康正果：《我的反动自述（1949-2003）》

目录

小引
01 解放
02 寂园读书乐
03 日记忧患
04 初入大学
05 检讨老手
06 紧急转移
07 开除
08 社会渣滓
09 劳改窑
10 在劫难逃
11 就业队
12 抄家
13 我要翻案
14 鬼迷心窍
15 马疙瘩
16 初识梦霞
17 绒线花树下
18 “素女为我师”
19 被捕
20 我叫二号
21 提审
22 精神会餐
23 妄图与敌挂钩罪
24 判决号
25 收容站的杀威棒
26 避秦何处桃源去
27 放开肚皮吃土豆
28 担水上山路
29 抽紧的法绳
30 偷吃偷喝
31 绝不留场就业
32 黑人黑户
33 老贫协
34 李春来
35 宝玉这秃尖子

36 “吾不如老农”
37 打赌摔跤修马达
38 曼丽
39 修理钟表来
40 毁炕风波
41 打得好
42 偷听敌台
43 父亲之死
44 山里领来的媳妇
45 女人是个房楦头
46 春天来了
47 还乡难
48 学院小世界
49 “朝这开枪！”
50 出中国记
51 我不是归人
52 恶梦还在恶
53 行行重行行
54 打破沉默
55 秀芹
尾声

小引

1979 年是我这一生快意之事高度集中的一年：首先，我开除学籍和劳教三年的处分先后宣布平反，多年的“反动”帽子一风吹了。其次，参加了两次招考，先是由农村考到中学教书，几个月后，又考上研究生，竟得到再次入大学读书的机会。最后，平反还带给我一笔可观的收入，我拿补发的钱给妻子买了她渴望已久的缝纫机，也给自己买了急需的自行车和手表。家中其它成员，该花的也都给花了一些，花到最后，存折上尚有近千元存款。那时候，这笔钱可是个不小的数字。

我妻子跟俩孩子尚留在乡下，她照旧当她的社员。村里的人虽不太清楚我读的那研究生是啥名堂，但对她这个山里头领回来的媳妇，周围的妇女已有些刮目相看起来。听她说，有天晚上，学校操场上看完露天电影，她跟几个姑娘同行回村，一路上她们问长问短，中心的话题，竟是向她讨教找对象的经验。姑娘们问话的口气挺认真的，满天星光的辉映下，好像她真有啥本事能教她们找个如意郎君。

当时报刊上正流行报告文学，报导了不少平反后得到新生的人物。有历尽艰辛，却还忠于党和国家的受难英雄；有受尽打击，依然坚持在事业上做出成绩的杰出人才……就在此类文章争相传阅的过程中，被报告的人物与写报告的作者双管齐下，同时出了大名。报告文学开始吃香，一时间不少舞墨弄文者都尝试起这一新兴的体裁。

那还是我初入师大读书的秋季，有一天一位老同学带了个记者找我采访，说是打算把我自学成材的经历写一篇报告文学。“自学成材”？我沉吟了一下。就用这四个字来给我定性？听起来怎么叫人觉得怪夸张的？我再次沉吟“自学成材”四个字，越想越觉得我的故事并不像是那么回事。我自二十岁被踢出大学门，一直在劳改队和农村干体力劳动，仅在偶尔有空

时读了些蹓到手的书籍，实在不敢奢谈所谓的“自学”。就是现在读这研究生，也只是想由中学跳到大学教书，求个更自在轻松的工作环境，更指望将来当了教授，好解决老婆孩子的城市户口问题。报上说，知识分子的春天到来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都把入大学读学位当跳板，好脱离不愿待下去的地方或改变不喜欢干的工作。仅此而已。我们的导师霍教授不爱给学生上课，我们一直按他的指定在读几大本枯燥的《全唐诗》，哪有什么动人的“成材”事迹值得一谈？

“你们真想写，还是听我讲我被打成反动分子的故事吧，可以写写我到底怎么反动起来，后来又怎么不反动了。”我向那两位提议。

话说出口，才发觉说得有些突兀。他们刚才还很热心的表情突然低落了许多，好像让我浇了一头冷水。他们对我的反应明显地有所警惕，仅草草提了几个对不上号的问题，就起身告辞了。原来他们想借用我受辱的经历，编排那类趋时的文章，没想到叫我两句愣话给吓走了。我心里不悦地想道：走了也好，哪里的娃哪里耍去吧。

这是我处事的一贯方式，凡让我闻出了馊味的人和事，都是掉进眼睛的沙子，即使是几分钟，我也隐忍不了。

就是从那一刻起，我产生了把我当反动分子的经历写成故事的想法。这个故事应该怎么写，我还不清楚，只是朦胧觉得，我要写的与那些报告文学或小说中的人物及其故事不是一回事。应该说，遭遇的事件都有类似之处，但他们讲述事件的腔调和品味却让我觉得不太对头。我理想的腔调和品味是什么？我自己也说不上来，只能说与我反感的那些东西截然不同，我的想法尚悬浮在逆反的意向中，还没析出明确的思路。

幸好那两位没编排成我“成材”的事迹登报献丑，事实很快就证明，我不是他们要塑造的成材人物。当研究生的日子仅风光了两年，我又在言论上惹了麻烦。我的学位论文被定性为“宣扬色情”，虽与政治不沾边，但仍被认为思想倾向上有很大的问题。不少同学和老师都避着我了，连回到母亲家，同院的邻居也用怀疑的冷眼看我。这一次，几乎所有的亲友都认为事情怪我，都说唐宋那么多伟大的诗人哪一个不能写，何必偏偏要选“艳情诗”这种被视为反面的作品去做研究。

看来历史并没有终结，我也没有走出自己的故事。一面警惕着不可把握的未来，一面对于命运的未知方面，我仍暗怀好奇的冲动，管它是幸运还是灾难。

人家作假都习以为常了，因而戏上的样板照搬下来，现实生活中仍可运用自如。我眼里却容不得假，公然不用社论体说话，结果堕入恶性循环，在生活中被迫重演了自己从前的苦难故事。

有个亲戚，对我有过小恩，后来我考上研究生，她前来祝贺，言谈间颇带居功的口气。此时见我又栽了跟头，她好像要发泄自己有功未受报的不满，当面就做出了我这个家伙的确不成材的结论。

除了报告文学，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也是好戏连台。那一阵，又是“伤痕”，又是“反思”，流放归来的作家群重放了鲜花，香红嫩绿得令人的春心好不荡漾。小说一时间成了国人的生活教科书，不管是长的短的，一发表总是广泛传播，引起强烈的共鸣和争论。周围的人甚至常拿小说中的人物与我比附：有的说，《牧马人》中的婚姻结合很像我的，甚至戏称我为“牧马人”；有的建议我一定要看《人生》那部电影，个别人甚至警告我说，千万不要走高加林那条错路。被称为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和电影就是这样专断地篡改着现实，反过来又将其虚假的模式推销给现实，以致现实中的人也模仿着它的腔调说起话，还将他们的期待和担忧强加给我。

古人云：“痛定思痛，痛何如哉。”我们的时代已经流失了古典的沉痛意识，却流行在苦难的复述中给受难者颁发浪漫主义的受难奖章。常是在与朋友们聚会闲谈中，大家要我讲我那些年的经历，我讲起其中颇为传奇的段子，总有些人恨不能分享些酸楚，于是就鼓励我快

把它写成小说，好喂养人们在反刍那个苦难年代时的悲壮心情。小说这种文体，曾作为街谈巷议的东西，被贬低了两千多年，可现在，我看也把它拔高得太过了头。在热衷小说的国人眼中，有了丰富的经历而不去攀附小说，好像那一段私生活就贬了值似的。写小说的朋友也看好我的素材，或拉我合作，或要我交给他们去编，都说一旦写成书出版，肯定会引起轰动。

我不是没起过哗众取宠的俗念，人总是活在人群的影响中，别人的期待刺激了我的妄想，无形中也给我造成了某些压力。有一段时间，那期待与我的妄想加在一起，相互作用，竟至压迫得我可笑地担心，若不把我那个好故事迅速写成书出版，可能就要错过轰轰烈烈的时代列车。无奈我实在缺乏趋时的才能，只因拿不准如何讲述那些仅作为段子存在的散漫经验，结果一拖再拖，举笔踌躇着过了四十，继而有所不为地晃荡到五十好几。其间好事者仍时有类似的建议，我则敬谢不敏，无复当年跃跃欲试的心情，尽管心里头仍旧酸酸痒痒的。

北齐的颜之推在批评当时的浮艳文风时说过：做学问只要老老实实地做，即使天资平庸，多少都能做出些成绩。但若缺乏才情，却硬是要染指词章，则费尽了心思，到底也写不出像样的东西。颜氏的告诫诚为明哲，我最初是起过搞文学创作的念头，自以为有那么丰富的经历，不愁写不出有趣的故事。但几经尝试后，才发觉自己在这方面并无才能。想起颜氏的忠告，便毅然把写作的重心转向了批评论述性的文字。颜氏说："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放在今日这个文凭科层社会的语境中理解，那就是说，拿上学位，谋得教职，有了稳定的生活和收入，你才有条件从容裕如，慢慢试着去干你想干的事情。但若毫无根底地浪博诗人或作家的浮名，特别在今日的后现代社会中，那可是糊弄别人也耽误自己的事情。

为那篇倒霉的论文，我付了不小的代价，后来几经折腾，才在西安交大当上了语文教师。我开始老实做我的学问，抑制着屡屡萌动的俗念，在整个浮躁的八十年代，并没有贸然拿我那段经历去投资喧嚣一时的文学新潮。

回顾自己以往的文字生涯，可以概括为这两句老实话：没写成很想写的小说，仅做了些还能做的学问。

直至在中国住到很难再住下去的一天，我们举家搬到了美国。带了一腔难以泯灭的"六四"悲情，在经济大潮席卷中国之日，我有幸避入异国学府的港湾，靠教自己的母语，最终有了安身立命之地。我在故国虽被迫放弃了很多很多珍贵的东西，却仍保留了那块土地哺育我的文化资源。来到美国，说汉语写中文竟成了我的饭碗。拜本职工作之赐，走出母语之国，我与我的母语反而有了从未感受过的亲近。

时空拉远了，写不出小说的焦虑也沉淀下来。对于那一直想讲的故事，这才渐渐获得了走出庐山看庐山的视角。譬如有个草莽石匠，忽然看中一块石头，几番摩挲，却不知从何处下刀。他退而远观，左旋右转，环视几周，慢慢才看出那石头形如卧牛。于是他大刀阔斧，因势而雕，稍加砍削后，沉睡在顽石中的卧牛气势栩栩然而醒，露出了荦荦的头角。

原来，困难和问题并不只是纯技术性的。我固然缺乏小说叙事的才能，但我的故事也不适合小说的框架，它就像那卧牛石一样浑成，精雕细琢成赏心悦目的玩意儿，反而可惜了它原有的材料和质地。

我的故事一直都在现实中推进着，写不出来，是因为它尚无结局。喜剧向来都有些套子，其中的一种结局就是平反。平反是庸俗的报告文学、流行小说和电影的结局，也是很多与我经历类似的长辈或同辈在自己人生道路上翻版了那些作品的结局，但却不是我想要的和应得的结局。对接受了那一结局的人们，我不想在此多说什么，各人都有各人的命。我只能说，那种结局所包容的自足和美满，我并不艳羡。平反仅宣布取消我所遭受的惩罚，但并没有给出我受难的答案。没有答案，就赎不回我在无数次检讨、批斗、审问和折磨中受尽的屈辱。因为平反只是一时的政策性赦免，政策一变，曾一度温煦的光圈就随之暗了下来，又退化成再次的受辱，这就是我在我的国家反复堕入"反动"的运行轨道。从 1949 以来，中国一直

处于反动的时代，反动的政党及其政权怎么能给不承认他们的人民真正平反！

我的故事并不是一幕戏，不是写出来叫人看热闹的，因此它无法纳入演示的程序。直到我真正动笔写起它，才渐渐地感受出，我起初在叙事上的无能并不意味着我毫无叙事的能力，是我要讲述的本事在从中拒斥，它不接受现有的模式，因此才产生了那种紧张状态，使我经受了无能的焦虑。

就这样怀着朦胧的醒悟，我走出无能的焦虑，下了守拙的决心，决定踏实地写一部自述，就像当今很多普通人所写的那种非虚构叙事作品一样朴素。在以下将要展开的故事中，我试图在经验与文字之间，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在原发状态与被表述的世界之间，开启一道回旋的叙述之流，让洄溯、蔓延、推进和展望交织在一起，把淹没在检讨、批斗、审问和折磨中的屈辱叫魂一样再扯出来，翻出那招供中的抵赖，挨打中的闪避，劳瘁中的偷闲，以及种种匮乏中按捺不住的渴求——从对食物和女人的渴求直到对了解真相的渴求，从渴求平反到渴求返回城市、返回学校，直到渴求走出中国和出了国又渴求回国，回了国再次逃离——，从而赎回那一纸平反书不可能给出的答案，向我自己，也向他人呈现出我这个"反动"绝非那个话语帽子的"反动"所能扣死的丰富意蕴来。

但愿我讲述的这些真人真事没让我讲走了调，没在想说实话时说假了嗓子，没把我要写的"不是那一回事"也写成了"那回事"。

真假虚实的关系，有时在具体的叙事中甚为复杂，非虚构叙事并不意味着绝对排除虚构的叙事手法。我这本自述中，至少有两点，应在此交代清楚。

其一，既为真人真事，按说所有人物都该用真名实姓，但我只给一部分人物用了他们的真名实姓。另有一部分人物，考虑到政治的或隐私的因素，我隐去他们的真名实姓，酌情杜撰了姓名。我本无意在我的自述中孤立地描写任何他人，实写他人，多为了虚写我自己，即写出在那个对应交错的关系中浮现出来的"我"。因此，这些人物和我的关系已不可更改地成为我的经历的组成部分。鉴于他们目前仍居住在中国大陆，为避免因提到他们而影响到他们的安全，也为避免由此而给我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只好在部分人物的命名上采取虚构的策略。这样一来，谁也没有必要对号入座了。

其二，虚构的叙事手法涉及到剪裁和拼接的操作，既为叙事作品，总得有一定的可读性，不能所有的事情，一五一十，都流水账一样拉杂记下来。所以，有时一个事件涉及到几个人，叙述中容易造成头绪繁多的情况，我就采取简化的手法，把牵涉到数人的事情合并到一两个人的身上。比如，我上大学时，与同学通信的事被揭发出来，接着引起烧毁日记，最后被开除学籍。其间牵涉的同学很多，若全部罗列，势必弄成专案材料曝光，最终失去讲述的条理。为讲述中主线分明，我作了删除，舍去枝节，只集中写出两个与我有牵连的同学。总之，事是经，人是纬，宁可忽略人而保存事的原汁原味，也不可拘泥于人而歪曲了事的真髓。类似情况，不一而足。特举此一例，是要说明，即使是讲真人真事，也得有详有略，有取有舍，尤需在重构事实的意义上采用虚构细节的手法。

常言道："听话听音呢。"声音所包含的信息量，有时比从字眼中死抠出来的意义要深厚得多。我竭力追摹的飞动之势和错综之象，有些，已远远超出牝牡玄黄之类形似上的细琐核实了。

一 解放

1949 年初夏的一天，奶奶包好那堆银首饰，提起她的蓝土布包袱，就领上我仓皇出了西安的东郭门。

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那天是五月二十日，西安市就是在那天正式宣布解放的。我当

时还不满五岁，尚不懂“解放”这个新名词的全部含义，只记得出走前的那几天，奶奶和周围的人天天都在谈论中央军败退和土八路就要打进城的消息。那土八路是什么军队，他们没见过，也都说不清楚，但从他们说话时的神色和语气能明显看出，所有的人都很担忧眼下正在发生的变化。奶奶特别害怕军队，看她那紧张的样子，似乎不管是哪一路的军队，进了城都会打劫老百姓的财物。听她说过，包袱内那包银首饰是她的嫁妆，在那个时候，她手头也只有这一点可变卖的财物。就在奶奶和周围的人天天谈论土八路的日子里，我多次见她从柜里拿出那些镯子、簪子和项圈包来裹去，好像收藏不稳妥就会被土八路抢走似的。

东郭门外有两条丫叉一样分开的土路，向南偏的通到奶妈她婆家，向北偏的通到她娘家。听奶妈多次说过，我出生的那一年，她的头生女子得四六风殇了，她趁自己饱满的奶水还没吊上去，执意离开她婆家，跑进城奶上了我。她不喜欢她那个老实头丈夫，自到我家奶上我，她就不想再回她婆家去了。但逢年过节，她常带我走这条偏北的土路回她娘家。我能像公共汽车售票员报站一样说出沿途的村名，能记得哪儿有处古墓，哪儿有座寺塔，哪儿的路口上卖凉茶。往常，行人稀少的土路上，总是平淡的乡野风光，这一次走在路上，却看到了从没见过的景象：有人从城里往乡下跑，也有人从乡下到城里去，还有从撤退的中央军队伍里逃出来的民夫，他们在路上抹下衣服，让别人看他们肩膀上抬担架磨出的红伤。远方传来沉闷的大炮声，还有炸毁浐河大桥的轰然巨响。我看见各色包袱，手提着，肩扛着，担挑着，车拉着，都在转移和掩藏私人的财物，都害怕叫路过的军队抢走，怕正撤走的，更怕就要打来的。我们一路上都没看见军队，只是半路上看见怕遭军队打劫的平民混乱中哄抢了军队的财产。那是一处国军驻扎的营地，位于离大路不远的地方，驻军刚一撤走，涌入的人群便拆掉军营的房子，扛走椽檩和库房里袋装的面粉，而另一些还没得手的村民则互相怂恿地喊着“走，发洋财走！”乱纷纷都向那里涌去。

赶到奶妈她娘家已是半下午时分，他们住在又深又阴的土窑洞里，炊烟熏黑的窑顶裂开一道道缝子，在抬起头仰望的一瞬间，我不由得产生它会不会塌下来的恐惧。我坐在炕上伸展酸困的双腿，深深吸了一口气，特意感受我爱闻的土腥味、发霉的草料味和淡淡浮起的炊烟味。窑壁上的神龛点着油灯，下面有供桌，奶妈撩起桌围，桌下现出黑暗的洞口。她把那地洞叫窨子，她下了窨子，藏好了她带回来的包袱。随后，有许多邻居拿着他们的大包小包走进这窑洞，也都一件件藏入供桌下的窨子。惊慌的白天终于过去，溃退的军队已撤得很远。直到次日上午，并没有发生任何军队抢劫的事件，邻居们又纷纷过来拿回了他们藏在窨子内的包袱，村里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十来天后，我跟着奶妈从乡下返回东关老屋，城里早已宣告解放。在那一段日子，“解放”这俩字出现在到处张贴的标语上，也传布在民众的口头上，宣布解放的声音一时间响遍了整个城市。一些人听到另一些人欢欣鼓舞地唱歌，便都跟着欢欣鼓舞地唱起歌来，我也跟上周围的人唱一首刚流行起来的歌曲：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解放区的太阳永远不会落，
解放区的歌声唱呀唱不完。

唱歌的时候，人都随着歌曲的情调显得喜气洋洋，好像“解放”这新名词无形中产生了切割的魔力，随着千千万“解放”的呼叫喀嚓一声切下来，眼前的世界就在我们的口头谈论上分成了截然不同的新旧两半，尽管那被指称为一新一旧的两个社会实际上还粘连在一起。比如，我家二门内的院子照样终日安静，灰蓝色的鹁鸽照样在屋脊上咕咕鸣叫；门口的老槐树依旧半死半活，半边树身还是裂着那么大的树洞；从东郭门到我家的一段路还是那样坑坑洼洼，那土城墙根下照样有粪便、垃圾和死猫死狗，大老远就臭烘烘熏得人头昏。

古城刚解放，有太多的喜事要聚众庆祝，有太多的政策要上街宣传，而一有庆祝宣传的

活动，从我家隔壁的中学就涌出了游行的队伍。师生们敲锣打鼓，手持红纸绿纸做的小旗，旗上写有各种标语，他们边走边呼口号，同时举起手中的小旗，用力在空中挥动。

奶妈爱看热闹，往常正月里街上玩社火，她叫上家里专职做饭的厨师一起出去逛街，那人个子高，他把我往肩上一架，就在人堆里挤来挤去，挤到最前面，看游行队列里形形色色一身戏装打扮的人物。所有的角色都塑像般一动不动，被固定在抬起来的道具上，高悬空中，缓缓随队列移动。奶妈指着过来的角色，告诉我每一个人物叫什么，出自哪一折戏。但眼前的游行队伍完全变了样，那是打着腰鼓扭起秧歌的队伍，他们大摇大摆地扭起来，前行两步，又后退一步，有的头戴八角帽，身穿列宁服，有的头上挽起白羊肚儿手巾。他们走一段路，还停下来，在街头围起场子给观众演唱。这些新节目全与旧戏无关，奶妈再也叫不出名称。只有那锣鼓声和从前一样震耳欲聋，咚咚锵，咚咚锵，响得古城里三天两头都像在过年。“解放”就这样在游行队列的行进中喜气洋洋走过了街道，给奶妈和我，也给我们周围的人群留下了它明显不同于解放前的一系列印象。

自然没人再使用“土八路”那个明显的蔑称了，现在都把进城的军队叫解放军。这是正式的称呼，再不许有其它叫法。那是解放后一天的黄昏时分，有一队解放军开进了东郭门。我们在二门内听到了外面喊着“老大娘”的叫门声，奶妈前去给他们开门。她始终无法消除老百姓对军队那种固有的恐惧，事后她对祖母说，去开门的时候，她双手发抖，抖得半晌都拉不开门闩。那支部队当晚就在巷内驻扎下来，次日还借用我们家的厨房做饭。并没有发生奶妈和其他人一直担心的事情，他们尊守纪律，态度和蔼，自始至终，情况都很良好。尽管如此，城里人一时还难以扭转原先对土八路形成的印象，比如关于他们的土气，就在巷子里留下了几则笑话：说是有士兵咂着纸烟在电灯泡上对火，还说有几个住在法院院长家里的士兵听见电话铃响了，立即卧倒在地板上拉动枪栓，还以为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

解放军开走不久，我家中发生了进入新社会第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派出所换了新户籍员，他穿一身旧军服，说一口陕北话，每次走进我家院子，家里的人都招呼他到堂屋喝盖碗茶。他好像坐不惯光滑的楠木椅子，经常是坐着坐着，鞋也不脱，就在椅子上圪蹴起来。他来我家的首要事务是盘问父亲那台五灯收音机的情况，听他盘问的口气，好像那是一件违禁的东西，好像它并不是收听广播的装置，而是被当成一种可能会用来发射无线电报的机器。就为这讨厌的收音机，父亲被多次叫到派出所问话。经过一番审查，父亲并没有什么问题，但他实在厌烦了派出所的纠缠，干脆把那收音机一缴了事，从此才断了那个户籍员的骚扰。

父亲毕业于国立西北农学院，学的是水利工程，后来去重庆进修了城市给排水工程，结了业就回来负责筹办西安市的自来水厂，任筹备处处长之职。解放前，父亲穿西服打领带，留的是吹了风的分头，上下班骑一辆摩托车，在他的客房里接待过从美国田纳西州前来协助建厂的工程师，还和那人用英语说话。父亲还教我用英语问好，给我吃美国炼乳和麦片粥，那些东西都是罐头装的，上面都写着英文。解放后新政府接管了旧摊子，父亲属于留用人员，在新成立的自来水厂里担任副总工程师。厂里派他去上海跟解放前承建水厂的外商打官司，他在那里住了好久好久，为厂里追回了落在洋人手中的大批款项。大约就在他去上海为新政府争利益的日子里，我们家的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土改开始了，祖父被划为地主成份，按当时的政策，工作组要让他赎回我们家前不久卖掉的土地，再交给工作组给贫雇农分配。祖父只好贱价卖掉我们西安东关的老屋，拿卖房所得补了那个窟窿。我父母带上我和两个妹妹搬到城内租房居住，从此以后，再也没能力拥有私房。

我们离开了偏僻的东关，住到了南城墙根下一条幽静的巷子内。逢周末或过节，我们全家人常去东关，每一次都是到园子看望祖父母。那园子离卖掉的老屋不远，紧贴着东郭边上那道残破的夯土城墙。附近的老户都把那园子叫康家坟园，因为祖父他母亲就埋在园内的一座石头宝塔底下。祖父他母亲一辈子吃素念佛，民国初年，祖父客居上海的时候，接母亲到

江南一带朝山拜佛，老太太不幸病逝在进香途中，灵柩运回西安东关老屋，就在附近的东郭墙下择地下了葬。祖父自幼丧父，是他守寡的母亲供给他读书成了人，因此对慈母的怀念，在他心中尤为深重。当时祖父正在创办实业，力图振兴地方经济，谁也没想到办完了他母亲的丧事，祖父突然决定放下手头的一切俗务，就在那墓塔周围辟了个十来亩的园子住下去，从此发愿学起了佛。佛教称有修行的僧尼之死为圆寂，因为祖父他母亲葬于园内，他便命名这园子为寂园。

自从我记事起，祖父就在园内过他的静修生活。他雇匠人常年在园内雕版印刷佛经，专设有客房供养来往的法师，也召集本地的居士在一起讲经说法，平日就他独自住在那里，不许家里的大小随便到他跟前走动。祖母和儿孙们均在各自的住宅内过他们的日子，只有逢年过节，全家才去园中和他相聚。

在我最早的记忆中，寂园正门内有一重圆门洞开，每一次我走到那里，掀起门两边刻有对联的木牌猛往下一放，总会把藏在牌下的壁虎惊吓得钻进墙缝。进了圆门，沿青苔斑驳的小路穿过一片竹丛，拦路有一架老藤蟒蛇般盘起，爬上大树，缠满枝干。藤架的左手有假山和鱼池，右手是一排瓦房。沿房前一条砖铺的小路继续前行数十步，上台阶而入正屋，经过方砖铺地的过厅，揭起门帘就进了祖父自称为“精舍”的房间。那房间内永远有烧香的气味，若碰上祖父待在屋内，他十有八九都是在沙发上盘腿打坐。他默数手中的念珠，白胡子胸前长垂，慈眉喜眼的样子，满脸都是安祥的神情。

父亲和伯父们出现在那里的时候总显得有点拘谨，他们一进去先是站在一边，祖父叫坐下，他们才在远处捡低座位坐下，说话时声音也压得较低。他们好像在尽量躲避什么，我总觉得，他们不想让祖父在他们张口说话时闻出自己口中的气味来。祖父吃长斋，严戒烟酒，他的鼻子对此类东西的气味尤其敏感。但他的三个儿子并不信佛，他们既吃荤又抽烟，平日出现在祖父面前，都显得毕恭毕敬，而且总是要坐得离他较远一些。

我们几个孙子在祖父面前就没有那么多的顾忌，比如我，小时候就最喜欢走上前摸他的白胡子。有时候母亲若走过来喝止我的顽皮，祖父总是哈哈一笑说：“爷爷孙子老弟兄嘛”。接着就习惯性地高声念一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每一天不知要在祖父的口头念多少遍，那常常是他言谈间偶然停顿时惯用的插入语，也是他终止谈话时脱口而出的感叹词，在不同的语境中，祖父的“阿弥陀佛”可能有不同的表示，有时是赞叹，有时是遗憾，有时也可能是发出警告……总之，佛教用语随时都从祖父口中涌出，连起给每个孙子的名字，全都与佛经相关。比如我这个“正果”，按祖父的说法，即为佛陀的十大名号之一，是修行得道的意思。在家里没人严肃地叫我这个大名，都亲切地叫我“果子”。

我翻过祖父五十八岁时写下的一本自述，还断断续续听他讲过自己的不少往事。祖父学佛前也有过思想颇为激进的经历。前清时在临潼老家读书，他成立天足会，印发“放脚歌”，发起过“天足”活动，在他的主张下，他的长女从小就没缠脚。祖父参加了清朝的最后一届科举考试，考中了秀才。随后清政府废除科举，他去京师大学堂攻读政治经济。在京读书期间，他加入同盟会，写过反清的诗作，辛亥革命一爆发，他即辍学回陕，在临时军政府任了要职。也就是在这一社会巨变的年月，他从临潼乡下一介贫寒的书生一跃而为军政府的官员，遂有了我们东关老屋那一大院房产，且置了后来辟为花园的一大片土地。袁世凯很快当政，临时军政府接着遭到取缔，包括祖父在内的很多要员都成了当局通缉的人物。从此他避居上海租界多年，在那里办报写文章，鼓吹实业救国，一度还颇为左倾，接触过孙中山和陈独秀，印发过宣传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小册子。但二十年代初回西安住进寂园以后，祖父便完全退出政治活动，再没有担任过任何公职，直到解放军进城，他始终靠仅有的房地产维持生活。除了念佛弘法，他在地方上还参与慈善、赈济和兴办教育的事务，募捐修复了不少破败的佛寺，在西北地区的佛教界，算是个很有地位和一定影响的人物。

据说土改刚开始的时候，地方上本来是决定要没收康家坟园，且准备大肆斗争我祖父的。

是当时在西北军政府任职的青海活佛喜饶嘉措从中保护，由上边打了特殊照顾的招呼，祖父才没有受太大的冲击。土改的结果是，仅分了他所有的土地，那十几亩地大的园子，因属于现住的房产，竟一点也没有触动。但祖父从此失去从前赖以为生的房地租收入，要解决每一天的吃饭问题，只有继续变卖家产。他只剩下葬有母亲的最后一块地皮可供变卖：先是卖掉从前门到紫藤架之间的一段，接着又卖了后门内刻经房周围的一段。有一次我们从城里回寂园去看望祖父母，我发现那十几亩地大的园子已让前后新立的界墙从两头切断，只留下了中间那不能再分割下去的一块。祖母早已在老屋卖掉后搬入园内与祖父同住，她得亲自动手干从前由佣人所干的家务，照顾祖父的饮食起居，还得跟上他严格地吃素。她那些年搓麻将、端水烟袋保养得很好的手，如今在灶火下弄得粗糙了许多。一到冬天，她动了洗碗、洗衣服的脏水，手上就裂口子，手指和手背都贴了多处的白胶布。

解放初那段十分拮拘的日子，祖父并没有过得太久，几年之后，他的生活即蹦到了转机。大概是我上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去寂园，我注意到上房的内外都经过了打扫，室内灰暗的墙壁还刷了石灰水，屋内一下亮堂了许多。祖父好像要隆重招待什么客人，家里专门请了厨师在做比较讲究的素席。后来我才听说，他从前的一个朋友如今在北京当了大干部，当时那人正在西安的人民大厦开会，说好了要来园子看望一下祖父，我所见的那番情景就是专为接待这位贵客所做的准备。

不久，祖父就当上了市政协的委员。他有了自己的组织和归属，平日在家里他常穿长袍马褂、对襟衫子，现在他开始穿上灰布或蓝卡其的中山装去参加会议，跟他的宗教组成员在一起学习讨论中央文件。开完会，他还带回来大包小包的学习资料，在学佛之外，又多了学习文件和马列主义的功课。"学习"一词现在对祖父有了新的意义，它意味着改变旧脑子，接受新事物，它要求他们这些政协委员通过开会、讨论、读文件来统一认识，不断对上边传达下来的政策在口头或书面上做出赞同的表示，进而在不同场合广泛宣传，最终让更多的人都学会用那种通行的官方表达方式说话。在这一政治时事语境中，说一个旧社会过来的老人学习积极，就等于肯定他政治上要求进步，拥护党和政府。我不知道在刚一开始的时候，这一切是否让祖父和其他委员们觉得自己被人支配，受到约束，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他们这些毕竟都同旧政权打过交道的人来说，不管是哪个党的政府，只要有来自当局的重视和照顾，总归是有面子和很荣誉的事情。对任何一个识时务的人来说，能受到新政权的礼遇，总比被打入另册，挨整受罪好得多了。更何况参加学习还有酬劳，每到月底，政协的办事人员照例会给祖父送来一百多块钱；那不叫工资，按政协的说法，那叫车马费或生活补助，算是政府给祖父这类统战对象的一点津贴。在一般人月薪不过四五十块的年代，能拿这么多的补助，自然要算很优厚的待遇，特别对于失去了房地产的祖父，这一笔钱可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养老金了。

那时候土改已经结束，正是全中国乡下的土地主普遍让贫下中农压得抬不起头来的年代。比如外爷带着外婆从城里搬回他们长安县农村的故里，为陪伴他年老的父母而顶了那地主分子的帽子，就一直叫村里的人整得苦不堪言。我至今还记得，土改期间，有一次奶妈带我回她娘家，进了村子，村民们正在村口的学校门前召开斗争地主的大会。那地主高个子，紫糖脸，看起来是有些凶相，据说是本村的恶霸，民愤很大。村民们正在围斗他，砖铺的地面上侧立起两块砖头，拿红缨枪的民兵逼他一脚踩在一个砖头的侧棱上。他刚刚颤巍巍站上去，民兵就走上前一脚把砖头踢倒，随之一声脆响，他重重地摔倒在长了一层青苔的地面上。但围斗者并不满足，他们紧接着又逼他踩上砖头，又弄得他摔倒在地，如此反复进行，诉苦人的发言持续地增强着围斗的气氛，那地主摔倒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不一会儿，就摔得他鼻青面肿，一道殷红的血从太阳穴上流了下来。

站砖头的地主后来很快就在当地被镇压了。那时候，真不知有多少远不如祖父富裕的土财东都在失控的群众斗争中死于非命。而祖父这个地主，只因为拥有城市居民的身份，又正

好被上面选中去填充那个佛教界代表的名额，不但躲过了批斗，保住了他的园子，还享有了受人尊重的地位。如果他解放时拿的不是城市户口，而是住在临潼老家的村庄，如果他没信佛教，或当了居士而没有成为佛教界的领袖人物，我想他早就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叫当地农民扫地出门了。

阿弥陀佛，菩萨保佑，谢天谢地，祖父的印度檀香照样在他的佛堂里篆烟袅袅，香气浓郁，园内一度招客的房间再次腾了出来，摆满一架架佛经。家中又雇得起佣人帮祖母做饭了，荒芜了几年的花木也在请人修剪栽培，父亲还利用工作的方便，专门给园内安装了自来水，祖父常叫我帮他种菜浇花，残存的寂园一时间有了中兴的气象。

二 寂园读书乐

1958 秋季开学，我转到寂园附近的市二中读书。这学校从前与我家的老屋仅有一墙之隔，学生们在操场上升旗时唱起国歌，我也站在我家院内，忙着拉动拴在玉兰树上的绳子，把奶妈给我做的小旗子徐徐升到树杈之上。后来就是西安解放，不久祖父卖掉老屋，两隔壁打通了隔墙，那一大院房就并入二中，原先的大小房间经过整修和改建，都做了办公室和教师宿舍。刚转到二中上学，触处都让我想起小时候住在老屋的情景。

58 年是全国大跃进的一年，城内外到处大炼钢铁，与很多单位的情况相同，二中的小操场上，也是废铁和焦炭堆积如山。那上面什么铁器都有，甚至还混有显然由黄铜或白铝制做的东西。当时贡献废铁是光荣的政治任务，有人家里没有废铁可交，更有人想对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他们便毁坏自家正使用的金属器皿，以至不管那是不是铁，都一五一十都送到学校充数。我亲眼就看见有人砸了家中煮饭的铁锅，或扭下了大立柜上的铜栓。运动再往下发展，学生餐厅也临时改成了翻砂车间，餐厅外的空地上，强劲的鼓风机吹得土高炉火星飞溅，紫烟升腾，坐在教室内都不时能感到它轰隆的震动。大家好像都顾不上考虑日常饮食起居的事情了，高年级的学生日夜在高炉边奋战，还朗诵他们新编的诗歌，庆贺节日似的欢呼钢水的出炉。钢水冷却后结成炉渣状的硬块，黑不溜秋的样子，那就是我们土法炼出的钢铁。我们给那“炉渣”块结上大红绸子，敲锣打鼓抬到区党委报喜，红纸上大书“超英赶美”的标语。

学校里三天两头停课，连我们初中生也由老师带到工地上干一些较轻的杂活，就是从那时开始，我对学校的各种活动产生了抵触情绪。

父母把我安插到祖父母身边读书，确系他们工作太忙，顾不上管我，但突然把我转到二中，也有从此断绝我与我那些街巷玩伴来往的用意。五十年代的中小学，学生的功课远比后来轻松，大人们白天上班忙碌一天，晚上还要去单位开会参加政治学习，在我的周围，很少见到谁家的父母下班后有工夫守着孩子抓他们的功课。我们一放学就成了一群没王的蜂，做完作业再无其它负担，剩下的时间便全在巷子内疯玩。那时候各家的条件都比较差，很少有谁家的父母花钱给孩子买玩具、乐器或运动器械，我们聚在一起，能玩的多是些野孩子的活动：不是上树翻墙，就是摔跤打斗，甚至大着胆子爬上附近的城墙。

西安的城墙保存得相当完整，规模也极其宏大，向城外的部分全砌以大块的城砖，雉堞整齐，高临城河，依然保持着往日那不可攻克的形势。向城内的部分则裸露出夯土的墙壁，风吹雨淋，年深月久，不少地方都剥落得像受尽了侵蚀的土崖。为防止下到城墙上面的雨水冲垮夯土层，每隔几十米都修有砖砌的排水道。那是斜竖起来的巨槽，像高大的梯子斜搭在好几层楼高的城墙上，水道两边凸起的部分用大块的城砖砌成，由下向上，每一层砖都露出了约莫一指多宽的砖棱。解放前城墙上修过很多城防工事，直到五十年代，这城墙似乎还被市政当局视为遗留下来的军事设施而整个地封闭起来。原有的登城通道全部堵死，要想登城，

只能沿水道扒住砖棱往上攀：用十个手指头尖抠紧上边的砖棱，用十个脚指头尖踩牢下边的砖棱，十分吃力而缓慢地把整个身体向上提升。往上攀登的时候，绝不能注目下看，每一次换手都必须把握准确，稍有疏忽，就有摔下去的危险。攀登的过程紧张而费劲，等爬上了城墙，我们每一个人都累得手臂酸困，精疲力尽了。

除了参加此类冒险活动，我还耽读旧小说。自从有一次从父亲手中得到一本《水浒》，受了启蒙，我读旧小说的兴趣便一发而不可收。读完《水浒》，接着读《西游记》、《封神榜》、《三国演义》、《说唐》……先是由父母亲从他们单位的图书馆借，后来发展到向同院其他大人借，最后读完了从图书馆和私人手中借来的此类书籍，便去租书铺花钱租各种图书馆不收藏的剑侠小说。我迷恋于十八般兵器的名字，英雄与剑客的绰号，以及神仙们的坐骑和法术。在孩子们面前，我把这些新奇的词汇背得滚瓜烂熟，有时还比划起手势，给他们复述打斗的情节，模仿著书中那些讲故事的套语说话，把英雄好汉的绰号移用到我自己以及其他孩子的身上。复述我所读的故事时，我觉得自己已从书上学到了一点武艺，好像真有什么英雄事业在等着我带领孩子群去完成，好像只要走到离城市很远的地方，我们就能遇到那些发生在古代的奇迹。

这兴趣一直延续到我考上初中。我和几个上树翻墙的伙伴在一起攒钱，准备暑假登终南山。在城墙上一个废弃的碉堡内，我们开会讨论探险计划，并成立了"探险队"，由我担任队长。先是"五一"劳动节大游行那天，我们探险队成员溜出游行队伍去郊外玩耍，因翻了高干疗养院的墙，被警卫抓住给学校打了电话，回校后统统受了停课反省一天的处分。不久爬城墙又出了事故，有个探险队成员不小心从排水道上跌下来，摔断了腿，扎上石膏绷带在家里躺了好几个月。这一次事故闯了大祸，几家的家长都找到学校反映情况，纷纷抱怨自己的孩子受了其它孩子的不良影响。家长们告发了我们要去终南山的计划，还告发我是带头胡闹的危险人物。特别是成立"探险队"这件事，校方认为，才是初一的学生，竟敢擅自搞起组织，问题的性质已不是一般的不守纪律，教导主任因此严厉警告了几家的父母。我父亲觉得事态很严重，他最怕我受到坏孩子的影响，说我要是再这样放任下去，就有堕落成流氓的危险。父亲平日就不太喜欢我和街坊上的孩子混在一起，有时候我招他们到我家玩耍，只要听到父亲推自行车进大门的声音，孩子们都会吓得立即溜走。从外面疯玩回来，我常常把自己搞得很脏，手上和身上有土，有时候还撕破了衣服或擦伤了皮肉。因此我父母常斥责我说，今天我跟上那些孩子摔跤、打斗和上城墙，明天就可能跟上他们逃学、溜街，学成二流子。"探险队"事件更激起父亲过度的警惕，他决心要把我同我那些调皮捣蛋的玩伴彻底隔离开，因此便决定送我去园子和祖父母住在一起。就这样，我被迫告别了街巷里喧闹的孩子群，多少带了点被放逐的心情搬到祖父母的住处。

我住在祖父原来专门招待和尚的西屋里，那房间粉墙，地板，摆有笨重的旧式家具。屋檐下藤萝牵挂，再往后柏树森森，晚上一刮起风，就吹得曾祖母墓塔顶四个角上挂的小铁铃丁当作响，再加上楼上常有老鼠闹腾，每夜入睡前，置身漆黑的空寂中，我由不得胡思乱想，自己吓起了自己。起先是熄灯前祖母给我床头点一根香，让我害怕的时候看一眼那暗中发红的香火，默念着观世音菩萨慢慢入睡。与祖父口中那个远在西天，而又指向未来的阿弥陀佛相比，祖母的观世音菩萨要实在多了，我更喜欢菩萨那可亲的容貌，从此就养成了念观世音菩萨的习惯。

后来我从楼上的杂物堆里找出一把生锈的长剑，在磨石上花了几天工夫，最终磨得它发出寒光，连鲨鱼皮的剑鞘也擦得油光铮亮。我在床头挂起宝剑给自己壮胆，直到我完全习惯了那大房子夜晚时分的空寂和黑暗。

对楼上楼下尘封的堆积物，我由此生出继续发掘的兴趣。本来是想从祖父的藏书中找我想读的旧小说，结果没找到一本那类书籍，翻出的都是四书五经、老庄诸子、历朝诗文集等一大堆我从没见过的旧书。绝大多数书籍都是木刻本，线装，大字，通篇的文言，没有一个

标点符号。每蹤到阴雨日子，空气中隐约能感到发出霉味的湿意，翻动故纸堆不至于闹得尘土呛人，这时候我就有了翻检旧书的心情。我在过厅内铺着大方砖的地面上坐下来，撢净书上的灰尘，一本本随意翻阅下去。我捞到什么就读什么，读得没头没尾，杂乱无章，从祖父期盼佛教复兴的幻想小说《半枝香的梦游》读到八指头陀的诗集，从大开本的《十三经注疏》读到收集了大量陕西先贤著作的《关中丛书》，也读夹在书页间的东西，比如有好多年前几页戴季陶写给祖父讨论佛教的信，还有旧报纸上太虚法师来西安弘法的报导……就在这边整理边翻阅的滥读中，我不知不觉提高了阅读文言文的能力，等全部旧书都从积尘下经我的手一本本清理出来，我已半懂不懂地读了不少基本的古代典籍。

那是我此生最美好的一段岁月，每天做完学校的功课，其余的时间全用于阅读家藏的旧书。日子过得勤奋而单纯，我精力既充沛，感受又敏锐，正在开窍的心智尚为白纸一张，对读过的书籍，虽仅能达到模糊的理解，但由于感触新颖，印象鲜活，最初的记忆便来得深刻和牢固。直到后来我失去读书条件的漫长岁月，乃至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始终都觉得有一股知识素养的甘泉从那遥远的年代浸润而来，使我此生受用无穷。读书必须趁早，能在少年无忧无虑之日博览群书，真是人生最大的福气和快意。有很多国学的基础读物乃人人应读之书，如不趁年少之时狼吞虎咽一番，等到后来进入更专门的学习阶段，很可能就再难蹤到大量浏览的机会，即或得了什么机会，也未必能激起一心求知的少年时代那样浓烈的兴致了。

从尘土里清理出来的旧书已不能满足我的阅读需求，我在读书上越来越狂热和野心勃勃。我开始按专题或知识领域来分类集中读书，如按照文学史选读主要的文学作品，按照哲学史选读各种子部的书籍等。但祖父的藏书并不齐全，我开始出入书店，用我自己的钱买我需要的书读。祖父母都常给我零花钱。祖母喜欢差我跑腿买东西，找回的零钱，有时她就叫我全部拿去。祖父给钱则采取奖励的方式，比如我背诵了《心经》，或做了什么他认可的善行，他都会奖励我零钱。有一次我用我过年得到的压岁钱帮一个交不起学费的同学交了学费，祖父得知后便极力夸奖，奖给我的钱比我花给我那个同学的钱还多。所以自从住到了园子，我身上常有足够的钱进书店买书。

我特别喜欢去城里唯一的一家古旧书店翻阅旧书，每一次从那里回来，身上的钱都变成了我计划中应读的古代典籍。我买书不只供当下阅读，同时还贪求收藏和拥有，就像我从前收藏邮票或烟盒那样贪心，我越买书越想多买，而藏书越增多则越想更多，定期去古旧书店翻书或买书，成了我节假日进城的最大乐趣。那旧书店兼营出售与收购两方面的业务，这边的门面卖旧书，那边的专门收购旧书。看见有人拿旧书在那边变卖，我从中受到启发，于是心里暗想，何不把家里书架上那些无用的书卖掉，再用所得的钱买我需要的书呢？反正是旧书变旧书，拿无用的书换急用的书，最终还是更新了家内的藏书，总不能说我在暗中变卖家产吧。我这样考虑一番，说服了自己，觉得心无愧咎，就开始把我那更新藏书的打算付诸实行。每蹤到没钱买书，我便从家里的书架上选一些我认为没什么价值的书——如通俗的佛教读物和我觉得无聊的地方文人诗文集——拿到书店卖掉，再用所得的钱到这边的门市部买我想要的文史哲典籍。第一次这样干时，我还难免做贼心虚，有一点不安和后怕，最担心祖父有一天忽然要找我卖掉的那些书查阅什么，发现要找的书已不翼而飞，到时他追究起来，那怎么是好！然而我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其实，除了放在祖父手边的珍版佛经和几种大部头丛书，祖父并不完全清楚他的书架上现有什么书或少了哪本书。这个家除了我，很少有谁对那沾满灰尘的故纸堆有兴趣看上一眼，谁也想象不到那东西还可以变钱。就这样倒卖了很长一段日子，能卖出去的和我舍得卖掉的书差不多都卖光了，直到再也找不出可供倒卖的书籍，园子里的藏书暗中已有所更换。大量的劝善手册和地方名流的自费出版物让我分期分批地清洗殆尽，与此同时，很多国学基础读物陆续从外面补充进来。几年下来，在我的书斋内，经史子集中最主要的读物，大体上都收藏完备了。

我抓紧一切空闲时间，按我的自学计划读书。有时早上起了床，背上书包准备出门，我

都不太想去学校上那些无聊的课。我当然不是想赖在家中偷懒，而是嫌去学校熬四节课浪费我宝贵的读书时间。那时候，课堂内外的很多活动中，政治内容日益增加，政治课不用说了，语文和历史的课本编写和教学也明显有政治化的倾向。越是不想花时间死记硬背那些教条，便越是想待在家中多读些我爱读的书籍。我才是个初中学生，既不懂得什么是“反动”，也没有胆量反动，要怪也只能怪校方那些压制学生的条条框框把我逼到了它的反面。我特别讨厌以班级为单位的学校编制，班级的划分首先限制了学生在学习和课外活动上个人选择的自由，再加上有班主任这样专职管教学生的老师把我们跟前跟后，班级因此便成了让人感到特受拘束的空间。有时候我宁可多与外班的学生来往，也不想搭理那些常常向班主任汇报我的同班学生。按我的想法，学校既然是学习和交游的场所，校方就该多为学生开设有趣的课程，为学生提供结交朋友的活动空间。可惜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政治化，学校越来越办成管教机构，处处都把学生管得太死。为尽量少受学校教育的干扰，对学校的功课，我一律争取在校内完成，只要平时能保持中等或中等偏上的成绩，我就心满意足。而剩下的大部分时间，便全部用来在家里自学。

有位王先生常来园子借阅祖父的藏书，老先生写一笔好字，我请他为我抄下宋人翁一瓢《四时读书乐》一诗。我很喜欢这首七言古诗的情调，王先生工笔而书的那一张纸，我就把它贴在墙上朝夕讽诵。祖父显然从我的行动中看出了危险的苗头，对于所谓“读书乐”的提法，他很快就作出了不以为然的反应。

祖父毕竟参加了几年的政协学习，旧脑筋如今装了不少新思想，在很多涉及当前政策的敏感问题上，他其实比我这个长在红旗下的年轻人还表现得更加紧跟形势。祖父常夸我说，要是在旧社会，我就是天字第一号的好学生。但赞许归赞许，他一边对我的勤学表示欣赏，一边又摆出了有所保留的姿态。我能看出祖父内心的矛盾和隐忧。对他来说，孙子爱读书当然值得夸奖，但看到我的阅读内容越来越偏离学校的要求，祖父也时时对我提出告诫，他唯恐我受到负面影响，生出了什么不合时宜的想法。那是刚刚经历了“反右”运动的中国社会，我们家虽没有任何人戴右派帽子，但通过祖父日常谨慎的言行，我能感觉出无形的政治压力已扩散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连一个人读什么书，如今已不再是纯粹的私事，而成了关乎你政治态度的问题。新政权并没有白养各级的政协委员，那日常的学习开会表面上看起来很荣耀，但整个的过程都贯串了集训的内容。听报告，读文件，讨论发言，委员们总是在重复上边所定的调子，重复养成习惯，久而久之，随声附和者自然就懂得什么话该说或不该说的规定。祖父是佛教徒，往常他见了来客最喜欢大谈佛法。如今我注意到，他开始修正他宣扬佛法的方式，讲述中常用起他新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用语。比如，佛法所描述的世界乃因缘聚合而成，不是被外力创造出来的，在谈论这一缘起的世界观时，祖父就一再强调说，佛教不讲迷信，它与唯物论是相通的，佛教不同于其它宗教，它本质上是无神论的。

那一年祖父随政协出外参观，看了三门峡水库工地和武汉长江大桥，回来后在政协的会议上畅谈感想，并赋诗歌咏，一时在政协圈子内荣获红色老人之誉。社会主义建设的长卷轴才刚刚展开了它照人眼明的开端，像我祖父这类旧社会过来的老人，平日住在城里头，看到听到的都是正面的宣传，现在由政协组织起来定点参观了几项大工程，自然很容易让新社会的盛世图景激起真诚的爱国热情。当时全民都陶醉在革命浪漫主义的生产热潮中，二中所在的巷子内，临街的墙上画满了壁画写满了诗，有长到了云端的玉米，堆成了山丘的棉花，肥如大象的猪和下出了鸵鸟蛋的母鸡。经过图画和文字的夸张，一切工农业产品都被随心所欲推向了高产的趋势，连作打油诗歌颂新生事物的活动，上级都下达了生产任务，一夜之间，一个个编出了几句顺口溜的市民都俨然冒进成了诗人。

寂园的围墙为我维持了一个与外面完全不同的世界。我把楼上楼下凡能装点书斋的摆设都搜集起来布置我的西屋，端砚，贝壳笔洗，玉石镇纸，青铜香炉，字画，瓷瓶……再加上那一纸《四时读书乐》，装点得屋内很有文人的雅趣。而正是为纠正我明显脱离现实的倾向，

祖父模仿“读书乐”原诗的格式，作了《四时工读乐》一首贴在我西屋的墙上。那时候学校里正在贯彻党中央“又红又专”的号召，知识分子如果只重视专业和书本知识，忽视政治学习和劳动锻炼，就会被指责为“白专”而受到批判。祖父提出“工读乐”，就是要配合那个号召，要向我强调半工半读的重要性。但祖父的讽劝我并没有在意，他写的那张纸徒然贴在一边，在我看来，都是些很不顺眼的政治口号。

人的个性往往形成于惯常的行为，习惯了什么，自然就会爱好什么，进而反复去做什么，逐渐在反复操作中形成个人的乐趣。我那时只知沉浸于自己的读书之乐，还体谅不到大人的担忧，就这样不可更改地染上了文字积习。

我不是没有在其它活动上尝试过我的能力，练乐器，装矿石收音机，制作航模，参加各种竞技性质的游戏，我全都用心做过，都力图显示我有本领完成他人能做的事情。但所有那些需要动手的活动，我都搞得不得要领，半途而废。我也曾为小小的挫折而暗怀过懊恼，无奈之余，只好承认自己笨拙。后来我不再努力发展本来就缺乏的动手能力，最终退入了书堆。对我来说，与需要实际操作的活动相比，接触文字显然更容易取得效果。操作是很麻烦的事情，哪怕画一个圆形或三角形，你都得细心和准确地使用铅笔和规矩。处理文字则是调遣词句的活动，其过程仅诉诸理解和想象，无需实际操作的工艺训练，仅通过调遣词语，一个人即可达到情感或思想上的某种满足。坐下或躺着，翻开一本书读起来，身体随即进入松弛的状态，好比玩单人牌戏，再没有什么东西比书这一特殊的对象更适合一个人构筑独处的世界了。父亲现在可算初步达到了他的目的，他一心要隔离开的街巷孩子群的确是永久地隔离开了，我在书堆中潜沉日深，有时候都舍不得花费时间进城到父母家度我的周末。利用尽可能多的时间执行我的自学计划，在那时候成了我日常的头等大事，也成了我生活的价值，凡侵占我的课余时间而影响了我读书计划的事情，均在我抵制之列。

我与学校的一切冲突即由此而起。

那时候在学校里，典型的坏学生一般多指那些旷课、打架、辱骂老师，学习成绩很差的学生。我学习成绩属中上，遵守纪律一般，在校内外向无乖劣行为，自然不在坏学生之列。但从小学开始，我就很清楚自己不在表现良好的学生之列。

在此，我得先对“表现”这俩字稍作些界说，在 1949 之后中国的泛政治语境中，很多日常用语都随着生活全面的政治化而增生了它们在字典中没有的特殊含义。“表现”不只指表示出来，它还特指一个人平时懂得如何按照更高一级的要求有意去说什么或做什么，在言行上突出自己。通常，老师或领导在谈到你表现如何的时候，总会具体到你思想好不好，靠不靠拢组织，在政治上是否要求进步等等。一个学生处处能够按学校或老师的要求去做，就是表现好，否则便为表现不好。小学生表现好了才能入少先队，中学生表现好了才能入共青团，成年人表现好了才能入党。这表现的好坏一旦关系到学生在集体中所排的名次和被接纳的程度，乃至个人的前途，则如何争取更好地表现自己，就成了绝不次于考试成绩的大事。比如，那些善于显示自己的学生，通常便容易得到表现好的评价，而拙于或不屑于装模作样突出自己的学生，自然就不太容易给老师留下较好的印象。比方说打扫教室，那本是个日常事务，轮到谁打扫谁就打扫好了，但在当时的学校里，大扫除常搞成检查卫生的评比活动，打扫教室和校园不只是保持学习环境清洁的事情，它同时也被纳入了劳动比赛，每一个班级都要在检查组面前表现得比别的班级更好。这样一来，每一个参加清扫的学生便被拖入比赛的阵势，都得争着在老师面前表现自己干得很好。相比之下，像我这种散漫成性的人，举动又笨拙，不善于同别人配合，在老师看来，我这个人的一举一动就不只是不顺眼的问题了。久而久之，他们便对我形成表现一贯不好的印象，认为我有抵触老师的情绪。在校内，班主任或团组织总是圆心，随着注重表现的学生都不断向圆心靠拢，像我这样表现较差，不主动跟上去的学生自然就被甩到了圈子以外。

我才是个中学生，还没长到懂得政治的年龄，政治的框框就这样慢慢套到我头上，对我

打上了问号。

大炼钢铁一阵风刮了过去，“勤工俭学”却作为教学方针从此排进我们的课表，全国学校均增设劳动课，我们中学生每周都得参加几小时的体力劳动。这劳动课由校内一位主管勤杂的职员负责，在勤工俭学搞得最火热的日子里，我们今天被派往附近的生产队帮社员拔萝卜，明天又被带到街巷的社办工厂干杂活，等联系不到需要我们去帮忙干活的单位，就留在校内干那些本该由专职的勤杂人员去干的活路。干这些杂活时，我总有一种强迫劳动的不适。因为我认为，学生上学是为求学，不是为了接受劳动改造，学校不该迫使学生代替勤杂人员干活，更不该通过这种活动评定学生的政治表现。

我并不是不爱干体力活，平时在家里，我常跟祖父干园艺杂活，春天翻地种菜，夏天担水浇花，秋天抡起镢头在墙根下挖何首乌，还陪祖母采集半开的金银花，爬上树摘成熟的水果………我喜欢干这些体力劳动，是因为全出于我个人自愿，且有明确的目的，轻重快慢是由我自己掌握的，不必担心有人在一边监视，所以我干得很有乐趣。这就是我对自由的最初理解，虽然我那时并不懂得自由的观念。但学校派给我们的劳动却让我感到不自由，这一活动的目的是训练我们服从指挥，在整个的劳动过程中，我们都被迫做出热爱劳动的样子。我们被拖入了一种竞相表现自己的比赛场地，其他学生越有意要表现他们的干劲，我就越感到自己处处被动，步步落后，也越感到整个劳动的过程时间难熬。我常常怠工，漫不经心地磨混，或干脆找机会溜掉。就这样，在班干部或班主任的记录中，我无故早退或缺席的次数也就越记越多，日积月累，积成了我个人表现上的一堆烂账。

三 日记的忧患

1960 年春，有一天祖母差我出去买火柴和肥皂，我跑遍了东关的商店，到处都说没有，随后各种日用品就相继短缺起来了。卖小吃的摊贩完全从街头消失，走进国营的或公私合营的饭馆，花钱能买到的饭菜也越来越少。那年冬天特别冷，家里唯一烧煤球的炉子放在祖父的房间内，我的西屋冷如冰窖,晚上读书久了，常冻得我穿着棉鞋的脚发麻。听政治课老师说，因受自然灾害的严重影响，我们国家现在进入了困难时期。此后，“困难时期”这个新名词就在口头和书面上到处传播开来，成了当时的中国人对国家现状和个人处境的统一认识。

食品开始凭粮票供应，城市居民的粮食定量有了削减，从没挨过饿的城里人尝到了吃不饱肚子的滋味。但城市居民所受的饥饿，主要还是物资匮乏的总氛围造成的心理恐慌，毕竟家家都有购粮证，每月的定量总还能保证供应，谁家也没严重到揭不开锅的地步。真正受到饥饿威胁的，是为城市生产粮食和蔬菜的农民，他们没有定量标准，也没有粮站按时供应他们的口粮，一旦家里没有一粒粮食可吃，就只有出来逃荒要饭或坐等饿死。

那还是市面上食品供应刚开始紧张的日子，有一天祖父在东关的大街上雇回一个帮工，让他在园内的空地上翻地种菜。此人姓苏，我们都叫他老苏。祖父雇用老苏，除了园内需要劳力，同时也有找活给他干，好接济他一下的用意。老苏是从河南农村逃荒出来的，有时在街上要饭，有时到集市上揽活，来我家干活以后他有了工钱，每天可上街买些玉米面发糕胡乱把肚子填饱，省下的一点钱，他打算买成粮票给家里寄回去。老苏干活很踏实，平时没有多余的话，我只听他提到过他家乡的一些简单情况。他说他们那里吃食堂和种丰产田都搞得很厉害，干部虚报产量，搜光了社员家里的贮存，后来就闹得全村都没粮吃，村里开始有人饿死，他趁自己还有些气力，便跑出来逃一条活命。

饿死人的事情确实令我吃惊。我们在政治时事课上听到的都是大跃进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关于粮食供应紧张的问题，老师对我们解释说，主要是全国普遍遭灾和苏联逼我国还债造成的。但对照老苏家乡的悲惨景象，再看目前市面上物资匮乏的状况，我还是觉得，老

师所讲的并不完全令人信服，倒是那些攻击三面红旗的言论说得更符合事实。没有人和我讨论这些问题，连祖父也无法解答我心里的疑问，我只能在日记中记下老苏的遭遇，同时写一首诗抒发我的感怀。我的诗把老苏写成一头受人剥削的黄牛，写那牛如何卖力耕地，却被饿得瘦骨嶙峋，最后倒毙在田野上。后来，饮食业的供应越来越紧张，连买玉米面发糕也得按斤两付粮票，像老苏这类没有票证的流民，往后就再也难在城里靠出卖劳力混一口饭吃了。

进入寒冬，食物短缺的情况进一步恶化，周围的人普遍出现了一种营养不良的症状。如果有一天早上起来，你用手指在前额或小腿内侧用力一摁，那一处的皮肉陷下一个小涡，这就说明你得了浮肿病。浮肿病人日渐增多，大家见了面都习惯用手指摁一摁对方的那几个部位，互相做一番鉴定。起先浮肿病人还可凭医生的证明买到少量特别供应的黄豆和白糖，后来浮肿病人越来越多，营养品供不应求，各单位只好遵照上级的指示，贯彻起“劳逸结合”的政策。奇怪的新生事物相继出现，相应的新名词便跟着被制造出来。所谓“劳逸结合”，就是减少职工的工作时间，要求大家都把减少热量的消耗当政治任务执行。学校里也比平时松懈了许多，就因为食物短缺，我有了更多的时间读书和写我的日记

我写日记的习惯始于小学五年级。那年暑假的一天晚上，我在父亲的办公室读书，父亲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喝酒。不知酒力在父亲的哪个兴奋点上起了作用，他忽然带着酒气走到办公桌跟前，拉开抽屉，取出一个新本子，放在台灯罩下那白昼般的光亮中。他说要把这本子送给我做日记本，叫我从现在起就在这本子上记我的日记。父亲还勉励我说，记日记对练习写作和培养毅力均有好处，我如能一直坚持记下去，将来在写作上肯定会有长进。那本子深蓝色的硬皮，道林纸，有不少彩色插图，厚得就像一本书。我当下翻到首页，就在台灯下写了我的第一篇日记。

父亲并没告诉我日记该怎样写，不过对日记本和记日记，我那时都不陌生。首先，祖父就坚持记了几十年日记，他的日记本都按年代顺序编了号，在他床头的书橱内堆了成百册，像一摞摞旧式的帐簿，在我眼中显示出祖父经历和文字上的富有。祖父的日记也确实是记事的帐簿，他让我看过那里面的内容，大都是一条条简单的记事，比如某日去某处会某人，谋人来访谈某事，收某法师来信，或给某居士回信，参加某会议，听了某领导的报告等等，再加上节气物候的变化，日常购物的零帐，所有这些事都三言两语及时记下来，留作备忘，供日后查考。每晚在灯下记几行日记，也同每天早晨上楼礼佛或每顿饭后绕塔散步一样，多少年来都是祖父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他正在使用的日记本平时常公开摊在桌面上，显然并不提防有人随便翻阅。

但我们年轻人可与老一辈人的想法不同，打从记日记起，我就听同样也记日记的堂姐说，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属于个人的隐私，任何人都不得随便翻阅，偷看别人的日记和私拆别人的信件一样，也是不道德的行为。堂姐的话留给我的印象很深很深，自从在那个蓝皮笔记本上写起我的第一页日记，我就很注意保密，写完了日记，总不忘把本子存到隐蔽的地方。我只羡慕祖父那一摞摞堆起来的日记本册数，但不喜欢他那种日常事务流水帐的记日记方式。父亲要让我练习写作，我得把每天的日记写得像作文一样有趣。比如，我详尽叙述每天经历的事情，描绘我所接触的人，记录我和他们的谈话，还在日记本上随时写读书笔记，抄录书上的警句，发表我读后的感想。每天晚上，我花费在记日记上的时间常常比做作业还多。我写得凌乱而冗长，写了大量笨拙而词不达意的废话，有很多很多段落，再次翻阅时，都看得我脸上微微发烧。我相信很多刚开始私下习作的年轻人都有类似的心理，都把自己的文字隐私看得像身上的隐蔽部位一样见不得人。我从此有了秘密，也有了负担，我常担心有人偷看我的日记本，唯恐自己幼稚的文字暴露在别人面前。

物资短缺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混乱，混乱总使我特别感到兴奋。反正米面油盐的艰难有做父母的在那里操心，只要学校继续执行“劳逸结合”的政策，我们学生就能随大流过我们的轻松日子。自由市场上比任何地方都热闹，几年来一直让政治运动绷得太紧的城市生活

突然松弛下来，很多不允许买卖的东西又纷纷出现在摊子上，你只要有钱，在八仙庵的自由市场上什么东西都能买到。国营的饭馆和食品店尽管冷冷清清，电影院的生意却比任何时候都好，外国电影周一个接一个举办下去，从苏联、东欧的直到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新片预告栏的图片一批批更换，正在上映的片子从早到晚场场座满。那一年冬天我看了很多外国电影，有时甚至连续几场看下去，看得我在灯亮散场时从座位上站起来腹空欲呕，夹在拥挤的人群中一阵阵昏眩。等走出影院，踏上街道，再环顾冬日萧条的街市，我心里总会生出一股子美梦初醒的怅惘，拖着无力的脚步，我都不想从依然萦绕神魂的音像世界回到眼前的现实中来。欧洲世界的形象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集中地、大量地呈现在我的眼前，教堂，宫廷，贵族的庄园，上流社会的舞会，现代都会的繁华，还有迥然不同于中国的自然风光和人情世态，所有那些吸引我的情景都让我感到了强烈的对比。那魅力和反差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一时还说不清楚，只觉得在强烈的对比下，我更加厌倦眼前这灰色的现实。每一次从电影院回到家中，我都要抓紧机会在日记上描述残留在心中的印象，我想在文字书写中再过一次电影，通过我的叙述反刍那些视觉感受中最合我心意的东西。我一写起来就写到深夜，激动得不能入睡。

我的日记册数因此增长得很快，望着祖父那几摞高高堆起的日记本，我盼望有那么一天，我写的日记本堆起来也会那样高，甚或更高。

我的增多的日记本内现在有了更多想起来让我不安的秘密，至少对于常去我房内的祖父和父亲，我心里有了不同往日的提防。为了保密而又保险，我给我的抽屉加上了锁。这加锁先是引起了祖父的不悦，因为他把此举视为我防范家人和明显有了隐私的信号。后来，我这庸人自扰的举措很快就引起了父亲突然袭击的检查。这加锁其实纯属形式，钥匙就放在另一个无锁的抽屉内。有个星期日，父亲像往常那样，为避开祖父，又躲到我屋内喝酒。不知是那劣质的红薯酒喝得他心情不好，需要找事发泄，还是他对我的放肆隐忍已久，如今确实憋到了非爆发不可的地步，那一天他偷看了我的日记，然后狠狠教训了我一顿。

父亲嗜酒，他差不多每天都得喝上几杯，因此他经常处于囊中羞涩的状况，只有在刚发工资的一周内，他才过得比平时阔绰。这期间他买瓶装酒喝，从茅台到威士忌，他舍得花钱喝各种名酒，收废品的在大门外高声吆喝的时候，母亲常拿出成堆的空酒瓶子卖一点小钱。通常喝过一周的好酒，父亲手头就拮拘起来，他只得又去买往日的散装白酒喝，所以提起自己的经济状况，父亲喜欢自嘲地说他“富不过三天，穷不过一月。”就在他月底那些最穷酸的日子里，他差我出去沽酒，很少能一次掏出足够的酒钱。我得等候他在身上的不同口袋里搜寻零钱，一直等到他模出最后一分硬币，凑够了数，我才一手拿酒瓶，另一只手攥一把分币向巷口走去。有时在近处的店里买不到他要的那种廉价酒，还得到远处去找，甚至一连找上好几家，找得我常常很反感为他干这跑腿的差事。我拿到的酒钱几乎总是正好够数，一分也不会多，很难蹓到拿上一张大票子，买了酒找回几角钱归我所有的机会。越是到了月底，他能在身上搜寻出来的零钱就越少，实在凑不够数的时候，他便向同院的李奶去借。即便是几分零钱，在凑钱买酒时也对他不可缺少。所以在我的印象中，他身上根本就没有多余的钱给我们孩子零花。我只习惯伸手向母亲要钱，即使是买文具或给学校交费，我都不好意思向父亲张口。

父亲就是要品那烈酒的辣味，他喝起酒并不讲究下酒的好菜，常常是一瓶一杯往光桌面上一摆，他就坐下来慢慢地抿，一言不发地干喝下去。有时他会买包花生米或凤尾鱼罐头下酒，也有过把我或妹妹叫到跟前吃上几口的时候，但更多的情况是他独自坐在那里享用，并不喜欢随便把小孩子招惹到自己身边。他喝酒似乎不是为增加兴致，而是为陷入孤独，随着瓶中的酒慢慢减少，他的脸色便逐渐阴沉起来。这时他身上酒气袭人，闻到那股子预示着某种不祥的气味，我不由得想从他身边避开。我想不起他是从什么时候喝上瘾的，只记得从我能替他跑腿沽酒的时候起，他已经是经常纵饮，每饮必拖到很晚的时候。等到他喝干了瓶内

的酒开始进餐，那些喝下去的液化粮食差不多已填饱了他的肚子。吃饭之于他，有时候不过作个样子，吃几口，算是表示他吃过饭罢了。

买酒与缺钱于是成为母亲和父亲经常吵闹的起因。父亲任副总工程师，在他们公司拿的是高薪，加上母亲做中学教师的工资，我们家在当时算是收入很不错的家庭。外人都以为这是好得再不能好的日子，只有母亲自己知道她管的这个家枉担了有钱的虚名。她不但不好向外人诉说自己的难处，也无法令人相信她的日子过得不太宽裕。父亲发了工资只交给她一部分钱做家里的生活费用，他得先还掉月底拉下的债，再给自己手中留够酒钱，这样的三折两扣之后，他能交给母亲的钱自然就不会太多。就是交出的那部分钱，有时到了月底，父亲实在无处借钱买酒，他还会从母亲手中三块两块地要回去零花。所以一到了家里缺钱花的日子，碰上他在家中没完没了地干喝，便最容易引起母亲发火。

父亲刚喝起来的时候，母亲还能耐心在一边伺候，随着他细斟慢饮地品味下去，一再推迟他用餐的时间，母亲就变得不耐烦起来。她催他结束喝酒，硬是要收走他的瓶子，他则说让他再喝下最后一杯，把酒瓶攥在手中，就是赖着不给。母亲热着冷了的菜，开口抱怨，嫌他拖延了吃饭的时间。那不满常由小声嘟囔开始，慢慢上升到大声斥责，直到翻出父亲的陈年旧帐，怨愤地提起他几个酒肉朋友的名字，接着大肆数落起来，揭他们的老底，反复诉说父亲给全家人制造的贫困。起先，父亲只顾喝他的酒，好像顾不上反应，好像他已听惯了那些絮聒，并不屑于和母亲拌嘴。但有时候，偶尔蹿到他喝过了头，而母亲也唠叨到让他忍无可忍的程度，不知道她的哪句话说到了爆发点上，父亲突然就变了脸。他把酒瓶子用劲摔下去，只要这第一声摔向，他便不可遏制地开了摔戒，不管三七二十一，他捞起桌面上的东西乱摔一通，然后推上他的蓝铃牌自行车踉跄而去，回公司的宿舍过夜去了。瓷器摔在地上的破裂声很有效果，它立即止住了母亲的嘟囔。母亲终于造成了她期待的那个局面，她的怨愤一下子随瓷器的破裂而倾泻干净。很多女人与丈夫吵完架都爱哭哭啼啼地示威，没完没了地自怜，但母亲和父亲发生过冲突，从来都不唱那独角的苦戏。她的发泄业已通过瓷器的破碎彻底完成，那就是他们冲突的高潮，此后便只剩下她来负责收拾父亲出走后的残局。搅扰了父亲的饮趣，且导致了饮器的破碎，那就是她在家这个她自己的领地内暂时禁了酒而赢得的胜利。她现在操起笤帚细心打扫满地的碎瓷烂玻璃，拿上抹布擦洗所有的器皿，心安理得地干着，甚至为自己又捅了一次马蜂窝而甚感惬意。直到把房间收拾得和吵闹前一样整洁，她把一两个新增加的缺把茶杯放进茶盘，就像在棋盘上摆定最后剩下的棋子。

星期日吃完午饭，父亲常去园子找清闲，特别是碰到手头拮据的日子，他就来找祖母要钱买酒。祖母总爱宠儿孙，永远都喜欢做个有求必应的活菩萨。她差做饭的上街买酒，还特意叫他用荷叶包几两腊汁肉回来，然后把父亲安排到我的房间内过瘾。父亲进了西屋，她给他关紧门，再放下门帘，自己在过厅里坐下来吸烟喝茶，好像在专门给他望风。如果祖父偶然走出来问起父亲，她会指着西屋低声说:"正在那里面睡觉呢。"祖父对祖母的话从不怀疑，他于是到此止步，回头向后院走去，满意地念着"阿弥陀佛"，从远处发出一阵清喉咙的声响。很多星期日的午后，父亲都在园子这样度过，平静而安谧，从没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然而这一次他却趁着酒劲在当下发作了。他在我日记中发现了两处问题，而且直接从本子上撕了下了那几页，立即把我叫到跟前厉声训斥。其一就是有关老苏逃荒的记叙和那首把老苏比成黄牛的诗，父亲说我写的这些话正是当前批判的思潮，一旦传出去，就是攻击"三面红旗"的言论。其二是几句评论《雷锋日记》的话。我说我的日记与《雷锋日记》根本不同，我写日记只为写给自己看，书写的快感就在书写的过程之中。等过一段时间，我再拿出自己从前的日记随意翻阅，就像把消逝的一天再活了一遍。我说我的日记是我内心的财富，是我的自我那见不得人的一面，我绝不想叫任何人读我的日记。但《雷锋日记》好像是为供别人阅读而编写的日记，我读《雷锋日记》的时候常常想，也许就在写那些日记的时候，雷

锋已为他的日记能在死后公布做好了准备。读完了《雷锋日记》，我真遗憾这位年轻的战士从无一字提到他自己的爱情。雷锋暗恋过或谈过恋爱吗？他怎么不写这些最值得记在日记里的事情呢

父亲很生气，他一边骂我，一边将那几页纸撕碎，然后把一把碎纸片摔到我脸上。我因出于一时的不满，随即顶撞了父亲几句。我说他没有权利检查别人的日记，还用背诵法律条文的口吻抗议说，私人日记和信件不容侵犯，偷看日记非法等等。这些话激怒了父亲，他动手打了我几巴掌，我举臂格拦，结果火上浇了油，惹得父亲更加恼怒。他认为我那格拦的动作是对他还手，怒斥着我的放肆，扭头出去就捞起他蓝铃牌自行车上自带的小打气筒。我见他拿了家伙，转身便往后院跑去，他则一副警察提着警棍对付暴徒的样子，满园子撵着要狠揍我一顿。我最后跑到祖父跟前寻求庇护，惊动得正在坐静的祖父光脚板走上前制止父亲，慌乱之中，祖父从地板上捞起他的布鞋，在父亲身上抡了一鞋底子。父亲悻悻地走了，他打算把我转到一个管理严格的寄宿学校。但因受到祖父的劝阻，说是已到高中即将毕业的阶段，怕转了学影响功课，随后父亲才勉强作罢。

我和父亲很长一段时间都没说话，父子间从此暗礁一样埋下了对立的情绪。不知父亲是否为他当初送我日记本的心血来潮之举感到后悔，也不知他还记得起他在酒兴正浓时拿旧小说给我启蒙的往事。我总以为，陶然纵饮时的父亲倾向于精神自由和情感浪漫，没想到他也有醉中并不胡涂，而且很实际，书刊检查官一样严厉的时刻。自从那次冲突后，父亲好像很后悔他当初送我到园子跟祖父母住在一起的做法。本来，他只是怕我跟上街巷的孩子群野下去受到不良影响，现在他才发现，那长期隔离的措施对我造成了另一个严重的后果，这却是他始未料及的。按照父亲的看法，正是这几年住在祖父身边，我才养成了滥读乱写的习惯，如果他当初没把我送到园子而是留在城里跟他们住下去，也许我现在完全是另一种情况。

然而如果是那样，我会受街巷里那群野孩子的影响，变成街痞吗？

只有我自己心里最清楚，父亲其实错怪了祖父。祖父是学佛的人，他每天用在坐静和念佛上的时间远多于读书和写作，对于佛经以外的文字，他平日阅读的并不很多。对我那贪多求大的读书计划，祖父不只从未有过盲目的鼓励，反而多是提出委婉的批评。每见我向他乱提经史子集方面的问题，他就以“记问之学不足为人师”的话打消我的浮夸。祖父常对我重复“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那句老话，对他来说，做好日常待人接物的事情，要比书本知识重要得多。

我爱读爱写，本为我自发的志趣，祖父既没有多少责任，父亲所做的激烈纠正也没起到任何效果。自从那次冲突后，在我这个不听话的儿子身上，父亲好像看透了什么，他显得很灰心，似乎不想再多管我的闲事。高中毕业的那一年，有一天父亲又喝多了酒，他把我叫过去对我说：“父母管不了的事情，到时候会有人管的，你要是不听大人的劝告，还是这样乱读乱写下去，我可要警告你，吃亏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四 初入大学

1963 年春季是我在高中的最后一学期，课程照例结束得很早，考完毕业考试，报考大学的学生便按理工和文史分科编班，紧张地准备高考。父亲并不赞成我报考文科，他希望我最好学一门实用的技术。按照他一贯的看法，选择专业最终为的是造就将来的职业，但在当前的中国，凭技术吃饭显然要比搞文史可靠和安全得多。喝酒的时候，他多次发表议论说，只有自然科学有求真的客观标准，文史方面的学问很难说有什么真理。他列举了解放后文史界出现的很多争论说，今天属于正确的说法，明天就可能被宣布为错误，甚或反动，学术上的是非随时都在变化，搞文史专业实在没什么意思。向我举出了反右以来的很多事例，父亲

满怀忧虑地告诫我说，在今日的中国，写文章搞创作是最危险的事情，他叫我最好脚踏实地，趁早放弃从事文字工作的打算。

父亲不是不喜欢文学，他有时也读小说消遣，特别在斟满酒杯慢慢往下喝的时候，翻开一本旧小说，边读边喝，好像在用阅读下酒，长期以来，那已成为他挥发酒兴的最佳方式。他老是读那几本书，如《儒林外史》和“三言二拍”等。我读的第一本旧小说《水浒》，就是他酒喝得很有兴致时推荐给我的。父亲的阅读是即兴的和随意的，他读得无头无尾，他反复读他喜欢读的片断，就像他反复喝那种容易上头的散装白酒一样。与他那些搞工程技术的同学或同事相比，父亲要算很有文学修养的人了。他能背诵李后主的好多小令，也习作过旧体诗，我见过他所作的一首七律，对仗还算得上工稳。听他说，祖父当年曾特意让他休学一年，专门聘家庭教师给他补习过文言和英语课程。

父亲对文科的轻视并非由于他在这方面无知，而是解放后日益严峻的政治形势迫使他接受了教训，周围的很多知识分子都持与父亲相近的态度。他们普遍重理轻文，对文史领域的学术问题多持虚无主义的态度。有一次，父亲酒喝多了，他看见我的一本《哲学研究》杂志放在桌上，趁着酒兴，就提笔在封底的空白处写道：“哲学是最没有用的学问，我永远都不想学它。”这句话，不知怎么会让父亲的一个同事来我家闲坐时看到眼中，然后记在了心里，后来运动来了，此人给父亲贴大字报，居然把这句酒后戏言也作为反动言论揭发出来。那时候谈“哲学”可不是闹着玩的事情，它主要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包括毛泽东思想，你说你不想学哲学，人家就可以说你不愿意学习马克思主义。生活在政治嗅觉如此灵敏的同事中，也难怪父亲怕接触敏感的文史问题。父亲费尽了口舌，但他的话我当时根本听不进去。我不喜欢数学，数学也学得不太好，就是硬让我报考理工，估计也很难考上。我对父亲说，我一定要学自己喜欢学的专业，绝不愿仅为求得生活的稳定，干一辈子自己不感兴趣的工作。后来我执意报考了文科，父亲显得很失望，他愤然指责我说：“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等将来你犯了政治错误，害了自己又影响家庭，到那时再后悔就来不及了。”

63 年据说是历届高考政审最宽大的一年，应考前我还一直担心我的家庭成份和个人表现过不了政审关，没想到一切都很顺利，发榜时我收到了陕西师大中文系的录取通知。“困难时期”虽说过去了，但物资供应的紧张状况并没有得到缓解，居民做衣服都得凭布票买布。我玉米拔节一样长个子，亲戚们逢年过节见了我，都喜欢冲着我这高个子开玩笑说：“长这么高的个子，浪费你妈的布票。”母亲主管家里的布票，她集合了全家人的布票，才够给我做一身入学时穿的新衣。八月底，新生入学的日子到了，我穿上新做的毛蓝布夹克，高高兴兴走进师大的校门，去了中文系新生接待处。

“喔，你就是康正果。”接过我递上的录取通知，一个负责注册的人看着那上面的姓名，脱口就说出了这句话。他认识我？我站在接待处的桌子跟前，还没对那人的话完全反应过来，刚才交出的一纸录取通知已退到我手里。那人接着通知我说：“你现在还不能注册，彭书记打过招呼，叫你先去系办公室谈话。”

谈话？一听说谈话我心里立即发毛，在我这些年的学校经历中，只要是老师和领导传我去他们跟前谈话，几乎百分之百都没好事。一个恐惧的条件反射从我的脑际闪电般掠过：莫非又惹了什么麻烦？我手持录取通知书在原地呆站了片刻，一副不甘心接受这一事实的架势，却到底笨得说不出一句要求变通的话来。最后，见那几个办理注册手续的人都不再理我，我只好离开那里，像以往那样硬着头皮去见那陌生的书记。我去了系办公室，但没见到书记，只听说我是否能入学的问题还正在研究，很有可能要取消我的入学资格，但到底什么原因，一时也问不清楚。我只得离开那里，灰溜溜回到家中。父亲两天没上班，他坐上单位的吉普车跑了好几趟师大。多亏他给师大设计过自来水塔，还算认识几位处级领导，托人去系上说了话，最后才争取到系上同意我入学的结果。

我在系办公室见到了彭书记。原来在开学前夕，中文系从省招生办接到了一份我的单行

材料，彭书记严厉地对我说，如果在招生前他们就知道我有这么多的问题，中文系是绝对不会录取我的。他说本来他们打算取消我的入学资格，或先送我去学校农场劳动一年，然后再根据我的表现决定我能否入学，但后来考虑到我还年轻，可以先给我一个机会，但我得深刻反省一番，在新环境中一定要努力争取进步。说到这里，他刚刚温和下来的声调突然又严厉起来。他说经研究决定，我得马上写一份深刻的检查送来，然后才会考虑我能否报名。那单行材料反映的都是些什么问题，书记并没全部告诉我，按照他们的常规，这都是要我自己在检查中交待的。“你看这是什么？”彭书记摊开了桌面大小的一张纸问我。我受审似的站在一边，微低下头，像往常接受批评时那样，竭力表现出认错的态度。望着他手中揉皱了的一大张墙报，我立即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那是去年冬天发生的事情。班上办了个墙报，名叫《百草园》，专门选登语文老师推荐的优秀作文。我自己也说不清出于什么动机，突然决定和那集体办的墙报唱对台戏。于是我背着他们独自编写了一张墙报，评论、散文、诗歌、小说，包括发刊词，整版的文字全由我一人包揽，墙报命名为《北极星》。为绝对保密，我特意到城里请外校的一个朋友画了报头。画面是深邃的夜空寒星高照，木刻般的黑白对比与《百草园》上艳红鲜绿的装饰明显形成了对立。大功告成的一天，我早早起了床，趁天麻麻亮时分夹着我的一卷墙报溜进了校门。校园里空无一人，我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张贴《百草园》的墙下，就在靠近它的上方匆匆用图钉钉上了我的《北极星》。事后据一个目击的学生向老师报告说，她看见一个大个子在那里慌张地张贴墙报，然后一转身就走掉了。我贴出去的墙报大概只在学生一大早走进校门时引起片刻的围观，接着就惊动了教导处。他们立即派人把那一大张有嫌疑的东西从墙上揭走，等我再次从那里经过，墙壁上已恢复了原先的空白。

事件的后果很严重，他们没有费多少周折就找到了我的头上，接着我多次被叫到教导处和班主任那里查问和训斥。他们说这是违犯校纪的事情，因为我未经学校的审阅和同意而擅自贴出了墙报，如果要上纲上线，这就是非法出版。幸好那墙报没审查出什么政治问题，最后以责令我写一份检讨而告终。我惹了祸，也连累班主任挨了校领导的批评，他因此很气恼，一直对我耿耿于坏。我虽给他交了检讨，那一张墙报却被他罪证似的压在手中，毕业前我曾多次索要，到底也没能讨回。现在情况很清楚了，彭书记手中的单行材料，就是我那班主任听说师大录取我的消息后追加上去的。

我交了检讨，注了册，比其他学生迟入学了几天。母亲对我满口抱怨，她说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还没入学就给领导交检讨，真给康家丢尽了人。我自己也觉得扫兴之极，背上铺盖走进学生宿舍，面对那几个同屋陌生的面孔，我都发愁未来的四年怎么在这里熬过。

这住宿的安排显然有监视我的用意，班长的床就和我的床紧挨在一起。班长是成年人，农村家中已娶了老婆，刚从部队上复转下来，从衣着到铺盖，一律是洗得淡黄的军队装备。这来历既显示了他的特殊身分，也使他当然地高踞在监督全班同学的位置上。他还保持着以军纪律己待人的态度和习惯，平时常板着脸，出出进进，腋下老夹着一个里面夹有全班学生名单的活页夹子。我甚至觉得，他考进师大，似乎不全是为了给自己学知识，而是奉命来管理我们班集合、排队和点名之类的事务的。那开学之初也正当国庆游行的前夕，全校的学生都在操场上练习队列和步伐，准备十月一日的早上整齐走过新城广场，接受主席台上省市领导们的检阅。学校正好也借机来加强新生的纪律训练，而我们有了这位酷爱叫操的班长，排上队练齐步走的次数就比其它班多了好多倍。训练的时候，班长比平时更来了威风，他好像又回到了连队的营地，完全把我们当新兵操练起来。他连续吹起刺耳的哨子，还带领我们高呼口号，常常是其它班早已散了队，他还坚持让我们再走几圈。

现在我住进了集体宿舍，想随便逃避集体活动，可不比从前住自己家那么方便。况且，入学前又给系上做过保证，更需努力表现要求进步的决心，即使处处紧跟形势，还怕做得不够，哪里再敢疏忽出事。我无聊时常回想高中毕业前夕最兴奋的一些情景，那时候面对布告

栏上各大学那么多令人浮想联翩的概况介绍，我也曾美滋滋想象过进入高等学府读书的生活，以为等待我的是电影上那回旋着轻音乐，朝暮在树荫下勤读的校园图景，谁会料想到一进陕西师大就受起这样严格的管制。每周从周一即盼望起周末，星期六下午大扫除一完毕，我立即便乘公共汽车赶回家去。但星期日晚上必须到校参加晚自习点名，我们班长总是非常准时，一到上自习的铃声打响，他准会夹上活页夹子进教室履行他点名的职责。

师大的学生招自全省各地，农村学生占多数，其中团员学生特别多，包围在这么多积极争取进步的学生群中，处处都对比出我一个人的落后。每个人都在努力表现自己，已是团员的要争取入党，还没入团的更得争取入团，你如果只想做到无可指责，原地不动地稳坐下去，你即使不想找别人的事，别人也要给你制造麻烦。“树欲静而风不止”呀，外面阶级斗争的形势也延伸到我们的宿舍和课堂来了。

有一段时间我集中精力大读名人传记，其中有一本写的是拿破仑的生平，这书名很快被教文艺理论课的老师看在眼里，然后他就拐弯抹角追问起我读此书的动机。他是个很会写风派文章的年轻教师，胖胖的黑煞脸很会摆出故作严肃的神态，我们的任课教师中就数他政治嗅觉灵敏。听他那口气，好像我对拿破仑这类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发生了兴趣，就说明我这个人有什么政治野心，因而他就有责任捕风捉影，追问我阅读此书的动机。我在宿舍内朗诵《哈姆莱特》中“活下去还是不活”那段著名的独白，很快就有人汇报到辅导员那里。辅导员把我叫去盘问，问我对现实到底有什么不满，问我为什么那么多革命诗歌不好好阅读，偏偏要朗诵这类情调消极的东西；最后还严肃地质问我，说我是不是要扬言自杀来威胁组织。我惊异，惶惑，此类无孔不入的监视和怀疑让我觉得可笑而又可气，每走进宿舍和教室，看见同学或老师特别注视我的眼神，我就隐隐觉得头痛。我开始尽量减少在集体中的活动，下了课就钻到图书馆大阅览室的角落抱一堆书一气读到吃饭时分，吃了饭再进去，一直读到关门，在熄灯铃之后摸黑回到我的床铺上。我从书包中拿出日记本，压在靠墙的褥子下面。每一天的日记，我都是在阅览室的那个角落一页页完成的。我也常在那里写信，写给我高中时的几个同学。

高中最后一学期准备高考期间，我和几个同学成立了一个复课小组，常在我家园子聚会。其中有个叫李稚敏的男生也报考中文系，他喜欢写诗，是《百草园》墙报的编辑，就是在我那有意要唱对台戏的《北极星》贴出后，他很欣赏我的文章，主动写诗赠我，和我做了好朋友。高考发榜后，我留在西安进师大读书，他考入外地一个更有名气的大学，分别的时候，我们相约，在大学四年中保持通信，联络友谊，互相激励，交流各自的习作。果然他一到那里就给我写来特别抒情的长信。他的信文词华美，钢笔字也写得工整秀气，再加上用了特备的艺术信笺和信封，每收到一封都引起我热烈的反应。我们几乎一两周即通信一次，连信封的书写也有特别的格式。在通信中，我们互相诉说各自在新环境中的孤单和苦闷，也提到种种不习惯的，乃至难以容忍的人和事。我们不是不知道在信中发牢骚或倾诉消极情绪是不明智的，甚至是很冒险的，但我们只想到那是我们两个好朋友之间的通信，是永远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私事。他在信上说他此刻坐在他们学校那克里姆林宫式的图书馆顶楼上给我写信，远处可以看到黄河东去。我说我也在图书馆给他写信，那是一座宫殿式的大屋顶建筑，窗外高耸起大雁塔雄伟的剪影。我们两个人都写得很投入，很热烈，每当我收到他的来信，坐在阅览室的角落给他回信，我甚至把这通信的举动想象成互相发无线电报，每写下一笔一划，我都觉得像是在发报机上按出了“嘀……嘀……嘀”的声响。这交换文字的游戏越玩越热，热得我们全忘了安全的界限，至少单从我自己这一方面来说，他来信的频繁和定期，以及那惹眼的信封，好像已引起了别人的注意。每个班在收发室内都设有一个信箱，由一个专门指定的学生负责取信。时间长了，那负责取信的同学每次给我分发信件的时候，我都能敏感出他对那封常来的、有点厚的艺术信封流露出好奇或怀疑，有好几次我都觉得，他投向我的目光发出了刺探的锋芒。

我越来越觉得，因爱好文学而上中文系，大概只有在解放前比较合适，而在当前，简直成了自讨苦吃的事情。我开始后悔报考文科，更后悔上了这所土气十足的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中，有文学底子且有艺术灵性者为数极少，在大多数聪明精干的学生都去修理工科的年代，中文系可以说是资质较差的学生大批集中的地方。该系的教师也以平庸者居多，经过了反右运动，老一点的都谨慎得令人感到昏庸，而比较年轻的，差不多都成了宣讲文艺政策的政治教员。

开学初刚领到新书、新讲义，我还有些新鲜感，几周的学习过去，多数课程越学越枯燥无味，大学的课堂便成了令人受罪的地方。蹉到听不进去的时候，最好的消遣是在讲义的空白处或笔记本上胡画乱写，或断裂的诗句，或前言不搭后语的随想，甚至不成句的单字或词组……不只我一个人上课时写这些东西，其它学生也都有不自觉地挥笔书写此类意识流语言碎片的习惯。谁要是有兴趣把这些自动书写的断句收集起来阅读欣赏，肯定能从中发现不少妙趣横生的文字，甚至可搞一集教室文选，为超现实主义的"自动书写"填补一些空白。不幸在 1963 年的中国大学，可不容许我们学生玩我那想象中的文字游戏。记得一本写间谍内幕的书中提到，为收集情报，间谍甚至对特定的垃圾做细心的翻检。我周围的同学中也有类似间谍的人物，他们竟有心思从别人随意书写的语言碎片中搜索反动言论。有一天上政治课，老师在讲台上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三无世界"论，我在笔记本上照常乱写。不知我当时是怎样地鬼迷了心窍，听着听着，就随手写下了这样的话："三无世界：无党员、无团员、无班干部的世界。"我随手写下，下了课便随手把本子丢进课桌下的桌斗，并没有在意是否有人看见我纸上写了什么。直到辅导员传我去他那儿问话，我才恐惧地得知，这一次我闯下了大祸。

辅导员名为辅导员，他们其实并不辅导学生功课。他们被派驻在学生楼里，干的是宿舍派出所的差事。他们专职监管我们学生的一言一行，从检查宿舍卫生到主持政治学习，从听你汇报思想到给你写评语、做鉴定，他们什么都管，包括你申请入团入党，毕业时分配工作的去向，他们都有权做出决定。与很多年轻辅导员的情况相同，我们的辅导员也是反右时的积极份子。积极当然会得到组织积极的回报，这位来自陕南农村的中文系毕业生并没有分回当地教书，而是留在大城市，做了大学里最有机会提升的政工干部。他那似乎永远都在发炎的红眼好像抹了胶水，看起人来，黏糊糊的眼皮总是挣扎着往大睁的样子。

我进门后站在他办公桌前，他向我亮出一张纸，问我那是不是我的东西，我承认说那确实是从我本子上撕下来的。辅导员说，只要我承认了就好。接着分析我眼下的情况，吓唬我说："你知不知道？这张纸要是落在地上，或传到其他人手中，就是不折不扣的反动标语了！"我一下子吓得头皮发麻，好像当头挨了一闷棍。我再定神看了一眼，正是从我的政治课笔记本上撕下来的那张纸，一点也没错，上面有我上课时胡乱写下的句子。现在辅导员的眼皮完全挣开了胶水般的粘连，他小眼睛圆睁，说我写的这句话是明目张胆要取消党的领导，表明我对党团员和学生干部怀有仇恨。他还威胁说，如果不是我的同学及时撕下来交到他手中，我今天就不会站在这里，也不会由他来处理我的事了。我能听得出，他的意思是说，这张纸能被挽救了我的某位同学及时撕下来交到他手中，算我造化，如若它自动传出去，像一张传单那样飘落到地上，再被谁捡起来举报上去，我肯定就会以现行反革命罪论处，应该依法逮捕了。辅导员满嘴吓唬人的口气，他说我这事可属于现行案件，业已上报系总支，彭书记就要将此事通报全系。

随后就是一级一级的谈话，有系总支书记，有学生科科长，保卫科科长……然后是一份份检讨写给相关的领导。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就这样在多雨的秋天和阴暗的冬日中艰难地过去。最后，终于熬到了寒假，自开学以来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紧张总算告一段落。

五 检讨老手

1964 年春季开学，我应招加入男子篮球校队。男篮教练姓秦，是我们班的体育课教师，在我就读师大期间，要说各方面对我都不错的老师，大概就只有秦老师一个。我的个子全校最高，又是个新生，自然在教练眼中最有培养前途，这就是他选拔我入校队，且很喜欢我的原因。我跟上校队集训，比赛期间吃运动员的小灶，坐上校车去各大学参加联赛，在整个春暖花开的晴朗日子里，远远地甩开了我们班那些老爱监视我妨碍我的同学。回想起在师大的整个岁月，大概就数这一段日子我过得比较开心。

每次校队出外赛球都乘坐校车，有一次上了车我在靠窗子的座位上坐下，上来了一个女篮队员顺便坐到我身边的空位上。她梳着短短的剪发头，谈吐开朗，一副不拘男女界线的气度。从打招呼到互相介绍，我们很自然地交谈起来。路不太好，行进中时有厉害的颠簸，在一车人整个的摇晃中，我和她的肩膀不时蹭在一起，而随着谈话的投机，两个人在座位上就不知不觉地靠近起来。车开得飞快，由速度带动的风力吹得人浑身舒畅，也吹得她的头发多次从我脸上痒痒地撩过。见我肩膀上落了些从车窗外吹进来的尘土，她掏出手绢给我掸了几下，挥起一丝刚用香皂洗过的清新气,使我一瞬间呼吸到女生身上那种特有的洁净气味。

次日我和她在食堂相遇，她这个学数学专业的二年级学生开口就对我说，她想请我给她推荐几本外国小说读读。就这样，我们约定了上完晚自习去图书馆会面，而从此以后，图书馆西南角楼梯的转弯处就成了我们常见面的地方。天气渐渐热起来了，我们见了面就走到那楼角的凉台上，凭着栏杆向南眺望。我特别喜欢凝望远处有一片灯火的地方，我把那繁密的灯火想象成落向地面的星群，还把这自以为得意的想象写成一首诗赠给了她。再往后，我们发展到去校外散步，乃至周末一起看电影，骑车子去远郊游玩。这日益亲密起来的关系一直延续到放了暑假。

师大的女生宿舍向来门禁森严，大楼入口处有专人值班，男生进去找女生，先要受到值班的盘查，若准许你入内，你还得在来客登记表上填写你自己的以及那位女生的姓名。我烦履行这道手续，也怕踏进那冷清清的小院子遭遇审视的目光，所以我很少登女生宿舍的楼门。我们的相处中倒是她比我来得主动，周末时校内外若有什么演出活动，常是她找到我们男生楼约上我一同出去观赏。看见我和她在楼道内出出进进，肩并肩走在一起，我们班有些同学很快就传出了加盐加醋的闲话。

入学之初，校领导讲话中早有明令规定，上大学期间，所有在校学生一律不准谈恋爱。我那些多事的同学本来就戴着有色眼镜观察我的一举一动，如今我和那女篮交往得如此频繁而又显眼，在他们看来，那不叫谈恋爱又能叫做什么关系。但谈恋爱与同学关系的界线到底划在哪里，不准学生谈恋爱的校方也没有做明确的界定。在这个被戏称为"陕西农民讲习所"的大学校园内，校风整体上显得土气而趋于保守，稀有的女生们平日大都在女生的范围内活动，现在我们俩一男一女常在楼道里和小路上走在一起，且总是单独活动，那行动本身似乎便定义了两个人的关系。人家都是在背后议论，我又能到人面前说清什么？

不久，有所耳闻的辅导员也介入进来，他听了风就说起雨，竟把我传到他那里盘问起纯属我个人的私事。进了他的门，他劈头就敲打我说："学雷锋的好事情从没见你做过一件，组织上不许做的事怎么老有你出来带头！宿舍里抽烟有你，校园内谈恋爱还是你。你本来思想上的问题已够严重了，现在难道作风上也要闹出违反校规的事情不成！怪不得你那高中寄来的单行材料上说你给班上的女生写情诗，都叫对方把那东西交到了班主任手中。我看你呀，从小就受到了资产阶级享乐思想的腐蚀。听说你端午节晚上还和数学系那个女生在校园里喝葡萄酒，尽搞了些情调不健康的活动。这样下去，"辅导员停顿了一下，拿出手绢擦了擦他的红眼，接着往下继续啰嗦："我看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要提醒你，可别忘了你入学时写给彭书记的保证，我们随时都可以根据你的表现处理你的学籍问题。"我只有洗耳恭听他训

话的份儿，我能向他做出什么辩解？每一年过青年节，团委的讲话都号召青年发扬五四传统，看看我们大学生现在的处境，简直倒退到连五四时期反封建的青年都不如了。其实，同学中也有人在交异性的朋友，因碍于校方的禁令，又害怕造成不良影响，他们都只在暗中保持来往。学校附近有个植物园，很多谈恋爱的男女都到那里的树林内幽会，只是回到了校园，一个个都显得和其他人一样很守规矩。我和我那个女篮朋友既没想隐瞒什么，也不懂假装正经，只是觉得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所以就一直光明正大地来往下去。没想到这公开反成了自我暴露，本来什么事也没做，结果却招惹了是非。

秋季开学后，我和她同时接到秦老师的通知，他要我们交回校队所发的运动服装。秦老师不好对我俩明说什么，算是不动声色地对我俩做了处理，把两个“谈恋爱”的队员从校篮球代表队除了名。我对离开校队并不感到遗憾，我知道自己根本不是打球的材料，继续在队里留下去，终究都是个滥竽充数。只是对秦老师，我有些过意不去。我那时抽烟已经上瘾，为鼓舞我好好练球，秦老师连自己配给的烟票——购买香烟的凭证——都送给了我，我却辜负了他的一片期望。从校队除名后，我与我的女篮朋友随即终止了来往。在她，是初次遭遇了不明不白的除名。而在我，紧接着就不断有更大的麻烦出现，自顾都不暇，哪里还顾得上再交女友。在我短暂的大学读书期间，值得一提的友情加温情，谨此昙花一现，此后就风雨骤起，打击接二连三，再也没遇上一天好过的日子。

秋季一开学，校内外的形势即变得紧张起来。先是中文系师生配合文艺界批判《早春二月》等电影和“中间人物论”，接着，学习“九评”运动在高校范围内全面展开。“九评”是指当时报刊上中共中央批评苏共的一系列公开信，特别是《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文，从学习这些论述中苏两党分歧的文章扯起，我们大学生被拖入了一场局部整人的运动。我们班每天大会小会地开，会上或会下，每个人都得向党交心。所谓“交心”，就是要求你老实讲出你对各项政策的看法，当然是硬逼人交代自己有什么不正确的看法，还是那老一套的思想检讨，并非真正鼓励人畅所欲言。至于重点教育的对象，还是集中在成份不好的或表现较差的学生身上。目睹那些发言者在讨论会上自己糟蹋自己，同时糟蹋自己的家庭，我感到整个的交心表演恶心透顶，所以始终保持了沉默。

初入学的一年中我也做过努力，也争取过进步，想积极表现自己。本以为慢慢扭转了从高中带来的不良印象，在这班上当个顺民，也许就可以平安混过四年，等毕了业好远走高飞。我那个女篮朋友更想拉我一把，推我上进，还替我草拟了一份入团申请书，鼓励我去团支部的组织委员那里献丑。听了她温情的规劝，考虑到她的一片好意，我差点都动了那俗念，准备交上申请书，争取入团。但我最终还是搁置了她的建议，保持了解下红领巾之后就再也没加入过任何先进组织的纪录。我越来越看到自己处境的不妙，所以也不想再做徒劳的挣扎。我甚至想到了退学，每逢忍受不了令人窒息的大学生活，我就恨不得马上走出这个“农民讲习所”。

他们显然不在乎我发不发言或发言是否深刻，这一类人人过关的例行手续针对的是一般的学生，好比让大家挨个到水边洗一下手。但针对我，他们显然要抓大事，要在拿到真凭实据后，给我狠狠的打击。同学们在会上检讨，我则被单独叫去与辅导员交谈。都知道我好写，写了几本子读书笔记随感录。辅导员当面通知我，组织上要我交出来审查审查。我知道胳膊扭不过大腿，心想那里面也没有什么可审的，便全部爽快地交了出去。

不久那些本子如数退还，辅导员也没追究什么，我还以为就此便过了那一关。深秋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我正要进城，辅导员突然来到宿舍，挡住我不许回家，他严肃对我说，我周末得留在校内写一份详细深刻的交待材料，说他是奉系总支之令专门来通知我的，要我务必认真对待。星期日是祖父的生日，正当菊黄柿子红的季节，每年这时候祖父过生日，园子里比一年的任何时候都热闹。前来贺寿的人会送来各种礼物，临潼老家的人年年都送家乡特产

的火晶柿子。那熟透了的柿子皮薄肉软，一个个都红得像点亮了的小灯笼，拔掉塞子一样的柿子把儿，对住那凹窝一吸，一口凉甜的柿子就下了肚。我坐在图书馆面对白纸准备写我的检讨，想起此刻园子吃素席的座位上就少了我一人，不由得心里一阵酸楚。

自打上学至今，我不知写过多少检讨，几经揣摩，多方体会，差不多磨练得成了写检讨的老手。我摸清了其间的起承转合，会用一连串作检讨的套语排比铺张，渲染一番，且懂得能敷衍下去的如何来个公式化的敷衍，而混不过去的又如何给自己扣些空洞的大帽子。结尾时自责加保证，尽量把篇幅拉长，好让老师或领导觉得我态度诚恳，准许我过关。和他们交道打多了，我心里慢慢也明白起来，写这检讨，大不了把自己说成他们认定的那个样子。但人毕竟是人，人本来都是有尊严顾廉耻的，就我的所闻所读，古代也好，被称为旧社会的民国时期也好，所有的历史记载中至今还没见哪朝哪代有过迫使人写检讨的做法。这新社会建立才不过十几年，我真不明白，中国人怎么会一下子都变成了检讨动物！校方凭什么敢把学生置于预审犯的地位？是谁给了辅导员和系总支书记这种践踏他人人格的权力？他们常常说组织上要求什么什么，组织到底指的是哪个具体的人？组织不就是各级党组织吗？后来我才渐渐明白，作检讨本是中共党组织监督处理其党内成员的通用方式，随后才移用到党外群众的身上，连正在成长，特别需要爱护的学生也不放过。党史上说，毛泽东早期挨过整，曾被迫给当时的党中央写过检讨。后来，很多犯了路线错误的中共高干也给毛泽东写过检讨……更不用说解放后历次运动中，有多少知名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都曾争先向党表态，大写过检讨。在他们之中，不少人的检讨还特意登报公布，作为接受改造的样板供群众观摩。曾有一个时期，在新中国的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检讨书简直成了充斥论坛的专栏文章。总之，要求被整者向整人者交检讨，起先只是中共党内的纲纪，只是在解放后，它才作为通行的惩罚手段侵入了普通人的生活，日益制度化，终于形成了这一置全民于无耻的检讨体文风。

回想我写过的那些检讨，再面对我现在写检讨的情景，我越想越来气，越觉得委屈和羞辱，我丢下纸笔，走上凉台向南眺望，不由得对这害人的检讨制度从心底发出了控诉：去他妈的检讨吧！那是摧残个人尊严的文字酷刑，是培训无耻人格的造句练习，是迫使检讨者把自己的小辫子任人乱揪的精神折磨，是指令一个人按照上级的批示去骂自己的话语暴政，是拿起笔杆子打自己嘴巴子的粪便作文。写什么检讨，够了够了，我今年整二十岁，正当砥砺志气，探求真理的锦绣年华，可憎的学校和老师却迫使我练熟了这一无耻的写作技巧，千言万语地自我鞭挞，为的只是求得一次次幸免。

我发现这一次的突然袭击明显不比往常，辅导员一再要我老实交待自己的严重问题，同时明确指出，必须深挖阶级根源，剖析我都受到了祖父的什么影响。看来，我以往运用娴熟的那些检讨型文字，这一次恐怕搪塞不过去了。我能敏感出来，这凶猛的来势不像是空穴来风，在他们手中，似乎已经掌握了什么东西。如果的确如此，那现在让我检讨，显然是向我发出警告的信号，是要试探我的态度，是提醒我快把自己的问题全抖搂出来。辅导员说得很清楚，这是组织给我主动交待的一次机会，他要我抓住这机会争取宽大处理。然而我到底该交待什么？我并不知道我犯了什么错，我一直在校内努力学习，除了读书，就是写作，写了些笔记、日记和信而已。苍天有眼，清平世界，朗朗乾坤，难道非要我捏造事实以自诬，进而再诬人不成？但是，我若交待不出任何事实，检讨哪怕写得再动听也是白搭。

我连续抽烟，为完成今天的检讨，我特意买了一盒好烟。再说我祖父，他是地主成份又怎么了？我爱戴他，我从来也没打算和他划清界线。什么“背叛自己的阶级出身”呀，什么“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呀，这些口号全都让我感到刺耳，反正我不想积极表现自己，只求做到不受人注意，能够平安无事混下去。实事求是地说，祖父他老人家比我更要求进步，曾有好多次，我因听不进去他那些政策说教，都和他起过冲突。若从党组织争取团结党外人士的立场出发，我看多说些祖父的好话才符合事实呢。祖父好坏也是个政协委员，辅导员怎么能用那样贬低的口气说他？难道祖父最近出了什么政治问题？我竭力回想近来发生的事情。我

发现有件事祖父最想不通。他经营了三十多年的佛化社去年被勒令解散了。佛化社是祖父一手创建的佛教组织，社址在东大街上，是一处不小的院落，里面有礼堂、阅览室和会客厅等不少房间。祖父与该社成员礼拜日常在那里聚会，有时还请来法师讲经。解放后该社已把大部分房产捐给公办的小学，但政府还不满足，还要继续吞并，终于在去年由上面下令解散，把全部房地产都没收归了公。

那时候我其实并不明白祖父办佛化社的重大意义，自然也很难理解佛化社的解散对祖父的精神打击。只是在好多年过去后，我知道了更多的事情，才开始理解了祖父当年的追求。"佛化"这名称本身便明确了该社把佛法推向社会和渗入日常生活的努力。解放初，祖父一度离家出走，曾去灵岩山和终南山住庙，决心做个出家人度过余生。可惜后来事与愿违，寺庙内无人敢收留他，他不得不回过头承受他的地主成份，进而当上了政协委员。祖父之所以始终紧跟形势，随遇而安，甚至委曲求全，不惜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谈论佛法，就是为了在新的政治形势下能够继续弘法，曲线维持其佛化的追求。我记得祖父在不同的谈话场合中多次提到列宁的一句话，据说，当着宗教界人士的面，列宁宣布他们在苏联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他同时又强调说，他也有去教堂反对宗教的自由。列宁真不愧为玩弄辩证法的诡辩高手，祖父之所以多次不由自主地提到这句歪理，显然说明他已警惕到随时都会发生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比较而言，对寺庙和僧尼的存在，政府还能保持更多的容忍，因为藉此既可以保存古迹，供人参观，又能树立宗教信仰自由的幌子。但是他们决不宽容民间组织的存在，比如，居士们结社念佛，编印刊物，进而面向社会搞活动，那就算侵入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要另当别论了。佛化社的存在，正是犯了共产党的这个禁忌。

我到底该怎样在检讨中认识和讲述祖父对我的影响呢？思来想去，我实在想不出祖父有什么该批判的地方。什么"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思想"，什么"宗教迷信的毒素"，我觉得这些大帽子都与祖父的真实情况毫不相关。就算他那些失去的房地产有所谓的"剥削"因素，他解放前在赈济、慈善和地方教育事业上所做的努力和成绩，无论如何也是否认不了的。小时候我常听奶妈提说民国十八年（1929）的年馑，那一年关中大旱，饿死了很多人，饥民吃光了草根树皮，最后一无可吃，有不少人都吃起了要命的观音土。后来在寂园的旧书堆内，我翻出了很多祖父主持救荒赈济的印发品：有佛化社办的《陕西灾情报》，上面有灾情实况的报导，有在灾区拍摄的照片，还有祖父和他的同仁向全国各界呼吁救灾的通告……那时祖父参与了设立灾童教养院和施粥厂的工作，在他的佛化社内也设有贫儿园，收养各地的孤儿，组织他们学习技艺，引导他们念佛向善。那时候他能做的事情，现在是绝对不许做了。新社会根本不承认饥荒的存在，就拿我们刚刚经历的"困难时期"来说，吃不饱肚子的事不许讲，饿死人的现象更不准公开报导，连灾情的存在都死不承认，哪里会让你民间社团插手救灾的事务。政府现在包揽了一切，也封死了一切，像佛化社这样的同仁组织，自然免不了遭到取缔的命运。

我面对白纸长久地发呆，思前想后，所谓的受到影响，我能够想起的都是祖父教我努力向善的往事，其中既无所谓迷信，更谈不上有什么毒素。还在我不识字的年龄，祖父就给我看丰子恺的《护生画集》，我从祖父的言行领会到，慈善首先是一种爱护生命的态度，慈善的人总是乐见一切生命欣然自得地生存下去。祖父和我在后院散步的时候，凡见我随便动手乱折花木，他即当面制止。比如我行走中顺手折下一枝冬青，祖父便打一下我的手背，呵斥我不许犯贱。在祖父的眼中，后院的树林和花坛与楼上的佛堂同等的庄严，对我们小孩子，他嘴中总有许多不许做的事情要郑重地指将出来。有时候，他的不杀生都绝对到让人觉得可笑的程度，比如他从不拿蝇拍子打死苍蝇，任何飞虫偶尔闯进屋子，他都是揭起门帘将其驱逐出境。那一年外面打向了消灭麻雀的战斗，祖父无力抗拒那举国捕杀的狂潮，他只得日夜在家里念诵超度的经文。

凡来园子的客人和家人，祖父最喜欢劝他们吃素，除了强调杀生的残忍，他还从饮食卫

生的角度指出肉食的坏处。按他的说法，动物挨刀时恐惧愤戾，挣扎嚎叫，它们的血液多会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化学变化，他极其认真地向听者指出，这一化学变化的本质就是血液的毒化。因此他认为，仅为个人健康着想，那样的肉也是不该吃的。对此，他还特举一事例做出说明。说的是一家的奶妈和主人吵了架，随后给孩子喂奶，孩子吃奶后面色发紫，猝然死去，经医生检查，才发现那奶妈的乳汁吵架后有了毒素。祖父说这是印光法师劝人吃素常讲的一个故事，那乳汁的变质就是由奶妈吵架后生了气引起的。人生了气血液尚且中毒，牛羊在磨刀霍霍下愤戾叫嚣，其血肉的化学成分岂能不发生变化！祖父日常向我和其它人重复的不外乎这些劝善的老生常谈，他重复得太多，有时候来园子闲坐的常客听了他说上句，大都知道他下句要说什么了。我确实听到有人说他迂腐，但没见谁说他封建迷信。

而除此以外，祖父总是督促我多干家务，教我平日要学勤快，朱柏卢《治家格言》中“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那几句话，他几乎天天都要对我重复。祖父就是这样一个朴实的，一切都求平和的老人，他那些不厌其烦向人重复的劝善话语，有时在晚辈口中都成了嘲笑他迂阔的话柄。但我的良知告诉我，祖父向我灌输的不是毒素，我也谈不上受了他什么不良影响。自上小学至今，学校的教育充其量只教给我了一些基本的书本知识，真要提说良好的影响，我看主要都是来自我祖父的。我确实不知道该检讨什么，揭发什么，批判什么。

举起笔对着一张白纸，我头痛欲裂，烟一根连一根抽下去。

最后，我还是同往常一样，为蒙混过关，在那连篇累牍的文字自残中大量掺水，又一次重复了说废话的句型练习。我说我好逸恶劳，受了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还说我有修正主义思想，一直走白专道路，想将来成名成家，像苏联作家那样住别墅，开汽车，过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说我看不起贫下中农，对学生干部和党团员怀有不满情绪等等。最后，实在没什么精辟的言论可交待了，我忽然想起了父亲大学毕业时纪念手册上一个同学的留言，那是四行诗句，毛笔楷书在粉红色的纸上，题词人的照片贴在右上角，是张全身像，摩登的发式和长裙，手背后站着，背景中波涛起伏的大海显然是画在摄影室内的布景。题词读起来朗朗上口，我早都背过了，遂顺手抄在我检讨的末尾：

过去是美丽的回忆，
现在是淡漠的象征，
将来是可怕的幻海，
最难把握的就是人生。

我说这就是我现在的思想情绪，我一贯的精神状态，也是我没落的地主阶级消极的人生观。按照既定的角色，我再一次把自己抹黑，抹得似乎比以往更黑。我承认，我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是资产阶级的公子哥儿，是修正主义在中国的应声虫……给自己戴上一连串空洞的大帽子之后，我发觉太陈词滥调，为了给那些干巴巴的标签添些文采的花絮，我再模仿某些十九世纪欧洲小说的腔调，胡乱倾诉出世纪病的忏悔。在有些写得颇为得意的段落中，我都对我那自状其丑的形象生出了奇异的自怜。但与此同时，我始终谨慎地把握住出卖自己的底线，我竭力在颓废、灰色、腐朽这些属于情调不健康的检讨阈内纵笔渲染，兜着铺陈的圈子，但绝不碰“反党”、“反社会主义”那类字眼的电网。

检讨写了几大张，天黑之前，我亲自送到辅导员手中。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你若拒不交待，他们当下就叫你过不去，眼前的事态肯定会急剧恶化，我只得用有限的招供苟延暂时的平安。我把我的自诬想象成类似接种牛痘的行动，现在先有意受一点感染，但愿最终能起到消灾免罪的作用。

六 紧急转移

交了那份长篇检查，一直没得到什么反应，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以为这一关又照常混过，随后便松懈下来。转眼已入寒冬，一天晚饭后返回宿舍的路上，团支书突然从后面赶上来，他叫我去个僻静处，说是有几句要紧的话得马上告诉我。天色正在转暗，我走到一堆树丛后，他已及时跟了上来。

团支书对我说，系上决定收缴我的日记和信件，明天就要指派专人带上我去我家全部收回来审查。他说此事现在尚属保密，本不该让我事先知道，他私下给我透这个风全出于好意，只是为了让我精神上先有个准备。他还说，他争取让辅导员明天派他跟我一起去拿那些东西，并特别提醒我，现在就想好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不能交出，等明天一到我家就趁机挑出来毁掉。昏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脸色，但从声音能听出他十分紧张。他反复叮咛我说："我给你透这个风可是违犯组织纪律的行为，你万万不能对任何人提到此事，永远都不能提。这事要是让系上知道了，我非受党纪处分不可。"

团支书是我们班仅有的两个党员之一，另一个是班长。班长的军人气显得有些做作，他人还算爽快率直，但说话举动常倚粗卖粗，在这政治挂帅的环境中，做事情总是明显地偏左。因为全班学生中就我和他抽烟，毕竟烟酒不分家，在宿舍里抽起了烟，我让他一支或他给我一支，在所有不抽烟的学生中，我们之间就别有了吞云吐雾中的融洽。看着那吐向空中的烟缕越散越淡，两个吸烟者之间的界线也慢慢模糊起来。他紧绷的脸开始放松，我的心情随之柔和起来，在浑身的舒畅向神经末梢弥漫下去的过瘾中，我觉得我不再那么拘束，而他也显得不太讲原则了。我就是喜欢让自己进入这样松动和涣散的状态，进而扩散这种状态，把它传播到更多人的身上。所以，即使班长这样极左的人，我也要在他身上找出能和平共处的一面，哪怕在事后他又绷紧他那军人的面孔。

团支书为人比班长随和，他原先在陕北一个县城的机关当小干部，也是受辅导员的安排，多次找我谈过话，要做我的思想工作。与班长那种总是一本正经的样子迥然不同，他的软绵绵的陕北腔常叫我想起了一种老大娘式的和气。他身上有某种难以捉摸的阴柔气质，想必是受了他老家县城里民间俗文化的熏陶，他显然比班长更注重人情世故，也更善于和他人相处。班长显得头脑简单，团支书却有些内心复杂，除了他身为团支书要讲究的原则性以外，我还能敏感到他本性中有所隐蔽的一面。显然是看准了我这个可靠的交流对象，他有时会找我谈些不可能和其它人谈论的话题。要说做我的思想工作，实际上他并没做成多少，倒是他自己思想中某些见不得人的东西，让他在我这个落后学生面前露出了一鳞半爪。

有一次他拿来一本《麻衣相法》，和我讨论起相术，还给我看相，说我右眼下那两个黡子长得不太好，是相书上所说的"滴泪黡"。但紧接着他又解释说，幸亏长得偏上，年轻时怕是有一段避不过的绊磕，若是生到脸蛋下面，那我这一辈子就注定要倒霉到底了。他的话说得我心里有点迷惘，使我想起了我算过的一个坏卦，我把那算卦的事给他简单讲了一遍。祖父有一副骨牌和一本名叫《牙牌神数》的小书，将骨牌摆弄过三遍，可按每次的得分从小书上查出算卦的结果来。祖父常说："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因此他并不随便给人算卦，他说卦要是随便乱算，卦就不灵验了。但我常喜欢纠缠祖父给我算卦，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不是有疑要卜，而是想藉卜读诗。从小书上查出的诗句多富有暗示，耐人寻味，我喜欢吟诵中反复琢磨那些诗意。那一年三天的高考考完了，我的好多同学都去著名的八仙庵抽籤问卜，我则回家拿祖父的骨牌给自己算了一卦。是个很坏的卦，最后的四句判词是："七十二战，战无不利。忽闻楚歌，一败涂地。"字面上是咏楚霸王的故事，显然指的是一种从大顺走向大败的运转模式。这一卦叫人甚感扫兴，但我当时不太信那一套，也就没怎么在意。现在经团支书一说，又想起那卦中的警告，我不由得拿起镜子照我的面孔，仔细端详眼眶下的部位。在我这并不白皙的脸上，真有两个暗淡的小黑点，就像天上亮度很低的星星，不仔细注视，是很容易视而不见的。

对涉及到性和色情的问题，我发现团支书也暗怀好奇，只是他不太好意思直说出来。有

一次他拿给我几册石印本的《金瓶梅》，叫我看那是不是足本。我说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部奇书，因为我读的古书多是文言文本，对于明清的通俗小说，我熟知的其实并不太多，更不用说明清的色情文学了。他谈到此类话题时口气是吞吞吐吐的，神情是遮遮掩掩的，多用发问引导我发言，显然想让我给他多讲些比较刺激的东西。我一开始还有所警惕，怀疑他是不是有意从我口中套话，但我很快就排除了这一可能。他确实有很多被压抑的灰色情绪或黄色意念，我是公认的落后学生，只因他认定我是个可靠的接受对象，这才时不时来我跟前宣泄一下。如此而已，岂有他哉。我知道我们都活在思想密封，情感冷冻的状态，我也清楚大家都处在相互的怀疑监视之中，都在提防别人告发自己，都在向别人隐瞒自己的思想。每个人都深知祸从口出的道理，一天之内，不知有多少次得把自己真正想说的话咽下去，完全消化在心中。正因为处于如此压抑的境地，我越发抑制不住地渴望发泄不满，同时对团支书那些随便乱侃的话题抱有乐意倾听的态度。团支书也同样闷得心慌，对他来说，也许只有在我跟前，他打开的那个出气口才比较安全。

一年级暑假期间，我收到团支书从陕北寄来的一封信，信里写了些农村社会的阴暗面，也抒发了他自己的抑郁，情调很灰，所有的话都不像出自一个党员之口。从他手中收到这样的信，我当时甚感惬意，这说明即使在党员中，也有人和我持相似的看法。他敢于写信对我说出他想说的话，而我却只敢在日记中自言自语。相比之下，他反倒比我更有说出真话的勇气。我当然知道，这样的信传出去对他不好，自收到那信便把它收藏在家中。这团支书后来似乎后悔给我写了那信，曾不止一次暗示我把信交还给他，我还没来得及从我的皮箱中拿给他，就发生了这收缴信件的紧急情况。他肯定害怕他那封信落到辅导员手中，这就是他冒险向我透风的主要原因。他护我，当然也是为保他自己。

我仍去图书馆记我当天的日记，翻出日记本的扉页，那上面写着：第三十六册。都这么多的册数了。我不由得在心里感叹了一下，一边抚摸着这第三十六册，一边想象所有的日记在书橱中摞起来的样子，想象我这一摞比祖父那一摞还低多少，想象我若写到祖父那样的年龄会比他的高出多少。但想到系上明天就要全部收缴的决定，我便心乱如麻，不知如何是好。首先是舍不得交出心爱之物的心情压倒了一切。交给他们，这些日记从此就被没收，就像那张《北极星》墙报，成为封存在我档案中的单行材料，我将永不能再翻阅我自己写的文字。是顺从交出，还是拒不交出，想来想去，我一时拿不定主意，直到想得我头脑发胀，太阳穴针扎一样刺痛。有一瞬间，我甚至想入非非，想到拿上我那一箱子日记和信件逃走，现在马上就走，再叫上我那个女篮朋友，像电影上那样，去火车站跨上火车，两个人拥坐在车窗下，把这个可恶的城市同路边不断向后倒去的电线杆一起抛向身后。

想到最后，我终于横下一条心，就是被开除学籍，也绝不交出一片纸来。这学我确实也上腻味了，有时我烦躁极了，甚至觉得不如叫他们干脆把我开除了事，省得待在这里凌迟受罪。交出日记，只会招来更大的灾难，现在就有明显的例子摆在我眼前。四年级学生蔡光澜已宣布开除，他的反动言论就是从收缴他的好多本日记中搜罗出来的。批斗他期间，中文系还专门办了展览，我们都去参观了他那些作为罪状陈列出来的日记。他们还从他的日记中发现了他偷书的丑事。如果他只背个思想反动的罪名，多少还会有个别人对他表示同情，然而查出他还有盗窃行为，这双料罪名加在一起，恐怕就没人可怜他了。太可怕了！我那么多的日记，他们若要成心找反动言论，岂能找不出几十条来？况且还有那么多纯粹属于个人隐私的内容，特别是涉及到我和那女篮朋友的交往，还有我高中的一个女同学，我们在复课小组中亲密的接触……我简直不敢再往下想，再想都觉得脸上发烧，身子不由得微微颤抖起来。最后我决断地对自己说：绝对不能交，交出日记就等于出卖了自己。

次日一早下起了雪，上午我还照常上课，表面上完全是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匆匆吃了午饭，在食堂里人最多的时候，我溜出学校，很快跳上 15 路车，顺利赶回家打开我的手提箱，清点里面的东西。首先是包括我带回来的那本日记在内的三十六册日记，其次是我数年

来收到的所有信件，连信封带贴在上面的邮票，已积了那么大一捆，还有我写的诗，以及很多其它手稿，已来不及一一翻检。我一五一十装起来，几分钟之后，就提起箱子走上了大街。

雪下大了，城里正在举行抗议美国轰炸越南的群众集会，满街的游行队伍，远近都响起高音喇叭，一阵阵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声。为了安全和迅速，我花钱叫了一辆人力三轮车，提上箱子坐到车篷下，车夫放下遮帘，就像坐进轿子，一下子置身于封闭的空间。我对车夫说：“去东关，要蹬快点。”坐在黑暗的车篷内，我紧张中激发了兴奋，竟用电影情节给自己壮起了胆。好像我不是身处现在的西安市，而是战斗在解放前“白区”的某个城市，好像这箱子内装的不是日记，而是党的机密文件，我眼下匆匆乘上三轮车，就是要转移这批机密文件，去投奔一个住在城外的革命同志。

就在这自我悲壮化的激奋中，我把箱子提到了她家。她是我们复课小组中没考上大学的一个女生，但她比所有考上大学的女生都生得模样可爱。那时候我刚刚背着大人抽起了烟，她从家里偷她爸的烟供我抽，整包整包地拿，都是凭票供应的。我羡慕大人抽烟的那种派头，开始抽烟时最喜欢摆姿势，先是用食指和中指把烟一夹，微仰起脸吸上一口，然后缓慢地吐出连环的烟圈，竭力显出风度萧洒的样子。见我练习摆那抽烟的姿势，她也陪着练习给我点烟的动作，她点得灵巧而优雅，俨然一副女主人殷勤招待客人的姿态。我还羡慕父亲那长期抽烟而熏黄了的手指，为了使手指快速变黄，我抽烟时就紧紧捏着烟屁股猛抽，很快，我右手的几个指尖和指甲就有了不黑不黄的烟熏色。

我把手伸出来对她说：“你看这颜色怎么样？”她抓起我的手闻着说：“好闻，这气味才叫男人气呢。”我就是从那一下手与手的接触发现了她双手的温软丰润，特别是手背上那似有若无的小窝。于是我们的手常常有了有意无意的接触。复课累了，我就拉她玩掰手腕的游戏。她不玩，她把手抽回去往身后一背，说女生咋掰得过男生。我说我让她双手和我掰，还让她先占个优势。我说得她有了勇气，我们面对面靠桌子坐下来，她开始用她的两只手把我的右手使劲往倒扳。我看她眉头皱起，嘴唇翕动，面孔有了潮红，看她为了两只手能鼓上劲而不住把手靠近她的胸膛。我于是乘势迁就，任她往怀里收缩，直到她鼓起的胸膛快压到我们紧握的手上，直到我似乎感受到她的心跳。但我的手臂始终不偏不倚，我只图在这延长的较量中把她的手越握越紧。最后，她渐渐软了下来，力气越来越小，但我还不想立即将她扳倒，我开始用劲捏她手上最经不起捏的部位，捏她那柔若无骨的细皮嫩肉，捏得她喊起了痛，一直捏到她差点恼了我。

她看上去还算伶俐，不知为什么总学不进去功课。平时跟我们一起复课，表面上她也在踏实地读，努力地背，只是不知心用到了哪里，背过的老是记不住。加入我们小组，她不过为凑热闹，对我来说，正好从中活跃了小组的气氛。她与我同岁，但比我显得早熟。不知道为什么，她总是一脸心事重重的样子，有时才合起书低声背诵起要记忆的内容，但没背多久，又呆在那里走了神。天热，她说她心烦没胃口，不想吃饭，也怕发胖。我说我看她的体重挺合适，还夸她是牡丹花的姿质，丰满得富态。她半信半疑，惊喜地问我：“你怎么知道？”我顺势张开双手作抱持状说：“不信咱们试试看。”她身子往我跟前一挺说：“试就试。”说着，我就把她上秤似的抱起来，提溜在空中掂量了一下，然后对她说，她真的一点也不重。就是些此类半开玩笑的亲热，我们的身体有了短暂的蹭撞。那感触是有些热火，但回味起来，又很朦胧，有几许怅惘，只觉得心里头怪怪痒痒的，却什么情况也拿捏不准。

后来高考发榜，我们学习小组的人都考上了大学，就剩下她蹲在家里当社会青年，她觉得没脸见人，就和谁都不再来往。我去她家看她，她在我面前哭过一次，哭得她湿润的黑眼圈显得更加幽暗。消逝的夏天早已带走我们高考复课时心头的郁闷，事过境迁后，背景随之变换，各人的感觉也恢复到日常状态，我们仿佛都另换了面孔，从前那些甜蜜的游戏似乎根本就没发生过。有几次面对她愁苦的容颜，连对她说几句安慰的话，我觉得都说得有些僵硬。

本来我是想把箱子藏到园子去的，中途想到不安全，情急之下，才决定转移到她家。因

为旧日的同学中只有她闲住在家，且不必担心有单位查问，从各方面考虑，藏到她那里都是最安全的。从三轮车上下来，我才完全回到眼前的现实，我急速行进的脚在雪地上踩出了格嘣格嘣的脆响，假想中的电影情节，如梦迷离的回忆片断，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迟疑地敲起她的房门，尽量用平和的语气消除了她乍见我时的惊奇和疑虑，随即给她简单讲明情况，求她让我把这箱子在她家暂且寄存几天，说等风头一过，我就拿走。她十分通情达理，当即爽快收下我那个皮箱子，还打趣地问我，放在她手中，难道不怕她偷看其中的什么秘密？我说就是有些秘密，也都是我们俩共同拥有的，她爱看就看去吧。

事到临头，已顾不得考虑那么多了。我放下箱子，立即慌忙奔回学校。但我不敢回宿舍，因怕他们找我，就躲到图书馆我平日读书的角落，在那里熬过了我多年来第一次没有记日记的晚上。白天转移箱子过程中的紧张和亢奋退潮了，真正的恐惧现在像巨大的阴影从半空压将下来，越逼越近，逼得我往后退缩，直退到这没有退路的死角。熄灯铃响了最后一遍，图书馆就要关门，我起身下楼，沉沉黑夜中，路灯投下昏黄的光亮，我好像走在恶梦的边缘，真不知该往哪儿去躲。

七 开除

回到宿舍刚睡下，辅导员就进来厉声催我起床，叫我跟他出去。这一次可不是去他的办公室，而是把我带到了保卫科。两个负责校内治安的工作人员配合系上的干部一起审问我，他们追问我白天去了哪里，日记现在何处。我一口咬定说，我就在图书馆读书，哪儿都没去，我该交出的读书笔记已交辅导员检查过了，如今手中再无任何东西可交。他们并不理会我的强辩，因急于迫使我招供，便对我采取了车轮战术，四五个人把我围在刺目的灯光下，这个审问一会儿，接着再由另一个问。开始的时候各有不同的口气，或劝我，或诈我，或哄我，但问来问去，问不出结果，便对我厉声斥责起来，拍桌子打板凳的，都说我再不老实，明天就把我移交到雁塔区公安分局处理。后来我疲劳得闭起眼睛半垂下头，他们才在深夜把我放回了宿舍。

但他们并没让我回原来的宿舍。我的铺盖预先已搬到二楼的另一个房间，次日早上，我醒后才看清了眼下的处境。垂在半空的电灯吊得快挨住天花板，窗子也封死了，同屋专门做了调换，我出去上厕所都有人跟随。辅导员向我口头宣布，系总支和保卫科联合决定，从现在开始，正式对我隔离审查。保卫科差不多等于公安局设在校内的代理机构，他们管校内的治安和师生的户口，看来他们就有权这样就地拘留学生了。自学习“九评”运动以来，中文系已有好几个学生陆续受到隔离审查。前几周我和郑良从走廊走过时，曾看见有两三个房间的门口都有人坐在凳子上看守，我问郑良这些人坐在那里干啥，他说他们在值班看守受隔离审查的学生。那时我还置身局外，还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没想到这么快厄运就轮到了自己头上。现在看守我的同学中正好就有郑良，连去食堂吃早餐，都得由他和另一个叫富仓的看守一起陪我前往。辅导员还向我宣布了隔离审查期间的纪律：不许回家，不许和其他人接触，不许独自行动，离开宿舍要告诉看守等等。房内看书光线太暗，我问郑良为什么把电灯吊那么高。他说包括封窗子在内，都是防止被隔离审查者自杀的措施，连我们这间宿舍内私人用的剪刀，保卫科都暂时收走了。

辅导员和班长早饭后强行带我去我家取我的日记和信件，他们昨天发觉我溜走后已去过一次，但扑了空，那正是我坐三轮车去东关的时候。我随他们到了我家，他们在房屋周围查看，一眼就在窗外墙根下看到一堆纸灰，垃圾筐内还弃扔了好几个撕下来的笔记本硬皮。后来听我大妹说，是她在我事发后出于害怕烧了她自己的几本日记。对那堆纸灰，他们有怀疑，于是立即从西安高中叫回了正在上课的大妹，对她严加盘问起来。大妹说她烧的是自己的东

西，与我的事情完全无关。对大妹的答复，他们很不满意，辅导员红着眼对她说，即使是她自己的东西，也不许随便焚毁，只要我那些日记和信件没收缴回来，我们家每个人都脱不了干系，都不许随便焚毁私人的文字。辅导员进而以威胁的口气要求大妹端正态度，说如果她不把有关的情况讲清楚，他们就要通过她所在学校的党委往下追究了。他们最终也没从我大妹嘴里问出任何线索，于是便怀疑她烧了我的信件和日记。

对我那些找不到下落的日记和信件，他们暂时放松了追查。辅导员的态度突然平和下来，他开始耐心追问我都和谁来往，和谁通信，我老实向他交代，他一一记下我说出的人名和地址。我暗自侥幸，辅导员始终没问到她，这说明他们至今对我去她家藏箱子的事仍一无所知。她知不知道我已被隔离审查？如果她现已知道，她会如何处理那一箱子文字？她会不会因害怕或后悔而交出我藏在她家的东西？我越想越焦急，真想立即跑出去见她一面。好多天以来，她成了我呆坐在宿舍里反省问题时胡思乱想的焦点，我的意念像舞台上的聚光灯，时不时就向她投下光圈，追踪照耀起她在我记忆中所有的细节。

那是去年端午节中午，我们复课小组的其它成员都不在，独有她来到我家。她一进大门就在院子喊着说她带来了一包绿豆糕，要跟大家一起分食，人还在过厅走着，先飘过来一丝淡淡的药香。我一闻就知道那是香药的气味，和我在中药铺或祖父的佛堂闻惯了的气味差不多，闻起来让人感到神清气爽。我说着"真好闻"，走过去就在她身上乱闻。她避开我，站在一边对我说："在这儿呢。"说着就解开了她短袖衫子最上面的衣扣，把领口下的对襟掀开一亮，一个小小的桃红香包贴在她那紧绷绷的内衣上。我把鼻尖凑上去闻了一下，她推开我，说等会儿她解下来给我，叫我闻个够。我趁势抓起她的手，她手腕上勒了一圈五彩丝线，紧得陷入了她那丰腴的皮肉。我说："你不是要上楼看佛堂吗？今天佛堂里比平时好看，咱们现在就去看。"说着，就领她上了楼。楼梯处光线总是很暗，上楼时，她很自然地向我伸出手，由我牵着缓慢登楼，在楼板上踩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楼上的外间比较昏暗，蛛网上扯下灰絮，粘了一团团老鼠屎，直至走进佛堂，里面才亮堂了许多。祖母把红漆的香案擦得铮亮，日光从玻璃窗子照入，桌面上都映出了我和她的身影。西方三圣像的金身在正面的玻璃龛中庄严而立，周围杂陈着各具形态的大小雕像，有佛，有菩萨，也有罗汉，还有太虚法师和印光法师精致的舍利塔，都是金属做的，密封在玻璃罩子内。香炉上香烟氤氲，浓烈的气味有点呛人。她显得晕乎乎的样子，半挨不挨地向我斜过了肩膀，那神态像是叫我自己动手解她藏在衫内的香包。

晚上他们又把我叫去审问，突然再次追问起日记的下落。他们说话的口气更凶狠了，而且说限定我明天必须交出日记，否则我的问题就会升级，我交代问题的地方也不再是校内。难道他们要把我移交公安局处理？我回到宿舍，昏沉沉躺在床上又想起了她。半睡半醒中，心里明明是急着现在的事情，身子却晃悠悠飘到了从前。还是在佛堂，香炉里燃起的烟缕雾腾腾的，那香案显得升高了许多，她菩萨一样笑着，坐在案沿上垂下双腿，正在把上衣扣从上到下一个个解开。那香包在她胸前发出暗红的闪光，冒出了火花，她的面孔也随之变得模糊起来。只见她袒开怀向我俯下身子，俨然是奶妈给娃喂奶的姿势。我伸手想摘掉那着火的香包，但够不着，一手抓住了她的奶头。我触电一样血脉贲张，就在此刻，佛堂四处起了火。

惊醒后才觉出那是迷糊中颠倒一梦，同屋们都已入睡，我睁大眼睛在黑暗中呆想，想我的出路，想她这些天来都做了什么事情。最后就想到逃跑，去看我那些日记怎么样了，也去见她。我忽然觉得很想念她。

第二天我再次溜出了学校，是趁午间休息时偷跑的。一路上我乘车下车，比上一次还要紧张，每一分钟都担心他们会赶上来抓我，从汽车站到她家那一段步行的距离，我差不多完全跑步前进。然而就在我眼看跑到她家门口的时候，辅导员等四五个人骑自行车突然从我身后包抄过来，把我团团围在了她家的大门之外。一刹那间我才醒悟到自己中了他们的欲擒故纵之计。我真浑啊，显然，正是我这一路的逃窜把他们引到了这里。

事情的结果糟糕透顶。我隔离审查后，消息立即在同学中传开，她得知此事后非常害怕，正好是在昨夜，她偷偷到后院墙角下烧毁了我皮箱中的全部东西。他们通过街巷派出所查看了她家，而且在后院的茅房墙角下找到了焚余的一堆纸灰，目击了所谓的现场。他们向她盘问了事件的整个经过，当即录下她的供词，让她亲笔签了字。追踪的结果一无所获，只带走了那空无一物的箱子，聊作我指使他人焚毁日记信件的证据。她受到的诸多牵连是不用说了，从此她和她父母都怨死了我，后来我们多次路遇，她都对我避而不理。多少年以后，我们两个人各自的路越走越远，彼此的消息日渐隔绝，最后就彻底失散在城市的人海中。

他们带回的空箱子似乎装满了对他们的嘲弄，辅导员及其助手们这一段时间来紧迫的期待直线低落下来，他们急欲抓住我反动罪证的计划全盘落空了。因此都显得气急败坏的样子，恨不得把我这个顽劣的皮球一脚踩扁。我知道这下他们绝不会轻饶我，想到这一点我心里反而坦然起来，反正事情是不会向好的方面转化了，那就任其发展，看它能坏到什么地步。他们恼恨我闪得他们一场扑空，却对既成的事实无可奈何，最后只得把空箱子还给了我。现在他们只有以恶狠狠的咒骂泄愤，辅导员和总支书记，还有保卫科的干部，全都口口声声指责我“毁赃灭证，胆大包天，反动气焰，十分嚣张。”。郑良告诉我，我这“焚毁反动日记三十六册”的事实业已定性，现在就只剩下收集我平时的言论来充实我“反动”的罪证了。

审问基本停止，郑良或富仓有时带我去教室上课，有时则陪我留在宿舍里。班长也搬进这间宿舍以加强对我的看守。现在他和我严格划起了界线，不再和我互相让烟。自从我毁赃灭证的罪名成立，班长便忙碌起来，常见他夹上公文夹跟辅导员外出，一时间比往日更显出他那坚定的军人立场。听郑良说，现在系上正对我进行外调。我问他啥叫“外调”，他说就是找我过去的朋友同学，叫他们写我的揭发材料。上一周发动全班同学写过了，现在转向了校外。富仓还说，团支书受了批评，据说班长在党员会上指责他纵容了我这个反动学生，最近系上搞我的外调，派出的人员都没轮到他的份儿上，一直和他有磨擦的班长正好趁机得了势。

辅导员开始不时叫我去对证揭发材料，他一条条问我说没说过那些言论。有些是我记得我说过的，有些我说是说过，但揭发人的复述歪曲了我的原话，更有些纯属捏造，我根本想不起我在哪儿说过。那时候我还不懂得抵赖的策略，初生牛犊不怕虎，一股子好汉做事好汉当的老实劲头，凡是记得自己说过的话，我都爽快地向辅导员做了承认。比如，我是转述过英国作家韦尔斯一句幽默的话，韦尔斯曾说，马克思的大胡子与他的《资本论》同样的冗长，什么时候若有机会，他真想拿起刀片把老马的胡子连同那本书一起好好修理一番。我知道我给谁讲过此话，他也是个家庭出身不太好的学生，有一次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来师大参观，大部分学生都去参加联欢活动，被指定留在宿舍内不许出去的学生中，有我也有他。我觉得这样的隔离对我们几个人是莫大的羞辱，他却羡慕有资格与会的同学，为自己不能身临现场而怨恨父母，深感遗憾。然而，就他这样的另册人物，不知深自痛心，反要硬充进步，表现积极，竟完全抽离我当初和他谈话的语境，硬是把韦尔斯说的话加在了我的头上。此话后来成为我恶毒侮蔑革命导师的罪状之一。

对证完本班同学揭发的言论，辅导员又和我一条条对证从我中小学同学那里搜集到的陈年老帐。大约是在困难时期，我和一个好朋友去逛自由市场。那时食物短缺，农民们在自由市场上高抬市价，我想买一块烤红薯吃，买红薯的农民竟索价一元。我嫌太贵，拧身就走，那农民却“同志，同志”地叫我留步，我满脸不高兴地冲着他说：“谁和你同志！”我真佩服我那老同学的记性，连这样的小事，都被前来外调的辅导员从他的记忆中挖了出来，给我的“反动”增加了一点份量。

我知道我那些中学同学都很单纯，他们也许并非有意要揭发我的问题，盘问他们的辅导员会启发说，“地主阶级的本性随时都会暴露的，即使在大街上走路，康正果也会表现出对贫下中农的仇视。想一想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什么侮蔑贫下中农的事例？”罪状

的分类就像文章的小标题预先已经拟定，外调只是尽量收集可以填充的事例。经辅导员这么一定调，我那些幼稚的朋友很自然地受到启发，就这样，处理我所需要的事例便一条条催化出来。辅导员确实对他所定的调子深信不疑，他并不听我解释事情发生的现场，他只问我有没有那件事。只要我承认了那个事实，罪名就算正式成立。

郑良和富仓都是贫农子弟，他们俩为人正直，待我还算朴实。对某些偏激的做法，他们有时会明确表示不满。他们家里都很穷，郑良身上的对襟上衣都是土布做的，他嫌周末穿上这样的衣服去外校会朋友太寒伧，我就把我的毛蓝夹克借给他穿。在宿舍里冬天洗脸，盥洗室的龙头只有冷水，若想用热水洗脸，得自备热水瓶到锅炉房打回开水。富仓的手生了冻疮，我就和他合用我的热水瓶，他很感激我，因此也经常帮我跑路打水。就这么点小事，也都成了某些好提意见的人指责他俩立场不够坚定的口实。但对此类挑剔，他俩满不在乎，也不屑置辩，在看守我期间，始终都对我态度宽松，提供了不少方便。

辅导员和我对证了我的所有反动言论以后就再没有叫我，我知道处分是免不了了，剩下的日子只是等待上面的批准。有一天我们宿舍内没其它人在场，富仓开门往外面的走廊看了一眼，便关好门认真对我说："学校已批下了对你开除学籍的决定，事先给你打个招呼，你心里也好有个准备。"郑良接着说："明天上午要开你的批斗会，反正就是个开除，再坏也坏到底了。到时候你可把握好自己，要顶住那场面啊。"我领会他们的意思，他们是在给我打气，让我挺过这最后一关，可别把自己当众弄得太脓包了。

次日一大早去食堂吃饭就换了看管的人，是平时常和我起冲突的两个积极分子。我在他们的推搡下被押进会场，只见那大教室内坐满了有关的领导、教师和中文系二年级全体学生，会场内贴了些增强斗争气氛的标语，诸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类的口号等等。使我感到特别惊异的是，标语上那"打倒"俩字下面竟然有祖父的名字，而且还加上了"地主分子"这顶帽子。我才在此隔离了四十来天，难道外面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莫非祖父也出了什么问题？怪不得辅导员启发我交待问题时，老是要让我讲我都受了祖父的什么影响。郑良的话预先提醒了我，从一开始我就以安然承受打击的姿态坐在我的座位上，不再起幸免的念头，一直冷漠地听他们的发言。从领导公布对我的处分到教师、同学依次登台发言，都是按预先的安排分别揭发批判我那些反动言论，那程序，那场面，那发言的姿势和腔调，以及不时插入那拉拉队式助战的口号，全都是我多次目睹的表演。发言者总是尽量表现出他们应有的愤怒，会场上总是激起阶级斗争的热潮，最后总是要达到把被批斗的人批倒批臭的目的。现在，唯一不同的只是，斗争的矛头直接戳向了我。

表演中还增添了忆苦思甜的插曲，一个女生上来讲起她家旧社会如何受地主压迫的故事，她用背话剧台词的腔调发言，说到伤心处还哭，哭得下面的口号声再次聒耳地响起，淹没了她抽泣的声音。看他们这样滑稽地表演，我忍不住笑了一下，这表情立刻激怒了几个积极分子，他们厉声喝令我"站起来"，接着更多的人大喊"站起来！"一个人举手高呼："打倒康正果的嚣张气焰！"其他人群起呼应。那呼声是声嘶力竭的，故作威严的，震慑着我，同时也抬举了我。我心里想，我一个才年满二十岁的学生，也犯得上这么多人合力打倒？在两位看守的推搡下，我站了起来，木然面对满教室呼着口号举起的拳头。环视了很多熟悉的面孔，我很想看出他们此刻到底有什么愤怒。他们真的仇恨我吗？如果真的仇恨我，那又是什么性质的仇恨呢？为什么要人为制造这样的仇恨？我惹了他们中的哪一个？我损了谁的个人利益？我到底干了什么坏事？我真想诚恳地告诉他们，我只是系总支指定的一个靶子，我根本没有反动什么。反动是一种派定的反面角色，每一次运动都会推出些此类倒霉鬼激发群众的愤怒，不幸这一次派到了我的头上。

批斗会结束后，我最后一次被带到辅导员的办公室，手续很简单，他交给我一纸开除学籍的决定，说现在立即遣送我回家。那天是 1965 年元月 5 日，开除的决定是先一年的 12 月 26 日通过的。我如释重负地走出了师大校门，冬天的寒风吹得我无比轻松。我的行李他

们已为我收拾停当，由辅导员和班长骑自行车驮走，我则跟富仓乘公共汽车进城。他们带上了我的户口和粮油关系，说要亲自把我转交给我所在街巷的派出所。

八 社会渣滓

他们这负责到底的送行其实是一次押送，要把我本人和我的档案材料当面移交给派出所。我现在是没有单位的人了，所以我回的虽是我父母的家，却首先得通过户籍员这道关口。我看见辅导员把我的户口和粮油关系交给了户籍员，还看见他拿出一个档案袋和户籍员到里屋说了几句话。然后他们一行人离去，户籍员老华便铁起脸训斥我几句，满口警告的语气，叫我先回去规规矩矩待着，听候他们的进一步安排。他留下了我的户口与粮油关系迁移证明，但并不提报户口的事情。我是在本市范围内转户口，本不该存在任何问题，但老华抓住我受了开除处分的短处，一直对我刁难加拖延。今天去了，他白眼一翻，叫我先写份材料。明天材料送去，又待理不理地说，还得研究一下，要等到下周。下周去了，却扑了空，另一个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人冷漠地对我说，老华出差去了，得一阵才回来呢。

户口悬着，粮油供应就落实不下来。粮油关系现在是每个城市居民一日能吃上三餐的保证，领不到那份定量，连身为家庭成员的资格都大大地打了折扣。我现在没有所属的单位了，既失学，又无业，这身份被通称为“社会青年”。“社会”这俩字是相对于国营单位而言的，凡非党国体制包干的领域，都属于社会。在一个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却有这样的怪事，你一旦被推出单位，加在你头上的“社会”一词便有了不太光彩的含义。当然，把你叫社会青年，并无明显的贬义，只是说你是个正在等待升学或就业的年轻人。但像我这类受过处分的人，既不可能再有学校招收，也不容易找到工作，在户籍员的口中，说得好听，叫“社会闲杂人员”，说得不好听，就直呼为“社会渣滓”了。

户藉员老华那天对我训话，我特别注意到，他警告我少跟街巷的社会渣滓在一起鬼混，他所提起的名字中竟然有李稚敏。我一时觉得奇怪，回去一打听，才知道李稚敏在我被学校送回之前已开除回家。我偷偷去找他，他父母在门口挡住我，说什么都不许我和他见面。回家后正好富仓从师大前来看我，说是辅导员派他给我送还我落在宿舍的几件东西。我们俩去兴庆公园湖边的餐厅吃饭，谈话间，富仓向我提起了系上突然决定收缴我日记和信件的具体原因。他说事情起于我写给外地某校一个学生的信件，那里也搞学习“九评”运动，该校的保卫科从我那位同学的箱子内查抄出他的日记和信件，其中有多封信寄自陕西师大中文系，他们便将原信如数转给了我们系总支。辅导员突然让我写交待材料的那个秋日周末，他们已掌握了我写给我那个同学的所有信件。富仓说，系领导本想让我主动交待我和那个同学的关系，因我一直拒不交代，他们才决定收缴我所有的日记和信件的。他们怀疑我隐瞒了重大问题，也想从我的日记和信件中找出更多的线索。现在我全明白了，这一场灾难都是由李稚敏交出了我写给他的那些信引起的，怪不得我后来再没收到他的来信，怪不得我去找他时他父母不准我见他。

富仓此行似乎还另有目的。他提到了团支书，说我开除后有人传说团支书给我写过一封信，班长一直在党员会议上咬这件事，因此系总支正在调查团支书和我的关系等等。他似乎在诱导我说出什么，但我什么也没对他说。我现在对他说话得小心谨慎，因为我弄不清是系上专派他来了解情况的，还是团支书不放心我，指使他来试探我口气的，抑或他只是随便说说，仅仅想告诉我某些真相而已。不管他此行的目的是什么，反正我绝不说一句对团支书不利的话，他毕竟冒险给我透过风，我绝对不能再连累他了。见我对团支书的问题没什么反应，富仓又提到那个女篮队员的情况。他说我被隔离审查后，她也受到了牵连，他们系的领导至今还在找她的麻烦，逼她写检查交待她与我的关系。

听了富仓的一席话，我再次感到开除后的轻松。让那些留在校内的人搞他们的阶级斗争去吧，反正我再也不会回到那里去了，谁好谁坏，谁胜谁败，如今全都与我无关了。

我现在最大的烦恼是报不上户口，在家要看父母的脸色，出门常受老华的白眼。老华压住我的户口似乎另有打算，他压了一个多月，压得我烦躁失去耐心，压得我父母也跟着发了慌，压到了快把人压垮的地步，有一天他主动找上我家的门。他忽然变得比较和气了，连说话的声调都有了好意，说是要给我介绍个工作，叫我到南郊的一个建材厂去当工人。说着便交给我一张表格要我填写，而且怂恿我说，我若同意去那里上班，填了这张表，就可以到新单位去报我的户口和粮油关系。

"派出所怎么会管介绍工作的闲事，那是街道办事处的业务呀。"父亲回来一听就觉得事情跷蹊，他让我先把那张表压在手中，别着急填，也别轻易交出，一切都等他把情况搞清楚再说。经过打听，那个建材厂果然不是好地方。原来那儿就是西安人常说的青砖二厂，都知道那里是劳改窑。西安有两个劳改窑，较大的一个在东郊，这较小的一个，困难时期也在国营单位纷纷下马的形势下转交给市公安局，调走了里面的犯人，改成了一个强劳单位。"强劳"是个新名词，是这两年出现的新生事物。三年的自然灾害制造了大量的流动人口，大批单位的下马又给城市增加了很多社会闲杂人员，而自由市场的开放则把这些人都吸引到合法或非法的买卖活动中。其中尤以倒卖粮票等无价票证的活动为不法行为，为此，治安机构特拟了一个叫做"投机倒把"的罪名。其实，在物资供应正常的状况下，在做生意合法且受到鼓励的社会中，哪有什么必要"投机"，又谈得上什么"倒把"呀，还都不是上面的政策变来变去，在忽开忽闭，一松一紧的过程中，害得大量的人陷入了法网。孟子所说的"罔民"，两千多年后竟活灵活现在今天。这些所谓的投机倒把罪，大都够不上判劳改或劳教，公安局抓住他们，关起来审查，若查出严重的问题，也许会升级为劳改或劳教，但大多数查不出重大问题的，就长期关下去，边审查边强迫他们劳动，等查清了他们的来路和背景，便把那些没有什么问题的人押送回去，交原居住地的有关单位处理。这一审查关押的整个过程名叫"强劳"。它是困难时期的产物，是对突发的社会失序应急修补的举措，是为了在劳改和劳教之外扩大劳役范围而增补的设施。好比泄洪的水库或过滤杂质的巨网，正是依靠这一不受法律约束的惩罚机制，国家用劳改的方式收容了自然灾害、自由市场和单位下马制造的大批流动人口。现在困难时期基本过去了，一大批释放后无处安身的强劳人员都在二厂就了业。为进一步扩大编制，也为了把持本市户口的社会闲杂人员都集中到二厂充实劳力，市公安局便在劳改窑大门口挂出了"地方国营建安建材厂"这块招牌，在 1965 年开春公开招起了工。

眼前的形势很明显，管我愿不愿意去，老华是非把我逼到那里去不可了。但父亲仍不放弃挽救的希望，他在找熟人关系，他想让我把这事尽量拖下去，等避过了公安局招工的风头，再想办法给我报上户口。父亲很清楚二厂是什么地方，对于城市街道上那些地痞流氓的危害，他向来视同瘟疫，避之惟恐不及，早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就是怕我和巷子内的坏孩子鬼混在一起，才把我转到祖父身边上学的。没想到命运不饶人，父亲从前的担忧如今终于成了我们真正面对的现实，老华强加给我的招工就是硬要把我推入各种刑事犯的窝子，要让我这个"反动学生"在酱缸里染得更黑。父亲的忧虑是十分深远的，他怕我思想没改造好，再染上别的恶习，将来若堕入偷盗诈骗的帮伙，我这一辈子就彻底毁了。

我能理解父亲的担忧，但我没有再等下去的耐心，我受不了母亲的唠叨，也不想再看父亲阴沉的脸色，更羞于蹲在家中吃闲饭，分食父母弟妹的定量。两相比较，我宁可先去二厂当就业工人。我知道去那里名声不太好，活路苦，工资也很低，但我心想，我又不是去那里当犯人，工作之余，仍可随便出入监狱大门，也算是个体验底层生活的难得机会。小时候我读过《王若飞同志在狱中》等一大堆写共产党坐国民党监狱的故事书，那些有关狱中斗争的革命浪漫描写曾给留下很深的印象，现在那些印象的残渣突然在我的想象中起了发酵的作用。在父亲眼中，那是掉进火坑的险途，在我的想象中，却显示出刺激而富有戏剧性历险的前景，

甚至有了某种自我悲壮的意味。父亲看得很严重的事情，我偏要当儿戏去拨弄一下，我甚至在心里痴想，说不定在那些劳改劳教释放犯中还能结识几个江湖英雄。

老华不断来家里催，父亲一再往下拖，我越来越在那个总是晾满了湿衣服的大杂院里住不下去，出了门最怕和老华那黑不溜秋的长脸照面。我渐渐失去耐心，有一天随手拿出老华留下的那张表，就像接了阎王殿小鬼勾魂的传票，趁父亲尚未下班，我亲自把它填好，径直送到了派出所。

九 劳改窑

1965 年 3 月，我进西安市建安建材厂当了就业工人。

就业工人系劳改单位用语，不只这工人的称呼与普通工人身份上区别甚大，所谓的“就业”，也有其特殊的含义。按规定，劳改犯或劳教犯刑满释放后，若无原单位出面认领，一般都不准返回其原住城镇。劳改机构设有专门容纳这些人员的工厂或农场，刑满者出了监狱大门，只需夹上铺盖卷走进另一个比邻的大门，就享有了政府安排的工作。刑期有限，但改造无期，继续留厂/场改造，乃是政府给释放犯的一条生活出路，这就叫就业，其人之身份即为“就业人员”。中共中央的文件上有明确的规定：“刑满释放后强制留场（厂）的人员，要设置专场（厂）或单独编队，严格管理，……要实行监督改造。”而且“要在偏远的地方选择有生产门路、有就业安置条件的地方设置就业场所。”这些人也有工资，也享受一定的福利，但得继续在严格的监控下劳动，仍不许乱说乱动。比如，就业人员首先就没有辞职不干，迁走户口的自由。如果他未经许可，擅自离开所在的就业单位，乃至长期不归，厂/场方即可对他以逃跑论处，管教干部完全有理由赶到他家中，像抓逃犯那样用铐子把他抓走。就政府的立场而言，安置他们就业,是对他们的照顾，甚至被认为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对那些受到强制隔离的就业者来说，实际上等于被当成了回收的废物，只是供政府廉价利用的劳力罢了。

这就是从五十年代延续下来的就业制度。直到困难时期突然来到，很多单位纷纷下马，连就业单位也负担不起收容就业的重担，这才遣散此类人回家自谋生路，大批的劳改劳教释放犯由此获得了重返城市的机会。接着经济开始好转，秩序重新恢复，西安市公安局需要回收散布在社会上的闲散劳力，他们便通过控制户口和粮油关系，从城市的各个角落，硬是卡住形形色色的前科犯，以及像我这种并非前科犯，却属于社会渣滓的无业者，全部逼到这建材厂当就业工人来了。

我不是不知道这些情况，可我偏偏要自投罗网。

那天从户籍员手中拿回我的户口和粮油关系，我背上从师大带回的铺盖卷，还特别装上我没有修完的《古代汉语》、《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和《大学俄语》课本，打算到了劳改窑继续坚持学习，在工作之余自修完我的大学课程。15 路车过了师大再向南开，三站后下车，就踏上了二厂大门外的马路。远望四周围一圈高墙，走到近处才看清，那墙上有电网，哨楼上有岗哨。大门口有持枪的警卫和值班的干部，他们通常都不太理会往进走的，但特别严查往外出的，包括开进去运砖的大卡车，出门时连底盘都要仔细查看一番。

我入厂后去干部院报了到，交上我的户口和粮油关系，他们发给我一红塑料皮的小本，名曰“就业人员出入证”。这是每个就业工人出入二厂大门的凭证，上面有持证者的姓名和照片，出门时必须出示给值班干部。这出入证与国家正式工作人员的工作证性质有别，基本上对外无效。它的作用主要在二厂内部，一方面标志我们的身份仅高于强劳人员，一方面也把我们与干部严格区分开来。我们必须随身携带此证，丢失或被干部收回，暂时就出不了大门。只要干部院一个电话打到门卫室，通知说取消某人出门的资格，他暂时就别想迈出大门

一步。正是通过这一凭出入证出厂门的制度，厂方控制了我们就业工人的行动自由。通常，从周一到周五，晚上大都安排有政治学习，在这五天内，门卫室基本上不许我们就业工人随便出门。只有捱到星期六下午下了班，通过门卫室验证检查，我们才得以走出厂门，各自回家。各种过错都可能带来暂停出大门的处罚，这出入证简直成了套在我们头上的金箍圈，或松或紧，全由管教干部一手操控。

干部也有干部的理由，干部知道我们这伙人里小偷最多，所以总是好意劝我们不要乱跑。比如，他们常常就对全体就业人员这样说："少放一个人出门乱跑，城里的公共场所就少丢一个钱包；少出去一回，就少犯一次错误。不是不给你们出门的自由，是考虑到少出门对你们有好处。安心待在厂内，既有利于你们自己的改造，也有利于城市的社会治安。"这类话乍听起来，让我深感荒谬，又不是所有的就业人员都犯有绺窃罪，凭什么让大家都跟上背做贼的黑锅！但干部把这类告诫的话讲惯了，训斥人训出了他们的职业快感，在他们眼中，我们都是社会渣滓，管你做贼不做贼，严加管制总是没坏处的。

有个新来就业的小伙子对这种死规定很不服气，一天他有急事需要回家，下班后来到大门口，偏不巧蹿上那时候门卫室不给放行。小伙子坚持要出去，门卫室就是不肯，最后他急了，不听拦阻出了门。门卫室的电话立刻打了进去，小伙子还没走到汽车站，就让追上来的摩托车截住，拉回厂二话不说，立刻关进了强劳队。干部们常向我们强调说："这里是专政机构，不是哄娃吃奶的地方。你是龙，给我盘住；你是虎，给我卧下。"还威胁我们说："就业队和强劳队只隔一道墙，从这边调到那边工作容易得很，只要挪个铺位，手续就办妥当了。"

即使不挪铺位，也看不出两者有多大的差别。我们宿舍墙上贴有《就业人员守则》一大张，一条条往下读去，全都是针对犯人的口吻，越读越叫人觉得心寒。这宿舍原先就是犯人的号舍，两对面两排板子搭成了双层通铺，上面并排摆了不少包装布做的被褥。那暗灰的色调老鼠皮一样肮脏，同我进厂后所见强劳人员着装的布料完全一样，不用说，用那种铺盖的就业人员都是从强劳队转过来的。

我挑了块宽敞的地方展开铺盖，把带来的书籍全摞在枕边，躺下来抽着烟，自己给自己宽心。既来之则安之吧，先干上一阵再说，等实在干不下去了，到那时再要求退职也为时不晚。至少有一件事还让我觉得满意，我手里现在握有领自食堂的饭票，每月可吃四十五斤粮，是砖瓦厂工人的定量。每天开饭时，我凭票买了饭，端上碗靠在向阳的墙根下，毫无拘束地独自享用。毕竟能自己吃自己的定量了，不管再有多少苦处，总比端父母的饭碗，吃别人的定量自在。

在食堂遇见了小学同学二毛，他初中毕了业考上技校，前两年技校解散失学回家，曾去自由市场上混过一阵，没想到竟混进了二厂。二毛说，他先是被户籍员老华从家里叫到派出所问话，然后就送到这里宣布强劳，至今已有两年。他学了一手烧窑的技术，不久前才在烧窑队就业。边说着二厂的情况，二毛带我上了东窑，从东窑上向下望去，坯子场上一排排晾晒的砖坯，一处处小丘般堆起的黄土。二毛说，这里一直都是手工制坯，不久以前才装上了大型砖机。制砖机此刻正轰隆隆运转，有一堆工人抡镢头挥铁锨，挖的挖，铲的铲，把土丢进架子车，再把一车车土倒入砖机后面的大漏斗。砖机的前面另有一堆人，他们轮流把砖机吐出的湿砖坯用车子推到远处，再由另一批人把砖坯摞起来晾晒。"跟黄土打交道都没有轻活，"二毛对我说，"那湿坯子一块就有十几斤重，砖机要是不出故障一直开下去，干八个小时真够你受的。"他说最舒服的还是烧窑工，三个人一班三班倒，各钻到各的窑道里工作，谁不见谁，比在坯子场紧跟机器转的活路自由多了。

新来的人全分到坯子场干活，这活路不需要任何技术，只要舍得出蛮力，谁都干得了。我二十岁，身上的各个部位都太嫩：面软，嘴笨，心实，一双学生手没受过劳动的磨练，头一天在坯子场挖土方，手上就打了泡。现在可不比当学生参加义务劳动的日子，那场合再紧张都有很大的表演成分，不过偶尔受些劳累。如今在这里是当就业工人，每天八小时都得实

打实出力干。名义上叫工人，整个的管理方式仍是劳改队的，有带工队长监工，有大组长跟在屁股后面吆喝督促。现在我才真正尝到了干体力活的滋味，劳累只是不适的一个方面，更难受的是受人监督，干部根本不把我们当工人看待。从师大开除回家后，父亲已向我讲明了受处分的后果，他说只要那处分不撤除，恐怕我今辈子就得把重体力活干到底了。

母亲给我包内装了几双干活时用的帆布手套，但手套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手上打了泡，就得让它往破磨，磨出黄水流了血，结上痂再磨烂，再愈合，最后长起茧子，磨得手掌本身就手套一样耐磨，劳动的手才会磨练出来。坯子场上，制砖机只要转动下去，胳膊腿就得跟着动弹，得不断给砖机的大漏斗内倒土。我干累了，拄上锹把缓口气，习惯地张开手掌，也学别人的样子，往掌心吐些唾沫，合掌搓两下，像膏了润滑油，又攥紧锹把干下去。

在坯子场熬了数月，后来烧窑队需要进人，二毛把我推荐给刘队长，天刚热起来，我就调入了烧窑队。

那砖窑按类型名叫罐窑，每一个都如巨型的罐子半埋在地下，进入窑内，站在拦火台上抬头仰望，那开了一个圆口的穹顶离窑底足有两三层楼高。向坯子场的一面开有几处通道，供装坯出砖之用。二十来万的砖坯装满了，我们分头做点火前的准备工作。二毛是主烧，他和副烧长海负责盘灶，我给他们打杂当帮手，任务是用那几处通道上废弃的砖坯把窑门封死，再用麦秸泥从外面糊严。我们的工作面在地下，进入一条沟通了很多砖窑的隧道，通过阴暗的走廊可走到我们将要点火的地方。那工作面的形状正如一孔陕北大窑洞，一砖到顶的拱券，熄了灯里面一片漆黑。点着了火，二毛和长海负责烧火，他们用一特制的小铲子把和湿的煤均匀撒入灶内。我只管供煤，这工作是把煤末加上水，和湿拌匀堆到灶边。只要他们有足够的湿煤烧火，我就没有太多的事可干。一窑砖需连续烧十来天，刚点火的几天温度不高，烧煤也不多，我的活极为轻松。只是到烧大火的时候，用煤量大增，我的供煤任务随之变重，下班前要清理的炉渣也较平时为多。我们在地下十几米深处工作，所有的炉渣得装入抬筐，用辘轳绞上窑顶，再运到远处的炉渣坑倒掉。这一段工作紧张而繁重，也很脏，会弄得人满身是灰。但八个小时内仍有不少时间是在窑道里坐过去的，这期间我们喝茶，抽烟，聊天，又有现成的火，还可以做饭。若再有其它班上的闲人凑过来坐在一起，灯光下就是一场热闹的聚会。有时候我们没有兴致，或精力不足，就互相照应，轮流睡觉。窑道里没有昼夜阴晴的明显区分，也没有雨雪风霜之苦，只要防住查班的队长，我们完全可以根据情况舒服地安排空闲的时间。

听我说我因写日记犯了错误，他们全都显得茫然不解。“写日记干嘛？想当雷锋了？”长海故意打趣地问我。这窑底下干活的人对读和写的事情都没有什么兴趣，每见我利用休息的时间读书，长海多对我报以嘲笑。他们基本上就那么两种案情：不是偷窃，就是投机倒把，聊起天来，自然三句话不离本行。外号叫大侠的山西人听说掏包的技术特高，他自称高级钳（钱）工，每一次进城回来，都拿牡丹烟给大家乱散。即使在窑道内闲下来，大侠也不放弃勤学苦练，他拿一块肥皂放在装满热水的缸子内，反复用两个指头把滑溜溜的肥皂快速夹出缸子。长海是二马路上坏孩子群中长大的，进强劳队之前已劳改过几年。听说他本来也偷，但技术不行，现在专门“吃二馍”，就是叫上几个相好的小兄弟去街上作案，给他们打掩护，他们若得了手，便跟着分些零头。大侠和长海属于沉不住气，喜欢乱咋呼的人物，其他人大都韬光养晦，不动声色。他们待在这里就业，不过图眼下稳定，只等时机成熟，便会远走高飞。但确实也有老老实实在厂内劳动，再也不偷不骗的，堪称改造好了的就业工人。另有些人到底做没做什么坏事，谁也搞不清楚，就是管教队长，抓不住证据，也不好胡乱猜测。“抓住是你的，抓不住就是我的。”这是他们常挂在嘴上的小偷哲学。但久走夜路总有遇到鬼的时候，过上一阵，在全厂好几百就业人员中，偶然总会有一两个翻把的倒霉鬼。比如某某人前天还在班上，昨天外出未归，今天就听说城里的分局打来电话叫这里去领人。那是个平时干活还老实的小伙子，周末外出总洗换得干干净净，谁能看出来他干的是“钳工”。据说是

在车站作案被当场抓住的，押回二厂随即丢进了强劳队。

窑上的工作很分散，在开会学习方面，向来都松松垮垮，这也和主管干部刘队长的管理方式有关。他是那种劳改队里混久了的干部，没事不找事，只要生产运转正常，手下的人不在外面作案出问题，小事情他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带我们干活的时候，他常摆出家长式的态度，就像过去的店铺老板对待手下的伙计，半真半假地骂着，恩威并施。而这伙人则嬉皮笑脸地应付，有时干得齐心卖力，有时则对他阳奉阴违。就这样一窑砖烧熟了，另一窑又接着点了火，这东窑上一溜串二十四孔窑城堡般耸立在坯子场东边，日夜都有烟往天上冒。

窑内的砖即将烧熟时，最后一道工序是在该窑的顶上围起土做成圆形的池子，在闭火后给里面放水。这道工序叫饮窑，即给砖窑喝水。池内的水慢慢渗入窑内，激在烧红的砖上，经过这一逐渐冷却的处理，红砖就变成了青砖。饮窑的时候，那窑顶热气腾腾，恍若巨大的蒸笼，炽热的窑壁把热扩散到附近的地面上，从那儿经过，隔着鞋底子都能觉出从地下冒出的高温。有一次我意外发现，连靠近窑边的自来水龙头流出的水都成了热的。这对我可是个重大的发现，砖厂里没有任何卫生设施，平时我们都在窑下烧些水随便洗洗。发现了这热水龙头，我下了班便常去那里洗澡。脏工作服往地上一丢，光身子打开龙头，不管是热天还是冷天，就在光天化日之下痛快地冲洗起来。这里地处劳改窑东南角，往后是大片荒地和围墙，没有人来这警戒线的边缘闲转，大概只有哨楼上站岗的武警能从远处看见我洗澡。

我每天下白班在下午四点左右，冲洗干净了，就来到远处一座废弃的窑顶上，找处阴凉坐下，望着坯子场消磨时间。东西窑之间那一大块凹下去的平地上，正是工人和强劳人员出力流汗的时候。烈日当空，上晒下蒸的坯子场有如热锅，工人在砖机的牵制下紧张地制坯，很多人光膀子头戴草帽，脖子上搭一条毛巾，边干活边擦汗水。强劳人员则干最重的活，他们肩挂皮条，背衬麻袋片做的垫子，在岗哨的监视下，把晒干的砖坯背到窑内装窑，或把刚烧熟的热砖头从窑门背出来码成堆，供运砖的大卡车开进来装载。出热窑特别受罪，窑内就是个大烤箱，一股子发臭的硫磺气味，空中纷扬的粉末眯人眼睛，尽管有鼓风机在窑门口轰隆地吹风降温，那砖块拿起来依然感到烫手。他们都上正常白班，下半晌两点出工，得干到六点才能下班。这四五点钟偏西的烈日十分毒，正是一天中最难熬的时刻。有时候有人背不动了，一个趔趄，背上的砖头就哗啦啦垮下来碎在地上，即使擦伤腿砸烂脚流了血，也少不了队长一顿臭骂。

我暗自念了一声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幸亏我调到了窑上，真是苦海超度，躲进了避风港。要是现在还留在坯子场干活，我真不敢想象我此刻会狼狈到什么地步。

我那同案的老同学李稚敏也进了就业队。本来听说户籍员逼他来二厂就业，他母亲坚决不让他来，不知道为什么他最终还是叫户藉员逼进来了。两家的父母都不许我们两个再有往来，他明显有意避开我，我一直想追问当初他们学校收缴信件的始末，却始终找不到机会向他开口。才不过半年光景，他整个的人都变了，穿一身旧工作服，推了光头，真正摆出了老实接受改造，甘当苦力的姿态。听说他进厂后表现很积极，随后当上小组长，很快就学会了劳改队犯人小头目板起面孔吆喝手下人的那一套。听说他现在已是队长跟前的红人，最近定工资就给他定了月薪 40 元那一级。我和大多数新来的都是 30 元，属于最低的一级。有一天我在路口上碰见他们一队人从坯子场下工回来，他的样子令我十分吃惊。难道一个人内心的变化会起到自动塑造他外貌的作用？他体格比从前壮实了，面庞也变得轮廓粗厉，磨出了强悍的棱角，不要说无复昔日的清秀，甚至都隐隐露出了凶气和恶相。他看见了我，但脸上是一副不认识的表情，过去的一切好像已从他记忆中完全抹去。

人与人之间就是这样变化无常，昨天还可以在一起无所不谈，突然来了政治上的变故，交情从此中断，再也没有互相沟通的可能。我不知道他现在心里是怎么想的，他到底是为暂时偷安而假装积极，还是确认自己犯了错误，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决心在这个人斗人的烂摊子里混出名堂来？我看不出在这鬼地方卖力干活有什么奔头。厂领导多次讲话，号召我

们就业工人安下心在建材厂工作，叫我们“以厂为家”，但我从来也没信过那些糊弄人的好听话。既然说劳动光荣，为什么要把最重最苦的活都派给我们社会渣滓，而带工的队长从来什么都不干呢？自进厂之日起，我就看清了这种劳动的劳役性质，它是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惩罚，根本没有什么荣誉可言。

这劳动的目的就是要在身体上把人拖垮，通过劳损筋骨来消磨意志。改造的结果就是把你限制在只知道埋头干活，再也没有兴趣和精力进行思考的状态。我从来也没热爱过这样的劳动，自从在中学上劳动课开始，对那些毫无意义的体力劳动，我便采取逃避的态度。现在当了就业工人，受人管制，逃避不了，我只好磨混，能少干便尽量少干，能能捞到机会就避而不干。我很欣赏食肉动物的捕食方式，只需几分钟的追赶与捕杀，即可在捕获猎物后狼吞虎咽地吃饱，剩下漫长的白日无所事事，就雄狮般懒散地卧在一边养神，不必牛羊那样低下头没完没了地吃草。烧窑队的工作也有类似的性质，紧张出力地大干一阵，累得我满头大汗，然后我就可以成小时地歇下来，抽着烟想我的心事，不必受任何人的督促。懒散现在就是我的价值，我得想办法争取偷懒的机会，维护我偷懒的条件，在懒散中蓄精养锐。我可不想学李稚敏的样子，我的确想不通他怎么会如此积极地投入劳动改造，怎么会热爱可恶的劳役。

二厂的墙那边驻扎着军营，下了白班，很多人都去那里看无聊的露天电影。我不想去，我就爱在这窑顶上独自坐下来四处观望，看终南山由清晰变得模糊，看夕阳下沉时暮色四起，看远近的灯火渐渐繁多起来。这里和师大只有三站公共汽车的距离，在落日的返照下，图书馆那宫殿式的大屋顶看得一清二楚。天色渐暗，顶楼上的大阅览室亮起了灯光，是我熟悉的日光灯那种发白的光，白得冷清而宁静。自开除离校至今，有好多次，我梦见我再次返回师大。处分撤销了，我又坐在阅览室的那个角落，书桌书架依然如昔，眼前的情景出奇地真实，连日光灯管发出的嗡嗡声都听得十分清楚。每一次我都从梦中喜醒，然后黑暗中大睁着眼睛一阵惆怅。

天已全黑，再回过头环顾这墙圈圈以内，我看见了另一种景象。大墙上的灯泡都亮了，每隔一段，电网上亮一个昏黄的光团，从北向南，随着地势，一段比一段高上去。而在东西两窑和坯子场之间，好多排路灯平行排列，稀稀落落的，也是亮着昏黄的光团，在这过于空旷的工地上显得暗淡而凄凉。把远近两处目睹的情景在心里对比和回味一番，我突然明白我“人在何处”了，原来这就是我当初向往的灯海。那时候我黄昏中常从图书馆顶楼上向南眺望，我看见远处有一片灯火亮起，面对那煌煌灯海，我总是满怀诗情。我长久地向那里凝视，我看见外围一圈灯火高低错落，圈子内的灯火则繁密璀灿，都在黑夜的深厚底子上闪闪生辉，飘渺得动人遐思。不知那灯火繁密的地方是广场是街市抑或村落，我只顾沉吟我的诗句，把那远方灯火比拟为落向地面的星群。现在一切已清楚地呈现在眼前。显然，我当初看到的灯海就是二厂的灯火，就是我此刻所在的地方，而那飘渺的美感，正是大墙上和坯子场那些昏黄的光团造成的。真是一个够讽刺的诗谶。我再次环顾墙圈圈以内的灯火，回想着那时从图书馆楼顶上看到的情景，用手背抹干了几星辛辣的眼泪。

十 在劫难逃

1965 年秋日的一天，大妹看见祖父从家门口走过，她说她跟在祖父身后连叫了几声“爷爷”，只见老人家木然向前走去，背上好像受了伤的样子，对她的叫声毫无反应。紧接着家里的帮工彩霞从后面走了上来，彩霞对大妹说，宗教事务处在卧龙寺设了专案组，她今天陪老人家到那里接受批斗去了。卧龙寺就在父母家所在的巷子内，是我小时候常去玩耍的地方，那寺里的佛学图书馆为祖父创建，方丈朗照法师也是祖父一手扶植起来的。怎么就在那样的佛门清静之地开起批斗会来了！彩霞说，他们不许她进入批斗现场，她站在会议室外的大院

子里，只听到里面忽高忽低说话的声音，都是和尚和居士批判揭发祖父的发言。她还说，那发言声偶尔还被一阵起哄声打断，好像有人在里面动手动脚。祖父都八十五岁的高龄了，难道他们在批斗会上殴打了他？

中共的党国体制不许任何组织或团体独立于党的控制之外，对于社会各界人士，党权政府都要特设一管理机构。宗教事务处就是地方当局主管宗教界的监督部门，而在此机构的操控下建立佛教协会，则是为进一步在佛教徒内部安插党的代理人。不知祖父当初对这一全面政治化的现实是否有所认识，自从新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以来，连寺院和僧尼也一股脑纳入了行政管理。祖父在佛协享有的地位，在政协得到的荣誉，包括那一百多块钱的津贴在内，全都不是白给白拿。他们试图将他这个著名的居士官员化，从一开始就指望他忠实执行党的宗教政策。祖父显然没有完全领悟这一“统战”工作的政治同化目的，在前些年比较宽松的形势下，他也许太轻信了当局的某些许诺，还天真地以为，他这个居士仍可像从前那样一心弘法，因而常提出很多振兴佛教的建议。他哪里晓得宗教自由的政策只是个幌子，比如，他频频建议举行纪念法会，据说就特别招惹了官方的讨厌。出家人现在也不比从前，祖父要求寺庙内严整戒律的倡议更引起了很多职业和尚的反感。也许直到最后祖父都不明白，在主管官员的心目中，他在宗教事务上流露的所有热心和善意都属于不识抬举的表现，都超出了宗教政策所许可的自由。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上面决定不再容忍他了，于是就赶在运动的风头上组织僧尼把他一举打倒。

祖父在新社会过了十六年平安日子，现在终于轮到他领教党组织挑起群众斗群众那险恶的一手了。从卧龙寺挨批斗回来，祖父最想不通的就是那些佛教徒的表现。平时都很敬重他的僧尼和居士，怎么会说翻脸就对他翻了脸？怎么会比主持批斗会的干部对他还来得凶狠？他得罪了他们什么？他们真心要打倒他吗？祖父确实不知道，解放后的寺庙环境及僧众的处境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里受到宗教管理机构的控制，那里也培养了靠拢组织的积极分子，建立了向上面反映情况的渠道。祖父更不知道，他那些弘法的言论，不管是公开讲的还是私下说的，全都由特派的僧尼收集整理起来，统统汇报给了主管单位。主管部门一直都在暗中给祖父记账，早先给他那些脸面，好像都是为促使他充分暴露他反对宗教政策的真相。

在佛教界内部挨批之后，祖父随即被栽上攻击党的宗教政策之类的罪名，然后免除宗教界的一切职务，接着又从市政协除名。他那一百多元的补助立即停发，又像解放初失去房地产之后的情形，他和祖母每一月的生活费用首先成了问题。他开始变卖他家中最后可变卖的财产，卖了古旧书店还愿意出好价钱的大部头书籍，有影印宋版藏经，有各种稀有的丛书，还有历朝的正史和一大堆地方志，所有这些我一直在心里想要继承的遗产，全都连箱带柜被古旧书店运走了。

更沉重的打击接踵而来，那是在祖父从政协除名后的一天黄昏，公安局突然持搜捕证闯进了寂园。他们来势险恶，一进屋先把祖父叫出来当场拍照，然后展开搜查。揭了他卧室的地板，挖了我祖母的炕，但大动干戈后一无所获。据说当时要是找到了电台、枪枝或变天帐之类在小说、电影中描绘滥了东西，当下就会把他这位八十五六的白胡子老头以反革命罪逮捕。可惜他们并没找到那些恐怕也只有在小说、电影里找得到的东西，为显示战果，也为了表示他们没有扑空，公安局最后还是没收了不少被宣布为“反动”的物品。有祖父所有的流水账日记一百多册，有解放前后所有的照片，还有杨虎城、于右任写的字，特别是被中共宣布为国民党战犯的戴季陶与祖父讨论佛法的一包通信，全都一五一十地装入好几个麻袋，带回公安局审查。公安局当场宣布，给祖父戴上地主分子帽子，交当地派出所管制。多年来去政协开会写学习心得的光荣资格，政府现在断然收回。从此以后，他得接受法律规定的羞辱，不许随便走动，不许自由交往，只能在他的家内画地为牢，形影相吊，还得定期向派出所提交他接受监督改造的书面报告。

事情还在进一步恶化。一个名叫“社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或“四清”的新运动已

在全中国展开，除了清查所谓的“四不清”干部以外，工作组还发动群众进一步完成土改所未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如给个别农户补订家庭成份，再次从他们手中没收被认为属于漏网的财产。真可谓祸不单行，祖父这躲过了初一的地主，如今再也躲不过十五。

有一家姓曹的农户受了工作组的煽动，他们告祖父修建寂园时强占了他家的地产。那曹家的控诉土改时就提说过，当时祖父受到保护，他们的控诉也不符合事实，因而所挑起的事端并没有闹大。如今上面已决定打倒祖父，为清除他在佛教界的影响，正需要有罪名加在他头上，自然又翻出那笔旧账，给祖父定了条霸占曹家土地的罪状。对寂园附近的生产队及其社员来说，十五六年前没分成的那笔财产一直都是个恨事，现运动搞起来了，正好可弥补他们的遗憾。祖父的城市居民身份，现在根本没人理会，他们要把他当农户对待，除留下现住的房屋，包括我那间西屋在内的全部房间，以及屋外的院落，生产队宣布全归他们集体所有。

1965 年冬的一个周末，二厂里刚发工资，趁手头还有点钱可花，我去寂园看望祖父母。我想起了祖母的卧室，我熟悉那间与祖父的“精舍”仅一帘之隔的套间，还有炕头的红漆桌子。祖母喜欢在那桌子的抽屉和柜子内贮藏好吃的东西，她贮藏食物供自己享用，同时也放在那里任我偷食。祖母似乎有私存食品的癖好，她通常并不急于吃自己存起来的东西，只是等闲暇时想起那些贮存，偶然才拿出来独自享用。祖父平日很少过问祖母的私事，也绝不随便走进她的房间。家里只有我随便出入祖母的套间，一进去就拉抽屉开柜，到处乱找祖母贮存的食品。蹡到节假日弟妹们来园子玩耍，我专门带他们溜进祖母的套间，拉开那个红漆桌子的抽屉，常常把祖母的贮存一扫而光。祖母从不追究，好像她存下这些好吃的东西，为的就是放在那里等我们孩子翻出来吃个干净。

祖母七十多岁了，我吃了她那么多东西花了她那么多钱，她常喜欢在我跟前掐指头推算，看要到哪一年我才能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看到了那时候她有多大年纪，看她到底等得上享我这个孙子的福。没想到祖母期待的那一天如今已提前到来，我大学虽没毕业，好坏也有了个工作。祖母总算没有白疼爱我，她现在就可以享我的福了。我买了祖父母爱吃的两样食品——黄桂柿子饼和鼓楼口那家食品店特制的南糖，还准备了少量的钱，我要去园子孝敬她老人家。

寂园已发生了让我吃惊的变化。除了祖父母的房间和外面的过厅，所有的房屋都贴上了当地生产队的封条，很多比较好的家具也贴了封条，包括祖母的套间内那个贮存食品的红漆桌子。帮工彩霞已经辞退，两位老人的一日三餐又归祖母自己料理。祖父声音沙哑，言谈间再听不到爽朗的笑声。他似乎不好意思给我多讲他近来遭遇的变故，大多数时间都在沙发上闭目打坐，清臞的面孔上神情十分枯淡，好像在这间精舍内，唯一属于他的，就剩下这一具暂时寄存的形骸。

人与人的不同有时候是很难说的，祖父有众多的孙子，其中有一些立即和他这个带地主分子帽子的祖父划清了界线。现在他和祖母没有任何固定的收入，他们的生活费摊到了父亲、大堂兄和三伯的身上。祖父仍然抓住宪法上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逢来人即申辩说：“我们又没搞迷信活动，为啥不让念佛烧香呢？佛教既不封建，也不迷信，说佛教是封建迷信的人，其实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封建迷信。”生产队要祖父交出佛像，祖父没有交出，他向他们抗争说：“要我交佛像也行，把宪法改了；要我不信佛教也行，把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变了。”生产队的社员毕竟都是农户，都还对神灵有一丝敬畏，他们更关心分组父母的财产，搬走了几件家具后，就再没有动楼上佛堂供奉的大小佛像。

祖父明显地憔悴了，但他的精神还没有完全打垮，一天中大多数时间，他都在打坐念佛。香还在烧着，念珠还在手中数着，一个手掌大的小本子放在枕边，日记还在那上面照常写着。有时候他安祥地闭上眼睛，自言自语说：“他们说佛教要灭亡，我看这不对，佛教至今两千多年，历代的君主灭法，没有一个成功，现在和将来的灭法，也都不会成功，佛教会永远流传下去的。”

十一 就业队

1965 年，寒冬的一个星期日，坯子场上寂静而空洞。干部过周末，就业队和强劳队自然也跟上休假，除了正烧的砖窑还在冒烟，大墙之内，一切生产活动都暂停下来。我们东窑上，好动的早进了城，不好动的多在铺上蒙头大睡。脚汗、头油和长期没有拆洗的被褥散发出的气味混合在一起，一股子刺鼻的酸臭。我醒后在这脏乱的宿舍里实在待不下去，便出了厂门，向附近的麦地信步走去。冬天的原野上，无边晦暗的绿色错杂着一块块休耕地枯燥的褐色，四围一片萧索的景象。我踏着坑坑洼洼的土路，走下一处土丘，又走上另一处土丘。几个骑自行车的城里人身背猎枪，四处寻找可以瞄准的野兔。堆放在路边晾晒的玉米杆早已干透，有个老人在那里面仔细翻检没掰净的小玉米棒。我说不清我走在田野上要找什么，我只是闷得发慌，想走出来解一解闷。

城市离这儿并不遥远，登上土丘，都能模糊看见钟楼的轮廓。但在此刻，我的心离那儿很远很远。自从被赶出大学，再没有一个同学和我来往，连路遇的熟人大都摆出素不相识的面孔。我一看出人家想要避开我的样子，也就自觉地把头一偏，快步走过。到处都有监视的眼睛，我没有理由期待别人冒险与我接近。我父母，我妹妹，家里所有的人对我的现状都竭力保持沉默，不希望我被开除和进二厂的事传进更多人的耳朵。若是节假日在家里偶然踫到来客，我的在场甚至都会给他们的谈话带来尴尬和不便。比如，“在哪儿上学”或“做什么工作”之类最普通的问话，对于我，便成了很难开口回答的问题。我总不能对客人撒谎说我还在师大上学，可要照实回答，又非一句话所能说清。我拿不准该从哪儿说起，该用什么口气说出我最近遭遇的变化。我不得不主动避开此类场合，或在谈话中及时岔开涉及到我的话题。我现在竟把人活到了这一地步，成了家中多余的人物，弄得家人不得不在涉及到我的事情上对外有所隐瞒。既给家人造成难堪，也使自己心生羞愧。所以，有时踫到周末，我宁愿待在二厂，待在这个自己该待下去的地方，自罪自受。

我们的大组长让我想起了师大的那位班长，今日的体制下，凡有集体的地方，大概都少不了这类人物。他们长了谄上与傲下两副面孔，善于拿欺凌同类来抚慰自己所忍受的不悦。我们的大组长就是这号人物。他姓傅，大家都叫他老傅。老傅本是技术工人，曾因莫须有的反革命集团罪判了劳教，三年劳教下来，一个聪明能干的年轻人就过早地磨成了劳改油子。困难时期他回到西安家中，自由市场上挣了些“投机倒把”的钱，因此又栽了跟头，被送到二厂强劳。随后转到就业队，当了我们的大组长。

老傅确实具有无耻的模仿天才，他把劳改队里队长训斥犯人的话学得一板一眼，有声有色，只要遇到主持学习的机会，总要在我们面前重复他那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宣讲。现在队长不在场，他就是老大，好像主人不在家，仆人偷穿上主人的衣服照镜子，装模作样，摆起了不可一世的架子。现在他走上前来，开始他一本正经的训话，那声调表情，那气势谈吐，简直比队长还要队长。他讲得没完没了，直讲到大家都不想再听他多讲一句。讲完大道理，接下来他便抓住几个有问题的人点名批评。这时他马上变得声色俱厉，又申斥又叫嚷，引用些有关阶级斗争的毛主席语录，最后走到被他点名的人跟前，吆喝那个“靶子”站起来给大家交代问题，推搡那人，大声向其他在场的人问道：“要不要修理一下？”此刻其中必有几个应声虫附和说“要！修理他狗日的！”一个小型的批斗会就这样开了起来。凡让他点了名的都陆续被迫站出来面向大家，有的老实交待，有的坚持沉默，有的力图抗拒，其间不时插入质问或斥责的叫喊。有几个好斗分子，常趁机跳出来拳打脚踢，过一阵施暴他人的恶瘾。

我开始后悔了，悔不该盲目进入二厂。这里既无江湖英雄，也无监狱小说中那些惊险的情节，这里完全是蛇坑。父亲的话又一次在我耳边响起：“你一天除不了那个开除学籍的罪

名，你就别想在这个社会上有什么前途。”我得想办法要求平反，然后返回社会。听说有些学校学习“九评”运动搞得太过火，扩大了打击面，因此现在正在纠偏。还听说有个大学生被逼得跳大雁塔自杀了，惊动了省委。更听说团中央书记很开明，刚调到西北局抓陕西的工作……听了不少未经证实的传闻，听得我对省委和西北局抱起希望，连续向那里写信申诉，想侥幸得到来自高层的甄别或平反。然而，所有的信均石沉大海。想在目前迅速获得平反，看来是没有多少希望了。

但我仍不死心，我又从调离二厂的方面寻找出路，只要能跳出二厂这个蛇坑，不管让我去多边远的地方我都愿意。一年一度的招兵指标下来了，我和二厂的几个青年去征兵站报名，还特别交上了个人决心书，结果我们均被办事人员断然拒之门外。上班时我谈起了这件事，二毛就说我太糊涂，他对我说：“你把事情想得太美了，没看见那标语上写着‘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话吗？连清清白白的适龄青年都要经过严格审查，然后才择优录取呢，这样的好事咋轮得到就业人员头上。中国有的是人，就是上战场打仗当炮灰，咱们这号人都不合格。”

参不上军，我又降而求其次。听说街巷里动员社会青年参加林建师，到陕北的荒山野岭上搞长期植树造林的工作。我说我想去报名试试看，长海说，八抬大轿抬他他都不去，去了那里，就等于自动放弃了这大城市的户口。长海接着对我说：“待在二厂再不好也是西安市居民，这城市户口可是个宝，你要是丢了它，将来再想从外县往回转，可就比上天还难了。”但我的想法与长海不同，我现在只想离开二厂，只要能马上离开这个鬼地方，再艰苦的地方我都去。然而，就是这报名者寥寥无几的林建师，我积极报名参加，人家还是拒而不收。我甚至要求跟随首批走向农村的社会青年去外县落户，但街道办事处的人告诉我，我不属于他们动员的对象。我的前途还真的让户籍员说死了，偌大的西安市，除了这劳改窑，确实没任何单位要我。想离开二厂，似乎只有一条更坏的出路，那就是判处劳教或劳改，让囚车送入另一个高墙圈起的大门，去受更严酷的劳动改造。

我走出麦地，来到公路边，上了 15 路车，坐到终点站，继续我没有目的的走动。脚下是韦曲镇的街道，已从西安郊区进入长安县境内。主街两边停了好多卡车和马车，有几家商店和饭馆，我们东窑上有些懒得进城的就业工人，就常逛荡到此处消磨周末。我发觉今天这里的气氛明显与往常不同，只见到处贴出新刷的标语，街上的行人也多于往常，好像在举行什么重大的活动。我向那传来高音喇叭的地方走去，是韦曲中学的大操场，地上站满了参加大会的群众，远处的台子上正在宣布一批人的罪状。原来是全县规模的宣判大会，有以阶级报复罪宣布逮捕的地主，还有以破坏“社教”运动罪逮捕的县级领导干部，以及各类刑事犯罪分子。正在社教运动的风头上，据说这次运动中长安县被中央列为试点，所以从上边派来的工作组一进驻县委，便雷厉风行展开了打击。从台子上正在宣判的内容可以听出，运动的来势十分凶猛。黑压压一片人群中，喧嚣的口号声听得我心慌意乱，那声音与愤怒的旋涡在向外不断扩大，似乎随时都会把我卷进去吞没。我仓皇转身离去，快步踏上了南去的大路。

想把一切远远抛在身后的冲动驱使我急速前行，我越走越有劲，越满怀遗世独立的冲动，我想登上高处，远远离开这互相瞎斗的人群。

阴空低垂，寒野萧索，才走到半路上，就飘起了雪花。等我爬上少陵原的黄土高坡，走到崖畔的杜公祠下，站在那紧闭的大门前向下望去，雪已经下得天地混漭，分不清东南西北了。那密集的白绒毛无边地倾倒下来，滚滚寒流，泻自高天深处，一股子要把这世界的空洞塞满填实的气势。雪下得我心胸壮阔浩渺起来，我头上冒出热气，浑身起了热流，我顶天立地站在那里，任纷纷落雪把我浑身上下沾满，与雪中的树木、石头、房屋一起变白。我想象大雪如何把坯子场填平，把东西窑灌实，把二厂整个地埋掉，把天下所有派出所的居民户籍和每一个单位人事科的个人档案材料全部冻结起来，永远埋葬，让我们一觉醒来，每一个人的历史都是一张白纸，像茫茫雪野一样干净。

十二 抄家

1966 年夏，我从城里返回二厂，路过中共西北局。不久以前，我还对这个西北地区的最高权力机构抱有获得平反的希望，不料想形势的变化如此之快，如今连住在那里面的权势人物也快自身难保了。解放军还在门口站着岗，但讨伐的大字报已铺天盖地，贴满了门外的围墙和大字报栏。我还看见学生在到处演讲，他们满口都是要打倒某某人或砸烂某某机构的叫喊。语言的暴力近来空前高涨，我模糊地觉得，自反右以来一直受到压制的对抗力量似乎再次得到鼓动，各级党委再次成了群众炮轰的靶子。谁给了学生如此放肆批评领导的权利？他们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胆量？我在二厂的窑道内闷久了，整天听的是专政机构的语言，一时还吃不透外面突然发生的这些变化。但变化和动乱总是让我感到刺激的，只要风起浪涌，我就有弄潮的冲动。我挤在人堆中浏览大字报，得意地走来走去，处于围攻下的西北局显得焦头烂额，让大字报贴得顿失了昔日的森严。学生们有赤脚穿草鞋的，有一身军装的，个个都臂缠红袖章，我初次乍见他们这一身装束，还以为演员上了街，都像是直接从表演瑞金苏区革命故事的舞台上走下来的。

外面的运动搞得越凶，二厂里面管得越严。厂领导在大会上宣布，公检法一律不搞群众运动，就业人员除了认真学习有关文件以外，没有资格参与外面的任何活动。刘队长在窑道内就曾对我们班上的三个人说："按说，你们这伙人都在牛鬼蛇神之列，文化革命也要革你们的命哩。"我觉得刘队长的话说得太刺耳，但他自称是出于好意，他说外面现在的形势很混乱，我们这些人待在二厂内反比在外面安全，因此他劝我们就在这儿老老实实干活，最好少去城里乱跑。有个跟我同时进厂就业的小伙子批评厂领导压制群众，要求参加运动，他午饭时在食堂贴出他的大字报，下午就叫抓起来关了禁闭，几天后在全厂大会上宣布劳教三年，立即送到陕北的农场改造去了。那小伙子的受罚果然在厂内起到了震慑作用，就业工人中刚刚出现的蠢动很快平息下来，一时间再没人敢出来带头闹事。制砖机照常在坯子场轰隆运转，东西窑依旧冒起浓烟，晚上的时事政治学习比以前有所增多，老傅那仿队长腔调的讲话更加冗长，门禁也明显加强了。

传来了抄家的风声，我不放心家中的藏书，一到周末便回家察看。我这些书部分取自祖父的书架，部分由我自己花钱一本本购置。自从离开祖父母的住处，我把所有的书籍都从园子搬到父母家中。每本书上均盖有我私人的藏书印章，我还把所有的书分类编号，造册登记，形式一如图书馆。我就拥有这一点属于我自己的东西，虽说值钱不多，但在我眼中却无比珍贵。每月那三十元的工资扣过伙食费所剩无几，我有时还要省些钱买书增加收藏。

入秋，红卫兵破四旧的革命行动迅疾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展开，附近街巷里已有个别老住户叫当地中学的学生抄了家。据说事先都由派出所和居委会提供线索，按照他们的唆使，学生们突然闯入那些被列为打击对象的家庭。他们随意翻箱倒柜，挖地三尺，要找出枪枝、变天账、金银珠宝，以及一切被认为是四旧的东西。一次回家的路上，我亲眼看到了红卫兵破坏卧龙寺的现场。他们首先在寺门外贴上了一大张"勒令"，罗列了寺僧的罪状，还有一幅革命宣言式的对联贴在那红漆大门的两边

砸泥像拆庙宇破除迷信

老和尚小尼姑赶快还俗

我走进寺门，只见学生们到处乱砸乱涂，大雄宝殿上西方三圣的金身巨像已被砸得缺胳膊少腿，露出了泥胎内填塞的干草。一摞摞经书正被扔进院内点起的火堆焚烧，寺内的和尚全部被驱来罚跪一圈，好像在举行焚烧佛经的营火会。朗照法师也跟其它和尚跪在一起，这大胖子方丈此刻红着脸，浮肿的眼泡青蛙一样突出，直勾勾盯着那焚烧的书堆。红卫兵伸手去抢挂在他脖子上的念珠，他双手护住，死也不给，恼怒的革命小将们立即开打，几条皮带

劈头抽下来，顿时在他的光头上抽出了好多道血痕。至此我再看不下去，遂仓皇走出了遍布红卫兵的寺院。那念珠，我听方丈说过，是他随佛教代表团访问缅甸时所得，一百零八颗琥珀，弹球般大小，个个饱含温润的光泽，方丈一直视为珍宝，平时外出，总要挂在胸前。后来听说，方丈挨打甚重，又被他们夺去心爱的念珠，气愤不过，当晚就上吊自杀了。

对于抄家的事，我父母倒没有太大的担忧，他们基本上抱着静等红卫兵到来的态度。这倒不是说他们无所畏惧，而是因我们家几乎没什么可抄，没有存款，没有金银，母亲从无一件首饰，父亲喝了十几年酒，喝得他和母亲至今都戴不起手表。这样的家底就是抄个底朝天，也不至于损失惨重。他们只怕红卫兵在我的书架上找出了属于“毒草”的书籍，怕抓到此类反动的证据会加重父亲的罪状。父亲在本单位已有声讨的大字报零星贴出，那些造反派来势凶猛，一开始就把父亲这个副总工程师打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经了我的事，我父母已变得非常胆小怕事，看问题也心眼太死，他们还以为来抄家的人手里有明文规定的禁毁书目，以为那伙人都图书管理员一样熟知该抄什么与不该抄什么，以为抄出了“毒草”就果真有了天大的罪恶，以为只要自己清除了那些可能在查抄之列的“坏书”，就真的能保住其它无辜的“好书”。在父母多次催逼下，我只得未雨绸缪，抄家的人尚未进门，我自己倒提前认真地清理起自己的书籍来了。我挑出了自从批判“三家村”以来受到批判的书籍，还清洗出一系列报刊上点名批判的作者，经过了反复斟酌筛选，最后把挑出的“毒草”捆成两大捆提出去卖了废纸，用所得的钱买了几斤时鲜红枣拿回家，和弟妹们分着吃了。吃枣的时候，我有些难受，因想到剩下的那些书没准能蒙混过关，心里才有了少许宽慰。街巷红卫兵并没来我家破除四旧，但全家人不敢有少许懈怠，一直处于高度警惕之中。

我二妹就读的中学位于西北局附近，校内高干子弟特别多，该校的红卫兵在全市也闹得最凶。祖父是地主分子，父亲正被揪斗，我又在大专院校区以烧毁反动日记数十册出了名，这一切都给二妹带来了灾难。她不但当不上红卫兵，还在校内挨打受气，被打入狗崽子之列。不知是受了本校红卫兵的驱使，还是想表现她自己也很革命，我二妹在学校没资格参加运动，却跑回家破起了“四旧”。她俨然成了我们家内的红卫兵，似乎自己的气没处出了，就拿烧我的旧书泄愤。她现在对我的态度也变得凶了起来，说起话比平时尖刻了许多，先是伙同堂兄去寂园烧了祖父的很多佛经，接着又赶回来烧了我好几套线装书，包括一套用特制木函盛装的《章氏丛书》。事过后，我回家看到那个装书用的盒子完全空了，这才从弟弟口中得知，二妹趁我不在家，对我的书籍采取了革命行动。这事要放在平日，我不知会和她闹到什么地步，可现在是大势所趋，我只有痛在心里，窝上一肚子闷气。接着，父亲单位的红卫兵勒令他上缴家里的旧书，他自己无书可缴，便从我的藏书中拿走一些，交到公司去应付塞责。父亲上缴我几本书好交差过关，我纵心里不悦，又能多说些什么？

就这样经过三次清洗，我的线装书已所剩无几。回家后发现藏书不断受损，一时又拿不出妥善保存的主意，只有对着尚且整齐排列在书架上的书籍干着急。我想把这些书全转移出去，但能转移到谁家？谁家绝对安全？在这到处造反的年月，又有谁家敢于接受？转移途中会不会出岔子，也很难说。红色风暴闹得人人自危，在现有的亲友中，我几乎找不出一处绝对安全的人家。我甚至觉得，如何把这些书安全运出我们院子的大门，首先就是一个问题。比如说，在院子内部或大门外面，说不定就有人专门监视我们这等黑五类家庭的一举一动。世界好像在走向末日，天崩地裂了，四处都露出了危险的豁口。想来想去，想不出更好的出路，最后我只好在我家的范围内搞一些安慰我自己的鸵鸟式窝藏。比如把《昭明文选》藏入米瓮，把一册精装的金批本《西厢记》塞进衣柜内卷起来的被子中，把很多我最喜爱的和版本比较珍贵的书籍都从书架上疏散开来，按我自己可怜的想象掩藏到隐蔽的角落。经过这一番处理，总算给自己稍微安了心，于是撇下三次清洗后剩余的书籍，我抱着侥幸的想法去二厂上班。

等再次回家，父亲单位的红卫兵已抄过了我家。小屋内一片狼藉，撕掉的封面和遭践踏、

被揉损的书籍乱丢在地上，我的大书架已空了一大半。《鲁迅全集》还完整地摆在原处，闻一多所有研究古典文学的著作竟然一本不缺，抄家的看来还比较懂行，总算知道鲁迅是文化旗手，也知道闻一多是毛泽东赞扬过的烈士。但我经常翻阅的《唐宋名家词选》不见踪影，范文澜校注的《文心雕龙》抄走了上册，幸存的下册丢在地上，书撕破了，封面上踏了一个脏鞋印。我站在半空的书架前发愣，在呆想中复现空缺处原先摆放的书籍。

弟弟告诉我，他们开来了大卡车，还带来铁锹，似乎一心要找出暗藏电台的夹壁或埋有金银的地窖。他们煞有介事，在屋内的地面和墙壁上敲来敲去，但最终没敲出任何可疑的处所。弟弟说，我自作聪明掩盖起来的那些旧书，首先让他们从各个角落一本本翻了出来。接着他们翻了母亲的两个大木箱，箱子内没搜出金银或存折，仅有十元未兑现的公债券被他们拿走。另有两张民国时期的旧报纸铺在箱底，他们说那是反动报纸，当场宣布没收。父亲的旧唱片也在“四旧”之列，特别是周旋的歌曲，马连良的京剧，他们都当场摔碎，另有些搬上汽车，抄得一张唱片都没有剩下。因实在抄不出什么更值钱的东西，他们便搬走几件象样的旧家具充数。其中有一套破旧的皮沙发，还有母亲娘家给她陪嫁的梳妆台，再加上一大堆从我房内抄出的书籍，总共堆积在一起，才填充了那辆载重汽车大车箱的一半。

初冬一个阴沉的雨天，生产队和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洗劫了寂园。生产队宣布没收园内所有的房屋，他们用架子车拉了些留给祖父母的破旧用具，一伙人簇拥着两个老人，当下把他俩扫地出门。祖父母众多的孙子中，或自顾不暇而无法脱身，或因恐惧避而不管，只有堂兄和弟弟负责照顾两个赶门在外的老人。弟弟小学还未毕业，是家里的闲人，他既无组织管束，也不必担忧什么影响，所以由他每天从城里跑到东关去看望祖父母，协助堂兄做些提水、买菜之类的杂活。

生产队把祖父母安置在他们从另一户地主家没收的房子内，周末的一个阴天，弟弟带我走进了那间拥挤的厦屋。那厦屋中间隔一道木格子，一边作厨房，一边住人，住人的这一半深仅两米多，长不过五米。北边是原先的小土炕，南边放置祖父的单人床，祖父额头上贴一块医用纱布，脸色蜡黄，躺在床上发出无力的呻唤。听祖母诉说，红卫兵拉祖父出去游了街，他们嫌他行动缓慢，途中不断在他背后推搡，把他推倒在地，撞伤了额头。亏得祖父身板硬朗，跌了跤竟没伤到筋骨。那床与土炕间仅可容一桌两凳，我和弟弟走进去几乎转不过身来。厦屋系老式的木格子窗户，破裂的糊窗纸在寒风中吹得呼啦啦响着，只有一个烧煤球的炉子放在厨房内。我把手放在炉口上，试试那一丝冒出的热气，就那点微弱的火力，实在起不到多大的取暖作用。现在他们什么都没有了，连祖父手边那一盒算卦消遣的牙牌，在抄家之前，祖母都吓得丢到了井里。

寂园已由生产队全部占领，书都烧了，佛堂也砸了，大小佛像扫掠一空，包括印光和太虚法师的舍利塔，全都随其它杂物一起被他们抄走，保存在楼上的佛经刻板也全搬到楼下一把火烧成了灰。这一次可是彻底的灭法，祖父经营了几十年的经像收藏和其它与佛教有关的东西，不是被没收，就是当场破坏。

他们拆毁了曾祖母的墓塔，连塔上的碑碣和石刻都用榔头砸成了碎块，做了生产队翻砂厂的原料。据说土改时，园子附近的住户就谣传过曾祖母的墓内埋有金银财宝，更有人散布说，我曾祖母下葬时活埋了一个丫头陪葬。那时候祖父受到保护，贫下中农挖墓分财宝的愿望并没有得逞。现在他们终于得到了一看究竟的机会。在这个大多数人都住得窄小而简陋的国度里，你拥有了养尊处优的住处，这情况本身就使你成为众矢之的，不把你拉倒摆平，就填不了人心的不平。嫉妒和仇视长期积压在那里，只要社会一失控，抢劫财物和掘人祖坟之类的暴行便会立即发生。生产队的社员毁了墓塔尚不足以了结心愿，他们一气挖到底，直挖至墓室，挖出了曾祖母的棺材。但结果一如翻出我母亲的箱底，同样没找到任何值钱的东西。所谓的金银财宝以及那耸人听闻的陪葬，仅四个茶碗和一盏油灯，都是些粗陶器。曾祖母的棺木尚完好无损，他们随即移到生产队的公墓埋了，剩下那墓圹空空洞洞，最后只能一平了

事。

十三 我要翻案

1966 年冬，我从街上张贴的大字报看到，工厂的合同工要求给他们转正，被动员到农场的社会青年要求返回城市，几年前因单位下马而失去工作的人要求复职，造反的洪流一时间冲开了这个社会严密控制的闸门，不同的群体或个人都顺势提出了涉及到各自利益的诉求。他们全打起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红旗，把自己对现状的不满与造反有理的行动挂上了钩，而把各自所受的不公正待遇都笼统地归罪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社会上积压了太多的不平和怨气，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现在成了使用方便的公共杠杆，当权派一旦被拉出来当成靶子，谁都敢向他们开火。

又是一窑砖刚点起火，炉温尚低，用煤量小，休息和聊天的时间自然较多。长海从城里回来，又带回了外面的最新消息。他说到处都贴出了"砸烂公检法"的标语和大字报，言谈间显得十分兴奋，按照他自己的乐观估计，等造反派砸烂了公检法，我们窝在这鬼地方的日子也许就熬到头了。二毛是个蔫性子人，他平日不爱随便发表意见，心里却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往常见我为脱离二厂而四处寻找出路，他总是劝我乱动不如静守。他说他就不信这就业厂的局面会长期维持下去，这里毕竟是劳改队的底子，有一天上边要从市公安局手中收回去再关犯人，我们这些人就是想留下不走，公安局也要强迫走人的。但在这一天到来之前，二毛认为，任何个人的闹腾都无济于事，闹不好只会把自己的情况闹得更糟。他说他要静等到这就业厂解散的一天，他相信会等到那一天，但目前得静守在这里，权当它是个藏身之地。他一再告诫我说："乱动是绝对没好处的，你不信你看么。"所以见长海一副闻风而动的样子，二毛就泼冷水说："别高兴得太早嘛，只要这里还归公安局管，外面就是闹翻了天，造反的壮举都轮不到咱们'老就'（就业人员对自己的戏称）的头上。我看还是安安宁宁烧咱们的窑，得空能到街上捞几个零花钱，那才是你的正事。"二毛的话哪儿能挡住长海的贫嘴，他边说边比划，说得唾沫星子乱溅，还说干部院最近不让工人随便入内了，大院内贴满了炮打厂领导和局党委的大字报。二毛说："那又能怎么样？都是干部们贴的呀，就是真的要砸烂公检法，也是公检法内部的事，是他们造他们党委的反，反正没咱们'老就'的份儿。"但长海还是显得很激奋，他说我们就业工人中已有人做好了成立组织的准备，目标就是要求厂领导改变我们就业人员的身份和待遇。

我知道和就业工人在一起闹不出什么名堂，所以打一开始就没想到参与成立组织的活动。我心里很清楚，凡是派出所逼到二厂就业的人多少都有些问题，有把柄攥在人家手里，蹦跶得再欢也成不了气候。就拿我自己来说，只有撤消了开除学籍的处分，恢复原来的学生身份，才有可能离开二厂。所以我只在争取平反方面动脑筋，并不打算把自己的前途同其他就业人员的命运连在一起。倒是四处出现的翻案风对我有些启发，我也想蹚蹚运气。听说不少受迫害的人都去北京上访，国务院专设有接待站处理上访者反映的问题。反正搞翻案又不犯法，即使翻不过来，能去趟北京见个世面，也不枉文革一场。

正当十二月底，天寒地冻，坯子场上好几天已不见强劳队出工。听说干部中也出现了两派斗争，他们正斗上劲，都顾不上管我们就业队了。我和茆致谊在窑顶上拣个避风处生起一堆火，围住火商量去北京上访的计划。茆致谊戴深度近视眼镜，穿中式便服，围巾的一端整齐搭在胸前，一副标准的银幕五四青年形象。他比我大好几岁，他大学毕业那年，我还在读高中。听他讲，那一年正当困难时期，只因偶然听到深圳那边敞开放人去香港的消息，正在等待分配的他忽动了出走的念头，当下便盲目乘火车直奔广州，贸然在旅馆里打听偷渡香港的渠道。不幸走漏了风声，公安局直接在旅馆将他抓获，押回北京，便以偷越国境罪判了他

两年劳教。解教后他回到西安父母家中，也是让当地的户藉员连逼带诱，糊里糊涂进二厂当了就业工人。我早就听说他进厂后大闹公安局，多次要求离厂的事迹，很佩服他的胆识和他那一套合法斗争的方式。我们刚刚订交，是突然听说他要去北京跑一趟，我才决定跟他一同去告状的。就这样，我们白天商量好行动计划，夜里即从围墙的一处缺口摸黑出去，一路上抄小道步行到车站，连夜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正是全国各地红卫兵和造反派大量涌向北京的时候，在西安车站的月台上，我和茆致谊连扒带爬钻车窗挤进了车厢。硬座车厢内满载串联的学生，过道和行李架上，甚至厕所里，全都有人占据，列车服务员无法来回走动，一路上根本无人执行服务和剪票的工作。没有暖气，没有供水，空气污浊得让人头昏。但乘客的情绪都很高昂，不断有人领唱革命歌曲，再穿插上齐声朗诵毛主席语录，那热烈的气氛就像干柴上点起一把火，一下子激发了大家的革命热情。我平日并不喜欢群情激奋的场面，连国庆节游行从主席台前走过，如潮的欢呼声中我都难得激动起来。但现在的气氛迥异往常，不由我不受感染，几首革命歌曲合唱下来，唱得我浑身有了热血沸腾的感觉。我放开喉咙叫喊，满怀豪情地过起了革命造反的干瘾，一时间竟忘了自己姓啥为老几。

母亲从一开始就反对我参与外面的任何活动，她认为，在当前这种混乱局面下，像我这样不安分的人物，还是老实待在二厂烧我的窑最为安全。母亲劝我说，我是受过处分的人，自己本来就有问题，别人在运动中闹得再凶，将来秋后算帐，也许啥事都没有，但轮到我身上，闹不好，人家会新旧账一齐算的。听说我要去北京上访，母亲死活都不放我前去，但我对她的劝阻听不进去，她最后无奈地警告我说，我要是不听她劝阻，还像以往那样不约束自己的言行，早晚都会栽更大的跟头。母亲的此类警告，我听过的不计其数，她说的越多，反而越激起我的抗拒。现在成千上万的学生坐火车不花钱，全国各地大串联，处处都有食宿接待，连两个妹妹和小弟弟都加入了串联大军，徒步长征去了延安，我实在不甘心守在窑道内再这样埋头苦干下去了。

也就是在这时候，我翻译了莱蒙托夫的长诗《童僧》。长诗说的是一个自幼被俘的高加索男孩从修道院逃跑的故事，他临死前发出的热烈独白，他拼死追求自由的勇气，还有高加索壮美的风光，所有那一切全译得我如痴如醉。尤其是他那“吃点儿蜜尝尝味道，就甘心死去”的精神，经了诗意的渲染，使我深深地受到震动。《童僧》的每一行诗句都激起了我孤注一掷的冲动，待在黑暗的窑道内干活，我常沉浸在出逃的狂想中。现在好不容易上了东去的列车，置身如此激动人心的空间，几个月以来的向往总算成了实际行动。上访也许只是我的一个借口，而争取平反，顶多也只能说是我此行的一半动机。我想远远地逃离二厂，哪怕只是暂时的逃离，哪怕这逃离会有不堪设想的后果，哪怕等着我的是那个童僧一样的下场，哪怕二厂追来的干部很快就会把我抓回去，我也要逃跑，跑出去看一眼外面的世界。造反的形势就像关在窗外的遍地阳光，二厂这黑屋子我实在是再也待不下去了。

列车在半夜到达北京，下了车步行穿过黎明前的长安街，我们直奔国务院安排上访工人的登记机构。接待人员显然不懂什么叫“就业人员”，见我们出入证上的单位名称印着“建安建筑材料厂”，就把我们分配到建材部接待站住宿。

那是个腾空了的大会议室，芦席铺成的地铺，每人发一条毛毯，暖气热得人皮肤发痒头发昏。我坐在地铺上认真写我要求平反的申诉材料，为了写好这材料，我专门带来了四卷毛选。我仔细从中征引合适的语录，为我的要求罗列根据。我把自己说成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受害者，我天真地以为，只要我的材料写得有说服力，毛主席语录引用得当，说不定就会获得平反。

外面的大字报完全改变了首都的市容，几乎所有临街的墙壁和方便张贴的建筑物都为白纸黑字层层覆盖。大字报上什么内容都有，我一座楼或一条街地读下去，在露天下浏览另一种形式的报刊。我特别注意个人的申诉材料，琢磨着其中那些要求平反的措词，拿他们的遭

遇与我的相比，同时暗自估计我能否获得平反。我甚至揣摩其中的行文格式和语气，尽力把握更有效果的表达方式，一心要写出富有说服力的文字。就这样，我认真参考着大字报上的申诉材料，同时研读着四卷毛选，在那闷热的暖气房间内，起草论文似地写成了我的申诉。

但该如何有效地投递这份申诉，我心里还没有底。茆致谊在北京上过学，他很熟悉北京的情况，完成了申诉，他带上我去中南海和钓鱼台的大门口等待投诉的机会。在北京城元月的刺骨寒风中，我们跺着冻麻的脚瞎蹝白等，只盼望周总理或中央文革的哪个成员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直到一个个热乎乎的期望在心里相继变冷，直到白昼过去，街灯昏暗地亮起。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在街头终日聒噪，贴满标语的电车怪兽般疾驰而去，我呆看着破损的大字报在寒风的劲吹下纷乱飘落，像废弃的抹布或擦过屁股的手纸一样肮脏地遍地乱滚，一团团滚到看不见的远处。

1967 年元月 5 日，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在首都体育场接见全国工人造反派。我终于等到了大好机会。我挤入紧挨主席台的看台，挤到隔开两个看台的栏干下，占好了投掷的位置。在全场欢呼雷动，千万个语录本挥起一片红海洋的时刻，我把我的申诉材料束成一卷，对准主席台上的席位扔了过去，扔到了一个中央文革成员的怀里。那人着军大衣，军帽下的脸看不出任何个人特征，也不知他是王力还是戚本禹抑或关锋，反正我清清楚楚看见，他拿起我的材料看了一眼，然后塞入了他的大衣口袋。

一块石头落到底，我心安了。然后我们得完成我们的善后工作，这可是关乎我们俩回厂后人身安全的大事。我们必须取得一纸保证我们不受打击的证明，为此，我跟茆致谊专门去国务院接待站反映了二厂的情况。那接待站专门接待全国各地在运动中受压制遭打击的群众，特备有一纸公函，上面印了几句晓喻各单位领导支持群众革命行动的官方套语，以示国家最高行政机构的革命姿态及其对上访者的支持。正当运动搞得热火朝天的日子，接待处的工作人员对上访者基本上持有求必应的态度，听了我们的反映，那人拿出那公函填上我俩的姓名和建材厂，并签署处理意见，最后盖上红彤彤大印一个。我们如获圣谕，收起那保障我们人身安全的一纸证明，由茆致谊负责装入他贴身的口袋。现在解除了后顾之忧，走出接待站，我们立即跨上电车，去北海、颐和园疯玩去了。

我们痛快地游览了动乱中的北京城，十几天之后，大胆返回了二厂。面对我们呈上的国务院公函，厂领导不能不信，又不甘心全信。他们踌躇不决，在如何处理我们俩离厂出走的问题上，不得不作出比以往要慎重得多的考虑。谁也吃不透反复变化的形势，干部们也学乖变精了，没把握处理的问题，只好先摆在一边。厂方仅暂停我们俩出门数周，此外再没有什么惩罚。

我们幸亏离开了两周。二毛告诉我，在我们离厂期间，一部分就业工人大举游行闹事，参与了全市造反群众在市公安局门口的静坐示威。结果就业工人受到严厉的打击，抓了好几个带头的，长海就是其中的一个，现在人还关在市局看守所内。据说定性很严重，给他们都加上了现行反革命的罪名。窑道内听不到长海的大嗓门了，替换他和我们一起干活的是个回民。他姓马，外号疙瘩子，我叫他马疙瘩。我开始照常上班，一窑砖连一窑砖往下烧着，偶然想起上访的事情，茫茫前途上闪一下平反有望的亮点，随即又陷入渺冥。

我以为投准了目标的那份材料实际上是石沉大海了。理性的判断告诉我，不可能有任何反应，人家中央文革日理万机，哪有工夫管我这渺小人物的屁事！但我仍不死心，我又寄希望于师大校内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我去了师大，这是我受到开除处分后第一次向那儿走去。接近校门时，我不由得心跳脸发烧，在一阵犹豫之后，才鼓起勇气进了校门。刚刚开始的苦难尚未磨损我那多情善感的学生情怀，目睹校园内的景物，竟触动了我小小的伤感。

毕竟是全国造反的年月，有不少同学对我还算热情，听说我也要写大字报，他们立刻给我拿来笔墨白纸。我写了几大张，亲手贴了出去，仍旧是北京那份申诉材料的基调，我把自己说成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受害者，把平反的要求和目前的造反形势牵强地拉扯到一起。贴

出了那几张大字报，我站在跟前再读了一遍，对自己争辩的道理，我忽然产生了怀疑，心里觉得很不踏实。我写了什么？是在揭发当权派还是在检讨自己，抑或二者的含混拼凑？我口是心非，强词夺理，企图用控诉的口气乞讨宽恕，竟敢冒着迫害的狂澜打捞自救的稻草，不知警惕自身的沉没，反而准备扒上造反的贼船。连自己都说服不了的申辩还能说服谁呢！难道我为的就是抓住一次贴大字报的机会，在这人人都拿起笔做刀枪的年月，也加入进来，留一笔将自己抹得更黑的墨痕？

凑这样的热闹岂不自讨羞辱吗？我转过身，沿路往下浏览大字报栏，读到了造反派声讨校长、系总支彭书记和我们辅导员的大字报。我愣住了，他们的罪状居然包括这一条内容：纵容和包庇了反动学生康正果。情况原来如此，我按我的翻案逻辑指控当权派迫害了我，可造反派还嫌他们把我害得不够，反咬他们纵容了我的嚣张气焰。原来，我这个人本身就构成了当权派的罪状。看他们大字报上那声讨的口气，在打倒校长、书记和辅导员的同时，似乎还打算把我揪回来给他们陪斗。

“痛打落水狗”的呼声隐隐在我耳边响起，我仿佛看见学生们举起手向我走过来，齐声喊打，要把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我永世不得翻身。好比一记响亮的耳光打破了我的幻想，也敲醒了我那一直迷信文字说服力的榆木脑袋。就目前的形势来看，我不但算不上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受害者，还属于应该一并打倒的余孽。平什么反呀，简直是在做梦！不嫌寒碜自己吗？不怕叫人抓住小辫子吗？我四顾张望，觉得今天所做的一切近乎自讨没趣。迈起几乎是逃窜的脚步，我灰溜溜离开了师大。

十四 鬼迷心窍

马疙瘩脸上和脖子上生有稠密的粉刺，包括他肥胖的肩背上，光膀子干活时，看上去都是疙里疙瘩的。烧窑时闲下来，他常掏出小镜子，边照边挤脸上的痤疮，挤得他那张脸青红驳杂，看上去总像是没洗干净的样子。

我和他的交情缘于抽烟。我每月三十块钱，抽不起好烟，但我烟瘾不大，两三天一包的普通烟基本上还能保持自给。马疙瘩则不然，他有了钱尽拣好烟买，一没钱就只得干吊起来。这时候他就向别人乱要烟抽，有人给他烟抽，有人并不给，有人勉强给了，嘴里总嘟嘟囔囔。只有我对他的索要从不拒绝，且给得爽快。我喜欢他那种满不在乎的样子：脸虽厚，人还算实在，有点赖皮，但并不显得低三下四。对马疙瘩的好感，最初起于听他唱歌。他并没受过演唱训练，大概是爱在他家的旧唱机上听印度电影《流浪者》上那几首著名插曲的唱片，听得久了，跟着哼出了感觉，因而唱起《拉兹之歌》，颇能传达原歌的韵味。他那浑厚的男低音发自有点沙哑的喉咙，那神气，那姿态，差不多一个粗砺得走了形的活拉兹。不是他抽了我的烟就唱，就是我听了他唱歌连忙给他烟抽，就这样，我们常在一起抽烟和唱歌，成了窑道内比较要好的朋友。

马疙瘩识字不多，也看不起读书，见我在一边读书，他老是走过来把我捧起的书本一拨，揶揄我说：“别耽误事了。”他说的“事”和我做的“事”根本不同，他要出去找外快，有了钱好吃喝玩乐。我只知道读书，也只有这一点兴趣还有条件满足。抄家之后，我残存的书籍中有几本俄文版的文学作品，主要是莱蒙托夫和屠格涅夫的，我抱一部完备的俄汉大字典，硬啃起满是生词的原著，边读边练习翻译。翻译对于我是另一种写作方式，我通过中译本读了那么多外国名著，深知翻译家带给普通读者的好处。所以我不只敬佩翻译的工作，也很想自己动手翻译。可以说我学习俄语最大的动机就是希望有那么一天，能把我喜欢的俄文书译成中文书出版。我大妹的俄语老师原在部队上当翻译，他历史清白出身好，没人敢抄他的家，他的几架子俄文书一直完好无损，我读完了自己的俄文书就去他那里大量借阅。

进入 1967 年夏天，各地的武斗相继高涨，很多单位都处于瘫痪状态。热中造反的都拼命去干革命了，退出组织的或在一边观望的群众一时间成了闲人。他们偷运动之闲，领了公家的工资回家度假，火红的年代里过起褪色的生活，这些人当时被称为“逍遥派”。而我，不折不扣，就属于其中的一员。自打那次从师大校园扫兴而归，我就不再在平反的事情上白费心思，也不再为自己被排斥于运动之外而心怀不平。我想通了，也看开了，这就又回到我原来的轨道上，利用一切空闲的时间读书和练习翻译。二厂处于半停产状态，公检法内部的人早砸烂了他们的党委，他们忙着搞革命，强劳人员暂时关在号舍内，不出工也不审问；而就业人员，差不多都放了羊。我们上班往往只去那里照个面，集中起来读读报纸，然后各走各的人。为了能休长假，我更去医院里纠缠医生，混上病假条泡我的病号，有时竟一周半月地待在家里。

俗话说，人一天常有三昏六迷九糊涂的时候。蹓到这样的时刻，鬼就迷了你的心窍。鬼是什么？鬼不在阴间，也不在黑夜中，鬼就在我们自己身上。它是我们遗传基因中紊乱的信号，是干扰生理—心理稳定机制的一个出岔子因素，是某种执着的意念在压抑下积聚起来的捣乱力量。我们平日犯傻或闯祸，表面上看虽出于偶然，深思起来，都有难以洞察其幽渺的根源。确实有一个生理—心理的鬼盘踞在我们的意识深处，到了一定的时候，某一顽念在你心里占了上风，那个致命的鬼就冒出来惹祸了。

在俄语老师那里借的书已不能满足我的需要，他的收藏太老旧，凡我想读的新作品，特别是苏联“解冻”以来一些新作家的作品，他那里都找不出来，他自己也不太熟悉。比如叶甫图什科的诗歌，索尔仁尼琴的小说，特别是帕斯捷尔纳克，他的《日瓦戈医生》早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该书的内容和帕氏生平创作的详情，我全都一无所知，也无从得知。我特别渴望得到此类俄文新书，正像我不久前渴望奔向远方一样，现在我又满怀翻译的冲动，到处找起了“解冻”文学的俄文原著。政治压抑，青春躁动，求知热情，书写冲动，所有这一切不安的因素混在一起，萦惑我心头，搅扰得我时常胡思乱想。我甚至暗中盘算，看能通过什么渠道直接从苏联取得此类书籍。莱蒙托夫有诗曰 :“没有风暴，算什么海洋？/没有痛苦，算什么诗人的生活？”而另一首咏孤帆的诗更拟人地描述那孤帆说:“而它，却狂乱地祈求着风暴/仿佛在风暴中才有安祥。”一边翻译着这些诗句，我同时也受到诗中情绪的感染，有意无意间，我在文字中给自己堆积起了灾难。

在二厂当就业工人，我得天天按时上班，白天干重活，晚上还免不了参加无聊的政治学习。若轮我上夜班，白天睡不好觉，一天到晚都是昏沉沉的感觉。我时常恐惧地设想，如果长此以往，有一天我也会变得像那些老就业工人一样木呆，慢慢被改造成干活的工具，最终对文字失去兴趣。因此我总是努力打起精神维持阅读的习惯，每天下了工，那怕只有随便翻上几页的精力，我也要坚持读下去，唯恐放任自流，荒废了时日。如今正好让运动打乱了二厂紧张的改造秩序，我休病假有了闲空，在这全中国人民都不敢读不敢写的年代，我却重拾起抄家后残存的书本，忽然有了重理旧业的兴致。我甚至想利用这一段时间翻译一本书。不是我忘了父母和其他长辈的告诫，不是我不知道再次沾染文字很危险，而是我实在没有任何更有意思的事情可做，只有回到文字中，我才心安理得，才能保持我精神的昂扬。

返回，尽可能钻空子返回我自己感兴趣的活动，这一直都是我生活的动力，正是受到这一动力的牵引，我才没有在劳改队消沉下去。每一天窑道内出力流汗，之所以还有耐心磨过八小时，为的就是磨到了下班，好抽空继续弄我的文字。马疙瘩嫌我读书耽误事，我偏要把它当回事，我就是要朝相反的方向运动。也许正是这股子劲头串通了我身上的出岔子因素，一再地把我推向了“反动”。

1967 年 5 月的一天，我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一篇批评苏联当局的评论员文章，文章对苏修当局出版《日瓦戈医生》一书的事件给予了严厉的批评。该文称帕斯捷尔纳克为叛徒作家，称《日瓦戈医生》为反革命小说，并以这一出版事件为例，严厉指责勃列日涅夫修正

主义集团在意识形态上的彻底堕落。这本是一则阅后即可扔开的消息，偏不偏就是读了这则消息，我那不安的渴望从中发现了明确的目标。文中的批判言辞首先煽动了我的好奇，在那个大批判的年代，批判总是起到教唆的作用，越是被指责为反革命的东西，越是引起人想要了解的欲望。读完报纸，一个着魔的念头立即在我心里发出声音说：我要读这本书，我想译这本书，我得想办法搞到这本书。

多少年后提起了此事，对我这样的心血来潮之举，几乎所有的亲友都无法理解。他们不是嘲笑我无知、傻气，就是惊讶我那自投罗网的大胆。那一天读完《人民日报》的文章，我立即提起笔用俄语给莫斯科大学图书馆写信。我在信中说，我是个热爱苏联文学的读者，得知《日瓦戈医生》一书已在苏联出版，很想借阅这本新书，希望他们能按我随信所附的姓名和地址将此书邮寄给我。我记得很清楚，在邮局寄信时，我还迟疑地走到工作人员跟前，问他发往苏联的航空信该买多钱的邮票。贴了邮票，我慎重地将信投入信箱，然后满怀着不久就会收到那本小说的希望回了家。

从此我有了新的等待目标，无聊的日子暂时出现了令人向往的前景。光阴流水过去，我的等待好比空垂水中的钓钩。起先见邮递员来送信，我还心怀期望，等时间长了，什么也没发生，写信借书的事遂渐渐淡出，我那不安的渴望也转移方向，有了新的目标。

十五 马疙瘩

马疙瘩手头明显宽裕起来了，他开始给我烟抽，还置了一身下班后穿出去很像样的衣服，而且袖子一抹，亮出了手表。他似乎很忌讳有些多事的人拉住他手要看他戴的啥表，他警惕他们，但却很放心我。单独和我待在一起，他会主动叫我看他手腕上那发亮的东西，并给我介绍那些经常变换的牌子，说这种名叫“菊花”，那种名叫“英纳格”或“欧密加”……全都是些崭新的瑞士造。可惜我没玩过表，也不希罕那玩意，叫我看等于白看。我当时只知道，很多人有了工作，攒钱买块表，乃属优先考虑的要事。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表确实属于贵重物品，连我父母都戴不起，何况我这个每月仅挣三十块钱的就业工人。

都知道马疙瘩因诈骗罪而强劳，他则自称他是倒表的，他手上那些表就是他还没倒出去的存货。他多次说要带我出去玩玩，但这“出去”的提议一直停留在我们彼此的口头上。一来我还不放心跟他这样的人去公共场所，二来他也未必百分之百地信任我。直到 1967 年夏，厂内的纪律松弛到极点，我也在平反的希望幻灭后彻底逍遥起来，有一天下了班，我们一起乘公共汽车进城，他带我到东大街的老孙家吃了一次羊肉泡馍。

喝着酽茶，慢慢地掰着坨坨馍，我跟马疙瘩复习着刚学来的回民用语或市井黑话，我们的交谈扯到了他倒表的活动。原来他那些瑞士表仅配了崭新的表盘和表壳，里面装的都是三分不值二厘买来的旧表。吃完饭我们走向鼓楼，马疙瘩进了一家钟表修理铺，从他的老搭档处取出一块新装配的手表，往手上一戴，然后告别我跨上电车，说是他要上车站倒表去了。怎么一个倒法？据他所述，往往是在旅客中看准对象，走上前探测着搭话，若能攀谈下去，他就会诉苦说丢了钱包，身上已一文不名，或家里有事急需用钱云云。说着便卸下手上的“新表”，表示愿意便宜卖掉，以解燃眉之急。不一定每一次都有人愿买，但总会蹓到几个爱占偏宜，且对瑞士表的价值略知一二的旅客。这些人一见眼前的事有利可图，几句话给说动了心，便掏出现金将赝品买去。结果当然可想而知，离去的火车很快就把上当者带向不知道什么地方，而他们的后悔莫及也随同他们本人一起没入了茫茫人海。对此，马疙瘩总结得很精辟：车站上啥人都有，你一次诳他一个，一辈子都诳不完的。

1967 年夏季以后，热衷武斗与夺权的人都忙他们的革命去了，文革中的社会生活因此腾出了不少空白，就在革命抛荒的社会角落，休闲的情趣有了复苏。热衷搞无线电的人自己

动手安装晶体管收音机。爱好音乐的人练他们的乐器。很多家庭都养一种叫红茶菌的东西，用茶水养在器皿内，让其水母一样长大，舀出那发酸的汁液，加上冰糖，可当补养饮料喝，一时成为风尚。香烟供应紧张，我们都买回一种简单的卷烟器，自己卷烟抽。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致不但没有批死，反而经过大批判有了新的起色。很多两地分隔的夫妇都因单位停产而得到团聚的机会，几个月之间，街道上挺起大肚子的妇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红卫兵抄走的四旧物资又经红卫兵自己的手流散出来，我已通过不同的渠道得到各种私下传阅的书籍，从中读到很多奇书，包括两册前后都撕掉了几页的足本《金瓶梅》。在我的熟人圈子内，破四旧造成的文化荒漠一时间春意酝酿，现出了一点点文艺复兴的气象。

马疙瘩一次领我去回民居住区的清真大寺，那里的抄家物资库房内有大量的唱片，他的红卫兵朋友让我们随便挑选。凭着我的音乐常识，我选了很多外国音乐，特别是著名的舞曲和俄罗斯民歌。马疙瘩对读书不感兴趣，但对音乐，他倒是想从我口中抓些皮毛的常识，好在他那些闲人朋友跟前露几句附庸风雅的谈吐。倒完了他的表，马疙瘩身上有几个钱花了，便常拉上我进城，吃完羊肉泡，到不同的场合抽烟喝茶听唱片，有时还伴着乐曲跳舞。与会者看样子都是困难时期舞场上跳上了舞的男女，大都比我年长几岁，老练，会玩，情场上已有过各自的经历。大概只有我拉斯蒂涅一样没有经验，跟他们混在一起，显得有些呆头呆脑。好在有马疙瘩在我身边指点，他热心扮演他的伏脱冷角色，在教练男女社交的事务上对我连拉带推，嘲笑着我的无知，同时给予世故的教诲。经过这几年接二连三的运动，这群舞迷们的舞兴荒废已久，如今一曲《蓝色多瑙河》或《红莓花儿开》回旋而起，立刻起子一样松开了每个与会者记忆的螺丝。

我也随舞曲的荡漾而想起了我跳舞的往事，那是我上高中的时候，自由市场刚开放，就在我常去西北电影院看电影的那一段日子里，附近的中苏友好协会礼堂内总有定期举办的舞会。每从那儿经过，听到舞曲声隐隐传出，目睹穿戴都很洋气的男女出出进进，我也曾心有所动。但我一无门票，二无舞伴，再加上我那中学生寒酸的穿著，有好几次，走到入口处向内望上几眼，我随即悄然退缩而去。我不好意思在那儿站得过久，我觉得自己形影孤单，举止生硬，在别人的眼中肯定显得可笑。唯独有一次，我跟上一个外号叫黄毛的同学去了那个舞场，在里面不得要领地学了点儿舞步。后来上了大学，在 1964 年外语学院的元旦舞会上跟一个英语系的女生跳过几场，此后舞会就被作为修正主义的颓风正式宣布禁止。

现在我常跟随马疙瘩出入于西安的回民街坊，在那些发出羊膻气的小巷子内拐来拐去，踏进不同人家的院落。聚会的房间大都很狭窄，与会的多是些西安市所谓的“闲人”。放唱片听音乐，不过做个引子，助一助兴而已，大家聚会在一起，主要还是为消磨无聊的时光，有个合适的场合好结交朋友。特别是我，在马疙瘩的安排下厕身其间，并非为练习跳舞，而是要找个机会结交女人。凭我现在这身份，正规的谈恋爱找对象，想都别想。青砖二厂，西安市的人差不多都知道那是劳改窑，只要向对方明确提到自己工作的那个地方，几乎所有打算正正经经找个男朋友的女子都会吓得退避三舍。马疙瘩周围的闲人聚会给我开辟了一条社交的出路，从前我只知道在同学或熟人的圈子内寻找吸引我的异性，现在才发现，一个人也可以在公共场所同完全陌生的女人交上朋友。我从前和女同学之间那些极其肤浅的接触，如今按马疙瘩的标准衡量，全都太傻瓜或近乎儿戏了。得知我二十来岁的人至今尚无性经验，马疙瘩总是取笑我说，都怪我书念的太多，念呆了脑子。于是他常在我耳边吹风，半激励半嘲讽的，说得我甚感紧迫，不由得为自己这人生经验中有待填补的空白而着急起来。每逢马疙瘩及其一伙大谈各自的艳遇，描绘勾引的细节，铺陈销魂的感受，甚至夸耀他们玩过多少女人的记录，我的没有故事可讲便成了我的另一种贫困，成了让我颇感羞耻的缺陷。现在面对我这样的笨蛋，不懂俄语又缺乏音乐常识的马疙瘩终于有了他可以夸口的长处，他开始热心开导我，不厌其烦地对我说教，还打算把他前几年舞场上认识的女人挨个引荐给我，并鼓励我大胆去跟她们学手。他向我保证说，只要我操作得当，她们都会乐意配合的。

“秀英，来，跟我们这位大学生跳个舞。”一次聚会中，马疙瘩把我交给一个洋娃娃睫毛的回民女人，她眼睛和嘴角微微向我一笑，整个面部依然保持着原有的自持。这不是真正的舞场，根本转不开圈子，双方身体的贴近和回旋非常形式，我们勾肩搭背，淡淡地拥住挪步一阵，算是履行了认识的第一道手续。因为她在和丈夫闹离婚，家里是不能随便去的，按照马疙瘩的安排，她要向我借书，我告诉她我家的地址，接着在约定的时间她来看我，一个有点像是排演节目的程序由此缓慢地展开。按照马疙瘩的指点，我应迅速亲近对方，穿插上有情趣的交谈，去些有意思的地方，一个个环节连起来，直至揭开那最后一层纸。然而实际做起来，情况并不像马疙瘩说的那么顺利，在很多细节上，从一开始我就进行得有些吃力。我说我觉得事情好像不太对头，秀英配合得并不热心。但马疙瘩总认为，不是对方架子大，是怪我自己运作拙劣。他还拿跳舞作比方开导我，说女方的舞步得靠男方激发，由男方掌控，男方进退有度，回旋得力，女方便容易跳出舞姿。男方若连自己的步子都踩不准，女方即使善舞，双方也会跳得举步艰难。他给我打气，叫我尽管见机行事，大胆下手，不要考虑她会不会拒绝。

就这样，我试着和秀英跳起了进退周旋的“舞”。秀英衣着素净，打扮俏皮，人是地道的西安回民，却喜欢装扮成时髦的上海女人。那天她来借书，进门后与我面对面坐定，只见她把身子那么闪避地一侧，立刻就给我一种拉开了距离的感觉。起先，她美人图一样保持沉默的时候，还显得有点捉摸不透的深度，等到她开了口，说不上几句话，她那西安回民的口音就渐渐露出了她的平板和缺乏趣味。我确实不会带人跳那个“舞”，越是踙到僵硬的时刻，我越不会活跃气氛，两个人干巴巴坐了一会，很快便到了没有更有趣的话可往下敷衍的地步。最后，她起身在我半空的书架上翻了一阵，挑了本外国小说，算是完成了她此行的任务。还书的时候，她和我约在外面一处僻静的地方相见，我没有带她去马疙瘩建议我应带她去的饭馆、电影院等其它消费场合，我确实没有足够的钱支付那一类开支。我们的排演于是到此终止。对于我的毫无收获，马疙瘩笼统归咎为我的穷酸，他向我总结说：“你那块大学生牌子不顶屁用，想搞女人，不花钱是办不成事的。”

马疙瘩说秀英爱钱不爱才，确实不适合我这样的穷酸，搞不上手也就罢了。过了一阵，他又要给我引荐新朋友。说是有个音乐教师，长得比秀英差点，但性格谈吐比秀英可爱多了，他估计我门俩肯定能谈到一起。这一次马疙瘩搞得很正式，在一处茶座安排了见面，树荫下零落的绒线花散发出爽人的药香，坐在躺椅上的音乐教师果然个性开朗，一搭上话就十分健谈。我们从音乐谈到文学，到个人的经历，加上马疙瘩在一边插科打诨，整个的气氛显得融洽而富有发展的前景。这盛夏的一日是个良好的开端，等到天气逐渐变冷，我们坐到甜食店喝着热醪糟消磨晚上的时光，两个人已经是无所不谈，但也没有更新鲜的话题可激发谈兴了。下一步做什么？我并没有忘记我的目标，但我们越熟悉，甚至越亲热，我发觉能够达到最终目标的契机越在拖延中流失。马疙瘩几乎在拿他吃羊肉泡馍的胃口来处理他和女人的关系，对他来说，凡是沾上手的，就非得撂翻了不可。但我却有所挑剔，我那交接女人的胃口还没发展到马疙瘩那样消化力极强的程度。我还很青涩，才初涉这风月场，心里虽跃跃欲试，行动起来总有些犹豫。按招马疙瘩的分析，我还处于有贼心而没贼胆的阶段，于是他精辟地对我总结说：“不是人家对你没有那意思，都怪你没有下够死功夫。”

马疙瘩的话说得我有些困惑和挫折，无论是和秀英还是和音乐教师，我看我都没有真正进入情况，我们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有什么不对头的因素。事情的不成功，我看并不完全是马疙瘩所责怪的技术问题，而是他派给我的女教练都与我没缘分。起初见我和音乐教师来往很密切，马疙瘩还说我有了长进，但后来听说我与她在身体接触上毫无进展，便又抱怨起我的无能，说我在追求女人的事情上缺乏培养前途。他教训我说，像秀英她们这些女人，周围有的是追求讨好的男人，她们哪一个会在乎我摆我那知识分子的臭架子。对于我一分钱都不想花的做法，马疙瘩更是持坚决批判的态度。他说：“天下哪儿有白吃干铲的好事情，有些人

给秀英她们大把花了钱都沾不上手呢，你这家伙竟然一点不想破费，那你就干等你的好事去吧。”为了促使我速成，马疙瘩甚至要借钱给我。他说我要是确实没钱花，就先从他手中拿些钱，可以带上可爱的音乐教师去临潼的华清池玩玩，买上双人浴池的票，快跟她把那好事办了。

我不服气马疙瘩的批评，也不信服他那一套稳操胜券的“女人经”，更不想依赖他的老关系沾光。我说我已经受够了他的熏陶，从今后我要独立操作，只跟我自己的感觉走了。

十六 初识梦霞

冬去春来，转眼已是 1968 年初夏，我有时上班，有时泡病号，我交往女人的范围也超出了马疙瘩那个交际圈子。

有一天我们东窑上的学习小组读完报宣布提前下班，我早早离厂进了城。按以往的路线，我先在钟楼下车，然后沿邮电大楼到新华书店临街的墙下浏览大字报。等走到平安市场口上，正要穿过马路，忽然瞥见一个眼熟的身影骑自行车从近处的街道缓缓擦过，迂回着绕行了一道弧线。那骑车者好像微微向后瞟了一眼，一副有意放慢速度，迟疑着想要引起谁注意的样子。她是谁？我一时想不起来。就在她即将走出我视线的一刻，我脱口叫了一声“沈荣”，那身影立即掉过头向我骑来。正是她，昨天晚上在一处聚会中听音乐时认识的，要不是临出门她告诉我她的姓名，刚才恐怕就只能干瞪眼与她擦肩而过了。

昨天晚上那屋内灯光很暗，只记得听到一首音调深沉的歌曲，有人连连发出叹息，显得深有感触。这时我才注意到是她，一抬眼和她湿热的目光蹭了一下。那小屋内当晚来人多，她隔在了另一边，一时没找到和她搭话的机会，只是散场的时候，我与她互道了姓名。现在，我们显然都意识到必须抓住这路遇的机会，于是边走边谈着，简要地讲出各自的大概情况，都竭力要给今后的往来留下足够的线索。

她随我拐入后街，跟上我向我家走去，我老实告诉她我在青砖二厂就业，她说她在西郊的一个技校工作，但语气显得有些含糊。说着就到了我家。在我那间狭小的屋子内，我们没坐到五分钟，马疙瘩突然敲门走了进来。他进得慌张，一脚踩了沈荣的鞋子。她立刻不满地偏过头，摆出不屑答理她的样子，然后避开他换了个位置坐下，手中的扇子不停地扇着，一股子要把他扇出去的气势。我正要责备马疙瘩冒失，看一下他们两个的表情，才看出他们本来认识，刚才那一脚显然是马疙瘩有意的玩笑。马疙瘩笑着说：“真是‘西安地方邪，说鳖踩了蛇。’”然后打趣着和她搭话，她仍然坚持不理。可以明显地看出，马疙瘩这个不速之客的到来不只使她感到受了打扰，而且弄得她有些被动和懊恼。我心里也盼马疙瘩知趣地离开，但他毫无离开的意思，最后沈荣见扛不过他，只好扫兴地走了。

听我提到“沈荣”这名子，马疙瘩对我说：“什么沈荣！她就是舞场上有名的沈梦霞，怎么叫你挂上了？”我说 ：“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看，我总不能老是经你的手办自己的事，现在我也该学着独立操作了。”马疙瘩连声向我表示赞许，夸我有了长进，说着就聊起了沈梦霞其人。原来这沈梦霞前几年在舞场上曾出过一阵风头，马疙瘩也厕身她众多的追求者之列。他说他纠缠过多次，花了工夫破费了钱，却始终没沾得上手。刚才走进门踩她一脚，就是要惹她恼她一下，给她个不客气的见面礼。对于自己的扑空，马疙瘩显然很不服气，所以提起了沈梦霞，他说的都不是好话。他说沈荣不是她的真名，而且肯定她不在技校工作。他劝我对这个女人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多打折扣，说她骚名在外，鱼一样滑溜，还说她老是在有意招遥，空头许诺，哄得一群男人跟在她屁股后头打转。因此他特别提醒我小心受骗上当。听了马疙瘩的评论，我并不以为然，我说我才不在乎她到底叫什么名字或干什么工作，反正我没钱可骗，她再滑，又能把我怎么样？

好像她预先等在那里似的，第二天下班回家，我又在老地方与她路遇，随后又与她边走边说到了我家。言谈间，她对昨天的窘况不太好意思地做了点解释，随口说了马疙瘩一大堆坏话。她说马疙瘩是个社会老油条，说我这么老实的人跟马疙瘩混在一起，小心叫那家伙利用了等等。我们正说着，马疙瘩又大大咧咧跨进了我的房门。一见他进门，沈荣立即满脸不悦，抽身就往外走。我紧跟她到门外，她说她也许过一会还会再来，同时和我约了在外面见面的时间和地点。临分手时，她特别对我强调说，听朋友们说我一笔好写，她最近有件要事，想求我帮她写份材料，叫我千万别对她有什么误会，更不要听信马疙瘩满嘴的胡说。说罢，她湿热地看了我一眼，就骑上自行车走了。

我盼马疙瘩趁早离开，心想她过一会儿兴许还会再来。但马疙瘩根本没有离开的意思，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歉意。他根本不考虑我现在的特殊心情，只说他有要紧的事情要和我商量，一屁股在我的屋内坐到了天黑。原来他倒表的事传出了风声，可能让干部抓到了什么证据，队长已找他谈过话。他自昨天就没去上班，只担心这一次回厂会叫厂方没收了出入证，弄不好还会再次进强劳队。他说从昨天把我找到现在，就是急着与我商量出走的计划，要是我愿意跟他一起出外流浪，这一两天我们俩就坐火车去郑州，那儿有他倒表的据点。

我一口回绝了他。自进二厂至今，我始终坚持我在劳改窑立身的一个基本原则，我虽同我那些干偷窃或搞投机倒把的同事混在一起烧窑，甚至和马疙瘩交朋友，一起出外玩耍，但他们的作案活动我绝不能参与。我确实很缺钱，但我并不过分爱钱，捞钱犯法的事，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要做的。我固然想脱离二厂，但我不想走马疙瘩眼下要走的路，我又没有犯到队长的手上，何必要以逃离、流窜的形式出走。即使明天干部要收掉我的出入证或把我投入强劳队，我也不愿意跟马疙瘩一起出外流窜。跟上马疙瘩或其它任何二厂的此类人流窜出去，迟早都会翻把，最终还会叫公安局抓回来。对他们这些职业偷窃行骗的来说，抓回来不过关一阵或判几年，等再次放出去，他们还会重操旧业。“抓住了是你的，抓不住是我的。”他们的生活摆幅就在这两极之间移动，蹲几年监狱，于他们不过是被迫做长期的休业罢了。但我的情况与他们根本不同，我相信我这个思想反动的罪名总会有平反的一天，然而我如不自爱，现在破罐子破摔下去，一旦误入刑事犯罪的歧途，那就跳进黄河再也洗不清了。所以从一开始我就给自己划定了底线，听音乐跳舞会女人，不妨跟上马疙瘩一起出动，但要去车站倒表，我绝不跟他当帮手。我提醒马疙瘩说，我不适于在外过流浪生活，他带上我出外，不惟给他帮不了忙，还会给他增添麻烦，弄不好会坏了他的大事，甚至会加速他落网。我的一席话给马疙瘩泼了一头冷水，但并没有动摇他出走的打算。我知道我说服不了他，我也没想要改变他，我只是想让他明白，首先，我不可能接受他的生活方式；其次，我不是闯荡江湖的材料，他做的那些事情，就是我想学也学不会的。我说我不是瞧不起他那个行当，搞诈骗也得具备诈骗的才能，平日连简单撒个谎我都说不出口，咋干得了车站上卖假表的事呢。

我们去老孙家吃饭告别。在夏夜昏黄的街灯下，空中弥漫的湿热，满街大字报发黑的脏颜色，还有下水道入口处一滩滩污水散发的臭气，现在全都混合在一起，使得这个城市的街景显得无比地浑浊。我目送着马疙瘩的背影没入夜色，就像站在海岸上送走了一只颠簸远去的小船。

十七 绒线花树下

我按约定的时间来到邮电大楼，她说上面那大钟敲响一点整她就出现，但她并没有在那时出现。我赴约会没有死等下去的耐心，几分钟过去，还不见她的人影，我很快就离开了那里。一周后她来我家找我，笑脸亲切地坐过来，那样子好像根本没发生过失约的事情。她改变了发型，原来松松垂下的剪发扎成了两个鹰爪，我印象中她那有些晦气的脸色一下亮堂了

许多，显出了几分妩媚。我们闲谈了一阵，她这才平淡地提起那天失约的事情。好像故意要气我一下，她说那天她确实去晚了一会儿，但等我等了好久好久，最后实在等不下去了，才怏怏离去的。后来，她说她就和一个朋友到外地去了几天，所以整整一个礼拜没能和我取得联系。她的话说得我有点后悔，特别是提到“去了外地”，还“和一个朋友”，那不可捉摸的行踪更使我感到怅然若有所失。她在屋内立坐不安，看那样子，似乎仍担心会受到意外的打扰。我告诉她马疙瘩已不在西安，他绝不会再来家中找我。但她仍坚持要去外面，要我带她去个好玩的地方，说今天一定要和我在一起待个够。

我们去了大兴善寺，这是南郊最大的佛寺，破“四旧”之后，寺内的和尚都赶走了，大殿也全部封闭起来，寺内草草做了些修整，就改成了凭门票入内的公园，还起名叫新风公园。自文革的红色风暴刮起，名称也一窝蜂追求革命化，从地名到单位的名称，乃至个人的名字，凡有封、资、修意味者一律改得具有战斗气势和革命内容。比如“外语学院”改为“反帝反修大学”，“政法学院”改为“无产阶级专政大学”，而“陕西师大”则改为“人民师大”。有一个名叫“卢进士巷”的小巷子，改名风潮下，“进士”这样的封建头衔自然不能容忍，遂一举改名“芦荡巷”。那巷内既无湖水也不长芦苇，之所以起了一个如此莫名其妙的名称，据说是照应了当时的革命样板戏《芦荡火种》。这新风公园内特设了儿童游乐场，只因地处偏僻，园内又空旷得吓人，开辟至今，很少有母亲敢带上孩子进来游乐，倒是让成双成对的男女讨了方便，成了市区内情人幽会的最好去处。

新修的儿童游乐场上空无一人，我们两个大人玩起了孩子荡的秋千。她先上去悠悠晃荡了几下，连连说她晃晕了头，我跳上踏板挺身卫护，和她面对面荡向高处，每向上一荡，两个人的身子自然就贴到了一起。我的脸渐渐俯下，她的脸微微仰起，各自的嘴唇都够着往对方的挨去。好像火柴棍一划，就那么轻微地亲了片刻，一下子把什么都点着了火。自从那天晚上瞥见她眼睛湿热的一刻起，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整个接近过程中的受阻和中断，以及有意无意的延迟，似乎全都为现在这一刻积聚了必要的热能。她说她腿有点发软，怕半空中再站不下去。我也觉得小腹内一股热流往下扩散，荡这个秋千再也没什么意思。我们俩眼下这情势已到了不管说什么话都可能词不达意，甚至话说得再多也不顶用的时候。我能敏感出来，这有点游戏形式的开头若再没有进展地拖下去，事情很可能就会变味，变得像从前和其他女人那些没有结果的嬉戏调笑一样乏味。我们不约而同地向公园后面走去，急着找更合适的地方，急着要做秋千上引起的，但秋千上不方便做的事情。

那是大雄宝殿背后的小院，青石台阶上散落着绒线花的残红，凉风吹过，淡淡的中药房的气味。四处无人，整个公园内大概只有我俩。现在脚踏在实地上，我可以空出双手把她搂紧，可以用劲箍得她喘不过气来，可以长久地亲住她，吸她伸给我的舌头。我的动作太急促，一开始毛手毛脚，弄乱了她的头发，不小心把其中几根挂到我衣扣上，晃动中竟揪疼了她的头皮。她讥笑我的笨拙和生硬，拿开我抓在她胸膛上的一只手，嫌我揉皱了她的衫子。然后她自己动手解开衣扣，叫我看清她解除胸罩的步骤，最后把她袒露的胸膛挺给了我。我把她推到绒线花树下，一直推得她脊背紧靠住树干。她一动不动，任凭我在她起伏的胸膛上长久地揉捏，但对我另一只塞进她裤腰的手，却死拉住不放，不想让我摸到更深的地方。

一阵冲动慌乱地过去，稍稍平静后，她拉展衣服问我：“美够了没有？”我没有回答。我有点不好意思，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话可说。只见她上唇微微翘起，狡黠地向我一笑，那露湿烟润的眼睛溢出了她心底的满意——满意她成功启蒙了我这个生手，满意她激发了我大孩子气的贪馋，也满意她自己特别的感受，以及其中那不是男人能琢磨得透的深奥。最后，她拉出我依然塞在她衣服下面的手，用她的手绢擦净了我的指尖。她说她正来月经，叫我不要这么猴急，说等一两天那讨厌的事情过去了，有的是我用劲张狂的时候。

现在她比几个小时前走进我房门时更显得精神，像刚充足了电的电器一样能量饱满。我却觉得自己有点疲塌，不知为什么，心里隐隐生起了模糊的不安。“怎么啦？想把我甩到这

儿回家看你妈去？”她抓住我一刹那的走神，猛地向我叩问，接着又问起马疙瘩都给我讲了她什么话。她显然很关注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唯恐我听了谁的流言，对她产生不好的看法。其实我并没有心思挑她说话的漏洞，对她的过去和现状，我也无心深究。我只面对她的在场，此刻我正在亢奋中，心里想的只是接下来要做什么。刚才那些身体和身体的接触还残留着后劲，我神思涣散，懒得和她说那些闲话。我没有把马疙瘩说的话全对她说出来，我不愿意让她感到伤脸。她骂了马疙瘩几句，要求我不要再和他来往，然后对我肯定地说，梦霞确是她过去的名字，但她现在已正式改名沈荣。她还解释说，她可不是想赶现在这改名的时潮，而是不想把自己和那个旧名字连在一起，想从此甩脱她的过去。接下来，她就给我简单讲了自己的经历。

那是困难时期到处办舞会的时候，她初中还没毕业，才十五六的年龄，看起来已像是十八九大姑娘的身材。她特别对我夸耀说，那时候她的眼睛比现在还要亮蓝，说着就把脸凑过来，让我仔细看她的眼睛。果然那眼白泛蛋青色，白净里依稀透出似有若无的淡蓝，衬托着眼圈湿润的暗色，看得我心里再次发热，一阵阵地酸软。这时她眼神中笑意诡谲，阴影迷离，目光扯不断的丝缕一样盯住我，逼视得我再也看不下去。我觉得，似乎再这样继续与她对视，她眼眶内那满溢的潮湿非把我淹死不可。于是我们再次重复那些用力让身体和身体接触的动作，我鼓起劲在她身上狠狠压挤，我要在手的揉捏中把握住仅凭眼睛的注视捕捉不到的感觉，直到把她揉得软瘫在树下，闭住了眼睛。她一手勾住我的脖子，突然把另一只手放到我胸口上，说是要摸摸我的心跳。摸了片刻，她放下手，很不高兴地责怪起我的冷漠。她让我把手搭在她胸口上试试，果然那里敲鼓一样跳动。“怎么样？你承认不承认？你那儿没有我这儿跳得厉害吧？”她诘问着我，接着总结说：“你并没有真正动情。是不是就图个新鲜，只想在这地方和我闹着玩玩？”我承认我的反应不如她强烈，但我认为那是各人的生理特征，不必往情爱问题上死扯。我对她说：“人和人血型不同嘛，怎么能仅凭着心跳的快慢鉴别真假呢。难道你那只手是中央情报局的测慌机器？”我不想和她再争辩下去，便岔开了话题，催她给我讲她的故事。

舞会的灯光和乐曲也曾对站在门外的她有过类似我那样的诱惑，她年轻，虚荣，想去浮华场合展示她青春的丰采。而这正是女孩子在寻欢逐乐的事情上比我这类呆男生危险的处境。男人有时想放荡也未必能放荡起来，比如像我，衣着不入时，口袋一摸没有钱，虚幻的渴望虽多，勾引的手段却少，根本就不配厕身放荡者之列。但女孩子若放任起自己，又不懂得必要的防范，则走上失足的路就比想干成任何事都会来得容易。她们本来就是舞场上的猎物，只要盲目接受了献上来的殷勤，贪图些小恩小惠，举步都会踩进陷阱。梦霞的故事十分平常，只能说听来令人感到惋惜，但基本上属于扑灯蛾自寻死的不幸，不知道多少天真少女都以这样的模式一夜间长成了妇人。一次舞会上，她和一位风流闻名的高干子弟跳到一起，这公子本是风月老手，再加上出身和地位提升了人的风度，没见过世面的中学生自然受宠若惊，边跳着边说着，几圈转下来就给那厮吊上了手。散场后他把她带到他豪华的住所，就像把吹起来的口香糖泡泡一口气吹破那样随意，就在当夜，他给她破了身子。那是一月的寒夜，送她出门时，他补偿给她一件新买的大衣，是当时流行的款式，他给她披在身上，好像支付了一笔缠头。他早已有自己的妻室，和她来这一腿，全图的是尝鲜，他只要她那开苞的一次，然后什么都不想再要。结果是很糟糕的，她怀了孕，被她所在的中学张榜公布开除，而那位公子在她的事情上翻了把，加上其它很多类似的勾引事件一连串被揭发出来，最后被捕判了刑。她从此走向了社会，成了声名狼籍的女人。

接着她还讲了自己与另外两三个男人的事情，平淡得已没什么情节可以复述。大概的情况是：从学校出来后，她在建筑队临时打工，谈了一次恋爱，随后被所爱的男人遗弃，因为他本来就知道她那不名誉的经历。再往后，她和另一个人结婚，没过多久便告离异，然后回父母家居住至今。沉默了片刻，她目光湿热地盯住我问：“怎么样，嫌弃我不？”我没有立

即回答，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其实她没讲给我之前，马疙瘩已给我说过事情的梗概，现在经她这么一问，反问得我有点愧咎。我在心里问自己：难道我不正是冲着她这些经历才走近她的吗？我本来就是在寻求放荡的女人。我嫌弃什么？只要没人嫌我那反动学生加就业工人的名声，我就觉得很不错了。过了一会，我才对她说："我也受了学校的开除处分，罪名是思想反动，至今还在劳改窑当就业工人呢。与你的处分相比，可要严重多了。我看咱俩都不必再提过去的事情，那时候你我互不相识，谁也谈不上嫌谁。"

我的话说得她露出了笑容，站在明显扩大了的树荫下，她勾住我的脖子，仰起脸和我长久地亲在一起。我们更加贪婪地重复起刚才做过的那些动作，没有餍足，欲罢不休，直到天色转暗，空旷中传来几声乌鸦的啼叫，才提醒我们走出了公园。

十八 "素女为我师"

沈荣来家中找我的时候，我正要和弟弟去园子给祖父看病。祖父母在临时赶入的那个小屋过了一个冬天，1967 年春，各地纠正抄家时的过火做法，那家地主要讨回他家被占的房子，经堂兄找生产队多次交涉，两个老人才获准搬回了寂园。过厅里早扎起一堵隔墙，楼上楼下，生产队全部占领，他们只给祖父母留下原住的三个房间。现在老人的生活费得由父亲和堂兄分担，堂兄的工资并不算高，父亲工资虽不低，却因身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被单位扣发了工资，目前仅领得少量的生活费，他其实给祖父母拿不出多少。经过抄家洗劫的寂园，已找不出几件像样的家具，就这些劫余的破旧东西，我们也不得不送到寄卖所贱价变卖，指望卖上几个钱补贴祖父母匮乏的生活费用。

两位老人家身体向来都很不错，晚年的健康和未来的长寿本没有什么问题，可怜他们几年来不断遭受打击，再加上生活环境日益恶化，硬是叫害人的运动逼上了提前死亡的末路。先是祖母于 1967 年冬病逝，给祖母办完了丧事，整日念诵"往生咒"的祖父便卧倒病床，凄凉地捱到了他生命的最后日子。父亲和三伯都关在牛棚里接受群众专政，他们暂时失去行动自由，孙子中有工夫探望祖父，且愿意去园子常走动的，现在只剩下堂兄、弟弟和我。弟弟叫我今天去那里，就是要借生产队的架子车把祖父拉到医院做一次检查。

拉到医院后，堂兄负责和医生接头，办理各种收费的手续，我和弟弟用担架把祖父抬出抬进，应付不同的检查。沈荣也跟着我来了，她守在祖父枕边不停地扇凉，给他擦汗喂水赶苍蝇，勤快得像个孝顺的孙子媳妇。祖父浑身起了水泡，那些水泡不断扩张变大，等胀得撑破了皮，就流出有臭味的黄水，而黄水沾濡处又生起水泡，一串串葡萄一样蔓延开来。起泡处的皮肤让泡内的积水憋得稀薄而发亮，泡破处便糜烂起受感染的红疮。看起来，他全身好像让一大盆滚水烫过，只剩下不多处完好的皮肉。大热天，他赤身裹在被单内，水泡破裂处都敷上纱布，一个知觉尚清楚的人就这样僵硬地躺在床上，忍受着疼痛和溽热的煎熬，让身体的裸露与溃烂难堪地暴露在儿孙、医生和任何一个照料他的人面前。现在他孩子一样无助地躺在那里，由着医生摆弄他的身体，一任别人的手随便触及他身上任何隐蔽的部位。垂死地活着，活下去简直成了受罪和羞辱。祖父的神志依然很清醒，他还在念佛，趁自己还有那么一口气，他在为尽快地往生而默诵经咒。因果这事情，有时候荒谬得让人感到疑惑，祖父弘法念佛半辈子，应该说积下的善缘也够多了，何以死到临头，会如此痛苦和受辱？难道果真有什么来自宿世的恶因？我参不透命运的深奥，但面对眼前的惨况，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祖父讲给我的那些轮回的道理。医生告诉我们，祖父的淋巴癌业已扩散到全身，没必要再住院治疗，他让我们把病人拉回去快准备后事。

祖父并无公费医疗，我们也没多余的钱给他看病，在每一天都有人被活活打死的年月，人命也显得比往常贱了许多。我们只得把祖父拉回来，抬进里屋，停放在祖母咽气的炕上。

临时雇来伺候病人的王妈忙着给他新破裂的水泡处敷上纱布。这小脚老婆无依无靠，一直在城里做服侍病人的杂活。她是贫农，也不怕沾任何政治嫌疑，有时候，为了我们这边的利益，她和那边的生产队干部争执起来，比他们队长还显得厉害。多亏有她专职照料，代替祖父所有的儿孙做了他们都做不了的事情。王妈一边以夸张的口气唠叨着病人的琐事，一边在祖父身上清洗着污秽，不管擦到哪个部位，她那利落的手都毫不迟疑，无所顾忌。沈荣在一边给她递送药棉，一路上又流出来的一滩滩黄水，全让王妈几下子擦得干干净净。堂兄和弟弟都走了，沈荣和我没走，我们想留在园子，想在这处安静的地方继续待下去。从沈荣手中得了几斤粮票的王妈显得懂事而善解人意，晚饭之后，她在外间的炕上收拾好铺盖，好意挽留我们，说我俩今晚要是不想回家去，就在外间那屋里留下来歇息。

寂园已面目全非，花木全砍伐光了，生产队办的翻砂厂弄得院子内到处蒙一层铁青的灰尘，我无心再细看屋外那一片破败的景象。天色转暗，那翻砂厂的大门已经上锁，屋外的空地上只留下我和她两人。我领她来到最后面的偏院，那是围墙内离土城墙最近的一角，关上偏门，就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我们踏着台阶走上几尺高的露台，方砖铺地的台面上有石桌石凳，高大的观音柳在晚风中投下摇曳的树影。这露台从前是我们夏夜乘凉的地方，还记得八月十五月亮从东边升起的时候，祖母在那石桌上摆上月饼和水果，点起一炉香祭月。现在石桌上落了一层土，连一处能坐下来的地方都找不出来。她从厕所回到我身边，对我耳语说她的月经已完全过去，还说她急着想快点过去，这两天吃了好多冰棍和冷食，说着，她伸手从裤裆内抽出一绺干净的卫生纸叫我看了一眼，转身就把它丢到了远处。已是夜静时分，月光把露台照得舞台一样明亮，台下的空地上树影模糊，荒草连片。障碍已经除去，她回过头，目光湿热地看我，那神情明显在对我说，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

她脱光了她，我也脱光了我。她脱得麻利而诱人，我脱得却有些忸怩，特别在此刻与她面面相对，我有一种登了台还不知道如何开演的尴尬。就这样干站着空亮了片刻，直到两个赤裸的身体搂到了一起，紧贴的皮肉才激活了触觉。这几天，我们两个人的皮肉隔着衣服早已厮磨得十分焦躁，现在一下子贴到了一起，每一处接触的部位都在贪婪地寻求全面的重合。我把自己整个地放任给身上那些渴求接触的部位，现在就全由着它们去贴得更紧，去陷得更深。月光水一般倾泻下来，清空，有些凉爽的湿意，我看见我脚下的树影水藻般浮动，那交错的身影很模糊，恍若两条纠结的人鱼在半明半暗的水底扭动和浮沉。

回到外间的炕上已经很晚了，夜在没有餍足的厮磨中延伸下去，黑暗中比在亮光下更能激发身体的放纵，由着她的导引，我一次又一次探测到她更深邃的激动和欢畅。

打从我们认识开始，她就在明显地导演我们的关系，但我自己很清楚，我想体验的事情与她一心要导致的结果从起点上就有所不同。她瞄准了我的单纯和没有经验，似乎一心想拿她的美色给我打上钟情的烙印，好把我贪婪的情欲引向一种纠缠不休的恋爱关系。这正是我害怕陷入的关系。我的渴求很简单，我只想通过与她发生关系这一具体的行动彻底扫除我那一窍不通的性盲，我没有更多的野心，能把那长久以来使我无比困惑的无知从心底抹去，就让我很满足了。在接触女人的事情上，我还太青涩，同时也很功利，自从和她在公园内搂到一起，直到来寂园睡过一夜，整个过程对于我只是一个获得经验的行动，一次解除内心困惑的身体经历。也许从本质上说，我和那个最早勾引她的男人干的是同样的事情，不同的只是，两者分别发生在她的不同的年龄阶段，触及了她身体的不同状况。现在她反过来扮演启蒙我的角色，若没有她如此投入地言传身教，我真不知道自己在性事的入门上还要拖到何年何月，更不知在无谓的延宕中我还要空耗多少焦渴的思慕。

现在好了，现在即使她马上从我身边走开，我也不会感到特别遗憾。至少我见了马疙瘩再不会觉得我交出的还是白卷。知道那是一回什么事与还不知道，是很不同的，这就是我们有时候需要进入某一个世界的原因。

第二天早晨，当她梳着头斜睨我一眼，问我夜里感受如何时，我一时不知如何答复。我

不是一个善于随机应变的人，讨人喜欢的话，即使我知道该如何讲，一般也都说不出口。昨夜发生的事情凌乱而模糊，犹如醒后记不清楚的梦影，我确实没有什么特别激动的感受可为她娓娓道来。我于是就敷衍地回答她说，谈不上什么特别的感受，只觉得不像原来所想的那么好。她听了我的话不太高兴，说我总是冷言冷语，故意惹她伤心，还抢白我说："大姑娘的感受好，你找去吗！"接着就指责我不珍惜我们的关系，又提起她在兴善寺与我纠缠过的问题。我连忙向她解释，说我说的都是实话，因为这在我才只是个开始，身体和身体还很陌生，感受当然比较肤浅，恐怕得经一番由浅入深的过程，才会有特别的感受可对她讲呢。经我这么一说，她低沉的脸色又柔和起来。这时，她对着镜子把梳好的头轻轻弄乱一些，给前额和鬓角垂几丝发缕，然后回过头对我灿然一笑说："那咱们今天就别各回各家了，等到晚上再叫你好好感受吧。"

祖父躺在炕上做他念佛的早课，他闭目数着念珠，不再理会周围发生的任何事情。我和沈荣走进附近的兴庆公园，钻到树林里消磨天黑以前的时光。白昼漫长，天气闷热，无风的树林内坐得我唇干舌燥。已经两天没回家了，今天又没上班，四顾这陌生的空旷，我忽然产生了一种小学生逃学的不安。因为突然脱离了生活的正轨，连在公共场所踫到一个显得面熟的人，我都不由得有点惊慌。这是一处用挖湖的土堆起来的高地，就在我家园子的后墙之外，从树隙间可以清楚地看见偏院的露台，正午的阳光白热刺目，照得那里白花花一片。望着那恍若聚光灯下的场地，我想起了昨夜的情景，还想起上高中住在园子读《聊斋》读得入迷时的痴想。那时候我月夜里给自己编造聊斋式的浪漫故事，常坐在露台上渴望某个狐狸精或女鬼突然从黑暗中出现……

发现我坐在一边出神，她突然用食指戳了我一下，冷不防问我："你想啥呢？"

"没想啥。"我说。

"怎么啦？跟人家睡过了觉，这一会儿想甩手走开不是？"她不安于沉默，更受不了沉闷，闷得难受了，便刁钻古怪地找起了我的岔子。这时，她把她那湿热的目光盯住我的眼睛，审问似的对我说："你得老实回答我你爱不爱我。"

"那不都是已经做过的事了嘛，还有必要在嘴上重复？"我想绕个弯子滑过去，从一开始就避开她这个陈腐的话题。

"我就是要你的答复，我想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她又伸过手摸起我的心跳。

"我其实并没想过什么。"我迟疑了一下，然后对她说。

"没想过，没想过就跟人睡觉呢！"她立即沉下了脸。

"你事先又没有特别问我呀。昨天晚上上床前，你咋不先叫我给你发个誓呢？"我开始用强硬的口气跟她说话了。我不想和她在"爱"这个字眼上做正经的讨论。爱还是不爱，那确实是个叫人说不出口的问题。在我的印象中，它基本上是小说或电影上那些恋人们对话的用语，是讲故事的人给他的人物编出来的台词，硬把它插进我们俩现在的谈话语境，横竖都让人觉得虚张声势。我向来不喜欢接受任何逼我表态的要求，不管它属于政治的还是感情的，不管它来自威严的组织还是亲密的个人。反正我就是不喜欢表态，我更不愿意故作姿态。见从我口中逼不出什么实话，她凑过来靠在我身上，套问我："是不是就只想和我睡觉？"我吱唔着说："你一定要这样想，那就这样想去好了。"这下她抓住了我的口供，立刻变了脸骂我"流氓"，而且"流氓流氓"地重复了好几遍。我在口角上终不是她的对手，这"流氓"俩字一骂出口，我耳根子立刻发起了烧。此时，一转念想到她给我讲过的经历，想到她情感上那个脆弱之点，想到我那个只图初试云雨情的欲念，我忽然感到自己的立场叫她一连串固执的叩问狠狠地将了一军，将得我退到了无处可退的地步。然而，她很快又和颜悦色起来，又靠过来和我亲热，让我用我的串脸胡硬茬子在她的腮帮上狠偎，直到扎得她从腮帮到脖子发红发烧。她的执著的探问越往下扣得越紧，似乎不触及我灵魂的深处，她就不甘罢休。最后，她终于摊开底，问我想不想和她结婚。见我闭口不答，她又缓和了口气，说她只是随便

试探我一下，叫我千万别太紧张。但过了一会，她又变了腔调，开始严肃要求我认真考虑，说至少在明天得给她一个确切的答复。

白天在极其疲乏的叩问中过去，她的纠缠不休弄得我搞不清她是在认真探讨我们之间可能建立的关系，还是在演她调情的拿手好戏——故意做出高姿态，好对我们俩已经发生的事情搞一个让她感觉良好的事后追认。她越在承诺的问题上逼我做出反应，我就越觉得她这个人麻烦难缠，悔不该当初轻率地招惹了她。

随着黄昏的迫近，眼前弥漫起模糊的威胁，我不想带她再返回寂园。今夜不再像昨夜那样前景诱人，在某些瞬间，我甚至闪过立即与她终止来往的念头。

我们在外间的炕上又过了一夜。熄灯后，两个人更深地陷入了那些滑腻而没有餍足的晃动。偶尔从那边传来祖父的呼叫声，他在叫王妈给他做什么事情。人与人在身体的感应上竟如此隔膜，一个生命在他自身的溃烂中没落下去了，其他人则在界线外照常过各自的生活，谁也无法真正代替谁受苦。她婉转在我的怀抱里，用她那忍不住要发出来的声音淹没了墙那边祖父病痛中的呻吟。

十九 被捕

秋天来了，祖父身上的水泡随暑气的消逝而趋于收缩，他整个的人干瘪起来，皮肉好像风干的水果，皱巴巴裹着骨头。看样子，他那些该流出来的体液已快流干。我去看他，见枕边有个小本子，翻开竟是他正在记的日记，他还在努力给他生命最后的日子赋予文字的秩序。在家中的佛经已抄得一片纸都没留下之后，他从来探望他的一个居士手中得到了两本佛经，都放在枕边随时翻阅。他仍未放弃念诵，念珠在手指间持续缓慢地拨动，伴随他的脉搏，一颗接着一颗……神志在微弱地凝聚和沉淀，精魂就要蝉蜕般从臭皮囊中脱去。

祖父的声音很沙哑，他断断续续地说话，言谈闲竟然问起了沈荣。他把她当成我的什么人了？就因为她跟我一起来过园子，在他身边服侍过片刻，他便记下了她。我已与沈荣分手好久了，现在只能应付着祖父说："沈荣忙着呢，今天没时间跟我来园子看你，但她叫我替她向你问好。"我把我买的一点食品指给祖父说："爷爷，这就是沈荣给你买的。"听了我说的话，祖父安祥地合上眼皮，念了声"阿弥陀佛"。老人都是这样，都习惯按他们自己的想法估计儿孙的事情，结果总是把一片诚意的关怀给予了其实并不是那回事的年轻人。

那一次直到第三天上午，我才和沈荣离开寂园。我步行陪她走到她父母家，一路上她一直跟我谈结婚的事情。我回避她的问题，并向他强调说，我那个单位忒歹毒，干部常会插手破坏就业工人的婚姻。按他们的看法，一个臭就业工人能在外面找到对象，不用说都是耍手段骗人家女方的。所以就业工人若要办结婚手续，厂方立有特殊的规定，你得先向厂方出示女方单位的证明。甚至你呈上女方单位的证明，他们还会拖延你的事情。比如，他们会去女方单位了解情况，很可能顺便把你的劣迹和建材厂的实际情况给女方当面讲清楚。抱着对公民负责的态度，他们唯恐你对女方隐瞒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这是他们的职业道德，他们有责任向女方揭发你那前科犯的老底：你犯过绺窃罪，你向你的对象承认你做过贼没有？你因乱搞男女关系而判过刑，你是否向你的女朋友交待过你从前的花案？经他们这么一搅和，不少人都因受到揭发而丢了对象。所以我提醒沈荣说，她真要想和我办这事，将会遇到想象不到的麻烦。沈荣居然没叫我提出的那些麻烦吓倒，她说那很容易，她会拿上证明亲自和我去见干部，当面要求她们开介绍信，看他们还有什么话可说。我又推说就业工人永远也在二厂分不到住房，她说她宁愿跟我在厂子附近的农村租房住。我再说不出任何借口，最后只能说我现在不想结婚。她白了我一眼，对我说："算了吧，不想结就不结呗，摆那么多的理由干什么！你就是不敢和我这样的人物结婚，害怕带着我上大街，全西安城的闲人都认识那是

有名的沈梦霞。”这问题一直拖了几周，最后我们因谈不到一起，只好不欢而散。

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弄不清楚，到底是我的拒绝伤了她的心，还是她拿结婚的承诺为难我，好给她从我身边的迅速撤离下一个台阶，抑或那纯属吓唬我的戏言，为难我的玩笑，只不过给我们发生的关系加些恋情的调味，使整个过程有些跌荡起伏罢了。不管怎么说，我是绝对不愿意和她结婚的。我不想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草草结婚，也不想和任何女人认真谈论婚约，尤其不愿意和沈荣谈论，因为从一开始我就没有那样的想法。那时侯，我心中罩着挥不去的阴影，老是有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就是在这次来看望祖父前的一个夜晚，连阴雨浇人心愁地下着，我坐在窑顶上的小屋内值班饮窑，曾写了《一剪梅》一阙，其词曰：

别梦阑珊风雨多，滴漏将残，无计消磨。起来遍地蛩声寒，九畹荒莱，没尽香萝。 白露蒹葭秋水波，蓼浦孤鸿，桂殿嫦娥。声声暗问夜如何，有美伊人，湿透双罗。

写定这首小令，把它夹入一本正在读的旧书，琢磨着那冷清凄绝的情调，我心里隐隐生出了不祥的预感。

现在面对祖父，我能就我和沈荣的关系多说些什么？他僵卧病榻，根本无法想象我这个孙子现在的情况。我不再是住在寂园读书时期的我了，我在二厂已混过四个年头，我交往的男女，以及我们在一起所说的和所做的，是父亲和祖父凭他们那局限的经历根本无法想象的。父亲当年曾那么担心我跟上街道的野孩子学坏，可如今，他哪里能知道我交了什么人做了什么事！我现在发生的很多变化早已超出了他们可能理解的范围。祖母生前总算吃了我挣的钱所买的食品，但祖父辞世前是绝对等不到我成婚，见不上他真正的孙子媳妇了。祖父说他想吃西安饭庄的八宝甜饭，我答应等星期四那里供应甜饭就给他去买。不幸还没等到星期四，在星期二下午，公安局就抓走了我。

那天下午四点钟我去上二班，窑刚点着火。长海早获平反放回来了，加上二毛，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烧火。长海在西安市公安局看守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五处——关了半年，他最近老是给我们讲他在那里关押的经历。他说那一阵大逮捕，里面塞满了人，他们的通铺上，从这边到那边，人睡得密密实实，连翻个身都得喊着“一、二、三”全体一齐翻，一个人晚上要是硬抽出身下床去小便一次，回过头就很难再插进去睡觉。我买了一盒阿尔巴尼亚进口的钻石牌香烟，打开后给他俩一人一支，我自己也点了一支。长海今天尚未开讲，忽然组长下来传话说，队长叫我去办公室一趟。我把刚吸了两口的烟灭掉装入烟盒，跟着组长一起去了办公室。

队长站在一边，办公桌边坐了位陌生的中年人。那人穿对襟上衣，一副乡下人的模样。我进去后，他让我在他的对面坐下，队长说他是市局的从干事。然后他们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队长便突然命令我说：“康正果，站起来！”那人从提包内掏出一张纸对我说：“现在对你宣布一件事。”接着就读下去，我一时尚未反应过来，都没听清楚他读了些什么话，只听到最后一句说对我“依法拘留”。就在这话刚落点的一刻，队长把手铐套上了我的手腕上，“喀嚓”一声上了锁。一切都来得迅雷不及掩耳。

接着带我进宿舍作例行搜查。先是搜身，最引起我注意的是，从干事把那包阿尔巴尼亚烟打开，每一根烟都在拇指和食指间捻了几下，那情形活像电影上抓住美蒋特务，在特务身上搜索微缩胶卷时的某个场景。我的床铺也经过了仔细的搜查，搜出厚厚的毛选第二卷在下面砖头一样垫了床板，还搜出一本文言旧书，当场予以没收，我几天前所填的那首《一剪梅》就夹在其中。他们把我的铺盖打成一个大包，在干部院办完离厂手续，就把我推上中吉普车拉走了。车箱内平放了一个备用轮胎，我被猛地一推，跌坐到那轮胎中心。然后他们把大行李包在我肩上一套，压得我直不起身子。

终于告别了二厂。

真想不到呀，我也同几乎所有离开这里的就业工人走了同一条去路：不是返回社会，而

是转到了更坏的地方。用干部们的话说，这样的转移叫"问题升了级"。汽车出厂时正值大雨滂沱，密集的雨点遍地激起了水泡，车子不知拐了多少弯，最后把我拉进了一处警戒森严的看守所。我抬头看见高出其它屋顶的小雁塔顶矗立在附近，不用问，这儿正是长海所说的西安市公安局五处。

那是 1968 年 9 月 19 日，我今生今世都忘不了那个日子。

二十 我叫二号

一个黑脸看守带我走上长长的甬道，甬道的两头矗立着哨楼，两边夹以砖墙，头顶上露出一线天。我走不快，入狱时又通过一次搜查，收走了我的钱包和那包烟，腰间的皮带和球鞋带也全被抽去。我背负重大的铺盖包，手提裤子，靸着鞋走向号子，左拐进东四排小院，在五室门前停了下来。看守开了大锁，推开厚重的牢门。本来，我心里是做好准备，等着承受他从背后把我猛推进去的，但并没有发生电影上那种典型的入狱场面。是我自己迈步，很正常地走了进去。看守只是在开门前举起手中沉重的钥匙串警告我说："你狗日的反革命，再不老实，小心给你加刑。"入狱搜查时，他们已告诫我不准互谈案情，不准说出姓名，不准这不准那，有很多的不准先给我敲了警钟。看守特别叮咛我，现在我领到的编号是二号，以后在这里就叫我二号了。

门在我背后锁上，听到看守远去，同室的一伙人才围上来和我搭话。得知我来自并非等闲之地的二厂，自称十四号的回民首先向我做出友好的表示，他对我这一点来历的认同立刻引起了另外几个人的响应。二厂的出身显然在他们眼中意味着我有一定的坐牢资历，这使我觉得，一走进这号子，我就处于比较受欢迎的地位。他们纷纷向我打听外面的情况，有两个人大概是干投机倒把的，竟热心问起了粮票卖多钱一斤等黑市行情。狱中已开过饭，听说我还没吃晚饭，同号都鼓励我立即向管理员索要。我刚入狱，惊魂未定，恐惧绝对压倒了饥饿，哪有心思想到吃饭，他们的催促明显让我觉得，他们对那份可能补给我的晚饭比我本人更关心。几经催促，我实在难却他们的好意，这才按他们的吩咐喊道："报告，新来的二号没吃晚饭。"我高喊了几声，十四号同时也大嗓门为我帮腔，但门外一片死寂，毫无反应。我停止了索要，同号们暗怀希望的神色也随天色的转暗而低落下来。

我巡视了一下这号子，铺板从檐墙一直通到后墙，所余的地面仅为一狭窄的过道，它前端是门，后端是个沿后墙角而修的小便池。最好的铺位紧靠檐墙，越往后越靠近尿池，自然属于不好的铺位。这顺序严格按先来后到排列，新人总是跟在最后，随着有人离去，后来者依次挪位向前。幸好关押的人并不算多，铺位不但不挤，且有些宽余，与长海描绘的情况相比，不知好到哪里去了。

檐墙下的一号资格最老，已关了四五年，据说是历史反革命，案情至今未结。三号是师大物理系教师，"社教"时进来的，已多年没有提审。六号是个撬门扭锁的惯犯，一双发红的贼眼有股子凶气，大多数时间都盘腿坐在自己的铺位上。七号是东郊纺织厂来的，好像犯的是经济罪，终日沉默，皱起的眉头若作盘算状，闭口不谈自己的案情。九号是长安县的农民，马达盗窃犯。十四号简称"么四"，犯的是花案，通称流氓罪，据说是几个人轮奸一个来自四川的野鸡，不巧让红卫兵纠查队抓住送到分局，然后立案转进五处。三号任号长，按他的安排，我这个最后进来的就紧靠十四号铺展了铺盖。一个高吊起来的灯泡昏黄地亮在头顶，东南角一孔密布钢筋的窗洞，我翘首对那里注目片刻，心里暗想，这就是书上常说的"铁窗"吧。我这些同号们终于熬过了漫长的一天，现在他们都钻入被窝，而对于我，昏暗的囚室内，一切苦恼都才开始。

我还不知道我为什么被捕，我得镇静下来过滤一下近来的所作所为，看我到底犯了什么

严重的过失，如果有什么漏洞，看我该怎样填补，提审时该如何为自己辩解。在二厂得到的常识告诉我，拘留和逮捕不一样，拘留没经过法院立案，公安局就有权随时拘留嫌犯。我还知道，与正式逮捕不同，被拘留者的罪名若不能确立，有时候也会获释。大概很多初入狱的人都容易怀抱侥幸的想法，我起先也总是喜欢把事情多往好处去想，一考虑起自己的问题，便围绕有利于自己的圆心转起圈子。会不会错抓了人？要是他们发现抓我完全是个误会，那很快就会逢凶化吉。即使他们没抓错——我继续给自己编织乐观的前景——如此突然的被捕，也可能纯粹是蹠上了风头的缘故，也许熬一阵子，等形势缓和下来，我就没啥事了。而如果情况确实如此——我痴心地抓住这一点，自我宽解地往下想——他们纵把我关上几个月，最后还是会以教育释放结案的。如此这般，种种设想在我的心中胡乱翻腾起来，我给自己找了不少有利的借口，顽强地推算着理想的结局。因为我思前想后，几乎过滤不出任何足以导致我拘留的罪行来，我就去北京翻了一次案呀，充其量不给平反罢了，绝不至于犯法的。至于和马疙瘩或沈荣的来往，也都沾不上犯法的边。还有什么呢？从他们搜查我的情况可以看出，这案情大概与文字有关，他们的疑团显然很重，竟连每一根纸烟都仔细做了检查。但我知道我没做什么，对我这样“老就”群中的小毛毛虫，从于事何必如此小题大做？

我急着等上边提审，便向同室诸人问长问短，三号——他姓刘，我称他刘老师——对我说，没有那么快的事情。他让我先安心坐我的牢，说通常都是关过十天半月，然后才叫出去提审。刘老师接着向我解释说，这是狱中的常规，先把你关起来不闻不问，等你肚内的油水刮得差不多了，开始痛感饿苦，也特别急于出狱，身心都折腾得十分脆弱了，这才把你叫出去审问。关押已给你教了乖，此时要逼你说出实情，就比刚入狱时容易多了。

现在要论肚内的油水，全号自然数我最多，第一顿早饭分到手中，我就没有吃完。不是我吃饱了，而是那早饭实在难以下咽。早饭是一大碗玉米面糊糊，咸味的，里面搅着白菜叶子，吃到嘴里粗涩而发苦。可能是见我进食颇有难色，我发现有些人流露出期待的目光，显然是想得到我的剩饭。我把剩下的多半碗给了么四。第二天我仍有剩余，三四天以后，那近乎猪食的玉米面糊糊开始有了滋味，我不但把自己的那一份吃得光光净净，吃完了还有想再添上一碗的胃口。除非逢年过节，一年到头，这糊糊天天早上都是一人半瓢。一大早起床就开早饭，每次都由两个值日负责打回，一人端上大瓦盆承饭，一人提上桶打回开水。领饭的时刻分外紧张，这一排牢房共有七个囚室，早饭送至小院中，由看守挨室呼叫，各室的值日轮流出外领取，反应过早或过晚都会惹他不悦，从而直接影响到领得的份量。因此，在快轮到我们五室时，值日总是做好充分准备，一听到看守出口喊“五室”，他们立即箭步跨上去，在瓢起饭落的一刻把瓦盆承接于最佳的位置，让看守以最佳的心情和势头把满满一瓢饭倒入饭盆。

通常，值日报出了本室的人数，发饭者便一瓢连一瓢如数舀入，那糊糊是半稀不稠的，舀得很快时会带起更多的糊糊，承接得越合适，得到的糊糊越多。若承接时笨拙迟缓，瓢在空中稍有停留，瓢中的糊糊就免不了有所流失。值日操作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所有同号的利益，每日领饭前，大家都拿出助阵的热情，在一边跟上值日一起紧张，给即将上阵的值日以饱含希望的鼓励。如果听他端盆子进来说今天饭稠，瓢上带的多，或舀进了几个面圪塔，大家便面带喜色，全室庆幸。若值日操作失当，致使糊糊有所流失，包括他本人在内，都会发出遗憾的叹息。现在么四和九号领饭进来了。今天的运气平平，值日开始给大家分饭。各人的饭碗排列停当，在每一双眼睛的注视下，么四一勺勺均匀地分饭，直到瓦盆内再刮不出一勺糊糊。但分配并没有结束，为防止分饭人给自己的或相好的碗内多分，现在由刘老师打点。那是放在布袋子内的几个硬纸牌子，上面写有我们全体同号的编号，在其中抽出谁的，就由谁打头端碗，接着按铺位顺序往下排。这样一来，每个人虽各有自己的饭碗，但分好饭经过打点，谁该端哪个碗则是说不定的。至于分饭的人，能得到的唯一好处是清洗瓦盆，他有权把瓦盆内所沾的糊糊刮入自己的饭碗。能够刮下来的糊糊少得可怜，算是大家给值日服务的

一点酬劳。尽管如此，所有的人都乐意在轮到自己值日时承担职责，不但把饭分得天平一样公平，而且把瓦盆刮得几乎像洗过一样干净。谁也不想放弃多吃这一口的机会。我自始至终没刮过瓦盆，我实在没那样的耐心，也懒得为多吃那么一点点饭而花费精力。轮到我值日，我常让么四代我出去打饭，我不愿意承担那么大的责任，也不想和看守那黑煞脸照面，因此连带可贵的分饭权利也一并让给了么四。么四世故精明，在每个人都饿得没精打采的号子内，他总是比其他人显得乐观和勇于进取，也比其他人更有兴致为改善自己的现状而付出努力。很难说他沾了谁的光，那些仅可塞牙缝的好处，应该说都是他用勤快的服务换来的。

五处是西安市最大的看守所，管理上据说较他处正规多了。坐牢当然没有任何值得庆幸的地方，我直接从二厂抓到五处，没经过分局的转移；而进了五处，又关到了东四排五室这么一个人缘关系较好的号子，不像廖亦武笔下的狱霸或刘青所描绘的红头所统治的牢房那么恐怖。因此，相比之下我还是深感幸运，为自己的造化不由得念一声“观世音菩萨”。到底是八十、九十年代的中国监狱和犯人的质量变得比六十年代更坏，抑或只是我个人的运气较好，正巧蹅上了五室那个比较平和的坐牢环境，因而侥幸避免了廖亦武和刘青曾经历的那些残暴，我实在无法在此下简单的结论。反正我坐牢蹅到的好人远比恶人多，所以我更喜欢把同号间和睦相处，一致维护公道的事情，以及号子内日常的有趣活动都如实记在下面。

白天一律不许在铺板上懒散睡觉，按规定，早饭后各人应安静坐在铺位上考虑自己的问题，也可以学习毛选或读唯一的一份《人民日报》。当然，这只是监规上的要求，实际上在这个号子内，我们的行动要松散放任多了。大约在一两点左右，腹内的糊糊早已消耗干净，在这最难熬的时刻，四点钟才开始发放的晚饭已提前显示出它温馨的前景。九号站在几床垒起的被子上扯长脖子观察窗口所切割的那一块天空，他在观察烟囱的冒烟情况，从而预告今日吃什么晚饭。我也跟上踮起脚跟看。九号指给我看伙房屋顶上竖起的三个烟囱口，说二号烟囱今天冒烟，下午有馒头吃了。这是他们经长期观察所得的判断，果然晚饭每人一个不黑不白的麦面馍，一碗不稀不稠的菜汤。水煮萝卜条的苦味很快就在我嘴里变得好吃起来，盐水汤上稀薄的油星也对我产生了色、香、味俱佳的效果。我一口菜一口馍地吃着，以正常的速度吃完拉倒。然后再喝碗开水，好把缺乏饱意的肚皮往大撑起一点，然后断绝杂念，强行压下依然很强的食欲，把满肚子的不适引向对下一顿饭的期待。

但同号们在享用晚餐上各有偏好，比如九号，他就始终以拥有一个贮存起来的馒头为他的精神支柱。直到新篜出来的馒头分到手，他才拿出上次所存的旧馒头吃掉，而到手的新馍，他总是小心地放进那个特制的馍兜，高挂起来。我很难想象他这样做有什么好处，他一口也没比别人多吃，反而每次得吃放冷变干了的陈馍，这样做何苦呢？他是不是想以此维持他比其他人都多拥有一个馒头的感觉，从而获得多吃多占的虚假满足？七号吃得很讲究，他给面前铺一块干净的手帕，用一条线——他称之为拉馍绳——把馍拉成片，再把片拉成条，炸薯条一般堆在面前，然后用一牙签般的小棒，扎起一条放进口，慢条斯理地咀嚼。大部分人早已吃完饭，他还在一边享用他丰盛的馍条。

据说每人每天的定量是八两粮，但实际吃到犯人口中的，肯定少于这个数字。而菜都是些长老了的或放蔫了的，禾草一样廉价买回来，连发黄的叶子与菜根一并入锅水煮。盐总是放得过重，再放些酱油和明油，既上了点像样的颜色，又给你带来尚存些许油水的感觉。这一点饭下了肚，很快就被饥饿的肠胃消化吸收，将其可转化为热量和营养的成分榨取干净，而可供排泄的杂质最后就所剩无几。所以我们这些坐牢的人大都没有多少粪便可拉出去。刚关进来，我肚内还有那点油水垫底，排泄的情况尚可，日子久了，遂同其它人一样严重地便秘，两三天才上一次厕所。上厕所可不是什么时候想去就可以去，只有等到放风时分才能去。每天放风总是很紧张，一室一室轮流放风，一次仅五分钟左右。这一室拖了时间会影响到下一室，也会延长看守工作的时间，所以看守把时间抓得很紧。他总是厉声吆喝着催促我们，门一开，我们拔腿就往厕所跑去。蹲下来憋气，鼓劲，挣得肠子要断了似的，才拉下来一点

硬如石子的屎蛋蛋。有时会肛裂流血，有时才挣出便意，看守便在外粗暴地吆喝，我们不敢再蹲下去，只好提起裤子往回跑，把没拉下来的留到下一次放风。我发现刘老师上厕所回来常常面带痛苦，他手掩着肚子，半瘫在铺位上将息，那死灰色的面颊在隐隐抽动，好像要塌陷下去的样子。他便秘得特别厉害，大便时不得不从下边往外掏，所以每大便一次，简直像蹲在茅坑上动了一次手术。他闭住气使劲挣，把自己憋得死去活来，回到号子，人就整个地累垮了。

坐在自己的铺位上，我常回忆小时候读过的监狱小说，大都写的是共产党坐国民党的监狱，“放风”这俩字的意思就是从那些书中了解到的。放风总是被描写成充满了交流机会的大好时刻：大墙内辨认革命同志，室外接触时暗中传递书信，互送东西，交换图书，接受党组织的指示，甚至三两个人凑在一起策划越狱，在狱中掀起暴动。总之，有关放风的情节，往往是小说中最激动人心的内容，想象着这露天俱乐部一样的活动场地，我以前甚至对监狱产生过革命浪漫主义的向往。

现在，我悔恨地检讨少年时天真的想象，参悟着命运的嘲弄，咀嚼着现实的苦涩。只可惜现在不是在小说上的国民党监狱服刑，而是在共产党的大牢里接受无产阶级专政。这新社会的牢房永远灰暗、冷酷和森严，根本就不存在小说上那些壮烈的斗争和历险记式的场面，连放风的时间都压缩到不够上一次厕所。从前国民党的监狱让共产党人钻够了空子，幸存者后来夺了权，因知晓漏洞百出的危险性，于是便把空子一一堵死，堵得像浇灌了钢筋混凝土一样严实。

看守们老是这样教训我们说：“坐牢要是舒服，不都想坐牢来了？把你关到这里头饿一饿，多吃些苦，就是要叫你知道喇叭是铜锅是铁嘛。”

二十一 提审

提审是我们待审犯人唯一的出路，早饭后阳光从窗子照得屋内特别明亮的时候，每个人都满怀希望，等待看守开了门叫自己出去提审。大约在我入狱后十天左右，看守带我出去接受初审。临行前，么四一再交待我一定争取见机行事，给大家多拣些烟头回来。么四的托付给我此行增加了一点刺激的内容，关了近十天，忽然蹓到可以出轨冒险的机会，我满怀跃跃欲试的心情。但一踏上那长长的甬道，我的心情又转为沉重。毕竟是前去接受审问，又不是出去拾荒，我问自己：他们掌握了我的什么情况？应该如何对付他们？想来想去，心里一片茫然。我只是蹓到冒险的事情胆子贼大，一旦要迎接严肃的较量，得动脑筋拿出明智的对策，我就陷入了惶惑。眼前的路一片漆黑，看来只有豁出去硬蹓硬了。

审讯室内果然满地烟头，主审者就是抓我的从干事，另一个年轻的坐在一边负责纪录。我在受审者的位子上坐下，那是一把固定在地面上的椅子，四条腿埋入了地下。为什么要这样装置？我不解地想了一想。难道是怕犯人在审问过程中像李玉和那样反抗，要防止我们突然提起椅子打他们审案的人不成？总之，这里的所有缝隙全部预先堵死，他们绝不给你留下任何偶然的可趁之机。我看一眼他们，再看一眼地面上的烟头，暂时还没有弯腰去拣的机会。

提审开始了：姓名，籍贯，家庭成分……那些表格上通常填写的栏目都例行公事地对证一遍。像我从前在学校接受辅导员或书记的问话那样，他们并不告诉我他们拘留我的理由，也不举出具体的罪行让我承认，而是叫我先主动交待。抓我的根据谜底一样攥在他们手中，现在我处于猜谜的位置，他们希望我交待的越多越好，“坦白从宽”的审问原则就是要达到这一目的。我从小在这有罪推定的审问语境中长大，只知道避重就轻往过滑，却从没想到我有拒绝回答的权利。没有人敢于抵制这种审问方式，因为抵制必遭到“抗拒从严”的制裁。这是一种等着挨打的处境，由于没有任何法律条文为我提供招架防护的起码条件，我能做的

便只有闪避或退缩，而避不过去了，就只得硬挨，人家打到哪里，我就挨到哪里。好像练就了挨打的内功，长期以来，我对自己的言行有了一套原罪检讨的思维习惯。为努力表现出老实交待的姿态，我甚至懂得如何列举些小小的罪过，以搪塞那严厉的逼供，甚至善于做出些不关痛痒的自诬性招供，好求得暂时的幸免。

我开始老实交待了，从去北京翻案谈起，扯到去师大贴大字报。他们打断了我的话，对我交待的这些鸡毛蒜皮，他们显然不感兴趣。他们开始主动审问我，从《现代人》杂志问起。这是一份被定性为“反动”的地下刊物，主编该刊的学生现在就在二厂当就业工人，而支持他编印的那个中学老师，逮捕后给定了个幕后策划的罪名，已在几年前作为现行反革命枪毙。我曾拥有一本油印的《现代人》，里面的那些诗文，我看充其量不过是情调浪漫，有些感伤罢了，不要说反动，连抨击现实和议论政治的边边都沾不上一点。然而竟遭了如此残酷的镇压！师大隔离审查我期间，保卫科曾派人到我家追缴这本反动刊物，我二妹吓慌了，她把那一大厚本倒了垃圾。他们再次一无所得，这坏纪录随后便进入了我的档案。为什么会提起这件早已结案的旧事？显然是想从我的历史薄弱点切入，一上来先来些旁敲侧击的恐吓。

接着，从干事话题一转，又提到二厂就业工人内有个文学社，问我参加了没有。我脑子里电击一样紧张了一下。我知道这种不明不白的小团体事件决不能陷入，一沾上边就有弄成反革命集团的危险。我想起了曾和几个在文化宣传单位工作过的就业人员一起聚会喝酒吟诗的事，我即席赋过诗，还记得有“登高目尽高墙内，举酒愁生酒盏心”一联。我心里不由得一沉，难道他们有人出了事？但我立即排除了这一可能。我发现从干事刚才提到所谓的文学社时，语气并不确定，他显然只是试探一下，似乎是想顺便从我嘴里诈出什么话来。见我决断地回答了“没有”和“不知道”，他们这普遍撒网式的审问便就此打住。

突然，从干事问我读过什么俄文书，都搞了些什么翻译。我一直担心的谜底终于暗礁一样露了头。没错，他们抓我肯定是为我写信借书的事情。我开始交代，说我给苏联莫斯科大学图书馆写过一封信，想借本名叫《日瓦戈医生》的小说。

“收到了那本小说没有？”从干事立即感兴趣地追问下去。

“没有，从来没有。”

他们不再向下审问，让我就在这里凭记忆复述那封信的内容，而且必须写出俄文原文和中译。他们去外面休息，我趁机拣起了地上的所有烟头。

几天后，再次提审，基本上是复核我的口供。谜底已经揭出，原来就是这么无聊的一件小事情。我在中学学俄语时，学校的共青团组织分发给我们很多来自苏联学生的俄文信，我也从中分得一封。是一个住在新西伯利亚城的女孩写的，她名叫柳妲，还附了一张坐在公园长椅子上的照片：小辫子，连衣裙，提着提包的手搭拉在膝盖上。我乘兴用俄文写了一封回信，但只是练习作文一样写了下来，后来压在抽屉里并没寄出。给莫斯科大学写信的想法便来自这一早先的经验。审问中我一再为自己辩护，说我并不知道给苏联写一封信有什么不妥，因为这曾经是受到鼓励的事情，而且是团委组织我们那样做的，是属于中苏友好的活动。对我的辩解，从干事置之不理，听他那口气，好像并不相信我写这封信仅为读一本小说。那还能为什么呢？他不再和我往下啰嗦，我已承认写信的事实，这就够了。至于如何定性，他说那是他们要上会研究的事情，我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回号子静候处理。 我给刘老师和么四谈了我的案情，他们都宽慰我，说这一点点事也许够不上判刑，说不定关到元旦或春节前放人的时候，就把我放回去了。但一号不完全同意他们的估计，他在这里经过的事多了，他认为不可过于乐观，因为这写信的行动，就事实而言确实很简单，但如何定性则有很大的伸缩性。他说：“苏联现在是社会帝国主义，成了中国的头号敌人，再也不是当年的老大哥了。为什么一年多之前截获那信的时候不抓人，偏偏等到现在苏修派兵占了捷克才抓人，这显然说明，定案的依据取决于中苏关系的变化。犯罪事实归事实，定性量罪常取决于当前的政治形势。什么小事都可以夸大，什么大事都可以化小。总之，苏修现在和中共翻了脸，两国的

冲突成了敌我矛盾，我们现在推断问题绝不可忽视这一重要的出发点。”

因此一号认为，他们若给我定个里通外国的罪，咋够不上判刑！他说根据他多年坐牢观察到的事实，一般的情况下，公安局只要抓你进来，就不会轻易放你走人。放人等于他们自己打自己的嘴，所以抓进来的人多少都会判几年的，哪怕判错了判重了。“进来容易出去难啊，”一号叹息着，最后有把握地对我说：“你的案子很快就会有结果，就耐心等着吧。”

二十二 精神会餐

么四用我所拣的烟头卷了两支烟。要享用这两支烟，最麻烦的事是取火。这一艰巨的任务由九号和六号负责执行，我在一旁好奇地看他们怎样取火。九号做准备工作，他先从我的褥子内掏些棉花，再从我们扫地的笤帚上折些纤细的高粱穗子，然后用棉花裹住穗子搓成条，置于铺板上。接下来的工序由六号完成。他用砖头压住棉花条飞快地搓动，不一会就闻到轻微的糊味，这时他立即把那发黄的棉花撕开轻轻晃动，渐渐扇出了烟，于是用口轻吹，最后吹出暗红的火星，对上烟吸几口就点着了。搓到冒烟的程度很容易，但吹出火来很难，吹得不及时或太过火都吹不着，我们失败了多次，丢下一堆废弃的棉花和穗子，直到操作上不断改进，最后才算大功告成。吸烟和取火都是违犯监规的事情，刘老师对我们此举自始至终持谨慎的观望态度，他不想扫了大家的兴致，虽没有制止，却对万一事情败露后的责任问题流露出深远的担忧。

我初入狱曾一度苦受烟瘾发作的煎熬，一想起我那包暂时收存在看守所的钻石牌香烟，就后悔事先没把它收藏妥当。有时我会呆坐在铺上假想那包烟如何带进了号子，自己给自己勾画过瘾的乐事。但饥饿很快就压倒了想抽烟的欲望。抽烟者常说，“饭后一根烟，赛过活神仙”，这说的只是我们平日饭饱食足，满肚子油水时享用香烟的快感。每天喝玉米面糊糊，且只能喝个半饱，抽烟的感觉就大不相同。从六号手中接过点着的烟，我猛吸了两口，不但没有丝毫快感，反而感到一阵强烈的恶心。没想到空肚子吸烟，竟引起了如此严重的过敏。我头发晕手发麻，恶心得干呕了几下，躺在床上难受了好久都缓不过来。

天凉了，家里给我送来过冬的衣物，母亲在新送来的褥子里层特意多加了些新棉花，号子内现在就数我的褥子又厚又大。我对大多数同号勤于纺织的劳作很感兴趣，但我并不想亲自动手参加他们的劳作，我贡献出我的褥子，让他们从中随意取用他们所需的棉花。那是最原始的纺线方式，左手持自制的纺锤，右手将其旋转起来，边转动边从棉花中引出纤维，用拇指和食指捻成线缠绕起来，再用所纺的线合成更粗的线，最后编织成各种用品。我得到他们为我编织的袜套。平时我们基本上在铺板上活动，很伤袜子，在袜子上再穿上自制的袜套，就像登上一双软鞋，耐磨，保暖，而且舒服。

他们另一个了不起的制作是自造铅笔。牙膏瓶均用锡皮制成，其顶端较硬的部分据说含有可做铅笔的成分。他们先把废牙膏瓶的顶端切下来，经过捶打，用碗边将捶打成条状的锡皮反复研滚，直至滚成铅笔芯那样粗细，再将此笔芯用自纺的线结实捆绑在磨制得圆滑的小木棍上，一支笔便算制造成功。

狱中向来不准犯人手中有笔，即使是要求你在号子内写交待材料，所发的笔用完后也总会立即收回。这里面不许我们拥有的东西基本上为防止两种危险，一是怕犯人自杀，二是怕他们逃跑，比如不准我们拥有皮带和鞋带，就是有意让我们行动不便。但他们暂时收走皮带和鞋带的作法是徒劳的，我进入五室后，么四很快就用自纺的线为我制做了很结实的腰带和鞋带。然而不准拥有一支笔的用意何在，就很难想象了，难道我们能用笔自杀！家里给我送来的白纸甚多，我开始用自造的铅笔在纸上书写。我纪录么四口述的精神会餐内容。么四喜欢在饥饿时谈论与饮食相关的话题，我们称此类交谈为“精神会餐”。他反复给我讲西安城

内四大街上著名餐馆的分布情况，从东门到钟楼，再延伸到西门，又从南门到钟楼，再延伸到北门，我就按这样的路线挨个纪录么四讲给我的餐馆名称，以及各自独特的饭菜。我还根据他的讲述写出数页西安回民食谱，从腊羊肉到羊肉泡馍，从羊肉饼到蜂蜜凉粽子，对每一种食物的特色及其制做过程都做了详细的描绘。

么四的西安饮食导游录激起了我很多亲切的回忆，除了记他所讲的食物和饭馆，我也记了我小时候一些难忘的饮食经历。大跃进以前的西安街市是令人回味无穷的，单单在我们所住的开通巷一带，临街开餐馆的，沿街摆摊子的，担上担子挨家挨户叫卖的，各类小贩所卖的小吃，在不同的季节和时辰就各有不同，花样多得简直叫人应接不暇。大多数食物都很便宜，有的仅花几分钱即可买到手。冬天的早晨，学校门口的摊子上卖枣模糊和杏仁油茶，舀在碗里热气腾腾，喝下肚子浑身暖和。油茶若加了钱，还会给你泡上一个麻花。枣模糊喝不饱，则可以吃一套烧饼夹馓子。1956 年公私合营以前的西安城，粮食还没有定量供应，繁荣的饮食业服务依然保持着 1949 年以前古朴的淳风，买甑糕可用竹笋皮包上带回家中，腊汁肉一律用墨绿的荷叶包裹。骡马市卖的稠酒用红铜壶烧滚，盛在蓝花粗瓷碗内，加上一点黄桂，甘洌中别有浓厚的腻香。凉粉纯白，多盛以黑瓷浅口碗，必浓调油泼辣子和大蒜，尤讲究重放不稀不稠的黄芥末汁，红筷子挑起来吃一口，一股子辛味便窜入鼻腔，呛得人能流下眼泪。冬天的晚上，看完戏或电影回来，走到巷口的摊子上，往长凳上一坐，花一角钱即可吃一碗酸辣绿豆丸子汤。东关的时辰包子像馒头，好处是油而不腻。西大街的粉篜羊肉又膻又麻，吃的时候要配上生蒜瓣。还有街灯下油光光的烧鸡，独轮推车上染了红颜色的羊杂碎。烟熏色的梆梆肉则放在特制的木盆内，揭开盆盖子，就好像剖开猪肚子露出了满腔的内脏：心肺、肝子、大小肠，全都摆在位置上。可惜自大跃进以后，所有这些地方风味的小吃都在市面上绝了迹。

我自住进园子，常年跟祖父吃素，习惯了素食，也慢慢品出了“香积厨”的淳味。春天，园子南墙角的香椿树刚长出绿中泛红的嫩芽，祖母采回来凉调豆腐拌香油，一丝淡淡的清苦，后味却带出了草木新嫩的微甜。夏天吃酸汤面，到后院的花椒树上连枝带叶折一串花椒放在汤里，清汤上红绿相间的颜色漂着，吃得人寒毛眼麻酥酥地凉。深秋，从地里收回见了霜的老南瓜，清蒸，又面又甜；红烧，有糖炒热栗子的干面；若剁成馅篜包子，多放些五香粉，别有任何肉包子都不能比美的鲜味。冬天我们天天都吃胡萝卜，祖父说胡萝卜最有营养，他美其名曰“小人参”。红烧胡萝卜，要切成块多放酱油和味精；凉调则切成丝，和白菜心拌在一起，红白相间，杂有嫩黄，是喝红豆稀饭时最可口的凉菜。祖母在夏天特制一种清凉饮料，她摘嫩竹叶，未盛开的金银花，还有粉红的绒线花，把这些东西晾干，饮用时就拿来泡入开水，泡成淡黄的颜色，放少许白糖，喝下去可以清火败毒。祖父则常年喝何首乌茶。偏院的土墙下长满了何首乌藤，秋天，我挖出那红薯一样的块根，洗净，晾干，必须用铜刀把它切成片，加上黑豆，九篜九晒，都乌黑得中药一样，然后就可以泡药茶喝了。祖父告诉我，从前有一家人姓何，全家人长寿，活到老头发都不变白。原来他家的井里长出了一根老藤，他们的乌发就是常年吃那井水的缘故。从此那种藤便叫何首乌。何首乌的块根分两种，有白心的，有红心的。按祖父的说法，白的补气，红的补血。

祖父怎么样了？我入狱已一月有余，他还等着我给他去西安饭庄买八宝甜饭呢。我何时才能出狱？祖父等得到那一天吗？

自造铅笔对我更大的帮助是学习英文。刘老师解放前教过英语，他虽坐了好几年监狱，对英文词汇的记忆仍十分精确。他在我毛选四卷的空白页上给我分类编写英汉词典，每到两顿饭之间那难熬的漫长白日，我就靠背单词打发时间。不久家中按我的要求送来了毛主席语录和诗词的英译本，监狱当局只许我们读毛主席著作，毛著的英译本因此成为我阅读英文文本唯一可凭借的材料。

我的另一个老师是一号，听说他写一笔好字，我于是打算跟他练习书法。我向一号提起

我的计划时一切尚属空想，因为自造的铅笔并不能解决写大字的问题。对我的空想，么四和九号提出了他们大胆的设想，说他们可以试着利用现有的条件自造毛笔和墨汁。毛笔杆取自笤帚，笔头的制作颇费了一番心思。么四从他的皮大衣上选取一撮黑羊毛，但纯用羊毛做成的笔头太软，无法挥毫书写，需加入有一定硬度的毛，才可以写出清晰的笔划。我说我的头发很硬，我愿意把自己的头发贡献出来。于是由么四在我头上一根根拔去不少头发，把头发与羊毛掺和在一起，制成一支挺像样的大字笔。制造墨汁的方案由九号提出。他有一条黑土布裤子，为土制颜料所染，那裤子每一次洗涤都严重掉色，因此九号认定可从中提纯出墨汁来。他先把裤子在水盆中泡上几天，把那盆墨黑的脏水加以沉淀，倒掉上层的清水，最后在盆底留下颜色稠浓的黑水。再经过反复沉淀分离，把最后所得的黑水盛入肥皂盒，放在窗台上蒸发一周之久，最后便得到可挥毫书写的墨汁。

现在我们要看一号的书法了。一号提笔蘸上肥皂盒中的墨汁，开始在我的白纸上为我书写字帖。纸展在铺板上，他悬肘而书，虽然那笔头不够硬，墨也不够浓，他还是写出了很有工力的颜体大字，粗壮的笔划饱满有力，丰润的墨韵凝聚着骨鲠的架子。有了字帖，我该如何练字仍是一个问题，我们不可能不断自造出墨汁来，也没有那么多的白纸供我书写。刘老师出了个好主意。我们的铺板可不同于一般的床板，多少年来犯人天天在板上活动，板面已磨得非常光滑，加上汗气的渗透，体温的烘暖，年深月久，那木板如上了清漆，光滑的板面在阳光下几乎都能映现出人影。刘老师认为那板面就可充当我临帖的纸，他放一碗水在一边，提笔蘸水，给我示范。果然那潮湿的笔划在汗水润泽得发出暗红色的板面上留下了痕迹，甚至有微微凸起的效果。我开始在板面上写字，写满一帖字，用抹布擦掉，再以同样的方式写下去。

我的功课每天都排得很满，早饭后我跟刘老师一句句朗读毛主席语录英译，背生词，再自己练习拼写，有时还让刘老师给我听写。正午时分，我端一碗水练习书法。天渐渐冷了，老坐在铺位上不活动，身上一阵阵发冷，活动太剧烈了，又容易疲倦。我有时和么四在过道上跳三步或四步的交际舞来活动脚腿。我把《外国名歌二百首》中我会唱的歌挨个唱下去，有“深深的海洋，你为何不平静”，有“山楂树”，有“一条小路弯弯曲曲细又长” ……我们放缓了节奏，在门和尿池之间，两个人来回地进退。

每到午后，所有的人都开始精力不济，情绪低落，这时候，受到饥饿侵蚀的身体就像快熬干了油的灯焰。刘老师那没有血色的脸在此刻显得特别死灰，他靠墙瘫坐在铺板上，不自觉地从喉咙间发出微弱的呻吟，总是在这腹内最空虚的时刻，他肚子绞痛。一号的身体已磨练得适应了狱中的生活，他终日盘腿而坐，在自己的铺位上闭目养神。他脸色暗褐，人虽消瘦，却不失其硬朗的架子。七号和九号常忙于编织，我褥子内新添的棉花已给他们掏去了很多。么四精力最充沛，他总有有趣的话题讲给我听。他在回民坊上一直是打架闹事的头子，也是个大玩家，浪荡子，讲起解放前他那些年轻放荡的经历，常听得我暂时忘了饥饿。他打架坐过国民党的监狱，出入过各种妓院，每讲到兴头上，他就低声唱起那些娱乐场所的流行小曲，并描述起当时的妓院和舞厅在城里的分布情况。循着他讲述的地图，他导游我穿越西安市的大街小巷，从菊花园冶游到开元寺，一次次返回他记忆犹新的旧社会。

六号在同号中显得最为孤独，他是个惯窃，不知已几进几出监狱大门，这一次是挖穿了银行的墙壁行窃时被捕的。听说我来自二厂，在他眼中，也算是有点劳改队经历的人，因此喜欢给我讲述他在陕北马栏农场柳树坪站劳教的往事。他特别提到那里出产的土豆和苹果，一再回味种土豆的季节和收苹果的时候放开肚皮吃土豆和苹果的情况，听得我对那地方有了模糊的神往。犯人的处境就是如此可怜，随着获释的希望日益渺茫，我又开始给自己编织尽可能从轻发落的前景。比如，六号所说的马栏便为我未来的去向提供了可供想象的蓝图，我甚至暗自设想，他们要是真的判了我，能把我送往马栏农场，我看就很不错了。

我们号子内彼此相安无事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很久，后来在一次由我引起的打架事件中，

我们辛勤经营的一切全遭到了破坏。

么四和六号早已有隙，自从我来到五室，我发现么四对六号便持警惕的态度。他说那家伙是个盲流，与我们有家有户的人不同，属于亡命之徒，蹚到关键时刻会翻脸不认人的，所以说话做事得对他多加提防。六号的铺盖为监狱所发，被子内薄薄一层劣质棉花，日子久了，早粘连成一团一团的，有一处棉花集成一堆，有一处只有被面被里两张皮。天已经很冷了，他请求看守所发放的被子一直都没发下来。每天晚上钻进他那两张皮被子，总冻得他缩成一团。因此，睡觉前他总要关上号子东北角上那唯一的窗户，好挡住冷空气流入，以保持室内的温暖。但这小小的窗户也是我们号子的出气孔，关上窗户固然会暖和一些，室内的空气却因此变得很坏，尿池的尿味和常年未拆洗的被子的臭味混在一起，让人感到胸闷和头昏。对于被褥暖和的我来说，关闭窗户的坏处自然就显得十分突出。这样一来，关窗的总是六号，开窗的总是我，我们俩的一开一闭闹下来，慢慢就形成了对立，也在我们之间积累起敌意。刘老师劝我不要和六号在关闭窗户的问题上较劲，他认为毕竟六号的铺盖最差，他关窗户不过图个保暖的效果，无论怎么说都是有情可原的。但么四在一边煽动我说："他扒窗子可是不轨的行动，你就是揍了他你也没错。"因为那窗户很高，大概只有我一人踮起脚伸手能够得着窗扇。六号个子较矮，他每一次总要跳起来手扒住窗台，引体向上，再抓住钢筋，几乎爬上窗子，才能够关上窗扇。

有一天晚上我们俩较上了劲，我开他关，我再开，他再关，一来一往，气得六号脸红脖子粗，他怒不可遏地和我争吵起来，骂我"反革命"。我被他骂恼了，便与他扭打在一起。已是夜静时分，我们俩在铺板上的响动引起其他人介入，也惊动了站岗的警卫，很快值班看守就闻讯赶来。面对一高个和一矮个的对比，看守首先不悦地问我为什么动手打人，我说他夜里扒窗户，我干涉他，他就和我打了起来。看守一听扒窗户，转过去便对六号一脸凶气。六号平时说话就不太流畅，看守问他扒窗户干什么，他结巴着说不清楚，看守马上就斥责他："你狗日的想逃跑咧！"说着就向其它人询问六号的表现。么四立即从角落跳出来揭发六号，说他经常扒上窗户向外张望，并从六号的铺下拿出一枚大钉子和用布缕搓的绳子，交给看守。钉子是六号从铺板下松动处拔下来的，他准备磨制工具，绳子他说是捆行李所用。但这些都是号子内不许拥有的东西，而上窗户乃狱中大忌，人证物证俱在，六号现在已逃不脱越狱的嫌疑。关于关窗户保暖的辩解，六号自知，至此已毫无意义，所以他完全撇开我，立即把矛头直对么四。他显然平日已观察好么四的动静，心里早给他记下一本账，因此一出手就从铺板的隐蔽处捞出么四磨制的一把小刀子拿给看守。接着他咬出了么四带头卷烟的事，么四则反咬他毁坏笤帚搓棉花条取火。六号被么四咬急了，他不分青红皂白，什么鸡毛蒜皮的事全都给抖搂出来。先是从我挂在墙上的包内拿出字帖和毛笔，向看守告我们自造毛笔和墨汁练习写字的活动，然后又咬么四和我在室内跳舞，还咬大家在一起纺线搞编织。他们俩咬来咬去，几乎把所有出格的活动都陆续揭发出来。

我们的日常活动让我们自己给捅了个大洞，一切都败露在管理员面前。第二天早饭后，锁子一响牢门打开，一下进来了数名看守，给我们号子来了一个大搜查，我的铅笔和毛笔，纺织工具和编织物，我们自造的一切东西全被收走。么四和六号当场被扎上背铐。六号的罪名是逃跑嫌疑，么四的罪名是带头从事多项违犯监规的活动。管理员手拿铐子在我眼前晃荡着，厉声警告了我，说我再不规矩，下一次就轮到铐我。一号和刘老师属于知情不报和有所参与，因此也挨了训。

现在全室七人中有两人暂时成了废人。他们扎上了背铐，双手和手腕很快就发青肿胀起来。背铐就是把双手背到后面，紧套在铐子上，手越动铐子会越紧，最后紧得没有任何活动的余地，身上任何一个不合适的扭动都会引起被铐部分难堪的疼痛。六号不分对象的乱咬触怒了所有的人，他的饭分到碗里，但一直没人给他喂饭吃。他的态度还很强硬，始终不求人，刘老师实在看不过眼，端起已经放冷的糊糊，给他一口口喂了下去。我专职给么四服务，不

只给他喂饭吃，还照顾他小便，给他掏出来装进去，代理他操纵撒尿的整个过程。特别是晚上，戴上背铐根本无法睡觉，躺也不行，爬也不行，无论什么姿势都很掣肘。就是曲起腿侧身伏卧片刻，那向下卧去和再次起来的过程，也全得藉助别人的扶持。因此，两个人戴了背铐，闹得全室人都跟上受累。直到第三天，六号突然昏了过去，我们齐声大喊，叫来了看守，两个人的铐子才一齐卸掉。一号用劲掐了六号的人中，过了一会他才慢慢苏醒过来。目睹他们受背铐的折磨，我非常内疚，我很后悔不该如此多事和好强，更不该仗自己长得高大，和六号这样的盲流过不去。狱中的生活质量，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同号间关系的好坏，我自己无事生非挑起了事端，结果害得我们全体室友辛苦经营的活动全遭到了破坏。

窗外有一棵树，正好从窗口可看见它稀疏的枝叶。我关进五室时树叶还是绿的，后来目睹叶子日渐变黄，一片片落去，直到现在剩下空枝。两个月过去了，已进入十一月下旬。一天晚上大约八点左右，他们谈到了狱中放人的事情。有人举出自己的耳闻，说晚上常为放人的时候，理由是释放犯走出监狱大门后不易引起行人的注意，对维护城市的形象很有好处。谈论的同时，我们几个人之间也都提前委托，互相约定，谁先获释，一出去便去仍在坐牢的人家中传话报信。我受了刘老师的委托。刘老师告诉我，自从大抄家至今，两年多他都没有妻子儿女的任何音信，他为此特别焦心。他家就在南门内，离这儿步行不过十几分钟，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像闷在活棺材里头，他一无所知。

么四又在重复他精神会餐的内容，他光顾餐馆的路线正说到端履门口。现在，他已走进了西北电影院对面的中华甜食店，他说他先叫服务员端一碗黄桂热醪糟上来。正说到这里，门突然打开了。看守在外面叫道："二号，收拾行李，带走所有的东西，赶快出来。"我还没反应过来，么四已喜出望外，他恭喜我说："老二——他总是这样亲切地称呼我，你走人了，今晚上还能赶上去中华甜食店喝一碗热醪糟呢。"几个人都给我道贺，他们七手八脚帮我把行李收拾好，放到门外。我也自以为马上就要离开五处，临出门时耍了个大方，主动把我那又大又厚的褥子留给么四保管，说留下来供全号成员将来纺织之用。

门在我背后沉重地关上，我隐隐约约犹听到么四在门内向大家感叹道："老二今晚要到中华甜食店喝热醪糟去了…… "

二十三 妄图与敌挂钩罪

我背上铺盖大包，经甬道走出上有哨楼的大门，看守把我引入一间宽大的办公室。我诧异而失望，怎么没见二厂的干部？听说在一般的情况下，监狱当局总是把要释放的人交给原单位领回去的，现在的情景显然不像放人的样子。只见我的提审员从干事坐在沙发上，另一个年轻的干部见我进了门，便走上前来，叫了我的姓名，说是鉴于我交待问题较好，态度还算老实，他们已决定对我从轻处理。听到这两句话，我下沉的心又上升少许，有了瞬间的轻松。会不会向我宣布释放？我正疑虑着，那人已拿出打印好的纸快速向我宣读起来。灯光下我心神恍惚，没听清楚宣判的整个内容。我总是在关键的时刻走神。那人读完了，把一式三份判决书放在我面前让我签名。我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这才看清楚，所得到的那个宽大处理是劳教三年。对判决书中的案情描述和定性，我很不服气，就指着判决书对那人说："这里面有些说法不太符合事实，我不能糊里胡涂就在上面随便签名。"他威逼说："你不签？那咱们今晚就这样僵下去，我们有工夫奉陪到底，但到头来吃亏的只能是你自己。"我仍然站着不动，想僵持下去。他接着说："别把这签名看得太认真，要你签名，只是走个手续，你就是不签，判决也照样生效。不过，我得实话给你说，你要再这样顽抗下去，落个不认罪服法的罪名，那就等着上面给你加刑吧。"他说得我无话可说，我那强作的抗拒姿态终因缺乏信心的支撑而软了下来。最后我还是签了名，拿上归自己保存的那一份，跟上看守来到了东二

排的判决号。

这时我才发现，刚才把褥子留在五室供他们纺线使用，真是十分糊涂的做法，现在若不拿回那褥子，今夜，乃至以后所有的晚上，我就只能身子贴住光铺板睡觉了。我立即对看守说，我把褥子忘在了五室。看守并没有让我自己去拿，他在这新号子另叫了一个犯人，几分钟后，我的新同屋带回了我那依然厚重的褥子。么四他们该怎么说呢？他们还念叨甜食店和热醪糟吗？这判决号就是我的甜食店，这份判决书就是我的热醪糟，它的苦味够我今晚上慢慢咀嚼着硬往下咽了。

号子内的电灯总是通宵不熄，这一夜，我平生头一次在灯底下大睁着眼睛直到天明。我先是对着那粘有灰尘的灯泡发呆，呆看了很久，直到看累了眼睛，脖子也开始发酸，然后才拿出判决书反复细读，越读越觉得满头针扎一样刺痛。那一年去北京上访，我在建材部接待站写申诉材料，为获得平反，我曾认真引用过毛主席语录。我以为只要引用得当，那“最高指示”就是我应获平反的有力依据。讽刺的是，现在市公安局军管会判处我三年劳动教养，定罪量刑的依据居然也是毛主席语录。我把目光集中到判决书的顶端，那是时下各类文件的统一格式，不管什么内容，首先要印上针对性的毛主席语录。我从那段语录读起：

最高指示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

把这条“最高指示”冠于判决书之首，就是把它奉为司法的纲领，用它来做判处我劳教的有力依据。下面判决内容的题目是：“对反动分子康正果劳动教养的决定”。这“反动分子”就是对我的定性，对照上面的语录，我现在这个“反动”显然已升了级。师大开除我时称我为“反动学生”，那时我的“反动”，按他们的说法，主要还是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尚属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现在按照所引语录的划分，我的问题已上升为“敌我矛盾”。我往下读去，判决书的第一段简述了我个人的反动履历和反动的家庭背景：

康正果，男，年二十四岁，陕西省临潼县华清公社胡王村人，汉族，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学生，大学肄业文化程度，家住西安市开通巷八十号。其祖父康寄遥，地主分子，父康申生，系劳改释放犯，释放后在市自来水公司工作，现被群众揪斗。本人从一九五一年九月至一九六三年七月先后在开通巷小学、市八中、二中读书，一九六三年九月至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在陕西师大中文系读书，因思想反动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被师大开除回家。一九六五年三月到地方国营西安建安建材厂当工人，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九日依法拘留。

一人犯法一人当，与他的家庭及长辈本不应有任何连带关系。但现在是贯彻阶级斗争路线的新社会，阶级斗争论者常说水有源，树有根，我个人之所以反动，根源肯定在我的父祖身上。因此，判决书不但处处要突出我的反动与我那个反动家庭的关系，而且按照其判词的叙述模式，我的家庭及长辈的现状，也都要一一描述成我活该判罪的主要根据。仿佛在搞陪斗，定我为反动分子，自然免不了把我祖父的地主分子帽子和父亲的前科犯身份抖搂出来。这样才能构成我的反动谱系，也从而证明我个人的反动具有阶级和家庭的根源。就为了证实这一“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逻辑，他们甚至不惜夸大事实。我父亲解放初曾因吸毒被本单位送到戒毒机构关了一段时间，其实并没有正式判刑。给他笼统扣上个“劳改释放犯”的恶名，就是要把我们祖孙三代人全部抹黑。这样一来，我这个反动分子便与我的有问题的祖父和父亲一脉相承，形成了毛主席语录中所谓的“反动阶级”，而有了我们这些人的存在，就更能证明这个以压迫为任务的国家机器行使其专政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了。第二段描述我的罪行：

经查，罪犯康正果被开除学籍到建材厂就业，仍坚持反动立场，表现不规，藉文化大革命之机，进行翻案活动。尤其严重的是，该犯于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以西安外语学院康振国名义，直接给苏修莫斯科大学图书馆去信，索取已被我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人民日报揭

发批判的叛徒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写的反革命小说《日瓦戈医生》，并借机歪曲和攻击我们对反动小说《日瓦戈医生》的批判，妄图与敌挂钩，进行反革命活动。依据《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的精神，决定对思想反动，妄图与敌挂钩的康正果劳动教养三年。自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九日至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八日止。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盖章）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我的被捕与判处三年劳教，仅因我写信往苏联莫斯科大学图书馆借阅一本小说。但判决书有它的行文模式，按照其叙事的逻辑，我写信索取那本“反革命小说”绝非一个偶然孤立的行动，而是我一贯反动的结果。为在叙述上造成必要的铺垫，对我以往的情况，判决书便用“坚持反动立场，表现不规”这些惯用语增强渲染，并特别点出我“进行翻案活动”，以此作为我“不规”的一个具体表现。文化革命最初即起于抨击右倾翻案风，这个以镇压为宗旨的政权从来也不许受害者翻出旧案，提出甄别的要求。翻案就是不认罪的表现，它本身即构成了重新犯罪，乃至罪上加罪。我回忆起去北京告状的前前后后，心想，说不定我这次突然被捕的起因就和我当初去北京上访有一定的关系。我投给中央文革的申诉材料会不会被退回二厂？会不会就是这份材料引起中央文革，乃至厂方的恼怒，结果促成了我的被捕？在昏黄的灯光下仔细琢磨判决书上的每一句话，我就像头困在笼内不断打转的野兽蹭着一根根铁栏发晕，死抓住一点点贫乏的信息反复地想象和分析，企图从中悟出我惹祸的根源来。

我给苏联莫斯科大学图书馆写信，公安局怎么知道？他们是根据我自己的交待判我有罪的，还是逮捕前早已掌握了所有的情况？至少从“该犯于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以西安外语学院康振国名义，直接给苏修莫斯科大学图书馆去信”这句话可以看出，他们手中有我的原信。原信是用俄文写的，我当时自作聪明，想打个掩护，确实在信封上的发信地址栏写了“西安外国语学院”。我的姓名也由俄文拼写，我并没有用什么“康振国”的名义，是他们把“康正果”的俄文拼写还原成“康振国”，藉以诬蔑我假冒姓名。然而由此也正好看出，他们直接从邮局截获了我寄往苏联的信件，早已给我立案。

再往更深处推想，渐渐才悟出，邮局内肯定有公安局所设的机构，专门检查国际邮件。这就是说，所有的来往邮件都逃不脱严密的过滤。我真傻，我完全是“此地无银”的做法，信封上虚拟了一个公家单位的地址，信内却写了我的真实姓名和地址，还指望对方收信后寄来那本我要借阅的小说。我做梦也没想到，我那封信从邮箱取出后，经过检查，直接就落到了公安局手中。信根本就没有发出去，随后他们即凭那封信上的地址弄清了我的下落。但为什么一年多以前写的信，直到一年多以后才对我下手呢？这一点我想来想去，始终没有想透。

“妄图与敌挂钩”的定性实在让人费解。苏联与中国的关系确实越来越坏了，“敌”这个定性就算可以成立，但“钩”又是怎样挂的？“与敌挂钩”的罪行总得涉及到提供情报之类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向一个大学图书馆借一本小说也能算作“与敌挂钩”吗？我到底向敌方透露了什么国家机密？又从敌方得到了什么好处？要说透露，也就是《人民日报》报道苏联正式出版《日瓦戈医生》一书的消息。公开的新闻也要保密吗？

就为了读一本书，一本根本没借到手的书，落了这么大的罪名！我开始后悔了，一万个后悔，好像有一万个绣花针扎在头上，扎得我头皮阵阵刺痛，多次从铺上无奈地坐起。我觉得这个法犯得太不值得。先是给李稚敏写信受了牵连，落了开除学籍进劳改窑的下场。现在又是因为写信，升级成劳教三年的反动分子。躺在铺位上，我越想越懊恼，这些年父母告诫我责备我的话像一波波浪头涌上心头，撞击得我揪心地疼痛。我面对墙壁默默地自责：都怪苦学外语，想搞翻译的念头害了自己。当初若不懂俄语，怎会有今日的下场！想到了这一点，我一骨碌爬起来，把枕边毛主席语录的俄译和英译收拾起来，全塞入了包袱。要不是害怕落上毁坏毛主席著作的罪名，真恨不得立即把那两本红宝书统统撕碎，扔到墙角的尿池中去。

我对自己说：从今后我再也不想看到外文书籍，再也不要学外语了

二十四 判决号

判决号是个寄押处，也是中转站，判了死刑的关进来等枪毙，判了徒刑的由此送往劳改队服刑。号子内流动性很大，经常有人离去，也不断有人进来。进来的人都拿着刚到手的判决书，像我一样反复地呆看，或喊冤，或悲叹，或坐在墙角自言自语，对漫长的刑期做无奈的计算。所有的人无不抱怨判的太重，但人人都羡慕我判的很轻。他们说抓到五处多少都会判几年刑，像我这样判了劳教的，实在是个例外。劳教怎么了？劳教就不服刑了？他们这些可怜虫准是相信了文件上的说法，以为劳教不属于刑事处罚，好像它真的就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一种方式，真的属于所谓的“最高行政处分”。这一十足公文式的定义，我早在二厂就听说过，至于那“敌我矛盾”到底如何“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至少从我眼下在这判决号受到的待遇看不出有什么“敌我”和“人民内部”的区别。

劳教为“劳动教养”的简称，据说是五七年反右后出现的新生事物。那时候党在全国范围内制造了五六十万，甚至近百万右派，为把这些没有任何刑事犯罪事实的思想言论犯合法地送去和劳改犯人一起改造，党便责成人民政府及时公布了《劳动教养条例》。该“条例”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签署，从此便定为一种全国范围内的惩罚制度。正如糊弄猕猴的老人用“朝四暮三”代替了“朝三暮四”，“劳动”俩字后面的“改造”只是换上了“教养”一词，那同样剥夺人身自由和公民权利的苦役竟有了党国体制内特有的人道主义性质。名曰教养，不就像教育和培养下一代那样嘛，是需要做长期耐心的工作的。按照《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解释，“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改造的行政措施，”他们“只是受到管制处罚”，与“徒刑的受监处分”不同，所以那条例起初执行的时候，劳教人员所受的“教养”并没有期限。党的政策向来重在表现，你什么时候改造好了，党就什么时候给你放人。但很多被认为还没有改造好的劳教人员，对不起，政府要对他们认真负责，只好让他们继续改造下去。然而共产党的事情总是计划没有变化快，随后困难时期来了，饥荒与不景气迫使各单位精简人员，本来计划要长期关押的大量劳教人员，政府养活不起了，这才把一部分人陆续遣散出去。随后经过一番调整，劳教也像徒刑那样有了年限。幸好轮到我判劳教的年代，无期改成了有期，规定最多只判三年，而这一点也就成了判劳教轻于判劳改的一个明显标志。然而惟其属于轻量级，判一个人劳教便比判刑容易得多。判刑再草率，也得有个法院审理的形式，判劳教则全由公安局一手操办。有时甚至由单位领导和公安局事先取得联系，直接就可以把本单位的某成员送去劳教。《条例》上讲的很清楚，劳教分子甚至可被定义为“受到国家行政机关的强制处分的人”。比如有些人仅因为和单位领导发生个人冲突，那领导就可以给他们扣个“无理取闹”的罪名，打电话叫来公安局，直接便把他们送去劳动教养了。

判决号所在的东二排离干部院较近，从每天高音喇叭播放的广播新闻可以听出外面局势的变化情况。那是 1968 年岁末，大运动中套了小运动，“三结合”的革委会正在纷纷成立，同时也搞起了“清理阶级队伍”，又一波“严打”由此掀起，监狱内送来的犯人随之突增。在我们号子内，自从我进来后，就一连串来了几个所谓“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罪名的犯人。

一位中年人来自东郊某国防工厂，人长得瘦小而衰弱，是个科室干部。他说不久前一次政治学习中，他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听其他同事发言，无聊中拿起一枚大头针在面前的《光明日报》上随意乱扎。其间他出外上厕所一次，坐在他旁边的一个同事顺手拿起那张报纸阅读，那人也真够眼尖，一眼就看出大头针所扎的报纸背面是毛主席头像。众目睽睽之下，毛主席头像上扎了很多小孔！这一发现立即被作为现行反革命事件上报组织，这倒霉鬼干部立

即被定了“恶毒攻击”罪关入牛棚，挨了群众专政的毒打，然后交公安机关处理，最后判刑四年，转到了我们这个判决号。

另一个人在城里的社办工厂工作，收拾房间不小心摔坏了摆在桌上的毛主席石膏像。他知道，这事若被外人揭发，就是不得了的罪行，于是干脆将其捣为碎片，偷偷用报纸包严，慌忙扔入了垃圾箱。也许是因为作贼心虚，他丢垃圾时行动显得很鬼祟，不巧被目光锐利的居委会主任看在眼中。这主任平日以监视邻居为职责，随时都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保持高度警惕。她立即过去翻检了垃圾，把从中找出的罪证直接送交公安局。那工人随即被捕，无意撞坏变成了故意毁坏，再加上对毁坏的石膏像做了丧心病狂的“碎尸”处理，又投入肮脏的垃圾箱。论情节，当然属于手段恶劣的犯罪，于是判了六年，然后送到我们号子。

还有一个来自山区的男孩，看样子不过十五六岁，以书写反革命标语罪判刑七年。他说话口齿不清，明显有点弱智。据他所述，他被当地的反革命集团奉为真命天子，在他们唆使下，他在学校教室的黑板上写了“打倒毛泽东”和“打倒林彪”的反标。那些幕后策划者的下场如何，他也说不上来，幸亏他尚未成年，还是贫农出身，若是成人或地富子弟，犯了性质如此恶劣的罪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都是很有可能的。他离开判决号时和我交换东西作为留念，我把我的搪瓷缸子送给他，他把他的草碗送给我。那是一个独特的大碗，用麦杆编成，里外涂有黑漆，使用轻便而又结实，但有一股生漆的气味。后来，我把那黑漆草碗带到了劳教农场。

一天晚上，门突然打开，走进一个新来的犯人。他怀抱散乱的铺盖，慌里慌张，嘴里不知在咕哝什么，一副失神落魄的样子。这时我正在过道上来回踱步，和他打了个照面儿。我们两个面面相对，一下子都愣在了那里。

“这不是果子吗？你咋在这儿？”他叫出了我的小名。

“王师傅，你咋也进来咧？”我吃惊地问。

“唉，不能提，不能提…… ” 他顿足摇头，满腹冤屈一时说不出口的样子。

我连忙接过王师傅的铺盖，招呼他坐下，还没顾得上讲述入狱的来由，他先从身上掏出一包已抽了一大半的牡丹烟，热心散给我和其他人抽。他边散着边说：“这是我女儿的喜烟，昨天他们才从昆明结婚回来，是我女婿到牛棚看我时带来的。刚才搜查时收走了一条，这一包装在身上，幸好没搜出来。”说着又拿出他的打火机给我们点烟，我们得到烟的人，都点着火吸了起来。这一次我再不敢猛吸，先轻轻吸一口，把吸入口中的大部分烟都吐出去，渐进地享用这支难得的香烟。大家吐出的烟气在灯光下弥漫开来，各人口中点着的烟头在我眼前闪着虚幻的暗红。我感到浑身舒服，酥软的快感扩散到每一个关节的缝隙，一片烟气中，我晕乎乎驾上了云。

王师傅是自来水公司的老司机，解放前就给资本家开车，可谓地地道道的工人出身。公司买到第一辆吉普车的时候，他来公司工作。因常开车来家中接送父亲，和我们全家人都很熟。听父亲说过，运动初起时，王师傅是铁杆保皇派，誓死保卫公司党委，和造反派闹得势不两立。王师傅让我看了他的判决书，也是以“恶毒攻击”罪判了五年，可以说是目前在公司内得势的造反派组织一手给他制造的冤狱。造反派得势后，王师傅就被他们抓去关了牛棚。据王师傅说，一次他教小孩喊“打倒刘少奇”，失口喊成了“打倒毛主席”，这一下被他的对立面抓了个铁证。就因这一时的疏忽，老工人成了反革命。王师傅提起自己的案情时非常生气，他说他这个“恶毒攻击”罪犯得实在窝囊，像他这样解放后一直坚定跟党走的人，怎么会反革命！怎么转眼就成了阶级敌人！

我问起了父亲和家里的情况，王师傅说，他正好和我父亲关在一起，说我父亲没事，说他人缘好，没有对立面，又没有什么重大的历史问题，所以没有人专门整他，不过每天跟其他人一起参加劳动罢了。我问起家里的情况，王师傅说，我祖父在我被捕后不久就病逝了，说他老人家临终前还在问王妈，果子怎么还没给他买到西安饭庄的甜饭。说我大妹在农场劳

动，等待学校分配。说我二妹已经上山下乡，去农村插了队。说我母亲跟学校的师生在外县劳动。说我们家目前只有我无学可上的小弟弟一人留守开通巷的空屋。王师傅说，这些情况都是前几天我弟弟到牛棚里探望我父亲时他亲耳在一边听我弟弟说的。他说我弟弟用咳嗽糖浆瓶子装了些白酒偷偷给了我父亲，说我父亲还让他抿了两口。他说得很高兴，说完了，还哼了几句秦腔。王师傅是个秦腔迷，平日在自来水公司一直积极参加工会的演出活动，我特别注意到，那判决书上把他爱唱戏也列为罪状，说他"大唱旧戏，宣扬封建的帝王将相"等等。加给他的那个"恶毒攻击"罪显然过于孤立和偶然，份量实在单薄，所以他们就网罗些补充的罪行，勉强充作辅助材料，好在罪状的叙述上造成必要的铺垫，从而突出他这个大老粗工人一贯的反革命立场。

自入判决号以来，判决书已读了不少，那上面通行的"判词文章"，我看大都是这样强词夺理铺陈起来的。

天哪，怎么这么多"恶毒攻击"罪呀！毛主席像已脱离毛主席本人，不再是纸印的或石膏塑的肖像了!它现在成了令人畏惧的魔物，任何迫害意志都可以方便地凭附在这个偶像的身上。举国发疯了，全民着魔了，为把害人的毛像举得更高，真不知还会制造出多少犯"恶毒攻击"罪的受害者。想到这一点，我甚至觉得我包中的毛选四卷和红本本语录全成了我的负担，成了"恶毒攻击"罪的定时炸弹，谁知道哪一天没收藏好这几本宝贝玩意儿，灾祸就会从天而降。再想起刘老师在毛选的空白处给我编写的英文词汇表，心里不由得生出模糊的恐惧，真想立即擦掉那些铅笔写下的英文词汇，免得往后引起意外的麻烦。但号子里根本找不出橡皮，我该用什么擦呀？

王师傅很快就从我们号子送到劳改队去了，此后不久，大约在十二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接到了离开看守所的通知。我知道这一次将要发配到很远的地方，每一件东西对我都很珍贵，遂细心收拾好我所有的东西。领回了我的钱包，里面有钱和粮票，把钱包装进衣袋，我心里首先冒出的冲动就是去外面买两个烧饼。我那盒钻石牌进口烟十七根半完好无损，趁管理人员办手续的空儿，我抽完了被捕前没抽完的那多半根香烟。他们很快从办公室出来，一人手提档案袋，沉甸甸的样子；一人把我的铺盖大包往我肩上一挎，立即给我铐上了铐子。大包套上肩压在背上，铐子从前面上了锁，我受到了前后两头的掣肘，行动起来很不方便，现在就是放开我让我跑，我也跑不了几步。他们告诉我，马上要步行押我去何家祠堂省劳教收容站，在路上我必须严守规矩，不许随意走动，不许和路遇的任何人说话。

天阴得很重，像是要下雪的样子。正在冬菜供应期间，沿途的菜地和店铺门口都堆起一堆堆大白菜。寒风一阵阵刮过，吹得枯叶与尘土一起从地上扬起。两个押送的公安干警一前一后，我背起累赘的大包走在中间。我走得很吃力，想象着自己此刻狼狈的样子，我唯恐碰见哪个熟人。可以明显地看出，路遇的行人一注视到我手上那个可怕的玩意儿，大都惊恐地避到了一边。林冲戴枷刺配，还有亲友酒食送行，义士沿途护持；《革命烈士诗抄》中那个"戴镣长街行"的烈士还有机会慷慨赋诗，给后世留下他崇高的历史形象。看看我现在这模样，挺不起胸也昂不起头，灰不溜溜，不但没有丝毫的悲壮味，还被他们弄得有些下贱和滑稽。背上的大包不时溜下肩膀，走几步我就得使劲把它往上颠一颠。路过黄雁村十字路口的食堂，我要求买两个烧饼，两个押送我的干警坚决不许。为抓住这难得的机会进一步争取，我就一屁股坐到地上，说我身子虚弱，实在一步路也走不下去。见我赖在地上不动，他们愈益加紧催促，引得一群行人走过来围观。我在人堆中坚持说我要买吃的，否则我走不动路。围观者大都对我投下鄙视的目光，只有一个中年妇女用怜悯的口气求那两个干警，说叫她去给我买两个烧饼。这一下惹怒了两个干警，他们驱散了围观者，粗暴地把我拉起来，从背后推了我一把，逼我继续前行。

早起喝下的玉米面糊糊已耗尽最后一点热量，而背上的大包也变得更加沉重。我觉得再这样往下走，随时都会连人带包倒下去，跌在路边的冻土上。但我并没有倒下。人的耐力有

时就像海绵里的水一样，就在这似乎再也撑不下去的时刻，竟还能继续挤出些微的气力来。我咬紧牙挣扎着往前走去，不知道如何一步步走完了剩下的路程，最后走进了何家祠堂的大门。

二十五 收容站的杀威棒

劳教收容站是个集中点，从各处送来的劳教犯在这里集够了人数，然后成批送往马栏农场。利用上路前的一段时间将犯人集中起来，也有集训的用意，要杀一杀我们这伙人的威风，等差不多都整服帖了，再押到劳教单位去加强改造。这里的住处不再是严密的号子，全体劳教犯住在一间大宿舍内，凳子支起来的板床分两摆连成通铺，所有的床铺上被子都迭得有棱有角，收拾得营房一样整洁。房门也不上锁了，但门外有哨楼矗立，上面有警卫日夜值班。出去上厕所得面向值班的警卫大喊："报告班长，上厕所。"警卫说声"去"或摆一下手表示同意，方可向厕所走去。

白天，我们坐在各自的床头读报或学习毛选，低头思过，写交待材料。管教干部不时进来检查，不断有批斗会就地召开。首先拉上阵的是两个劳教逃跑犯，他们逃出马栏农场流窜了一段时间，被抓获后就寄押在此，等候和我们一起送回农场。批斗会由干部主持，两个逃跑犯站在前面交待自己的罪行。他们都是小偷，下面的人七嘴八舌，一直逼他们老实交待跑出农场后作案的事实，但他们一直在胡扯些无关紧要的过程，只承认被当场抓住的那一次绺窃。

批斗两个逃跑犯是个引子，随后就开始人人过关。我们都是刚判过的，谁也不知道谁的案情，现在挨个站出来面对大家做检讨，像是在做自我介绍，得老实交待自己的犯罪，谈所谓犯罪根源，还要坦白至今尚未彻底交代的罪行，也就是管教干部所说的"余罪"。会后总是给我们发下纸张，让每个人都交待自己的余罪，说这是争取宽大处理的最后一次机会，若有余罪而继续隐瞒下去，将来到劳教单位后再被他人揭发出来，那就要加倍惩罚了。因此每天开会，干部总不厌其烦地向我们宣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一再让我们相信交代余罪的好处。也许只有没经验的初犯会信那样的鬼话，盲流惯犯们绝不上那个大当。他们一贯反读政策，且有他们的对策。"坦白从宽，二厂背砖；抗拒从严，回家过年。"他们告诉我，这是从痛苦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真理。比如那些掏包的，永远都懂得坚持"贼无赃，硬似钢"的原则，不是当场抓住，打死了都不会承认什么。批斗会就这样一场场虚张声势地往下开着，斗到底也没见谁交待出任何重大问题。

我们的大组长来自部队，穿一身草绿色军装，衣服似乎给人撑了腰，军装竟穿得他自以为高其他劳教犯一等。听说他在部队是个排长，表现也积极，本有提升的前途。不幸他和他那个农村妻子闹离婚，女方心里想不开，随他从部队返回的途中跳火车摔死了。妻子的自杀成了他的过失，他因此丢了党票，判了三年劳教送到了这里。看到他的穿著和举止，我再次想起我师大上学时的班长。他似乎还活在他曾经光荣的经历中，只因包装了那一身军皮，便趁这主持开会的机会显示政府对他的信任，在我们面前摆一副管人的架子。经他这么一搞，那本来只是走个形式的集训便搞得斗争的火气十足，每天都拉出几个倒霉鬼，站在会上当靶子乱轰。自入二厂以来，我经过的批斗会多了，揪出去挨批的霉运至今尚未轮到我的头上。现在这形势可到了火烧眉毛的程度，我惴栗不安地等在一边，只盼早日开往马栏，尽快离开这个鬼地方。我已敏感出军皮大组长对我的敌意，他常用他那阴沉沉的眼睛瞄我，显然在留意观察我的举动。只怕照目前这顺序批斗下去，很快就会轮我上场。

没想到突然出现了一幕奇怪的插曲，我面临的危机由此得到了缓冲。

有一天批斗会开得正激烈，一个红脸警卫进来叫我出去，我惊惧地走到他跟前，不知自

己犯了什么错误。他带我进了一间空屋，合上门让我坐下，接着又出去转了一圈，再次进来后才开始向我问话。我发觉他整个的行动显得不太自然，看起来好像是要单独教训我一顿的样子，但实际上是特意挑中我出来帮他处理私事。我想起我从看守所转到此地的一天，一进门几个警卫就吆喝着要我拿出判决书让他们过目，其中就有这个红脸警卫。那时我站在一边，听见他对其他几个说："还是个大学生呢。"后来才知道他姓杨，便称呼他杨班长。这杨班长先打着官腔简单问了问我的情况，突然把话题拐了个硬弯，无端地问起我会不会作诗。我说他问得真巧，我一直都在习作旧体诗。他面带欣喜，立即拿出几张纸递给我，以布置任务的口气对我说："这几首诗你可以看一看，要是有不合适的地方，也可以改一改。"他的话说得不太明朗，有些意思是用语气和脸色暗示给我的。按我当时的领会，他明显是在求我给那些诗做点润色，但表面上依然摆出下命令的架子，仿佛他眼下是在督促我写一份检讨。就这样，我像个考生被关在空屋内处理杨班长留下的诗作，而杨班长则像个监考的在外面转来转去，对他自己的"作弊"显出了轻微的不安。他脸上的神色始终十分严肃，他当然不是在监督我，而是在谨慎地守护他自己导演的这一幕好戏。这毕竟是在监狱，一个站岗的警卫以这种方式接触犯人，绝不能算是多么光明正大的事情。

毛泽东诗词的流行喂养了不少拙劣的模仿者，特别是一些缺乏文言修养的年轻人，不懂得起码的诗词格律，仅半通不通地读了些"毛诗词"，就按照七个字一句的格式，浪吟起空洞的豪言壮语。他们随便给自己七言四句的诗标上七绝，给七言八句的标上七律，至于平仄、粘对、对仗、用典，或根本不懂，或置若罔闻，好像旧体诗整个的结构及其特征，就是一种堆砌字句的简单操作。杨班长现在让我修改的诗作基本上就属于此类夹生的文字。这些自称为"七绝"的诗显系他本人的习作，句子生涩，词汇贫乏，从题目到语调都是模式化的，套用了不少因袭的句子，而且杂有太多的口号和大白话，完全停留在顺口溜、打油诗的水平上。可以明显地看出，诗篇的作者反复在歌咏一个名叫红梅的女子，要我修改的几页诗好像就是写给她的。修改这些幼稚笨拙的诗句，确实败坏人读诗的胃口，但考虑到作者向红梅——好像是他在农村的未婚妻——献诗的热情，我还是受到了一些感动。在收容站如此冷酷的批斗会语境中，一个警卫能生出粗浅的风雅情怀，总比那些吃了饭没事干，专找犯人麻烦的莽汉军人好多了。我看来看去，觉得仅孤立修改个别的字句，实在很难改得通顺流畅。怀抱着体谅的心情，我索性设身处地，以代偿的姿态向他的红梅抒发爱意，把他的原作大加删改，差不多替他从头到尾草草改作一遍。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杨班长进来了，我很坦率地给他指出原作的毛病，讲了我修改的道理。没想到杨班长全都欣然接受，拿起那几页诗稿，他立即装入衣袋。这时我发现，他本来就显得红扑扑的面庞又添了些微的赧红。

自此杨班长诗兴大发，不时叫我出去改诗。有一次那军皮大组长正主持批斗会，站在哨楼上值班的杨班长把我叫到了门外。当时天上正降大雪，这位哨楼上四处瞭望的警卫想必让"万里雪飘"的"北国风光"触动了干涩的诗怀，他公然包住土块给我丢下一张纸，我拿回去一看，原来接到了书面布置的命题作文，他让我立即赋"咏雪"诗一首（连题目都亦步亦趋地学"毛诗词"!）。他把他的泡沫诗兴转嫁给我，而我，在批斗会刺耳的叫喊声中，接受了突击性任务，用现凑的诗句替他抒情应了景。我匆匆完成后，再包个土块扔了上去。他在哨楼上一接，立即打开，站在高处，若有所吟，再一次获得了拥有一篇创作的快感。那些诗句对于我当然只是些造句练习的排列，满篇的言不由衷，仿佛拿我的鼻孔给别人出气，写过后立即也就忘干净了。我暗中深感庆幸的只是，那军皮大组长见我和杨班长一起出出进进，他也摸不出深浅，身为劳教分子，他这前排长就是敏感出什么，量他也不敢去顶撞现任杨班长的。就这样拖了几天，那批斗会开到底都没有斗到我的头上。

1969 年元旦过后，一天杨班长突然把我叫到了僻静处，他对我说，一两天内，全体劳教人员就要送往马栏农场。他说我要是想给家里写信，现在就尽快写好封入信封，他会替我买张邮票拿到外面发了。我从心里感谢他的好意，当天下午，我把封好的信交给他投寄，第

二天我们一行人就离开了何家祠堂。

那天天不亮队长就吆喝我们起床收拾行装，向我们宣布立即前往马栏的决定，并公布了路途的纪律。早饭后，我们整队站在院内接受搜身检查，然后每人领得大馒头一个，说那是途中的午餐，由各人自己保管。我等不得放到中午，馒头一到手就大口吃进了肚子。在整个挨饿期间，对食物的处理，我一直坚持果决干脆的态度：有了就饱吃，没了就硬饿，贮存或延长食物享用时间的做法，向来都不符合我进食的方式。我们货物一样被押上大卡车，两个人戴一副手铐，一环锁一人右手，一环锁另一人左手。那敞车的车箱四个角有武警持枪监守，前面还在驾驶室上支起机枪以加强震慑的威力。冬晨的冷雾模糊了沿途的景物，我看不清从哪条路驶出了西安，只觉得随车速而增强的寒风吹得我浑身像浇入了冷水，最后则如一块冰从头顶冻结到脚跟。

车开到马栏农场场部已是下午时分。我缓了好久好久，慢慢活动了一时弯曲不了的关节，只觉得整个身子像一块缓缓消冻的肉，烤了一阵火，才稍许恢复了感觉。

二十六 避秦何处桃源去

马栏这地名，最初是从赵壹口中听说的。

赵壹在省委当过干部，“反右”之前，据说是省委书记手下最红的秘书。后来大鸣大放，他对毛主席的讲话大胆提出质疑，“反右”一开始就打成右派，由省委机关直接发配到马栏，在该农场最著名的右派集中点江南站劳教了几年。困难时期，他解教返回西安，在建筑队打小工谋生，专干和泥搬砖的粗活。省委领导有意重新启用他，让他好好做个检查，再回省委工作。但他一股子牛犟脾气，断然拒绝了上司的好意。好像成心要当面给他们难堪，那一次老领导召见赵壹谈话，他竟打赤脚，穿一身邋遢的工作服前去会面。走到省委大门口，又与拦挡他的传达吵了一架，闹得本来想拉他一把的老领导十分被动，只好把他的事撇到了一边。赵壹彻底脱离了原单位，从此成为没有组织关系的社会闲杂人员。后来他觉得在城里混日子没意思，便干脆放弃他的城市户口，让妻子带上孩子在城里过活，自己只身回临潼老家伺奉老母，在生产队当起了社员。

赵壹全家人住在一条小巷子的深处，那是他妻子娘家拥有的一个独院。妻子她娘家在这巷子里从前也算富裕人家，1966 年秋抄家风暴刮起，自然被居委会圈入了查抄之列。最初红卫兵抄家，就像土匪根据内线透露的情况进城打抢富户一般，执行抄家任务的学生并不了解街巷内各家住户的情况，暗中指使他们的居委会用纸条子写上记号贴在应抄家庭的大门上，给红卫兵提供具体的线索。他们家本来已叫居委会事先贴上了条子，吓得他们合家闭门不出，死守在家里等候挨打。没想到夜里刮大风，那条子被吹得没有踪影，前来抄家的红卫兵无迹可寻，遂侥幸躲过了那场劫难。赵壹的满屋藏书因此完好无损，奇迹般保存到抄家风刮过以后。我家与赵壹家有点亲戚关系，两家住得也很近，我的藏书在抄家后丧失殆尽，听说赵壹那里收藏颇丰，便常去他家翻阅或借读。

也许是从小与学校教育格格不入的缘故，很早很早，我即萌生强烈的自学冲动，很想在校外投拜一位思想和学问上能给我有益点拨的导师。可惜在我早年成长的整个过程中，不只从未遇到可以师事的人物，连够得上对等谈话的对象，一直都找不到一个。只是后来结识了赵壹，常与他在一起交谈，我才领受了交谈的乐趣，初次从一个人的口中得到了思想上的启蒙。与赵壹在一起交谈，更使我感到痛快的是可以信口开河，放心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与周围那些以识时务自勉的长辈们不同，赵壹从不向我提出谨慎小心之类的告诫，每当我们聚在一起，话说到了兴头上，他乜斜着眼睛，诡异的目光向我一闪，那满口激烈的言词便倾泻而出，显得更比我放肆。凡是我想与他谈论的，他无不知晓，从经史诸子到诗词书画，到五

四以来的名作，到西方经典，他谈起来全都头头是道，而且时有独特的见解。他对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和马恩著作的了解尤其使我大开眼界，在国学和西学上我还可以和他对等谈话，但在中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领域，我只有洗耳恭听他侃侃而谈的份儿。他派系出身上属于陕北党，路线斗争上是亲苏派，理论修养上自封为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主要经典著作，他自诩都有过精深的研读。

无论从他的个人感情上讲，还是从他信守的理论出发，赵壹都旗帜鲜明地反毛和批毛。我说我从赵壹口中得到了思想上的启蒙，这启蒙首先就是他对毛泽东其人及其路线的明确否定。我虽背了个反动学生的黑锅，但要认真谈论那"反动"，实际上我并不够资格。我的不喜欢毛泽东，只不过是由周围的崇毛狂热引起的一种逆反心理而已，至于毛所领导的这一场革命以及历次的整人运动，党内斗争的根根节节，我连最起码的了解都不具备，更谈不上有什么清醒的认识。赵壹是解放前就投奔到延安的进步学生，后来又在省委书记手下工作，对共产党的内幕，他听到看到过很多，他说自从解放初听了王震传达的一次毛泽东内部讲话，他就对毛产生了看法。赵壹告诉我，毛在讲话中说过："一千一百万干部组成一个统治集团，统治六亿人民。干部就是官，官者，管也。我就是红色皇帝。"毛还说过："领导就是干预，要对一切进行干预。中国根本没有真正的少数民族，只有部族。大汉族主义有什么不好！人口占了百分之九十四，还有无产阶级。"转述完毛那些露骨狰狞的言论，赵壹认真对我说，就是从那时起，他看出了毛泽东专制独裁的面目。

只要听说他从乡下来城里小住，我总是抽空去与他聚会，在他们那幽静的独院内交谈到深夜。交谈中，喝他的酽茶，抽他连续递给我的香烟，听他那些犀利的批评言辞，古今中外，海阔天空，在交谈的机锋中触发着我的感悟。赵壹发起议论，有他明确的理论立场，而且充满自信，正是受了他的影响，我才开始认真思考中共及其革命路线的谬误，不再停留于那种纯个人情绪性的不满现实。但赵壹有一点颇令我感到疑惑，他狠批中共，却不反苏共，而且还武断地要我相信，苏联的道路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样板，似乎苏联不管做什么都是对的。赵壹的那些崇苏言论实在不怎么令人信服，我仅模糊地觉得气味不对，但到底不对在哪里，只因我自己缺乏这方面的思考和研究，一时也说不清楚。尽管存在着此类不能令人苟同之处，能有这么一个可以放心说话的谈伴，总算是很过瘾的事情。过上一段日子，赵壹若久住乡下而没来城里小住几天，我都会因无处随便讲话而心里憋得发慌。

常常是在晚上，赵壹一关上他的房门，便与我议论起时局，常插入些批毛的言辞。最让我忍俊不禁的是赵壹对毛泽东诗词的解读，他以令人信服的口气对我说，毛泽东咏庐山仙人洞那首七绝是一首写给江青的色情诗。我让他给我详细讲解，他便索隐本事，训诂字句，有根有据地指出，"暮色苍茫看劲松"是毛的自况，而"天生一个仙人洞"正是比拟江青。赵壹业余行医，精通《黄帝内经》，还读过"房中书"，他坚信不疑地向我解释说，"劲松"和"仙人洞"都是"房中书"比拟男阴和女阴惯用的隐喻。他还说他当面听西北局某位高干聊天时说过，早在延安期间，康生就曾投毛之所好，给毛收集过大量的色情读物。有时我们会说到连自己也不由得害怕起来的程度，这时赵壹会下意识地走出房门，去院子看上一眼，然后再回来继续跟我倾谈。多亏他们家住的是独院，若不是拥有这么好的环境，在那个隔墙有耳的年月，我们在一起说话，也未必敢放纵到如此地步。每一次我们都谈到再没有气力说话的时候，直到患有气管炎的赵壹不住地咳嗽吐痰，惹得他妻子出来劝阻，我才不好意思地起身告辞。踏上了深夜的街道，我心中慢慢弥漫起恐惧，偶一想起自己刚才说过的话，不由得紧张地拧过头向后看去，看有没有人跟在背后。

撇开其它方面不谈，仅就毫不妥协地反毛这一点而言，那时候我确实觉得，拜赵壹为师是很应该的。赵壹还写旧体诗，我们互相赠诗砥砺气节。我曾口占给赵壹一首七绝，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对我诗中"避秦何处桃源去，直欲袖椎博浪求"两句，赵壹尤其击节赞赏，一再夸我"孺子可教"。其实那诗中的所言的抗争不过是套用了典故的大话，到底该如何站出

来挺胸反抗眼前的暴政，浪吟豪言壮语的我连想也没敢想过。早在文革初起之日，赵壹就对毛的阴谋或阳谋看出了一点端倪，他指导我读马克思的两本书：《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建议我观古而知今，仔细透视这一场革命的闹剧性质。

赵壹的中医完全是自学的，他的脉理和针灸都很高超，用药尤其大胆，开起了方子，敢在剂量上做独特的加减，因此治好了不少疑难病证。但他从未开门行医，一直都只是在亲友圈子内免费看病。与他交往的过程中，我最大的受益便是跟他读了几本中医经典，并初步学会了针灸的操作。那时候狱中除了毛著，什么书都不许阅读，但自然科学的书籍却属例外。我在劳教收容站集训期间，弟弟多次去那里看我，我也模仿赵壹当年奔赴劳教农场的做法，让弟弟把我所有的中医书籍和赵壹赠我的一包银针给我送来，打算把医书全部带往马栏，在未来的岁月中自修中医，并争取行医。

赵壹常向我提起马栏，他对那里的描述还为我浪漫化那个劳教农场提供了想象的资源。人是很可怜的东西，蹚到没有更好的出路可走的时候，就自然会降而去求其次，拿某种不是最坏的可能性宽慰自己的软弱和妥协。我在看守所判决前后的等待中，因自知没有释放的可能，马栏在一定的程度上便成了我向往的地方。赵壹说江南站的图书馆有丰富的藏书，还说那里荟萃了不少有名的作家和教授，所有这些关于马栏的传闻，经过我那可笑的文学头脑做种种设想，一时间竟给我劳教马栏的前景涂上了十二月党人流放西伯利亚的诗意色彩。我希望到了那里能遇到更多的赵壹式人物，我猜想其中肯定会有些奇人异士。后来，我带去的医书和银针倒是偶然用过几次，但我对马栏的浪漫想象，却被证明完全是我自己的胡思乱想，是我一贯把自己的困境作戏剧化处理的自我安慰，是比白日梦还白痴的妄想。马栏在反右之后确实曾一度是规模很大的劳教农场，但后来随着右派分子陆续离去，沿川道一带的各个站早已由劳改犯充实，我们一行人让那辆敞篷大卡车运到马栏农场场部时，全场就剩下柳树坪一个站收容劳教人员了。

1969 年已是反右十余年之后，劳教农场早已不是专门收容右派的地方，公安局继续保留此类机构，主要是为了大量关押不够判刑的刑事犯。走进柳树坪劳教人员大院，我发现十个劳教中就有两三个来自二厂，有的面熟，有的早已认识，他们之中多数是小偷，有不少人甚至戏称二厂为“二校”。曾在一起相处过的一伙人如今在异地重逢，好像从同一处初级班毕了业，如今都升到马栏农场来深造进修。我觉得“二校”这称呼尤其适用于我，二厂确实是我走向劳改队的预科学校。那里的经验不只使我在正式进入劳改队之前预习和熟悉了将要面对的种种情况，而且使我有机会广泛结识出入于各种监狱的“二进宫”或“三回头”人物，使我此后随处都蹚到了直接或间接的熟人关系。

如今的劳教农场已完全更新换代，充斥了形形色色的盗窃犯，其中少年犯占的比例一直在逐年增高。排队出工时，站在一群毛孩子当中，我那显眼的大个子就像灌木丛中长起一棵又细又高的白杨树。

我来得太晚了，我想结识的奇人异士早已死的死散的散，赵壹也许是仅存的硕果一个。没有，这里根本没有值得我学习的人物，除非我解教后决定当职业小偷。

二十七 放开肚皮吃土豆

马栏农场的场部在山下，柳树坪站在山上。那天在场部吃过饭，烤火取暖，缓过了麻木的四肢关节，我们这批新劳教跟上领队的干部开拔上山，向柳树坪站进发。我那个铺盖大包现在更大更重了，增加了家里送到收容站的衣服和书籍，背上那么多东西，十几里的上山路走得非常艰难。都在看守所关了很久，我们走一程歇一阵，气喘吁吁一阵，等翻过两道山梁，约莫走了一多半路程，所有的人几乎都累垮了。多亏站上的干部派出了几个老劳教，半路上

拉上架子车接了我们的行李，否则，走到半夜也未必能走到柳树坪站。

我们新来的一行人编为一组，每天由陆教员亲自主持开会学习。这里继续在搞收容站那种集训，要在我们初到之日，再次杀我们的威风，仍然是大会穿插着小会往下开着，时时有人被推出来批斗。

每到开饭时分，全体劳教犯分组集中到大院分饭，那苍白的面色就是我们新劳教暴露在老劳教面前的显著特征。现在我们吃上了劳改队的定量，每月有四十五斤粮食，除逢年过节可吃到白麵馍或大米饭，平时一日三餐均为农场自产的玉米麵。早餐每人一碗玉米面糊糊和一个小号的玉米面馍，午餐和晚餐均为一个大号的玉米面馍和一碗菜。这数量远多于看守所，吃惯了这一标准的老劳教虽不能说顿顿果腹，习以为常之后也就是那回事了。但我们新劳教肚内的油水早已在看守所刮干流净，一个个胃口都像没底坑，每顿饭吃完毕，总是想再多吃一些。这种不满足的感觉特别令人难受，包括我在内，很多人常在觅食意念的支配下走出号舍，饿狗伸出鼻子一样到大院内四处游荡。

有人钻到伙房里拉关系，给那些在伙房内干活的老劳教抽烟，巴结讨好他们，只为了能在开过饭之后帮他们义务刷锅，好铲一碗糊锅底的锅巴吃吃。从省军区送来的一个小伙子就是这群人中把头削得最尖的一个。他叫王建中，犯了流氓罪，听说是个军干子弟，在我们这一伙新劳教中，平时就数他显得最眼馋，见别人留下剩饭，他总会厚着脸皮过去乞讨。然而也正因为他不太顾及脸面，自来农场后，也就数他身体恢复得迅速，没过多久，他的脸蛋就明显地胖了起来。

另有人拿自己的衣物换玉米面馍吃，向他们提供食物的人多为劳教中的外役。干外役的多住在大队的墙圈圈之外，如放羊放牛的，赶车喂马的，以及各种从事单独工作的。他们这些人可以自由出入大院，每逢一批新劳教刚送进大院，食物交易极为活跃的时候，老劳教或外役中好搞交易的人就趁机从新劳教手中捞取便宜。外役在外面有的是搞食物的机会，伙房里打来的那份饭对他们不足挂齿，有时甚至可有可无。其中个别贪心的家伙，趁新劳教求食心切，仅拿出自己省下的几个玉米面馍便换到很好的衣服。他们把这些衣服拿出去再转手倒给当地的农民，从农民手中换取更多的粮食或其它食物，再继续倒换。在我们新劳教到达后不久，一个外役打完饭离开大院，临出大门时，就叫小哨从包内查出了五六件衣服。经干部一审，全都是用省下的玉米面馍换来的。他那些衣服被暂时没收，他本人也因此调回大队，丢掉了外役的差事。

更有人女人一样，凭着脸蛋长得可爱，从个别好男色的劳教犯手中获得食物。他们长得似乎不够男人气，也都比较年轻，在某些劳教犯眼中，也就显出了女人的风韵，以至被当女人看待。我们新劳教中有个来自歌舞团的小伙子就是这类人物。他中等偏下的身材，走起路屁股习惯做女人式的扭摆，看人用眼瞟，戴了个军帽，还有意把前面的头发从帽沿下弄出丝丝缕缕来。他洗过脸讲究搽些雪花膏，从人面前走过，淡淡地飘香。来柳树坪不久，他就得了个“二妹子”的外号，所到之处，总有人迎上去打他的俏皮。有几个混熟了的人和他亲近起来，甚至公开摸他的脸蛋，拍他的屁股。这小伙很快就风魔了劳教大院，送食物讨好他的接二连三，连轮他去伙房打饭，所打的数量都比其他人要多。

还有人乱吹牛骗吃骗喝，刘致远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来自二厂强劳队，在何家祠堂时就主动与我拉扯关系，我见他谈吐还有些文气，又喜欢翻我的医书，便对他比较亲近。他特别能吹，讲起他在外面流浪的经历，常听得我想入非非，有时听信了他那些海阔天空的许诺，我都想在解教后跟上他去跑江湖。到柳树坪之后，他突然借去我带来的几本医书和那包银针，后来召开他的大型批斗会，我才知道刘是个卖狗皮膏药的骗子。刘致远也真够大胆，参照了我借给他的方剂手册，他就给个别劳教人员看起病扎起针来，借机吃了不少别人剩下的玉米面馍。这家伙越玩越大，没过多久，竟毛遂自荐，说动了某位队长，被特意召到站部给几个干部诊脉开药方。但他开的方子在中药房让抓药的看出了破绽，经场部的医生一审核，证明

刘致远开的那些方子完全是胡拼乱凑。这一下惹恼了那几个轻信他说大话的干部，他们亲自布置批斗会拿他问罪。会后，他立即被打入严管队，在下边挨了几顿饱打，人还没恢复过体力，就被整得更加狼狈了。原来他根本不懂医术，完全是靠从我手中借去的那几本医书蒙人。我挨了干部的批评，从他手中拿回了我所有的医书和银针。

那是大雪封山的季节，我们每天关在大院内开会学习搞批斗，我初次听到"偷吃偷喝"和"倒换倒卖"这两个劳改队的常用语。正在冬训期间，这两项犯规的行为就被列为我们互相揭批的首要内容。干部在上边严厉制止，此类活动在下边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搞得猖獗。究其根源，只能怪这里的伙食标准太差。只要这大队里有人吃不饱肚子，只要有人想自找渠道以获得额外的食物，不管干部怎样制止，此类活动随时随地都会发生。绝大多数住在这墙圈圈内的劳教人员属于大队编制，他们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一切活动。同组的人同一个号舍住宿，同一个饭桶分饭，早饭后整好队，报名点数，在队长的带领下一同去地里劳动，其中严管队还有警卫在警戒线外持枪监视。收工后又一同整队返回，进门时再次报名点数。大院的角落和大门口日夜都有干部信任的劳教人员当小哨，他们监视大院内所有劳教人员的活动，严防任何人随便出入。我们新劳教以及被认为有逃跑思想的人，都属于大队编制，因受严格的监督和限制，我们很难蹤到独自干任何事情的机会。除了求助外役，我们没有任何办法获得额外的食物，若不采取所谓偷吃偷喝或倒换倒卖的做法，那就只能老老实实吃分到碗里的三顿粗粮了。

犁地组可谓住在大院中的外役，他们多数人即将解教，逃跑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故虽在大队编制中，却常被派出去干一些分散的活路。比如现在冬闲期间，大队里各组劳教人员整天学习开会，需要烧柴烤火，干部就派犁地组的成员外出打柴。他们因此有工夫满山遍野地乱跑，老乡家可以去，马栏镇也可以去，蹤上机会，还可以下饭馆买盘炒肉片解解馋，然后给其他人捎带些吃的回来。犁地组号舍内存的都是最好的干柴，蹤到星期日全天休息，我就去那里跟几个二厂的熟人烤火聊天。地炉里的青棡木过完了烟，出尽了焰，留下一炉木炭般的红火，正是火力最硬的时候，火烤得我眼皮干涩，膝盖处的棉裤面摸起来烫手。黑子是从二厂强劳队送来的，听说我认识二毛，同样也跟二毛关系不错的黑子立即对我做出友好的表示。他拿出自己存下的玉米面馍，用镰片把馍切成薄片，撒上盐末和辣椒粉，烤得金黄酥脆，一片片分给我吃。他给我介绍柳树坪站的情况，说我们新来的人放在大队编制中只是暂时的情况，等开春后正式生产，我肯定会调入果园组干活。果园组的成员不是在西安市有家有户的年轻学生，就是由单位送来的带薪劳教，管理上比在大队里要松得多。黑子认为，只要干部觉得我没有逃跑思想，像我这样的学生出身，绝不会老跟严管的劳教编在一起。他说他最近常出外打柴，说我要是想买什么东西，可以放心交给他办理。我于是把我收藏的现金和粮票交给他，托他给我多买些食物带回大院。

我们刚到柳树坪的时候，干部曾发动我们把身上的现金换成农场内部的代金券，说是可以在定时来站上巡回售货的小卖部买各种东西。干部不许劳教人员私留现金，他们若发现谁身上留有太多的现金，就会认为谁有逃跑思想。但我没有拿我的钱换他们的代金券，早在来到马栏之前，我就听说给自己手头存够现金和粮票有很多好处。我把我的钱和粮票藏在棉胶鞋的鞋垫下面，经过黑子的手，那些钱和粮票都变成了白面窝馍、点心和熟肉。这些暗中买来的食物弥补了我好多次饭后的不满足感，给我初入大队的艰苦日子带来了不少甜美的时刻。

我到柳树坪站写给家里的第一封信也是黑子带到马栏镇邮局发出的。劳教人员经站部正式发出的信件都不许封口，信得先交给主管队长，经他们审查后，才由站上统一寄出。这里的艰苦生活是不许写的，个人的苦闷情绪是不能写的，向家里明显索要食物的话是不宜写的。你只能写一些"政府对我们很宽大"，"我在此地的劳动和生活都很好，没有什么问题"，"我要努力改造自己，争取早日新生"等劳改队的家信套语。如果你不这样写，而写了什么明显出格的话，你的信多半会压在队长手中，或打回来叫你另写。所以，凡能另找渠道的人，都

宁可冒险私发信件，好让家里知道自己在此地的真实情况。

劳改队的饥饿在把人的羞耻感腐蚀殆尽的同时，也将其自私心激发到极致。我们这些饿坏了肚子的人现在只受自己口腹之欲的支配，眼中只有食物，只顾没完没了向家人要这要那，却很少考虑自己的索要会给家人造成什么困难。我在发出的信中给父母开了一长串食物清单，我要他们给我快寄包裹，寄给我挂面、牛油炒面、腊肉、油泼辣子……要他们寄给我很多我看见其他人所收的包裹内常有的东西。急于收到食物的欲望压倒了一切，提笔给父母开这样的清单，我总是贪心大量罗列，却从没设想父母见信后会怎样看待我这些要求，以及他们购买和邮寄我要的东西时会遇到什么麻烦。周围有不少来自西安的劳教都在私发的信件中索要邮包，得到邮包的人一时成为大家羡慕的对象。

包裹很快从家里寄来了，我收到了不少我想要的东西。我把收到的东西锁入我的小木箱，很多劳教犯都拥有这样的木箱。那箱子上加了锁，自从大妹给我寄来的腊汁肉夜里被人偷走，我便用衣服给自己换了这个小箱子。包裹现在给我撑起了腰杆，我因拥有了额外的食物而提高了我在劳教犯中的地位。我不再是只有伙房那一份饭可吃的人了。我们几个经常能收到包裹的西安人形成一个小圈子，每逢周末，各人拿出自己的食物，生起火做小锅饭一起分享。有一次在我们聚餐时，我以朗诵的语调向他们宣告说："我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食欲。"我这句话得立即到热烈的赞同，被他们一致奉为表达了劳改队生存境况的警句。好多年以后，其中有一位在西安街头和我路遇，还记忆犹深地提起我那个警句，并为此而拉我去餐馆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但也有很多人始终都在老实吃他们自己仅有的那一份饭。他们身上没有现金和粮票，没有多余的衣物可供交换，也没有家人寄东西接济。由于对外来援助自觉地绝望，他们反而获得了忍受饥饿的勇气，对于每一顿分到自己碗里的饭菜，他们只有本分地吃下去了事。陈克俭平时就是如此。他与我铺挨铺，星期日吃完饭放下饭碗，他毅然拉开被子蒙头闷睡，对我们的聚餐，他视而不见，从未流露出眼馋的表情。有时我会偶尔给他分一点食物，他老是坚决辞谢，若在我坚持下接受了我的好意，他必一副感恩戴德的样子，向我表示出太过分的谢意。他也来自二厂，但在西窑上烧窑，所以我们以前并不认识。听他给我讲，他父亲是国民党军官，解放初死在劳改队里，母亲随即改了嫁，把他撇给了贫困的祖母。在家里，他从小缺乏教养和爱护，没读完初中，就逃学出去，到处流浪了。后来，他因偷窃在二厂强劳两年，留厂就业后，又不安于现状，再度外出流浪，然后再次翻把，判了三年劳教，从何家祠堂跟我一起来到马栏。

正如六号在看守所向我描绘的那样，我们最常吃的菜是土豆。柳树坪是盛产土豆的地方，那是一种紫皮土豆，个儿大，淀粉含量多，吃起来很面，若吃一大口而下咽太急，很容易把你噎住。但自我们到达此地，从没有放开肚皮吃过土豆。我们劳教大院建在低处的山坳上，围一圈高墙，墙内又一圈号舍，中间空出的一大片院子是我们平日活动的场地。从院子里抬头可以望见修筑在半山腰平旷处的站部，那里有房屋和窑洞，房屋里住着干部和武警，窑洞里贮存着各种东西，而一排排土豆窖则在山腰的更高处，在荒草间露出狭小的洞口。土豆窖里贮存的土豆主要供播种之用。冬闲时常派个别人到窖内翻检所存的土豆，把部分变坏的土豆挑出来送入伙房，伙房的人剜去霉烂处，留下那可食的部分给我们做菜。每天送入伙房的烂土豆十分有限，能用来做菜的当然不多，整个冬天，分到碗里的煮土豆总是汤多土豆少，发出了泔水一样肮脏的灰色。随着天气变暖，土豆窖内清除出来的土豆量加大，汤里的土豆也日渐增多，等到播种开始，土豆的供应便达到高峰，每个人吃饭时都能分到一大碗煮土豆块。这时候大量的劳力拿镰片切下土豆上有芽眼的部分，拌上灰，运到地里栽种。剩下的多余部分全部送入伙房，在伙房里稍经洗刷，切成块大锅给我们煮食，各组的饭桶里，饭后常出现剩余。我终于目睹了六号在五处曾向我描绘的情景，不论你饭量小或饭量大，这期间确实都可以放开肚皮往饱吃了。

春播期间，从西安看守所正好送来一批新劳教，一个个苍白的面孔风吹日晒后都起了皮，脱皮之处，都是深一块浅一块的褐斑。我已在劳改队混过几个月，新来乍到的陌生感正在淡薄下去，突然站在局外观察新来的劳教犯，从他们脸上正好看出了自己当初的饿鬼模样。新劳教中有个小伙子，他大约就像王建中那样饿坏了肚子，蹦上这一年一度放开肚皮大吃土豆的日子，吃得他忘掉了节制。那天，他吃完自己的一份土豆，又贪吃了别人分给他的，结果吃的太多，饭后不久，就肚子痛得在地上乱打滚，医生还没来得及急救，便因肠胃堵塞而撑死了。

原来人不只能饿死，还会撑死，这可是我从未经过的世事。但“撑死”这个词我早就知道。我想起了小时候西安的小孩子都会背诵的童谣，那时候每到黄昏，成群的乌鸦从城外飞到住家户的大树上栖息，哇哇地叫着，此刻，我们小孩子就在树下齐声高喊：“老鸦老鸦一溜溜，/回去给你妈炒豆豆。/你一碗，我一碗，/把你妈撑死了我不管。”撑死，就是没有限度地进食的结果，它基本上是动物的行为。比如，开春后我们的煮土豆内偶尔会有一点点羊肉，据伙房的人说，都是因羊号不断有死羊送来，才使我们的菜碗里增添了肉味。原来春暖草长，窝了一冬的羊群突然面对鲜嫩的新草，便没命地饱吃起来，其中有些小羊没有控制能力，往往一直吃到撑死为止。我曾目睹过羊号送来的死羊，肚子都是鼓胀鼓胀，像吹足了气的羊皮筏子一样。我们的祖先经过了漫长年月的制礼作乐，才使先民脱离了动物状态的饮食恶习，从而建立起文明的饮食礼俗。而监狱，特别是共产党的监狱，现在却滥用其饥饿惩罚的手段，把一个犯人饿得像春天的羊那样没命地暴食，最终撑死了自己。

小伙子撑死的次日，干部叫我上去帮忙装殓死人。尸首停在土豆窖附近的窑洞内，一具临时钉起来的薄棺材放在一边，死人的肚皮鼓胀，身上散发出食物发酵的酸臭味。他吃下去的土豆已经在尸体内膨胀开来，撑得他的肚子和腰部碌碡一样滚圆。我和另一个人用尽了力气，都无法把一条给他换上的干净裤子提上胯部。实在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把半穿着裤子的尸体装进了棺材。

自从装殓了那个可怜的撑死鬼，我一看见饭桶内堆积的煮土豆，就想起他鼓胀的肚皮，还有他那土豆芽一般苍白发青的脸色。整个春播期间，每逢端起碗吃我那丰盛的一份，我嘴里都有一股子怪味。那几句童谣从遥远的童年隐隐传来，在我的耳边回旋不已：

你一碗，我一碗，

把你妈撑死了我不管。

二十八 担水上山路

果然如黑子所说，我们新劳教集训了几周，包括我在内的不少西安人都编入果园组干活。柳树坪站共有四大果园，一果园和二果园分布在站部附近的山坡上，三果园和北羊号果园一西南一正北，都处于离站部较远的山头。果树以苹果为主，也种有少量的梨树和桃树。现在我们是在大山的脊梁上活动，不要说干活，就是从住宿的大院走到另一重山上的果园，爬那几道大坡，一开始也是十分吃力的。初来时强烈的饿感在逐渐减退，体力开始向正常的状态恢复，紧接着终日的劳累就开始折磨人了。号子里挨饿纵不好受，虚弱的身子至少可以瘫在那里不用动弹，哪怕像石块沉在水底下，也没有人逼你起身。但现在进了劳改队，活路作为任务压在身上，工具犹如刑具发到手中，你得机器一样运转，从极易疲劳的筋骨皮肉间硬是挤压出超常的能量来，队长没让停工，谁都不敢稍有倦怠。

水果成熟前，我们在果园里主要做两项工作：一是涂白，即给每一棵树的树干刷上防止病虫害的石灰水；二是打药，把经过稀释的农药喷洒到果树的枝叶上。和石灰水和稀释农药都需要大量用水，而马栏地区的荒山上向来水源稀少，不要说供应果园用水，就连平日吃水，

来源都极其困难。果树生长在半山腰以上的梯田上，水得从沟底一担一担往工作面上担，从早春果树发芽前的涂白直到开花结果期间的数次打药，要在果园组中抽出部分较硬的劳力专职担水。除了个别的特殊情况——如有时队长会罚某个违犯纪律的人担水——以外，队长通常总是挑年轻力壮的劳教犯干这样的重活。在一果园涂白的第一天，开工前先由队长派活，队列中就数我个子最高，带队的杨队长第一个叫出来担水的就是我。接着他叫出了个头也不算小的王建中，这小伙现在吃得脸上油光，身上已明显长了膘，他那副体魄自然逃不过杨队长的眼睛。收容站曾威风一时的军皮大组长也被一声叫了出来，这家伙长得还算壮实，他此刻若要暗下叫苦，也许他得怪自己那一身军皮在队列中过分惹眼。解放军战士都能吃苦，杨队长显然看准了服装的标志。最后，再加上原先担水的几个老人手，由果园组的大组长傅向荣领队，组成了新编的担水小组。

杨队长毕业于农校，是这里的专业干部。他性子急，脾气倔，满嘴关中农村口音，向来不喜欢那种只会玩嘴皮子的劳改油子。所以，他手下的几个组长都比较踏实能干，在各自负责的小组中，他们得带头出力气干活。傅向荣来自西安东风仪表厂，属于带薪的劳教，这类劳教解教后可回原单位工作，从组织关系上讲，要比劳教中大多数被视为社会渣滓的人物更靠拢政府，也更受干部的信任。他说话声音洪亮，人显得很正气，对新劳教态度不错，也乐于帮助在他手下干活的人，与很多咋咋呼呼喜欢欺辱新犯人的监盖子明显地不同。他告诉我，水桶差不多都一般大小，无需费心挑选，但扁担的好坏很重要，说着就挑出一条轻巧而有点弯度的扁担交给我，让我先试着用用，随后即领我们往沟底走去。

那是一条崎岖蜿蜒的小路，从高处向下望去，像一条发白的长绳子歪歪扭扭搭拉在乱石枯草之间。从头走到尾，我看那所谓的路都是从前担水的人硬用脚踩出来的。随着沿途地势的变化，路线或直或弯，路面或好走或不好走，坡度或缓或陡，只是在特别陡的地方，有就地挖下的脚窝或拿石块临时垫起来的台阶。我现在的工作就是在这条路上穿梭往返，克服距离、高度和重力，做西西弗式的搬运工作。西西弗是希腊神话故事中的一个受难人物，他因触怒神灵，受罚将一巨石从山下推上山顶，每一次将至山顶，巨石便滚落下去，他得再次下山推石向上，如此反复不已，日日徒劳而终无成功。空担子走向沟底，就像西西弗下山一样轻松，我把挂着空桶的扁担从已压肿的右肩换向左肩，让火辣辣作痛的右肩将息片刻。下山途中，我还可以尽量放慢脚步，闭口做深呼吸，再次凝聚身上的气力。我迈起懒散的脚步，摇摇晃晃走下去，故意做出支持不下去的姿态，好让腰部和腿部的肌肉暂时松弛下来。对我来说，这下山途中的彻底放松很必要，等两桶水压上肩膀，迈起步上山，就要出力流汗和格外小心了。那是在山路上担水，稍有闪失，就会摔倒。一担水刚上肩的时候还不觉得怎么沉重，等走上一段距离，右肩就有了下沉的吃重感，担子开始压得肩膀不胜重负，越往下走越酸困，困得就像胳膊要脱臼，肩膀快折断，整个人立即要垮掉。但现在是在劳改队担水，比不得外面，又不能撂下挑子不干。没有别的好办法，我只得举右手托住扁担，用力向上顶一顶，藉以缓解肩上的压力。山路上根本没有平旷之处，在通往任何一处泉水的路上，我都找不到放下担子歇肩的地方。所以在泉水与工作面之间，无论路长路短，只要担起一担水，就得一口气担到底。西西弗推石头一刻也松不得手，他松了手石头就会滚下来压到他身上。我在山路的斜面上若放下水桶歇肩，满桶水便会流光倒净。

傅向荣告诉我，担水虽说是笨重的活路，也有它的窍道，得练一些技巧。他说，首先要练习换肩，即右肩担累了，可换左肩担，直练到左右两肩交替轮换使用，担起担子才有耐力走长路。我初练换肩，不只左肩疼痛难忍，连迈步都很别扭。但我现在是重担子压在身上没法子了，要胜任担水的活路，非把左肩练得跟右肩一样耐压不可。右肩的肿胀消退后，我觉得肩上的皮肉慢慢地长厚变硬，接着左肩肿得更厉害，消肿之后，也磨练得像右肩一样结上了硬壳。从此我练出了双肩，也能像傅向荣一样换着肩膀担水了。

担水的日子久了，傅向荣进一步指点我练习担水的步法，他叫我迈步时注意把扁担用活，

不要把扁担用死。我们在一起担水时，傅向荣特别让我注意那些制做得轻巧的扁担，那样的扁担，担起水都会微向下弯曲。他说，如果硬挺起肩膀扛着担子走，就会把扁担用成一根死压在肩上的木棍。我观看他的走势：他迈步矫健，行步间趁势摇摆身体，随着他步起步落，扁担在他肩膀上轻微地上下闪动，就在扁担那瞬间的闪动中，压在肩上的重力得到了分解。扁担与肩膀若即若离，在两者之间，好像闪出了比一张纸还薄的缝隙。我跟在傅向荣身后学着他的步法迈步，在走出了节奏的闪动中，我捕获着那只有辛苦的担水人能感觉到的一丝轻松，一丝短暂到近乎假想的轻松。而与此同时，我模糊觉得，从那逃逸了重压的空隙间，好像有一丝新生的力量溢向肩膀，使我正在疲软下去的身体又鼓起了一把劲。这步态带来的好处其实不止轻松，忽悠悠闪动担子，还可保持满桶水不向外乱溅。而死扛起一担水上山，低一脚高一脚地走着，会摇晃得桶里的水乱溅出去。若那样边走边溅着担水上山，等水担到水缸跟前，桶里的水往往会损失掉少半。这情况要是叫杨队长见了，就免不了挨骂，甚至会罚你多担几担。

军皮才担了几天水就累垮了，他的黑红脸现出了蜡黄色，日常严肃皱起的眉头也八字一样塌拉下来，平时脸上那副故作思考状的模样随之消损，明显露出了体力不支的窘态。他以为他经常写些学习毛选的心得交上去，队长派活就会照顾他。也许放在其它组，他那些玩嘴皮子的方法可能奏效，也许轮到陆教员带工，这位专抓犯人思想工作的干部会考虑到他特殊的军人出身，但果园组里按杨队长的规矩办事，杨队长是个实在人，他只看重干活，向来不吃空头政治那一套。有一天军皮用手捂着腰喊痛，还揭开衣服让杨队长看他疼痛的肝区处绑了一块瓦渣。他想显示他在带病劳动，而所用的止痛方法显系来自报上的一篇报导。那报导描述一位死去的英雄人物，说那位学习毛选的积极分子在患有严重肝炎的情况下仍坚持劳动，军皮现在效法的就是那位英雄人物的故技。他忘了军队里的那一套并不适用于劳改队，他本来想以此谋取轻活或赢得赞扬，没想到杨队长对他的表演根本不感兴趣。此举不但没得到杨队长同情，反而增加了对他的厌烦。杨继续派他担水，收工时还就地开会，喝令军皮站出来检讨。杨队长叫他低下头说话，见他头低得不到位，便走上去甩掉他的军帽，一边把他低下的头往下压，一边说非要打消掉他的牛气不可。但军皮毕竟来自部队，有党员和当排长的背景，他的案情又属于责任事故，与我们这些“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劳教犯相比，他大概真正是人民内部矛盾，应予区别对待吧。后来果然经陆教员干预，杨队长派他到修剪组干轻活去了。

一果园通往泉水的路程最长，但坡度比较平缓，我平时担水，缓缓迈起脚步，每跨一步，心里暗数一下，同时深深地吸气，尽量通过调整呼吸来降低加快的心跳。急促喘气最不好，吸气时不由得张口加大吸气量，会很快弄得口舌咽喉发干，反而加速了体力的耗竭。我闭起口做深呼吸，含津生液，暗数着步数，有节奏地凝聚着气力。每当我喉咙冒火腿发软，出汗过多，身子虚弱，一松劲就可能栽倒在半路上的时候，我硬是坚持着数我的步数，一步步挣扎到底，从没在崎岖的山路上有过闪失。常有人脚软了或眼花了，行步中一个趔趄，连人带担子摔倒在山坡上，弄一身水不说，还会弄滑路面，受其他人的抱怨。

北羊号果园的泉水地处幽谷，直上直下，一路都是阶梯，每担一担水，都出一身汗。那泉水在很阴森的石洼中，水面上常漂一层死蝴蝶，白花花一片，隐隐冒起如烟的水汽。站在泉边给桶里灌水，只觉得寒气逼人，如临幽冥之境，不敢在那里久留。灌满水转身走上陡峭的山路，得稍微变换担水的姿势，不能像上慢坡那样晃悠着担子迈步，我得伸开双臂，用手抓紧桶襻，几乎一手提一个桶向上攀登。我知道那一直向上的阶梯整整二百五十级之多，每一次空担子向那漂满死蝴蝶的泉水走去，想到即将转回头上山的路径，我都不由得腿肚子抽筋，寒毛眼里钻风。

尽管如此，与打药的轻活相比，我还是宁可干担水的重活。打药总得几个人配合在一起干，有队长在旁监视，有组长跟屁股督促，活虽然轻松些，却不能随便停止。而担起担子，

我始终独来独往，自己对自己负责，走路的快慢由我调节，只要水缸里供水充足，我就可以随机休息。我们这伙挑水的，常常猛挑一阵水，然后躺在山坡上伸长腰美美地晒一阵太阳，活虽累，干活的过程却比较畅快。

我个子高，最怕干弯腰的活路，一担水虽重，担起来总能挺直腰杆走路。为保护腰脊，我还给自己搞了一条三指多宽的板带勒在腰间，那是几层软和的蓝棉布用密针细线深缝起来的腰带，打拳摔交的，运输队干装卸工的，他们出力时都少不了这东西。早在二厂的时候，我就知道干出力活用板带束腰的好处。它可以固腰，聚气，像箍木桶的铁圈一样，使一个站立的人躯干更加紧凑，体态也显得更加精神抖擞。它还有稳定重心的作用，在我肩负重物的时候，有这一条带子在身，就如有神力为我撑起腰杆。每当我在担子的重压下腰酸腿软了，精疲力竭肚子空了，我就将板带再往紧收束，总是能从挺直的腰杆间勒出更多的力气来。

二十九 抽紧的法绳

打药工作停止后，果园组的多数劳力随大队投入夏收，仅留少数人在果园内看守正在成熟的果实。也许我几个月来老实担水赢得了杨队长的一点信任，他派我去看守北羊号果园。这里四围一片荒山，没有几家老乡，劳教人员中也只有个别的外役有机会路经此地，即使有人偷吃几个水果，也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失。派我看果园倒不是防人偷，而是驱赶成群的乌鸦，随时拣拾树下的落果。我所住的茅屋坐落在路边的高地上，下面低洼处的梯田上长满了梨树，因这种梨子于伏天成熟，故名叫伏梨。即将成熟的伏梨正在从青绿变成淡黄，我看准一个快熟的摘下来，咬一口一包水，又脆又甜，味道颇像甜瓜。我没有领到多么有效的驱鸦工具，杨队长只发给我少量的的鞭炮和一条用麻编成的长鞭子，再加上我自己的脸盆和搪瓷饭碗，我吓唬乌鸦的方法就是甩向鞭子，敲向脸盆和饭碗，偶尔放炮，但主要还是从高地上跑下去，边大声吆喝，边挥鞭驱赶。

初至果园，我享了几天清福，枝头成熟的梨子很少，而已成熟的多叫我摘下吃了。乌鸦仅偶尔出现，牠们对突然响起的鞭声和喊声还很怯生，只要我大声一吆喝，鸦群立即从树上扑棱棱飞走。我拉一张塑料单子铺在树荫下，吃梨，抽烟，舒展几个月来备受劳累的腰杆和四肢，翻开一本中草药手册，根据书上的图谱和文字描述，我想在山坡上的野草中认出几种草药来。站在我的茅屋门口，可以清晰看见远处名叫鳖盖子的山坡。那是一大片种在阳坡上的麦田，黑子曾告诉我，鳖盖子麦田的坡度很大，每年夏收，从那坡上把麦子一捆捆背下来，是很辛苦的重活。背麦捆时，头顶太阳晒着，背上成百斤压着，麦芒在身上刺着，还有挥不尽的牛虻死死在皮肉上叮着，他对我说：“在鳖盖子背几天麦，准叫你身上脱一层皮呢。”

黑子已解教回家了，我还得在此再过两个夏收。在劳改队，人最怕想到刑期，每次计算还剩下的时日，来日茫茫的忧愁就一下子将人压倒，本来还算差强人意的日子，立即变得一片晦暗。我再次向那片麦田望去，站在高地上甩向我的鞭子，往下面的果园吆喝几声。我突然觉得胳膊上尖锐地螫痛，好像叫烟头烫了一下，低头一看，原来是个牛虻，是马栏山特有的大个儿牛虻，它正死叮在我胳膊上。我一巴掌打扁了那家伙，只见被叮处渗出一丝鲜血。谢天谢地，幸亏是在这里叫牛虻叮了，要是在鳖盖子上背麦捆，牛虻叮在我身上，此刻想打都腾不出手来。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伏梨大片成熟，飞到果园骚扰的乌鸦越来越多。少量的鞭炮早已用尽，鞭子的脆响和我声嘶力竭的吆喝开始失去威慑作用。从清晨到黄昏，鸦群一阵接一阵袭击脆嫩的梨子，就像电影上越南天空出现的美国轰炸机，黑压压一片突然从树林那边冒出，一只只分散落下，在不同的枝头啄食起来。我只得从高地上冲入果园，奔跑在树林内到处驱赶，刚赶尽了这边的几只，那边又有更多的聚集起来，而就在我辗转奔逐的过程中，地上不

断落下被啄烂的伏梨。我做了一个弹弓打这些可恶的乌鸦，没打中乌鸦，常打落梨子。乌鸦的胆子越来越大，起初挥鞭或吆喝，会吓得它们成群飞走，但现在发出驱赶的信号，它们仅暂时飞起，在树梢上空来回盘旋着，作伺机落下的滑翔。鸦群飞着叫着，那邪恶而放肆的样子就像女巫从某个城堡派出的黑色精灵。它们在我的头顶上执拗地挑战我的耐力，只要稍一放松守护，便立即落向树梢，肆意糟踏我来不及保护的伏梨。有一天我用弹弓打落了一只乌鸦，把那受伤的家伙绑起腿示众，用它的啼叫和翅膀的扑棱声制造警戒，但仍起不到吓阻的作用。我拾回茅屋的落果越来越多，伏梨也吃得我失去了口味。眼看着果实繁密的枝头明显露出大片稀疏的地方，我心里不由得焦躁忧虑起来。我将如何给杨队长交差？那麻编的长鞭子已甩短了许多，我的嗓子也喊成了破锣，本指望接了这差事聊作度假，抽空读书，没想到书没读下去，却发觉自己抓了个烫手的山芋。北羊号放羊的外役就住在梨园边上的羊号里，他对我说："每年都是这情形，出力不讨好，你这活实在算不上什么美差。"终于有一天我正在上下跑着喊着赶乌鸦，杨队长来查看情况，目睹树下落果狼籍一片，空中鸦群纷乱啼叫，他顿时火冒三丈。他破口大骂我懒惰，不负责任，当即宣布撤销我看果园的职责，责令我夹上铺盖卷滚回大队。我落魄地回到大院，好在紧张的夏收已经结束，不管怎么说，今年的鳖盖子背麦捆可算躲过去了。

整个秋季都在忙于采集苹果，虽然累死累活地干着，好在每天都有苹果可吃。不只在休息时杨队长给大家发苹果吃，我们干活时也偷苹果吃。发给我们的苹果总是落果，得削去伤疤或霉烂的部分，要吃自己喜欢吃的鲜苹果，只有趁干活时偷，在各种得手的情况下偷：在树上边采边吃，在树下找个隐蔽处坐下来饱吃，扛起果筐，在运送途中大口急吃……从早熟的吃到晚熟的，从黄皮的吃到青皮的，红皮的，紫皮的，花皮的，从脆的吃到面的，从酸甜的吃到甘甜的，乃至有酒香味的，有肉香味的，带柿子或香蕉味的……马栏山二十多个品种的苹果，我全部吃遍，吃得我牙齿整天发软，喉咙眼常冒出一股酸水来。我们果园组的劳教天天偷吃，人人偷吃，一直偷吃到四个果园的苹果全部收完为止。

那是 1969 年秋末，林彪刚刚发布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中苏边界吃紧，全中国掀起备战热潮，到处都在挖防空洞，连我们柳树坪站那地处荒山的干部院都挖了不长一段地道，聊作备战的姿态。城市又一次清洗人口，有问题的家庭成批被驱赶到农村或边远地区，很多干部下放到五七干校。这紧张气氛很快也牵动了劳改队当局敏感的神经，在农场管理干部的眼中，我们这些人好像随时都有破坏国家安全的危险，好像不立即对外面的局势作出反应，就会犯麻痹大意的错误。

初冬的一个早上，我们全体劳教犯突然被叫到大院集合，陆教员当场宣布，奉场部指示，得立即从柳树坪站迁出。出发之前，开始执行常规大检查，绳子、刀子等违禁的物品又收缴了一大堆，我来马栏后搞到的几本外国小说，也被搜出来予以没收。我们的行李集中由马车运载，各组劳教人员在主管干部带领下立即上路，队列外有武警持枪防守，押送我们向场部附近的五一站行进。不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调动，是定期的调换，还是要把我们送到管理更严的地方加强改造，谁也说不清楚。只听劳教犯们谣传说，劳教制度马上就要撤销了。难道迁往五一站与此有关？"要是劳教撤消了，我们这些人会怎么处理？"坐在五一站的窑洞内，劳教犯们在一起议论此事。陈克俭冷冷地说："你以为会把劳改队解散了，都放回家去？做梦去吧，每个人都得服够刑期的。"

有一天黄昏时分，新月从西边早早升起，五一站大院的地面一片冰冻，空中干冷干冷，一口气吸下去，鼻子喉咙都冰得刺痛。我们全体劳教人员被召集在露天下训话，陆教员当场宣布了几个劳教人员分别延长劳教期限和逮捕法办的决定。陆教员警告我们说，不要以为判决后送进劳改队，好坏就算罚到尽头了，谁要是抱着破罐子破摔的态度，以为反正就是这么回事，那他就大错特错了。陆教员指给我们看那几个站在台子上的劳教犯，其中有延长劳教期限的，还有逮捕法办的。陆教员说，他们就是摆在我们眼前的活例子，还说我们之中任何

一个，只要表现不规或有新的罪行被揭发出来，政府随时都可以加重惩罚。所有的干部对劳教犯说话时都是“政府”俩字不离口的，他们喜欢把自己等同于政府。陆教员发出了冬训运动的总动员，他鼓动每个人都行动起来，大胆揭发检举，说立功可以受奖；他还让我们交待自己的余罪，说坦白可以从宽。接着他用演讲的腔调对我们训话。他说：“目前国内外反动派甚嚣尘上，在你们劳教分子中，眼下就有人蠢蠢欲动，刚才宣布处理的那几个就是阶级斗争无处不有处处有的表现。我要严肃警告你们，中国一旦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打起仗来，对你们这些人民的敌人，必将加强专政，进行更严厉的管制。因此，只有彻底向人民低头认罪，老实改造自己反动的世界观，才是你们劳教人员唯一的出路。如果你们中间还有谁想负隅顽抗，我告诉你们，等待的只有死路一条。”陆教员讲话中的措辞用语和他平时宣读的那些文件如出一辙，他每一次讲起来都煞有介事的样子，自以为对我们制造了威慑。实际上，我们已听得耳朵起了茧子，早都对他那些恐吓无动于衷了。

最后，由两个队长将一个新来的劳教人员押上台子示众。那人穿一身黑棉衣，大个子，高鼻梁，自来卷的黑发，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他名叫高斌，据说是个基督教地下教会的成员，因传教判了三年劳教。但陆教员脑子里并无信教自由的观念，他一贯拿现成的帽子给劳教人员笼统地乱扣，比如对这位穿黑衣的基督徒，他就直呼邪教徒。他说邪教徒高斌自来本站至今，一直不认罪服法，而且拒不出工，反动气焰十分嚣张。罗列了高斌的罪状之后，陆教员宣布说，兹经站部研究决定，现在立即对高斌当众捆一绳子。那麻绳又细又长，制做得精致而结实，是捆绑不服管教的犯人专用的刑具。陆教员向我们解释说：“捆绳子可不是说捆就捆的事情，我们对高斌的处罚经过了站部的批准，这是对抗拒改造者进行打击的措施之一，一经宣布，是要正式记入该犯个人档案的。”陆教员拿起那束绳子向我们晃了两下，他特别强调说，这绳子代表了法律的威力，所以称之为法绳。陆教员宣布了对高斌捆绳子的处罚之后，劳教人员中立即响起打倒邪教徒的口号，一阵连一阵催逼他交待罪行。

高斌站在台上一言不发，口号声再起，就在这时候，队长剥下了他的棉衣，在摄氏零下十几度左右的严寒下，他只穿着贴身的衬衣站在我们面前。目睹他那衣衫单薄的样子，我不由得打了个冷颤。两个队长把绳子在他脖子背后打了个扣儿，再把绳子两头从他肩上分别拉下，一匝一匝，在他的双臂上密实地往下缠去，最后在他的手腕处捆紧，把他的胳膊向后背去，将绳头穿入上面的绳扣，开始上弦一样将绳子抽紧。黑衣人捆紧的手腕被抽紧的绳子向上提起，绳子抽得他弓起背弯下了腰，抽得他整个的人弯曲如一条蜷缩的软虫，脑袋几乎低到了裤裆下。逼他交待问题的呼声再次喊起。我已多次目睹捆绳子的场面，一般的人捆到这程度早已娘呀爷呀地喊痛求饶了，但黑衣人仍未吭声。绳子继续往紧抽着，我的肩膀不由得跟着同步纵起，头往下低去，好像那绳子同时也捆在我的身上，引起了我一身肌肉的内在模仿。全场唱起毛主席语录歌：“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动跑掉。”干涩的歌声中，手拉绳子的队长好像受到了鼓舞，他们把那细绳子抽得更紧，紧得已勒破了黑衣人的衬衣，勒得他额头上冒出冷汗，鼻孔往外喷气。他开始急促地喘息，从嘴里迸出了吭哧吭哧的声响，随后吭哧着昏倒在台子上。

三十 偷吃偷喝

不知是川道里比山上头冷，还是那个冬天特别冷，自迁到五一站，我总是怕冷，老觉得身上热量不足。早上分到碗里的玉米面糊糊若是烫口地热，喝下去会浑身暖和，走在路上双腿都带劲。可惜我们不能单独从伙房打回自己的那份饭，饭是分组发放的，先由伙房舀入各组的饭桶，饭桶提回来放到我们露天下围起来的圈子中，然后才分到各人的碗里。轮到每个人分饭之前，按规定必须高声诵一句毛主席语录，比如说：“要斗私批修”或“世界观的转

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值日才会把糊糊给你舀到碗里。这样分下来，吃到嘴里多是半温，甚至已经变冷，喝下肚子由不得人打起冷颤，一路上走向工地，浑身都不舒服。

我们要去对面峪口的牛号干活，牛号外面的空地上有大堆的牛粪，我们的任务是用架子车把牛粪运往川道，倒入稻田。正当数九寒天，地面上到处都冻实了，泥泞的道路冻得圪里圪塔，人拉着车走路，轮子不断在路上绊磕，空车子拉起来都像重车子一样费劲。而粪堆早已冻实，一镢头挖下去，只挖出个冰碴，连续用力挖好多下之后，啃下来的小粪块也装不满一架子车。镢头挖在冻粪上几如硬碰石头，震得我双手一阵麻痛，有时都把虎口处冻裂的手纹震出了血丝。

我们是在搞生产，但整个的劳动过程又不完全是为了生产。它不是唯生产力的，它具有惩罚和折磨人的性质，劳改队就是要拿此类毫无价值的笨活重活来耗竭我们犯人，同时藉以检查和衡量每个人接受改造的态度。不少人都为积极表现自己而累死累活地干活，于是攻克眼前这一大堆冻粪，就成了对我们全体劳教犯的考验。开工之后，工地上立刻摆开了战天斗地的阵势，那规模就像是一项宏伟的工程刚刚开工。镢头挖不动，拿来了钢钎和榔头，抡起锤打眼，然后塞入撬杠，用撬杠硬撬。撬不动了，又点起火烘烤，直到烤化了底部的冻粪，粪堆顶部才大块地垮了下来。终于揭开了冻在表层的硬盖，排在一边的架子车才一车车装满粪土。

我有时挖粪，有时拉车，重车往地里拉的时候，车与车之间展开竞赛，好多人都在下坡时拉上车撒开腿飞跑。每三个人拉一辆车，别人跑我也得跟上跑，跑一趟便是一身汗。而空车子回来，放缓了脚步，遇到沟道里一阵阴风吹过，脊背上褟湿的衬衫又变得十分冰冷。我们从没有洗澡的机会，汗渍的衬衣和裤衩也很少换洗，那衣缝中自然就长起虱子，弄得人身上很不好受。星期日或午饭后在工地休息的时候，若遇到好太阳，最舒服的消遣就是脱下衬衣或解开裤腰，在衣缝间给自己捉虱子。看准一个扒在那里不动的胖家伙，只消用左右拇指的指甲盖对着一挤，就会将它挤成肉泥，而指甲和衣服上，总会在这小小的杀戮后留下点点血迹。但虱子是挤不完的，小如针尖的虮子密密麻麻粘在衣服上，你根本无法用指甲挤杀，虮子除不掉，虱子就会不断长出来。消灭虮子的一个好方法是回到号舍，在地炉内生起火，用火烘烤生了虱子的衣服，等烤到衣服发出焦黄的颜色，屋子内一股糊味和臊气，虱子和虮子便全部烧死，而衣服也可能因此而受损。但这虱子和虮子总是柴火烤不尽，臭汗渍又生的，过不了多久，衣服穿脏了，你会再次被咬得到处搔痒，一蹓到晒太阳的机会，又忍不住解开衣服，搞起捉虱子的消遣。

我干了一阵挖粪和拉车的活，队长派我单独跟马车给地里送粪。那块地很远，在牛号对面的山沟里，我的任务是卸粪。赶车的把粪车赶到地里，让车辕翘起，车箱随之向后倾斜，我迅速用耙子把车上的粪刨到地里。我只需在这一段时间内猛干一阵，粪刨光了，我跳上马车，赶车的坐在辕上赶车，我坐在车尾上，放声高唱《外国名歌二百首》上面那些忧郁的歌曲。有“茫茫大草原，路途遥又远”；有“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赶车的是个劳改犯，往返途中从不和我说话，对我所唱的歌，他似乎听而不闻。在那大山沟深广的空旷中，歌声刚一出口，就让打不破的寂静整个吞没了。

在劳改队里，你只要干过一两次单独行动的活路，以后蹓到类似的活路，就很容易再轮到你身上。干部实际上倒不一定非要偏谁或整谁，他们给不同的劳教犯派活路，首先要考虑自己承担的责任。如果你干过单独行动的活，那就说明你没有逃跑的危险，以后蹓到类似的活路，自然首先会想到派你去做。服刑的过程就是混日子，尽快过完每一天，耐心走向期满。每一天只有干活与吃饭两大内容。饥饿和劳累谁也抗拒不了，我和周围的人一样懵懵懂懂，常为多吃了一口而深感庆幸，或因干了一天轻活而满怀得意。混过一天就是赢得一天，贪图着渺小的轻松，满足着侥幸的温饱，越来越不在乎自己活得多么低贱。

跟马车卸粪之后，我又蹓到了更好的差使。接下来架子车要把粪土运往更远的稻田，半

路上需要布置小哨监视拉车的劳教犯，队长便抽我站到路旁的山坡上放哨，防止有人趁拉粪之机在中途逃跑。对带工的队长来说，安全问题高于一切，每天收工后，早上带出去的劳教犯能如数带回，便算完成了最基本的任务，所以在活动分散的情况下，布置严密的小哨比什么都重要。现在我电线杆一样立在高处，目逐每一辆架子车在路上运行的情况。就因为领了这好差事，我暂时得以抽身局外，有了游目纵观的余暇。我仰观奇形怪状的云块在天边聚合飘散，看那山岭的连绵起伏，看到最远的一个山头，直至看得双眼发酸。天色慢慢暗下来，我身上发冷，腹内开始猫抓一样难受。这表明身上的热量已消耗殆尽，收工的时候马上就到了。

五一站的冬天就在这有时劳累有时轻松的严寒中度过，开春之后，我们再次迁徙，转到了离场部最远的石底站。天气慢慢暖和起来了，我看见那个挨了绳子的黑衣人天天坐在大院内晒太阳。在五一站期间，他一直关在禁闭室内，大概是陆教员发现捆绳子和关禁闭都对他无效，现在只好让他出来活动一下筋骨，好让他恢复体力后跟上大队下地干活。但他对陆教员丝毫没有屈服的表示，仍然拒绝出工，强迫他走到地里，他也死不干活。他的胳膊和手伤得很厉害，差不多已失去干活的能力，手背依然肿得鳖盖一样。他自进劳改队大概就没洗过头面，如今头发已脏成一团毡片，成块地粘在头上。从未见他和任何人说过一句话，他们组里读毛主席语录或唱革命歌曲，他从不开口，干部们对他毫无办法，只好默认他那永不作出任何反应的自闭状态，权当他是个哑巴，是个手足麻痹的废人。我试图接近他，问他的情况，但什么都问不出来，对任何接近他的人，他都是一副不屑搭理的样子。他组里几个犯绺窃罪的小劳教似乎得到队长默许的纵容，得空就欺辱可怜的黑衣人，拿他穷开心。他们拿起石子戏弄着向他身上投掷，他不躲避也不抗议，只是抱着头在那里硬挨。那几个恶作剧的小家伙甚至往黑衣人脸上吐唾沫，吐上了他也不擦，一任那唾液从他脸上流下来自动干却。他固守在他泥塑木刻的自我中，用他的没有感觉绝缘了企图从外面矫正他的任何举措。可以明显地看出，只要他们继续把他无理关押在这里，他就会坚持石头一样存在下去。他死不承认他犯了法，自从进了劳改队，他似乎就没打算活着出去。他确实是完全豁出去了。

我没有黑衣人那样绝望的勇气，和绝大部分劳教人员一样，我活得平庸而世故，每天照常混日子，总想混得更舒服一些。我不想鸡蛋硬碰石头，我要为解教后重返社会保养好身体。这石底站地处川道开阔的地方，自然条件比其它站都好，农业之外还搞各种副业，站上有酿酒和榨油的作坊，还有小型的土砖瓦窑。光阴荏苒，转眼又是夏天，我和陈克俭以及也是来自二厂的郑天佑被调去烧窑，三个人因此都躲过了夏收。

为方便工作，队长让我们搬到窑上居住，一天二十四个小时的烧火工作全包给我们三人，我们自行调配班次，再无外人妨碍。那砖瓦窑地处荒野之中，干部很少前来检查，每到夜间，我们就在窑道内做起小锅饭。在看守所的时候，六号曾向我描述过有关土豆的各种吃法，来马拦之后，一直都没机会尝试。现在在窑道内烧火，我们终于可以放手大搞偷吃偷喝的活动了。陈克俭在我们三人中胆子最大，他自来马拦一直编在严管队里，这一次因要利用他烧窑的技术，才把他抽调到外役。他说他好不容易得了机会，现在不偷还待何时！于是他半夜爬入土豆窖，一次偷回半麻袋土豆。天佑来自咸阳，是个机伶的小偷，干活时动作特别麻利，最喜欢在改善伙食上花费时间和心思。因他有烹调才能和改善伙食的热情，我和陈克俭就负责烧火，分担他部分的活路，让他专门为我们加工土豆食品。他有两种土豆的吃法最使我难忘，一种叫土豆丸子。他用钉子在一个罐头盒底子上凿好多小孔，制成一个礤床，在这个自制的礤床上把土豆擦成细丝碎末，再加上葱花及各种调料，搅和成馅，团为丸子状，入水煮熟，做成辣味丸子汤食用。另一种叫土豆餈粑。做法是：把煮熟的土豆去皮，捣成土豆泥，反复用力捣烂，直捣到土豆泥有了粘性，可以像面团一样拉长。这时可以拌入白糖或蘸上调料汁食用，吃到嘴里有糯米糕的感觉。天佑常在白天出外游转，观察动静，为我们晚上的小锅饭备料。我们仍处于食欲压倒一切的状态，往往贪馋到无所不吃的地步，为满足当下的口

腹之欲，有时甚至不惜冒食物中毒的风险。我们吃过天佑打死一条大蛇所做的蛇汤，还吃过天佑拿病死的猪所做的红烧肉。那是猪号白天埋掉的死猪，天佑在晚上竟偷刨出来带回窑道，经过他细心的处理，做出了一大碗红烧肉块。尽管那肉里放了很重的调料，还是盖不住那死猪肉本身的怪味。

秋天来了，全体劳教又迁回柳树坪站。为从根本上解决吃饭的问题，我主动要求入伙房担水。伙房附近的沟里有专属伙房的泉水，路程较近，路况也较好，担水虽说还是重活，但比在果园里打药期间的担水轻松多了。我们一共三个人专职担水，除有时会被抽去给地里送午饭，只要伙房的水池和大锅内贮满了清水，我们就可以放心地休息或在大院内外游荡。在伙房内干活，吃喝上的好处不用说了，我们担水的每天在伙房与泉水之间奔走，做饭的和切菜的做了什么好吃的，总少不了我们一份。但对我来说，更大的好处是这里从不开会学习。伙房内无所谓八小时工作时间，也不可能有任何节假日，一年到头，我们都得为全体劳教犯的一日三餐服务。开完饭并做好下一顿饭的准备工作，剩下的才是我们的休息时间。忙碌掩护了我们，管理员若问起学习的事，我们总是说没时间集中起来开会。我们的管理员也管干部灶的伙食，得经常出外为干部灶采购，所以很少监督查问我们。这管理员也比较懒散，不太多事，听说是犯了点错误，由城里的公安机关贬到这儿工作的。

这里的干部来源上可分三类：其一系公安系统内部的调动，其二为部队转业到地方后安排到这里来的，其三是农牧专业的学校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到此地工作。来自这三方面的干部之所以能服从分配，到这么差的地方工作，不是缺乏有力的人事关系，就是本人多少也有些问题。他们自己心里大概也清楚，若不是干这管犯人的工作，像他们这类级别很低的干部，放在劳改队以外的任何地方，作威作福的权力是根本轮不到他们头上的。

这里是克山病区，没有任何干部带家眷来住，除非休探亲假，留在此地总是过光棍儿的生活。在这穷山恶水的地方，难得见上一个女人，干部和我们犯人一样生活得十分枯燥。碰上年轻开朗的劳教妻子前来探望，干部院就有了节日的气氛。特别是傅向荣那个当公共汽车售票员的妻子，人长得有几分姿色，见了大小干部又会来事，一副文工团的演员到阵地上慰劳将士的姿态，每逢她探亲在柳树平站小住几天，站上的改造秩序都暂时出现了松懈。干部们喜欢包围她，常邀她去打扑克，她也善于谑浪调笑，在会议室内打起了扑克，总弄得里面像开联欢会似的。乔站长是个老红军，没有文化，从不拿架子，人直爽得挺可爱，每提起傅向荣的妻子，他总是情不自禁地赞扬说："说话像唱歌，走路像跳舞。"

马栏山上的林木全部属于地方林场所有，按林场的管理条例来说，任何个人与集体都不得随便砍伐。但劳教农场的土地就在林场的管辖区内，近水楼台先得月，农场在使用木料上不受林场的约束，偷伐的活动从来都是公开进行的。农场拥有我们这么多劳教人员的劳力，无论什么时候采伐都不必花钱，干部们常带上我们大队人马到深山老林中砍伐站部所需的木料。上行下效，农场当局偷伐林木的做法自然也影响到每一个干部。对他们来说，来这鬼地方工作，毫无好处可沾，唯一能捞到手的补偿就是私下给自己搞些木料。通常的做法是：某队长若在山上看中了哪棵树，便派他手下的劳教犯偷偷伐倒，找个方便的机会运回站部。然后在劳教中抽出劳力解成板材，做成家具，等有了顺车，便将家具运回各自家中。在出山的关口上，运出的木料一律要受到检查，但家具之类的木材制成品不受出境限制。我见到，不少来自关中农村的干部在马栏当了几年队长，等到回家探亲，必带上大木箱、柜子等家具，算是在这里辛苦一场的收获。长期以来，这一做法已形成风气，我们的管理员来到柳树坪工作一段时间后，也筹备起他做家具的事情。他在远处的沟底看中了一棵合抱的漆树，早已让劳教放倒，并将树干截成了短截儿，正需要几个好劳力从沟底把木头背到路口上，再用架子车偷偷拉回站部。有一天他选了几个好劳力去沟底背木头，我直属他管辖，又是个硬劳力，不但被他选入其中，还按他的吩咐，从伙房内带去不少玉米面馍，专门负责给其它人分发额外的食物补助。那湿木头每一截儿估计在二百斤上下，用绳子捆住，死压在脊背上，即使在

平地上迈步也很困难，我们竟从沟底将所有的木头背上了大路。在我三年劳教所干的各种活路中，这是我觉得最重、最要命的一次，说不定我多少年后突发的腰痛病就是这一次埋下病根的。

为管理员干了那次偷木头的差事不久，我则因偷了十斤苹果而差点受了捆绳子的处分。

那是深秋的一天，开过午饭，正当我们伙房全体人员午休时分。我和其他两个担水的在大院外的苹果树林中游荡，在空疏的树枝上，偶然能找到一两个漏采的苹果。能找到的苹果极其稀少，我们越走越远，最后闯入了二果园。那里的苹果尚未完全采尽，我在一棵树下发现了大半筐没来得及运走的苹果。是晚熟的国光，青紫相间的颜色，咬一口一股子醉甜。我上身穿了件运动衣，把运动衣扎进裤子，我从领子下带拉锁的开口处把苹果一五一十装了进去，装得那上衣形同塞满土豆的麻袋。我笨重地向回走去，不巧在下坡时看到张队长带领要去上工的果园组向我迎面走来，情急之下，我只好去路边的土豆窖内躲藏。慌忙中在洞口掉下了一个苹果。眼看大队已从我头顶的路上走过，落在队后的一个小劳教眼尖，一扭头竟看见了洞口的苹果。他离队去拾苹果时被张队长发现，狡猾的张队长由此看出了问题。他随即走到洞口向里面吆喝，同时派人进去将我揪了出来。

我被张队长带回站部，他从我身上掏出的苹果一共称了十斤。他叫来了杨队长一起审问我，我一口咬定所有的苹果都是在路上拾的。张队长认为我狡辩，厉声呵斥我说："你炕旮旯里拾枕头哩，说的倒好听，哪有在果园里拾苹果的道理！只要是从果园里拿出去的苹果，就都是偷的！"说着，他拿出捆人的法绳摔到我脚下吓唬我，要我老实交待偷苹果的经过。我依然坚持说全为路上所拾，并提到有人在沟边割草可以作证。割草的劳教很快被叫到张队长跟前，张队长问他是否看到我偷苹果，那人说他只看见我从小路上经过。张队长没抓住人证，也没得到我的口供，便把从我身上搜出的苹果装入一个担笼，让我手提上那笼苹果，立在大院门口罚站。随后，他转身去找管理员交代我的问题。张队长为人尖刻，平时好挑剔，对我的印象似乎原来就不太好。这一次不巧叫他抓住了把柄，要是我现在还属于果园组编制，他肯定非狠狠整我一下不可。幸好我在伙房担水，不属他管，不管他多么想重罚我，要处理我的事，也得通过伙房管理员。

我站在大院外示众一两个小时后，管理员慢腾腾从站部走了下来。我还在担心会不会挨张队长的绳子，没想到管理员走过来挥挥手，叫我快去担水，他提上那担笼走进伙房，把我所偷的苹果都分给伙房的其他人吃了。

三十一 绝不留场就业

1971 年是我刑期的最后一年，随着我盼望已久的解教日期日益临近，我的忧虑反而与日俱增起来。解教后的出路并不乐观，我担心最终仍摆不脱劳改单位。如果我来自农村，不必提出任何要求，一到期当即放回生产队当我的农民，即使我想留下来就业，农场方面也绝不接受。但城市户口的劳教人员中，只有极少数保留公职者解教后回原单位工作，凡是回城后会再次成为社会闲杂人员的劳教，解教后都要强迫留下来就业。我家住在大城市，摆在我面前的去向十分明显，如果解教前拿不出落户农村的一纸准迁证，解教之后，就非去铜川的跃进煤矿当就业工人不可了。跃进矿专门收容马栏农场出去的劳改劳教释放犯，早在二厂就业期间，我就从不少在那里待过的人口中听说，那里的环境比二厂还要恶劣，更不是人待的地方。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受了这么多罪，熬完三年劳教，到头来又回到从前的起点，这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结局。我打定主意，只要能彻底脱离劳改单位，不管去多么边远艰苦的地方，我都要努力争取。

我是过来人，深知就业单位的可怕，初到马栏农场，就打算出狱后去农村落户。人落到

这步田地，只有家人可以求助，因此我一直写信催促父母，要他们尽早为我找一个可去落户的地方。后来弟弟来马栏探望我，带来了父亲给我的信，父亲在信中回绝了我的要求。他说他对我不敢再抱过高的期望，也不愿意再听我多次重复的那些保证，根据我以往屡教不改的事实，他很怀疑三年的劳动教养会把我彻底改造过来。恐怕费尽精力把我从马栏转回来，我安宁不了多久，说不定又要闯什么乱子。所以他劝说我先留在此地就业，说就业单位固然待遇很差，比较起来，还是在远离西安的地方受公安局严管，比回到城里当无业游民更安全。父亲还说，不是做父母的心硬，不关心儿子的前途，是现今的时局如此，谁也无力改变我的现状。他特别提醒我，我现在的身份和背景更劣于在二厂就业时期，这都怪我自己把路越走越窄，往后的苦果也就只能由我自己承受了。他说他和母亲能力有限，并无有力的社会关系，即使他们想把我的户口转回来，一时也难找到门路。父亲最后说，管我愿不愿意，也只能先留下就业，反正逢年过节休假，我总有机会回西安家里团聚几天，能看到我平安无事过我的日子，一家人也就心满意足了。

父亲的话说得很现实，听起来似乎有点绝情，但所说的的确都是事实，我也没有理由反驳他的建议。我让弟弟回去求母亲说服父亲，同时也在写给父母的信中吓唬他们说，如果他们不想办法把我办回西安，到时候农场强迫我去跃进矿就业，我就豁出去铤而走险，干脆跟上劳改队结识的流氓小偷逃出去，过到处流浪的生活了。哪怕将来犯了法叫公安局再抓回来坐牢，我也不会去跃进矿当就业工人。

1971 年夏天，弟弟第三次来马栏农场看我，带来了令我兴奋的消息，他说我落户农村的事已办得有了眉目。弟弟对我说，父亲上次在信上说的多是些气话，他嘴里说不管，其实一直都利用工作上的方便为我在长安县寻找机会。弟弟完全长大了，他在工厂里做学徒，再有一年就升一级车工。自文革开始至今，祖父母相继病逝，父亲关牛棚，母亲妹妹下乡，我判了劳教，其他人的处境都各有各的不便，唯独弟弟年龄最小，他无需避嫌，行动上没有什么顾虑，因而也只有他能为身在难中的祖父母和父亲，还有我，去做很多家中的其他成员都无力做的事情。多亏有弟弟来回跑腿，不断给我传信息、送东西，我在马栏的处境，以及我要彻底摆脱劳改队的迫切心情，才经过他确切地传达给父母。

听弟弟说，自来水公司已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父亲又开始受到重用，他现在负责沣河沿岸勘测水源的工程，刚认识了几个公社和大队的干部，正托人在高桥公社给我办理准迁的手续呢。弟弟还给我讲了些我在劳改队想象不到的社会现象。他说自从知青上山下乡后，社会上新兴起一种名叫“走后门”的风气，现在你要和地方上的干部打交道，办任何事都得讲条件，给好处，适当的请客送礼尤为必要。弟弟说，为我的事情，父亲带上他大热天骑自行车已往长安县跑了好多趟。我知道父亲向来不善交际，更不会搞社会上拉拢关系那一套，从弟弟的描述中可以想见，现在为给我开出一张户口准迁证，父亲也得勉强学着跟那些农村干部套近乎了。弟弟说他亲眼看见，对那些人，父亲尴尬地笑脸相迎，笨拙地敬烟点火，热心地酒饭招待，还帮他们搞一些购买紧缺物资所需的票证或介绍信。自解放后进自来水公司工作以来，父亲基本上活动在他专业工作的范围内，除了处理技术问题，就是回家喝酒，在人际关系上，他向来都十分疏阔，如果没有为我办理准迁证这样的事情逼到父亲头上，也许他永远都不会接触地方上那些小干部，更不会涉足应酬他们的吃喝场合。听着弟弟的描述，我完全能想象出父亲招待那伙人时的窘况：他会生涩地说着他还不太习惯说的客套话，给每一个未必会喝酒的人诚心劝酒，把任何略表点意思的招待都搞得过于隆重，最后因破费太多，招致了母亲的责备。母亲最讨厌父亲在家里请客吃饭，更讨厌接待农村的来客，因为花钱掏腰包是她，动手做饭还是她。

八月底，母亲来柳树坪站看我，从她风尘仆仆抵达站部，直至她返回前我送她去汽车站，短短的几天内，她都在不住抱怨，反复向我诉说为办这张准迁证全家人经历的艰难。“害祸，我前世造了什么孽生下了你这个害祸！”这是母亲每一次抱怨我时挂在嘴上的开场白，“害祸”

就是她对我的称呼。“我四个孩子里你是老大，别人从来都没出什么事，怎么老是你叫父母操心劳神！”开场白仍在她口中往下重复，“都是你奶妈把你从小惯坏了，真后悔那时候不该送你到园子，让你跟你爷爷住在一起乱看书看坏了思想。”她嘟囔个没完，妇怨无穷，她把这劳改队接待家属的简陋窑洞吵嚷得有了家庭气氛。边说着抱怨的话，边解开身上最隐蔽的衣兜，母亲掏出一张公文，把它递给了我。最后，她才对我说：“我给你送准迁证来了，快打开看看，看这样写行不行。”这一句才是她真正要说的话。我把那宝贝拿在手中反复端详，是陕西省长安县高桥公社准许我迁入户口的证明，上面盖有红色圆形的专用公章。我对母亲肯定地说，证明的款式完全合格，回到西安是不会有什么问题了。总算拿到了这一张决定命运的公文，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母亲这次来马栏，就是要赶在我解教前把它亲自交到陆教员手中，并要当面从他口中得到准许我解教后迁走户口的答复。

1971 年 9 月 18 日早饭后，大队出工的时候，陆教员站在站部的高崖上传我上去，叫我带上行李，去他的办公室办理手续。刑法是严苛的，判决书上所写的期限一天都不能少，我终于磨到了最后的时分。这是我最后一次走出劳教大院，回望那阴沉厚重的大门，从半掩的空隙中，我看见了黑衣人。他又受了处罚，在禁闭室门口的房檐下，仍旧木呆地坐着，蓬乱的头发上粘满了禁闭室内打地铺的麦草，两只手树杈一样僵硬，瘫在腿盖上，那是他再次挨了法绳捆绑的结果。

秋空明净，山林沉寂，我扭头上了坡，满目酸热，再也不想看一眼那里面的任何人，任何东西。

在陆教员处接受了最后的行李检查，然后办完我的解教手续。我知道避不过这最后一关，事先已烧掉了我三年来收到的所有信件和所写的一点随感札记。真可惜呀，我没能从这里带走一行记录我劳教生活的文字。我得到了迁入长安县高桥公社的户口迁移证，也像母亲那样谨慎，我把这张重返人寰的通行证装入贴身的衣兜。离开站部去场部的半路上，我拉出预先藏在路边草丛内的扁担——我长期担水专用的好扁担，一条轻巧的桑木扁担，然后担起行李，晃悠着，闪动着，大步向山下的汽车站走去。

三十二 黑人黑户

1971 年 9 月下旬，我从马栏回到西安。刚刚发生过林彪事件，虽然官方的正式披露尚在很久以后，但各种说法的小道消息已暗中传播开了。我是从那个曾和我有过一点交情的音乐教师口中听到这则新闻的，讲了林彪机毁人亡的事件后，她还告诉我，几天之前的一个大清早，她在南门外看见一辆大卡车疾驰而过，车上押了很多戴铐子的解放军军官。像我们这样私下议论的人肯定还有很多，但表面上大家都装出一无所知的样子。这消息令我感到既震惊又欣喜，不管怎么说，这铁板一块的现状毕竟烂掉了一个小洞。连伟大领袖最亲密的战友都企图叛国投敌，如今还能有多少人真正拥护毛泽东呢？我发现巡逻的民兵小分队明显地有所增多，晚上九点以后，街上行人就很稀少了。偶尔有公安摩托车轰鸣而过，在阴森的秋夜里听得人惊心动魄。

自我回家后，父母一直不放我单独上街，他们尤其怕我在巷子内碰见户籍员老华。我现在还是个腰包户口，也就是说，只要报不上户口，从马栏带回的那张迁移证就是一纸空文。要是像这样长期在城市住下去，碰上户籍员来查户口，他们就会把我当“黑人黑户”处理。更何况我刚从劳改队获释，现在可算真正的前科犯了，若让老华知道我从马栏返回，他随时都有可能来找我的麻烦。本想到处走动一下，去见见赵壹等几个还有些交情的朋友，但眼下住在父母身边，吃着他们的饭，就得受他们管，为免得惹他们担忧，我只好先窝住性子，一举一动都按他们的吩咐行事。他们也太谨小慎微了，连上电影院看个无聊的阿尔巴尼亚故事

片，都不放心我独自外出，非得叫弟弟陪上我同去同归不可。有一次电影散了场，我在电影院门口碰见了那个可爱的音乐教师，她很想约我单独见一次面，我却因出门不方便，无法说出确定的见面时间。

但我还是独自去三兆火葬场看了祖父母的骨灰盒。我没能在祖父临终前送去他要吃的八宝甜饭是我终生的遗憾，现在我要去他灵前祭奠一回。高大的灵堂内立起一排排架格，每一个格子内放一个骨灰盒子，我按排号找到了祖父母的，给祖母的骨灰盒前放了一盒她爱抽的大前门烟，给祖父的骨灰盒前放了一包檀香，给他们各点了一炷香，然后去屋外的空地上，把我特备的两沓上坟纸点火烧了。

秋空明净，站在这西安城外东南角的高地上，我四处眺望，远处依稀可见二厂高墙的轮廓，还有师大图书馆高大的屋顶。我在师大的那班同学早毕业了，听说去向都不太好。学生最终还是学生，他们轰轰烈烈造反一场，到头来并没给自己争到什么实际的好处，等人家三结合的革委会宣告成立，所有的毕业生都被迫开往解放军农场参加劳动。经过一番整顿，然后再由校方给他们草草分配了工作，把很多家住西安市的学生都发落到了偏远的山区。那个爱穿军衣的班长，从带头造反干到当筹委会主席，也曾一度红得发紫，谁料翻云覆雨之际，他也随一大批造反派头头锒铛入了狱。听说，至今还不明不白地关着呢。

我把视线从师大图书馆的大屋顶移向二厂的高墙，正值秋收季节，墙外的田野上混杂着枯燥的黄褐与衰败的暗绿。听说 1970 年城市大疏散，厂方连劝说带威逼，迅速把全体就业工人都下放到了外县农村。事态的发展还真的让二毛说准了，的确是时机一到，能飞的，会跑的，全都远走高飞，各得了其所。就连个别在西安市成了家，并不想离开二厂下乡的老就业人员，厂方都一个个推出了大门。李稚敏可谓白出了几年苦力，本来是想混出个名堂，可惜最后还是和所有的“老就”被突变的政策一脚踢出了二厂。听说他为了能在长安县就近落户，已到终南山下一户农家当了上门女婿。茆致谊在所去的山区落不下户，拿上户口回来找厂方交涉，要求安排他重返西安，结果被扣上聚众闹事的罪名投入了强劳队，至今还关在里头。二毛听说在韩城县落了户，已与一当地女子结婚，想必是平安无事吧。长海把转往农村的户口装入腰包，一直在火车站、二马路一带混他的生活，像他这样在警察的眼皮下不务正业，谁知道还能逍遥多久。马疙瘩的结局最惨，据说因诈骗罪、投机倒把罪和诱奸女知青破坏上山下乡罪，加起来判了二十年，由二厂强劳队转到了更加严酷的青砖一厂劳改。我母亲认为我早判了三年劳教是我的运气，她说我就是躲过了初一，也未必躲得过十五。按她的估计，我当初若没去马栏劳教，而是一直和二厂那伙人鬼混在一起，说不定今天还在哪个劳改队服更长的刑期呢。

天地悠悠，福祸无端，也许母亲的话有见地，公安局运作的事情，谁能说清楚呢？

家里的购粮证上没有我的粮食关系，我再次成为食客，又吃起了别人的定量。因此我急于去高桥公社报户口，父母也希望我能在农村稳妥落下户，早日过我自己的日子。星期日，父亲从长安县请来给我办了准迁证的老张，和他商量我去高桥落户的大事。自然又是特意做几个好菜，表示对人家的感谢。母亲最怕在家中请客吃饭，按她的看法，父亲总是藉请客之机大喝其酒，因此常陪父亲喝酒的几个来客，都成了不受她欢迎的人物。比如今天父亲专门请来做陪的李师傅，母亲就尤其讨厌。李师是公司老资格的电工，能吃能喝更能侃，近来以工代干，在公司的西郊分厂跑外交，据弟弟说，自从父亲为给我办落户手续而交结了几个地方干部，李师就成了我们家的座上常客。他喜欢陪父亲喝上几锺，在帮父亲拉关系的诸多事务上确实出力不少。父亲不会搞应酬，求人办事的时候，他得靠李师制造气氛，在一边帮着腔，替他说些他说不出口的话。老张现在沣河边的沙石管理站当领导，在那个地区，他从上到下都有熟人关系，算是当地很有影响的人物。正是通过了李师的拉扯，父亲才结识了这位办事痛快的地方干部。老张给父亲办事，当然是看上了父亲在自来水公司的副总工程师职位，想给自己在城里多打通一条活路。至少就目前的状况而言，他便靠父亲的关系在西郊某食品

厂给他家槽头的几头肥猪买到了凭票供应的优质饲料。而我那张脱离马栏的准迁证，据李师后来对我讲，正是在老张初次买回饲料之后，由他亲自从城里骑上自行车去高桥搞回来的。那一天李师带上好烟，跟老张直接找到高桥公社的文书，李师给文书点上烟，亲眼看着老张连说笑带催逼，从文书手中拿到了那一纸证明。我今日能摆脱劳改队回到西安，所凭的就是那加盖了公章的一张纸。

父亲只知道靠那张纸能转回我的户口，却不知道它解决不了我在高桥公社落户的问题。直到那天喝了几杯酒，几个人都喝得耳热脸红，话越说越没有拘束，父亲趁机提出给我报户口的要求，老张这才当面讲清了报户口的难处。原来公社一级只负责登记和保存户口卡片，所谓这“农业户口”或“非商品粮户口”，最终的落户权全由生产小队掌握。只有生产小队才是真正的核算单位，土地是小队的，公购粮以小队为单位向上交纳，任何一个社员都得在具体的小队内挣工分和分口粮。你一个城里人想凭空插进来，当然要征得全队社员的同意。公社的文书可以私下乱开准迁证，却无权安排任何人到具体的小队落户，就是老张这样神通广大的人物，有力也是使不上的。父亲至此才看出了落户一事的麻烦。听老张说，现在要在生产队安插一个户口，通常都得附带很重的条件，比如大卡车、钢材、车床之类由国家控制的物资，若能搞到购买其中任何一件东西的指标，给生产队经济上带来实惠，这才有可能和队长坐下来提要求讲条件。但此类物资，当时只有专管指标审批的领导或经手购销的办事人员才有权调拨，父亲哪有这么大的神通？何况父亲还有另一件转户口的事要办，我二妹远在陇县插队，因受家庭背景的影响，至今招工都轮不到她的头上。她回到家中常闹情绪，父亲为此深感负疚。自把我从马栏转回来，父亲便联合李师，开始为二妹转户口回西安四处寻找关系。即使能搞到老张所说的物资，父亲也得优先考虑二妹的事情。我知道我毕竟已脱离劳改单位，又过了依赖父母的年龄，下一步路如何走，该由我自己努力去闯了。

父亲和李师正喝上了劲，老张早已伸手捂住他的酒杯，一再谢绝李师的劝酒。老张说，要是觉得给生产队套购物资有困难，还有另一条路可走，只是不知我们愿不愿考虑。李师让他往下说，他说那就是通过结婚，结那种去女方家上门的婚。老张说这种婚姻形式在农村向来都很平常，听起来好像不太光彩，但像我目前这样的情况，若能连落户带娶媳妇一步到位，未尝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老张进一步开导父亲说：“现在正果落户的事僵到了这一地步，依我的看法，反正他当了农民就免不了在农村成婚，还不如趁早两步并作一步走。”父亲脸上显出了诧异的神色，他那城里人的脑子显然还没有完全领会老张的意思。经李师从中解释，父亲才微醺中有所会意，表示可以考虑，说着就把正在炉子旁操作的母亲叫过来听取她的意见。我陪在一边，听到他们所说的那些话，想到自己如今竟把人生的路走到如此狭窄的地步，心里很不是滋味。看了一眼颓然举杯的父亲，我突然发觉，父亲已露出了老态。父亲今年不过五十出头，他头上靠近前额的那部分，原先头发就比较稀疏，现在已经完全脱光。陆续掉了的牙齿都还没有及时镶补，致使腮帮与面颊之间有了明显的下陷。记得在六十年代初，他还有兴致骑着自行车在院子内上台阶，越门坎，精神抖擞地玩骑车的特技表演，打起乒乓球，各样招数玩得都很像样，才不过十来年光景，他的身体竟衰退到如此地步。

老张继续讲他那上门落户的主意。他说他隔壁有个女人不满三十，刚死了丈夫，带了俩孩子，三丈宽的庄基地，新盖了瓦房，不缺粮吃，槽头养了两头肥猪，就是屋里缺劳力，所以正要招人呢……老张几乎在用寡妇招募长工的口气向我们作着介绍，说着就向父亲要我的照片，还说他这次回去，马上就去多托几个媒人。至于那邻家寡妇，老张突然停顿了一下，然后把话头一转，说他只是顺便在此提出来举个例子，并不是非要说这门亲事不可。他进而告诉我们，他那里更合适的对象还另有几个，比如有个亲戚家的独生女，高中毕了业回到队上当民办教师，听说她父母也打算给她招人……我没有单人的近影，母亲从弟弟那里拿来了前两天我与弟弟在照相馆照的一张合影。我把照片递给李师看的时候，心里感到一丝莫可名状的耻辱，对着照片上我那年轻的面容，我不由得心口一酸，一肚子命运捉弄人的无奈。看

见老张装起了我的照片，对于这位在我脱离劳改队的事情上起了关键作用的乡下小干部，我忽然生出了几许模糊的敌意。我不喜欢他那种世故、精明的神气，能看出来，他办我的事只是为落我父亲的人情。但对待我，他脸上明显带几分长辈的矜持，还摆出地方官吏的架子，眼里似乎并没把我看成一个独立的成年人。真不知经了他的手，我那张照片将在些什么男女挑剔的眼光下受到审议，再遭扼杀？

两周之后，老张又来家里拿父亲给他的饲料购买证，他再没有向父亲提起给我介绍对象的事。后来听李师说，老张确实热心说了几家媒，但人家一听我有前科，又犯的是政治错误，全都如避瘟疫，根本不予考虑，连张家隔壁那个长我几岁的寡妇，据说都看不上我现有的条件。老张是个粗中有细的人，表面上似乎大大咧咧，实际上做事很精明。他办不成的事情，就闭口不再提及。现在，他建议我先找点活干着，说落户的事暂且搁下来，往后再慢慢找机会。说着，就亲笔写了一张条子，叫我拿上条子去南门外一家军用被服厂找一个包工头。他说有个高桥公社的生产队在那里包工，他已和队上说好，我暂时可跟上该队的社员搭帮干活。

我跟上生产队的社员一起在城里当民工了。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活动都让户口和粮食关系死死卡住的七十年代，就在十来年以前，像老苏那样流落城市的农民，还有可能在西安打零工谋生，那时候街头还有劳力市场，出卖劳力者大清早往那里一站，总会有雇主雇你去干杂活。如果那样的人市还存在，我最坏也可以自己找些出力活混一碗饭吃，如在建筑工地上和泥搬砖当普工，拉上架子车搞搬运等等。然而就是这一类粗笨的体力活，现在也得通过街道办事处安排，你没有户口，就什么工作也不许你做。修路、基建和人力运输等重体力劳动的活路现在大都廉价包给了生产队，农民现在由生产队组织起来进城干活，特别是干城里人很少干的体力活。城里人习惯称此类打工的农民为民工，明确地把他们与国营或社办企业的正式工人区分开来。民工被限制在国有体制的大包干之外，他们是纯粹出卖体力的劳工，在城里人的眼中明显低人一等。

民工干工厂里的活，挣的却是生产队的工分。工厂雇民工，只与他们所属的生产队直接签约，工程结束后，厂方才会把款项汇入承包工程的生产队户头。在整个过程中，干活的民工根本见不到现金，只有等到年终决分，他们才能从生产队得到自己干民工的部分报酬。他们背上铺盖住在工地上临时搭起来的工棚内，我也背上我从马栏带回的铺盖与他们住到一起。他们在工棚里自己办灶，各人都用面口袋装上自己家磨的的玉米面，交到民工灶上，交多少粮食，发多少饭票。我也给灶上交粮，都是父母从粮店或黑市上买来的粮食。与其它民工一样，直至最后结账之前，我个人的一切花费得自己预支，连干活所用的一把铁锨都是拿我父母的钱自己去店里买来的。要说来这里干活是为了挣钱养活自己，那钱暂时也只是记在账面上的数字，兑现尚在很久以后，而在兑现前的整个做工期间，我的吃用仍然要靠我父母。有时候，我自己都弄不明白在这里辛苦打工的意义到底何在。到底为什么？是为了在外面找个干活的地方，免得每天在父母面前惹他们心烦？是为了在下乡前亲身体验农民在城里所受的低下待遇？还是仅仅为了有一个工棚可暂且栖身

弟弟妹妹对我都很好，我们家中任何一个成员从来都没有做出要和我这个“反动分子”划清界线的表示。弟弟的工资很低，有时还给我零花钱买烟。二妹把她在农村插队处省下的粮食卖了，得了一百多斤粮票，拿回来交给母亲，算是补了我自马栏归来给家中粮食造成的亏空。大妹远在大同工作，单位的农场给职工分了很多土豆，她听说我报不上户口，写信来说要给我多寄些土豆回来。我当时正在当民工，即刻给大妹去信，叫她不要费事邮寄土豆。二十多年后，她把那信复印了一份寄来供我咀嚼。现从中节录一段，抄在下面，聊示我当时心迹之点滴：

智妹：

来信收悉。土豆不要寄了。一则不好寄，二则邮费折合不划算，我归家后暂时粮食还不成问题，你们就不必为此操心了。

……

我在南郊三五三八厂已劳动二十来天了。每天劳动十小时，没有星期日。具体的活路是铺水泥路面。我有时用铁锨把混凝土装入架子车，有时拉车运混凝土，劳动强度甚至比劳改队还重。不过，这一切我都能经受住的。吃的是农民自己的灶，伙食当然差些，只好以吃饱为原则。今后的生活不会比这更好的，现在还是在城市，将来要长期在农村，还能求什么更好的？这里工资是每半年结算一次，所以我打算先干到年底再说。在城市里过着农村的生活，在工厂里以农民的身份出现，各种刺激和印象在我思想深处的波动是相当复杂和矛盾的。不过这一切我都会合理地调节。不管怎么说，算是为以后过真正的农村生活先来个演习，经一番考验。而更主要的还是为让父母安心，让他们对我这个始终都不放心的儿子产生新的看法，若能做到这一点，也就是我目前唯一能给他们的精神安慰了。

……

祝好

果子

1971年10月31日

三十三 老贫协

腊月中旬后，民工全部回家过年，工地上停了工，我只得回到父母处闲住。从年前到年后，我骑上父亲的自行车多次去生产队讨工钱，始终没讨到分文。转眼间正月就要过去，那天天气晴和，母亲又催我去高桥公社五席坊大队四小队要我的工钱。好容易找到了包工头牛顶汉，他答复我的仍是老话，说城里的款子还没汇到队上。我怀疑其中有弊，但毕竟在人家的地盘上，也不便当面对他发作，只好咽下这口气，推上车子怏怏地离去。

出了村子，路过村外一块休耕地，有几个四队的社员在地里干活。听到那边有人喊我的名字，走近一看，原来是工地上干活时认识的选民。他正在和他爸打土坯，他把湿土丢进模子，他爸用力将虚土夯实。见我走过来，他们放下手里的工具，留我在地头跟他们聊天。我给他父子俩及其他人散了烟，他们遂就地休息，和我闲聊起来。听说我来村里向顶汉讨还工钱，选民他爸向我打趣说，明年这时候若能要到手，都算是我的运气。选民他爸四十来岁，名叫国栋，说话很有风趣，与他们几个人东拉西扯间，我很自然地扯到了想找个地方落户的问题。国栋听说我想落户，显得很感兴趣，果然如老张所说，他立即问我搞得到几方木料或一台车床之类的物资，一副充当中间人的口气，好像他手中就有个现成的去处等着做户口换物资的交易。我说我要是有那么大的神通，也不会跟上四队社员打工，大老远跑来讨这一点工钱了。国栋于是中止了他兴致勃勃的开价，转而很现实地对我说："看来你也是个可怜人，那就得走另一条路，或者当上门女婿，或者给孤寡老人当娃。这类事就是干部想挡也挡不住，只要谁家要招女婿或收养儿子，生产队就得批准。"我说我绝对不愿意上门，但要是有人收养儿子，我倒愿意考虑。国栋看来是个爱包揽闲事的热心人，他当下便问身边的几个村民，说把我说给他隔壁的李宝玉怎么样。我再次给大家散烟，他们都怂恿国栋带我去见李本人，接下来国栋就给我简单讲了李的情况。他说李宝玉今年约莫五十六岁，是个老光棍儿，现任村上的贫协组长。新旧社会他都一穷到底，至今还住在两间建于二三十年前的破土屋中。说着国栋抬头看了看略微偏西的太阳，就叫大家收工回村，顺便约我去那贫协的住处看看，叫我先和他见个面。我在父母处住得实在腻味到极点，现在的情况又类似师大开除我回家的时候，户口和吃饭的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依赖父母，身份不明等一系列问题，再一次逼得我无路可走。我急于给自己找个安身之地，对眼下这给人当娃的事，我也不想仔细考虑于我是否合适，便抱着不妨试探一下的态度，径直跟国栋回到村里，走进了那贫协的土屋。

称这类房子为土屋，是因为整个的房屋基本用泥土建成。关中地区普通农户家所谓的“厦屋”，大多是这种结构：背墙和两对面山墙都是夯土而成，只有檐墙的基础有几层砖头，往上均为土坯砌成。屋顶只有从背墙到檐墙的单面斜坡，所以屋内极其窄狭，光线也不够明亮。李宝玉这两间土屋没有卧室与厨房之分，一头是炕，一头是灶，烟熏火燎，顶棚和墙上一层黑灰，角落结满下垂的尘絮，靠墙根摆了几个瓦瓮盆罐。看着这陋室内的一切，我心里不由慨叹，真是个家徒四壁，穷得叮当响的老贫协啊。国栋介绍了我的简况，那贫协听说我家住在城里，父亲又认识管理站的老张，立即对我落户的事表示很有兴趣。国栋于是叫来我早已认识的顶汉，由他俩从中协调，再联络上四队的副队长，几个人讨论了该办的手续和要向我们提出的条件，然后决定下午一起去见老张，由他最后拍板。我发现国栋和顶汉俩人都能说会道，经他们三言两语一煽，那贫协对收养我的前景立即显出十分乐观的样子。正蹦上村里吃午饭时分（关中农村的午饭一般都在下午两点左右），我眼前这位动了收养儿子念头的贫协兴致冲冲，说话间就生火烧开一锅水，捞一大碗挂面端给我，还特意从土墙上储存东西的窑窝内拿出正月十五留下的红烧肉，说着就往我的面碗内放了少许。我肚子真的饿了，明明瞥见那几块肉上沾有黑灰，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筷子头挑起面条就大口吃了起来。

老张已与四队队长以及几个有关的人议定，近日内便陪同李宝玉进城与我父母见面，在我家把我落户四队的事最后敲定。李宝玉那两间急待翻修的破土屋可以说是促成此事的主要因素。那土屋实际上比棚子好不了多少，屋顶上并无片瓦，只覆盖了一层胶结的干泥以防漏雨。听说四队还有很多买不起瓦的人家住的都是这种土屋。那是一种从沣河滩的盐碱地上挖回来的碱土，极富有黏性，和成了泥，敷上屋顶，干却后便结成一层硬盖，能在短期内起到防止漏雨的作用。多年来，李宝玉以及四队不少住土屋的人家，每到夏季，都要去河滩上挖回碱土，和成麦秸泥，在雨水已经冲薄了的旧泥层上重敷上一厚层新泥，好混过秋雨淋漓，冬雪纷飞的日子。但近几年来，李宝玉那土屋实在很难再靠碱土凑合下去了，一蹦到霖雨季节，屋内就漏得摇筛子一样，炕上和地面全摆满了接水的盆盆罐罐。他本人和邻居都担心，再这样漏下去，说不定哪天一场大雨就会下得他房倒屋塌。李宝玉年年算计着买瓦，但一年年过去，迄今也没攒够那笔瓦钱。

国栋热心撮合，队长一心支持，大概都和这破土屋急待拆换有一定的关系。五席坊大队临近河滩，土地比较脊薄，国家配给的那一点化肥根本不够使用，至今种地还以农家肥为主。除施圈粪之外，他们一直习惯兼用墙土，即将旧土屋放倒的土墙和土坯打碎，运到地里当肥料使用，据说越是陈年老屋，那闻起来呛鼻子的墙土越是肥田。这一带的生产队，每年开春都要打很多土坯，拆几家老旧的土屋，用了他们的墙土，再由生产队抽调劳力帮他们盖上新房。队上无偿用了私人的土肥，私人也不花钱用了队上的劳力，这种两方面均有利的拆房盖房作业在村里的各户人家之间长期轮流执行着，今年正好轮到拆国栋和李宝玉两家共享一道背墙的土屋。国栋和他大儿选民去年在城里拉架子车搞运输挣了些钱，已做好今年盖新房的准备，无奈李宝玉手头照旧没钱，眼看队上就要动手拆他的土屋，他还是拿不定拆旧盖新的主意。他不拆那破土屋倒也罢了，但只要他不拆房，就会对国栋家盖房有一定的妨碍，同时也会影响到队上春季活路的统一安排。正当李宝玉在拆房盖房的问题上一筹莫展之际，突然冒出我这个想落户的城里人，一听说我父亲在自来水公司当工程师，月薪不菲，他们便把我进李家门的条件与李盖新房的事挂上了钩。

我今年二十八岁，要是当初大学顺利毕了业，分到国营单位工作，按一般人的正常年龄结婚，也该是孩子他爸了。无奈老天爷作弄人，世事荒谬颠倒，已是将近而立之年的人，不惟自立不了，还得花上父母的钱，去认个贫光蛋养父。

前方的麦野一片晦暗，蹬车子行进在回家的路上，我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我已与老张约定，过几天他就领李宝玉等人来见我父母。但这是我自作主张定下来的，也没事先与父母商议，过一会回到家中，真不知该如何向他们交代。母亲准会又像往常我闯了祸以后那样责

备我说："你这害祸，你给康家把人丢够了！"

是的，这一次我可真是给康家把人丢够了，丢透顶了。

三十四 李春来

老张带上李宝玉、四队副队长和介绍人乔国栋，按约定的那天来到我家。双方议定，我父母提供李宝玉盖两间厦屋和一间厨房所用的新瓦，我在1972年4月1日正式到四队落户。从去年九月解教至今，我悬了半年多的居住权终于有了着落。但对我父母来说，这落户的方式也实在不太光彩，往后，亲友们若问起我的去向，真不知他们将如何张口给别人解释。

那天老张一行人离开我家后，李师陪父亲喝着酒，给父亲说了不少宽心话。面对父亲脸上那难以言说的窘迫，他向父亲强调说："能把果子安顿下来就很不错了，你先放下儿子的包袱，下来才好办女儿回城的大事。再说，现在这世道谁还笑话谁呢，大家不都叫运动整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各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呀。"父亲一言不发，只顾喝他的闷酒，李师的话也许可缓解一下父亲此刻那无奈的表情，但未必能化解他心底的苦涩。只有他自己知道那是啥滋味，别人是无法体会的，就是我这做儿子的也体会不了。

其实送我去乡下的想法，父亲早就有过。我刚从师大开除回家时，他就曾打算送我去他住在农村的一个老同学家中落户。而且据我奶妈所说，父亲写过一份遗嘱，书面上托付她把我带回乡下抚养。我甚至在心里胡乱猜想，对我这个不争气的长子，说不定父亲已多次起过抛弃的念头了。

那还是西安刚解放的时候，祖母和父亲，还有三伯，他们全都抽白面儿上了瘾。祖母三天两头变卖家中可卖的东西，三伯抽得媳妇和他离了婚，父亲则因一屁股烂账无法偿还，有一天服下了一瓶安眠药片。他想以自杀了结债务，好把他所有无人知晓的苦恼从此一笔勾销。事情发生在一个阴暗的下午，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母亲惊惶失措，跑过来叫我奶妈，差她快出去请医生，说是父亲服了二十多片安眠药，现在舌头发硬，已躺在床上不省人事了。全家人动作很快，即刻把父亲送进医院，幸亏抢救及时，几天之后，他出院回家，一切都恢复了正常。听我奶妈对别人说，父亲住院后，母亲在床头发现了他写下的遗书，遗书上说，他死后，母亲若改嫁，可带走我的两个妹妹，但我这个男孩得留在康家。他特别要求家人把我交给我奶妈带回乡下，并托付我奶妈把我养大成人，供给我好好读书……后来，奶妈一讲起这件事就很感动，讲得她眼圈发红，再往下说，就溢出了泪水。她仿佛不是在讲述遗嘱中那没有生效的委托，而是在讲她业已承担的重任，好像我已经失去了父亲，好像她马上就要带上我离开康家回乡下去了。而如果这确实是事实，对我对她来说，不幸中万幸的便是，我没有让我母亲带到不知道什么人的家中，而是被安排跟了她。她深信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待在她身边才不会吃亏，其他任何人都是靠不住的。她的落泪甚至有对父亲的感激，感激他在他那个不负责任的遗嘱中唯独选择她托付了我的未来。直到事情完全过去，直到父亲已经上班，每提起那早已作废的遗嘱，听我奶妈叙述的口气，依然像是在讲昨天发生的事情。甚至直到多少年以后，我从师大开除后进了二厂，有一次去我奶妈家拜年，她还满怀遗憾地对我说，早知道我受家庭成份的影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那时候她就求我父母把我寄养在她家。要是从那时起我能跟上她填写她家的贫农成份，也许还不至于落到开除学籍的地步呢。不知奶妈所讲的托孤之说确系父亲遗书中的原话，还是她自己转述时一厢情愿做了夸大，戏言也好，误传也好，哪怕是奶妈的杜撰也好，不管怎么说，当前的去向多少算是应验了从前那个空洞的传闻，尽管现在这事情由我做主，与我父亲完全无关。然而，如果现在的收养发生在我和奶妈之间，至少也算了结了她从前的心愿，而且对我父母来说，感情上也比较容易接受。可惜现实很无情，生活中似乎并不存在故事里所编的那类巧合，我们在人生前途上陷入的种

种无奈，不惟难以预知，且多与原先期待的相反。我要认的那个养父打了大半辈子光棍儿，至今盖不起瓦房。而我，只因走投无路，非得下乡　　落户求一时的安身，就这样和他陌路上遭遇到一起，各抱各的目的和利益，在一个锅里抡起了勺把。

我落户四队，是关系到全队社员的大事，李宝玉得招待相关的人员喝酒吃饭，也算是借机召集乡亲，当众庆贺和见证他收养了我这个儿子。我带上我那一套历经师大、二厂和马栏的铺盖，在前一天下午到达五席坊四队。李家和乔家连墙的土屋早已拆掉，庄基地上打碎的陈墙土堆了一大堆，社员们正在把墙土运往麦地，街道上尘土飞扬，空气中一股子呛鼻子的土腥气。副队长世全挥锨往架子车内丢着土，满口夸这墙土气味冲，肥力足，同时大声督促装车拉车的社员干活。李宝玉临时搬到生产队柴草场的草棚下住宿，四月一日中午，以队干部为主的聚会便在那里面举行。

老张和大队小队的相关干部，以及本村几个有头面的老人，全都应邀出席，李师也陪父亲专程赶到了现场。与会的村民大都面带赴宴的喜悦，吃了长面，喝罢酒，国栋给大家散了烟，这时顶汉向所有在座的宣布说："各位都听着，凡在这桌子上动了筷子的都是证人，李宝玉收养儿子的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还有啥意见没有？"他问了大家，见没人提出异议，就接着说："没意见就好，那咱们四队全体社员就算一致通过了。"正是午后吃饭时分，这边的与会者打着饱嗝，脸上淡淡现出喝了几杯的红光，而那边，离就餐处几步之外的地方，围了好多四队的社员在看热闹，特别是一些妇女们，叽叽咕咕，往这边指划着，都把打量陌生人的目光投向了我和我父亲。

饭后，四队会计让道填写我的户口卡，他要我当下立个字据，并对我说，按收养的规矩，在户口卡片上，得填写我姓"李"，到公社才能报上户口。现在起草这个字据，就是要注明我改姓为"李"。让道有点抱歉地向我提了这个要求，他叫我对改姓的事可别见怪。我让他放心，说这道手续，老张已向我提过，我早在心理上有了准备。事情已到了这一步，我还能弹嫌什么。这些年来，我给父母制造的难题和怪事也够多了，他们也叫我折腾得见怪不怪了。父母都能想通，我还有什么不能接受？接下来再转念一想，能趁这机会变姓易名，也未尝不是好事，另换个身份在农村安居下来，总比窝在父母家里吃闲饭的处境好受。就是有苦，也是我自罪自受，不必连累家人，免得家人都跟上我不愉快。把猫叫个"咪"，难道猫就不是猫了。我略沉思了片刻，然后对会计说："光改姓不改名，叫起来怪怪的，我现在来四队正当春天，就在字据和户口卡上改成李春来好了。"

字据很快写好，上面规定了双方的义务和责任，包括李宝玉负责为我娶媳妇，我对李宝玉养老送终之类的事务。李宝玉和我各存一份。李年长我父亲几岁，按这里的叫法，我对他以"伯"——就当是我父亲的兄长——相称。经过这一道命名手续，我的身份终于得到确定。从现在起，我正式成为四队社员。根据我伯在村里的辈分，我这个外来户也很顺当地进入了村民的称呼系统。现在我与村民们都是乡亲，有叫我春来哥的，有叫我春来叔的，甚至有叫我春来爷的。

"李春来"或者"春来"，就这样在五席坊大队，以至高桥公社范围内叫开了。

刚开始听人开口叫我"春来"，我一时还难以迅速反应过来，我又没喝迷魂汤，过去的生活哪能像脐带一刀割断？旧我与新我还重叠在一起，乍一听起来，那新名字不只生疏、隔膜，还有点刺耳。但四队的村民与我不同，对我的落户，他们都看得很认真；对待我和我伯的收养关系，他们都按照世代相传的人情习俗办事。我只当作落户手段履行的那道手续，在他们心目中可是真实的契约。通过那道转换身份的手续，我就是这村里的人了。很少有人了解我的过去，也没有人特别关注我的过去，从"李春来"这新姓名生效之日起，我即获得了类似转生的面貌。仿佛从个人历史的高空一下子空降到一张白纸的土地上，仅在一个下午之间，我便以全新的身份出现在四队社员面前。没有人特别在乎我思想反动，也没有人追究我先被开除，又被劳教的经历，但也没有人重视我上过大学，读过很多书，会摇笔杆子。我如

今可真像劳改队用语所说的那样，过上了“重新做人”的生活。我得与新旺村的人打成一片，努力做个合格的农民，就像土生土长在这里。

三十五 宝玉这秃尖子

1972 年四五月间，队上拉完墙粪，接着就出劳力给我们盖房。从垒墙到立屋架，到盖屋顶，到泥墙，到盘炕和盘灶，我都跟着大工干杂活，给他们搬运土坯，传递砖瓦，或和上一大堆泥，一锨一锨送上脚手架。为方便和泥，我常把裤腿挽上膝盖，打赤脚带两腿泥，在院子里出出进进。房实在盖得艰难而劳人，出力虽累，那力气使完了还会再有，但我手头的钱就那么一点，用完了真不知该去哪儿再搞。父母已给我买了机瓦，我没脸继续向他们伸手，我得把仅有的钱一个当两个用。买烟，要适当招待每一个干房活的社员；买钉子或其它杂物，在东西用完之后。李宝玉手头同样很紧，他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添置新料，只是用尽了旧屋拆下的所有材料，才不得已花钱添置了几根便宜的椽子。我们就这样因陋就简，搜尽可用的材料，硬凑合着撑起了两间厦屋和一间厨房。新屋其实仍是再普通不过的土坯屋，只有盖在屋顶上的新机瓦显得与众不同，比起周围那些暗灰的手工瓦屋顶，那厚重的深红确实给这土坯屋增色不少。村里的人都夸那瓦的成色好，说它烧得厚实，是不折不扣的正品，在啧啧称羡之余，又都慨叹现在的砖瓦厂再也难生产出“文革”前出厂的优质产品了。

瓦完房，尚有二十多块剩瓦，暂时都堆在屋檐下。这院子临街处还没打墙安大门，过路的人抬脚即可走进院子。见屋檐下还有剩瓦堆着，就有人打起了借瓦的主意，爱使小心眼的宽让首先开了口。他走上前掂起一块瓦，出口便要向李宝玉借用，说是过些日子他要修理门楼，这些瓦不多不少，正好能用在他家的门楼上。李宝玉一口回绝，说他这些瓦还另有用处。借瓦的人接踵而来，前仆后继的，一个个口气都很认真。李宝玉单身过惯了，在村里是有名的“独活虫”，他们并不是不知道他铁公鸡一毛不拔，可他们就是硬要碰这个钉子，想拔下几根毛来。我算是初次领教了人活在贫穷和匮乏中的难处，好像只有家家都没有，谁也不比谁的多，这才能彼此相安无事，若别人没有，单单你有了，就免不了招来麻烦。比如现在，这村里唯独李宝玉盖起了机瓦房，有些人在羡慕之余，就恨不得从他的屋顶上揭下来几块拿回家去。我不太懂得爱惜东西，也受不了索讨的纠缠，他们要是从我手中借瓦，我可能早就借给他们了。但李宝玉现在是一家之主，住了几十年碱土棚，好不容易盖了瓦房，而且是全村唯一的机瓦房，他当然有理由珍惜他的每一块机瓦，舍不得借给人的心情也完全可以理解。为避免借瓦者纠缠，他索性把那些剩瓦搬进屋子，就靠住炕头的板柜摞起来，平时没事门一锁，钻到不知道什么地方躲清闲去了。他们都讥笑他连几块破瓦都贵重地锁到屋里，背地里骂他秃尖秃尖，越秃越尖。

不知道李宝玉什么时候害过秃疮，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包起了头巾，据说，自他从武功县流落到这个名叫新旺村的大堡子，他头上那条白羊肚儿手巾便扎得封条一样严实，不管天气多么热，不管他头上流下多少汗，谁也没见过他抹下头巾露出头顶来。这新旺村里以牛姓为主，解放前，身为外来户的李宝玉一直在姓牛的财东家扛长工。那家财主待长工还算不错，讲起了李宝玉的往事，国栋老是说他在财主家“干的是㞞管娃的活，吃的是㞞管娃的饭，”日子久了，差不多都成了那个家庭的半个成员。他干家务活的时候比干地里活的时候多，或带上财东家的孩子去邻村看戏，或给他们家的妇女跑腿买东西，碰到了不满意的事，他小则嘟嘟囔囔，大则骂骂咧咧，有时厨房里还对执炊的主妇顶撞几句，发一通怨气。东家的人都知道他不明事理，也不太计较他那个猴脾气。

那头巾紧裹在头上的时日久了，无形中已变成他身体外延的部分，他的自我的外壳，掩盖着他的脆弱，标明了他的禁忌，也强化了他的防守意识。漫长的孤立使他蓄积了太多的疑

心，对他人总是缺乏信赖，对外界暗怀模糊的敌意，但又没有胆量确定明确的攻击对象，只是在随大流乱起哄的情势下，他才敢趁火打劫地发怒泄愤。一次在地里干活时几个人谈起了李宝玉，国栋就很幽默地对我说："春来，别看你伯现在当了个贫协，他解放前可是地主家的狗腿子呢。"听了国栋这句话，我脑子一时还转不过弯来。贫协如何同狗腿子共存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似乎比"秃"和"尖"的必然联系还令人难以理解。国栋继续给大家勾绘李宝玉的漫画，说他扛长工的时候，东家若和别人吵闹，他老是在事情闹起来才跟在别人屁股后头摇旗呐喊，但从没见过他首先冲出去向谁大打出手。按国栋的说法，李宝玉并不是个真正的歪人，只不过爱跟在东家后边咋咋呼呼，显得他比地主本人还凶罢了。国栋最后总结说："宝玉只有在人堆里起哄时显得厉害，实际上连当个帮凶都不够格，这就是他当'狗腿子'的整个表现。"后来就解放了，村里闹起土改，他这个长工理应是最有条件分地主房地产的一员，但斗地主时不知听了谁的几句话，吓得他跑回了他的武功老家，等他再次返回新旺村，能分的东西已分得光光净净。他能住上那个碱土棚，并得了这么大一块庄基地，据说都是受了他外甥女家的照顾。此后他一直是四队最穷的一户，自然也成了最有资格充当贫协的一员。

"涨管娃"是村里人的口头语，是不负责任，什么也不管的意思。从不操闲心在财主家干活吃饭，到不操闲心在生产队干活吃饭，可以说只是个形式上的转变，两者本质上完全相通，都属于"涨管娃"心态。这里的村民每说起"涨管娃，打电话"这句口头语时，总显出一副满不在乎，洋洋得意的样子。满足当长工的人自然也乐意在生产队当个社员，他没有私心是因为他没有私产，而且根本没有本事挣私产和守私产。之所以喜欢不操闲心地干活吃饭，正是因为不会管理经营，完全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因此，只要有一个给他活干，给他饭吃的"东家"，他就会去投靠，不管这个东家是地主还是生产队。在中国广大的农村，正是像李宝玉这样不善于单干的农民大有人在，土改后的合作化运动才得以发动起来，才涌现了那么多积极分子。

贫协本来是贫下中农监督生产队干部及其日常事务的群众组织，理论上是代替社员说话的，但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它形同虚设。队干部们知道，让李宝玉这号人当上贫协，有个职位，正好堵住了他那个喜欢嘟囔的贫嘴。他们当然心里都明白，他既不厉害，也无帮派，不会给队委会决定各种事务时制造障碍。他们还知道他好跟着别人起哄，因此也是不同势力拉拢的对象。在生产队这样你争我夺的集体中，当队长的总需要扶植几个根红苗正，敢跳出来乱咬一气的人物。李宝玉正是这样的人选。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他这个光棍儿虽然吝啬，却不贪他人的东西，脾气倔一些，却干不了阴险的坏事，而且是村子里唯一没有临街墙和大门的农户。几十年来，李宝玉的破土屋敞开亮在左邻右舍间，连把集体财产偷偷往回拿的起码条件都不具备，集体的事务让他监管，至少比交给其他有家有户的人让大家放心多了。就是这样一个常识和智力几乎达不到一般水平的人，本来很可能与队上其他几个傻瓜一同沦为受人嘲弄，供大家开心的角色，却因与其他也有资格当选贫协的人相比，只有他显得最没有危害性，因此才能多年来在四队连任贫协组长。不管有人背地里怎样蔑称他"秃尖"，但面对面的时候，我还没见谁随便向他发起过挑衅。

关于李宝玉的笑话，国栋他们重复最多的就是他有过一夜夫妻生活的那则旧闻。那还是在困难时期，在长安县这个尚未受到饥荒严重威胁的地方，不知有多少光棍儿都凭一碗饭把沿门乞讨的女人迎到了自己的炕上。每当地头休息谝闲传的时候，国栋总是这样给我们开讲。他说："有一天吃午饭时分，一个中年妇女走进咱们村要饭，听口音是河北人，衣衫不破不脏，说话还有点斯文。选民他妈给那女人舀了一碗汤面，饭市上就有几个人问起了她的情况。"饭市是村里人在吃饭时端上碗到户外聚集在一起吃饭的地方，就像在地头休息时大家常议论各种事务一样，很多公共的话题也常在饭市上展开。国栋的描述总使我想起他把我介绍给李宝玉当娃的经过，也是经了几个好事的村民三说两说，那要饭的女人径直就被引到了李宝玉的碱土棚下。一切都办得比住进旅馆的房间还要简便，李宝玉屋里既有粮又有炕，那女人进

了门就被安排上了炕。国栋去供销社买回一鞭炮，挂到那碱土棚的门口放了。拴柱回家抱来了他炕上新婚的一床被子，给李宝玉临时布置起新房。世全那时候当队长，他当晚叫来队上的几个干部在李宝玉家吃饭，饭桌上就算通过了李宝玉和那女人从此睡在一起的手续。队长银嘴当时还很年轻，那天夜里，他叫了几个小伙子藏在窗根下，专等吹灯后听房。银嘴说，他们听了好久，听到底也没听出什么特别的响动，只听到李宝玉从炕上下来又上去，反反复复好几次，干打雷不下雨样子。又听到那女人叫李宝玉把他的头巾解下来，说那上面有一股子难闻的气味。然后有脱衣裳的声音，接着就听见那女人抱怨他干不成事，好像是嫌宝玉那玩意儿太不中用。银嘴几个人在窗外继续听下去，一直想听到男人和女人睡到一起总会发生的那种响动，却到底什么声息也没听出来。第二天吃过早饭，那河北女人闹着要进城洗澡，她要李宝玉带她去城里的澡堂子洗个澡，也要李宝玉自己好好洗一洗，说是洗得白白净净的，晚上回来好舒舒服服睡觉。李宝玉没到晚上就独自回到村中，他说他买了澡票，两个人分别进了男女浴池，等他从男浴池出来，再也没看见那个爱干净的女人。

我和我伯李宝玉的日子正在走上正轨。新厦屋中间一道墙隔了两间屋，我们各走各的门，各睡各的炕，平时各干各的事，一天之中，大都在进了厨房，一起做饭的时候，两个人才面对面说上几句必要说的话。新瓦房刚盖起来，我又是新来乍到，在这个新组合的家庭中，一切都呈现出新开端的气象。李宝玉只指望两个劳力多挣些工分，多分些现钱，慢慢把日子过红火起来，等我有个媳妇娶进了门，再生几个孩子姓了李，就真正成了一家人了。人逢喜事精神爽嘛，上下工走在路上，吃饭时端碗来到饭市上，李宝玉满脸都是喜滋滋的样子。按照国栋打趣李宝玉的话来说，“那秃尖子高兴得连他的葱头鼻子上都冒出了红光。”

李宝玉在队上主管务棉花，开春后常单独干活，上下工的时间由他自己掌握。因此他总比我早回家，等我跟大多数男劳下了头晌工，走进院子漱洗完毕，他已做好了简单的早饭。正当忙前的日子，是农村一年中青黄不接的季节，四队的社员中家家都缺麦面吃。早饭通常喝玉米糁儿，再搭配些玉米面饸饹。饸饹是压得很瓷实的食物，吃下去特别耐饥，没有白面时，村里人都把饸饹当干面条吃。因为玉米糁是淡的，喝在嘴里寡味，所以调拌饸饹时，总是把盐、醋、辣子和蒜放得很重，喝一口玉米糁，再就一口饸饹，凑活着就算把肚子填饱了。从冬天到新麦子分到手以前，村里的人大都是这个吃法。

这里是关中农村那种典型的粮棉区，种粮食交纳公购粮，种棉花完成上面下达的收购任务，除了种上几畦葱和韭菜，队上根本没有多余的土地种任何蔬菜。村中各户人家，不管日子过得是好是坏，全都不讲究吃菜。菜因此成了最缺乏的东西，吃菜比吃粮还要艰难，很多家庭顿顿吃的都是妇女们自制的浆水菜。那是用野菜或城里的菜场弃扔的老青菜叶子泡制的酸菜，平时泡在酸菜缸内，饭时捞一些切碎，调上盐下饭。我们家没有酸菜缸，所以没有酸菜吃，我们去附近的咸阳买些容易长期存放的洋葱，酸辣饸饹吃厌了，就切上一小碟凉调洋葱下饭。午后休息的时间较长，下工后，总是我和我伯两个人一起准备午饭。我在灶下烧火，他在面案上扦面，他面扦得很利索，等我拉着风箱烧开了锅里的水，他的面条已切出来等着下锅了。忙前以吃汤面为主，汤面内同样没有什么青菜可放。只是蹓到从队上分回一把韭菜或几根葱的时候，小铁勺内滴上几滴油，把切碎的韭菜或葱倒进去，火上架起铁勺子炒一炒。然后把少得可怜的炒菜搅入锅内的汤面，让一锅白面条漂上星星点点的翠绿。这样的汤面，舀进碗挺好看，吃到嘴里，也带了点淡淡的油香。晚饭大都随便吃吃，一块馍或一碗剩饭填填肚子，一日三餐的事务就算告一段落。这时社员们都拿上记工本去记工员那里登记当天的工分，有时候在人堆中谝一会闲传，回到家就吹灯睡觉了。

离开劳改队转眼已是一年，我不再有饥饿的恐惧，吃多或吃少，也不再是我每天关注的大事。吃饭现在只是个吃饱肚子好干活的问题，吃饱肚子就像给机器加足油一样，首先为的是干起活来劲头大。等多挣了工分，多分了粮，最终，就更有条件吃饱肚子干好活了。

三十六 “吾不如老农”

四队人穷，光棍儿比其它队都多，收养儿子的人不只李宝玉一个。另有些先打光棍儿后来结婚晚的，娶的都是带上孩子进门的寡妇。比如副队长牛世全，穷光蛋一个，老大年纪才结婚，现在跟上他姓牛的俩儿子便都是老婆带过来的。再如木匠牛师，多少年娶不起媳妇，后来娶了个戴地主分子帽子的寡妇，那女人带来的两男一女便都跟他姓了牛。会计让道住在我家隔壁，是他养父从亲戚家要来的娃。正队长银嘴是牛家的外甥，银嘴他舅牛顶汉从小在外逛荡，顶汉他爸见顶汉不成器，怕将来靠不住，就把外孙子收养到家里顶门。顶汉从劳改队回来后仍是光棍儿一个，不久前才收留了一个从夫家偷偷出走的甘肃女人，那女人进门时就带了一儿一女。穷光蛋的日子就是这样穷凑合的，翻一翻四队各户的老底，差不多有一半家庭都是此类杂乱的组合。所以在四队切不可骂人“杂种”，若随便用这句话骂了人，往往会犯众怒。

在所有的外来户中，只有我情况与众不同。人家都是农村人，从外村迁至本村，过的是同样的日子，干的是同样的农活，只不过换了个地方当农民，一改姓也就和本村人没有什么两样。唯独我来自西安，虽说当了四队社员，但社员们依然把我当城里人看待。别的先不说，只说我干起农活那两下子，老农们就看不顺眼。

老农们虽不识字，但都懂得“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句古话的道理。他们认为，做一个精干的庄稼人，各样农具首先需配备齐全，且应收拾得干净利落，以便用起来得力顺手。比如锨把镢头把，都需安装牢固，还要略显轻巧；锄刃镰刃，要随时磨砺，务必保持锋利。我来新旺村只带了一把锨，只有干起用锨的活路，我不愁没工具用，除此以外，我常会缺这个少那个，急用时便到处瞎抓乱借一气。于是，那些干活认真，且爱置农具的人便有了怨言。他们抱怨我说，我到四队是混工分来了，干农活连常用农具都没配备齐全，到底算是哪一号社员！

老农们还很讲究干活的姿势，对手持工具时一举一动的架式，都像练功一样做得一丝不苟。他们常在地里指教一些散漫的年轻人，给他们示范，教他们干活要有个干活的样子。我就是经常受他们矫正的一个。我在我的锨头上安了个很长的锨把，用这长把锨铲土，可以避免弯腰过深。我个子高，干活时最怕弯腰，但老农们看不惯我这用锨的姿势，他们嫌我的动作拖泥带水，指责我不该把一步到位的动作分成两步完成。有人指教我说：“干活时该猫腰就要扎实猫下腰，年轻人嘛，打一开始就该磨练弯腰的功夫，咋能在老人面前喊叫腰酸呢？”听他那口气，好像只有老年人才有资格谈论腰酸腿痛的问题，至于年轻人，那尊贵的腰杆似乎还没完全长成，若随便娇气地说自己腰酸，就是僭越了老年人的特权。他们总是用“懒腰没胯”这句话指责我干活不像个干活的样子，还嫌我使用工具不带力，说我“扶起锨把像给铁锨号脉，拄着镢把像给镢头喂奶”。

我伯有一把挺不错的镢头，沉甸甸的，挖起土很是得力。可惜那镢把安得不合适，我抡起它挖土时经常掉头。头一掉我就得停工安装，地里又找不到合适的木楔子，若安得不够紧，干一会儿还会再次掉头。于是，我的干活不在行，乃至李宝玉的农具不齐备，便都成了老农们反复在我身上挑刺儿的口实。我能看出来，有些人说我，并没有什么恶意，只是想教我把活干好，大队会计他爸就是这样的。他是个居士，识字不多，能念几句经文，在这个村子里，就数他与人为善，说话和气。但也有些人不怀好意，世凯便是其中的一个。他那张猴脸生得两腮无肉，一副刻薄的样子，说起风凉话拐弯抹角的，地里干活时总是他爱数落别人的毛病，自我来到四队，他挑刺儿的对象很快就转到了我的身上。我因自己新来乍到，本不想轻易冒犯老年人，每当世凯在一边罗唆个没完没了，我既不搭理也不反驳，只是照样干我的活，一任他说到自觉无聊，再没话可说的时候。

春天的太阳暖洋洋的，照得人浑身困懒。地边休息时，纵目环顾平旷的田野，一切都让我感到异己而生疏。我心里很清楚，我不是下乡知青,不是到农村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没有刻意表现自己的必要，也没有表现好了招工回城的盼头，更不必为生产队能给我写上好评语而硬充积极。反正现在已在此落户，好坏都是这一回事了。地里这些活，能凑合着干下去，不至于搞得太不像话，我看就算尽了我的努力。我还是我那劳改队连磨带混的老样子，一副“滗管娃”的神奇，他们爱说什么，且由他们说去，手中的活该怎么干，我自有我的路数。我确实尊重老农们奉守那些干活规矩的精神，但我绝不打算追随他们。孔夫子早说过“吾不如老农”的话，农民这身份，我自信是不会长期背下去的。

架子车是农家最基本的生产工具，四队差不多家家都有，但我们家没有。上工铃响了，听队长给我派下拉土的活，我才东家出西家进地借车子，等我手忙脚乱一阵，终于拉上借到的车子往地里走去，其他人的第一趟土已拉进了村子。我喜欢干拉车子的活，就像我曾经喜欢担水一样。拉车虽比较费力，但人处在流动的过程中，又能独来独往，快慢全由自己调节，总比和一群老农在一起干活畅快多了。拉土的工作结束后，地里的麦子眼看着一天天变黄。搭镰之前，我看见公社和大队的干部一律都戴上草帽，骑上车子穿越田间的小路，在地头停下来察看麦子的长势。选民说，那是在评估产量，就根据这粗略估计的亩产量，他们订出本地区当年缴纳夏粮的指标来。估产一告结束，广播上便宣布龙口夺食的夏收开始。那高音喇叭装在村口的电线杆上，自搭镰之日起，广播里随时报告夏收的进展情况，传达公社的各种通知，不断呼叫各队队长参加不同的会议，有时还穿插些革命歌曲和用秦腔演唱的样板戏，在酷热的田野上制造出一片大会战的声势。

选民把我叫春来叔，他现在成了我最忠实的帮手，我蹴上很多干不了的事情，都有他来及时相助。选民个子不高，人虽长得黑瘦，干起活却劲头十足。我们是两隔壁，吃饭时他爱端上碗到我屋里，我们边吃饭边说话，饭后我总给他烟抽。开镰的前一天晚上，我和选民在一起做割麦的准备，淡淡的月光下，两个人一起磨镰。我伯多年没割过麦了，他那生锈的镰刀让我磨了好久，才慢慢磨出了白刃。次日，天麻麻亮，上工铃急促敲响，我随同全队男劳一起下地，来到麦地边，才发现自己根本不会割麦。

队长银嘴带头割起走镰，其他人在地头一字儿摆开，各人都摊上自己要割的那一溜麦子。我从没割过走镰，先站在一边看他们怎样割。只见他们左手抓住一把麦穗，右手挥起镰刀，唰唰地放倒着麦子，边割边向前走去。行进中，他们两腿岔开，身子前倾，人好像骑在所割的麦子上，骑手掌控缰绳一样，就凭提住那一撮麦穗，他们有节奏地挥镰向前推进。站在他们背后望去，每个人都是低头猫腰的姿势，镰刀不停地斜砍下去，麦子都整齐倒向身后，排成了均匀的行列。有割得飞快的，也有割得较慢的，但没有一个人停下来歇息，都保持着不相上下的进度。我仅试割了几下，就败下了阵。看见我那拿镰和走步的笨拙样子，银嘴担心我弄不好会伤了腿，其他的人见我割倒的麦子纷乱散落在地上，也都不愿意我跟他们搅混在一起挣工分。于是我当下就遭到清洗，被发落到妇女那边去割围镰。

妇女们都割围镰，围镰就是深弯下腰，围住麦子一拢一拢往下割。你可以割一拢麦子，放倒它，然后再割一拢。这种方式当然容易操作，但进度比走镰慢多了。如果腰弯累了，也可以蹲下来割，那会比弯腰站着割麦舒服一些，但会割得更慢。我试着弯下腰往前割去，不一会就觉得难以继续坚持，最后只好选用最笨的方式，干脆从头到尾蹲下来割我的麦子，甚至在蹲不下去的时候拉一捆麦子垫起来，跪在麦捆上割。

太阳升高了，白热的阳光照得我眼冒金星，我不时站起来直一直腰，回顾割过的麦茬地，才那么短一段，向前望则看不到尽头。所有的妇女都和我拉开了距离，我现在落在了最后。我试图追上去，但力不从心，头上流下的汗蜇了眼睛，手背和胳膊上的皮肤叫麦芒刷起了一道道轻微的红肿。我前面的妇女们全都在匀速推进，虽然不很快，但都不停歇，都一声不吭地没身在麦地间。麦子不断倒向她们身后，在每一溜麦茬地的尽头，只见各色衫子包裹在弓

起的脊背上，汗水溻过处随湿随干，现出了一块块发白的盐花。

我终于割到了尽头，紧接着回过头把割倒的麦子捆成麦捆。我捆的麦捆有的太松，有的太大，拉麦时才发现，太松和太大的都不好装车，又不得不翻工另捆。现在，我割得慢捆得慢完全是我自己的事情，割麦是包工活，割光捆净，全部拉到场上，留下的麦茬地由记工员前来丈量，各人的工分就按所割的亩数计算。我一天割下来，浑身酸困，手划破了不说，连平时的标准工分都没挣到手。晚上在记工员那里上工分的时候，银嘴对我完成的工作量很不满意，个别人的嘴里也冒出了不同的怪话。

我能辩白什么？我自己心里清楚，我还不是个合格的农民。

麦子一割完，在漫过水的麦茬地上立即犁出一条条犁沟，趁天气还不十分炎热，得抽出一少部分劳力赶快种上玉米，其他人全部在场上紧张地碾场。场上的活路尚未结束，玉米苗已在麦茬地上露出新绿，接着锄玉米地的活路就全面展开了。锄头一遍地叫"破梁"，那"梁"便是两行玉米之间的干麦茬地，而"破"则指一锄一锄挖下去，把那梁上的硬土挖开，疏松玉米苗周围的地面。干这种活，所用的大锄可不像毛主席的诗句——"天连五岭银锄落"——那样浪漫，它打造得很沉重，一道鹅颈似的弯弯连着宽过脚板的锄刃，一锄落下去，要有镢头般的重量才能破开那干梁梁上的硬土。锄起地来，正如村民们的顺口溜所说："五斤的锄头三尺的把，屁股撅起脸朝下。"这就是说，锄头一遍玉米的要领是弯下腰用劲向下狠挖，用人力把那没犁过的空地齐翻一遍。

我初次用锄，拿在手中觉得左右都不好使，每一锄下去，似乎都有锄掉苗或伤了脚的危险。见别人迅速向前推进，我老觉得自己背后锄过的地太短，前面剩下的还很长。紧跟在别人后面锄着，我时不时站住，直一直发酸的腰。国栋在我前面锄得徐缓而有力，他会交替使用左右手，一步一步迈向前去，随着锄头的起落，上身一直在有节奏地晃动。他回头看了一下我，拖长声调说出两句顺口溜给我加油："要想赶上人，前面有个大老坟。"我们每个人摊四行地，长短都是相等的，如果你摊的那几行地里有一片老坟地，那就会少锄很多，等于缩短了你那四行地的长度。可惜国栋这话说的多是从前的经验，现在人口增多，人均耕地面积日益减少，生产队农田中大量的老坟地都平了，老井也填了，庄稼像满溢的湖水绿到了每一块地的边缘，行行玉米都得一锄一锄地从头锄到尾。

我们一晌活的任务是锄四行地，此刻天色尚早，一气把四行锄完，下工早了，是会挨队长骂的，下一次还可能加大任务。因此，锄完两行，大家都找个荫凉处休息抽烟，谝起了闲传。因为我的在场，近来地头闲聊的话题常扯到西安市。这里地处沣河西岸，离西安不过四五十里路，村里至今还有不少人没去过西安。西安对他们仍很陌生，在他们口中，那地方常被描述得像是传说中的世界。显然是出于乡下人对城市和城里人的某些偏见，谈到了西安，他们常以嘲笑的口气向我问一些道听途说的事情。让道刚撒过尿，他转过身来，边系着裤子对我说：春来，你城里人都讲卫生，我看有些地方比咱农村还脏。一家子住在楼上的单元里头，把厕所跟厨房连在一起，你说到了夏天，那臭味咋叫人受得了！"我说有抽水马桶，靠自来水冲呀。其他人都跟让道一口腔，他们向我争辩说，冲不净的，进了城里的很多公共厕所，那尿臊气熏得人都能昏过去。让道接着说："我看还是咱农村好，广阔天地嘛，裤子一抹，随地大小便，风吹过去，啥怪气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你城里人出门都擦香水呢，厕所就修在睡房里头嘛。"让道的话说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我立即反唇相讥说："在地里拉屎好是好，可惜很多人都舍不得把屎尿丢失在生产队的地里，想给自家的粪堆上多攒粪，都把屎憋回家拉了。家里的茅房怎么样？不都和猪圈连在一起吗！屙屎的人屎还没屙出来，猪就在屁股下等着吃屎了。听说有个女知青下乡后第一次上茅房，都让急着吃屎的猪吓得昏倒在茅房里头了。"

我们的城乡厕所比较谈到此打住，宽让跟上来要给我讲他的故事。宽让说："那一年我到西安去办事，走到西门口突然觉得内急，咱也不认识字，转了几个圈圈，就是找不见公共

厕所。我心里着急，怕再这样找下去，非拉到裤裆不可。后来就转到城墙根一处倒了堆垃圾的地方，我一看周围没有人，解了裤子就屙。屙完了，见远处有人走过来，吓得我屁股都没来及擦就提起了裤子。这时候，那人已经走近，我害怕他看出来，就把头上的草帽子卸下来捂在屎堆上。本想拾起腰快步走开，无奈那人已走到我跟前。他见我神色慌张，一手压在草帽沿上，就对我起了疑，问我草帽下压的啥东西。我灵机一动，就对那人说，我刚拿草帽子扣了个黄莺儿，那鸟儿正在帽子下扑棱呢。我叫他先在这儿把草帽压住，千万不敢揭开，等我到那边找个布袋子回来，把那黄莺儿抓住了便宜卖给他。那城里人一听很高兴，立刻过来伸手压住我那个扣在地上的草帽。我抽身离开，拐了个弯，撒腿就跑了。”宽让的故事没引起大家的任何反应，那显然是个老掉了牙的段子，都不知讲过多少遍了。

接下来他们谈起了城里人吃饭待客的事情。有人问我：“春来，你城里人做饭，家家都用一个小钢精锅，煮上那一锅面，咋够一家人吃呢？”我还没来及张口解释，另一个人便接上了茬。他说：“城里人吃商品粮，国家有定量，早都把人的饭量吃小咧，要不，城里人怎么都没咱乡下人劲儿大呢！”第三个人插嘴说：“所以城里人都皮薄极了，留人吃饭都是耍嘴皮子，常常把客人送到门口，这才问人家吃过饭没有。”第四个人发起了议论，他说：“城里人吃的虽是白米细面，但都是国家粮仓里放了多年的陈粮。咱农村人虽是粗米淡饭，但年年吃新粮，所以咱农村人都不生病，哪像城里人三天两头上医院。”他们七嘴八舌，都挖空心思出城里人的洋相，给农村生活的优越性添枝加叶。

最后，爱说黄色笑话的拴柱把我们谝的闲传推向了高潮。他把正靠着树打盹的来水推了一把，来水一惊，鼻孔流出的那两道黄鼻涕又让他吸了进去。来水是村里有名的傻瓜，队长训起人首先拿他开骂，地头休息无聊时也都拿他寻开心，他是任何人都可以嘲弄作践的对象，四十来岁的人了，没有人把他当成人看待。拴柱说：“来水，城里的女子夏天都穿裙子，我问你，这穿裙子图的是啥好处？”来水好像还没睡醒，只是含糊地说他不知道，他没见过。拴柱于是开谝了，他说：“都说是穿裙子凉快，我老是想不通为啥凉快，那一次进城才见识了穿裙子的好处。你猜为啥？裙子底下都是光屁股，不穿裤衩，透底的凉风往上窜啊。你们都信不信？我是在公共汽车上亲眼见的。”拴柱说到了吸引人的地方，正要往下大肆描绘，那边路上传来叫卖冰棍的声音。在如此偏僻的地头，难得有卖冰棍的小贩远道而来，那一声声“凉甜的冰棍，奶油的……”听起来可实在馋人。正当赤日炎炎，闲传已谝得每个人的喉咙眼快冒出了烟。拴柱到底从裙子底下看见了什么好看的东西，大家不再关心，有几个人立即岔开话题，谈起了买冰棍吃的事情。

这时银嘴正好肩个锄头来到地头，他刚从大队开完会回来。想吃冰棍的人于是都煽动起银嘴，叫他拿队上的钱给每人买一个冰棍。宽让特别强调说，是奶油的，一个才一毛钱。银嘴不答应，说他不能开这个先例，怕弄不好其他社员有意见。说着银嘴蹲下来，吸一口烟，挠着头想了一会儿，眉头皱起，盯了我一眼，然后对大家说：“这事咱们这样办看行不行？我代表队上跟春来打个赌，春来输了，春来请大家吃冰棍，春来赢了，今天就由队上掏这笔钱。”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到我身上，我只好问银嘴打什么赌。银嘴说，咱们村的老墓地在北边和咸阳交界的地里，昨天三队刚在那里埋了人。等下了工，他派人到那新坟上插个柳树股子，我今天半夜十二点若敢去那里把柳树股拿回来，就算我赢。银嘴还说，队上打井招待人还剩下一条宝成烟，他现在把这条烟也搭进去。接下来他问其他人，说我要是不敢打这个赌，看还有人敢不敢打。他们好像都很害怕黑夜中的坟地，对银嘴的征求，始终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回应。我毫不犹豫地对银嘴说：“这赌我打定了，你派人给大家买冰棍去吧。”银嘴立即吩咐会计让道去买冰棍，叫他先拿队上的钱垫上。最后，银嘴对我说：“春来，你要是输了，明天可要掏冰棍钱，还得给我买一条宝成烟呢。”我说：“你放心，这一点钱，我还能掏起。”

三十七 打赌摔跤修马达

半夜十二点整，银嘴到屋里叫了我，我提一根桃木棍向北门外走去。那棍是选民晚上给我送来的，他还提醒我说，银嘴派了几个人埋伏在半路上等着吓我，叫我路上要当心。我不怕黑夜，也不信鬼，他们的埋伏我根本没放在心上。果然路过桃园地，路两边唰唰地撒过来几阵土，都让我头上的草帽子遮住了。我边走边唱，自己壮胆，不觉已走到老墓地。没有月亮，但满天都是星星，黑暗中已待了很久，墓地上的一切都能看清大概的轮廓。我划了根火柴，照一下亮，拔下插在新坟上的柳树股，还从容地蹲下去，就地拉了一泡屎，给他们留个记号，随即凯旋归去。

赢得的一条烟，我给银嘴留了几盒，剩下的都在第二天锄地时给大家散了。银嘴似乎不服气我赢了他，接下来又煽动村里的小伙子和我比赛摔跤，也附带了赌烟的条件。那是在午饭时分，各家门口围了很多正在吃饭的村民，他拿纸烟做获胜的悬赏，但一直没有人积极响应，最后只有放民一个人犹豫地站出来应战，表示愿意和我较量一下。

放民是世全家的老二，解放那一年生的，所以叫"放民"。他大个子，干起活明显比我的劲头大。自锄地以来，地头休息时，我发现放民常对我表现出挑衅的样子，他的言谈举动让我想起上小学时刚转到一个新班级碰到的情况。那时几个厉害的孩子对我欺生，一直挑动我和他们打架，想从一开始就占我的上风。放民现在就是在对我欺生，想在我新来乍到之际把我压服下去。听说放民要应战，我心里暗自叫好，既然他要找我的麻烦，就让我给他教教乖吧。我心中暗想，新旺村这些人呀，对于我李春来，他们也未免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我确实是个城里娃，但我可是个劳改队混出来的城里娃，毕竟跟社会渣滓们在一起摔打过几年，好歹也练过两三手，摔跤那事，我还是懂得一点窍道的。我向银嘴提了个条件：要摔就摔活跤，不摔农村人那种死跤。死跤是两个摔跤的一开始就抱在一起，看谁能把谁扳倒，简直像掰手腕一样硬碰硬，可谓极其蠢笨的摔法，小学生才那样摔呢。放民蛮劲大，看样子像是没摔过活跤，上了场子，我逼着他转来转去，周旋了几圈，又连来了几个假动作，一下子就弄得他乱了脚步，结果他还没扑住我，就让我闪过去使了个绊子，撩翻在地上了。他两战两败，没有再摔下去的必要，窘得在一边观战的世全把"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银嘴狠狠地抱怨了一顿。

我现在基本上赢得了小伙子们的好感，我那个小屋，差不多成了四队未婚男青年抽烟、谝闲传的俱乐部，放民最终也成了我热心的帮手。世凯的儿子名叫兴善，他似乎是看他爸的样子，不久之前，也对我表现出欺生的势头，在地里干活时，无缘无故给我起外号，说我长了个能"日死驴"的大个子，"吃骆驼粪都不用搭梯子"云云。我很想对他发作，一直还没找到动手的借口，这下可好了，我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了。自我两次打赌获胜后，兴善对我突然一改挑衅的态度为试探性的亲近，我也不想计较什么，把赢来的烟敞开供他抽着，抽得他每顿饭后都到我屋里踅摸一阵，好得到饭后一根烟的享受。我向他暗示我对他爸那些罗唆的不满，这小伙还算够意思，一下便领会了我的意图，有一天世凯又在地里挑剔我干活的毛病，兴善当场就把他爸狠狠责备了一顿。世凯从此沉默了许多，对我干活的情况再也不说三道四，他那张臭嘴就像经过了一次消毒，地里干活时的空气一下清新了许多。

正是锄二遍玉米的时候，天越来越热，无风的田野上，几朵旱云像火烧一样高悬在头顶上，根本看不出丝毫的雨意。到处都在抗旱，水泵在马达带动下日夜飞转，深井下抽出的水不断流进地里。有一天队上的马达烧了。那时候买马达需要指标，烧毁的马达总是送到修理部重缠线圈，但一般得等十天半月才能拿回。俩队长都为此事着急，当银嘴求我在城里找个电工把马达及时修好，而我说我会修马达时，他当下还不相信，我就把我在钟楼电机修理部实习过一个月的事讲给他听。

春天的时候，决定要去四队落户，我抓紧时间，做了些下乡落户的准备工作。我想我得

在下乡前迅速掌握些适应农村需要的技术，等到那里，若派上了用场，一则可吃口轻松饭，二则可挣到现金，至少保证我口袋内有点买烟的零钱。从过罢年直到奔赴新旺村，我学了两门手艺：一是跟父亲的同事徐师学习修理钟表，此事容后再表；二是经李师介绍，在钟楼根一家回民开的电机修理部学习修理电机。我在那里义务实习，干了一个月活，跟上那里的男女师傅们亲手做了修理马达的所有工序。我先从最粗的活做起，把待修的马达在门市部外面的人行道上架起火焚烧，烧完了线圈上的绝缘层，就可以轻易拆除掉盘结在内的废铜线，然后清理压线槽，把新线圈一个一个按顺序压入其中。这下线是很细的手工活，修理马达之所以费时费工，在农村之所以被视为神乎其神的技术，就是因为工序麻烦，需要一套设备。实际上操作起来，并非袖手旁观时显得那么深不可测。起先见他们坐在那里干活，我还以为很轻松，后来亲手干起来，才知道那也是出力的苦活。一晌午下线的活干下来，十个指头个个都酸困酸困。下好线后，要做线圈的整形处理，用绝缘纸垫好应绝缘的部位，然后即可接好线路，通上电做试验性的起动。经仪表检验后，各项数据若都合格，就给新线圈灌上清漆，烘干之后，安装复原。这经过了掏肠换肚的马达运回来送到地里，便又像新马达一样带上水泵日夜飞转起来了。我自在那门市部学了这套技术，至今尚未派上用场，现在正蹾到关键时刻，学以致用嘛，我当然要争取露他一手。我为我及时学了这门有用的手艺而感到庆幸，同时得意地想着，等我给队上修好了马达，看那些嫌我干农活不在行的人还有啥话可说。

听了我的讲述，银嘴始而半信半疑，继而决定派我修理，但最终心里仍不够踏实。因为买材料也得花不少钱，万一修不好，材料钱就白花了。所以他对我说，他把这活现在就派给我，若修坏了，可得由我完全负责。我对他说："你就放一百个心好了，咱手里没有那个金刚钻，也不敢揽你这破瓷器的。"我拆了坏马达的废线，抄了那马达上的所有数据，在队上领了一笔现金，便前往西安购买所需的材料。银嘴只给我往返一天的时间，地里的旱情如火，他一再强调说，速去速回，玉米地浇水等着用马达呢。

这是我第一次给队上出差，每天记十分工，有一块钱的出差补助，还可以报销车费。我一大早从新旺村出发，步行十里路到公路边，搭上远郊公共汽车直达钟楼，在那个修理部很快就买全了修马达所需的材料。我那些师傅们，有帮我绕线圈的，有给我裁绝缘纸的，有给我准备下线工具的，所有的人都为我首次独立操作而感到高兴。铁师给了我一本电机修理手册，他特别叮咛我，那接线的最后一道工序最关键，一定要细心处理。

几个月没进城，自然也没进过任何办公机构，没机会接触到电话。现在看见修理部的电话机摆在办公桌上，我抓起来就给曼丽打去。这是我埋藏已久的心愿，伸手拨号的时候，我的手指都有点发颤。当了几个月农民，城里处处都显得陌生，突然从听筒里传出电话拨通的信号，我几乎都不敢相信那声音就在我的耳边。

三十八 曼丽

我是从马栏回来后不久与曼丽路遇的。当时她正在人行道上排队买东西，看见了我，她眼睛一亮，远远叫我一声"果子"，随即走过来拉住了我的胳膊。我们边走边说，走了很长一段路，我给她讲我被捕、劳教的大概经过，她不时插入好奇的发问，那神气就像在听我讲惊险故事。她说她觉得我变化不大，还有些原来的学生气，最后则用做结论的口气打趣我说："我看那三年劳教还没把你改造好。"

她姐姐是我的初中同学，我们早就见过面，但单独的来往则晚在我被捕前的那个春天。那时候曼丽一根独辫搭在胸前，紧身的大襟黑衫子短得刚遮住高吊腿裤子的裤腰。她刻意模仿民国女子的打扮，几乎拷贝了《雷雨》上那位四凤的舞台形象。有一次聚会，我们几个人听着唱片，在一起喝茶抽烟，其中有一位就"曼丽"这名字突然发了个怪论。他说叫这名字

的多为妖艳人物，比如在不少电影或小说中，就常用在国民党女特务的头上。那人的话似乎并没引起曼丽的不悦，反而还说得她有点得意起来。她似乎常在她自己虚构的光圈下走向生活的前台，别人不敢穿出去的衣服，她偏敢穿；别人不愿意接触的人，她偏要接触。他们谈论女特务的话使我想起一部惊险片中的场景，于是我走到曼丽跟前，模仿着那个男主角的台词对她说："阿兰小姐，来个伦巴。"曼丽立即若有会意地扭动身子，眯缝起眼睛，情意脉脉地看我。我鼓励她脱去上衣，她便用夸张的脱衣舞姿势缓慢解开纽扣，一个一个，然后把她的大襟衫子磨蹭着脱下来，直脱到露出贴身的内衣。

对身边的男性，她似乎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不知是出于崇拜英雄的心理，还是想远远离开西安，仅听凭她姐姐和姐夫的介绍和操办，她便和一个维族的摔跤健将结了婚。那人住在遥远的伊犁，我以为她早离开西安迁到新疆去了。没想到过了三年多，还会在东关正街与她路遇。提起与那人的婚后生活，她口气很平淡，只是说一年才去那儿度一次探亲假，结了婚也跟没结婚差不多。临分手时，她说她还想跟我见面，特意留下她工作单位的电话和通信地址，叫我周末有空时可预先约她。我那时刚从马栏返回，自知身份不比从前，因怕主动亲近了别人受到意外的冷落，故对亲友熟人均持比较疏远的态度。我因此便随口问曼丽，和我这样的危险人物来往，难道就不怕受什么影响。对我那问话的口气，她很不以为然，当下便纠正我说："你也未免太小看人了，我既然乐意和你来往，还害怕什么影响不影响！"她说得蛮带义气的样子，一时间听得我心里颇受感动。

整个冬天我们都没有联系。我混在生产队的民工群中干苦力，没有自己的发信地址，碰不到打电话的机会，也没有出外约会的心情。她在远郊的一个国防研究所工作，听她说属于保密机构，环境一向封闭，制度和管理比普通单位要严得多，再加上搭乘公交车很不方便，就是在周末，想进一次城也不太容易。后来直到开春，我在钟楼下那个修理部学修电机，才有了可打电话的地方。就是用办公桌上的这部电话，我拨通了曼丽，她接到我电话很高兴，随即和我约定在钟楼汽车站见面。

本来不过是一次很普通的路遇，如果我不主动和她联系，一分手也就失散于城市的人海，她就是真想见我，恐怕也很难找到我了。只因我自己不甘寂寞，心里惦记着那事情，抓住了她留下的一点线索，又续上了我们久已中断的关系。我想亲近曼丽，完全是出于孤独的需要，混迹在这个到处都排斥我的城市中，能有个可以约会的女友，总让我觉得比什么都没有要心里踏实一些。要拿我父母素来的现实眼光审视我当前的所思所为，他们肯定会斥责说我："你人都落到了这一地步，也不觉得自己心酸，还有啥心情去街头约会！尽跟些不相干的人混在一起，他们哪一个能解决你的实际问题？"我知道我和曼丽不可能建立什么正式的关系，我也知道和她来往解决不了我的任何实际问题，但我还是想再见她一面。青春过于荒凉，个人的处境又如此孤立，我心里很清楚，在满足情欲的问题上我必须自助自救，绝不能随便放过可抓的机会。

就这样我站在钟楼汽车站等候南来的公交车，等过了几辆，居然看见她从一辆到站的车上走了下来。街上还有些春天的薄寒，干巴巴轧马路也不便交谈，实在找不到可以消磨一段时间的合适地方，我们只好去了饭馆。我本来是不愿意和女人去此类消费场合的，我的钱包总是很干瘪，就是买一碗汤面，也不一定能掏出足够的饭钱来。她知道我身上没钱，进去之前，先拿一张大票子交给我，叫我待会儿用来付帐。我难免有些不好意思。见我面有难色，她便温和地宽解我，说她确实是想让我人面前显得体面一些，免得我当着服务员的面干看着她为我付账。我们找了个安静的角落坐下来说话，便给她讲了我即将去新旺村落户的事情。她还是以往那种未经世事不知愁的神气，言谈中总要发一些漫无边际的奇想。我正和她谈着下乡的打算，她无端地把话题转向了不可把握的未来，说我将来要是写书回忆现在这一段经历，可别忘了写到她，还有她待我的好处。她那些话说得毫无来由，我随意听她在一边说着，随口就敷衍着答应下来。不久我动身下乡，行前又与她见了一面。那一天春光明媚，坐在省

图书馆门外的台阶上，我们说了很多。想到即将去四队落户，对那里的陌生环境，我心里不由得生出了模糊的恐惧。但曼丽对那里却满口新鲜和好奇的语气，她让我一到那里就给她写信，说她想尽早去那里看我，看我住的是什么样的房，睡的是什么样的炕。

新房盖好后我给她写了信，不久的一个星期日她果然来了。那天早饭后李宝玉去咸阳购物，我到三队的磨坊磨面，即将磨完时，选民跑来叫我，说我妹子从城里看我来了。我觉得诧异，等走进院子，才发现是曼丽。她手里提了一长串油饼，说是下车后在公路边买的，因想到我在这儿的饮食不会多么好，就一路上提溜着走来了。只见选民家的几个小孩子围着她，她正在给他们分食油饼。选民他妈喜眉笑眼，在一边看她的孩子吃得油嘴油手，见我走进院子，便对我说我妹子长得咋那么心疼，咋那么像我。我一听就知道是曼丽在他们跟前信口胡诌，冒充我妹子给自己打掩护。对城里的来客，村民们总喜欢问这问那，他们既然相信了曼丽的胡诌，我看也好，省得他们见了我再没完没了往下探问。我和曼丽散尽了她带来的油饼，好容易打发走大人们带来索要油饼的一群小孩。我们住在没有大门的院子内，谁都可以不打招呼走进来，为尽快安宁下来，进屋后我立即把房门关死，拉下窗帘，遮住了那只糊有一层白纸的窗格子。炕下的地面狭窄一溜，空无所有，可以坐卧的地方唯有这大炕一个。我们上了炕，并排躺下，说着亲密的话，很快就搂在了一起。我估计下工后还会有人前来探问和围观，再往后，李宝玉从咸阳采购回来，在这一道墙隔成两间的屋子内，我们就处于隔墙有耳的情况下了。

去秋路遇后，仅有的两次见面都在公共场合，两次都是面对面干说话，不管寻觅到哪儿，都处于人群的包围。今天她乘车加步行，跑了这么多路，为的就是能来我自己的房间内和我相聚。然而，即使是在我的房间内，也不能说绝对不受干扰，因此我必须迅速行动起来。但不知为什么，现在我和她面对面躺在一起，做起了我想做的事情，我发觉一切都做得像在作一篇不好开头的文章。也许这是一种很容易变生疏的行动，中断了那么多年，现在突然面临新的开始，我首先产生了不知该从哪儿入手的感觉。曼丽也独居很久了，听她说，自去年把他们的黄毛儿子送到伊犁家中，她就再没去那里，而且也不打算去了。她显得有些被动，好像是为了照顾我的情绪，她才慢腾腾勉强脱了衣服。我们终于把各自暴露在对方的眼前，过于荒疏的身体就像搁浅沙滩的大鱼，现在突然裸露在白天那太真实的光线下，处处都显得白纸一样平板。本来我还以为，这些年积累了如此沉重的艳愁，是足以和她曲尽一番缠绵的，谁知就只蜻蜓点水了一下，随即叫院子里喊着"春来，给我孙子吃个油饼"的声音拦腰砍断。我的荒废太久的情欲就这样全部腾空，阵雨般一霎而过，残留下来的一丝快感恍若没入炉口的蜡烛，还没来得及感受应有的灼热，就软化成了一滩蜡油。她松开了搂在我脊背上的双手，全部兴致都让那讨厌的喊声一扫而光。能听得出来，那是副队长老婆的声音，这小脚老婆子真可憎，她经常跟在我屁股后面借这个要那个的，今天她早不来迟不来，偏偏在这一刻赶到我门前给她孙子索要油饼吃。"吃个毬！"我忍不住在心里骂了一句农村的粗话。老婆子再次叫一声"春来"，我没吭声，然后就听到她哄着啼哭的小孩渐去渐远。这么久以来，曾经在苦闷的淫思中预排了不知多少遍的偷情活动就这样尴尬收了场。我还在迷恋地看她，她已不再看我，大概是瞥见了各自裸露处的潮湿，两个人一瞬间都显出了不太好意思的神情。她动作得比我机警，很快擦了她那块湿处，把卫生纸团起来装入提包，然后迅速恢复到上炕前的状态。

我们下了炕，去厨房做饭，说着闲话，两个人都竭力想抚平刚才那没有尽兴的缺憾。她说她要给我做一顿饭，一进去就坐到灶下烧火，顺便把包中的那团纸丢进了灶口。火光扑闪了一下，与她脸上微起的潮红同时发出瞬间的光亮。我逗趣地说她销毁了她的机密文件，她娇嗔着反唇相讥，说她烧掉了我留下的情欲垃圾。

电话一拨通就传到了曼丽，她答应午后请假进城，仍在钟楼汽车站见我。我急于见到她，自那天她离开新旺村回城，我就想再次见她，想尽快见到她。我的身体也处于抗旱状态，那

旱情的严重程度并不次于队上的玉米地。一种没有尽兴的遗憾煽起了我更强烈的情欲，也引起了我隐秘的焦虑。难道我荒疏出了什么毛病？现在才切肤地体验到，做爱可不像表爱那么容易，那的确不是你想说得多么动听就能多么动听的事情。我们的身体并不完全听从我们意念的支配,没碰到合适的时间和地方，预想得再好也可能白搭。我越想越不甘心，现在只剩下一个下午，我一定要抓住这机会，带她去个绝对不受打扰的地方。

大热天，一动就是一身汗，终于看见曼丽走下了那辆南郊开来的公交车。然后和她换乘开往东关的公交车，下了车再步行一程，最后才进了寂园的观音洞。

直到现在，我还没提到寂园的这一部分。那是东墙下的一个大坑，从紫藤架向东走过假山，坑沿有向下的台阶，拾级而下，便是一大块低洼的平地。那坑下种满了果树，有桃、梨、海棠果和核桃等，我住在园子的时候，从盛夏到中秋，常爬上树采摘成熟的水果。西边的土崖下砖箍了一个大窑洞，因洞中供奉一尊很大的观音像，故名观音洞。这洞里也是夏日纳凉的处所，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年炎热的夏日，我们在窑洞里杀西瓜吃。洞内的观音像已让红卫兵抄走，那宝贵的六朝青铜像是毁是存，早无人过问，现在暂住其中的是我那个孤身一人的三伯。三伯文革中失去了原有的住处，牛棚中释放后无处容身，只好把这荒废已久的窑洞清扫收拾出来，先凑活住进去。三伯在建筑工地上干活，每天劳碌完毕，挺起他高大的身影，总像个孤独的老熊摸黑回到那洞中。

我按照三伯的交代，从门外的隐蔽处拿出钥匙开了门，在凉气袭人的昏暗中，拉住曼丽的手，摸索到床上。过了一会儿，才慢慢看清了窑内的一切。她仍然摆出那被动的、仿佛承受打击的架势，闭起眼合拢长长的睫毛，好像很害怕面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我抚摸她，她伸出阻止的手，小猫戏耍一样地抠人，同时发出似哭非哭的声音，哼哼唧唧的，脸色就像乌云密布的天空。这情状相当涣散军心，我不能再往下正视她这样的表情，再继续看下去，我会什么事都干不成了。做爱的确不是作文章，实在没有什么巧妙的头好开，我不想再拖延时间，对她的不太配合，只好断然采取生硬强迫的手段。那有些粗笨的举动弄得她的表情和体态愈加滞涩，而她的滞涩愈益激起我放纵的冲动。我于是对她肆意撞击起来，在她逐渐放弃阻止的身体上，加强着我的揉搓和挤压，一次又一次，迫使她承受着她似乎承受不起的打击，直到把我积压已久的沉郁倾泻干净。她阴沉的脸色慢慢缓和了过来，长睫毛也随之绒绒地张起，张得就像洋娃娃的眼睛那样圆润。身体从紧张状态松弛了下来，我和她的谈话自然而然地亲密起来。我打趣地问她，将来我写书若写到了她，要不要也写下我们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她一时说不出她想说的话，急得挥拳打我，敲鼓似的在我身上擂了几下。随后她叹了一口气，靠在我怀里对我说，她不是不接纳我的身体，实在是害怕怀上孕，叫我以后再不要这样了。

我在天黑时回到四队，连夜赶修马达，两天后，停转的水泵又转了起来。后来在玉米地里看水，我靠在树荫下养神，曾戏赋田园诗一首。我知道我真正向往的是城市的欢乐和繁华，这新社会的田园，我一点也不感兴趣。所谓的田园情怀，只算是纸上的戏仿，聊以自嘲，权充南风解忧之咏罢了。现抄录全诗如下：

水泵哗哗响，清渠缓缓流。仰天鸟影没，据树蝉鸣悠。

濯足沧浪乐，曲肱陋巷忧。有人踏蔓草，宛在地边头。

三十九 修理钟表来

修好那台马达，我又接着修了几台，有四队的，也有外队的，其间穿插着几次进城买材料，日子在城乡往返中轻松过去。不知不觉间，玉米出齐天花，抱上棒 棒，锄玉米的大锄都陆续在各家的墙上挂起，沣河两岸的村庄进入了所谓的忙罢季节。连下了几场雨，地里再无需浇水，站在新旺村北门口向远处望去，只见那无边浓绿的庄稼水一样高涨起来，一股子

快要把分布其间的村庄都淹没进去的势头。

农村没有周末，更谈不上享受城里人那些节假日，只有蹠到雨天，地里干不成活，社员们才能歇工。这劳碌一半为政策所逼，一半也属村民自找，但归根到底，都怪建立了生产队这种浪费劳力的编制。听国栋说，从前单干时有明显的农忙农闲之分，一年中闲时往往比忙时还多。那时候活路的安排一律根据农时的需要，人们都在自家的土地上劳作，地里没有活，谁也不会硬找活干的。个别勤快的农户，闲下来会在农活外另搞营生，靠劳力或手艺增加收入。与此同时，则有传统节日、地方庙会以及亲戚邻里间的喜庆大事穿插进来，在一年的农事进行曲中形成了一个个节奏欢乐的休止。按照国栋的描绘，还有我小时的模糊记忆，合作化之前的农村别有其劳逸结合的田园乐趣，闲散向来都为乡土情调填补着优美的旋律。

可惜从生产队建立以来，很多传统的风俗游乐活动都陆续遭到取缔，近来又大搞农业学大寨运动，单独出外赚钱的路子也被陆续堵死。下地干活现在是严肃的生产任务，不管是贫下中农还是地富，凡是生产队的劳力，全都得天天下地干活。劳动本为生产生活必需品，现在却被扭曲成目的本身，你当了社员，你就成了政府管辖的劳动动物。全体社员如今围住生产队这个大锅吃饭，每个人眼睛都盯住别人的饭碗，你没干而别人干了，人家就要说你白吃闲饭，你干的少而别人干的多，大家就会认为你占了集体的便宜。每一天每一晌是否出工，简直成了做一个合格社员的基本要求，久而久之，村民们不复有偷闲的欲求，大家都互相牵制着陷入了劳动的泥坑而不能自拔。再加上出工又与工分挂钩，工分的多少，一来决定你平时分配粮食、棉花等实物的多少，二来可决定你年终决分所得现金的多少。按劳分配的原则迫使社员都争着多挣工分，乃至乱混工分。可叹爱工分的社员只知多挣工分，却不懂起码的数学道理。生产队的总收入是一个很少增长的被除数，而全队社员的工分总和则是一个持续增长的除数。国家一直把粮棉价格压得特别低，产量很难大幅度增长，务农成本却不断上涨，在这样的情况下，总工分越大，劳动日值便越小。不管是社员跟着队长的屁股要活干，还是队长硬给社员派活干，结果都只能造成劳动日贬值。这就像一大锅稀饭，为了多喝几碗，每个人都给锅内掺水，最后那稀饭就掺成了清汤。可叹四队的社员都贱得闲不下来，雨刚一住，村道上还很泥泞，爱挣工分的人便都围住队长要活干了。队长明知都是来混工分的，无奈受那既定制度的惯性支配，只好没活找活干，领上社员去做起贬低劳动日值的事情。

我和我伯的关系出现了磨擦，对我出工的情况，他开始有了看法。本指望收养个大小伙子，也能像选民或放民那样拼死拼活挣工分，但日子久了，我伯才渐渐看出，他这个养子对挣工分并不热心。我隐约已有所耳闻，他在抱怨我懒惰。我承认我不如选民他们干活勤快，也能理解我伯的抱怨，但我并不简单地承认我身懒，我有我偷闲的立场和价值，这是我和李宝玉，乃至四队全体社员根本的对立之处。

我喜欢雨天，也常盼望下雨，半夜里听到雨声，因而想到明天可能歇工的时候，就觉得那下在屋外的雨同时也浇酥浇软了我的每一节筋骨，浇得我全身心彻底得到了放松。雨声催人安眠，只要雨声还在淅淅沥沥，就可以放心睡到天亮以后，睡过早饭时分，睡得长期积压的疲乏发酵一样胀大起来，越睡下去，就越觉得加倍地困懒，瞌睡也越睡越多。一次次半醒不醒地睁开睡眼，又一次次闭上陷入了黑甜。身子简直让睡魔拖住了，睡意水一样漫过四肢百节，滋养着困懒，消融着疲劳，直到一觉睡醒，彻底休息好了的身体轻松得就像另换了一身筋骨。

趁雨天有闲工夫，我拿出徐师给我的一个旧闹钟和几件修表工具，把旧表拆来装去，练习修理钟表的技术。

徐师是自来水公司的普工，按他的说法，要不是他和我父亲关入同一牛棚，就他这挖土方的普工，干到底也跟康工程师说不上一句话。徐师先在国民党军队中当兵，随后投降给解放军，因有些文化，不久即在部队中当上了文宣干部。不清楚他犯了什么错误，也许他来自敌军的历史本身就足以构成罪行，反正他当解放军的日子没多久，人就转到劳改队劳改了多

年。困难时期，他回到西安他老婆处，在自来水公司安装队干普工。文革闹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扫帚先把他扫进了牛棚，不偏不巧，和我父亲住在一起。后来牛棚撤了，人都放了，父亲恢复原职，身为普工的徐师却遭到解雇，只有回到他老婆家赋闲。大约是想重返公司再当普工，徐师近年来常来家中看望父亲，顺便探问一下公司的情况。他眼睛严重近视，却从不戴眼镜，看人时头伸过来，眼皮狠劲地聚焦，眨巴着，眯缝着，那样子颇显得滑稽。而且他穿得过分邋遢，头一两次在父亲身边看见他，我并没有想和他说话。谁知人不可貌相，这徐师听父亲谈到我的情况，得知我马上要去农村，竟对我表现出意外的关切。他建议父亲让我学点手艺，说如果不嫌弃，他愿意带上我学学修表。父亲确实有点看不起他那走村串乡的营生，因见他提说了几次，又说得那么恳切，后来才同意他带我出去转转，但愿他能给我些有益的开导。那天徐师和父亲喝酒时说定时间，次日一大早即来家中叫我，我就骑上父亲的车子，遂跟上他直奔城外。

城市和乡村只有一路之隔，下了柏油马路，踏上田间的土路，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徐师身上分文没带，他让我今天见识他怎样空手捞钱。我们从土路上走进一个村子，正当饭时，蹲在门外吃饭的人随处可见。徐师大声吆喝起来："修理钟表！修理钟表！洗油腻、换游丝、磨摆尖、接发条来！"我有些不自在地跟在他身后，目睹他边走边喊，随同他走过了没人搭理的村道。眼看，一个村子转完了，看不出有什么表可修。我们正准备上车离去，有人拿着一个马蹄表走了过来。那表的外壳烟熏尘垢，锈迹斑驳，表盘上连接秒针的鸡头早死在那处位置上，一动不动了。主人说他这表停摆好几年了，问徐师还能不能修好。徐师满口答应，说他马上就能让那鸡头重新活动起来。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主人搬出小桌，我们就在桌面上工作起来。徐师很快把表拆散，把大小齿轮放到碗里，让我用汽油清洗了所有的零件，然后给我演示他整个的操作。他把摆轮的尖端在油石上打磨一番，调整了游丝，再将各个零件细心擦净，重新装好。徐师告诉我，这表没有多大的毛病，只是油腻太多，摆尖钝了，现在经过清洗和调整，肯定会照走不误。果然徐师安装完毕，上足了发条，摆轮立刻有力地转动起来，各个齿轮相继传动，那鸡头也随之嘀嗒嘀嗒地啄起了食。主人满意地接过表，一块钱就这样挣到了手。

农村上下工仍习惯抬头看天上的大表，家里有没有钟表，对日常生活影响并不很大。多数农户都没钟表，有表的也多为结婚时购置。后来新婚过去，一切都日渐变得陈旧，那钟表也慢慢在烟熏火燎的土屋中失去原有的光彩，直到有一天突然停摆，从此就成了废表。村镇上没有钟表修理部，也没有人为修钟表专程去城里一趟，若无人登门要求修理这些旧表，多会在尘封中遗忘，最终化为废铜烂铁。徐师说，农家使用钟表的情况基本如此，因此他很有信心地向我指出，广大的农村潜藏了无数待修的钟表，只要我们有耐心到处寻找，总会有做不完的生意。他叫我别小看了他那几声吆喝，他说正是通过大声吆喝，才提醒村民想起遗忘的坏表，正是他耐心说服，才说得个别农民花了修表的钱。我跟徐师转到下午，大概修了六七个钟表，挣了十来块钱。徐师请我去饭馆吃了晚饭，最后还把几块钱硬塞到我手里。

整个秋天的多雨日子里，我睡好了觉就在屋内练习修表。我确信我能自如地拆装之后，便开始对外接活，当然全部是免费修理。我修完了本村的坏表，名声很快传了出去，外村的人也纷纷通过关系找到我跟前修表，各式各样的表于是陆续送到我手里。对我来说，每接触一种结构不同的表就是一次新的学习过程，但我只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记准拆卸的步骤，再按那步骤安装回去，就像记住去路，回程基本上错不了一样。修好的钟表，我得放在手中调理一阵子，走不准的给它调准，又停了摆的找出原因再修，因此我屋内常有三四个甚至七八个表在同时走动。每当下雨天，我美美睡一觉起来，睁眼一瞥，在屋子的不同角落，在不同形状和颜色的表盘上，不同的秒针都在同步的嘀嗒声中持续移动，都走得均匀而有力。屋外的雨声如背景音乐烘托着困懒的氛围，杂乱的嘀嗒声在屋内组合成令人惬意的和弦。

后来，我的当了车工的弟弟帮我备齐了修表工具，我自己从商店里买了些标准配件，在

秋后的一个阴暗日子里，我溜出新旺村，初次出征去修表了。我最大的困难是没有自行车，没法远征，只能步行到附近的村子转悠。也像徐师那样，在午饭时分，我走进一个村子，一切都按徐师的步骤如法炮制。首先，得鼓足勇气喊出“修理钟表”，由声音不够大喊到很大，由生疏和有保留的样子喊到十分坦然，我居然召来了生意，初次试干，就有所收获，居然修好了几个表，挣了几块钱。四队的劳动日值只有七毛五，如果你全年所得扣除所分的实物后还有盈余，年终决分时你才能拿到一些现金。这就是说，我每天干活所得的十分工，只是账面上的七毛五，实际上将来能到手的现金远低于这个数字。对比我每日地里干活的所得，再看我现在挣到手的现金，我几乎有点不相信这是真的，那奇妙的感觉，就像此刻是从童话故事的幻境中拿回这笔钱似的。正当农业学大寨，到处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我不参加队上的劳动，跑出来修钟表，万一让四队的干部和社员知道了，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不能不有所警惕。所以我一直干得谨慎而有所节制，见有空子，我才去钻，而且总是忍耐到没钱买烟的时候，我才挎上工具包走出去，偶一为之。

那一年决算，我全年共计得一百七十一个劳动日，折合现金，仅一百二十八元二角五分。我和我伯是合在一起算帐的，他当家，我从属，还了盖房时欠队上的借款，李宝玉领到手的现金实在不多。一年干到头，就要过年了，他仅象征性地分给我十来块钱。有个别人在我面前谈到我拿钱太少的事，颇有不平之意，对他们的同情，我仅当耳边风听听而已。分钱的事，我并没放在心上，像李宝玉这种经济状况的人，平时哪怕想用几块钱，也得靠变卖口粮换取，领得“大笔”的进款，一年中也就决分时这渺小的一次。他就那么点儿收入，想起来也够可怜的，所以我压根儿就没想与他计较分钱多少的事情。

我心里有我的打算，与其靠队上给我分钱，还不如我自己修表挣钱。腊月里队上没活，社员们都忙自己的私事，我频繁外出，便于浑水摸鱼。生产队刚决分，农民手头宽裕，我走村串乡去修表，也比平时有市场。总之，这是一年中行情最好的季节，要修表挣钱，就得抓这个机会。于是我遍访远近的村庄，早出晚归，大修起我的钟表。后来修得放不下手，我干脆修到哪里住到哪里，沿新旺村往西安的路线一路修过去，直修到土路终止而柏油路开始的地方，最后带上我修表的所得回到城里，过了一个手头宽裕的春节。

有人偶然在外村看见我修表，回村后传出了我修表的新闻。春节后我返回新旺村，听选民说，村里人正在传说我在外修表的事情。来到农村我才发现，农村的很多实际情况与电影小说上所描写的差距很大，就拿抓阶级斗争来说，在我们这个村子，实际的情况并不像故事中编造的那么厉害。起先听了选民的话我还有点担心，但后来两个队长都没正式过问我出外修表的事件。年前年后是一年中最松懈最混乱的一段日子，两个队长都不知钻到哪里赌博去了，吃饭的时候，他们家的孩子端上饭碗到处找都找不到他们，他们哪有工夫管我的闲事。村民们常说，“腊月里，正月天，老驴老马歇几天。”饲养室内的牛马骡子全都拴到了外面的空地上，任它们卧下来晒太阳，在地上打滚，腾起一阵尘土。黄牛啃着干玉米杆，倒嚼的口里流出白沫。叫驴拴在桩子上站寂寞了，突然发出几声刺耳的长鸣。从社员到牲口，全都彻底闲了下来，生产队里这时候，谁还管谁的闲事呢。

“春来居然会走村串乡，干起了小炉匠的活路。”这便是那个有关我的传闻带给村民们的印象，一个惊奇而有点滑稽的印象。在他们加油添醋的传播中，我被描绘成一个偷偷摸摸溜到外村的人物，大个子，怪模怪样的，沿街吆喝着，操作不很熟练，有时候，修好一个表，交罢差，人还没走出村子，就因那表又停了摆而被喊回来拆了再修。冬天天短黑得早，做完了那个翻工活，已是点灯吃晚饭的时分。主人家殷勤地端出一碗热玉米糁，春来两只冻僵的油手接过饭碗，大半晌，颤抖得都捉不住筷子……

那一段新春暖和的日子，我从新旺村村道上走过，一群调皮的孩子常跟在我身后起哄，他们有节奏地喊着：

春来，修理钟表配钥匙！

春来，修理钟表配钥匙！

春来，修理钟表来……

四十　毁炕风波

这里的农家一律睡炕，炕由土坯砌成，外糊一厚层麦秸泥，待里外干透之后，便与屋内的三面墙结实地连在一起，几乎成为一间屋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农家的理想生活曾被描述为："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由此可见炕在农家的中心位置。造出这一方温暖的小天地，为的就是夫妇及其众多的子女在一起活动起来方便。在一间厦屋中，炕下的地面过于狭窄，来客吃饭在炕上招待，雨天谝闲传、耍牌在炕上进行，连装有粮食的麻袋有时也都珍贵地堆放在被褥延伸不到的炕旮旯里。宽大的炕面上真是什么事都包揽得下，除睡觉之外，炕实际上也兼充了餐厅、客厅和贮藏室之用。但这一切对我均无实际的意义，我没结婚，也娶不到老婆，又睡不惯热炕，让这么样的泥土结构立方体占去我大半个屋子，于我实属空间的浪费。因此我常常暗自盘算，不趁早挖掉这庞然大物，还把它留到什么时候？

就这样，我把我屋里只用了一年的新炕拆了，从屋内清出的破土坯干泥块在院内积了很大一堆。我用修马达挣的钱买了个单人床，将它支在屋子的一隅，这狭窄的厦屋立即显得宽展了不少。一个木板钉的旧货箱，我用来装衣服和书籍，外面糊以牛皮纸，盖子上再加贴一层塑料薄膜，光洁犹如台面，置于床头，兼充床头柜之用。我从父母家中拉回一桌一椅，摆在窗下，桌上有文具和压相片的玻璃板，墙上贴两幅画，吊一个挂历，这本来只供睡觉的土窝子一下子大有改观，多少添了些耕读生活的气息。落户正好一年，我在农村的生活已基本走上正轨。初来时的陌生感早已消失，受排斥遭挑剔的情况虽时有发生，但我大体上算是站稳了脚跟。首先,村里的小伙子大都和我打成了一片，接下来妇女们也都对我表现出逐渐亲近的态度。至于俩队长对我的干活，起先的确看不惯，后来司空见惯了，也都看出我就是那么个样子，又皮又赖的，他们只好接受现状，尽量多派我干些笨活，凡遇到大队拉公差，大都支使我前去应卯。我的交际广泛起来，五席坊大队十二个小队，每一队现在都有了我来往的朋友。

我开始抽空读书，从城里借回了最新流行的书籍。很多书的封面上都标明"内部发行"，据说是专门译出来，仅供高干和专家批判参考的。有苏联小说《你到底需要什么？》和《多雪的冬天》，还有美国小说《爱情的故事》，以及《第三帝国兴亡史》等等。这些书读得我又有了想象外部世界的情怀，人虽然整天和黄土打交道，心却在某些瞬间海阔天空地远游了出去。我那永不学外语的誓言早成了一时的气话，正如母亲常说我的那样，"好了伤疤忘了痛"，我又拾起久违的俄文，在雨天或煤油灯下搞起了翻译，译莱蒙托夫的诗，还译高尔基的小说。这土坯屋眼前的情景总让我想起寂园的西屋，好多年了，睡大学的学生宿舍，坐班房，进劳改队，住民工的工棚，我一直都在别人的监视下生活，直到现在，才有了我自己独处的空间。我把家里的一个玫瑰红瓷花瓶拿来摆在我的货箱床头柜上，下工时顺路采把野花回来，红素相杂地插入瓶中。这里的农家都不养花，也不讲究赏花，对地里的某些野花，更有奇怪的禁忌。譬如一种喇叭形的花叫打碗花，据说采了它吃饭时会打破饭碗；另有一种黄花叫秃子花，据说动了它的花粉会秃掉头发；更有一种蝶翅状的花紫不紫灰不灰的，村里人都叫它鬼蝴蝶，仅顾名思义，即足以令人望而生畏。我把这些野花一五一十都往屋内养的时候，李宝玉看在了眼中，便气上胸口，拆炕之举所引起的不满便随之一并发作了。

我自以为拆炕并未损及房屋本身，但在李宝玉和其他村民的眼中，把好好一个炕无端挖掉，这行动本身便具有破坏的性质。发生在我家院子的事情总是公开暴露在过往村民的眼前，围着那一堆破土坯干泥块，众人都七嘴八舌议论起来：

“才是盘了一年的新炕，拆了真可惜这些土坯了。”

“春来这小伙咋这么胆大，炕还敢随便挖！挖了炕，到冬天睡啥呀？”

“城里人爱睡床嘛，等将来娶了媳妇生了娃，看他那个床还够不够睡？”

“春来拉回来的是个单人床，我看就不是给结婚准备的。”

我挖炕的那天，我伯就生了气，没有做饭，显然是看不过眼，他房门一锁转身走了，直到睡觉时分才回到屋里。次日他就关起门睡了一天，我叫了几次，里面都不应声。

这样的情况已不止一次，使性子不做饭或关起门怄气，是他经常向我示威的方式。一年多来，他对我已积累下太多的不满。除了嫌我懒惰，他还不喜欢我经常往城里跑，尤其不喜欢几个知青来家里找我。他说那一伙知青都是偷鸡贼，招惹那一伙，就是给贼引路。连我空闲时在我的房间内啸吟歌唱，他也极为反感，一听到我放声高唱《外国名歌二百首》上那些爱情歌曲，他就在屋里发躁，等实在忍受不了我的聒噪，便跑出去当街大喊道：“牛吼驴叫呢，起灵吊孝哩……”他骂人从不指名道姓，好像朝天上乱放空炮，听得路过的人都莫名其妙。等选民在一边指着我的屋子给他们使个眼色，大家才明白我伯在对我的歌声发表抗议。除此以外，他还有种种对我的不满，如我修马达挣下的现金没交到他手中，我进城回来没买东西孝敬他，我看不住家，常叫些爱占便宜的妇女借去一碗醋或要去几根葱，诸如此类使他觉得有损他家长形象的疏忽都构成了我的不是，不断积累着他对我的敌意。

他的举止和作为本来就不具备做长辈的权威，可惜他没有自知之明，却想在我面前摆他家长的架子。有话要说时，他总不明说，想叫我揣摩他的意思行事。但我偏不吃他这一套，他不说出来，我便不予搭理。可他也从不正面向我提出批评，有了小小的不悦，全闷在心里，等酿成心病，积到了按捺不住的程度，就和我闹起了别扭。但即使是大发脾气，他也不在我面前发作，不和我直接发生冲突，而是以村妇骂街的方式发作，不提名， 不挂号，只是胡乱骂上一通。怄起气来，他先是闭门卧床不起，一天两天睡下去，等聚足了怒气，门突然打开，人冲向街道，在没有任何上下文的情况下，就当众发出独白式的怨诅和谩骂。他从不提我的名字，只罗列我的不是，想在给我难堪的同时引起听众的同情，藉以对我形成舆论和压力。

那天他看见我带一把黄色的秃子花从地里回来，郁积已久的愤怒终于勃然爆发了。他已憋了好多日，现在终于有了一个突破口，于是便走出院子，当街站定，针对我拆炕的事，对我破口大骂起来：“驴日的就没安好心，挖他妈的屄炕呢，想把房往塌挖咧！支床咋不支双人床，支毬个单人床，窄得跟棺材板一样，还睡觉呢，能睡个锤子！驴日的没安好心，我说那野澀根本就没想在这儿成家。我日他妈我办了个啥澀事，招客欺主呢，都把那野澀养成精了。”脏话和恶咒连珠炮一样从他口中喷薄而出，他只有在这样的语境中表达最为流畅。一年前，新屋落成时李宝玉喜滋滋指望过上好日子的心情早已荡然无存，他现在恨不得一脚把我从这院子皮球般踢将出去。可惜我并不是他招的房客，不是他想赶走就赶得走的。我业已钉子一样扎在了四队,谁也休想拔掉了。

我不是不理解我伯盼我早日结婚的心情，两个光棍儿在一个锅里凑合吃了一年饭，那锅灶他确实也围着转烦了。他体质弱，饭量小，单身日子过久了，平日饮食总是很简单。按他的说法，揉拳头大一团面扦成面条，锅里添上一瓢水，就够他一个人吃上一天。自添了我这一张口，一切都变得和原先不同。本指望我早日娶媳妇，他也好吃碗现成饭，现在他才看出，要了我当养子，没沾上好处，反给自己添了麻烦。他日子向来过得仔细，由于没有任何挣钱的本事，多年来都是靠省下些口粮，黑市上卖了供花销的。我的饭量比他大，仅这一点就使他感到很吃亏，想起来烦恼。比方说，自从收养了我，就害得他再没卖过余粮。国栋早就向我总结过李宝玉的特性，说他是个“见利欢喜见害愁“的家伙。拆炕事件发生后，“见害愁”的感觉在李宝玉的身上日益强烈，终于在夏收之前，他向队上提出和我分家的要求。但队上没有同意，银嘴不满地对李宝玉说 ：“你惹的麻烦你受不了，如今想把麻烦扔给队上，住你

的新房，图你自个儿的安宁去呀。我当初就不太同意你要春来，你要听国栋和我舅的话，你就找他俩解决问题去，我管不了这事情。人常说，招客容易起客难，我看你跟春来还是先凑合着往下过吧。”

家没分成，李宝玉只得和我在时缓和时紧张的关系中往下凑合。最后，实在凑合不到一起，他和我自动分了伙。我和他开始轮换使用厨房，各吃各的小灶。我巴不得这样过，但这事不能首先由我提出，他执意要分，我自然双手欢迎。没有了他的妨碍，我现在想吃什么做什么，我从原先的只会烧火也慢慢长进到会自己扞面烙饼，而且蹚上星期日还会小小地改善一下伙食，炒上两个菜，把选民叫到我屋内和我分享。但分伙也给我带来诸多不便，李宝玉先做饭时我得等候，我先做饭时又得考虑他等着用锅，再加上其间种种小磨擦，常常又造成新的矛盾，以致再次发生公开的冲突。李宝玉有时气得把厨房锁起来，故意弄得我无处做饭，企图逼我离开新旺村。我只得到处打游击吃饭，去国栋家吃，到外村的知青点上混，经常进城回父母家……

从此，我彻底地游荡出去了。

四十一 打得好

那一天我和外村的两个小伙子游荡到临潼，游完华清池，已是下午时分，我们穿过县城的正街，准备去车站乘车返回。途中见路边围了一堆人，我们很自然地挤了进去。只见人堆中一个农民哭丧着脸在向一个矮个的中年人求情，人群围着那农民的架子车，车内满载才泛黄的小杏子。有人在网兜内装好杏子，在催那农民过秤；有人乘混乱之机抓起杏子往衣袋内装了几个；另一个同伙的农民在无奈地维持秩序，顾住了这头，顾不住那头。矮子正在训斥卖杏的农民，他有点儿肥胖，白衬衫筒在裤子内，鼓起的肚子上束一条宽皮带，一看就是个土干部模样。我们挤到跟前时，那矮子正好夺过了农民手中的秤，不由分说，喀嚓一声折断了秤杆，厉声吆喝那农民把杏车快往市管会拉。与此同时，人群中不少工人、干部装束的人跟着起哄，都喊着要求五分钱一斤把这车杏子就地处理了。

“两毛五一斤太吭人了!”

“这投机倒把心真狠!”

“干脆让咱们今天拾他个便宜…… ”

众人只对车中的杏子有兴趣，一片喧嚷掩盖了那农民求告的声音。有不少人甚至主动排起队，想拾那个便宜，只等着矮子最后发话。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保护卖杏的农民。

目睹眼前的情景，我立即明白了其中的原委。正当农业学大寨期间，市场上严禁农民私自出售任何农产品。那矮子显然是市管会的干部，他完全有权随意处理这车杏子。我落户新旺村以来，已多次给队上卖过甜瓜，也多次在市管会干部手中蹚到过麻烦，瓜被他们贱价收购过，人叫他们训斥罚站过，我恨他们，也恨那些想拾个便宜的市民。现在，我曾吃过的亏正落到卖杏的农民身上。不准卖杏也罢了，折人家的秤杆干什么？真是欺人太甚！想到这一点，我不由得怒火中烧，旧恨新仇一时涌起，满腔的义愤夹杂有一股子私愤，一时间憋得我忍不住走上前去，伸手就揪住了那个矮子。我大呼他手段粗暴，怒斥他欺压农民。经我这么一煽，两个卖杏的农民立即强硬起来，旁边也有几个人随声附和，都指责起那矮子不该把事情做得太绝。这时我从背后提起那家伙的领子，把他拉到大街中心，人群一下子围了过来。“拉到派出所去!”有人在喊。矮子软了下来，他那抗议的言辞中越来越流露出辩解和求饶的声调，与此同时，我变得更凶。在用手把他向前推的同时，我对准他的屁股踢了一脚，踢得他跪倒在柏油路上。忽然，人群中响起了另一种声音 :

“光天化日之下，他殴打市管会干部!”

“这大个子公然用皮鞋踢人!”

“抓住他，他是个坏蛋!”

一些工人模样的人从两边涌上来，将我紧紧挟持住，矮子爬起来一把抓住我的领口，像块石头死死吊在我脖子上。转眼间，众人的愤怒从矮子转向了我。本想煽起众人把矮子扭送到派出所，没想到却落了引火烧身的下场。我那俩伙伴力图阻止挟持我的人流，但根本抵挡不住，在人群的簇拥推搡下，我们三个都进了派出所。

我立刻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一进公安局，想随便出去，就很难了。我知道他们首先会查问我的住址和个人情况，乘市管会与派出所两方面正在交换意见，我与那两个卖杏的说通，让他们认我为他们队上的插队学生，并从他们口中打听出一个知青的姓名及个人简况。审讯很快开始，他们自然先问我姓名、住址及个人简况。我按预先准备好的内容说了，同时那两个农民也证实了我说的话。农民怕公安局更甚于市管会，提供证词时说话吞吞吐吐，见干警们在声色俱厉地训斥我，两个卖杏的便躲避起我来，一副不敢再与我“串通”的样子。然而市管会与派出所自始至终则串通在一起，结论很快就做了出来。矮子一点错都没有，反而让我那一脚踢成了受打击的好干部，农民的一车杏由市管会全部没收，我在光天化日之下殴打了市管会干部，案情有待进一步审理。我和俩伙伴都遭到搜身，并没搜出任何可证明身份的证件。此时天色已晚，卖杏的放走了，俩伙伴也被厉声驱出了派出所。

派出所按我交代的姓名和住址打了电话，那里回答说查无此人，他们再次盘问我，我又编一套，他们再次扑空。几个审讯我的干警气得暴跳如雷，按下我的头，叫我蹲在墙角下，等候处理。我饿了，不断从衣袋里翻出一点干馍花送入口中，心里闪过一阵阵恐惧的阴影。我生怕他们查出我的来历，翻出我的旧帐后对我加重处罚。天色越来越暗，派出所院子空了，他们几个人在屋内商谈，我竭力倾听，但听不清他们的谈话。最后出来了三个干警，为首的吩咐其他它两个把我送到县收容站去。黄昏的大路上尘土飞扬，一路上我时刻准备溜走，但两个押送的一前一后，夹持得很紧，直到收容站门前，我也没找到机会。

对收容站的情况，我早有耳闻，知道它属于民政局管辖，每个县都有一座，专门收容在外盲目流窜的人员。离家出走的少年，逃离丈夫的妇女，被查出无身份证件的旅客，还有大量的乞丐，不管他们是否有违法行为，只要他们在异地逗留、流浪，就有可能被抓起来投入这肮脏的笼子，等查清了他们原住地的地址，再由收容站派专人遣返。但在未查清被收容者的确切地址之前，因无处遣返，就得把他们长期关押下去。按民政局的说法，这是个社会福利机构，你无业流窜在外，收容站收留你住宿吃饭，在你被遣返之前，收容你是为保证你的人身安全，就像车站上的小件寄存处专门保存旅客的行李一样。实际上那是个半专政的机构，为防止流民给城市的光洁形象抹黑，收容站总是把应予救济的失路人当垃圾人口非法地关押起来。我知道，正因为它不是正规的惩罚机构，里面的情况有时比监狱还要恶劣。

囚室打开了，我现在被他们作为一个小件暂时寄存进去。昏暗的灯光下，只见光铺板上坐了几个人，我受了一下午折腾，此刻浑身疲乏，头痛欲裂，上铺后找了个空处，倒头便睡了过去。整夜处于辗转反侧之中，疲倦拖我入睡，但阵阵的奇痒怪痛，又火辣辣把我不断烧醒。我知道铺板上有小动物在作怪，关进中国的任何囚室，都免不了受这样的活罪。天慢慢亮了，我实在受不了那似乎要把我从床上抬起来的叮咬，只好下地走动，缓解身上的不适。摸着满身的红疙瘩，我往手心吐些唾沫，涂在最痛最痒的地方狠劲揉搓。走动中天已大亮，我看见剥落的墙壁上血迹斑斑，有几处还粘着臭虫或虱子的干尸，其间杂有擤鼻涕抹下的污痕，一道一道的，以飞白的走势涂上了发黄的颜色。

同室共有四个人。一个衣衫破烂的农民，他说他是出来要饭的，此刻他正从布袋内抓一把干馍蛋放入搪瓷缸子，准备打水泡馍吃。房门开锁后，他打回开水，在一边吃起他的泡馍。守在大包袱旁的小伙子穿着整齐，据说是跟一个女人私奔出来的，两个人住旅馆时被查夜的抓到了这里。囚室的门白天不上锁，我们可随便出去打水，上厕所，或在院子内走动。现在

那女人过来了，她和小伙子坐在一起，解开包袱，吃他们的食物。还有个大汉是外地口音，他受不了叮咬，打地铺睡着。他说他喝醉了酒在车站的候车室内睡觉，半夜被抓到了这里。他身边还有瓶啤酒，一边奇痒难耐地浑身乱挠着，一边提起酒瓶喝上一口。墙角坐了个十二三岁的小孩，看样子很机伶，他说他受不了后妈的虐待，这一次跑出来再也不回去了。早饭是一个黑面馍和一碗下了芹菜叶子的咸玉米糊糊。我尝了一口糊糊，一股子糊味，混合着芹菜特有的药味，我吃不下去，便把糊糊给小孩喝了。他去外面洗了碗，给我打回了开水。我喝一口水，吃一口黑面馍，嘴里像和泥一样，吃完了那拳头大一个馍，肚子才好受了一些。

我被叫去审问多次，他们始终很有耐心，我交代的姓名和地址经查证无法落实，他们也不逼供，只是让我回囚室慢慢去想。他们说，国家有的是粮食养活我们这些盲流，我要是爱喝那芹菜叶子糊糊，就十天半月地喝下去吧，反正交代不出真名实姓和现在的住址，我就休想离开这里。我在二厂听说过一些从收容站逃出的故事，自进入收容站大门，就在留心观察，想伺机逃跑。但两天待下来，看不出任何可钻的空子。臭虫的叮咬，恶劣的饭菜，再想到我长期不归可能在四队引起的传闻，扛到第三天，我再也挺不下去。他们再次叫我出去审问，我对他们讲了实话。我说我叫李春来，是长安县高桥公社五席坊大队四小队的社员。

一切都很快通过电话落实，我只需耐心等待，听候他们处理。

第四天，市管会来了人，说是要带我到闹市中心，召开个现场批斗会。到了市管会，我坐在办公室死不起来。我说我浑身无力，头重脚轻，肚子空得发昏想吐，像这样在大太阳底下晒下去，恐怕开不完批斗会，我就昏倒在场子上了。他们拿给我两个白面蒸馍，事先给我做了工作，叫我放老实点，说好好做个检讨，争取从宽处理。我吃完两个馍，然后由他们押到会场，胸膛前平生头一次挂起牌子。牌子上写了我的姓名："李春来"， 还有我的罪行："殴打市管会干部"。批斗会开得很枯燥，市管会领导宣读了事件的经过，那个挨打的干部控诉了我的罪行，还有个别人的发言……我就是踢了他那么一脚，也没有太多的批判文章可作，开这批斗会，主要是通过羞辱我给市管会撑腰，壮一下他们管死市场的威风。我知道自己是个前科犯，唯恐他们翻出我的老底，拿这件屁事给我上纲上线，因此在批斗我期间，心里不由闪过了种种可能出现的恐怖结局。最害怕他们乱扣阶级报复或破坏市场管理之类的大帽子，要是定了那样的罪名，这一次我就完蛋了。

事情比我担心的要好得多，开完批斗会的第三天，大队就派人来领我。这样的事情在五席坊大队还是头一次发生，听前来带我的人说，收容站的电话打到公社，再转到大队办公室，春来在临潼犯了案的消息立刻在全大队传播开来。听说我犯的是殴打市管会干部的罪，前来押解我的民兵大队长和分队长都说我打得好，说打那伙狗日的，就是给咱农民出气。出了收容站大门，他们要给我庆功，便带我去饭馆饱吃了一顿红肉煮馍。回到新旺村，听我讲了事情的经过，从队长到社员都一致为我打了市管会干部叫好。只有李宝玉满脸不悦，他嫌我在外惹是生非，给他丢了人，见我走进院子，他锁上房门，拔脚就走了出去。这一次他趁机又向队上提出分家的要求，说他再也跟我这种二流子过不下去了。

转眼已进入夏收，队上受不了李宝玉的闹腾，收罢麦子，队长终于决定，这一次夏粮分配，我和李宝玉各分各的。厨房归李宝玉占领，我只得在自己那间小屋内生炉子做饭。

正好这时候县上要大上石砭峪水库的工程，抽调劳力的名额刚下到小队，我自然名列第一人选。那天从场上干活回来，我正在屋内收拾分给我的新麦，银嘴和世全一起走进来通知我去修水库。银嘴对我说："这是个好差事，由队上给你记全劳不说，每天还补助半斤粮、四角钱，水库工地还另有津贴。咱队上想去的人多着呢，见你眼下刚和你伯分了家，又没做饭的地方，所以才决定派你去顶这个名额。这一回去了，你吃在那里，住在那里，水库的工程大着呢，干脆就三年五载地干下去。你是有文化的人，说不定干得好了，等水库建成，还有留下来当工人的希望。"我巴不得远远走开，当下就接受了俩队长派下的任务。

四十二 偷听敌台

石砭峪是终南山一个较大的峪口，我们高桥公社的民工开到那里时，峪口上那座大坝已修建好多年了。山上每次放过炮，崖下便堆满碎石，我们的工作是拉上架子车装满碎石，运上坝面，倾倒下去，就这样一车车碎石堆积起来，将大坝加宽积高。这是全县大会战的工地，全体劳力按军事编制，以公社为单位在沿山脚一带扎下营盘。工棚都是临时搭的草棚，只有指挥部设在一处楼房内，从那里发出的声音通过高音喇叭传布到山上山下。从工棚到大坝工地要走好长一段山路，沿途的墙壁和巨石上，随处可见红漆大书“愚公移山”、“战天斗地”之类的标语。

我最讨厌每天上工时听到那些进行宣传和鼓动的广播，有前一天完成的石方数字，有及时表扬的模范事迹，还有声调激越的诗歌朗诵，通过了高音喇叭，全都漫天播送出来。那声音总是响彻山谷，不绝于耳，你就是不想听，也只得任它没完没了地聒噪你的耳朵。比如像这样的诗句，至今想起来还十分刺耳：

石砭峪啊，知识青年爱上了你，

愿为你献出战斗的理想，青春的血肉。

石砭峪啊，贫下中农要改造你，

敢叫你交出不竭的水源，无穷的电流。

这些诗句放在案头阅读，也许会产生激动人心的效果，但现在聒噪在我们干活人的头顶上，就让人感到特别肉麻。我们脚下的山路一点也不豪迈，它陡峭不平，三个人拉一辆满装碎石的车爬上高坡，每一车拉到坝面上都要经过严格的量方。每天得完成规定的石方，你才能得到当天的工分。为避免午后放炮时分出事故，每天半夜，领工的老王就将我们一个个叫起，催我们出门上工。我们抹黑上山，山路上走得出了汗，睡意才渐渐消去。等太阳从山那边升起来，我们已在探照灯下干过了几个钟头。

小时候读史，无法想象古代修驰道、挖运河的徭役是怎么一回事。而今在水库工地当上民工，有了亲身的体会，方才悟到，原来徭役就是古代的民工。新社会其实沿袭了旧社会的很多制度，比如人民政府搞各项大型工程，便照例像从前那样无偿抽调农民充当劳力。

午饭后到傍晚都是我们休息的时间，我有时去附近的村庄修几个旧钟表，手头不缺零钱花了，就留在工棚里休息、读书，或跟上我们公社那几个不安分的知青出外游荡。我们走在民工营地的小路上，见有模样可爱的女民工走过来，常会嬉笑着上前搭讪，想当机会认识几个。她们胆小的都显得有些紧张，头也不回地加快脚步走了过去；老练的会停下脚步，大方地应答几句，虚晃一下笑脸，然后抽身走开；更有些厉害的，常常是一副不屑的样子，说一两句带刺儿的话，就头也不回地把我们甩到了身后。日子不好也不坏地过去，不觉已到中秋。民工们都回家参加秋收去了，我不想回新旺村，正好这里也需要几个留守人员，领队的老王就留下我看守宿舍。留守人员每天只在营地附近干些零星杂活，我因此有了大量的学习时间。

我一直在断断续续自学英语，但学的是哑巴英语。手中有本大妹寄来的《英语九百句》，是当前最新的口语读本，可惜无人做示范朗读，我只能根据字典上的注音来朗读生词。到目前为止，我仅从三个人的口中听到过发出声音的英语。第一个是五处坐牢时的刘老师，最初从毛主席语录英文版上学到的那些单词，就是刘老师教给我的。其次是我大妹，她学英语专业，外语学院毕业后在外地一所中学教英语，我能凭借国际音标凑合着读出英文字母的发音，大都是受了她的熏陶。然后就是父亲，父亲解放前上学时受过正规的英语教育，有坚实的底子，虽已多年不读不用了，有时我让他给我读一段，他还能读得朗朗上口。早在上中学开始学俄语的时候，我就想同时学习英语。我读过的大多数名著都译自英文，因此我总觉得，若能掌握英文，用途将会更广。我最初之所以动了自学英语的的念头，就是想通过英文读到更

多更新的书籍。后来又听大妹说，目前的英语教学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再过几年，农村的中学也要开英语课的。因此她鼓励我尽快着手学习英语，早一点为将来能学以致用做好准备。

在农村待的时间久了，比来比去，我看还是当民办教师最适合我的情况。可惜现有的位置已全部填满，任何科目也轮不到聘我这种人去教。听说有些凭关系混进教师队伍的人，本身连中学都没毕业，可人家也照教中学不误。反正不管教什么课，都是说汉语写中文，教师的水平就是再低，只要能说话会写字，就能凑合把课教下去。但教英语就不同了，他就是公社书记的儿子，他不会说英语就是不会说，他总不能教他根本不懂的语言吧？翻开我的英语课本，我边读边设想着那一天的到来。等那时社办中学也要开英语课，找不到合适的老师，看他们请不请我！

我又想起父亲一次喝酒时和我的谈话。酒精作用下的父亲常与日常状态下的父亲判若两人。我是读了他喝酒时推荐的《水浒》才迷上读书的，然而他后来并不鼓励我读书。我是得了他酒后送我的日记本才迷上写作的，然而他后来撕坏了我的日记本。关于学习英语，他那天随意说出的几句话又意味着什么呢？那天我在读英语，父亲在喝酒，他忽然有了兴致，拿起书给我朗读了一段，然后对我说："英语是通行世界的语言，要学就把它学好。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将来有机会，争取到国外去吧。像你这种人，待在中国永远都好不了的，我希望有一天你最好离开这里……"父亲喝得正高兴，他给我也倒了一杯。接着他又说："中国正在进行一场社会大实验，在拿人的生命和国家的前途做实验。我们这一批人注定要做实验的牺牲品了……你还有机会离开……好好学英语吧。"父亲这些不连贯的话听得我有点石破天惊的感觉，他平日说话是很谨慎的，在清醒的状态下，他绝不会说这些怂恿我出轨的言论。但酒力如有神助，仿佛冥冥中有什么召唤突然发出，正好通过父亲的口，向我指出了我还没认真想过的出路。说这几句话的时候，父亲的神情很平和，他把手搭上我的肩膀，让我喝下他给我所倒的酒。我举杯一饮而尽，那辣味，以及我们父子俩少有的片刻亲近，至今回味起来，仍那么真切，那么鲜活。

晶体管收音机刚开始流行起来，价格非常昂贵，我最想要那种带微调功能，可收听短波节目的八管收音机。但我根本买不起，多少次停在柜台前注视那些标价二百元左右的最新产品，每一次我都是白看一阵，空手走出商店。春天我修马达挣了四五十块钱，钱一拿到手，就去寄卖所买了个旧一点的八管收音机。我买这么好的晶体管收音机既为学英语，也为收听国外的广播，特别想听从前在马疙瘩他家听过的"美国之音"，莫斯科的对华广播，还有台湾的对大陆广播……这些不断受杂音干扰的中文节目都属于严禁收听的"敌台"。我知道收听敌台很危险，但我和马疙瘩总喜欢听，所以就常去他那儿收听。马疙瘩家的收音机是旧式的五灯收音机，远不如我这个小半导体灵敏，现在在深夜的漆黑中，往我那单人床上一躺，插好特制的小耳塞，只消拧开旋钮，随着手指的调频，一个个"敌台"就都召之即来了。

我每夜必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导和时事评论，听了美国的报导我还觉得不过瘾，就又继续搜索其它台的，有来自伦敦的 BBC，来自东京的 NHK……甚至偶然会收听到一个神秘而出没无常的"红星电台"。那电台的电波好像是发自国内的某一秘密处所，广播的内容始终把矛头指向毛泽东及其中央文革的一伙，对毛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批判得特别尖锐，听得我解馋而又解恨。这些黑夜时分的天外来音都由于受到干扰而时强时弱，时隐时现，在杂音潮水般强大的冲击下，我必须高度地凝神谛听，才能从刺耳的电磁噪音中分离出片断的、被撕碎了的真实消息。

我珍爱我的半导体，在我狭窄的土屋与广阔的外部世界之间，它开启了无形的通道，一拧开那神奇的旋钮，白天在人面前谁也不敢说的话便在我耳边坚定而令人信服地讲述起来了。我整个的人都处于饥渴状态，在劳改队我曾强烈地渴求过食物，在某些时刻也按捺不住地渴求过女人，但渴求得最强烈、最持久的还是求知和表达的自由，我既想更多地知道当局不许人民知道的事情，又想公开说出不许我们说出的想法。在这个处处设限的国度中，可以说饥

渴就是我最真实的生存境况。

除了新闻，“美国之音”还有英语教学节目，而且教的正是《英语九百句》。对照收听到的对话，我都能在课本上找出相应的段落。这一发现令我喜出望外，这是我从第四个人口中听到的英语，而且是唯一从说英语的人口中听到的英语。

种种短波节目听得我欲罢不休，越听越想多听，也越觉得害怕。深夜中，远方或近处偶尔传来一阵狗叫，都会惊动我过敏的神经。我始终处于高度紧张之中，屋外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极易引起我恐惧的反应。听“敌台”时，我总会想起从前看过的一部电影，它名叫《永不消失的电波》，讲的是中共地下党在上海和国民党做斗争的故事。片中有个地下党员，他每夜在他寓所的暗室中向上级发送无线电报，同时国民党的情报机构也在搜索发出这一电波的隐秘处所。有一个最典型的场面我印象特深，那是在深夜中，搜索电波的汽车在仪器的指引下慢慢接近了电波发出的地方，最后确定了位置，一举抓获了这名地下党员。我每夜收听短波，由于总担心被人发现，有时越是听到夜静时分，那个搜索车寻找电波的画面便越是容易出现在我的眼前。这一刻，若突然听到几声近处的狗叫，悚然一惊中，那辆搜索的汽车就像真的开进了新旺村，眼看着就要开到我家门口。

我的神经过敏并不完全是疑神疑鬼，自己吓唬自己，我确实处于西安市公安局严密的监控之下。第一个向我透露这坏消息的就是我那个可爱的音乐教师。刚从马栏释放回来的时候，曾有一度不便和她接触，后来下了乡，我行动上不受父母限制了，回到城里，便常去她那里借书。当时有很多属于私下传阅的书籍，多是经过她的手，我才得到了阅读的机会。而每次同她见了面，总会在与她交谈时听到些最新流传的小道消息。那还是在 1973 年的春夏之交，正是我拆了屋内的土炕，经一番布置，要把我那土屋弄得像个书房，好过我那耕读生活的时候，突然有人给我带来了她的口信。她叫我立即进城见她，说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当面告诉我。她叫我不要直接去她学校找她，我就按她约定的地点与她在街上见了面。她神色紧张地来了，有所警惕地向周围环视了一下，就和我在闹市的一处角落说起了话。她说前不久两个公安局的便衣找过她两次，用威逼兼利诱的口气向她询问我的情况，问我回西安都搞了些什么活动，结交什么人，见她时都给她说过什么反动话，还特别让她了解我为什么要自学英语。她说她巧妙地应付了他们，只以我们两家的老人有交往解释她和我的关系，而其它问题，她都一一搪塞了过去。最使我吃惊的是，他们还在她跟前提到曼丽的名字，并想从她口中了解到我和曼丽交往的情况。音乐教师认为，这来势险恶的调查，说不定就是我与曼丽有来往招惹的。

不久，我又从曼丽那里听到了类似音乐教师透露的紧急情况，她说她也是在最近受到了公安局便衣的盘问。从曼丽的神色和口气可以明显地看出，面对眼前的真实威胁，这一次，她可确实是“害怕受我的影响”了。我想起了在东关路遇时曾对曼丽做过的口头提示，当时只是随便说说，不过事先来个警告，没想到事态的发展还真叫我不幸而言中了。我们当即约定，从现在起终止任何来往，然后匆匆分手。从此以后，我们就再没有任何交往，永远失散在城市的人海中。

有人告发我什么事了？我接触了什么危险人物？难道我改名换姓引起了他们的怀疑？会不会与我买了那个八管收音机有关？想来猜去，我最终还是弄不清自己到底撞了安全部门的哪一根神经。

我发现三队的宏君也明显地对我有所疏远。宏君不是本地人，是她妈从四川带到新旺村来的。她妈在四川外县一个镇上的食堂里当会计，只因是地主出身，文革中被整得死去活来，实在在家乡待不下去，才带上初中还没毕业的宏君逃到长安县避难，后经人介绍，跟新旺村的一个光棍过到了一起。她妈人长得白皙颀长，跟上三队那驼子确实窝囊了她妈。驼子把宏君给了外村一个现役军人，得了一笔订婚的礼钱，只等男方复转后给宏君完婚。我来到新旺村那年，宏君已是现役军人的未婚妻了。我们的交往始于在城里的民工队干活。宏君身材娇小，是个乖巧的四川姑娘，仰起脸看人时，那双月牙般纤细的眼睛总是显得如怨如慕，开口

闭口，他都对我以“春来哥”相称。这村里就我和她来自城镇，在驼子家里，她也是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因此她总是尽量多在外面干活，一年中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建筑队打工。每逢进城办事，我常去建筑队找她，带她逛街看电影，也带她见过音乐教师。有时还让她替我跑腿，去音乐教师那里取我需要的书籍，在回家时顺便给我带回。

音乐教师那一次就是托宏君带话把我叫进了城，向我透露了那个紧急情况。可现在为什么宏君见了我也显得要躲避我的样子？我感到纳闷。

那是秋日的一个下午，我在银嘴家见到了宏君。她趁身边没人注意，突然塞给我一小片纸条，然后匆匆离去。那纸条上说有急事要告诉我，让我在村外一处机井边等她。玉米已长得很高了，我走进地里，一下就没身到青纱帐中。宏君神色惊慌地来了，她对我说，前两天，公社干部直接来她家传她，说是叫她去公社有事，她跟上那人出了村子南门，走了一段路，见有一辆吉普停在路边。吉普车把她带到公社，几个公安局的便衣对她开始严厉审问。他们让她交代她与我的关系，所问的问题与音乐教师所说的基本相同。宏君还说，他们指使她有意与我接近，打探我的情况，看我会给她说些什么话，看我都在交些什么人，看我周围有没有什么组织。他们最后利诱宏君说，她如能配合他们做好工作，将来有了招工的机会，组织上一定会让公社的负责人对她优先考虑。宏君说她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她坚持说她和我只是一般的乡党关系，她不了解我，也办不了那些事情。但他们坚持要她好好考虑，并给了她联络的电话号码，说过一段时间，还会来找她了解情况。宏君说自从那天后，她一直想找机会把这事赶快告诉我，直到今天，她见我走进银嘴家的大门，就赶紧写好一个条子，跟了进去。宏君的作为很使我感动，我也告诉她，暂时不要再和我有任何接触。夕阳在玉米梢头投下一抹余辉，宏君抬起头看我，双目闪出了月牙般的柔光，那神态，那情意，愈益叫人觉得如怨如慕。

我基本上不进城了，也停止出外修表，与几个好朋友，都暂时断绝了来往。像一头穴中的困兽，我独守在自己的土屋中，恐惧地等待大祸临头。晚上，有时偶然听到哪里传来汽车声，我会下意识地下了床，做出翻后墙逃跑的准备。

我估计公安局找过的人肯定还有很多，只不过及时向我透风的仅有这三个朋友。人们都害怕公安局，甘冒风险来报信的人当然不会很多。能在危急时还关怀我安危的，看来只有这三个还有些交情的女士了。这些情况都发生在 1973 年从春夏到秋后一段时间，第二年我就到了石砭峪。终南山的工棚毕竟在空间上与西安拉远了距离，此后因再没听到更新的情况，我又恢复了以往的散漫，慢慢地麻痹起来。

1974 年 8 月，我从石砭峪回家看望，不幸与父亲发生了一场使我十分伤心的冲突。那天我又用我的八管收音机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教学节目，为使声音更清晰，我把家里的外接天线插进了那小半导体的插口，听完后忘了拔出天线。下午，父亲下班回家，他一进门就注意到我的半导体插入了天线。不问三七二十一，父亲劈头就责备我胆大包天，说我大白天竟敢在家里收听短波节目！我矢口否认，他指着那天线说，事实明摆在那里，不容我抵赖狡辩。说着就雷霆大发，怒不可遏。他怒斥我说，我不怕进监狱，就回我的新旺村偷听敌台节目去，不要在这里再连累他们。他越说火气越大，说得他一下子起了摔东西的冲动，我还没来得及过去拔下天线，他就走上前拿起我的半导体用力摔到了地上，当场摔裂了那个塑料盒子。东西摔下地，他的火气变得更大，现在在他眼中，我这个儿子完全成了家门的灾星。他指责我说，我害了自己还不甘心，又跑回来拉弟弟下水，嚣张到大白天收听敌台广播，难道还要害得弟弟也跟上我犯错误，最后彻底毁了这个家不成！父亲当下对我下了驱逐令，他直呼我“李春来”，叫我马上回我的石砭峪水库工地，以后不要再来搅扰他们的平静生活了。

我拾起破裂的半导体扭头出了门，忍不住落了几滴热泪。父亲的举动和言词过于粗暴，我心痛而恼火，走在回水库的路上，我发誓今后再不去父母家了。

四十三 父亲之死

1974 年十月二十日晚上，我正要上床睡觉，老王带了个人进工棚找我，昏暗的灯光下，走近了才看出是我弟弟。弟弟过来愣愣地对我说："果子，咱爸死了，快跟我回家走。"我即刻随弟弟动身回家，木然坐了一路车，始终无法把弟弟那句话和死亡的事实联系在一起。我已两个月没回过家，真不能相信，父亲摔了收音机驱我离去的那天，就是我们父子俩今生今世的诀别之日。为了什么？为的只是我偷听外国电台广播那么一件琐事，一件在当时的中国被弄得非常恐怖的屁事。

两周前，弟弟来石砭峪看我时还向我提说，父亲的气早消了，他说我就是当下回去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弟弟还告诉我，有个亲戚从外地来家里做客，送了几个好吃的罐头，父亲还特别叮咛母亲先把罐头放着，说等我哪天回家休假时再打开大家一起食用。听了弟弟的话，我那一直还在赌气不回家的决心有了动摇，后来就一直下雨，我想等天晴了再回家，没想到天还没晴起来，父亲就倒下去了。

父亲是早上在家中倒下去的。他前一天在单位不知蹚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早上起得晚了一些，起床后并没赶着去上班。喝过茶，他倒了杯酒坐下干抿，一口酒刚下咽，人就昏倒在椅子上。弟弟和二妹很快把父亲送入附近的医院，午后，父亲就在病房内死于脑血管破裂。据医生说，即使抢救过来，也会落下半身不遂。他没留下任何遗言，那个摔碎在地上的酒杯就是他给此生划下的句号。

停灵期间，单位上表现出少有的仁慈，好像要尽力做出最后的补偿，公司的领导和同事一致在挽联和悼词中追忆父亲生前的好处。不管他们给父亲的档案袋塞过什么黑材料，反正现在都让死亡一笔勾销了。提到解放初跟外商打赢官司的往事，他们特别就父亲为国家争回一笔巨款的功劳做了表彰。我对那些好听的话丝毫没有感动，几年前，他们为打倒父亲而公布的罪状不也和现在满口的褒扬同样显得刻意和牵强吗？好坏就是这最后一场戏了，如果你不是带罪而死，单位上通常总要把送终的一刻做得比生前的日子更风光一些。毕竟是在国营单位当过干部的人，死了也算单位的鬼，只要死者多停放一天，单位就脱不了干系。所以，平日架子很大的单位领导只有在这期间平易近人，而死者也就成了家属向单位讨价还价的法码。

亲戚们都建议母亲抓住这机会要求公司把二妹招回城市，再多要些抚恤金，快给我把婚事办了。我整整三十岁，早过了被抚养人的年龄，可耻的是我没有工作，人家还都把我当遗孤看待。遗孤只有在一边守丧的份儿，出面和单位交涉事务的都是长辈的亲戚。几天后，我们从火葬场捧回了父亲的骨灰盒，全家人和几个主要的亲戚坐在一起讨论起家庭的善后事务，我的婚姻大事首次被提上议事日程。父母从未对我提说我的婚事，他们不是没想到，而是知道很难办，提出来也是白提，所以一直都避而不谈。后来我又到新旺村落了户，不城不乡的，两头占不上一头，找对象成婚的事就更难办了。本来家里还指望将来情况好转了再把我转回城市，但现在亲戚们一致认为，父亲不在了，母亲将要退休，她绝无能力再管我那些麻烦的事情，我不能还像以前那样吊儿郎当混日子了。他们要求我现在就打定主意在农村成家，断绝返回城市的念头。他们说我若愿意，大家都想办法托人说媒，尽快给我娶个媳妇，把父亲死后得到的这笔钱都给我花了。好像要一次性把我打发走似的，他们还警告我说，要是我不愿意，以后就没人管我的婚事了；我不想花这笔钱，母亲还要留给弟弟结婚用呢。

在我落户的那一带，因怕耽误儿女的婚事，父母给孩子订婚多采取宁早毋晚的做法，女孩子大都在二十岁以前就有了婆家。一对男女在十几岁时订了婚，男方父母付出的不只是一笔礼钱，那女孩已给了男方，算是男方家的人了，直到结婚为止，男方家里每年都要给女孩及其家庭花各种各样的小钱。父母等于在花钱给孩子买婚姻保险，订婚的时间越长，所花的

钱越多，便越不容易发生毁约的事情。在如此实利和算计的婚姻市场上，哪有我插足的余地，不要说其它的条件我不具备，仅就我现有的年龄而言，便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

我初到新旺村那年，村里没订婚的大姑娘就粉旦一个。那一年粉旦二十一，之所以还在待订，倒不是她有什么缺陷，而是人长得聪明漂亮心太高，她母亲又特别难说话，挑来挑去，反挑脱了自己。那一年新房刚落成，李宝玉对我们两个光棍儿搭帮的日子尚抱有朴实的希望。他以为自己要了个城里娃，盖了两间机瓦房，就初步具备了给养子议婚的条件，平时走在村道上，一副人逢喜事精神爽的样子。他是村上的棉花技术员，从棉苗长出几片叶到开花结出棉铃，一直由他带领几个女孩子给棉花打药，那粉旦就是他手下最能干的一员。粉旦那时当记工员，李宝玉每晚去粉旦她家记完工，总会留下来说一会闲话。听说他和粉旦她妈的交情一向不错，他过年篜包子，家里来客擀长面，照例都由粉旦她妈帮着料理。蹚到他偶然卧病的日子，粉旦总会主动来我们厨房帮忙，做一碗酸辣汤面端到他炕头。

有一次下工回来，走进院子，我看见我的房门半开着，只见粉旦坐在我炕沿上，正低头看我的影集。炕上的包袱解开了，在我前脚踏进房门的那一刻，她急忙把那影集往包袱里放去。等转过身和我打起招呼，仓促中一下子飞红了脸。我正是在这一刻看出了她的可爱。于是趁势坐过去，为缓解她的窘迫，我随手打开那本影集，一张张照片给她介绍，说这是我父母，那是我妹妹和弟弟，说他们做什么工作等等。她则按农村人的习惯，开口便天真地问起他们一月挣多少钱之类的问题。末了，她突然问我 ："这里面咋没见你那个妹子？"

"你说的哪一个呀？"她问得没头没脑，我一时间真不知所指为谁。

"就是上次提了串油饼来看你的那个妹子嘛。"

她眼睛真尖，还留心记我的私事呢，我心里暗想。我只好对她解释说，是个西安来的朋友，哪里是我妹子，她随便跟选民他妈说着玩的，选民他妈就当真了。

"怪不得我觉得模样不像呢。"粉旦好奇地看了我一眼说，好像在刺探什么。

"人家都是娃他妈了。"我说出了曼丽的真实情况，有意要打消粉旦的好奇。

"那么年轻，真看不出来。"她自言自语地说着，把那影集往炕上一放，拧身就走了。

李宝玉晚上记完工分，在粉旦家逗留的时候更多了，我有时也逗留下来，俩光棍似乎心照不宣，在分头谋同一件好事。我伯在门房下和粉旦她爸她妈他哥说闲话，我在粉旦她妈的炕上和粉旦她妹子说笑、打闹，同时观察着在一边安静做针线的粉旦。她妹子十八九，名叫仙旦，比粉旦活泼，嘻嘻哈哈的，一点也不认生。她对城里人的态度有点像中国人对外国人那样，好奇地问这问那，似乎我是个怪物，明显在把我当异类看待。怪物就怪物去吧，怪物的形象正好使我获得了某种豁免。她既然另眼看待我，我就和她说话没正经，举动没轻重，半真半假地挑逗，再加些打打闹闹的亲热。蹚到我们俩疯在一起，我把她胳肢得咯咯傻笑的时候，她妈就连笑带骂地过来制止，拿起扫炕的小笤帚作势打我一下，然后扫平她炕上那被我俩弄皱了的方格格土布单子。

队上年年种几亩甜瓜，就靠甜瓜卖些钱买化肥和支付日常花销。玉米长高的时候甜瓜开园了，队上把瓜包给社员零售，按卖出去的斤数记工分，回来必须按批发价给生产队交够瓜钱，是赔是赚，全推给了社员。一年中只有这时候队上鼓励社员出去做生意赚钱，但风险全由社员承担。你要是倒霉蹚上市管会，一车瓜叫他们低价收购了，你就是自己贴钱也得给队上如数照交，队上并不管你的损失。

李宝玉好像有意要给我和粉旦制造机会，那一次队上包出两车瓜，我和选民一车，粉旦和她爸一车，李宝玉安排我们两家的车同时同路出发去西安卖瓜。他们相信我在西安人熟路熟，都指望跟上我稳稳当当赚一回钱。我带他们去了比较安全，行人来往又多的地方，瓜还算卖得顺利。偶然蹚上几个挑刺儿耍赖的，选民和粉旦他爸都不敢惹事的时候，我就走上去摆出强硬的姿态，甚至动手将他们推开，护住我们的摊子，大长了卖瓜人的威风。粉旦他爸高兴得不住地对粉旦说："还是春来这小伙子人硬气，下次卖瓜，咱还是跟春来一起进城。"

最后，蹦上了马栏农场一起担过水的伙伴，他是西安有名的闲人，见我在街上下苦卖瓜，就热心过来给我帮忙。他站在瓜车边，分派任务式地叫来一群熟人买我们的甜瓜。因有那闲人从旁张罗，当天下午，我们就以好价钱卖完了两车甜瓜。

回家的路上，选民和粉旦她爸拉上空车走在前头，我和粉旦空手走在后头说了一路话。她问我有没有机会回到城里，我说我说不来。她又问我将来当得上工人，我说大概不太可能。现在我才看清楚了，原来她更看重的是我城里的那个家，至于我和李宝玉现住的院落和土屋，她显然并没放在心上。我不喜欢她探问我的那种势利口气，因而当下就给她一五一十讲清了我的经历。我说我劳教过，定性是思想反动，还说除非我获得平反，否则很难把户口转回西安。看来她此行只不过顺便对我的情况摸摸底，掂量一下我现有的条件够不够她择偶的标准而已，李宝玉那些心思，显然是剃头担子一头热了。果然秋后就传来了令我伯失望的消息，国栋受他的托付去粉旦家探问口气，他们明确对国栋说，刚给粉旦订了婚，对象家就住在邻村。听说男方是国家正式职工，在一家大工厂的食堂当炊事员。

村里拔尖的女子眼睛都瞅着有正式工作的男子，不管是什么工作，她们一律都叫工人。她们有个顺口溜，把跟工人与跟农民的差别讲得很清楚：

跟上工人，自行车后头拦腰一抱；

跟上农民，架子车前头拉个偏套。

到粉旦订婚为止，我们村的大姑娘全部订出。我若想就地解决婚姻问题，除非我愿意花钱跟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订婚，再等上五六年或七八年，等她长到可领结婚证的年龄。当然这只是个杜牧式的荒谬设想，随着李宝玉和我的关系越闹越僵，村里大概很少有人相信跟上我这样的人会有好日子过了。

有天午后，村里过来了个甘肃女人，她怀抱吃奶的小孩，趁饭时沿们乞讨。那女人二十来岁，胖胖的身子，红扑扑的脸，好像个等着投宿的旅客，坐在国栋家大门外的石头上，随时准备被引荐到谁家的炕上。据说是从丈夫家逃出来的，爱管闲事好说媒的国栋把那女人收留到他家，当晚就过来怂恿我把她领回家当媳妇。我能理解国栋的好意，我也知道这是新旺村的传统，不会有人笑话的。但我毕竟还没落到非步我伯后尘不可的地步，对于国栋的建议，在断然回绝的同时，我从心底感到难以言说的羞辱。村里人常说，“有剩男，无剩女。”真是生活中得出的真理，我不愿意收留的甘肃女人很快就让另一个比我还年轻的小伙子连她的孩子一起收留下来，一家三口从此热火地过活在了一起。

1974 年冬天，我从石砭峪回到新旺村。因无厨房可用，就在屋内放个蜂窝煤炉子生火做饭。空牙膏盒子用图钉钉在墙上，一双筷子插进去，明显地标志了我简朴的单身生活。摔坏了的半导体经过修理，凑合可以听陕西台或中央台，但短波是再也收不到了。我完全终止了英语学习，也不再出外修表。虽然再没人主动告诉我公安局调查我的最新消息，但也没有任何迹象证明他们已停止了对我的监视。

几年之后，我的情况完全好转，才陆续有人向我透露了他们当初不敢讲的情况。他们的话都不同程度地证实，公安局并没停止对我的调查，那时候他们随时都有可能把我抓走。

福成是我在外村结识的一个青年，爱读书，有想法，我能和他谈一些无法跟其他农民讨论的问题。那年春天的一个夜晚，我正伏桌翻译莱蒙托夫的一首长诗，福成敲门进来了。他家离我们村至少在七里以外，这么晚突然摸黑来访，不能不让人感到奇怪。他说他去附近一个亲戚家办事，顺路过来看看我，敷衍着说了几句闲话，就心神不定地走了。见他那有点尴尬的样子，我立即有一种“来者不善”的感觉，好像是半路上遇了鬼，他的来访向我显示了不祥的信号。只是在多年后我已进了城，福成又来找我，闲谈中才给我讲了实情。他说就是在他突然去看我的那天，公安局把他叫到公社审问，让他交代与我交往的情况。他说他当时很害怕，因为他是地主子弟，让我别怪他做的事情，我说我完全能理解他的胆怯。于是他接着对我说，公安局逼他马上来我屋里侦探，看我正在做什么，并告诫他不得向我透露一丝风

声。他说那天他之所以匆匆离去，是因为他们的汽车停在村外，还等他回去汇报他在我屋内看到的情况呢。

李奶和我妈住同院，我们两家关系最好，我回城里时，她常对我有周到的照顾。有一阵，李奶的关心让我觉得奇怪，她多次劝我少进城，叫我说话做事交朋友要谨慎云云。为什么她突然要给我这些劝诫？她似乎有什么话要对我说，但话到口边又吞了回去。多少年以后她才告诉我，那时候公安局多次通过居委会把她叫去审问，要她交代我从农村回到西安都干过什么坏事，有什么可疑的人找过我等等。他们威胁她说，如果她向我或我的家人走漏了风声，一切后果由她负责。她确实很害怕，好多年都不敢对我提起接受调查的事情。

刘鸿深是我的初中同学，他在我们街巷社办厂当厂长，我每次进城给生产队买轴承、钢材等工业产品，都求刘帮忙，他每次都尽力帮我。但有一阵他似乎躲避我，办事不再积极，我只当我求他办事太多，惹了人家的厌烦。多年后刘才告诉我，那时候他确实害怕和我接触，他多次被公安局打电话召到外面的茶馆，好烟招待着，要他注意我的言行，随时向他们汇报。他们给了他电话号码和约见的地点，甚至安排他像特工人员那样打入我的交往圈子。他说他那时确实很害怕，但他没有给他们做任何事情。

也是多少年之后，有一次在我的土坯屋内喝酒，顶汉多喝了几锺，他绘声绘色地对我讲："春来，那一年公安局来势可凶啦，我在城里给咱队上包工程，来了个吉普车把我带到了分局。他们把我当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对待，问话时满口吓唬人的口气，还拿几百瓦的大灯泡照我，满以为那刺目的灯光就能把我吓倒。他们问我为什么介绍你来四队落户，问你都结交什么人等等。我心里有主意，反正咱没见你干过坏事，总不能胡说八道。我给他们一推六二五，屁也没交代。就那样，他们把我在灯泡下照了几个钟头，一直想从我嘴里诈出些口供。那时候，我还以为你真的搞了什么反革命活动呢，所以啥话也不敢对你讲。"

顶汉的外甥银嘴也在场，他举起酒杯干了，紧跟着说起了他的经历。他对我说："公安局到村上来过好几次，每次吉普车都停在村外的僻静处，几个人走到我家找我这个队长。你在地里干活，他们叫我领上他们到你屋里查看情况，看你的书，还有你纸上写的那些东西。他们审问我，我都是一问三不知。还有一次他们才搞得鬼呢，结果没搞出什么名堂，反给咱队上办了件好事。你还记不记得，那年队上烧了俩马达，本来打算叫你在队上修呢，后来把你派到城里去修了。"我说我记得很清楚，我住在一位师傅家，那人对我很好，还请我到饭馆吃过饭。银嘴说："那人就是公安局的眼线，专门负责监视你的。马达是公安局来车从队上拉到那人家的，叫你去那儿修马达都是公安局的主意，是他们给你设的一个局，就是有意把你放在那里，好监视观察你的一举一动。那个人请你吃饭的花销都在公安局报销，修理那两个马达的整个花费也都由公安局付了。据说那时候对你的案子抓得很紧，只要查出什么线索或事实，马上就把你抓了。"银嘴的话听得我毛骨悚然，恐怖之后说恐怖，更叫人感到恐怖。喝着酒，我竭力回忆住在那个人家中的一些细节，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心里充满了后怕。

家人和亲戚都认为，公安局监视调查我，明显与我一直单身有关。我若结了婚，少进城走动，不再交往那些闲人，往后安心在农村过我的日子，公安局也许慢慢就会放松对我的监控。不知他们的说法有没有道理，反正我别无选择，只有听从他们的劝告，决定突击结婚。但愿婚姻有护身符或保护伞的作用，但愿婚后能保我平安。

我开始在外地找媳妇了。我们这一带的农户中，家庭情况不好或个人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在本地娶不上媳妇，多去更贫困的地方领媳妇。有从四川、甘肃领回来的，也有从陕北、商洛领回来的，那里的女子只图到平川地带能吃饱肚子，自然也就不太挑剔男方。很多地富家的子弟，有残疾的人，各种条件差的光棍儿，他们花钱不多，都从那些穷地方领回了比本地姑娘还漂亮的媳妇。有人要给我介绍她四川的亲戚，钱和粮票都寄去了，后来听说，人都走到半路上，想到我有政治问题，又拉倒不来了。还有人带了个从商洛来的姑娘和我见面，那姑娘一见我屋里在蜂窝煤炉子上做饭，一双筷子插在牙膏瓶盒子内，摇头就走出了我家院子。

1974 年冬天几乎在山穷水尽的情况下阴郁而过，我想起了祖父常提说的那个“否极泰来”之象。如今我既已潦倒到这一地步，转机的日子，想必也该快到来了吧？也许公安局这来势凶猛的调查正是黎明前最后的一阵黑暗，我在心中暗自祈祷，如果菩萨能保佑我渡过这一次凶险，也许我苦难的日子就熬到头了。

四十四 山里领来的媳妇

1975 年春节后的一个晚上，我五姨带了个姓尹的司机来家中见我。尹师开邮车，专跑商洛一带，他说他认识路边一个名叫竹引的女子。竹引常帮尹师采购核桃、栗子等山货，而尹师也常从西安给竹引代买些白糖之类山里紧缺的东西，两人互相帮忙，遂成了公路边上的关系户。尹师说竹引人很精灵，长相也不错，前不久向他提说过想在山外面找对象的事，我若有意一见，最近就坐他的邮车上去看看。当时我正随五席坊的基建队在城里拉土方，身上没一件体面的衣服，和尹师约好了时间，我把架子车暂存在工地上，借了弟弟的大衣和制服穿上，理了发刮了胡子，稍加收拾一番，便到邮电大楼坐上尹师的卡车上了路。

正当山桃开花的日子，岭头上一片片烂漫绯红，汽车翻秦岭，过商县，开出丹凤县城，约摸半下午时分，在一处柳树丛生的地方停了下来。我跟着尹师穿过树丛，来到路边一户人家。一个年轻妇人招呼我们到屋檐下坐定，她站在台沿上往下面叫了一声“竹引”，片刻之间，树丛里走出了一个有几分秀气的女子。只见她弓起手中的柳条，耍耍达达走了过来，薄嘴唇微微撅起，流露出公路边的女孩子常有的几分狡黠。她走上前和我们打了招呼，斜眄了我一眼，转身就进了屋子。那妇人是竹引的嫂子，一坐下来就问起我的情况。我还是像以往那样直露爽快，开口便把自己那几条历史问题交代清楚。我说我本是城里人，如今在农村落户，受过劳教处分，是因为政治问题。对所有向我介绍对象的人，我一贯都坚持把丑话说到前面的立场，既不存侥幸的想法，也不愿隐瞒任何问题，我打算就这样硬蹚硬下去，谁要嫌弃，就拉倒算了。这是我立身的原则，绝没有什么策略可讲。尹师和竹引她嫂子进屋说了一会话，他们一走出门，我就看出事情没有谈成。尹师的邮车还要继续前行，他让我留下来，说今晚我可以在这里自己活动，争取把事情办好，等明天早上，他的车会在路口上接我。

尹师走后，竹引显得大方起来，她说要引我去个亲戚家走上一趟，说着就带我上了她家屋后的山梁，向右边的一条沟道走去。路上她对我说，她年龄还小，不急着结婚，再说她家里也不想让她嫁到山外面的农村去。她还特别强调了她嫂子的主意，说是要嫁到山外，就非找个吃商品粮的不可。我们走上一个小山包，竹引停下脚步，举目认真地望着我说：“你既然这么远跟邮车来了，总不能让尹师带你白跑一趟。我亲戚家有个女子，我想说给你，现在就是带你去跟她见面。”至此我才听出，她要给我另介绍个对象。她说这女子今年二十三岁，正够领结婚证的年龄，要是我们彼此都愿意，年内就可以结婚。天色正在暗下去，我跟上竹引不知上下多少坡，拐过多少弯，等走到一处山洼洼，看见几户人家，踩着踏脚石越过一道小溪，进了高台台上一家的大门，已是屋里点起煤油灯时分。

那家人似乎已有所准备，我进门不久即端上晚饭，是一大碗煮馍，垒得冒尖高。我知道这是山里人待客厚道的表示，那一大碗饭盐虽放得太重，我还是硬挣着吃了下去。竹引介绍给我的女子名叫秀芹，她比竹引长得高，上身让大棉袄包裹得有些臃肿，昏暗的油灯下，只有脸蛋上那红润的颜色看得比较清楚。与坐在旁边的竹引相比，她显得更健康壮实一些，但再看一眼竹引眉稍和嘴角言笑间偶然一现的神态，我还是觉得她不如竹引生得妩媚。接着她父亲出来见我，招待我喝他们家酿的柿子酒，初一交谈，即可看出是个明白事理的人。杯酒间，我把自师大到新旺村的经历大致给他讲了一遍，还是像白天那样尽量说清楚，免得人家起什么疑惑。老人面容十分消瘦，每一条皱纹似乎都刻下了长期积累的劳瘁。听说我上过大

学，他连声说好，说犯过错误没关系，只要有文化，将来总会有用的。竹引当晚对我说，他们全家人对我印象都很好，说我要是没什么意见，明早尹师的车下来，就让秀芹跟我去西安到家里看看。

第二天秀芹上车时我还有些犹豫，想叫她先别去西安，等缓一步再说。我明明是到山里头领媳妇来了，但事到临头，想起把婚事办到如此屈就的地步，心里不由得又打起了退堂鼓来。我脑子里还是城里人先谈了恋爱再考虑结婚的观念，如今完全按照农民的方式娶媳妇，总觉得有些丢人。因此突然面临决断的时刻，反倒拿不定主意。见我依然迟疑不决，尹师便有点不悦，他说这邮车是他开的，拉不拉谁由他做主，说着就让秀芹上了车。尹师并不理会我此刻的心思，他说带上我来山里一趟也不容易，他既受了我五姨和姨夫的托付，好坏都得带个人回去让他们见见。就这样一路上颠簸着，我和秀芹面对面坐在车箱的邮件堆里摇摇晃晃，半下午时分就回到了西安。

我五姨和姨夫早在我家等候多时，他们一见了秀芹的面就很满意。母亲忙着准备饭菜招待尹师，五姨坐在秀芹跟前，拉住她的手问长问短。姨夫在一边打量着，回过头拉我到一边说："这女子个儿高身体好，看样子人很麻利，结了婚跟上你在农村生活，肯定里外都是一把好帮手。"尹师走后，五姨嘱咐母亲留秀芹在家里暂住几天，还一再劝我说，我得明白我现在是个农民，都过了三十的人了，再不可三心二意下去，白耽搁自己的终身大事。姨夫也在一边热心催促，他叫我母亲把那几百块抚恤金准备好，说是若无其它意外的情况，干脆就抓紧机会，在今年春天给我把婚事办了。

秀芹乘尹师的车返回不久，四月上旬，天气突然热起来的一日下午，她又乘尹师的车到西安来了。车上拉了一对箱子和一堆盖厨房用的木料，她随身带了领结婚证的证明，还有她姐和竹引同行作陪。显然，她这一次到西安就是和我结婚来了。我五姨为事情办得又顺又快而倍感高兴，但身为当事人，我心里却在嘀咕，特别对事情进展得如此之快感到有些蹊跷。难道她在她那个地方再待不下去了？她如此毅然决然地嫁给我这个山外人，莫不是为了尽快摆脱什么麻烦？她和她的家到底出了什么事？她要逃避什么？介绍了那么多的对象，没有一个不弹嫌我那"反动"的历史，为什么就她和她父母一点也不在乎？我在心里胡乱猜测着，婚期眼看就要到来，我仍恍若置身局外，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母亲向来不善于处理具体的事务，她把大小事全交给五姨操办，五姨带秀芹上街买衣服，购置床上用品和屋内的摆设，五姨张罗着定日子，通知亲戚，摊派礼物，她忙碌得热情洋溢，处处都摆出了为她大姐当家作主的架子。母亲处事最不耐烦，她不只缺乏里外应酬的能力，还特别讨厌在家招待过多的客人。现在家里终日乱哄哄，增加了好几个吃饭的人，五姨在一边热心筹办喜事，她却终日愁眉苦脸的样子。我再次成为她发泄不满的对象，她得空就叮住我穷嘟囔，说我害得她整天伺候这么多人的饭菜，嫌我尽给家里招惹丢人现眼的事情，弄得她出门见了同院的人都抬不起头来。还说我三十一岁的人了，至今不能自立，要不是自来水公司给了那几百块抚恤金，看她现在拿啥给我办婚事呀！

多亏有五姨从头到尾替母亲做主和跑腿，四月二十日，我们在饭馆包了两桌酒席，请了些不冷不热前来应景的亲戚，在无论如何也热闹不起来的气氛中草草举行了我和秀芹的婚礼。

几天后，我和秀芹返回新旺村。终于熬到了让母亲如释重负的时刻，走出了那个让人感到碍手碍脚的大杂院，我自己也觉得轻松了许多。临行前，母亲一再啰嗦，叮咛又叮咛，她叫我回去后好好过我自己的日子，再不要三天两头跑进城惹事生非了。五姨也特意赶来，好像要把我这个不安分的外甥郑重移交给秀芹管理似的，她吩咐秀芹好好守住我，一定要带上我老实当农民等等。接着又转过来教训我说，现在我是成了家的人了，再不许像以前那样不安心在生产队干活，动不动就跑进城搅扰我母亲。

回到新旺村，不久即开始夏收，我们的蜜月在大忙天度过。两个人白天麦地里汗流浃背挣工分，晚上回来，新婚的床铺上再增添些贪欢的操劳，日子过得疲惫而又坚韧，每天早上

在上工铃紧急的催促下从床上爬起来，就像放干了的雨伞死活都撑不开一样，我困乏的胳膊腿一时间鼓足了劲也舒展不开。一两个月劳累下来，我整个的人瘦得都有点失形。身体在消耗中也经受了磨砺，虽然是瘦骨棱棱的样子，却瘦出了几分顽强的骨鲠。秀芹不知是不服水土，还是干不惯这里的活路，她三天两头身体不适，都是些莫名其妙的症状。随后又是恶心又是发烧，很快就被证实怀上了孩子。

从此以后，贫贱夫妻的头疼事务一大堆，我也确实再没有闲工夫进城去麻烦我母亲了。最初对秀芹及其家庭的那些疑惑，还有婚事上种种不满意的想法，也都渐渐丢到脑后，彻底淹没在劳碌的农家生活中。直到后来秀芹她父亲病故，我们的新婚早已成了旧婚，在一个寒冬的夜晚，两个孩子都在热炕上烂漫熟睡，她才揭起她往事的封条，把她的经历给我从头讲了一遍。至此，我才得知她父亲的遭遇以及他给全家人造成的不幸，还有她本人婚事上的坎坷，连带我那年去丹凤领媳妇前前后后发生的事情。

那一夜，我边听边记，就按笔录口述史的方式，把她讲的话逐句照录下来，在我的日记本上记了十数页。现照抄如下：

方秀芹自述

解放前，我爸是个穷光蛋，他家弟兄五个，他为五，分家后只得了两间草棚。因躲壮丁，我爸常年在外面乱跑。他跟八路军打过游击，后来叫保安队抓过俘虏，放回来以后，暗中还给八路军办事。他读过初中，在村上算个能人，也常在花鼓戏班子里扮角。

我妈娘家本是富农，他爸是个读书人，整年闲在家里读旧书，从不下地干活。后来地都荒了，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我妈才六岁，就叫她爸卖到一户人家当了童养媳。那一年我爸带我妈从那一家偷跑出来，回到我们银杏沟，俩人就结了婚。

土改时我家分了地主的大房，我爸当了乡长。58 年大炼钢铁，我爸调到铁峪铺钢厂管财务，当时我家在村上可红了，人家都争着巴结。那一年我刚上小学，老师宠我，开口闭口都叫我“小会计”。后来开始吃食堂，起先大吃大喝了一阵，人人都高兴，接着舀到碗里的饭越来越稀，食堂很快散了伙。60 年钢厂扯了，我爸回到队上劳动。后来就闹起饥荒，饿死了人。到处都谣传说，“彭德怀反了毛主席，中央要变了。”我爸跟别人暗中搞起组织，他们准备起事后先占领邮局和乡政府，剪掉电话线，然后打开铁峪铺粮站的粮仓，把粮食全部分给乡民。起事的日子定在农历二月二，二月二是龙抬头的日子，选那个日子，一是图个吉利，二是表示农民要站起来。都怪我爸自己口不紧，害了他自己后半辈子，也连累了我们全家。正月二十九，他去县城买东西，路过一个好友家，他想拉扯那人入伙，就给那人讲了他们抢粮站的计划。没想到他前脚出了门，那人后脚就去告了秘。公安局行动很快，我爸还没到家，半路上就让赶上来的便衣钉住了。他见事色不对，便见机钻进树林溜走了。公安局组织民兵搜山，但没抓到他，当天晚上，二十多个持枪的干警包围了我家。我还记得，他们说我爸参加了反革命集团，叫我妈快交出他藏身的地点，我妈只是放声大哭，她其实什么事都不知道。我爸独自钻进深山老林躲了起来，其它同伙一点都不知道他走漏了风声。二月二那天，他们都到原先约定的山顶上聚会，预先埋伏在那里的解放军就把他们全部抓了。其中有个妇女钻进梢林想逃跑，当场就让他们开枪打死在山上。据说子弹是从她背后射进去的，穿出胸口时，炸得奶头四面开花，在山坡上流了一大滩血。我爸在山上躲了六七天，最后撑不下去了，只好出来自首。半年后，法院以反革命罪判我爸八年徒刑，随后送到马栏农场服刑。

那一年我上小学四年级，我爸一逮走，学就上不下去了。上学放学的路上，课堂的内外，娃娃们看见我出口便骂我“反革命的女子”，老师也都另换了一副面孔，再也看不起我了。我实在没脸走进校门，从此就再没去上学。当时我妹子一岁多，我弟四岁，外婆在家里做饭看娃，我妈上工时总要带我同去，她在地里干活，让我到树丛里拾柴。

自留地的活，我妈一个人干不过来，只好求亲戚帮忙。亲戚都是偷着来帮忙的，怕公社的干部见了训斥他们。有一次竹引她哥——我叫他表叔——来帮忙，不巧让一个干部碰见了，

那干部指着鼻子呵斥他说："谁叫你来给反革命家属帮忙的？你家是啥成份？你还讲不讲阶级斗争？你马上给我滚回去！我警告你，甭叫我下一次再踫见这事情。"亲戚们让干部训怕了，都不敢来了，唯独我这表叔人老实，只要我妈叫他来帮忙，他就夜里跑来偷着干。就是夜里我妈还不放心，特别安排我在地边给我表叔放哨。

铁峪铺每年农历四月八有忙前会，往常我爸领我去看会，集上给我买一碗荞面饸饹。那一年逢会，我哭着闹着要去逛会，眼巴巴看着人家的孩子都跟他爸下山去了，我妈就是不准我去，我妈没有钱，我爸又不在家，没人领我去集上。我长到十岁，我妈就把我当劳力使了，家里烧火的柴全靠我拾，另外还要背上背篓上山割草、捋构树叶子，把那些东西背回来喂猪。

队上按工分给社员分粮，我家缺劳力，我满十二岁就跟我妈到队上干活，每天才挣三分工。开荒时，男劳在前面搬石头，妇女拿砍刀跟在后面砍树，我妈跟地主婆一前一后，我跟地主女儿一左一右，坡上常滚下来石头，或擦了手，或碰了脚，一年到头，我脚上的青伤还没消，手上又新添了红伤。冬天，山上飘起雪花，我光手握砍刀，手都冻麻了，队长还不让停工。我要回去，我妈不准我回，我边干边哭，为的就是挣那一天两晌的三分工。我们常年吃浆水菜，都是用红苕叶子泡的，我妈一泡就是一大缸。每天天麻麻亮，我们就着浆水菜喝了苞谷糁就上工，干到上午端才下工。撑到那时候，我早已饿得站不稳脚跟，眼看着别人都下工回家，我妈还硬逼我跟她沿途拾柴打草。

我三分工一直拿到十五岁，十五岁以后，我妈听了旁人的话，说是早早订了婚，把我卖些钱，还能常叫女婿帮家里干活。从此说媒的经常晚上来我家提亲，来往的人都能把我家的门坎踏断。但我妈在婚事上拿不住我的主意，反正我都不答应，她也拿我没办法。我妈什么都不懂，她只信命，有点钱就拿去给神烧香放炮。弟弟妹妹慢慢长大了，我得帮我妈养活他们。我知道我这辈子是没机会上学了，家里的变故耽误了我，可我不能让弟弟妹妹也跟着耽误下去。我想我再苦再累也得挺住，得帮我妈把我弟弟妹妹送去上学。

我妈不识数，也认不得票子，我小小年纪，就在屋里替她当家，买卖东西全由我掌管。那时候没有其它生财的门路，山里人都靠养猪和卖柴赚钱。我和我妈上山砍橺木，用锯截短，一节节装到背篓里，母女俩再背到沟口的大路上卖钱。从我们沟里到沟口，上下二十里，一次我顶多背五十斤，有一天我往反三趟，卖了三次柴，挣了两块多钱，给家里买回了下锅的盐和点灯的煤油。那一天我背柴用力过猛，挣得我下身一股血涌出，顺着大腿直流到脚面上。我年龄太小，不知道血是怎么流出来的，也不知道流血的可怕，身上连干净的纸都没有一张，我只好走到河边，用冷水把自己洗净。有一年干柴的价钱好，我上山砍了一天柴，不小心一刀下去，把手背砍了个口子。眼看着血流不住，我只有自己给自己急救，用了农村的老法子，抓一把土面面盖住伤口，总算止住了流血。

我家是欠账户，我妈每天六分工，我三分工，母女俩一天才挣九分工。队上的一个劳动日从没上过两毛钱，我和我妈干一天活，折合成现钱不过一毛多。我们一年干到头，从不缺工，到年终还欠队上七八十块钱。队上也没钱分给社员，欠的钱和分的钱都挂在账面上，等到了决分，队上就把讨账还账的手续转嫁给社员，让分钱户自己找欠钱户要钱。我家每年卖一头肥猪，猪都是树叶和草喂大的。因见我家槽上有大猪，人家都争着要包我家的账，我们便把卖猪得到的钱退给分钱户。

文化革命开始了，人家都当了红卫兵，只有我和地主女儿等娃俩人没资格参加。我们分的是地主的大房，就住在地主家的隔壁。红卫兵先斗地主家，地主本人早死了，他们就把地主的大老婆拉出来批斗，在我家屋外的大树上吊了一夜，吊到了天明，人早在半空中硬梆梆没有气了。

接下来就抄我家，他们扬言我家藏的有枪支，屋里翻遍了，没找到枪，又拿上镢头在我家自留地乱刨，最后还是啥也没找到。他们一口咬定枪藏在别处，因此把我妈拉上批斗会，叫我妈向群众交代藏枪的地方。批我妈我也得参加，我只好躲在角落，独自个暗暗流泪。

后来有部队住在我们村上办学习班，又搞重定成份的运动，把我家随便从下中农升成了上中农。有一次我妈下工回家，一个解放军战士把我妈截在路上。他厉声问我妈："你是不是反革命分子方乡武的女人？"我妈回答"是。"那战士立即手指头捣着我妈的脸大骂起来，骂尽了各种侮辱的话，骂了一两个钟头，引得一大堆乡党围观。晚上，我外婆把下了红苕的苞谷面糊糊做好了，全家人都哭着吃不下去。他们在屋里哭着，我面对那贴在墙上的毛主席像发问："毛主席你说，解放军不是人民的子弟兵么？为什么一个当兵的无缘无故要欺辱我妈？我妈到底有啥罪？一人犯法一人当嘛，我爸业已判了刑在马栏劳改，难道还要把我们全家人逼死不成？毛主席你说，这到底是谁的路线，哪一级的政策呀？"我外婆胆子大，夜里关了门，她常指着毛主席像小声咒骂。她骂毛主席像说："老毛，你不是㞞，你下巴上长了个大黑黡子，你这吃人的贼，你把我女害得男不男女不女的，整天上山干活，你把老百姓害得都吃不饱肚子，你把多少人都害死了，你咋还不死呢吗？老毛，你这害人精，叫我把你狗东西拿针扎死。"她越骂越气，边骂边拿起鞋底子打那毛主席像的嘴，再拿她缝衣服的针狠扎那下巴上的黑痣。

我队上有户贫农，家里有两个儿子，老大腿有点瘸，性子不好，常跟人打架，外号叫三愣子，三十多岁都找不到对象。后来他家就叫人到地主家说媒，地主小老婆图人家是贫农，看上三愣子人硬，只指望结了亲有个依靠，便把她女儿等娃嫁给了三愣子。我十六七以后也开始考虑我的婚事了，但凡找上门来提亲的，差不多都有趁人之危的用心，都想在我身上捡个便宜。他们见我们如今成了反革命家属，便给我说那些找不到媳妇，像三愣子之类的男人。但我可不是等娃那种软柿子由人捏的，要找对象，我就要找个我自己能看上的，靠跟人家结亲求庇护的事，我坚决不干。凡是我看不上的，一律都给回绝。而我心里喜欢的，人家又嫌我家的情况不好，全都不愿意我。三愣子他弟名叫双喜，双喜和他哥简直天差地别，他脾性温和人缘好，读完了高中，在村上的小学当教师，我们队的女子差不多都喜欢双喜。我也喜欢双喜，但双喜比我大五六岁，他只把我当小孩看，从来也没特别注意过我，我纵喜欢人家，也只能喜欢在心里。

我让说媒的事搅扰得经常烦闷不堪，后来就因婚事不如意气得我大病了一场。头天晚上我发了一夜高烧，第二天两腿就痛得下不了床了。家里仍然是没钱看病，我一口药没吃，躺在床上硬挺了三个月。我妈只知道叩头烧香，拿黄表纸在神前求药。我舅来我家，见我两条腿直挺挺，硬得柴棍棍一样，就把我接到他家给我扎针，自己上山采草药给我熬汤喝，后来用了些土法子，才算治好了我那怪病。

我已长成四分工，队长老是把我和我妈派到最远的山上干活，连给我们的自留地也分在一座高山上。粪全是我母女俩一背篓一背篓背到地里，收下的红苕，又一背篓一背篓背回来。那一年队上的萝卜丰收了，给我家就地分了一大堆，还得我和我妈从山上往回背，背得我尾巴骨上的皮肉都磨烂了。我实在撑不下去，扔下背篓不干了，我妈就捞起一个大萝卜打我。我跑到悬崖边上，吓唬我妈说，她要是再逼我，我就往下跳了。日子实在太苦，除了咬紧牙关硬往下撑，我们没有任何办法。我受不了的时候就坐在山坡上放大声哭，我妈老是哄着我说，等我爸从劳改队回来，日子就好过了。

69 年我爸从劳改队回来了，我家三个劳力，日子过得还算可以，那两年没有啥运动，也没有人欺辱我们。可惜安宁日子没过多久，运动又来了。工作组来到我村上，发现我爸漏戴了反革命分子帽子，他们到区上翻了档案，在 70 年底开社员大会，重新宣布给我爸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从此以后，我爸一直到死都没舒服过一天。我最受不了看我爸上批斗会：上台子的时候，他们故意从我家亲戚中挑两个人出来押我爸出场，谁不干，谁就是立场有问题。被挑出来的两个亲戚在两边一人扭住我爸一个胳膊，等干部一声令下，就把我爸押上台子。我爸胸前总是挂着牌子，头总是被狠狠往低压下，腰总是弯到九十度，而批斗中总是些爱打人的家伙跳出来，对我爸拳打脚踢。我爸老是在家里说，回到生产队还不如待在劳改队

好，像这样在自己家里活受罪，还不如把他多判几年。他常常自言自语说："他们要把我往死整呢，我活不了几年了。"

我从此断了在本地找对象的念头，一心想离开这鬼地方。72 年，我有个在合阳县工作的堂兄开拖拉机回来拉木头，我坐他的车第一次到了西安。我堂兄顿顿带我饭馆吃饭，还领我逛商场游公园，山里娃没进过城，西安待了那三天就像上了一次天堂。我堂兄给我买了一爪子香蕉，头一次看见那半黄半绿的东西，我拿在手里，都不知道该怎么个吃法。我跟我堂兄从那些高中、大学的门口经过，才知道像我这么大的城里姑娘都不干活，还靠父母养活当学生呢。看她们穿着裙子走在大街上，嘴里噙着冰棍，我真羡慕城里的女子娃享福。

从此我的心野了，我先去公社的基建队干活，后来又去了水库工地。水库离我家一百里，我自己背上铺盖和口粮走了一天才走到那里。我们全公社的女民工住在一个帐篷里，我慢慢认识了很多人，开始联络到落脚西安的关系。在水库干活工分高，还有粮食补贴，我把平时省下的馍卖给饭量大的民工，一点一点攒够去西安的路费。西安我跑了好多趟，看了好多家，大都是郊区农民，也有一家是当工人的，但都是本人有问题的，在当地找不到对象，才打算娶我们山里头的女子当媳妇。我找对象找得又艰苦又辛酸，结果一个都没看上。

我西安跑的次数多了，村里的人就谣传我在西安搞投机倒把，在全大队的社员会上，干部点名批评了我。我很灰心，不想再去西安白贴赔盘缠，因此又想在丹凤县城内碰我的机会。有人给我介绍了丹凤水泥厂一个临时工，小伙子长得白白净净，大个子，头一次见面，我和他当下都觉得满意。第二天黄昏，我们就在丹凤河的桥头上单独见了面，他领我去他家看房子，是新盖的三间大房，两个人在屋里谈了好久。临分手时，他说他愿意我，只等和家里商量了就做决定。我吸取了以往的教训，暂时把我爸的情况瞒着，分手后我一直不放心，只怕他父母背地里打听，问出我爸的什么。果然不出所料，他父母很快就打听出我家的情况，事情最后没有成。这事对我的打击很大，我知道我是很难找上我喜欢的人了。那一年春节，人家都高高兴兴过年，我闷在家里，把眼泪往肚子里流。此后，凡来说媒的，我一律谢绝，有时我都想不如给成份好的人家当个娃，甩掉"反革命的女子"这顶压得我抬不起头的大帽子。可我这么大一个姑娘娃，又能给人家谁当娃呢？想着想着，眼泪就把枕头流湿了。

74 年，又刮起了狠抓阶级斗争的风，我爸大会小会批斗了十来次。头几次，我们全家都没去，关门躲在屋里生闷气。工作组来我家大声训斥，逼我写了检讨。后来我不敢不参加，见我爸台子上站着，台下的人都拿白眼瞪我，那些冷冰冰的目光就像乱箭射人，看得我忍不住眼泪珠子滴嗒滴嗒顺脸蛋长流。但我台子下不敢哭出声，胸口的气实在憋不住了，我才扭头跑进玉米地，放长声大哭起来。有一次正开批斗会，工作组带人闯进我家，提秤的提秤，拿口袋的拿口袋，不问青红皂白，揭开我家的粮柜就把麦子往口袋里装，一下把我家自留地打下的二百多斤麦子全部没收了，没收的理由是我家开的自留地太多。这是够我们一家人吃多半年的细粮啊，干瞪眼看着那伙人强盗一样拿走了粮食，他们这才从批斗会上放回了我爸。

我又来到了西安。临走的时候，我心想，这次好坏找个对象，先逃一条活命。我妈把我跟到路口上，她要我这一次非把婚订了不可，她说我要是挑来挑去还不订婚，就别再回这个家来。我很快给自己找了个对象，但不是我满意的对象，是西安郊区一家农民的儿子。那男娃长得矮小猥琐，还没我个子高，他妈看样子很刻薄，订婚那天，当面给我提了好多当媳妇的苛刻条件。我心里本不愿意，只怕回到家中我妈啰嗦，便糊里糊涂答应下来，收了他们给我的一身新衣服，一双皮鞋，抱着走一步看一步的想法回到家中。回家后我越想越后悔，就把那衣服包好，托人退给西安的介绍人。介绍人很着急，不断来信催我去西安见他。因此自过了年我就急于找个合适的对象，好尽快把那门小女婿的婚事退了。

就在这时候，竹引给我说，要在西安附近找个农民很容易，她认识开邮车的尹师，她可以让尹师给我介绍一个。不久竹引就来找我商量，说尹师要给她介绍个对象，那人在长安县落户，他父母都在西安市工作。竹引还说，她心里不太愿意，嫌那人没有正式工作。我当下

就对竹引说："你先叫尹师把人引上来，只要人好，你就答应了，你的事要成了，也好把我救出去。"你上来的那天，竹引捎话叫我去帮她相人，我没去，让我妹子去了。那天下午我照常在地里干活，我妹子一进门就对我说："竹引不愿意那个城里人，嫌他犯过错误。那人长得可好了，就像咱们沟那边地质队的队长。"过了一会儿，竹引就把你引进了门。进门后，竹引先过来对我说："人给你引来了，就看你愿意不愿意，要是愿意，明天就跟邮车下去。"

你坐在灯下，我在一边偷看，竹引想给尹师办事，尽说你的好话。我一边在暗处看着，竹引一边给我打气，就这样看着说着，我的心一下子动了。我爸和你谈过话，对你印象也很好，说你是个大学生，只要有文化，将来不愁没有好工作。后来我和你在灯底下见了面，以后的事你自己全知道，我就不往下说了。

四十五 女人是个房楦头

夜深处传来了几声鸡叫，俩孩子都睡熟了，热炕上烘得小脸蛋红苹果一样。我继续听她讲述，听她讲出了很多当初没提说过的事情。

方秀芹自述（续）

我那一年来西安找对象，在公路局一家工人的单元里住过几天。那是座临街楼，他们夫妇俩上班去了，屋里就剩下我一个人。我常从窗口向大路上看，看见自行车一辆接一辆从楼下骑过去，有好多骑自行车的小伙子背后都带着女的。女的都是双手搂在男的腰上，脸贴在男的背上，车子骑得飞快，兜起的风吹得花裙子呼啦啦飘。我真恨我生在穷山沟里，直到那时候，连自行车蹁都没蹁过一下。你骑自行车带我到新旺村看家那一回，我才头一次坐上了自行车的依架。我老是坐不稳，你叫我往前靠，伸手搂你腰，我不敢搂，我还害羞，也对你有些提防。所以坐得太靠后，身子趔趄着，俩腿伸得死硬，害得你一路上倒了好几次车子。见你那没安大门的院子空荡荡的，房间又小得转不过身，钉在墙上的空牙膏盒子只插了一双筷子，我心里不由得凉了半截。随后转念一想，光两口过日子也有好处，上无公婆管束，下无兄妹搅扰，我这才觉得自在了一些。但我还是不放心，怕就怕你那个"反动"罪名也戴着帽子，所以特意去问了队长，听队长说你没戴帽子，我才放心回了丹凤。

回到家里才得知，我前脚走出银杏沟，大队干部后脚就把我爸拉到队部审问。他们嫌我走时没请假，硬逼我爸交代他派我到西安去搞什么反革命串联。我爸交待不出什么，他们就把我爸捆了一绳子。从西安回家的当晚，我去找工作组质问他们，一无根，二无据，凭什么那样蛮不讲理把人往死里整。我那天口气很硬，要他们拿出证据，看我那些找对象的事哪一件算得上"反革命串联"。起先，对咱们的婚事，我还有点动摇，等回来一看屋里是个这情形，我才横下心决定立即嫁过去。我想，反正好坏就是那回事了，干脆拿自己的命硬碰去吧。

我得先去大队开介绍信，拿上介绍信才能到公社办到领结婚证的证明。他们不给我开，说我西安去了好多次，得把问题交代清楚，才给我开。他们不开，我就叫他们不得安宁，我找来大队书记，问他我去西安到底干了什么坏事，叫他们摆出事实来。和他们磨牙淘气，闹了两三天，我才拿到介绍，然后去公社开出了领结婚证的证明。没想到村上的工作组嫌我态度不好，对我心怀嫉恨，见我马上要远走高飞，他们不忿，就想使个坏拖我的后腿。于是专程去公社找了书记，说我还有问题没交代清楚，不能随便把我放走。第二天公社派来俩民兵找我，问我是不是去公社开过一个证明，我并不知道工作组背后搞鬼，就答应"是"。他们叫我拿出那证明看看，我就老实拿给他们看，没想到他们把那证明抓到手里，二话不说，拧身就走。我撵上去追问，他们不作解释，叫我问公社书记去。没办法，我只得去公社找书记索要，书记说证明放在文书手里，去文书处要，文书又叫我去求书记同意。他们两个各在各的办公室看我的笑话，把我像皮球踢来踢去。我给他们说尽了好话，他们不但不给，时不时

还奚落我几句，我缠得紧了，他们就对我大声训斥。我在公社整整求了一天情，眼看着天色暗了下来，他们还是拒不还我证明。

我在铁峪铺亲戚家住了一夜，第二天继续去公社索要。磨过中午，书记开会去了，我就死钉住文书。文书离开办公室，转身进了他的房间，然后从门内透出头招手叫我过去，我随后进了他的屋子。屋内生着木炭火，床上垂下蚊帐。文书突然换了腔调，开始用温和的口气和我说话。他对我说："办公室跟你说话不方便，叫你进这卧房来，想问你个问题。"他让我坐下，我没理会，就紧靠住门站定。见他那神色怪怪的，我就知道他嘴里放不出什么好屁。他问我："你为啥这么着急结婚？是不是跟人乱搞怀上孕了？"要是在平常，对他这样无耻的谰言，我非厉声顶撞不可，但现在我惹不起他，就只好隐忍着，正色对他说："你少在这儿胡说，根本没有那事。"他拿腔作势的，一脸的假正经慢慢露出了暗藏的无耻，说着就从火盆旁站起来，向我逼近一步说："我不信，你把棉袄撩起来，叫我看看。"我靠紧门框，做出防护的姿势说："我不。"他更加露骨地催我说："把裤带解开，叫我在你肚子上摸摸我才相信。"我实在忍不住了，便对他说："你想仗势欺侮人呀，到我们银杏沟打听去，我方秀芹不是好欺侮的。走，咱到书记那儿说理去。"他一下翻了脸，指头指着我脸上说："算了，今天的事就到此为止。你给我出去！要是到外面胡说，小心我叫你从铁峪铺公社走不出去。"

书记回来了，我又过去向他要证明，他不理我，我紧跟不放，结果他生气了，回过头就骂我："跟到明天也不给你！把你这反革命的女子放出去，叫你到西安给你反革命父亲翻案去呀！"见书记训斥我，文书在一边幸灾乐祸，抽着烟发笑。我知道这样和他们纠缠下去没有用，便怏怏地回到家中，心上就像压了块石头。这事拖了两天，最后还是我姐夫求了我们大队支部书记，多亏他有心帮助，最后才要回了那一张证明。证明拿到手，第二天我就搭邮车去了西安，接着跟你去高桥公社领了结婚证。

你在新旺村结婚，我看村里有一半人都不悦意。你知道为啥？你娶了媳妇生了娃，就在村里把根扎下了，往后要多分队上的粮，要占队上的庄基地。咱们要掰集体的大馍，当然人家不高兴了。隔壁的会计让道尤其不悦意，他本来盼你早日离开新旺村，撇下这空庄基地，好方便他家的庄基地扩大。你现在成了家，不会轻易走了，他自然把你当成眼中钉。咱们新婚没几天，让道就挑唆队长派你去石砭峪水库，再次去给队上顶公差。你走后，村里就有些人来我跟前钻空子，他们各怀各的鬼胎，给我乱说你的坏话。有人说你城里娃，吃不了苦，不是过日子的人，说你在村里带头穿拖鞋，弄得好多小伙子都学你那吊儿郎当的样子。有人说你身懒，讲究星期日不上工，在你的炉子上炒菜吃。他们说村里自家养鸡下蛋的，连家里的老人和娃娃都舍不得给吃一个，个个都要拿到城里卖钱。你一个大小伙子，没坐月子没害病，居然舍得花钱买鸡蛋吃！银嘴更是说得我害怕，他说公安局来队上调查过你好多次，说不定啥时候铐子一铐，就把你抓走了。他们都是满口关怀我的样子，说跟上你这种人过日子靠不住，劝我不如趁早回我娘家，不要再来了。你伯——他实在不配给人当伯，我就叫他老汉算了——要是会活人，愿意跟我和睦相处，我也就捎带着给他把饭做了。国栋和几个好心人都劝他跟我合，他见我忙前还没分粮，怕合在一起我吃了他的粮，死活就是不合。他不但不合，也不让我用他的厨房，我只有把你那个蜂窝煤炉子放在房檐下生火做饭。我实在一个人撑不下去了，才求国栋托人捎话把你从水库工地叫了回来。

我那时很着急，心想首先要盖起厨房，打上院墙，日子才能安宁。所以我得空就往院子拉土，你从石砭峪回来，我院子里已堆起不少土了。我们紧赶慢赶，总算赶在忙前盖了一大间油毛毡棚。盖房期间，垒墙和盘灶，国栋都帮了大忙。你从外村请了些你水库上交往的小伙子把临街的墙打了，院子好坏严实了一点，村里头那一伙爱管闲事的，想走进来管闲事，也不再像以前那么方便。

我的户口很快转到了高桥公社，那一年在四队分了夏粮。我常说，待在这穷农村过日子，是跟一群活鬼闹世事呢。人没钱没势，走几步路都有人出来给你使绊子。你是外来户，如今

又从山里领来个媳妇，忙前到的，忙中即分了夏粮，当然很多人都心怀不满。咱们分粮的时候，兴善他爸和宽让嘟嘟囔囔，说什么干活时没人，分粮时人都来了，他们那风凉话明显是冲着我们说的。人软招人欺呢，我想我初来，不能太示弱，他们那边说着，我这边就应了声。我说："我是带户口到四队来的，又没白分队上的粮食，谁要不服气，就把话挑明说了，咱们到大队或公社说理去。"地里干活的时候，也常有人找事，能忍的我先忍了，实在不能忍的我就和他们顶撞。唉，我来四队的头一年，事事都难，等第二年生了小稼，盼我回了娘家再不来的那些人见我撺掇不走了，这才慢慢泄了气，不再找上门管我们的闲事。

你是有钱人家的娃，从高处跌到了低处，人在农村，心里想的老是城市。结了婚，我看你还是照样混日子，想跟你好好商量过日子的事情，从来没见你有过兴趣。有时候你满嘴胡说，说什么到了四十岁还离不开农村，你就自杀。你只图你自己说了痛快，也不想我听了那些混账话心里是啥滋味。我跟你不一样，我从小啥苦都吃过，咱们初结婚家里虽穷，吃的喝的比我山里头要强多了。你不感兴趣的事我可感兴趣嘛，我就是要争这一口气，要把日子过得比那些看不起我的人更好。前面的路是黑的，那时谁都预料不到你啥时候平反进城，我也不愿意往那方面多想。我嫁的既然是农民，自然就要打我当农民的主意，抱着一辈子就在农村生活的想法，我一心要早早生个男娃。你害怕养娃加重你的负担，说是几年内不考虑生孩子的问题，刚结婚不久，你就从城里拿回避孕药督促我吃。我哄你说我按时吃了，其实我早就扔了，根本没吃一片。我二十三正当年，不趁早生我的孩子，听你那些混话，岂不耽误了我做女人的大事。可惜头胎生了个女的，按政策规定，上了环才给孩子报户口，我只好先把环上了。但给孩子把户口一报，我很快就暗中花钱走后门卸了环。反正我按我的主意办事，什么都没对你说。跟你在一起相处，凡是谈不拢的事，我一律都不跟你白费口舌，啥事要都跟你商量好再去办，我看我啥事都办不成了。我打算抓紧时间集中生孩子，隔了一年，果然就生了个男娃。怀上庄娃的时候，你多次要带我去堕胎，我一直都拖着没去，我要是听了你的话把手术做了，现在就没我庄娃了。我三年生了两个娃，一儿一女活神仙，四队的人不但不再欺生，好多妇女都把我眼红死了。

咱俩初结婚经常吵闹，两个人的心性太不一样，干什么事都闹对立。我想和你好好过农家日子，你却不好好跟我配合，我知道我纠正不了你，但也不能跟着你稀里胡涂往下混。所以我想了又想，只好多对你做些忍让，平日不和你掐尺等寸，干活的事情上自己多吃些亏，免得和你发生些没意思的争执。有时你去城里闲住或给队上出差，一去两三天，有人就挑拨我说："你在家里干活，让他进城逛大街，你咋这么傻的？以后他进城你也跟去，住到他妈那儿享福去。"我才不听那些人不怀好意的闲话，总是淡淡地对他们说："咱农村住惯了，不想进城享人家的福。"

很多事按说都该男人干，你不好好干，我只好顶着去干。比如去磨坊磨面，人家都是叫男人去干的，叫你去磨吧，你不知道爱惜粮食，嫌把剩下的麸子在电磨子上倒来倒去太麻烦，面总是收得偏高，留下的麸子太多。那时候我们缺粮，我看不过眼，后来就亲自去磨坊磨面。为了多磨些面，我常把面收得偏低，篜出的馍比人家的黑，惹得邻居都笑话我太仔细。也有人撺掇我，叫我别那么傻出力给你干活，我才不听他们那一套，我心里打定主意，在干活的事情上，有你就当没你。既然说不动你使不动你，我就自己动手干我想干的事。我在娘家是养猪能手，见四队多数社员都养猪，我也想养一头，你却不愿意养，我只好自己去集上买回一头小猪。你还记不记得，我那猪娃短嘴粗身子，长了个能吃的架子，从小不挑食，吃起食来可心疼啦。咱们那时缺粮，可怜我那猪娃顿顿都吃不上精料，我用半盆水和几把干草末，再给里面搅拌些麸子，往槽里一倒，那猪立刻半个脸埋进稀汤，一口气吃得光光净。那头猪果然是个好种，硬是吃草咽糠长起了大架子。只因我们没有精料往肥追，它大肚皮搭拉下来，喂到底都上不了膘。送到供销社，验不上级，公家不收，最后我八十块钱转卖给私人去喂了。这八十块钱是我到新旺村靠自己双手挣下的第一笔钱，我拿那钱买了辆旧架子车，咱们家从

此才有自己的车子拉了。

1976 年，毛主席死了。正是闹地震的时候，我带小稼睡在咱门口苞谷杆搭的防震棚里，你说你不怕地震，照常在屋里睡觉。我听到门口的有线广播播出了毛主席的死讯，一遍连一遍响着哀乐，便急忙回屋给你报信。咱们嘴里不敢乱说，那天晚上关起门在心里偷着高兴。到底等到了这一天，全中国不知有多少人那一夜都蒙在被窝里笑呢！你说你离开农村的日子快到了，老毛一死，政局肯定会有变化。

炕有点凉了，秀芹下去给炕洞内添柴，暂停了她的讲述。我点起一根烟，用劲吸了一口，躺在这李宝玉咽气的炕上，回想着他最后的日子。就在毛主席死去的那年，李宝玉丢了他多年的贫协组长，位子叫宽让顶了。这事对老汉打击很大，按他的说法，丢了那位子，一年就要少挣好多开会的工分。接着老毛死了，老汉也到队上设的灵堂为他的大救星守灵，伤心和劳瘁加在一起，等全中国大小单位开完了毛主席的追悼大会，李宝玉就像霜打的叶子，人一下子蔫了下去。

接着又来了更大的打击，队上伐走了我们院内的三棵榆树。按队长的说法，李宝玉的庄基地宽度超过了公社统一规定的两丈，因此多出来的那七尺属于队上所有。院内的三棵榆树正好长在分界线上，所以树也为队上所有。伐树的时候，李宝玉嘴里没说啥，心里却窝了火。三棵树伐走了，地面上留下三个圆树墩和一层湿锯末，树墩墩中心冒出一股子带泡沫的汁液，就像砍了头的三个脖子埋在院子当中。老贫协一气之下关起房门，倒头就在炕上睡了好几天。此后他接二连三地感冒、发烧，引发了他那个气管炎的老病，整整一个冬天，人都是病病歪歪，没精打采。毛主席好像带走了老贫协的魂，他从身体到精神一下子整个地垮了。碰上大晴天太阳出得红，他就出来躺在门外的玉米杆上晒暖暖，一躺就是几个钟头。他耷拉下包着头巾的脑袋，不知道在阳光下想着什么。

他闭口无言，再也没劲乱骂人了。

我和李宝玉虽早已分家，但他那个养父的名分还压在我们头上，只要他人活在那里，村里的人就能抓到找我们岔子的把柄。每当他病倒在炕上，暂时不能自理，本属于我们家内的私事就聚焦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得及时去医疗站请医生给他看病，花钱给他吃药打针，秀芹则茶饭伺候着，一碗一碗端到炕头。村里人的眼睛这时候都盯住我们，今天这个来提醒，明天那个出主意，其实未必都是真心关怀病人，所有的关注都是要插手干涉，多管别人的闲事。李宝玉害了几十年气管炎，从来没进大医院看过病，我们也拿不出钱送他住院治疗。顶汉在饭市上说，李宝玉吐出来的痰里都带了血，他那个肺恐怕早都烂满了窟窿。宽让则说，他顶多能熬过新年，新麦肯定是吃不上了。那年腊月，粉旦她妈过来看望病人，她悄悄提醒秀芹，说我伯人不行了，叫秀芹趁早准备后事。那一年我的工分最少，决分没分到钱。腊月里，我从我妈那儿拿回了几斤炖肉用的大料、花椒，那是过年前专门给居民定量供应的紧缺物资，我妈给我套购了几斤，就是想叫我倒卖了赚点零钱用。一年到头，农民只有过年才大吃一次猪肉，煮肉都习惯用些大料、花椒，但那东西当时在农村很难买到，所以每逢腊月，大料、花椒便特别抢手。秀芹把我从西安拿回的大料、花椒都按一两或半两包成小包，我拿到集镇上卖了几十块钱。就拿这些钱，秀芹又东借西凑了不少布票，买回便宜的黑布和白布，紧赶慢赶缝起了老衣和孝衣。

眼看着这老光棍儿就要咽下最后一口气了，他一死，那庄基地和两间瓦房就自然落到我们的名下。村里有些人心里很不平衡，总觉得就这样轻易让我们继承了那份家业，也太便宜了我们。所以就想生出些是非，趁办丧事之机刁难我们一番。李宝玉一辈子穷得叮当响，哪有什么贵重的遗物，要说能值几个钱的东西，也只有身上穿的一件皮袄和一副常戴的平光眼镜。据他们说，那眼镜是好材料做的镜片，他们叫石头镜子，说是戴上那眼镜清凉去火，能治红眼病。老汉还没咽气，宽让等人就向秀芹打听起那副眼镜。秀芹发觉他们都在打那副眼镜的主意，便趁早进屋收了起来。那眼镜放在板柜上，秀芹说，她拿起眼镜，拧头看了一眼

躺在炕上的病人，只见他嘴里说不出话，眼睛却死盯住她手里的眼镜，盯得她由不得脊背发冷。

李宝玉幸好没在半夜咽气，他死在早饭时分。那是正月初十前后，正在过年期间，队上没活，社员都闲在家里，我家院内和房门口拥满了围观的人群。村民们平日活得太无聊，凡是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男女老少都喜欢去瞎凑热闹。李宝玉光棍一辈子，没儿没女，四队有些人本来就对我继承那一点房地产心怀不满，如今适逢李宝玉咽气，他们自然要来围观，好目击他咽气的过程。他们要看我这个养子在我伯弥留之际表现得如何，那一片好奇心似乎有几分见证的目的，俨然要根据我临场的表现来裁决我能否继承死者的家产。按村里的习俗，死者咽气后，儿女应立即给死者洗头洗脚，然后换上老衣。因此，屋子里外围满了人，都等着看我怎样给我伯洗头洗脚。我伯头上至死都紧裹着羊肚儿手巾，我亲手解下了那脏兮兮的头巾，他那秃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亮在了众人的眼前。那从不见天日的光头皮红不红白不白的，就像刚掉了痂的新伤疤，我用热毛巾擦洗的时候，只觉得再多用点劲擦下去，就会把那薄头皮擦破。洗完了头和脚，我和两个帮手给我伯穿上秀芹赶制的全套老衣，从头到脚，穿戴齐全，算是完成了停尸的仪式。

我的操作赢得了几个老人的称赞，本来黑云压顶般的紧张空气才一风吹散。

死者到底留下了什么东西？这也是凑热闹的村民们急于知道的事情。像李宝玉这样生前吝啬的老光棍儿，如今人已咽了气，前来围观的村民更想亲眼看一看，看能从他屋内的隐蔽处搜出什么值钱的遗物来。以队长银嘴为首的几个人开始在屋里四处搜寻，他们显得蛮有热情，炕角和席下乱翻一气，似乎一心要当众找出什么意想不到的财物。我从八队请四季来帮我主持丧事，他是我的好朋友，人是个出名的冷娃，抹下脸不管谁都敢顶撞。现在他代表我应付各种事务，挡箭牌一样给我撑起了办丧事的场面。四季手快，他一手就从墙上的窑窝内翻出一个小瓦罐，上面堆了些破铺衬，里面有老汉腊月决分的四十来块钱。四季转手把钱交给秀芹，她就是拿上这四十块钱，差帮忙的人出去买烟买酒，支应了丧葬的零星花费。

炕边那个破板柜还上着锁，里面到底有什么，特别引起围观群众的好奇。找不到钥匙，银嘴就叫人把柜子抬到院子撬开。他伸手一件件掏出柜里的东西，先掏出几包棉花，自然交秀芹收存，然后就是破衣服烂铺衬，还有几条新羊肚儿手巾，所有我们不要的东西，当下都让围观的人抢着分了。最后是两包年前买下的水果糖，老汉还没来得及享用，银嘴散给一群孩子，像是在发放美国鬼节的糖果。

我忙着挖墓、借钱买棺材等外面跑的事务，秀芹抱上小稼主持内务，她应付着那些来管我们闲事的头面人物，跟他们温和地讨价还价，谈判条件，到不能让步的地方就坚持下去，绝不让步。反正他们不甘心我们得了这一院房，所以在埋葬的事情上处处刁难，提了不少丧葬上的要求，如建议我们花钱请公社的电影放映队来村里演场电影，让大家热闹热闹等等。明说是为把丧事办得排场一些，其实是想让我们多破费些钱财。村民的心理就是如此，能给别人多制造些麻烦，他们心里才觉得平衡。合理的要求我们都答应了，不合理的，如请吹鼓手等等，秀芹都坚决予以回绝。还有人跑来借钱用，明显是想趁机勒索，秀芹全部顶了回去。她因此激怒了村里的几个刺儿头，在李宝玉下葬之前，他们煽风点火，声势汹汹，一副准备砸摊子闹事的样子。活人总是这样借着处理死人的事来整活人的，真是一群活鬼。我知道这是农村人最厉害的一手，闹到你埋不成人的时候，这才提出条件来逼你接受。为防不测，我从外村叫了五六个打架有名的知青，他们都是平时跟着我转的西安学生，我让他们组成维持秩序的纠察队，手里都拿着棍棒在我家院子出出进进，一律摆出说出手时就出手的阵势，这才稳住了局面，顺利抬埋了李宝玉。

1977 年春天是我和秀芹的春天，老毛召走了老贫协，我们的生活好像打开了沉重的闸门，一河的春水都哗哗地流开了。我当了记工员，连队长、会计的工也得经我的手登记，我的地位自然与往常不同,我们办任何事都顺当起来。首先安了前门和后门，分出前院和后院，

院内种了五六棵树。现在这院子内一切由秀芹当家做主了，她最开心的事就是着手养鸡。

秀芹一直想养鸡，但老汉最仇鸡，他嫌外面的鸡跑到他院子刨土拉屎，见有邻家的鸡窜进来，他立即连赶带打，嘴里还发出一连串咒骂。此外，院子不严实也养不成鸡，鸡白天乱跑会跑丢，晚上敞在院内，有时会被贼偷走。春天装好了前后门，秀芹便养了几十只小鸡。每天，我下地记工去了，她大门一关，一手抱起小稼，一手给小鸡撒米。眼看着一个个小东西的黄绒毛渐渐变白，长出了羽毛，腿长长了，脖子也弯起来了，尾巴尖尖地翘起，公的露出红鸡冠，母的体形上现出好看的曲线。夏天到了，日益长大的小鸡满院子寻食，其中有几个大胆的，有时围住小稼，抢着吃她碗里的面条。那面条，小鸡嘴里噙一头，小稼筷子夹一头，小稼和小鸡撴着面条相持不下，就像在那里拔河。冬里，秀芹的鸡陆续开始下蛋，长到了第二年春天，她终于也像村中的其它妇女一样，拥有了下蛋的鸡群，开始提上一篮子鸡蛋到集市上出售了。

秀芹添完柴回到炕上，我问她还有啥要往下讲，好像要给她的自述做个总结，她接着对我说："农村人有句话，说'女人是个房楦头'。 鞋要靠楦头撑，家要有女人管，家里有了女人，日子才能过红火。你和你伯在瓦房下住了好几年，这院子一直不都是空场子吗？要我说嘛，要不是你把我娶到你新旺村来，谁知道你后来都游荡到哪里去了。你妈和你五姨都说你这婚结得好，结了婚，老婆娃娃拴住了你，你不再往城里乱跑，公安局也不跟踪你调查你了。你要是一直还像以前那样到处乱跑，说不定毛主席死的那一年公安局就把你抓了。"

毛主席死后，虽然紧接着粉碎了"四人帮"，可中央还在坚持继续"批邓"，华主席要按既定方针办事，看不出这社会有什么真正可喜的变化。我心里很失望，觉得空高兴了一场。秀芹她家里依旧粮不够吃，我们在新旺村的日子也不宽裕。她那时还对我瞒着她爸的情况，我只知道她爸一直有病。后来她才对我说，她爸的身体越来越坏，人都在床上病得失了形，村干部还闯到她家，催她爸下地干活。她说她回家看望她爸，见她爸躺在屋外的草堆里，不断往地上吐酸水。见了她，他放声大哭，说他再活不了几天了。她把她爸带到西安大医院做了检查，才知道她爸患的是胃癌，已到晚期，想动手术也动不成了。她爸回银杏沟不久，就病死在家里。

我那时开始听着陕西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学英语，村里人都笑我"绕洋舌头"。秀芹什么都听不懂，也不懂饶这洋舌头有啥用，见我独自在那里呜里呜啦的，她只觉得稀奇古怪很有趣。我一边背诵英语单词，她一边教正学说话的小稼喊"打倒英语！"小稼举起小手，只模糊地喊出了"打倒"俩字，就说不下去了。

四十六 春天来了

自受到公安局追踪调查的惊扰，我已多年没动过英语，当初听"美国之音"广播学过的那一点简单会话，差不多早忘光了。

1978 年元月，我再次开始自学英语，这一次用的是北大西语系为工农兵学员新编的两册《大学基础英语》。书是四队新来的知青超英买的，超英是个乖巧嘴甜的姑娘，她来自西安，颇能随乡入俗，住到四队不久，就很自然地学着村里青年的口吻叫起我"春来哥"了。1977 年冬季，超英参加了大学招生考试，但没考上。后来她问我为啥不考，我说大学我早都上过了，要考就报考研究生。元旦过后，超英从西安带回两册英语课本，说是在钟楼新华书店排了一上午队才买到的，本来她想自学，但因自己没基础，买回来一直学不进去。她说她想叫我先学，等我学好了再帮她学。她还特别提醒我说："你不是想考研究生吗？听说现在研究生入学考试要考英语呢。你需要急用先学，这书就给你用吧。"她那双眼皮的大眼睛一汪善意，看得我埋没已久的学习愿望突然有了萌动。

得到超英这两册课本虽出于偶然，但对婚后老实当了几年农民的我来说，却是个关键的推动力。我翻开那新课本，书页上的字母已变得有些陌生，竭力回忆以前学过的东西，一切都模糊得恍若隔世。结婚三年生了两个娃，不知不觉间，我已习惯了“老婆娃娃热炕头”的生活。我媳妇并不赞赏我读书，也不太懂得爱惜书籍。有一次我走进厨房，忽然发现我的《楚词选》盖在一个小罐子上，揭开一看，里面装了满满一罐辣椒面儿，从中渗出的红油已湮透了一整本书页。原来我媳妇把这本书当罐子盖儿用了。真是无独有偶，今古相通，难怪汉朝的大学者扬雄完成其得意之作《太玄》后，刘歆曾嘲笑他那本晦涩的著作会被人拿去盖酱油坛子。无意之间，我亲眼在自己的生活中看到了一本书不被当书看待时的命运。一次清扫房屋，我从床下找到遗失已久的黑格尔《历史哲学》，封面撕破了，上面粘满了灰絮。掸净了书上的尘土，我才想起事情发生在两年前一个晚上。当时我要读书，我媳妇要睡觉，她关灯，我开灯，两个人一开一关闹下去，结果拉断了拉线开关的绳子，就在我和她激烈冲突的一刻，这本书被她顺手推出了我们的床铺。

性已在夫妇生活中扎了根，我们不知今夕是何夕地消磨着熄灯后的良宵，有太多的夜晚都补了当怨女旷夫时拖欠下的功课。我惊奇地看到，父母的制止，劳改队的改造，一切强制手段都不能迫使我戒除的文字积习，如今居然在平庸的夫妇生活中日渐磨损，消蚀殆尽。真是岁月不饶人，激情易衰老呵！惊恐之余，我产生了强烈的警觉。我担心再这样荒废下去，真有那么一天，学校要召我回去上学，我也许早已丧失学习的兴趣和能力。正是怀着这样的紧迫感，得到那两本新书的当晚，我便决定立即开始努力自学。我又像学生时代那样给自己拟订起作息时间表了，按照我定下的课程进度，我要在秋季开学前学完这两册课本。

说起这课本，熟悉英语的人见了大概都会莫名其妙，真要严格评定其内容，大概只能说它是中国人说给中国人听的英语。为体现外语教学也要为政治服务的指导思想，课本的编者似乎只打算教学生用英语叙述发生在当前中国的事情。课文的标题有“学习雷锋”，“农业学大寨”，还有“批林批孔”，翻遍了两册课本，几乎找不到多少直接从英文原作中节选的文字。教学的目的似乎不是培养学生读懂英文原著，而只是为了让他们将来能把《人民日报》或中共中央的文件翻译成英文。其中有很多英语词汇，英国人或美国人一辈子恐怕都听不到也用不上的。掌握这些当前政治流行用语的英译，唯一的用处只能是应付在中国进行的英语考试，或学成后在中国从事英语教学。好在书中的生词都有国际音标注音，语法讲得很清楚，练习也编得很详尽，不管怎么说，在没有任何人指导的情况下，对我这种低水平的自学者，这教材还是挺顶用的。

1978 年春天的形势明显不同于往昔，停顿十年之久的高考恢复了，“文革”后首届录取的大学生于春季入学，国家开始大抓教育，知识分子的情况正在好转，社会上呈现出百废待兴的局面，我觉得我的机会真正到来了。 农村人认为，给孩子起名字，起得越俗越吉利，“春来” 这俗气的名字也许没有白起，我媳妇是春天娶的，俩孩子都是春天生的，我暗自发问：“今年春天还有啥更大的好事排着队走来呢？”

开春后有过两次教书的机会，也都让我小小兴奋过一阵。一次是高桥公社主管文教的干部召我去公社的教师培训班讲课，叫我给那些中小学教师补习了几次古文。他们之中，不少教师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古文水平之差，实在令我惊异。后来，附近的农中又召我给准备高考的学生辅导功课，我也像其他的民办教师有了办公室，上课之余，可读到最新的报纸和杂志。我满以为暂时可捞个民办教师当当，没想到复课一结束，他们就辞退了我。我离开生产队教书数月，没当成教师，回队后反丢了记工员的美差。我找到公社主管教育的干部，向他提出教书的申请，他含含糊糊，不置可否。显然，我的前科记录依旧是个障碍，高桥公社的干部目前还不敢随便用我。

回到四队，我利用劳动之余的一切时间自学我的英语，甚至在地头休息，都拿出我的单词本朗读，引得其他人莫名其妙地在一边发笑。我自学到八月，学完了整整两册。现在学英

语不比从前，我有了更明确的目标。首先，听说 78 年秋季开学，县办中学一律要开设英语课程。我得乘他们聘不到专业英语教师的机会，争取去教英语。其次，我同时准备报考研究生的课程，就是找不到英语教师的工作，我也要蹚蹚考试的运气，再上一次大学。

让老农们唠叨那些使用农具的规矩去吧，我与他们分道扬镳的日子大概就在眼前了。

果然长安县教育局在招考英语代理教师，我去那里报考应试。填了简单的表格，一位县教研办主管英语的女士接待了我，她用英语问了我几个简单的问题，然后把我携带的《大学基础英语》课本第二册拿过去翻了翻，从中挑出一篇课文，题目是 Hypocritical Confucius，我按她的要求朗读了两段。她对我的应答很满意，当场就决定录用我当代理教师，并明确安排我秋季开学后去樊川中学任教。樊川中学属于县办中学，任用的都是身为国家干部的正式教师，自然非社办的农中可比。那学校背靠如屏的终南山，周围一片稻田，墙外的田埂上柿树粗壮，枝头结满了青柿，比起五席坊，景色显得格外悦目。从九月初开始，我教初中一年级的英语课程。我边学边教那新编的课本，前一天晚上听着教学录音带纠正自己的发音，跟着那上面的示范反复朗读，第二天就在课堂上领着学生读，纠正学生的发音。像个实习的演员，每一次登上讲台前，我都经过了紧张的排练。时代正在解冻，人的思想也在随着解放，十几年来，我受尽了鄙视，如今才开始有了受人器重的感觉。那学校的校长真是个大好人，听了我讲给他的全部经历，他不只敢大胆用我，在那些正式教师的面前，还有意给我制造机会，让我尽量表现我的能力。

代理教师只有很低的工资，而我又是在生产队分粮的社员，按队上的规定，我必须从工资中拿出一大部分现金交给生产队，买我这个全劳在队上应记的工分，剩下的那点钱，都不够我在学校的教师食堂吃饭。我差不多每个周末回新旺村一次，像那些在学校寄宿的农村学生，带一包家里蒸的馒头和青辣椒炒咸菜回到学校，搭配到一日三餐中，好减少伙食上的花费。我拥有了自己的一间小屋，卧室兼办公室，教学之余，便全部用来自学。

除进一步提高英语，我大量阅读报刊文章。这是我命运转折的关键时刻，我必须及时了解时局动态，为争取平反而迅速地行动起来。进入深秋的日子，根据各方面的情况，我估计，平反之事，时机已完全成熟。常言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在中国，躲灾难，你要避开打击的风头，但要抓好事，必须尽快赶上早潮。官府的大门总是神经质地忽开忽闭，过了这个村，就再找不到那个店了。时代曾把我造就成写检讨的能手，现在又把我逼成写申诉的专家，我买来一盒复写纸，夜以继日地制造起发往各处的申诉材料。我给陕西师大校党委和中文系写去了要求平反的材料，也给市公安局、省公安厅和公安部写去了申诉，乃至西安市委，陕西省委，中共中央，还把我从开除学籍到落户农村的遭遇写成一篇很长的报告，寄给了《光明日报》。在 1978 年的秋冬之际，我向各级有关部门连珠炮一样发出了一封封要求平反的信件。我暗自发誓，不获平反，绝不罢休。

反应之快，出乎我的预料。十二月三十日下午，我走进了依然让我感到森严的西安市公安局大门，在接待我的办公室内，一位姓周的干部宣读了对我的平反决定。我得到了一份打印的红头文件，题曰“对康正果问题的平反决定”。这“决定”前一部分简述我的履历，简明扼要，完全是中性口气，不再有任何诬蔑之词。后一部分是复查的决定，现照抄如下：

经复查：认为康正果因爱好文学，向莫斯科大学图书馆写信索要图书，并无歪曲攻击言词，原公安机关军管会以反动分子妄图与敌挂钩，对康正果拘留和劳动教养的处理及定性是错误的，应予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工职，补发工资，并按规定清理销毁材料。

西安市公安局（盖章）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我不再是反动分子了，拿到这一张返回人寰的证明，我还有很多麻烦的手续需要办理。所谓“恢复工职”，是指恢复我在二厂当就业工人的工职，这工职我当然绝对不要。我已在长安县参加了西安市教育局招收英语教师的考试，如果能获录取，我就是正式英语教师了。

而如果我户口在西安市内，我还会分到城里的中学任教。至于“恢复名誉”，这手续得先从恢复城市居民的身份做起，因此平反后我立即把户口从新旺村转到了我母亲那里。1979 年元月，我的户口顺利转回开通巷派出所，前后放逐整十四年，终于获准回原居住地当了居民。可憎的户藉制度，这些年来，我曾陷入多少困境，被迫做过多少艰难的选择，全都源于我被剥夺了在原居住地上户口的权利。现在可好了，我已恢复原姓原名，从今后五席坊四队户口卡片上那个“李春来”便成为空洞的蝉蜕，它只会在新旺村村民的口头上延续下去。

但我妻子和俩孩子仍为农民。办理户口迁移手续时，我要求公安局把他们三人的户口随我一同转回，没想到他们拒绝了我的要求。理由很简单，按公安局办事人员的说法，如果当初我妻子和孩子随我一同迁到农村，公安局有责任将他们一并迁回。但现存的问题乃由我自己造成，与公安局完全无关。也就是说，婚是我到农村后结的，我妻子本来就是农民，她当然只能还是农民。我反驳说，我要是没劳教，也不会去农村落户，自然不会在农村结婚。那办事人员则答复我说，即使我去了农村，也可以不结婚不生儿女呀。他进一步开导我说，城市职工娶农村老婆的人多了，公安局不能因为男方有城市户口便把女方的户口都转入城市，若没有这一严格的限制，成千上万的农村配偶都移居到城市，城里头就人满为患了！至于孩子的户口，他向我指出，按国家的户籍政策，凡未成年的孩子，其户口一律跟随母亲。这就是说，只要我妻子改变不了当农民的身份，我那俩孩子就落地生根，很难脱下农民的皮了。我知道争辩或求情都没用，国家的政策总是一刀切的，非彼即此，黑白分明，不会考虑任何个人的特殊情况。我一半轻松，一半沉重地走出公安局大门，向着门楣上那庄严的国徽，我回过头瞪了一眼。至此我才看出，这反平得并不彻底，户口后遗症将会带来很多难以预料的麻烦。在我康正果的背后，“李春来”依然拖着个人历史的阴影，把我现在的生活分裂在新旺村的农家院内。

所谓“补发工资”，是按我当初在二厂三十块钱的月薪计算，自拘留我之日起，到我去樊川中学当代理教师止，共计补发我十年工资。但要拿到这笔巨款尚需经过相当麻烦的加减法运算。办事人员告诉我，得从十年工资的总数中减去我拘留劳教期间的伙食、服装等花费，再减去我这些年在生产队的劳动所得，剩下的数字才是我应得的“补发工资”。我在监狱和劳改队三年花了国家多少钱，我不知道，按照公安局的计算规则，我坐牢和劳教的三年既然每月都有工资，自然应从中扣除我在那里的伙食花费。至于我在生产队的所得，得让大队出示证明，把那笔账转到公安局，由他们计算。我至今还保留了五席坊大队开出的一张证明，上面详列了我从 1972 年到 1976 年所挣的劳动日，特列表转录如下：

年份	劳动日	日值	折合现金
1972	171.3	0.75 元	128.48 元
1973	272.2	0.75 元	204.15 元
1974	214.1	0.75 元	160.58 元
1975	270.1	0.63 元	170.16 元
1976	334.1	0.75 元	250.58 元
总计			913.95 元

五年在人的一生中不可谓短，看一看我一个身强力壮的大小伙子，起早贪黑干着牛马活，总共收入有多少？仅九百一十三元九毛五分钱有奇。平均年收入为一百八十二元六毛一分钱，折合成月薪，才十五元二毛二分钱。四队还算一个中等偏上的队，若在我媳妇那穷山沟里，把我这些劳动日折合成人民币，我劳动五年，总共只有二百多块钱。这就是我必须脱离农村，绝不甘心一辈子当农民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时也是粉旦、竹引等可爱的女子都不愿意跟我结婚的现实原因，更是那么多农村女子都想找个工人嫁过去的唯一原因。户口在中国制造了两种身份，两大阶层，户口制度把生活在中国的大多数人口压制在绝对贫困线之下，排除在国家的任何社会福利之外。学生下乡和干部下放的事实再清楚不过地说明，政府一直都把农村

地区当作处理城市剩余人口的废料场和排污站，我在农村的整个经历就是一个社会渣滓所受的废弃排污处理。

1979 年春天，我的生活呈现出一路亮起绿灯的景象，每一个月发生的事情都把我推向新的高度。元月，我户口迁回城市。三月，建安建材厂给我补发了一千九百元工资。四月，西安市教育局录取我为国家正式英语教师。同月，陕西师大党委经复查，对我宣布平反。他们撤销了对我的开除学籍处分，承认收缴我个人日记的做法有错，也纠正了所谓的“散布反动言论”罪。鉴于我在师大已学习一年半，还给我补了个大专毕业的学历。五月，我转到西安市九十一中任教，樊川中学还想挽留我，但我已接受调令。我急于重建我在城市的生活，县办中学当然留不住我了。

我知道我这英语教师的工作只是我复出过程的一个跳板，我毕竟不是英语专业出身，现在人才奇缺，还可以暂时补缺，等将来受过专业训练的师资不断充实进来，我这种半路出家的势必沦为滥竽充数的一员。我得回到我的本行，正好研究生招生开始，我立即报考古典文学专业。六月就得赴考场应试，时间太紧迫，我仅在古文诗词方面有中学时自学所打的基础，便仓促选了主攻唐宋文学的方向。人生能得几回搏呵，卸掉了压在头上的“反动”帽子，也该在时局允许的范围内快意博取今日的功名了。八月，我接到陕西师大中文系的录取通知。十几年来，做了多少次重返校园，再进课堂的好梦，多少次梦醒后戚然枕上，现在总算圆了那个痴梦。

我痛哭的时候是独自哭的，现在我笑了，周围的人都跟我一起笑了起来。那时政治高压下的中国人还保留着感情上淳朴的一面，只因人人头脑里都被灌输了太多的政治用语，连表达真诚的祝贺，也只会用空泛的社论体说话。九十一中有两位年轻教师，一个叫许美玲，一个叫朱亚利，都和我住同一排教师宿舍，放了学我们三个常一起打羽毛球，在那个新环境中，就她俩和我关系密切。现在我平反了，又接着考中了研究生，在她们那少女的单纯眼睛中，我过去那些苦难和耻辱全都闪现出传奇般感人的光彩。临别时，两位女士赠我美术日记本一册，一如我父亲送我的那本日记崭新而厚重，其中也有不少彩图插页。在日记的扉页上，她们情深意长，写了几行赠语，虽谈不上什么文采，我还是愿意录在这里，一存那个朴素年代人们的单纯，二存七十年代末中国人在友谊表达上流行的文风：

闻知半生坎坷，
赞叹精神胜天。
相逢短暂而惜别，
友谊难忘怀。
山路崎岖陡峭，
还需努力登攀。
衷心祝福帆顺风，
知识献祖国。

哥德《浮士德》结尾曰：“永恒女性自如常，/引接我们向上。”感谢两位女士的引接，正是得了她们所送的新日记本，我又鼓起了重新记日记的勇气。就在重返师大校园的那一天，我在新日记的第一页上写下了这些话：

十五年过去了，我整整沉默了十五年，我不敢说，不敢写，甚至不敢想，十五年怀着一颗瘖哑的心。现在，我要从余悸中摆脱出来，我相信中国再也不应该，而且中国人民也不允许那样的恐怖重演，连一个人写日记都要受到干涉……如果有一天，那恐怖像瘟疫一样卷土重来，我绝不会像十五年前那样胆怯地焚毁我的日记，我要到法庭上宣读我的日记，公布我的思想，辩护我的立场。所以，从今天起，我要恢复我记日记的习惯，开始认真书写我的思考的档案。

现在把这一段写于二十多年前的日记抄在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我那时依然书生气十

足。我不但过于乐观估计了中国的形势，也未免过高期许了自己政治上对抗的勇气。我和当时很多平反归来的知识分子一样充满了新生的自豪，自以为做了 “时代的英雄”，从此可以扬眉吐气了。其实情况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后来才慢慢看出，一切都不是那回事。怪不得我平反后，几个中学的同学前来道贺，见了面都说我变化不大，说看不出我吸取了什么教训。我和其中一个已当了解放军军官的同学还抬了杠，两个人喝着酒争辩得脸红脖子粗，最后竟不欢而散。临走时，他对在座的几个人说："我说的话要是都不信，咱们就等着瞧吧，康正果根本没有改造好，他还会犯错误的！"

临去师大报到，九十一中的人事干部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交给我公文袋一个，袋子的封口处贴了张加盖公章的封条。她对我说，里面装着我的人事档案材料。我把档案袋拿在手里，发觉它薄得几乎只有两张皮，显然，过去的黑材料全都在平反后销毁了。我想起辅导员在街巷派出所把我移交给户藉员的时候，还想起五处的两个干警押送我去何家祠堂的时候，那两次我都一瞥过我的档案袋，都是厚厚一包拿在他们手中，咒符一样镇压着我的政治命脉。我曾在好多次痛苦的想象中计算过其中所积压的检讨书，猜测过塞进去的揭发材料，也曾在好多次白日梦中，幻想过那些东西失火焚毁或不翼而飞。现在可好了，现在这档案袋像灌过肠的肚子泻尽了污秽，现在只有几份平反的文件和我自己填写的干部履历表干干净净地封存其中。我轻快地拿起它，心里感到无比轻松。

这人事干部要让我顺便带走我的档案，到师大好亲自交到人事处去。她说这样更方便，省得她再跑邮局。告别时她对我说："康正果同志，组织信任你。祝你顺利！再见！"

我带上那又轻又薄的档案袋，还有户口和粮油关系，告别了许美玲和朱亚利等同事，翻身跨上自行车，就往陕西师范大学办理我入学的手续去了。

四十七 还乡难

我的故事本该在重返陕西师大后便告终结。我户口已迁回城市，终于摆脱了体力劳动，从此读书写文章成为我的专业，只要努力做好我喜欢做的学问，等着我的肯定是稳定的教授职位。多年之前，我在寂园苦读古书，随后入师大学文学，在整个的学生时代，我孜孜以求的不就是这样的机会和业务吗？我反动过什么？只不过一心要做学问，讨厌参加政治活动罢了。重返师大，选择研究唐诗宋词的方向，也是想远离政治，书斋中好平安地过我未来的岁月。过去的十几年，苦是吃够了，辱也受尽了，所得到的最大教训就是不想跟公安局再打交道。我确实想从此终结我的故事，有很多与我遭遇类似的熟人都在平反后终结了他们的故事，比如李稚敏、赵壹和徐师选都得到了满意的结果。

李稚敏平反后回原来的学校工作，当了科室干部。二厂的就业工人生涯还真的把他改造"好"了。他在幸存中成熟起来，掌握了向上爬的权术，返校后感谢党给了他第二次生命，后来竟光荣宣誓入了党，获得提拔，大概已升任到处级。

赵壹在我结婚后突然被捕，差一点因恶毒攻击中央文革罪判了死刑。幸亏他案发不久，伟大领袖便一命呜呼，紧接着"四人帮"垮台，赵壹获释出狱，翻云覆雨之际，他荣膺了坚持真理的称号。他随即恢复党籍，享受到高干待遇，全家搬入专为离休高干建造的住宅，和很多省委的老干部做了邻居。我去看他时，惊讶地发现，他议论时事的论调明显地左倾起来。他变得保守了，开始指责各方面出现的西化倾向，批判起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对我当时的耽读西方批评理论书籍流露出并不懂行的挑剔。我悲哀地感到，随着毛时代的结束，我与赵壹再也没有多少共同语言可言，此后我就再没见到他。他身体一向很差，平反后又多次病危住院，想必已板着那始终不渝的信徒面孔见他的马克思去了。

徐师的旧案也得到了甄别，他从一个无业游民突然成为解放军离休干部，全家住进了干

休所。有一次他来找我聊天，还颇感宠幸地对我说，他出进干休所都有专车接送，一副鸟枪换成炮的得意模样。他成了感恩戴德的小人，据他说，他在他家的客厅里专设邓小平挂像，供奉神像一样朝夕致敬，感谢那个伟人的好政策赐予了他幸福的晚年。他还想对我施加影响，向我灌输颂圣的思想感情，说要不是邓小平的政策给我平了反，我现在还在新旺村种地呢。我不同意他的说法，我说我根本就没有犯错误，要不是他们给我制造了“反动”的罪名，我在大学都教了好多年的书了，哪会落户到农村？捆了人家好多年才给松绑，又有何感谢可言！徐师让我说得很没趣，接着我便以唾弃的心情将他打发出门，此后再也没和他来往。

本来，我也可以走类似李稚敏、赵壹和徐师的那样的路，在平反后老实当我的教授，厚着挨过耳光的脸，喜滋滋接受党恩浩荡的抚摸，努力在纯学术上做出应有的建树。如果是那样，我的故事早已以喜剧收场。

无奈树欲静而风不止，性格也许就是命运，入师大读研究生班之后，我的生活没安宁多久，又因言论和文字不轨而招致了羞辱。清除“精神污染”的寒流第一次袭来，我便首当其冲，犯了“错误”。硕士学位没能顺利拿到手，我再次灰溜溜走出了师大校门，坎坷了几年，后来才在一所工科大学找了个教语文课的教职。在那个大学，我参加了“六四”抗议活动，事后让公安局审查了半年。1994 年，我带上妻子儿女逃难一样移居到美国，从此把公安局的威胁丢在了大洋那边，一个困扰我多年的恶梦才齐茬断掉。在一篇题为《死睡》的文章中我曾这样写道：

我在“文革”中曾因“思想反动”有过几年牢狱之灾，其后虽脱离了那样的环境，但由于余悸一直在怀，多少年都在反复做一个把我惊醒的恶梦。我总是梦见自己又因同样的罪名落了“二进宫”的下场，高墙森然在目，环堵处处如昔，我像笼中鸟一样转来转去，在计算刑期的焦虑中悚然而醒。只是在我走出国门之后，这个不知困扰了我多少次的恶梦才连根断掉，再也没有在大洋另一边的睡眠中出现。

此文写于 1997 年，可惜梦并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那时候我还不知自己这轻松的高兴还为时过早。在美国继续平安过了三年，直到 2000 年 5 月 10 日。那一天我从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飞往上海，飞机起飞前，因故取消了当日的航班，我们一行人由大巴送到旅馆过夜。走进我的单人房间，拉严大玻璃窗上的窗帘，封闭中立刻切割下一屋旅途的安谧。踏上中国大陆的日期推迟了一日，躺在美国旅馆的床上，我思绪起伏，心潮翻滚。就在这踏进中国海关的前夜，旧日的恶梦又袭入我的睡眠。它来得毫无预兆，像撞向双子座大厦的飞机一样眼睁睁满载着恐怖。来美已有五六年之久，我以为万里海空永断了它的来路，往后可以高枕无忧做我的美国梦了。不知因何恶缘，它今宵又找到了我的头上。躺在半夜的寂静中。我胡思乱想，只觉得往事的浊水一时间沉渣泛起，像是有千百条出壳的小蛇蠕动着溜进了我的被窝。

首先想到那个来自西安的坏消息。西安有个朋友,听说最近受到国安局一次盘问。他说他是突然让单位领导叫到办公室去的，一进门就见三个陌生人事先等在那里。他们自称是国家安全局的工作人员，说话的口气很严肃，劈头便提出了我的姓名。他们说康正果这个人很反动，叫他来谈话，就是要向他了解我的近况。于是问他，我都给他寄过什么，最近和他都有些什么交往等等。他说他从开始即有所警觉，故对所有的问话全部一推六二五，没给他们往下追问留下任何话茬儿，因此问到底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来。但他们并不甘罢休，临走还留下尾巴，说是还会找他询问，甚至会约他在外面见面，而且给了他电话号码，要他一有什么有关我的新情况，即刻向他们汇报。他说他当即拒绝了他们的要求，那场盘问就此不欢而散。

那西安的朋友并没直接向我通报此事，消息是我行前给惠州的一位友人打电话时听说的。友人名叫萧宪，和我在西安交通大学一起参加过“六四”运动，我打算这次回国去惠州拜访他一次，连带会见另一位也介入过那场运动的章艺。我们打的是越洋电话，没时间对此事作

详细分析，萧宪仅按他自己的推测给我简单作了点解释。他说每年“六四”前夕，当局都会都有一阵神经紧张，我那年受到审查的事肯定还记录在案，故即使人已出国，仍属监控对象。想必最近他们从哪儿听说我暑期要回西安，于是就闻风而动，搞起了捕风捉影的调查。他认为这也许只是一种例行公事，叫我不必过分恐惧。

我忍不住把此事讲给妻子，她对我说：“你不必疑东疑西了，我看都是你自己到处声张你要回西安引起的麻烦。我早就给你说过，西安的人事很复杂，你那伙朋友也是鱼龙混杂，要回去，悄悄回去好了，你偏不听我的话，好像你回家探亲是白宫的哪个议员去做国事访问，人还没到西安，早让你叫得成了你西安朋友口中的头条新闻。”妻子本来就不放心我回国，萧宪透露的消息听得她越发担忧起来。现在她正好抓到劝阻的理由，趁势就劝我马上打电话取消西北航空公司的航班。为打消我回国的兴致，她还大谈她向来奉行的度假哲学，说是什么一动不如一静呀，大热天出门活受罪，还是凉凉快快待在自己家最享福等等。等到无论如何说不动我，她最后便提起我们本地中国教会的张老头，拿他的一贯表现给我做榜样。她对我说：“你要是真想常回中国走动，就该把嘴巴闭紧，别在这里乱骂共产党。你要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和笔，非骂共产党不可，就干脆学人家张老头的样子。人家张老头有九十多岁的老母亲留在国内，来美十几年都硬撑住一次也没回去。人家张老头就是为了理直气壮到处演讲、发文章，把自己要说的话公开往出说，打一开始便豁出来断掉回家那条路。人家张老头才真叫有志气，人家就自甘寂寞，一门心思反共，不想搞你们这伙热心回国度假的文人男男女女，吃喝玩乐，三朋四友，高谈阔论那一套。人家张老头……”妻子越说越来劲，好像我这次回国是要背她去干什么坏事，闯什么大祸似的，在我即将动身之刻，她一定要把我说得回心转意，放弃此行，甚至还要说得我从此横下一条心，确实就学人家张老头的样子，今辈子再不打算去叩中国的大门。

我这次回国，首先要去南京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会后顺便回西安看望母亲，再与弟妹们办理祖父母和父亲的迁葬事务。祖父母和父亲的骨灰盒原先存放在三兆公墓，李宝玉葬后，我在四队拥有了一小块墓地，后来和弟妹们经过商议，便把祖父母和父亲的骨灰盒埋在李宝玉坟旁，几个人摊钱在坟头立起墓碑，算是暂时给先人的亡灵找了个入土为安之地。从此逢清明和阴历十月初一，就由我和秀芹负责扫墓烧纸。自移居美国以来，听说国内的丧葬服务有了很大的改观，有些村庄办起收费昂贵的墓园，城里人只要花钱，即可在园内买到一方埋骨灰盒的墓地。弟妹们因嫌去新旺村上坟不方便，已在一处环境优美的墓园给祖父母和父亲买好永久性墓地，专等我回来迁葬。

至于去南京参加学术会议，为的只是了却我一个渺小的学术心愿。想当年，我们那批研究生在陕西师大乃首届招收，头生儿子般宝贵，毕业之后，学古典文学的都分到综合大学的中文系当了教授。唯独我档案内新塞入坏鉴定，走出校门后，申请过几个大学中文系的工作，但人家都不敢贸然聘我。最后我只得去了无人愿去的西安广播电视大学。在那里当了几年辅导教师，1984 年冬调到西安交大社会科学系任教，为工科大学生开些文学欣赏的选修课程。大学的教职是混到了手，但只是个语文教师，从此就与古典文学的学术圈绝了缘。自 1982 年研究生毕业，转眼快二十年过去了，我好坏也出过几本学术著作，但在中国大陆，我至今还没参加过任何古典文学的学术会议。在我心里，这一直都是个学术经历上的缺憾。

就我现在的工作而言，其实并无必要怀抱这一缺憾。我在给美国的大学生教中文，只要教会他们说好普通话，能认字写字，就算尽了本职。对我们语言教师，校方并不要求终身教授那样的学术成果，我自然不必像教授们那样太看重参加学术会议的事情。我周围有不少当语言教师的同事，他们敬业而满足现状，教完了简单的中文课，都潇洒自在地过自己的日子，很少有人在意和国内的大学搞学术交流。我本可以也按照他们的方式享受生活，多花些精力营建自己的“美国梦”巢。无奈那文字积习依然如昔，总还是想利用语言教学之余，在文学研究上做出点成绩。自接到南京方面的邀请，我便精心准备起大会论文，对那个我并不是不

知其底细的学术会议“小世界”，我竟满怀起抛头露面的冲动，很想厕身其间，去凑一番热闹。

飞机追过太阳，飞到了云层之上，上面蓝天如盖，四围一片光辉，听空姐说，我们将在虹桥机场降落。我从漫天的遐想中转向即将踏上的土地，再次想到我带给几位友人的一大包书刊，特别是带给茆致谊的书刊。那包内本来放了几本茆致谊最爱读的《北京之春》，临行前，我妻子对我包中的印刷品做了慎重的检查，见《北京之春》这样的违禁刊物赫然在内，她立即抓在手中，死活都不准我带走。

茆致谊是我从前的患难之交，这老兄在公安局手里吃尽了苦头，也是在后来政府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时候，几经申诉，多次上访，才算争取到一个国家干部的工作安排。如今他退休在家无事，也算是一个终结了故事的人物。

当初只因想去香港，连深圳的边还没沾上，茆致谊就被公安局以偷渡国境罪抓获，从此倒霉几十年，可叹直到今日，他仍未迈出国门一步。自得知我在美国的大学教书以来，他就把我视同他在境外的文化代办，常向我索取信息，不断给我写信倾诉他对国内现实的种种不满。他邮来的每一封信拿起来都沉甸甸的，信封背后贴满了花花绿绿的纪念邮票，封口一律糊得十分严实，那金属焊接般的牢固让人觉得，他封信时一心要做到让任何人也休想轻易偷拆开他的信封。每一次接到老兄的来信，我都用小刀沿信封边缘缓慢裁开，以免撕坏信封或扯破封内的信纸。我这个人易动感情而好发痴想，拆信时端详着老兄在封口和贴邮票上那工艺般的仔细，便不由得为他缜密封存在纸上的友情感到一阵心热。所以他来信提出的要求我总是尽力照办。他不过想读些国内看不到的书刊，好奇心强，渴求了解真相而已，任何一个有头脑有想法的中国人都可能产生类似茆致谊的想法。我生活在自由世界，现在既然有诸多方便，便有责任满足朋友求知的要求。所以我手头一有合适的读物，不管是零星的剪报或整本的杂志，都随时给他航空寄去。我是从那竹帘子后面出来的人，有时目睹他那精心防范的信封封口，想到他与我通信所冒的风险，悲叹之情便油然而生。可以想象，在茆致谊把一封封发往美国的信件投入邮箱的那一刻，他肯定有过恐惧、警惕和犹豫。他担心他的信中途被公安局拆检，因此就在封口上多涂些胶水，再压得更严实一些，好增强抗拆的作用。然而如今的检查技术已高度发达了，有时我又担心，茆致谊如此良苦的用心会不会聪明反被聪明误呢？如果公安局利用了某种高新技术，他们也许根本无需拆开那些要检查的信件，仅藉助特殊的光照，即可把信中的内容看得一清二楚。事情若果真是如此，我这位老兄的信封就是糊得再牢固，其结果也不过给自己宽个心罢了。

我能理解妻子的担忧，在她的阻挠下，最后放弃了茆致谊喜欢的《北京之春》。我给他带回了哈维尔的《狱中书简》，因为他来信特别强调要读最“反动”的书籍，我更把自己收藏的小说《红鲨》也放进了提包。此书是作者无名氏在台北请我喝茶时亲手赠我的，在我的藏书中，我再挑不出更“反动”的读物，便想到将这本书割爱给他。我是过来人，最理解求知者渴求了解真相的心情，所以自来到美国，一直热心邮寄书刊给国内亲友，并把这样的行动视为传播自由呼声的使命。从美国发出的国际航空邮件是比较昂贵的，尽管妻子对我的破费有过多次的干涉，我一直都在背着她继续寄我该寄的东西。

机窗外的天空正在暗下来，机翼下现出了初亮的灯火，上海就在脚下。即将着陆的飞机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在轮子快挨住跑道的一刹那，整个的机身都发出了人体一样的颤抖。终于着陆了，走进机场大厅，我长长松了一口气。然后向入境检查窗口走去，这时，我心里再度紧张起来。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先镇静一下自己，站在队列中，心里已做好被拒绝入境或被叫到一边盘查的准备。这几年海外报纸上看过不少报导，据说很多异议人士都是在入境检查处吃了闭门羹的。此刻，我就站在那厄运的边缘上，吉凶未卜。

然而什么事都没发生，只是片刻的例行公事，证件很快从窗口退了出来。我顺利进入了中国。当我坐上出租车，穿越在夜上海的大道上，我又可惜起那些放弃在家中的《北京之春》，

要是我拒不向妻子让步，现在还能给朋友们多带些读物进来呢。

四十八 学院小世界

这次南京会议的议题是“明清文学与性别”，会议组织人洪升教授和他的同事做了精心准备，我从上海乘火车抵达南京，当晚就住进了他们预先包好房间的状元楼酒店。那是个五星级酒店，在康州的纽黑文小城过了六年平静单调的日子，如今突然置身如此豪华的场合，我处处都有些乡下人进城的感觉。这几年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一切消费水涨船高，这次会议的安排，从住房到膳食，到会场的布置，比起我在美国见到的同类场合，各方面都显得更有档次，更讲排场。真是进入了全球化的年代，这里处处都在力求和国际接轨，中国人似乎要把事情做得比他们洋人更显得洋气，有时候洋气得都让人觉得有些过头。

除了殷勤好客，东道主还特别向与会者强调了选择这个会址的用意，穆教授在他很有文采的开幕式致辞中对此专门做了解释。他的讲话把官腔和学问揉和得圆融周到，十分得体地显示了新的政治经济形势下学术带头人雍容的自负。这位被洪升教授尊称为大师兄的穆教授爱发思古幽情，言谈间常流露出抑制不住的地方自豪感，会上和会下，他多次提醒我们说，现在是在秦淮河畔开会，是在曾有过六朝繁华和明清文人才女留下无数佳话的地方讨论那时候的诗文。对河那边的假古董建筑媚香楼，穆教授尤为一往情深，好像成心要替那场所做广告似的，他一再建议我们几个远道客应去那处香艳遗址一游。

那天晚上，洪升教授就在秦淮河边临水的楼阁上招待我们吃了苏州小吃，通过消费服务，现场地辅导我们这群咬文嚼字的食客进入明清诗文的感性世界。饭后，我受几个朋友之邀，上了一条游船。那河水其实并不洁净，黑夜衬托出灯光的柔和，灯光装饰了水面。河两岸从前的旧屋全部拆除，盖起了清一色的仿古建筑，屋檐屋脊上都装饰起霓虹灯，各种招牌和广告闪烁多彩，临河的歌舞厅不时有乐声传出，制造了今日特有的“桨声灯影”效果。只可惜河面上并无轻柔的桨声。人家威尼斯人还懂得绝对保留他们的贡多拉，南京的生意经却一律开出机动船来拉游客，聒噪的马达声完全粉碎了朱自清曾雕琢营造的诗意。在灯光的涂抹下，这一场怀旧之游很像在舞台上进行，游客的花费只买到了进入布景的感觉。特别杀风景的是船头的米老鼠和唐老鸭装饰，这设计要多俗气有多俗气，要多拙劣有多拙劣。今日中国的假古董制造商就是这样无根、浮躁和想象力干瘪，连复制前朝文采风流的旅游工程，都要不伦不类地掺入此类洋调味。我因此不想再多看南京的其它古迹，在大力开发旅游业的旗号下，真不知道多少重修的古迹都搞成了这种伪古典加后现代的文化拼盘。

会议闭幕后，东道主举行了隆重的告别宴会。席间，几个年轻学者不满地提起了陕西师大中文系的霍教授，他们称他为当今西北的学霸，都一致指责他在学术上搞金日成式的世袭独裁。我不明白他们所谓的“世袭独裁”是什么意思，经我一问，几个喝上了劲的学者七嘴八舌，纷纷议论起霍教授的学术丑闻。

霍教授就是我读硕士学位时的指导教师，老先生文革中也算是挨过整的人物，没想到他后来名利双收了，手里有了权，竟也干起了打击同事，迫害学生的事情。听他们席间议论说，霍教授已近八十高龄，一直赖在博导的位子上不想退休，这些年来，在系上排除了几个异己，又逼走了好多优秀学生，终于在最近，把他在师大中文系的博导位子硬传给了他那个庸才儿子。那几个年轻学者越说越激动，酒力也增强了他们的义愤，于是他们当众发出倡议，说是要大量收集霍教授的学术腐败行为，写成文章在网上公布出来。我是从美国回来的，对我感兴趣的人多是从我口中打听些赴美访问的有关信息，没有多少人了解我的过去，我已出版的书籍和文章，留心读过的人似乎也不很多。我落寞地坐在一边听他们谈论他们学术“小世界”内传播的是是非非，愈益生出隔行如隔山的隔膜。酒精也在我身上起了作用，听着他们声讨

霍教授，我晕晕乎乎，回想起二十年前师生间那段很难说清的恩怨。

之所以跟霍教授学唐宋文学，首先是因为我一心想回师大读书，当时我就是非争这一口气不可。尽管亲友们多劝我再不要返回师大那个是非之地，但我想体会“前度刘郎今又来”的得意，硬是要在曾经跌倒的地方再站起来。这决定也与妻子儿女的户口尚在乡下有关，我得抽空回家帮妻子种我家的责任田，报考外地学校是不可能的，而要留在西安上学，除了师大，也没有太多的选择。系上主管党政工作的还是原来的干部，虽说我已获平反，但把我这样有争议的人物再招回来，他们心理上还不太容易接受。无奈当时的政策特重择优录取，我分数考够了，霍教授热心要收我，系领导也不好横加干涉。我那年三十五岁，已到了报考研究生最大的年龄，多亏霍教授一次就收了五个学生，我才争取到最后一次读书深造的机会。

我是带着对霍教授的感激之情走进师大校门的，不久在图书馆的书库中见到他一本六十年代出版的评论集，翻阅之际，才看穿了他这个人的学术根底。原来他发迹于棍子文章，当过打手文人！那书中收录了他历次运动所写的批判文章，从批胡风、丁玲，到批朱光潜的美学思想以及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几乎毛泽东在五、六十年代发动的每一次整知识分子运动，他都紧跟步伐，摇旗呐喊，抛出了大量的应时之作。怪不得文革之前，在原任校长的手下，霍教授曾一度那么吃香，而这一点也正成为后来文革中他叫系上的造反派整得很惨的重要原因。由此也突现了霍教授文革挨整与大多数教师受迫害在性质上的区别：整他不是因他一直很黑，而是因他过去太红，是扶植他的后台垮了台，随后才殃及他的。后来随着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逐步落实，霍教授在中文系全面得势，二十多年来，他在校内和学术界给自己攫取了太多的好处，也积下很大的民愤。酒席上就有个年轻学者发言说：“我看要是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中文系的师生非把他这个既得利益者斗死不可。”

至于霍教授的学术成就，要说有成就，也只能说是在普及古典文学上有些作为。比如在尝试把古诗译成新诗方面，就很少有人像郝教授那样精心炮制，译出了创作般生动的诗句。他还做过几本“诗话”的标点整理工作，挖掘出一个名叫叶燮的清代诗论家。此外，能把过量掺水的解释讲得趣味盎然，也算霍教授当行的本领，再加上他文笔通俗活泼，肯在表层的改写上下功夫，因而特别擅长为热爱古典文学的普通读者写些鉴赏性的短文。后来诗词鉴赏词典风行一时，霍教授的雕虫小技正好派上了用场，就是通过参与此类词典的编写工作，再搞了些诗词鉴赏的讨论会，他逐步在学术界和出版界经营起他的势力圈和关系网。这花哨的浅薄从此铸成了他的学术命运，久而久之，深入洞察的探索之于他，遂如五颜六色之于色盲一样彻底绝了缘。就因为这一切，真正称得上学术专著的书，霍教授至今还没写出过一本。

老先生最让我们学生倒胃口的就是那一身俗气。当时他刚升任正教授，一次要去北京参加全国文代会，他要派一个学生给他买票，当着我们几个同学的面，他自夸他已享有正教授级别的待遇，说按国家规定，往后出差就可乘软席卧铺了。而另一位他视为敌人的副教授，他对我们强调说，副教授的待遇只能乘硬席卧铺。他就是这样一个稍有得意便喜形于色的人。看见霍教授沾沾自喜的那样子，我当下就满腹反感。类似的耳濡目染还有很多，全都猥琐得不值得在此多写。自从给霍教授当了学生，我越来越警觉到，课内外可能沾染到的不良学风远多于所受的教益。假若我当初没抵制住他的影响，假若我亦步亦趋跟他这种学者出了道，稳坐上平庸的教授位置，我大概也会与他那几个得意门生一样复制平庸，至今都不知误导了人家的多少子弟！现在看来，当年被他一脚踢出师门，应属不幸中的万幸了。霍教授还热衷在学生中培养师徒间效忠的关系，他有个得意门生，曾多次肉麻地给我灌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陈腐观念。而他那个多嘴的太太，更喜欢私下为她老头子网罗羽翼，得空便对我们几个学生进行师门路线斗争的教育，活像父母给子女诉说家仇。针对那几位文革时斗过霍教授的教师，特别是一个打过霍教授耳光的文艺理论教师，她便一再向我们灌输仇视和敌意。

1981 年秋季，我们五个学生都完成了各自的学位论文，一俟答辩通过，便获硕士学位。我的论文专题研究晚唐诗人韩偓的生平和诗作，其中重点讨论了他的《香奁集》以及与“艳

情诗”有关的问题。选这个题目之前，我和霍教授作过简单的讨论，对“艳情诗”的提法，他似乎兴趣不大，言谈间明显有回避之意。我能理解霍教授的禁忌，我知道当时的文学研究仍存在不少禁区，他既然不想与我谈论这种有色情嫌疑的话题，我只有独自做我感兴趣的研究。从霍教授那里我没得到任何积极的建议，后来就按我自己的构想写成了那篇导师不太喜欢的论文。霍教授对我既没有鼓励，也未作制止，对于我那个未听他奉劝的选题，他似乎持“子姑待之”的态度，颇像郑庄公对他弟弟按兵不动的策略，忍让的老谋中多少包藏了模糊的祸心。

答辩的那一天，系办公室按各人所论作家的生年排列了我们五个答辩者出席的顺序，韩偓出生最晚，因此把我排到了最后。那天早上，答辩还没开始，一个与我关系很好的本科生慌忙来宿舍找我，他不安地对我说，他刚才有事去系办公室，正巧看见系办公室的石主任在排列答辩名次，对着写有我姓名的硬纸板，那女人恶狠狠诅咒道：“康正果，这一次叫你娃成不了‘正果’！”他说他觉得石主任的口气明显地不怀好意，叮咛我去答辩时千万要谨慎小心，以防系上有人给我制造意外的麻烦。我对他的提醒也没过多在意，满以为现在提倡学术自由，我只要充分做好准备，总有我登场阐发自己观点的机会。第一天等过去了，第二天还不见动静，已经等过了该我出席的时间，始终没等到传令。我发现已通过答辩的四个同学都闭口不提我答辩的事情，就像医生和亲人都向被检查出患癌的病人隐瞒实情一样，他们全体守口如瓶，都对我躲躲闪闪。直到听说答辩已告结束，我再也受不了这一场哑剧的折磨，我才找到霍教授他家，去当面问他个究竟。

霍教授以无奈的口气向我宣布了答辩委员会不接受我那篇论文参加答辩的决定，理由是我的文章有倾向性错误。他递给我一张纸让我看，那是答辩委员会取消我答辩资格的决定，上面罗列了我这篇论文的具体罪状。这决定，我后来托人搞到一份复印件，至今还保存在手中。现将其中几条武断的指责摘抄如下：

论文……所反映的思想倾向也是不健康的。为了肯定《香奁集》为韩偓所作，过多地否定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主观主义地写韩偓与爱情诗的暧昧态度，肯定〈香奁集序〉提倡艳情的意义，乱讲艳情诗的特征。对作品的分析，全是对艳情诗的欣赏，有的宣扬色情（如该文的 57 页，59 页）；有的宣扬人性论（如 64 页）。文章中甚至有这样的专题:“独宿与失眠：性的苦闷”，有的还大肆宣扬性欲（如 70 页），宣扬所谓“意淫”（71 页，86 页），肯定色情诗（80 页），肯定艳情诗的合理，说什么“正当要求在士大夫身上的不正当表现”等等。

……鉴于上述情况，答辩委员会不接受其论文答辩。

唐宋文学研究生答辩委员会

一九八一年九月九日

面对这些大帽子和大字报用语，我能同霍教授争辩什么？粉碎了“四人帮”，在中国仅赢得了极其有限的言论自由，对于这一明显的事实，直到我碰了眼前这个钉子，才开始有了真切的体察。原来我们的学术研究尚设有这么多禁区！想起我在新日记首页上写的那些话，显然是把形势估计得太天真，太乐观了。凡是不允许拿出来正面讨论的问题，你公然讨论了，就意味着“宣扬”或“欣赏”，这就是霍教授他们的逻辑。也怪我运气太坏，论文答辩之际，不迟不早，正碰上文艺界批判白桦《苦恋》的风头，社会上刚出现的解冻形势突然受到寒流袭击，转眼间一切又退回到严冬状态。霍教授和系领导终于等到了郑庄公那样的下手机会。由宣扬色情到宣扬人性论，这可是由道德嫌疑上升到制造意识形态混乱的严重问题呀，我心里不由得一惊！当时“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尚为理论禁区，都被笼统归结为“反动的资产阶级”观念，扣上那帽子，你就有口难辩了。郝教授接着指责我说：“我早告诉你要注意政治，你不听我的话，现在好了，你不注意政治，政治可找到了你头上。正果，学术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呀，这一点我对你可是有言在先的，你怪不上我。我告诉你，我确实后悔招了你这样的学生，你犯了错误，我也得跟上受连累，我现在没办法站出来帮你说话了。论文是你

写的，文责自负，你现在承受你不讲政治的后果去吧。我再一次告诉你，是你自己要写这篇讨论艳情诗的文章，我可从没支持过你的。将来不管争辩到哪里，我和你那篇艳情诗论文都没有关系。”

霍教授首先撇清了自己的责任。接着，他数落起我一大堆不是，所指责的那些问题已与我的论文完全无关。他扯起了师生间琐碎的是非，其中大都涉及到他特别重视的师门路线斗争。他指责我靠拢了那两个与他敌对的文艺理论教授，还翻出很多我对他不恭的言辞，听那口气，所有的话都是我身边的同学汇报给他的。坐在那里听他发泄对我的种种不满，就像饭碗里不小心吃下了一个苍蝇，咽下去吐不出来，不吐又一阵阵恶心。最后，霍教授从对面走过来，在我身边的沙发上坐了下来。像生意人谈生意时讨价还价那样，他忽然用一只手遮在口边，就近我耳朵说：“正果，系上对你的事已做出了决定，现在还属保密，我先给你透个口风。你未通过论文答辩，所以对你只能按结业处理，也就是说，你不能参加研究生毕业统一分配，只能退回你原来教书的中学。我想私下给你个好心的建议，你不妨考虑一下。你妻子儿女不都待在农村吗？两头跑也不方便，要退回，我看你不如就退到本地农中，去教个语文好了，这样也能照顾家里，种好你那几亩责任田。”此刻，我眼中的霍教授现出了他那生意人的一面，他皮笑肉不笑地说着，故作的好意中掺入了诡谲的幸灾乐祸，浑浊的眼睛世故地闪了几闪，一瞬间皱起的每一条抬头纹都向我涌出铅块一样的计谋。

我起身告辞，感谢霍教授向我吐露了答辩委员会的决定，但也坚定地告诉他，我不会就此罢休，我要向更高一级提出申诉。

中文系总支书记在给全体本科毕业生的讲话中通报了取消我参加论文答辩的事件，藉此告诫这批正在作毕业论文的学生，要他们选题一定注意好政治标准第一的问题。我再次臭名远扬，成了陕西师大的新闻人物。

然而时代毕竟不同了，中文系不可能一手遮天，他们想搞臭我，结果并没把我完全搞臭。我找校党委反映了我的问题，中文系以外的所有研究生由一个名叫韩书玉的研究生领头，联名向研究生处提出异议，他们一致认为中文系这样处理我很不公平，要求研究生处出面干预此事。最后，在校党委和研究生处的过问下，中文系不得不做出折中的决定，并非如霍教授所扬言的那样把我退回原来的中学，而是再给我一次机会，责成我另写一篇论文，随下一届研究生参加答辩。

我也做出让步，这一次选择讨论大诗人杜甫的作品。1982 年夏天，我以《试论杜甫的咏物诗》一文通过答辩，论文成绩为“优”，终于拿到了研究生毕业证。但在准备表决是否授予我硕士学位时，系总支又出面干预，不许答辩委员会表决这一项。理由是：我另写论文，属于补考，给予毕业，对我已属抬举，根本不存在授给我硕士学位的问题。我急于找工作挣钱，不想再和他们继续纠缠，抱着现实的态度，就先拿上研究生毕业证离开了陕西师大。

直到后来工作稳定下来，我才就此事多次写信向北京的国家学位委员会上告，经过五年的扯皮，至 1987 年，陕西师大才给我补授了硕士学位。

四十九 “朝这开枪”

咽炎越来越厉害了，躺在南京师大招待所的空调房间内，我哪儿都不想去。外面的闷热感不完全是气温升高的结果，自行车在汽车队中穿行，行人和货摊挤满人行道，还有各种噪音不绝于耳，走在大街上，整个的氛围都让我感到烦躁和头晕。回到中国才发觉，舒适干净的环境中住了六年，身体不知不觉间已娇气了许多。到达上海的第三天，嗓子就有点不适，先是喉咙发干，我大量喝水，接着说话渐觉气力不足，我及时服用起消炎润喉药片。我得避免多说话，但又很难少说话，等硬撑到会议结束，日益虚弱的咽喉已接近崩溃。我开始剧烈

咳嗽，断绝了多年的黄痰也一口口吐了起来。洪升教授告诉我，这是久居国外的中国人一朝归来的通病，近年来国内城市大气污染日趋严重，我那抵抗力已变弱的喉咙肯定受了感染。他说我得经过一段适应过程，等病上一阵，再次习惯了这里的环境，一切都会恢复正常。

城市现代设施的发展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4 年出国时，打国际长途还得专程去一趟邮局，现在买张电话卡，躺在招待所的房间内就拨通了美国。妻子告诉我，纽黑文很凉快，前两天下了雨，她和女儿晚上还开着暖气。她说我走后收到老黄一封来信，信还没拆，也不知老黄有什么要事。老黄是西安的旧友，朋友中就数他懒于写信，他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写信来了？是不是急需什么研究资料要我查找？放下妻子的电话，我立即拨通了老黄。听说我此刻在南京，老黄显得十分惊喜，我问及他写信的事，他说前不久听说我最近要回西安，一时高兴，遂提笔写了那封信，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要让我办。不知是不是电话中交谈声音不太真切的缘故，挂断了电话，我总觉得老黄刚才的答复有点语含支吾。他多年来从不给我写信，无缘无故，不迟不早，何以在我归国前突然想到给我写信了？直觉告诉我，他似乎想对我说什么，但又没说出来。他想说什么呢？我又想起了萧宪电话中提醒我的事情。现在才进入五月下旬，我暂时还不能返回西安，我得同国安局兜圈子，在归途中绕几个大弯：先南下惠州会见萧宪和章艺，然后西飞到成都，在弟弟那里住到六月四日以后，直至国安局一年一度的神经紧张松弛下来，我才能动身北上，走向我这次旅程的终点。

萧宪和章艺都是西安交大管理学院毕业的硕士，我们的频繁交往始于 1988 年冬。当时我在社科系当讲师，职称低，学校的房管科只分给我们家很小一个单元。那是盖于七十年代的楼房，质量低劣，设计小气，单元内仅有一大一小两间卧室。厨房形同笼子，妻子若正在内做饭，我要进去拿东西，她都得转个身让路。厕所更是修建得缺德，拉开门入厕，几如走进大立柜，踏上那蹲式便池，你只能直蹲直立，想转个身子都很拘束。走廊尤其狭窄，搬家时就因那过道窄了几寸，我们新买的柜子无论如何都搬不进去，最后没办法，只好锯下一截，硬抬进了屋子。我和妻子所住的大房间兼作餐厅和起居室，全家人视若宝贝的新彩电自然也放置其中。每天晚饭后妻子和孩子要看电视，四顾没有我的立锥之地，我便去我们语文组的办公室读书和写作。那办公室特别隔了个套间，外间摆满各位教师的办公桌，里间仅用于存放书刊数据，尚余不少空间。后来在其中用功的时间久了，我干脆在里间支张木板床，就把那里当作我的书房兼卧室，除了有课去教室授课，吃饭时回家一趟，其余的时间大都泡在其中。与那些前来会我的朋友们提起评职称和分房子的烦恼时，我常对他们说："咱走不了后门，可会搞邪门。你们瞧，这空间够大了吧，校长他家也未必有这么宽敞。这就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反正学校的房子每个老师都有份儿，房管科不给咱分大的，就只有到办公楼来找便宜占了。要不，一家人挤在那小单元内，坐等评了教授再分大房子，还不把人闷死在里头了！我管他办公室不办公室，只要语文组的老师不来开会，这里外间就都归我临时借用。"

那办公室所在的机械系大楼位于校园西北角，楼外长满了合抱的法国梧桐，夏日窗外荫凉幽静，冬天日夜都供暖气，我在交大教书十年，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间足有教室大的屋内度过，享尽了家属院难得的清福。虽说那屋内陈设极简陋，缺乏家居的温馨，但我关起门来自成一统，男友之中，单身的无处可去，已婚的与老婆吵了架流落在外，都来我办公室内暂时落脚，消磨时间，常与我神聊到深夜。

88 年冬，我在办公室赶写评介西方女权主义批评的书稿，章艺和萧宪在翻译奥威尔的小说，他们多次找我讨论译稿，遂成了我办公室的常客。这两个研究生起先都在本科毕业后留校当干部，一个在学生科管理学生分配事务，一个给本科生当政治辅导员，后来学校成立了管理学院，他们俩遂放下工作，都攻读起刚开始吃香的 MBA 学位。若退到二十多年前我上大学的时候，他们做学生管理工作的人都在校园内充当思想警察，哪里会与我有共同的语言。毕竟已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一切都出现松动，即使是政工干部，也有不少年轻人走出了思想僵化的框框，明显表现出求新的追求。1986 年是形势最好的一年，校园内思想解放

的势头空前高涨，萧宪和章艺给学生办课余的系列讲座，应他们的邀请，我给大学生们讲了存在主义等其它西方现代思潮。有一次由校团委主持，请我在学校最大的台阶教室讲美国的性革命，那天晚上，讲堂内听众爆满，连过道和窗台上都坐满了学生。可惜自由的空气在中国总是好景不常，随着胡耀邦被迫下台，理论界活跃的气氛很快就被打成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章艺和萧宪成立了读书会，他们晚上在章艺家聚会，我也常去听他们的争论，和他们坦率地讨论共产党与极权主义的问题。

1989 年春，我赶完了那本女权主义批评的书稿，不久即患严重的腰腿痛住进医院。出院后，一直行走不便，吃药、扎针和按摩均无效果，只好终日躺在办公室的硬板床上静养。正是这时候，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病逝，西安也与北京等地的情况相似，各大学纷纷乘悼胡之机闹起学潮。对待学潮，我一开始持旁观态度。首先，我对追悼活动向来不感兴趣，周恩来也好，胡耀邦也好，对中共的任何一个领袖人物，我都没有过丝毫的爱戴之情，在我心目中，他们的死亡无异于任何陌生人的死亡。世界上每天都在死人，我们只可能对自己死去的亲友或有过一定关系的死者产生特别的哀悼之情。我也不太赞赏向官方请愿的行动，更何况共产党从来就不是人民的父母官，像那三个学生在人民大会堂门前长跪上书的行动，电视上看到眼中，就让人心里感到很不舒服。近年来经历的事实一再证明，这个党权政府还像从前一样反复无常，他们说变脸立即就会变脸。别看那些中央领导电视上一个个都作出父母教导孩子的耐心姿态，我才不相信他们那装模作样诚意，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根本就不想与学生平等对话。回想我刚获平反时那一股子兴奋劲，再看看十来年艰难的进步，我越来越对所谓的“政改”失去希望。几年前西单“民主墙”运动遭镇压的事件再明显不过地说明，共产党并没有变得比从前更好，思想言论罪仍是每一个中国人头上的悬剑。我依然心有余悸，不敢贸然卷入学生的活动。

1984 年冬，我从西安电大调到交大社科系。记得办理调入手续时，系主任和我有过一次恳切的谈话。他说他看过我的档案材料，知道我半生的坎坷都是在政治上吃了亏，因此在我新来之初，他要先给我些忠告。系主任当过右派，他说他也是过来人，希望我能理解他的好意。他问我多大年纪了，我说我今年整四十。他说这样的年龄已进入中年，政治上也该趋于成熟，更何况我妻子儿女还在乡下，家庭负担要比别人重，实在也再犯不起错误。因此他劝我从此安定下来，好好教书，下一步争取把家人的户口转入西安，让孩子也能转到交大附小上学。他说我都折腾了半辈子，吃了那么多苦，如今我们国家一片安定团结的局面，他真心希望我从今后平安无事，就在交大这样的重点学校一直干到退休。

1985 年，妻子和孩子的户口都转到西安，妻子在交大幼儿院干临时工，两个孩子都上了交大附小。我也一心想在教学和学术上做出成绩，尽快评上教授，好给我们家分一套像象样的房子。运动初起时，母亲唯恐我卷入其中。她说我现在的情况不比从前，我现在是拖家带口的人，我妻子又没正式工作，她的那份临时工，以及孩子上附小的资格，还有全家人的住房，全靠我在交大的这个教职。人家学生闹事，就是出了事横竖不过一人承当，但我要是再和公安局打上交道，老婆孩子没人管，受害的首先就是她。母亲一再告诫我不要卷入学潮，她说我自进劳改队到落户农村，经济上长期不能自立，把她拖累了十几年。她说那时候她好坏还有工作，能拿出一点钱补贴我，但现在她已退休，就那一点退休金，难道我还要让我媳妇和孩子再成为她的负担不成！

母亲的告诫我并不是没放在心上，但躺在办公室的木板床上，感受到校园内日益热烈起来的气氛，我不可能不受任何影响。四月底，章艺从北京回到交大，他给我和萧宪带回了他住在北大校园的见闻。他转述陈子明在北大三角地的演讲，还描述他参加四月二十七日大游行的情景，讲他们胳膊挎胳膊，高喊口号，如何冲过了警察在街头的一道道防线。章艺是个热血青年，讲到激动处，他脸上和眼睛都灼灼生光，听得我多次从床上坐起来，满怀热血沸腾的冲动，恨不得拖着病腿走上街头，也加入学生的游行队伍。我读了章艺带回来的很多油

印材料，陈子明的讲话稿特别感人，读得我眼睛由发热到潮湿，最后忍不住流出一大颗泪珠。

我开始到学生宿舍区浏览大字报，去听校园内随处可见的露天演讲了。我感到文革式的造反气势正在高涨，但又明显不同于往昔，现在才真正触及了那个党权政府的要害，学生和民众都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从来没有如此客观地报导过反对政府的群众活动，特别是电视上生动的现场追踪报导，在全国范围内制造了同情学生的新闻导向。我每天都看电视新闻节目，对天安门广场上的形势变化，越来越倾注了关切。

妻子把我蠢蠢欲动的情况告知母亲，母亲便强迫我住到她身边养病，她给我做好吃的，护士一样守在我身边，一心想把我软禁起来。母亲死抱她解放以来几十年的老信念，任何群众运动都不介入，她认为共产党是反不倒的，按照她的想法，与其眼看着我卷入运动，惹来严重的后果，还不如就这样病在床上，多躺上几天，好避开这一场大难。她甚至为我突然得了这怪病而暗怀几分庆幸，她说，我走不成路才好呢，省得我跑出去跟交大学生一起惹祸。

在母亲家住了没几天，章艺和萧宪便来找我，他们要去省政府和省领导对话，要让我在他们的公开信上签名，还要我给他们的油印小报写文章。不断有朋友和学生前来看望我，母亲拦不胜拦，经不起两波三波来人鼓动，我最后硬是甩开母亲的看管，借口说有这事那事，执意回交大参加了五月十七日声援广场绝食学生的全市大游行。我推着自行车支持那两条病腿，走不动路的时候，便骑上一阵车子，就这样跟随游行队伍穿越市区，经过新城广场，一直走到了底。那天晚上，腰痛加重了，我辗转在床上，但精神上却感到了极大的满足。背了那么多年“反动”的罪名，我何曾公开反对过当局一次？只是今天走在游行队伍中，高喊起“打倒官倒”等激越的口号，我平生才第一次理直气壮地发出了反抗的呼声。

五十　出中国记

重迭的楼阁依山而起，经过了数百年的渐次增建，最终积木般摞成了一座雄踞山岭的堡垒式宫殿。

这就是布达拉宫。

你必须通过低层的殿堂，爬上陡峭的梯子，穿越狭窄的通道和阴暗的内室，绕回廊而经别院，才能一层层攀向高处。梯子上的扶手都油光光的，一路摸上去，沾一手酥油。前来朝拜的藏人大都手捧酥油包，每至一点灯处，便用小刀切下一块，添入那日夜不熄的灯盏。所谓朝拜，在一定的程度上说，就是给佛像前的长明灯添油来了。我和弟弟走在旅游团的队列中，游客有内地来的，也有港台或欧美来的。我们一行人忙于游览，既不住足给灯盏添油，也不在佛龛前堆放钞票，仅由导游带领着出出进进，从头到尾都在走过程。用赤裸裸的献钞来装点庄严的佛堂，大概是喇嘛寺特有的传统吧，看着那揉得皱巴巴的旧纸币堆满香案，我始终无法把金钱所显示的虔诚与那煌煌灯火中的金身、持续的诵经声、以及等身拜中匍匐前行的善男信女联系在一起。

登上布达拉宫顶端已是正午时分，灿烂的阳光下，高原上的天空蓝得透亮，举头仰望，也越发显得高远。人在旅途中，日期自然记得比平时更清楚，我知道那天是 6 月 4 日，一路上就特别留意周围的动静。拉萨市一如既往，看不出什么异常，包括我弟弟在内，同行的一群中并无人与我提说“六四”的话题。站在这最高处眺望远处的群山，我心情低沉地设想，即使此刻能望见天安门广场，能望遍全中国大地，也是看不到任何特别的动静的。

才过去了十一年，在这块人命太贱的国土上，好像从没发生过那场平民遭军队枪杀的事件。回顾这六年来在海外的见闻，我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眼前这打了麻药针一样的现实。在美国，每年“六四”纪念日，周围都会举办各种活动，媒体上都能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相关

报导，所有的活动和报导都提醒人们想起那个血腥的日子，都一再唤起 1989 以来从未间断的谴责和抗争。唯独在中国大陆，当局不许民众有任何表示，即使我此刻习惯地想到该有所表示，也只能默祭在自己心中。萧宪电话中提到的那件事一直搅扰着我整个的旅程，自入境的一刻起，我就没放松过对监视或跟踪的警惕。南京开完会，绕了这么大的圈子，从深圳先飞到成都汇合弟弟，再跟他飞到西藏高原上消磨时日，就是想避过"六四"敏感期再回西安，免得到那里惹上麻烦。

十年前，人们对时隔一年的大屠杀记忆犹新，记得"六四"头周年一大早，在西安交大正门外临街的墙上，还有人胆敢贴出大幅标语，上书"血债血还"等激烈的言辞。就在当晚，我在昏暗的大路上把自行车蹬得飞快，让坐在我身后的一个女学生沿途撒下片片祭奠的纸钱。我曾赋七律一首，其中"且干白酒避罗网，更挑红灯撒纸钱"两句，咏叹的便是此情此景。后来北京争得了承办亚运会的荣誉，空前高涨的爱国狂热顷刻冲淡了"六四"悲情。想当初全市学生大游行的时候，西安市民都拿上饮料夹道慰劳，那场面也曾感动得我眼眶湿润。然而，就在那同一条马路上，我后来又看见，他们以同样的热情夹道欢呼亚运会火炬，争着枪着给跑步前行的运动员送饮料喝。"要是大家都抵制亚运会，要是没有一个人上街欢迎，让运动员跑过空荡荡的街道，那才好呢！"甩开了那一堆健忘和爱凑热闹的人群，我无奈地痴想着，恨不得把各家店铺门前迎亚运的招贴画撕个干净。后来，正由于北京成功举办了亚运会，当局很快扭转了自镇压学运以来的困境。诡谲的现实又一次泼了我一头冷水，随后发生的很多事都让人越来越感到泄气。

前几天在成都，我特意约见了诗人廖亦武。我们俩还是初次见面，但此前都读过对方的作品，茶馆里坐下聊了不久，很自然便谈起了各自的"六四"经历。同我的情况差不多，在整个学潮期间，廖亦武也没有实际介入，只是在 6 月 4 日听到了北京开枪镇压的消息，出于抑制不住的悲愤，他才连夜创作了激烈抗议的长诗《大屠杀》。为将他个人的声音传播出去，他亲自朗诵该诗，制做成录音带四处散发。与此同时，他还与一群地下诗人摄制诗歌艺术片《安魂》，准备在"六四"头周年举行公开的悼念活动。电影还没拍成，公安局便抓了摄制组全体成员，最后定廖亦武为诗歌反革命案首犯，判了他四年徒刑。1994 年获释后，他家庭破裂，丢了原有的工作，也被注销了原居住地的户口。从此他光棍儿一条，谋生无路，只能靠吹箫卖艺或挣些稿费糊口，一直在底层挣扎到如今。

"六四"屠夫们就是要用持续的恐怖迫使人们闭口和忘却，最终达到抹掉那一段血腥历史的目的。廖亦武今日的下场再明显不过地让我看到，为什么每逢"六四"纪念日，唯独在中国毫无动静，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淡忘了"六四"。

我仅在校园内贴了几张大字报，远没有造成廖亦武那样向世界发出控诉的影响，后来又顺从地接受了系总支和公安局的审查，结局当然比他好多了。我认识的教师中，有被公安局抓去关起来的，也有留在校内受审查，不准再给学生上课的，我受的处罚更轻，系主任仅口头通知我说，系上决定暂时取消我评高级职称的资格。这就是说，只怪我"动乱"中行为不轨，从今后升教授便没我的份儿了。

我所在的社科系前身为马列教研室，原有的教学任务是给全校学生讲授那几门必修的政治课。后来上面提倡文理渗透，为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新增设了文学、艺术之类的选修课。也正是蹭上了这个机会，像我这种各大学中文系均不接收的人物才得以调入交大。交大是个工科大学，开设些人文学科的课程，聊作点缀而已，我自己心里很清楚，我那些古典诗词或现代派文学的课程，是远不能和政治课教学相提并论的。系上的形势基本如此，我就是没参与"动乱"，没有严重的问题，要竞争那有限的教授名额，也争不过数量太多的政治课教师。中国的很多事都是粥少僧多，评职称尤其如此，每评一次职称，最后总是闹得全系教师怨言纷纷，离心离德。别的不说，仅在那些有头有脸的政治课教师中，就争得不可开交。有个教"中共党史"的教师已年近退休，因多次评不上教授，气得患病住了院。他老婆到系主任家

大闹，系上怕闹出人命，临时向学校要了个急救的名额，由系主任亲赴医院，病床边口头宣布提升教授的决定。那决定果然立即见效，老先生闻声即从病床上坐起，次日就办理了出院手续。

这几年评职称的闹剧看多了，我实在不想败坏自己的心情，对系上的那个无理决定，也就没过分在意。但妻子气愤不过，她提醒我说："你评不上教授，咱们家就分不上大房子。"我说："不分就不分呗，反正我占着办公室呢。"她反驳我说："该争该闹的时候你偏不争不闹，不该闹腾的时候只有你出来胡闹。你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评职称这事情，你再要这样不闻不问下去，我就找到系主任他家去了。"我受不了妻子的唠叨，更怕她闹到系主任家丢我的人，几经踌躇，最后才拿上我那本新出的《风骚与艳情》，硬着头皮去教师科申诉，指望在校领导面前讨个公道。

《风骚与艳情》是我发表的第一本学术著作。写这本书，起先只是为争一口气。当初报考师大，本想在跌了跤的地方再站起来，没想到重返校园后，又再次不光彩地离开了那里。"反动"的罪名好容易平了反，随后写论文又触犯了"色情"的禁区。我还是我那个对着干的老脾气，心想色情就色情吧，既已叫他们泼了脏水，就非把那"色情"搞出个名堂不可。离开师大后，我断断续续打我的腹稿，很想把有关"艳情诗"的探讨写成一本专著。但在整体结构上一直没理出头绪，一转眼好几年过去了，那本想写的书始终处于待写的状态。如果不是后来受约稿的启发，没有应约后的压力和主编的激励，那写书的愿望也许早就在拖延中淡下去了。

1986 年，我在交大讲授西方现代文艺思潮，为教好那门课程，全力以赴钻研从结构主义到女性主义批评的一系列现代批评理论。初夏的一天，我刚完成一篇这方面的文章，听说城里正在举行一个性别问题的研讨会，便带上自己的文章去那里会见几个朋友，想趁机交流一些信息。他们都出外游览去了，只有一位来自河南的年轻学者留在招待所休息。我一边等候朋友们回来，一边和她谈论会上的议题。一个多钟头交谈下来，两个人都激发了谈兴，越谈越有了说不完的话。乐莫乐兮新相知，我也不等候那几个朋友了，下过阵雨的街上空气很清新，乘兴骑车子把她带到了交大校园。树叶上还有水珠嘀嗒下来，斜晖照耀下，树上草上的水珠都从不同角度闪出悦目的光彩。她提到了手头正在筹划的"妇女研究"丛书，还给我讲她要建立这一门学科的设想。她娓娓动听地讲着，言谈间不时爽朗地一笑，每一笑，那略微露出的虎牙都水珠般光洁地一亮。她说她很欣赏我的知识结构，也喜欢我的思路开阔，说着就问我愿不愿意为她的丛书赶写一部书稿。

在出书的事情上，我正处于奔走无门的情况，有几位打过交道的编辑，与他们合作得都不太愉快。中国的学术界和出版界正在思想解放的路上做艰难的突破，大多数学者和编辑尚有政治余悸，还都难能免俗地胆小和势利。有一位审稿人是我的校友，他负责审阅我一部评介西方现代派文艺思潮的书稿，竟以"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批评分析"的缺陷为理由，最后搁置了那部稿子。另有个范先生负责我和友人合译的一部美术史名著，在该书发稿之际，这位责任编辑忽生奇想，非要我求李泽厚写一篇序言不可，否则暂不出书。我又不认识那位著名的美学家，且对他的论著不感兴趣，只因范责编一再催逼，不得才已自费来到北京。一路上我越想越气，等走到社科院大门口，实在不想去那个求陌生的名人，一气之下，扭头回北京站，立即乘火车返回西安。

我知道自己是无名之辈，被挑剔和受冷遇是很正常的现象，除非蹦上一位审稿人既有胆识，又没偏见，且握有定夺大权，否则我写的那些东西很难过关。我的直觉告诉我，现在开口向我约稿的主编正是这样一位可遇而不可求的人物，比起我领教过的那些大男人们，她的举止和谈吐要显得有魄力多了。望着她信赖和赞同的目光，我那依然处于朦胧状态的书稿构思突然有了明晰的轮廓，于是当下便与她说定了给丛书赶写书稿的事。后来经过多次通信，互相交换意见，最终在 1987 年夏天的"丛书"讨论会上定下了《风骚与艳情——古典诗词

的女性研究》这个题目。书写得快也出得快，开完讨论会回来，我立即动笔，第二年五月全部完稿，几个月之后便印了出来。初次出书，当然令人异常兴奋，刚收到样书的那段日子，我也曾像个爱照镜子的妇女那样欣然自喜过一阵子，常常是在书架旁坐下来，动不动就拿起那本新书翻弄一番。

教师科科长在他的办公室接见了我，我向他反映社科系评定职称的情况，力陈自己所具备的条件，并把那银灰色封面上画了一支红烛的新书摆上桌面，指给他看。科长的态度还算温和，他拿起书疑虑地看了一眼，问我是不是本言情小说，并提醒我说，评职称要的是学术论文，诗歌和小说可不算数。科长的话说得我有点莫名其妙，难道是那花哨的封面或香艳的书名误导了他？我只好耐心对他解释说："是本有关古典诗词和女性的专题研究，确实属于学术著作，还特别运用了最新的西方批评理论呢。"经我一解释，科长消除了部分疑虑，接着他向我问起更实际的问题："你应用的那些理论能创造多大的经济效益？"什么"经济效益"？我一下子傻了眼。科长这问题也问得太驴头不对马嘴了，怎能拿工程技术上的标准来衡量人文学科的价值呢？我怃然站起来，淡淡地对他说："实在说不上来。"然后夹上我那无经济效益可言的书，拧身走了出去。

垂头丧气从行政楼回来，我把书摔到沙发上，当初接到样书时的那股子得意劲已消失得光光净净。妻子现在终于知道，再争再闹也是白搭，她的气没处出了，转而对我说起了无聊的风凉话。"你不是说你那个'风骚'与'艳情'的提法特别创新么？我还以为记者会来咱家采访你呢，都这么长时间了，咋没见有啥反应？"妻子不以为然地问我。她说的并没错，确实没引起我预期的反应。我无法用事实让妻子分享我的成就感，对她来说，我的快感只是一块含在我自己嘴里的糖。对我在文字上苦下功夫的事情，妻子一贯持轻视和缺乏信任的态度，不只妻子，连受过高等教育的母亲也是如此，几十年来的政治高压下，反人文和重实利的俗见已深入人心，很难扭转了。她们婆媳俩一口腔，都不约而同地惋惜我写作的方向不太对头，嫌我不像人家贾平凹那样一本又一本出版畅销的散文或小说。我斥责妻子目光短浅，叫她不懂的事情最好少插嘴。她又嘟囔起我这几年整天在办公室写稿子，不好好去校外兼课赚钱，弄得全系就数我家穷。她抱怨起我不挣外快的那口气，就像母亲数落父亲喝酒，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一说起来就没完没了。

看来，交大这地方是待不下去了。我开始四处活动，试图调动工作。先是联系本市的大学，接着南下广州和海南，想在几个经济特区新建的大学谋求教职，但结果全部落空。一了解到我参加过"动乱"，人家都不愿意考虑。我的生活又陷入了以往的"恶性循环"：由于所谓的表现不好，每在一个单位待一段时间，就出现很难再待下去的局面。我毕业后老老实实教了近十年书，好容易补救了早先那篇论文造成的不良影响，如今却因参与过"动乱"，又处于四面踫壁的困境。我们系主任不痛不痒地对我说："老康，一动不如一静，你都是'老运动员'了，转眼已到五十，要想跳槽，我看也难。还是在交大安心待下去，过两年，等咱们系上几个老教师都解决了高级职称问题，局势也缓和下来，少不了你那个教授头衔的。"

1990 年夏天，章艺和萧宪研究生毕业，两个人都南下惠州找他们的机会去了。一年前跟上我一起游行的几个本科生也都拿到毕业证，纷纷去新的工作岗位报到。临行前夕，他们都拿来纪念册让我题词留念。我给那个曾冒险坐在我自行车后面撒纸钱的女生写了一首很长的诗，还记得开头的四行是：

课堂是什么？
是绞肉机。
无论什么肉，
都得加工成饺子馅。

老子说："信言不美"。老子还说："反者，道之动。"我不会说好听话，说反话简直成了我的使命。按照老子的命题，"反"乃是大道运转的方向，也可以说是求真的动力。"反"不只意味着违反或相反，同时更强调返回，对抗的力量总是趋向回归，特别是向本体和个体的回归。这就是我理解的"反动"精神，也是我一贯执行的"反动"实践。用区区的政治框框套我的"反动"追求，也太歪曲我贬低我了。

那一天我躺在办公室的木板床上看英文杂志，翻出一幅摄于北美的彩照。孤立的房屋前一片草坪，路边的大树下落叶金黄，一位清扫者推着吹风机，吹得落叶如浪般翻滚，集成高高一堆。多么美丽的画面！我不由得感叹了几声，然后就做起了我的白日梦。我想象我如何移居到这样幽静的国度，闭门读书消永昼，等书读烦了，出来清扫落叶，就像那画面上的清扫者把金黄的树叶吹得如浪翻滚。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将再也不必看书记或主任的脸色行事，而以往所受的全部羞辱也都作为垃圾丢在了故国。

送走了那批"六四"学生，我暑期出外旅行了几周。从外地返回，信箱内积了一大堆邮件，翻检中发现，有一封信来自美国。美国我谁也不认识呀，拿起信封，我有点奇怪地想着，但再看一眼那上面工整的繁体字，写的确实是我的姓名。我好奇地拆开信封，是一封读者来信，既有寻求学术交流的意思，也提了点事务性的要求。我再读了一遍来信，同时推想来信者的情况。首先，开头第一句"敝人近读大作《风骚与艳情》"云云，玩味那措词，好像是出于一位讲究旧式书信格式的老先生之口。这位"敝人"姓张，自称是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的中国文学教授，说是读了我那本书获益甚多，非常钦佩。还说下学期要开一门"明清妇女诗词"的讨论课，想拿我的书给选课的学生做参考读物，写信的目的就是要打听订购该书的渠道。我给张教授写了回信，附上出版社和责任编辑的通信地址，当天便拿到邮局发了。

自从 1967 年 5 月给苏联莫斯科大学寄出了那封借书的信，我再也没产生过往国外写信的念头。二十多年过去了，寄这第二封发往国外的信件，我很自然地想起从前那惹祸的第一封信。仍然是走到邮局的窗口下，问发往国外的航空信该贴多钱的邮票。但这一次我不再有疑惧梗阻，给信封上贴好邮票，心中不由得泛起一丝温煦的冲动。到底冲动什么，我当下还说不清楚，那飘忽的温煦微弱之极，就像隆冬时分发自地下的阳气，仅萌动了一丝回升的态势而已。都是关于一本书的信，都联系着一所外国的著名大学……我把信投入了信箱，一边联系往事，一边对事物运转的总秩序，以及恶因或良缘在其中蹿撞的几率作联翩的浮想。不管怎么说，收到了来自读者的正面反应，总是个令人欣喜的好事。我把收到来信的事讲给妻子，说我那本书并没放空炮，还特别向她强调说，可别小看这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只要写出了真知灼见，只要传播出去了，迟早都会产生感应的。

回信发出很久，那边又有来信回应，书信往还间，遂渐渐有了学术信息上的交流。1991 年夏天，耶鲁东亚系寄来一个会议通知，其中列有几组议题，说是两年后那里要举办"明清妇女与文学"国际学术会议，我如愿参加，需从速报上论文题目，并写几句提要。出国开会，且由对方负担往返机票和会议期间的食宿花费，对我这样的无名之辈，当然是个难得的机会。看来，由《风骚与艳情》一书的撰写和出版牵动的一系列偶然性，在事物运转的总秩序中已形成某种趋势，正在展现可喜的前景。我欣喜地暗想，这些年在办公室的冷板凳总算没有白坐，长期积累下来的善缘也该到发生感应的时候了。当然，障碍还有很多很多，事情只不过刚开始向好的一面转化，我必须勇猛精进，尽我的人事，才能走出命运的阴影。当时我正在读《西青散记》，随手拟了个有关边缘文人和才女命薄的题目，及时寄了出去。

那边的会议筹备得从容而很有秩序，不时有来函告知进展的情况。1992 年夏天，我收到大会的议程和正式邀请。身为交大的教师，出国自然得先获校方恩准，然后通过教委系统办因公出国的护照，这一环扣一环的手续麻烦之极，任何一个环节打了绊子，都会前功尽弃，坏了我的大事。我又有参与"动乱"的记录，主管教师出国参加会议的科研处更不敢贸然批准，对我的政治表现，他们说必须做出特别严格的审查。从系总支到校党委，我一张张填表，

多次找各级负责人签署意见，加盖公章。与此同时，应科研处处长的要求，我还就参与“动乱”之事认真写了篇检查。在长达半年的审批过程中，踫钉子，受刁难，接二连三，烦得我多次濒临失去耐心的边缘，差点没和主管人当面发生冲突。1992 年年底，我完成了大会论文，科研处又指定我系一位权威教授审查论文内容，看有没有泄漏国家机密或意识形态方面出格的问题。谢天谢地，那老教授一向与人为善，而我那篇讨论性别与文学的论文也和他们担忧的问题沾不上边，老教授认为没有任何问题，还特别在评语中指出我文中的分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1993 年春，直到把我审查到无可挑剔的程度，科研处才做出了同意我出国参加学术会议的决定。

接下来，我得到外事处填各种表格，又是种种烦人的手续，我不敢稍有懈怠，一直抓紧时间办理，直至 5 月初，才拿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公出国的护照。我还得专程去北京找国家教委负责外事的部门，把护照交给他们，由他们为我代办去美国的签证。那会议在 6 月下旬举行，等一切手续办齐全，已是 6 月上旬。我暗自庆幸耶鲁东亚系那一套周全的设计，他们当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麻烦的出国手续，但若没有长达两年的会议筹备期，我就没有足够的时间通过交大那漫长的审查和拖延了。

办理出国手续过程中踫到的种种麻烦弄得我又焦躁又气恼，也更加激化了我的离去之心。那一天，在北京机场托运了我新买的箱子，通过出境检查，大步走向登机门时，我竟不由得紧张地拧头回望了几次身后的通道，唯恐有关人员接到什么紧急通知，赶上来取消我出国的资格。

飞机终于从跑道上飞起了，白云蓝天上，我一阵不可名状的兴奋。

关于自由和解放，多少年来，我一直最向往两个时刻。一个是销毁我那可恶的档案，还我一个历史的清白。那一年离九十一中去师大报到，拿起那档案袋的一刻，我轻松得就像孙悟空一纵身爬出了五行山的重压。另一个就是离开中国，去无论哪个不受党委、人事干部以及公安局刁难和威胁的地方定居下来。现在，北京和躺在纪念堂内的毛尸远远抛在了脚下，乘风离去的一刻就在当前。几十年来，在那块动辄得咎的土地上拘束惯了，现在看着机窗外那好像静止的机翼平展在高空，我心神恍惚，一时间还有点不敢相信已飞出了中国。飞机一直向东飞去，它追过了太阳，在太平洋上空彻底挣脱了降临到东半球的夜幕，直接飞入了西半球的白昼，越飞天空越明亮。

下午时分，飞机在纽约肯尼迪机场着陆。我顺利入境，出候机厅，乘康州大巴，一路畅通无阻，赶在天黑前，住进了大会预订好的纽黑文度假日饭店。

会议召开的前一天，张教授在家中招待与会学者，我随其他人一起乘车前往。车到张宅，主人夫妇已在家门口垂立恭候，我们一行人从路边沿高坡拾级而上。主人和来客一一握手，互相问好和介绍。轮到了我，也握了一下张教授伸出的手。面面相对下，这才清楚地看到，曾以“敝人”自称的张教授并不是我推想的什么老先生，而是个中年女学者。她有点鬈曲的头发丝丝茸茸的，上面戴了个素雅的蝴蝶结，满面笑容焕发出菩萨般和善的光彩。她开口先夸我第一个交了论文，也对论文的质量表示赞赏。她还说，他们会议组织者催交论文催得很辛苦，有些人一直拖到开会时才亲自带来，所以她早就准备在见面时表扬我按时交文章的认真态度。我对她说，我读研究生时专攻古典诗词，毕业至今还没参加过这方面的学术会议，这一次受邀来开会，就像小学生赶考，只怕哪一步没跟上，失去了与会资格。因此才不敢稍有懈怠，不过是笨鸟先飞，没落到后面就很不错了。我的话说得张教授莞尔而笑，这时殷勤周到的张先生给来客送上红酒，也给我递过一杯。我从未喝过洋酒，接过杯子喝了一口，只觉得酸中带涩，与我喝惯了的酒味很不一样。接下来几天，很多事都像喝洋酒一样初次见识，都让我觉得出乎原来的想象。

会议很快开完了，十来天后，带上那累赘的新箱子，我乘机返回中国。

本来参加几天会议，无需带这么大的箱子，之所以特意买了个新箱子，是为了给一去不归预先做点准备。那里面装了过冬的衣物，还有厚厚一沓稿纸和几本常用的工具书，以及牙膏、肥皂之类的日用品。早在赴美前，我便打算到那里见机行事，争取留下来，进一步再办定居美国的手续。想当初大学开除后报不上户口，劳教农场三年服苦役，释放后落户农村给人当养子，平了反读硕士学位又一次挨整，多少次落得走投无路，呼天叫地全不应的时候，我都产生过去此危邦的念头。但能走到哪儿去，何处可安身，所谓的“适彼乐土”，到底该选择什么地方，我心里一直都很茫然。直至拿到赴美开会的签证，眼前才有了明确的去向。临行前，不少关心我的亲友也都怂恿我说，这次出去了，最好别再回来。妻子更提醒我，说学校马上要实施教工出钱买房的新方案，我们家没有任何积蓄，到时候看我们拿什么买房。妻子在交大托儿所当阿姨，认识的孩子父母很多，各方面的信息比我灵通，已听到不少交大教师在美国拼搏谋生的传闻。因此她反复叮咛我说，即使在美国留不下来，也得想办法在纽约打几个月工。按她的盘算，要是能挣几千美元带回来，轮到我们买房子，也就拿得出几万元了。不过是几天的开会之行，耳边的种种建议都给我此行增加了碰运气、闯世界份量，也说得我给那箱子内多放了些必备的用品。

可惜美国并非我和妻子以及亲友们想象的那样容易逗留。我去纽约待了几天，想看看有什么机会。先是投奔一个在布朗克斯读博士学位的朋友，走进他公寓房门的那天，不巧正蹾上他丢了实验室打工的差事。我的到来似乎携带了霉运，相处了两天，主客间彼此都甚感尴尬。再加上那块住宅区既破败又不安全，建筑物上，触目皆是令人惊恐的涂鸦画。因此我很快离开了那里，转到皇后区另一处友人家居住。她当时独身一人，正在遭遇移居生活常有的各种困难，听她讲了每天辛苦的奔波，又亲眼看了她打工的场所，我那逗留下来的决心一下泄尽了气，随即决定马上回国。现在我才亲眼看到，移居生活有很多事先想象不到的艰辛，投奔自由固然好，但也要付出代价，得拼死拼活苦干好多年。至于像我这样一没身份，二没住处的 B1 签证持有者，即使能在美国赖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我一贯行事不愿意勉强自己，这一次既然不具备留下来的条件，我看还是以及时返回为上。

妻子见我拖着箱子走进门，扭头就进了卧室，好多天都没和我说话。她嫌我没赖在那里打工，没给她挣回美元。她发愁学校卖房子时我们家拿什么付款，她说她愁得都睡不着觉。我安慰她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走一步看一步吧，事情总是在变化的。同事们的反应则让我觉得又可气而又可笑，刚回到交大那些天，路上每蹾见熟人，差不多开口都问我：“老康，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按时返回，这是我当初申请出国时给领导所下的保证，现在人回来了，听他们那口气，反成了咄咄怪事。听说我走后，就有人私下议论说：“康正果这次出去了，非叛国投敌不可。”按他们的想法，我都反动了这么多年，放出去了，绝不会自动回来。原来如此，怪不得很多人都那样惊异地问我。然而我毕竟回来了，我到处走动，出现在他们眼前，就是要让他们感到诧异和预期落空。后来有人转告我，说是系总支书记听说我回到交大很高兴，当下就发出赞叹说：“看来，康正果同志还是爱国的。”真所谓“有不虞之誉”啊，没想到孟子这句话现在竟说到了我的头上。听了那人的传言，差点让我哑然失笑，我随即向他表示，本人实不敢谬承书记的过奖。

“爱国”这顶高帽子，最好还是让爱党的人士去戴吧，我的确是戴不起的。我和这个社会整个都处于错位的状况，我不认同他们的用语，不管他们说我好或说我坏，所说的都不符合我的实际情况。

对我的毅然归去，耶鲁的张教授也深表赞同。她是个奉公守法的人，最不愿意看到耶鲁邀来的学者无故黑在美国，搞成了非法居留。她认为我的现状还没有危急到非赖在中国城打工不可的地步，她说我若执意要走那条路，势必断了我今后与学院的联系。正是考虑到张教授担有责任，更怕事后引起她不安，也不想让人家东道主看扁了咱大陆出来的学者，我才断然放弃了滞留下来的打算，随即离美回国。也许正是出于对我的这一点信任，再加上我那篇

论文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很深，第二年东亚系急需聘一个中文教师，远在西安的我首先成了他们考虑的人选。

那是 1994 年 4 月，我突然收到了东亚系发来的传真，来信问我愿不愿意去耶鲁教中文。对这个职务，信上特别做了说明，说这是专业的语言教学工作，和拿了博士学位当教授的工作完全不同，我若有意应聘，首先得想好是否愿意致力语言教学。我立即回复说我愿意，接着就收到了正式聘书，职称叫 Senior Lector（资深讲师），聘期三年，自 1994 年 7 月 1 日至 1997 年 6 月 30 日。随后，又寄来了办理 H1 签证所需的有关文件。

这一次我需办因私出国的护照。申请递上去，系上和校方答应得又快又干脆。按要求，我得先办了退职手续，学校才会出具办理护照的证明。这是学校新实施的政策。我既已出国在外工作，又不属于公派名额，交大当然不会让我的妻子儿女继续留下来白占公家的便宜。退职意味着我不能再享有交大的公费医疗，必须退还交大所分的房子，我的儿女也不得在专为本校职工子弟开办的交大附中继续读书。总而言之，要接受耶鲁的聘书，我们家就得从交大扫地出门。我把所面临的情况告知耶鲁东亚系，要求带家属一同赴美。他们同意家人随我同行，很快就寄来了妻子和儿女办理 H4 签证所需的有关文件。

见我既保不住工职，又留不下一套房子，我妻子很不甘心，极度地感到不平。从 1965 年春在二厂当就业工人算起，我至今已有将近三十年的工龄了。三十年工龄是可以享受退休福利的，不少亲友认为，干了差不多三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一退职就等于前功尽弃，就这样让交大一脚踢出去，也未免太吃亏了。但我不想多考虑这些损失，尽快拿到四个人的因私出国护照，这才是我的当务之急。再说，从此断了退路也好，这样我就更可以义无反顾地走我的路了。既然我一直都不喜欢这个体制，对它那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不该心存妄念，贪图享受。吃亏就吃亏吧，从今后再没有牵挂，倒也落个一身干净。我毅然递上了退职报告，接着办理起一系列离校手续。

我的工资从五月起停发，妻子离开了交大托儿所，两个孩子也中断了他们在交大附中春季学期的课程。全家人都解除了与交大的依赖关系，然后处理家具，打点行李，忙碌着给交大房产科腾房。那是我们住了多年的宿舍，直至他们验收了我们交回的房子，校长办公室才给我开出证明，我才着手办理起申请护照的手续。

我们的家具和用品，能变卖的卖了些钱，能给人的都留给了母亲和其他 亲戚。经一番东凑西借，备足了旅费，在 1994 年 6 月 10 日，我们全家人乘火车离西安赴北京签证，打算拿到了签证，随即从那里出国。全家的财物装入三个箱子和三个大包，一半是我的书籍，一半是四个人的衣服和杂物。我特别带上了这些年来所写的几本日记和珍贵的影集，两个孩子还带上了他们正在饲养的几十条蚕。都到了快吐丝做茧的时候，一条条在纸盒子角落仰起头发呆，滚圆的身子软绵绵的，在阳光下显得透亮。

母亲和弟妹们几家人都到车站给我们送行，发车前，列车的一声长鸣突然激化了告别的气氛。他们月台上望我们，我们车窗内看他们，孩子们哭出了声，女人都流下了泪，而几个男的，则淡淡红起眼圈，我也觉得自己的眼眶湿热，一时间都说不出话来。就在这相视模糊的一刻，列车慢慢转动，越开越快，西安和他们的身影转眼就远远地甩到了身后。

到达北京后，次日一大早即去美国大使馆办理签证手续。听说这里一向卡得很紧，不只证件不全会遭拒签，即使证件齐全，仍有可能被拒。总之，拒签的的结果随时会落到任何一个申请签证的中国人头上，能不能顺利拿到签证，有时候全靠各人的运气。而一旦遭到拒签，不管你有多紧的要事需出国办理，也不管你从多远的地方来到北京，你最后只能自认倒霉地打道回府，白扔掉你办手续的花费。

但我们一家子现在已无家可归，我们已叫西安交大扫地出门，一扫帚扫到了美国大使馆的墙外。今天要是遭拒签，明天便是流落京城街头。踏上秀水街，我们全家人排上那长队，我在心里打定破釜沉舟的主意，不管他签证官给不给签，也非得签上这个证不可。

排了几个钟头的长队，好容易轮到我们四个人迈向窗口。那里面坐了位女士，她迅速审阅了我递入的文件，温和地问了每一个人的情况，然后入内和其他人稍作商议，很快就出来告知我们，说我可以带上妻子和十六岁的儿子赴美，但我十八岁的女儿得留在中国。这就是说，女儿遭到了拒签。我问她拒签的理由，她说我女儿已到了能够独立生活的年龄，不必非跟在父母身边不可。而且也到了快上大学的时候， 他们认为，我女儿要在美国读完大学，返回中国的可能就不大了。她叫我现在就办三个人的签证手续，那口气俨然是要把我女儿留下来当个人质。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等候，不管我愿不愿意留下女儿，看来已没有多少商讨的余地。我办事遇到障碍，向来不会求情，听了那女士的话我想都没想，当即就对她说，要签就是全家人一起签，否则我只好放弃去耶鲁教书。我进一步向她强调，耶鲁给我们四个人都申请到了移民局的批文，为的就是让我们一起往返，来去全家，家庭的团聚和孩子的教育可是做父母的大事，若不准我带我女儿，不要说美国，就是人间天堂，地上乐园，我也不要去的。我总不能为了出个国把这么小的孩子独自丢在中国，这样做太有违人情了。反正现在没有退路，只能豁出去硬碰硬地争取。至少我还握有耶鲁的聘书，那就拿耶鲁这块牌子押我的宝吧。

那女士也许没想到我会如此固执，她再次入内与同事交换意见，回过头来，她竟做了点让步。她让我们四个人都留下护照，说下一次约见时再做最后的决定。

回住处立即给张教授打去电话，告急了签证的情况。张教授吩咐东亚系秘书 Sharon 火速与使馆人员取得联系，并连夜追加了所需的材料。我 93 年赴耶鲁开会，与 Sharon 有一面之交，对她办事的热忱、负责和有效率，我印象很深。多亏 Sharon 反应及时，积极争取，也幸赖耶鲁这样的用人单位有其不可忽视的影响，再次约见时，四个人的护照上都贴好了赴美的签证。

7 月 7 日，我们全家人乘飞机离京赴美，我再一次感受了飞机飞离北京时的一阵轻松。但这一次我的心情与上一次有所不同，上一次是在假想的告别中发热发狂，惟其为假想，激动得才特别带劲，有一种飘飘乎不知其所往的快感。而这一次，真正踏上了出国移居的旅程，片刻的轻松后，我的心转而沉重起来。我都整整五十岁了，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事业有成，家业已定，正在接近的退休生活也初步打好了基础。然而我现在却是携妻带子，仓皇去异国定居，一家人几乎一无所有，事事都得从头开始。虽说到了那边，就有工作，但还是挥不去几分举家放逐的惆怅。看着初次乘坐飞机的妻子儿女不住盯住窗外，大开眼界，欣赏云天奇景，我心中悲怆与壮怀交集，流落的失意云一样散去，迎接挑战的劲头渐渐地云一样积聚起来。就这样一路上心潮起伏，回忆与向往交织在一起，喝着空姐不断送来的饮料，不觉得机翼倾斜下纽约市已经在望，飞机盘旋中，掠过了自由女神的巨像。

我们在肯尼迪机场下了飞机，顺利通过入境检查。出口处，张教授夫妇专车接了我们，当天下午，就安顿我们住进了纽黑文橘街一家二楼上的公寓。终于黄鳝钻进泥洞一样有了窝，现在就是有谁想揪住尾巴往外拽，也无从下手了。夜幕初降，窗帘静垂，柔和的灯光下，看着妻倦伏而儿女熟睡，只觉得此时此刻，人间天上，祥云回护，虚室安谧中，我合掌起立，反复默诵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五一　我不是归人

逐渐升温的篜气湿烘着我的皮肉，郁热中慢慢透出清爽的药香，整个身子好比大提琴锁在琴箱里头，只有头露在外面。还有很多“琴箱”挨个竖在灯光下，我左边那一个的顶端上伸出了弟弟的头。服务员正立在跟前喂弟弟冷饮，还给他擦汗。弟弟问我感觉如何，承受得

了。我说感觉还可以，确实挺解乏的，但温度不能再升了。眼前的温度表已升到摄氏四十二度，我浑身燥热，心跳加快，头有些发昏。

我们哥俩正在成都的一家按摩院洗中草药熏浴。从西藏回来，那顽固的咽炎症状仍未完全消除，弟弟就把我带到这里。我本不想来，弟弟提说了好几次，说确实属于保健服务，这才说动了我，随他走了进来。不是我假装正经，不懂得享受，而是我心里有难言的顾虑。曾读过几则报导，说是中国警方和三陪小姐串通一起，硬是给不慎进入娱乐场所的异议人士扣上嫖娼嫌疑的罪名。据报，他们已以此类诬陷手段拘捕了不少欲加之罪的人物。这些传闻无形中给我心理上增加了恐惧，自入境中国大陆，我就患上流氓罪过敏症。每到公共场所，看到按摩院或卡拉 OK 之类的店铺，我总是保持敬而远之的距离，唯恐不小心瓜田李下，跌入安全局设下的局，那就跳进黄河洗不清了。

已热篜到受不了的程度，我们终止熏浴，走出"琴箱"冲了冷水，然后曲廊内几经转弯，被导入一宽敞的按摩大厅。长沙发上躺满了半裸的男客，像一群肉墩墩堆在岩岬上的海豹，或大腹便便，或皮肉松弛，均换上大裤衩，懒散地把脚伸到低头工作的女孩眼前。我和弟弟也躺了下来，海豹般厕身其间。

喝着冷饮，我想起一月前初到上海的经历。那是我进入中国的第一个早上，走在南京西路上，急于找地方先理了长得太长的头发。时间尚早，正街上的国营理发馆都没开门。我信步走向背街，挂着"发廊"或"发屋"招牌的店铺随处可见，都是小门小户，各具装饰。有一间已开了门，我随便走了进去。里面有四五个不美也不丑的女娃，看样子都是外县来的打工妹。她们的打扮时髦得走了样，特别是脚上的新式凉鞋，几寸厚的底子，简直像在脚板上粘了两块蛋糕，踩在地面上，不走路都显得累赘。我迟疑了一下，然后说我要理发。她们说师傅等会就来，说着把我让到座位上，同时问我要不要先来个按摩。几个女娃立即围过来看我挑谁做，其中一个矮胖的附身向我，柔声柔气地邀我去里屋服务。面对墙上的大镜子，一瞥自己胡子拉碴那副民工相，心想她们一定看出了我外地生客的模样。我立即警觉起来，什么理发馆，很可能就是变相的色情服务场所。我随即恐惧起来，嘴里说着"不要，不要"，起身就走了出去。

直到躺在一家国营理发馆放倒的椅背上，热毛巾捂住脸，剃刀轻旋鼻孔，刮过了耳轮，十个手指甲过瘾地抓挠起头皮，我的身心才整个地松弛下来。好久没有这样享受过了，只有在中国才有如此舒服的理发服务啊，我从心底发出了叹息。晨光很明媚，电扇凉快地吹着，我闭起眼睛，一任那位男理发师在我头面上熟练地操作。随着淹没已久的感受渗出记忆，我的触觉才渐渐与所置身的现场对上了号。

但我现在与那女孩在我脚上施加的作用还对不上号。弟弟显然是这里的常客了，他满意地享受着另一个女孩的按摩，显得司空见惯，旁若无人。我这两只脚还是初次受宠，对那些据说有保健效果的烦琐手续，一时尚不太习惯。特别是面对那女孩眉清目秀的面庞，以及她始终温和的态度，我首先对自己伸到她手中的那只灰指甲大脚丫子产生了自惭形秽的感觉。这足底按摩整个过程长达四十五分钟，每一个脚指头，每一处足底部位，都在她的纤指下反复经过揉搓、按压和拍打；为调整用力的轻重，她还不时向我问长问短。看见她用劲时皱起眉头，我不由得生起消受不了的不安。我不再好意思注视她专注工作的面孔，开始盼望早点结束这繁复的按摩过程，让我的脚赶快从不自然的状态中解脱出来。

接下来还有背部按摩，时间更长。我对弟弟说，未必真有什么保健效果，恐怕只有变换着花样赚你的钱才是真的，尝一次新奇也就够了。弟弟对我的反应颇感失望，他说我美国住了多年，看来确实是越住下去越书呆子气了。

弟弟已提前退修，有个自己的公司，生意做得还算不错，比起从前靠工资吃饭的日子，他现在要过得富裕自在多了。他热心赚他的小钱，更有兴致花钱买成都人喜好的种种休闲享受，在这个日益势利起来的社会中，他活得潇洒而得意。在他们住宅区空地上所停的私家车

中，也有他新买的别克牌轿车一辆，忙完了业务，他常开上车带全家人去外地的风景点度假。“美国有啥了不起的？”这次西藏旅游途中，弟弟嘴里多次冒出这一类颇带情绪的大话。他的意思显然是说，我们这些出国去圆“美国梦”的人想过的中产阶级生活，现在他和他周围的很多人也都迅速在国内实现了，甚至实现得更容易，档次更高。中国正在经济起飞，确实有不少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在物质消费上过上了完全不次于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生活，弟弟产生这种扬眉吐气的心情，是很自然的，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再加上官方媒体经常散布的反美宣传，潜移默化中就滋长起这种浮躁的乐观和护短的骄气。

出了按摩院，我们驱车去吃夜宵，喝着冰镇啤酒，弟弟再次劝我不要乱写批评时政的文章。按他的看法，我离开中国已久，对这里的复杂情况并不完全了解，写文章随意发议论，难免有失实片面之处。他也不赞成我和海外的民运人士过从甚密，说我是有正式工作的人，又不靠民运吃饭，何必招惹无谓的政治嫌疑。比如，我在香港《明报月刊》上署名发表那篇支持魏京生的文章，又把复印件邮寄给国内的亲友传阅，在他看来，就纯属多事之举。“反正你不是搞政治斗争的材料，”点起一根烟，弟弟对我说着，习惯地也递给我一根。我没要，我早已彻底戒了，连烟味现在都闻不得了。弟弟接着往下说：“与其花费时间写文章骂共产党，我看你还不如利用目前在美国大学教书的优势，多和国内的大学建立学术交流关系，经常回来搞些开会讲学的活动，也在文学研究界出头露面，风光风光，叫师大的霍教授和交大社科系那些人看看，好坏也出上一口气。你这次回来也看到了，到处都在开发旅游点，中国好玩的地方多了。你要是没写那些无聊的批评文章，每年暑假回一趟，咱哥儿俩多跑些地方玩玩，该多痛快！可你偏要给自己找麻烦，你看你现在，拿着正式邀请回来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还免不了担惊受怕，连去个娱乐场所都疑神疑鬼，提防有便衣跟踪。”弟弟最后总结说，“中国现在变化很大，各方面正在改革，自由活动的空间确实比从前大多了。只要不公开发表批评，不搞反政府的活动，你赚了你的钱，就能过你的舒服日子，甚至能享受到美国也没有的很多自由。”我没反驳他什么，章艺和萧宪也都持类似的看法，我回来蹍见的不少人都是这样说的，都是笼统地说他们“这几年日子过得好多了”。除了最近在成都结识的廖亦武几个边缘文人，没有谁愿意和我谈论“六四”平反的话题，我提起海外的民运人士及其活动，几乎所有的人都做出了没有好感的表示。

成都人最大的兴趣就是打麻将，很多茶馆都特设喝茶和打牌两用的桌子，喝茶时可用光面，若想打牌，翻过来即为绒面的牌桌。听成都人说，该城每天有一半以上的人口都在麻将桌上打发时光。最叫我感到滑稽的发现，是在某些小巷深处看到的街景，那里常有些门面挂出了“老年俱乐部”招牌，门前吊下一大块蓝布，口罩一样掩饰住那陋屋的入口。蓝布上醒目大书：“高尚娱乐，禁止赌博。”但你若从那儿经过，里面总会传出耳熟的声响，有稀里哗啦的搓牌声，有高一阵低一阵的争执声，其中以年轻男女的嗓音居多，显然不全是所谓的“老年”，更听不出有什么“高尚”。 我想看一下究竟，便走了进去，只见一群玩家坐在其中，都是一副赌徒之意不在赌的样子。输赢在赌徒间一圈圈轮换下去，整个的过程就像一条嘴巴咬住尾巴的长蛇，吞咽和排泄串通在一起，吃的和拉的始终是同一种东西。回国一个月了，我走了六、七个城市，我看这个后毛邓时代的中国社会，整个地就遮在那成都式幽默的大蓝布背后，大量地制造着物质和精神的垃圾，乃至人的垃圾。

我能理解弟弟的关切和好意，我知道很多普通的中国人都持这种现实的态度。但我告诉弟弟，我实在做不了他希望我做的那些事情，就是我想做也做不到。人的选择不只由意愿支配，同时也受能力的限制。孟子所说的“不为”与“不能”肯定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我已在前面指出，我因发觉自己动手操作的能力较差，才退而浸淫文字。长期以来，在阅读和写作中自得其乐，而同时也招惹了接二连三的麻烦。经过十几年的强迫改造，后来又蹍到读书深造的机会，我本可以另选个远离这“文字累”的专业，但受能力的限制，我还是报考文学，随后干了教语文的职业。我就是想学弟弟去开公司赚钱，我干得了吗！我因此向弟弟解

释，我所坚持的“反动”，并不是权衡利害后所选择的政治立场，而是我发自性情的生存态度。世上的事没有“反”就没有“动”，正是有了不同的声音，有了对抗的力量，这个世界才有了运动、发展与活力。当局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说穿了就是党权高于一切，是要绝对保住当权者的既得利益，不许发生任何冲击党权的变动。都说现在比过去好多了，可在公民应有的几个主要权利方面，本质上与毛的时代仍旧一样。

我并不是不想常回来走动，多做些学术交流活动。我的文化之根毕竟扎在这块土地上，即使是在南京路上舒服地理一次发，整个的感受都深深连系着过去五十年理发的经验。包括上夜市上与亲友喝酒聊天等很多只有在中国才能享受到的乐事，在纽黑文寂寞的夜晚，百般无聊时，我都不知向往过多少次了。

已近午夜时分，成都的夜市依然不显冷落，我继续与弟弟喝酒，让酒兴激发我们的谈兴。在酒力的作用下，我忍不住向弟弟倾吐出胸中的块垒：“你以为我出了几本书，在美国的名牌大学当了个中文教师，回到国内就自然在学术界受欢迎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学界亦如商界，学术交流中也有很大的交易成分，你得善于经营，占据了有利的位置，还得不断在学问外多下功夫，才能打进学者的圈子。并不是每一个自以为把学问做好了的学者都能得到承认和接纳，学术交流也需要一定的投资，就拿我现在的情况来说吧，我如果没在美国接待过别人，人家为什么平白无故要在我回国时热情招待我呢？但我只是个很普通的语言教师，并没有能力为那些想出国访问的学者提供任何方便，我又没兴趣和耐心搞太多的应酬事务，你说说，像我这样人事关系上从不做任何投资的人，凭什么从美国一回来就肯定会受到欢迎和款待呢？所以说我并无你所说的优势可以利用，就是有，我也不会利用。至于参加学术会议，这一类学者的宴飨聚会想起来挺热闹的，置身其中，也就是那一回事了。平庸的文章太多，你得会做四平八稳的评论，假若不善于摆出貌似公允的态度，偏要提太尖锐的批评意见，你就会造成冒犯，成为会议上不受欢迎的人物。比如在这次南京会议上，其他人做评论，大都只说正面意见，即使是对某些很差的论文，也都稀泥抹光墙放过去一把。但我说不了假话，轮到我评论，忍不住认真地指瑕纠正起来，挑起了争议性话题，不经意给人家那学术融洽的幕布上戳了个口子。学术会议嘛，我看我这一次也就开到尽头了，往后恐怕再没有哪个会议组织者愿意请我这种砸摊子的人物。说实在的，这才是我这个人的‘反动’本质。自打走上人生舞台，我天生的嗓门就决定了我这个大唱反调的角色。我长了精神反骨，回顾从前坎坷的经历，我首先是忍受不了庸众的恶德，随后才发展到与中共的党权体制格格不入的。这块土地实在不适合我生存，即使没有来自安全局的威胁，我的回国之行也不会有什么荣归感。‘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 / 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这是我耶鲁同事和酒友愁予两行有名的诗句，引在这里，就作为我当前境况的比兴吧。来，咱们再喝一杯。”和弟弟蹭了一下玻璃杯子，喝完了杯中的啤酒，最后我对他总结说：“回这块土地，全是为了和亲友相聚，就像你我现在这样陶然放言的时刻，才是最珍贵的。让学术和政治统统见他妈的鬼去吧！”

“果子，你喝醉了吧？”弟弟有点舌头发硬地问我。

“没有，啤酒是喝不醉的，很快就尿出去了……”

弟弟让服务员继续上酒，我们直喝到弟媳开车来接我们回家。

弟弟要留我在成都多住几天，我说“六四”敏感期也该过去了，我得尽快回西安处理祖父母和父亲的迁葬事务。6 月 11 日，我乘火车回到西安，15 日即受到安全局拘审。抓我的地方并不是我曾担心的娱乐场所，而是我母亲家，是八个人开两辆车，一大早敲开门，不由分说就把我强行带走的。

五十二　噩梦还在恶

我母亲住在东关景龙小区红楼拐角上一个小单元内，两个卧室，厨房的一半扩入封起的阳台，给不太大的客厅留出了些许空间。母亲自解放一直在中学教数学，退休多年后几经争取，1994年才从原单位购得这套住房。这红楼交付使用至今不过六年，从里到外都明显地陈旧起来，门扇关不紧，墙壁在剥落，卫生间的水管子锈迹斑斑，时有漏水或下水道堵塞等问题发生。听邻居说，像这样的建筑，就是当今媒体上常披露的那种豆腐渣工程。

1997 年，母亲来美在我家住过半年，那时她勉强能上街走动，还有兴趣在屋内读小说消遣。自返回西安，她行动日益艰难，身体在急剧的老化中失去了生活自理的能力。我 6月 11 日赶到家时，小保姆刚返乡夏收，正好由我接了她的班。我每天照料母亲的饮食起居，用轮椅把她推出推进，暂时还顾不上去会朋友。先和茆致谊通了电话，他很兴奋，急着要看我给他带回的书刊。也给老黄等朋友打去电话，与他们约定，一俟保姆返回，即刻安排聚会。

14 日保姆从乡下返回，我随即打电话约茆致谊，但打了多次，他一直外出未归。晚饭后，那小单元内闷热难熬，我出外散心，沿大路向东门方向走去。茆致谊到底上哪儿去了？我心里忽然生出异样的不安，模模糊糊起了疑团，很想立即就叫辆出租车去他家看看。昏黄的街灯下，路上的车辆在排队前行，进城的路实在让人望而生畏。堆在路边的垃圾发出腐烂的气味，走在人行道上，时见“发廊”、“洗脚房”、“按摩室”之类的招牌光彩闪烁，珠帘下传出嗲声嗲气的流行歌曲，弥漫的臭气中偶尔掠过飘忽的香风。

从街上回来已经很晚了，昏沉半睡中大妹打来了电话。她显得声情焦急，好像担心电话窃听，仅含糊地转告我，茆致谊他妻子刚才打来紧急电话，没说啥细节，只说叫我赶快离境。离境？出什么事了？我吃了一惊。不久弟弟从成都打来电话，重复了大妹的话，但也没说清到底出了啥事。已是半夜时分，我不知该朝哪儿出走，更怕惊动母亲，黑暗中一翻身又睡了过去。

我在人声嘈杂中醒来，好像有不少人进来找我。我立即起床走出卧室，见几个陌生人已进入客厅。一眼即可看出，是安全局的大队人马。我让他们先等一下，匆匆漱洗毕，稍作镇静，再次走了出来。环视了一眼客厅，我说着“人还来得不少，”拉个凳子坐下来，然后对他们说：“我并不认识你们。”

“今天就是叫你认识我们来了。”一个三角眼，瘦脸一下子拉长了的人搭了腔。他姓刘，是个科长，亮出的工作证上确实写着“西安市国家安全局”。

“请问有何公干？”我淡淡地问。

“听说你回来了，想搞个回访。我们经常对回国人员做这个工作，就是问你些国外的情况，希望你能配合。”

“那现在就问吧。”我向房门看了一眼，还有人陆续走进，坐的站的挤满了客厅。他们说家里有老人，怕有惊动，也嫌保姆在场，不便交谈，因此要带我去个方便的地方好好谈谈。刘科长特别吩咐我带上证件和必要的东西，说车在外面等着呢，让我现在就跟他们走。

“要拘留审讯吗？”我问刘科长。

“用词太重了吧，只是个回访。”他纠正我说。

“不迟不早，回访得也巧，保姆昨天才回来，你们今天一大早就赶来了。”我惊叹他们的行动及时。都躲避这么久了，真是冤家路窄，最终还是遭遇到了他们。

“来早了怕你走不开么。”刘科长巧于应答，他似乎要向我表示，他们确实体恤我在伺奉老母，因而特别人道地宽限了几天。就这样带刺儿的话一来一往地说着，我在他们的挟持下上了停在楼外的桑塔那轿车。避到底还是没避过去，我从心底发出了叹息。显然，我回到西安的一举一动，早已在他们监控之中。

车子在附近的电力技校招待所大楼前停下。他们七、八个人带我去餐厅先吃早点，然后把我引进了七楼 21 号房间。我看见其它房间还有他们的人下楼吃饭，像是刚下夜班的样子。看来昨夜已有人进驻这里，早为今天的回访做了准备。此刻一群人出出进进，都在准备各就

各位，看他们眼前这阵势，像是要动一番干戈。

刘科长一上来先验证件，他拿过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美国绿卡看了一眼，说先放在他们手中，顺便奚落我说："别自以为得了美国绿卡就是特殊公民了，你这护照可是公安局发的，说给你扣下也就扣下来了。"说着，他把我的证件往身上一装，拧身走了出去。

不时有人出进，有个脸色阴沉的女人，姓王，是他们的处长；还有个胖子，姓黄，瓮声瓮气的，是副处长；另有几个年轻的，都是一般工作人员。空气中一阵凝滞的沉默，注视着这些陌生的面孔，就像街道上突然遭到围攻，我浑身一下子积聚起拼命的紧张。

其他人很快都离开了，屋内只留下两个人。一个姓周，他在食堂吃饭时就堆起笑脸说他早就和我打过交道。我说想不起来了。他说我出国才几年，这么快就忘了熟人。他叫我再想，我说实在想不起来。他说那就让他告诉我吧，78 年 12 月底在市局向我宣布平反的是他，"六四"后在交大审查我问题的还是他，现在把他从市局借到这个项目来工作，为的就是我们俩人熟好说话。

现在老周坐在我面前开始问话，另一个年轻的在一边记录。说是交谈，实际上就是审讯，只不过刚开始口气温和一些。我当然和他们没什么好谈的，因此一开始就郑重宣告，既然是叫我来问话，那就从提问开始，我会尽力回答能回答的问题，但别指望我主动交代什么。老周给我让烟，我没接，他说那他就往下问了。于是由西安和我通信的朋友一直问到了海外的民运人士，其中特别问到了刘宾雁和胡平，并提到我发表在《明报月刊》上的"反动"文章，问我都给谁邮寄过我写的文章和《北京之春》、《民主中国》等"反动"刊物。凡他没点出姓名询问的亲友，我一律只字不提。尽量避免牵涉别人，这是我颠沛造次中处事的原则。因此他问我都给西安的哪些亲友寄过刊物，我起先一口咬定，谁也没给寄过。

老周很滑头，谈话的口气始终和风细雨，总是在拉闲话的过程中诱导我的思路，试探性地打捞些信息。他对我说，能叫我到这里来，当然掌握了确凿的证据，我再否认也没用。说他们安全局的工作就是要堵截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防止危害国家安全的印刷品四处扩散。同时他还劝我打消顾虑，说他们只对事，不对人，叫我来问话，绝不是要罗致罪名，借机整我。都等我这么久了，好容易蹿上我回西安探亲一次，请我来只是要当面查对一下，看我寄入的刊物都落在哪些人手中，如能按我交代的线索如数追回，这宗案子很快也就结了。

与老周的谈话上午结束，记录员拿来记录让我签字，我没有签，我不想给他们留下口供。现在还不知他们掌握了多少情况，我打算能顶住就先硬撑下去，看他们那葫芦里头到底卖的是啥药。

老周离开了，我躺在床上休息，见床头有电话，抓起来就打给了两个妹妹。我叫她们快给弟弟通知我的紧急情况，并让弟弟把我受安全局拘审的事火速告知耶鲁的张教授。我心里已做好最坏的准备，不管后果如何，现在先把这消息捅出去再说。总之，我得尽快争取外面的营救，绝不能让他们关起门打狗。

午饭后继续问话，刘科长和黄处长也加入进来，审讯的口气渐趋严厉。因为我拒不交代都给谁寄过刊物，他们很快就向我亮了底。

"昨天你不是给茆致谊打了一天电话都没打通吗？那时候他正在给我们交代你的问题呢。"刘科长立起三角眼对我说。"他如今也关在这里，什么都招供了。从他家搜出了你这六年来写给他的全部信件和你寄给他的书刊剪报，所有证据现在全在我们手里。连你这一次回来给他带了什么书我们都知道。是不是一本名叫《红鲨》的反共小说？这书是你去台湾时作者亲自送给你的，对不对？"我好像交手中叫对方照心窝重击了一拳，他们连我不久前写给茆致谊的那封信都细读过了！

接下来，黄处长扯出另一条线索，把他们掌握的情况长镜头一样推到了三年之前。那是 1997 年 12 月底，我从美国送母亲回西安，连那短短几天的私人活动，他现在也陈芝麻烂穀子地全向我抖搂出来。黄处长显然深谙审讯术，他说起话旁敲侧击，闪烁其词，拐弯抹角地

提示，神乎其神地诈唬，轰击着我的记忆，动摇着我的判断，使我陷入天网恢恢的错愕。审问中，他忽然笑眯眯地插话说："你那个相好请客欢迎你的情况，我们都知道。是不是在陕西师大她那个单元里头？那一次都去了些什么人，我们也很清楚。有你一个在外语学院教书的老同学，对不对？当时没动你，是想等你主动找我们交代问题。哼，你还以为我们啥都不知道，回到美国，照旧寄你的反动刊物。所以这一次就把你请来了。"然后他顺势提到参加了那次聚会的郗琳，问我都给郗琳寄过什么东西。

连一次普通的私人聚会，他们都了解得这么清楚！我想起来了，是那位约我写书的主编在她新分到的单元里举办的一次聚会，当时她刚从河南调到师大，正巧蹴上我回到西安。我是在那里会见了郗琳，就在当天晚上和他发生了一场不愉快的冲突。我非常惊讶黄处长把当时的场景点得那么活灵活现，好像我那年冬天回到西安，行动都有摄像机跟在背后。就像得知自己的裸体被谁偷拍了一张，惊恐之余，我胸中涌起一丝受辱的愠怒。这算是什么国家安全呀？尽搞了些无聊的窥视和窃听，捕风捉影，囤积了一堆垃圾情报。但黄处长却显得颇为得意，他之所以特别向我点出这些片断，就是要让我知道他们神通广大，什么事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刘科长更有些低级趣味，他还戏谑着问我，"这次回来见没见到你那个相好？"

聚会，她，郗琳，还有外语学院的老黄……听着他们点出的这一切，我困倦地合起眼皮，暂时陷入了回想。现在看来，郗琳当初的过敏反应和高度警惕是事出有因，不能全怪他神经过敏了。

郗琳在师大教书，是个喜欢深思而刻意追求原创的学者。我在师大读书期间及其后，常同他一起交谈，思想交锋中也曾受到他不少启发。但我们俩读书的根基并不一致，性情差别更大。我的文化资源来自我早年泛览的经史子集，而郗琳则从马恩经典文本受到的陶冶更多一些。与我一贯率性放言的作风不同，郗琳在言行上向来力求谨慎，在这个政治气候变化无常的环境中，他最怕惹上不必要的政治麻烦。但这种树叶落下来都怕打了头的胆小只是郗琳的一面，他同时又很关心时局，提起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不公平现象，他强烈的底层关怀每每溢于言表。郗琳文革时属于草根造反派，虽经过多年学院生活的摧残，谈到当初那种平民主义的反体制诉求，他至今仍显得十分怀旧。早在八十年代中期，何清涟尚未出书，"新左"思潮更未露头的时候，郗琳就发出了他们的先声。可惜他那腔义愤始终活埋在他人格分裂的地层中，说到底，他也只会在唾沫星子上激进，对任何要冒风险的异议活动，他一直都避之惟恐不及。也正是基于这一人格分裂的立场，他认为我没有政治头脑，不懂得斗争策略，总是批评我书生狂气，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尽管我与郗琳时有分歧和争论，但对他在学术上极度的边缘处境，我一直都持理解和同情的态度。因为我在学者群中也是个被视为异类的人物。后来我出了国，有了帮助友人的条件，首先想到的就是他这个最落寞的朋友。但不幸就在代替他投稿和给他寄刊物的具体事务上，我们俩起了冲突。

五十三　行行重行行

秀芹不断打来电话，催我立即返美。我对她说，西安就是风险再大，我也得办完迁葬的大事才能离开。我说我会事事谨慎，处处小心的，叫她不要胡思乱想，不管怎么说，安全局总不至于无故反悔，再把我抓回去审问。听从了弟妹们的建议，受拘审的事，我对外人一律闭口不提，原订的朋友聚会也大都取消，同时密切提防安全局暗中监视，连打一些重要的电话，我都专门上街用公用电话打出。

我去新旺村拿回了祖父母和父亲的骨灰盒，顺便看望了众乡亲。

村内的建筑布局完全变了，原来南北走向的村道已改为东西走向。包括我们那三间红机

瓦土屋在内，早先的旧屋已全部拆除，新开的村道正好从我们原来的庄基地上通过，路两旁新盖起一家家一砖到顶的混凝土预制板大房。听村民们说，盖房的钱大多数来自出卖地里的沙子，若仅靠地里的出产或出外打工，他们今辈子也盖不起这么好的新房。

新旺村地处沣河西岸，我来此地落户时，沣河基本上还保持着自解放前以来的自然风貌：河水清可见底，河床是厚厚一层洁净的细沙，河两岸芦苇弥望，河堤上两行白杨树钻天高，夏日里清风吹过，一阵阵哗哗的声响。但截止八十年代末，这样美好的村野风光已消失殆尽。为供应城里基建工地的用沙，村民们掏尽了河里的沙子，每逢秋季雨涝，挖空了根底的河岸便常被洪水冲垮，大片的芦苇丛随之消失。后来上游又大量截用河水，地处下游的五席坊河段从此常处于半涸状态，干河道露出难看的泥底，布满了挖掘沙石留下的深坑。

但城市基建需要的沙石依然供不应求，沙源的开发于是转向了地下。新旺村的耕地下掩埋着早先沣河泛滥时冲积的大片沙滩，挖去表层数米深的沃土，下面就是很深的沙层。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全村各户便以出卖责任田内的沙子为业。十几年下来，沙子全部掏空卖净，平坦的耕地到处挖出了十几米深的大坑。村民们所得的唯一好处就是用卖沙的钱盖起了满村的新房。现在他们要进一步牺牲祖传的耕地继续换钱用，听说不少农户已与工厂签了合同，让工厂在自家地里的大坑内倾倒工业废料。据他们的乐观估计，等那些大坑填满垃圾，只需盖上厚厚的土层，就又是一片可以耕种的良田。

能很好地恢复原貌吗？我不太相信。

我提起不少乡亲的名字，听到的多是人已死亡的答复。队长银嘴与我同岁，听说已在几年前死于糖尿病。按照国栋的描述，银嘴是穷人害了富贵病，他病情越重，饭量越大；吃的越多，人反而越瘦，本来是狗熊一样的身躯，临死前瘦成了一把骨头。我在四队墓地见到了银嘴的坟墓，不由得想起当年在地里干活时和他的一段对话。有一次银嘴指着这片墓地对我说：

“春来，你离不开新旺村了，我看你将来也是那里头一块油渣坨坨。”

“你也未免把世事看得太死了，”当下我就顶了银嘴。我说：“山不转水转呢，你以为我这‘反动分子’的罪名就一辈子背到底了？”我拍了一下胸膛，继续对他说：“敢给你打保票，你们新旺村绝非我康正果久留之地。”我特别用了我的原名。反驳了银嘴，我还有点不忿，又大声对在场的几个人说：“都听到银嘴刚说的话没有？等哪天我离开新旺村，我可要叫你们出来作证呢。”

“咱俩打个啥？”银嘴还不服气，他有赌瘾，随时都想和别人打赌。

“算了吧，等我将来有了钱，多给你买几条好烟还不成了？”我不想和他打赌，我宁愿奉送他想赌的东西。一转眼，离开新旺村二十年了，没想到竟走得这么远。这一次回来，我确实想见了银嘴，多给他买几条好烟，没想到他说的那句损人的话先落到了自己头上：他早已变成了四队墓地里头的油渣坨坨。

我还想找到银嘴的舅舅牛顶汉，给他多留些钱。顶汉从前老是找我借钱，但我总没钱借给他。每次借钱落空，他便满脸不高兴。顶汉毕竟是我在新旺村落户的介绍人之一，又常在我受人攻击时替我说话，想从我手中得些好处，本是很自然的事情。后来，这没能从我手中借到钱的结局，便成了他心中的恨事。对顶汉来说，没沾上光就等于吃了亏，因此我能理解他的不满，也确实想满足他的愿望。可惜他已死于胃癌。早在他病死前，他那个甘肃女人就喝农药自杀了，带来的一儿一女都回了甘肃。顶汉身后什么都没留下，为抢先拆他仅有的几间房屋，一大堆债主发生了冲突。

与李宝玉年纪相仿的人差不多都死了，经常吊着两道鼻涕的傻子来水也死去好几年了。离开纽黑文时，秀芹一再叮咛我，见了来水一定要给他一百元。她说那时候她常让来水帮她照看小庄，进城后早就想报答一下来水，无奈我们那时候手头一直很紧，实在挤不出钱赒济别人。现在能拿出一点钱了，却永远错失了还那个人情债的机会。来水至死都是光棍儿一条，

连能代替他接受报答的人都找不出一个。

选民领上我在村里挨家挨户走了一遍。我见了粉旦她妈，她正好在她家新盖的大房门口乘凉，看样子人还硬朗。选民说她今年八十四了，新旺村如今就数她年长。我走上前向她问好，她说她眼睛、耳朵还都管用，还能给她那个一直打光棍儿的老四做饭。我想问粉旦的情况，话到口边，却咽了下去。老人家穿着依然如昔，旧式的大襟衫子还是土布做的，人坐在平铺地面的芦席上，伸出了她那双新旺村最后的小脚。

去了放民家，放民没在，但见到了放民他爸。我跟选民走到后院，在一间黑洞洞的小屋外，选民往里面叫道："世全爷，我春来叔看你来了。"过了一会，世全扶住门框，艰难地走出房门。他肿起的脚面上还沾着失禁流下的尿液，行步间引得成群的绿头苍蝇围着他打转。老队长完全变痴呆了，他似乎认出了我，嘴巴动了两下，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面对他呆滞的面孔，我想起了他当年任副队长时的威风。那时他每天早上把上工铃敲得当当响，高喉咙大嗓子在村道上吆喝着社员上工。派完活，泡一壶茶，茶壶端在手中，他边走边喝着，从这块地赶到那块地，严厉地督促社员们干活。监工时他专找软弱可欺者的岔子，训起人常带一脸的煞气。每干到太阳偏西时分，地里就有很多人拄着锨把磨起洋工。一看见这种偷懒的情况，世全开口便骂："你毬塞到烟囱里头——往黑咧磨呢！"他骂他的，我们磨我们的。他骂一阵子，见骂不动我们，只好叫大家先歇下来，等天快黑时再收工。为什么？怕收工太早，其他社员见了不好看。大家都在混生产队的工分，混到底还是自己哄自己。那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自生产队散了伙各干各的，世全没人可管可骂了，人也就慢慢蔫了下来，从此再提不起精神。现在他成了一具行尸走肉，脸上全无昔日的煞气，只有那两道浓眉还蛔蛔儿一样扒在眉棱骨上，由墨黑变成了灰白。

我想起了我和老队长之间的很多恩怨，特别想到了和他在地里发生的一次冲突，就是在玉米地浇水时构思我的五言律田园诗那一次。那天我把渠水放进玉米地，躺在井边的树下养神，正好叫世全抓住了现场。他走上前来，指头指着我，开口就骂，骂了很多难听的话。我回了嘴，他立即暴跳如雷朴过来，像是要动手打我的样子。我用劲推了他一把，没想到竟把他推倒在刚浇过水的地里，坐了一屁股黄泥。这一下可捋了虎须，他泥脸泥手，揪住我领口不放，硬拉我去见了队长银嘴，口口声声说我"反动分子气焰嚣张，大白天殴打生产队干部"。他要让银嘴作主，扭送我去大队处理。银嘴平常就和世全不对劲，此刻见世全一身泥水的狼狈相，正想在一边看他的笑话。银嘴不但没助长世全，反而压了他的火气。世全咽不下那口气，下午收了工，带上俩儿子和他那个小脚老婆，气势汹汹来到我家门口吵闹，全家人摆出了围攻我的阵势。我也不示弱，回去捞起我伯土改时当民兵用的红缨枪跑出来，张翼德一样叫喊着，挺在门口。放民本来就是我的手下败将，见我手里拿着家伙，他和他哥最终也没敢冲上来打我。世全为人，一贯欺软怕硬，后来见我在村上站稳了脚跟，又常给队上进城办事，再加上他儿子跟着我学修马达，他也慢慢地靠拢起我，在各方面都给过我不少方便。

现在那一切早成为过去，我思前想后，归根到底，还是要感谢老队长待我的不少好处。农村人就是这样的命如草芥，老人尤其活得艰难。一个不折不扣的贫农，从土改到合作化，好坏也跟党积极干了三十多年，到头来却沾不上党权体制的任何福利。老了，干不动了，还得靠儿子养活。而害了病没钱看医生，就只能这样苟延残喘着等死。选民告诉我，放民整天在外面跑着挣钱，儿媳妇就把老人安顿在这后院的黑房子里头，由他屎尿拉着，独自臭在那里。

儿媳妇练练见公公出来丢人显眼了，赶过来吆喝他进去，他退到房门口，显得有些畏惧。我掏出五十元一张的票子，叫了声"世全叔"，递给他，叫他拿上零花。他颤抖的手还没伸过来，就让站在一边堆起笑脸的练练接了过去。练练的态度变得比刚才温和了一些，她扶公公进了屋子，就像把她养的什么家畜关进了栅栏。

四季听说我回村，也赶过来看我。他还是那么油黑，红眼子不红了，牙却让烟熏得更加

黑黄。他说他日子过得还好，养了公猪、公羊、公狗、公猫，专门搞配种服务，月收入一千元左右。我和他说笑，叫他“配种专业户”。他还是从前的脾气，爱在人跟前落好，老向我提说他对我的好处，也很重视我记不记他的好处。我说我当然忘不了他对我的帮助，特别是我伯葬礼期间他主持丧事的功劳。我要给他留些钱，他不要人民币，只要了两张美元，说留下来作个纪念。

国栋夫妇跟小儿子一家住一院新房，大儿选民和老婆孩子住一院新房。他们的日子依然过得很勤俭，各方面都比从前好多了。他们父子总是乐于帮我干活，听说我来迁葬，都拿上镢头和铁锨跟我去了墓地。三个骨灰盒陆续从李宝玉坟旁挖了出来，当初下葬时全用塑料袋严实包扎，至今还都保存完整。这些年来，因有这三个骨灰盒埋在李宝玉坟旁，弟妹们基本上没断过上坟烧纸。现在迁走了骨灰盒，今后李宝玉这堆土馒头可就是真正的无主孤坟了。我在他坟头烧了最后一次纸。太阳白花花晒在头顶上，燃起的纸火转眼化成了一堆纸灰，随后一片片被风吹起，黑蝴蝶一样散落到才长出玉米苗的麦茬地里。四野静悄悄。

汽车在乡间的土路上颠簸着驶向沥青公路，回顾渐行渐远的村庄和田野，我在心中对那里的一切说了“永别”。

我和弟妹们，还有堂兄和堂姐，去骊山墓园安葬了祖父母和父亲的骨灰盒。祖父母合葬一个墓室，父亲另葬一个墓室，内有为母亲预留的空位。墓室上的青石盖子即为墓碑，上面均刻了被葬人的姓名和生卒年。二三十年了，他们总算有了永久安息的地方，而且是在临潼老家的土地上，南枕青山，北望渭水。

买这两处墓地，共花费一万多元，在干什么事都得花钱的今日中国，只要花了钱，什么需求都买得到。从前城里人死后要下葬，连立锥之地也求之不得，现在可好了，农村人为搞活经济，把他们无用的坡地、山地都开辟成墓园，专营丧葬服务。看着新修的坟墓整齐排列在山坡上，周围长满了花木，我静立在香火旁，为祖父母和父亲默诵“阿弥陀佛”。

离开西安的前一天，我约了二妹，推上母亲的轮椅，在东关转了一圈。人越老，行为上反而越显得小了。母亲行动越是不便，越是烦躁好动，最喜欢让人推轮椅带她外出转悠。见我和二妹要带她游东关，她高兴得就像小孩子要跟大人逛大街似的。我们在景龙小区的饮食摊点上吃了油条豆浆，然后沿兴庆路向南而去，先去了兴庆公园。

入公园东门，过一座木桥，来到空间开阔的沉香亭下。早晨的公园是老人的世界，草地上，花木夹道的小径上，散步的，做操的，打拳的，炼气功的，每一处空地都有人活动，其中尤以退休年龄的人为多。对比我前两天在新旺村看到的一切，在中国还是做城里人享福，包括我母亲这样的退休教师在内，所有从国营单位退休的老人，不管退休金多少，医疗保健好坏，大都享有能维持基本生活的社会福利。也正因为有这样的保障，才有这么多城里人讲究养生，有情趣锻炼身体。

兴庆湖上的船只比过去增多了，样式也更洋气了，湖水依然拍岸欲溢，但看起来不太干净。湖面上随处可见游客弃扔的塑料袋和饮料瓶，湖水呈暗绿色，发出了难闻的气味。我和二妹说着话，绕湖而行，把母亲推到北门附近，在一处僻静的湖边小路上，让她自己推上空轮椅锻炼走路。她缓缓向前走去，行步艰难而吃力，一走一跛，那膝关节骨质增生较严重的右腿几乎在拖拉着向前移动。走路对于她，已成了又痛苦又危险的事情。

母亲和父亲毕业于同一个大学，她学的是化学，解放前后都在中学教书。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平时总忙于上课和改作业，剩下的时间全做了家务。别人休周末大都贪睡懒觉，她的周末却过得比平时更忙更累。星期日她照样早早起床，屋内屋外大扫除，不只扫净自家的房间，还扫到房前屋后，乃至院子和大门口。扫完地，她回到屋内擦洗，从窗户到家具，到茶壶茶杯，直到所有她认为有必要擦洗的东西都擦洗得干干净净。早饭后，她开始洗全家一周来换下的一大堆脏衣服。不分阴晴寒暑，都是坐在屋檐下的台阶上，搓板搭在大木盆内，肥皂摆在一边，一件一件地揉搓，揉起满盆的肥皂泡沫。等洗净的湿衣服一件件晾满院子，常常已

是午后时分。她从没和父亲一起带我们去过任何游乐或度假的场所，很多次准备中的全家活动，都因她和父亲起了冲突而不愉快地作罢。一年到头，全家人唯一的集体行动就是节假日去寂园待上半天。到了那里，她有时候还要找出脏衣服去洗。

就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过着，清扫和擦洗成了她最重要的家务，久而久之，她在家内卫生上建立的种种规矩几乎达到了戒律般严格的程度。就在这学校和家里两头跑的劳碌中，母亲的半世浮生一晃而过，那一年她已干过了退休的年龄，校领导终于劝她正式退了休。这时母亲的两条腿已明显有了行走不便的症状。一直在医治，同时也一直在加重，最后就严重到不得不请保姆照料的地步。但在家务事上，她依然好强，固守着自己的陈规，任何人干活，她都看不上眼。自己干不了，还老爱挑剔别人，几年来用了好多保姆，没一个满她的心意，也没一个能跟她和睦相处下去。弟弟在成都，我在美国，我们两个都出不上力，她那些没完没了的琐事大都落到了两个妹妹的身上。其中二妹对母亲最有耐心，要说和母亲能比较和谐相处的，恐怕也就是二妹一个人了。二妹告诉我，母亲的最大问题是缺乏情趣，没有任何个人爱好。她教书、做家务忙了几十年，整个的人化入了事务主义的操劳，如今无课可上，又干不动家务了，生活反而空洞得成了无法忍受的负担。她不满子女的照料，不满自己的境况，开口闭口都是抱怨。

我把母亲推出公园西门，沿二中大操场边的小路北行，来到了寂园墙外。寂园旧日的围墙还有几段残存之处，但寂园本身早不存在了。那还是在毛泽东死后不久的年代，到处都开始纠正“文革”期间的过火做法，住在坑下观音洞内的三伯强行搬入了祖父的那间“精舍”，接着他就和堂兄一起向强占寂园多年的生产队正式提出归还全部房地产的要求。他们讨了好多年，不知费了多少口舌，跑了多少路，写了多少申诉材料，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才初步讨回了这块附着了不少房屋的八亩多土地。可惜我三伯已在此前饮恨而死，没等到物归原主的一天。

我比家中任何人都珍藏了更多的寂园旧梦，但对处理遗留房地产的问题，我并无太大的兴趣。后来由几个堂兄弟出面交涉，四处奔走，最终把这块地卖给了房地产开发公司，得了一大笔钱。那些年我在交大穷教书，每月的工资仅够维持生活，之所以还能买起彩电和组合式家具，靠的就是变卖寂园后分得的一份现款。现在那里面盖满了丑陋的楼房，一栋挨一栋，挤得像鸡笼子，遍地铺了水泥，连长一根青草的缝隙都没有。我向那里冷漠地扫视了一眼，匆匆推母亲走了过去。

从寂园西拐，进入二中所在的街道，就是当年墙上画满了大跃进壁画的龙渠堡。巷内的旧式四合院已拆除殆尽，自然再看不见从前那些临街的墙壁。二中也面目全非了，包括我家卖给二中的老屋在内，街两边的房屋都与记忆中的位置和外观不一样了。只有巷口那棵古槐还在固有的位置上垂下浓荫，以它金石般的枝干抗拒着岁月的侵蚀。在古槐的周围，不知何时砌起了一圈砖墙。经过询问，才得知是为了起保护的作用。在被认为是迷信盛行的旧社会，从没听说这大槐树是棵神树，如今欣逢改革开放的后毛邓时代，古槐却无端升格为神树，突然受起了很多人的崇拜。据说，前来拜神树的人又是在树下烧香烧纸，又是给树上披红挂彩，十多年来络绎不绝，有一次竟在树下引起了火灾。地方政府不得已才垒起砖墙，索性将古槐与外界隔绝。我住足远望，树枝上果然挂了很多红布条，砖墙外还有残留的香火。

我们乘出租车进城，去饭馆吃了午饭，再乘车去开通巷旧宅，这是我告别之旅的最后一站。母亲在这个大杂院住了四十来年，院内七八家住户，同辈的老人中，现在只剩下了母亲和依然住在那大院门房内的王太太。我把母亲留在王太太的房间内，让两位老人叙旧，独自到院内转了一圈。这院房原为母亲她姨家所有，后来前半院被房地局没收，我们前院的住户遂成了房地局的房客。房地局为了多赚钱，几年前拆了院内的旧屋，盖起两层简易楼，从前到后，一间连一间填满了原来的院子。原有的四合院格局不存在了，住户已增至三十多家。

与母亲的情况相同，原来的老户都搬入单位新建的单元，把各自在这个院子内的住房转

租给新住户。新住户全是从外地来西安打工或做小生意的乡下人，他们没有本市户口，各方面都比持本市户口的居民低人一等。城市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原来住在旧城区的居民纷纷迁入新居，他们把自己在城内原有的房屋都高价出租给外地人。我母亲在院内的三间住房也高价转租出去了，每月可得一笔不小的租金。城里人，特别是属于国营单位的职工，如今都从公有制的解体中分得了一定的好处，而体制之外的农村人，在离乡流入城市的过程中，处处都得付出代价，破费名目繁多的冤枉钱。

匆匆办完西安的事务，我告别了家人，乘火车前往北京，再从北京飞回美国。他们都不放心我上飞机前的这一段旅程，由大妹陪我同行，一直把我送到北京。她要到机场亲眼看着我上了飞机，看着我乘坐的飞机飞出北京的天空。

五十四　打破沉默

2000 年 7 月，我一路平安回到了纽黑文。中美两地的亲友，差不多都责备我不该在依然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情况下贸然进入中国。弟弟告诉我，那天听说安全局抓走了我，他立即给北京的美国大使馆打去告急电话，但使馆人员得知我只持有美国绿卡，便向他致歉说，我还是中国公民，他们不便直接过问。弟弟说，要是早知道会让我冒这么大的风险，就不叫我回来处理迁葬之事了。其实早在我筹划回国之初，张教授就多次告诫过我，说像我这样受当局监控的人物，还是取得美国国籍后再去中国比较安全。但当时我急于参加南京会议，也很想借机会会朋友，硬是没听她劝阻，径直回了西安。事后她非常严肃地对我说，这一次多亏有耶鲁大学校长及时出面求援，有美国高层直接插手营救，否则，我很可能就在西安长期关下去了。

身为中国人，连那个公民身份都成了易受威胁的弱点。回的是自己的国家，竟比待在外国更缺乏安全。这样的国家到底是谁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当公民，又有多大的权利可言？想到这恼人的国家认同问题，我不由得联想起成都麻将馆所挂的那块蓝布。国家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门面，是幌子，不过给肆意危害公民安全的党权赋予庄严的名义罢了。自 1949 年以降，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都因“反党”或“反革命”之类的罪名遭到批斗、关押、判刑和处决，迫害之广泛，前所未有。现在共产党早把自己搞臭了，崇高的革命事业也不再吃香，那可怕的旧罪名随之失去杀伤力，就像一把杀人太多的刀子磨损了锋刃。但其限制和镇压的本性依然未变，为更加有效地以新方式继续压制，“危害国家安全”或“颠覆国家”之类的新罪名遂应运而生。国家的大旗被高高举起，给一群“爱国贼”做了虎皮。人生有限，灾难无穷，在党权依然窃国的情况下，对这个国家，我看我还是远远躲开为妙。就像从前拆掉了我那间土屋内无用的土炕，现在这手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我也该尽快作废掉了。

回到纽黑文，我迅速通过入籍手续，取得了美国国籍。这一年我五十六岁。仍旧是为避地安身，我再次改变身份，在我的美国公民证和护照上签上了“Zhengguo Kang”这个英文姓名。孟子说过：“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雀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而在今天，驱赶成千上万华人投奔自由世界的，正是危害公民安全的中共政府。

就在那一年秋天，我们卖掉纽黑文市内的殖民地式小屋，举家搬入新买的郊区住宅。怀着受创的野兽挪窝养伤的心理，我卜居在环境更为安静的奎尼皮亚克谷地。但愿能通过避地的方式彻底摆脱旧时的恶梦，从此与中国，也与过去的一切划一条界线。

这郊区新居是一座宽敞亮堂的平房，前院有草坪花木，后院有游泳池和树丛环绕。秀芹盼了好多年，现在她终于有条件搞点园艺，可在业余时间重温她与土地和庄稼的亲切感触了。她环游泳池摆上各色耐开的盆花，在花季常提上洒壶给她心爱的花卉浇水。在后院向阳处，我给她开出一块菜地，她托人从中国带来各种菜籽，种上了黄瓜、豆角、青辣椒等中国蔬菜。

她那块小菜地连年丰收，除供我们日常食用，还有多余的送几家朋友尝鲜。

我有了宽敞的书房，隔着玻璃滑动门，纵目可见露台下一池清水，高大的山毛榉枝条茂密，绿中发红的叶子在露台上空搭起了凉棚。我和秀芹分了工，种菜养花的细活由她负责，粗重的体力活则由我包干。读书写作之余，我春天翻地，夏天剪草，秋天扫落叶，冬天清理车道和小径上的积雪，那一年我躺在交大办公室床上看画报时所向往的情景，已成为当前日常生活中一幅幅美丽的插图。这住宅占地半英亩，总面积约为寂园的四分之一，但家家四周均无封闭的院墙，邻里间草坪与草坪相连，庭院与庭院隔树相望，松鼠、兔子和不知名的飞鸟从这家游荡到那家，来游泳池戏水的野鸭子有时来不及回窝，仓促中都把蛋下进了池边的草丛。可以说，这整个的街坊，就是一片住家户共享的园林。一位住在西安东关的老同学见到我家住宅的照片后，有一次电话上颇有感慨地对秀芹说："果子就是有住花园的命嘛，他们生产队毁了康家园子，人家如今可在美国买下新的了。" 每当晨昏，室内外一片寂静，面对眼前的一切，我常想起住在寂园的日子。为早年乐园的失而复得，我不由得默诵观世音菩萨，同时好奇地参悟着事物运转的秩序，很想弄清楚，从祖父的念佛焚香中，我都沾了些什么善缘。

当年在寂园住过一位名叫赵顺的青年，他本是孤儿，早先收养在祖父主办的救济院中，后来在祖父照顾下读书上学，能书善画，曾一度在寂园刻经处担任写经的工作。七十年代末，赵顺从家乡来西安访旧，在三伯处小住数日。听三伯话及祖父晚年的遭遇，又目睹了寂园在生产队占领下的破败景象，赵顺感慨欷歔之余，就在三伯栖身的那间"精舍"内挥笔染彩，凭记忆之仿佛，摹写寂园图一幅，留赠三伯，然后满怀苍凉地归去。三伯将此画裱糊装轴，悬挂在"精舍"墙上。三伯去世后，我的堂兄弟们都忙于办理索要房地产的事务，孙子辈中只有我不切实际，依然对纸上园林，意中庐舍，情有独锺。埋葬了三伯，那无人眷顾的寂园图遂归我收藏，后来带到美国，挂在了我纽黑文住宅的书房内。再往后，书房不慎失火，此画随同中国带来的一架子书籍全部焚毁。幸亏我手中还留有一张寂园图的彩照，弟弟在成都请画家临摹那照片，为我另画了一幅。新画寄来，我赋题画诗一首，请孙保罗长老书于其上。其诗曰：

蹈海鲁连不帝秦，此生欲老纽英伦。
游魂不复识归路，聊写丹青作梦寻。

2001 年春，孙长老来纽黑文教会布道，我将寂园图装框挂于刚布置起来的客厅，就在我家新宅，秀芹请来中国教会的同仁，为孙长老办了个接待聚会。孙长老在台湾曾受国民党多年迫害，有过一段不堪回首的遭遇。后来他信了基督教，更名保罗，移居北美后一直虔诚奉主，再也没回过中国。我并不是基督徒，也不打算信教，对孙长老布道的演讲谈不上有多么深刻的领会，但对他断然弃绝旧我的决心，重塑新我的勇气，我一直都真心地敬佩和叹服。孙长老只读《圣经》和与之相关的书籍，其它闲杂文字，一律摒绝于外。平日除潜心自修，他尤致力拯救他人灵魂的事务。我拘审西安期间，为我的平安归来，孙长老曾连续祈祷达一昼夜之久。

孙长老常说，我历尽磨难后突然举家迁美，乃是神的旨意，很希望我也能像我妻子秀芹那样信教。无奈我始终俗念深重，至今还不想弃绝我的文字积习，孙长老所走的那条救赎（redemption）之路，离我依然很远很远。就我个人目前的特殊情况而言，所谓"救赎"，也只是用文字述说自己屈辱的经历罢了。我无意于诉苦，更没有劲头去发泄或怨诅什么，倘若通过这言辞的抗争，能够较为真实地呈现出我自己，以及爱我助我者或恶我害我者所陷入的境况，从而赎回我决不反悔的尊严，也就差强人意了。我很清楚，仅停留在文字水平上的个人救赎只是救赎的开始，真正的和彻底的救赎，是要靠全民族的具体行动去完成的。我知

道在举国沉醉的今日，个人能做的实在有限，但不管怎么说，能有更多的个人提起笔说往事诉痛史，总比群体沉默和全部忘却要好多了。

从中国回到纽黑文，我最想诉说的，就是我在西安受拘审的经过。但我并没立即公开我在西安的经历，没接受媒体采访，没发表文章，没听从魏京生的建议去美国国会的人权听证会上作证，甚至连熟人问及事件的经过，我都避而不答，一再地缄口。就这样，对那一段受拘审的经历，我保持沉默几乎一年之久。

这一屈从的态度实在不符合我这个人以往处事的脾性，不要说别人，连我自己都想不通我何以会如此胆怯地紧闭起嘴巴。

我确实有诸多难言之隐。我不是不想说，而是在打算公开说出时有所顾虑。我已答应了人家的要求，在"检讨书"中保证要维护安全局工作人员的正面形象，要把我受拘审的经过像国家机密一样封存起来。那天临放我时，王处长听说我毕业于陕西师大，便说我和她还是校友，随即以主人的姿态邀我跟他们全体工作人员一起去吃晚饭。我坐的仍是抓我时那辆桑塔那轿车，不由我分说，汽车就把我跟他们一伙人拉到了一家火锅店。我被招呼着与全体工作人员围圆桌坐定，说话间，菜肴和白酒陆续摆了上来。规训我惩罚我的任务业已完成，他们为此而设宴庆功，要自己犒劳自己一番。夹在他们中间，进入这曲终奏雅的饭局，只有我吃在嘴里很不是滋味，一股子滑稽和反讽的辛辣：我在用吃下的生猛海鲜来补偿我三天受辱的精神损失，我在与加罪于我的一伙人最后达成为他们保密的攻守同盟。在今日中国的商品经济年代，这一场抓了人又放人的恶作剧竟以奢华的消费收了场。杯酒间，他们再次施加影响，对我做了不少封口的奉劝，口气一直都显得人情味十足。比如说，我母亲上了年纪，我即使不打算常回西安探亲，那最后一次的送终之孝总得尽吧。再比如说，即使我一直到那时候才回到西安，他们仍有可能找我"回访"。刘科长甚至插话警告我，说就算我入了美国籍，我在美国的言行照样也会受到他们的关注,我若继续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他们安全部门随时都会通知纽约的中国领事馆，叫我拿不到进入中国的签证。

这一类软硬兼施的话，我相信，他们肯定对很多很多被"回访"过的回国者都做过精心的灌输。这就是受过骚扰的人至少数以千计或万计，而回到言论自由的世界，愿意或敢于将真相公之于世的人少之又少的原因。

我缄口的另一个原因，则是不想辜负亲友们郑重的叮嘱。从我释放后回到母亲家，直到我返回纽黑文，家人和耶鲁诸同事都多次告诫我，不要随便对人乱谈自己拘留和获救的细节，即使在美国，也该处处谨慎为好。从某些人说话的口气中，我隐隐能敏感出，似乎连校方和参与营救的有关政府部门，都不希望我重提旧事。难道他们对北京方面有所承诺，要我从此缄口不成？反正所有的私人关切都是好意，他们那讳莫如深的态度就像块丝绒手帕捂住了我的嘴巴，温柔得颇令人窒息。我毕竟曾受惠于人，若仅为快意一时而打破沉默，岂不有负那么多人的恩情？

就这样憋了将近一年，窝得我一肚子英雄气短的别扭。

当你感到自己的执拗连累了别人的时候，当好心的劝阻者对你的顽固表示失望的时候，你有时候就会不自觉地淡下了那曾经要抗争下去的决心。正是处于周围的亲友普遍都希望我屈从、妥协、不要再多事的善意关照中，我看到了中共那无远弗及的淫威。

中共的淫威不只来自其制造迫害的势力，同时发自它拥有的资源和巨大的诱惑。他们毕竟劫持了如此之大的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国家、团体和个人都免不了与他们控制的政府打交道，与他们共享了很多利益。正是存在着这一特殊的情势，即使身处自由世界的很多人士，也不得不考虑自身的名利和兴趣与中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遭遇了这一连串麻烦的事件，现在我才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从美国政府到美国大学，直到那些可敬的教授们，都有其不愿意得罪中共政府的一面。

原来，人心的畏惧多源于其所受的诱惑，而魔鬼的欺世、混世与扰世，便由此而得逞。

天主教主教猥亵男童的丑闻之所以一再在揭发过程中受到阻挠，正是包括受害者父母在内的天主教内部人士施加了压力。他们并非无视那一罪恶，而是不愿意给他们共享的荣耀抹黑。

隐恶与扬善于是在神圣的理由上达成了默契，我辈小人物只得蜷缩在恩与威的夹缝中，把自己被打断的牙齿吞进肚子。

2001 年夏，林培瑞教授介绍《高教记事》(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的一名记者找我，就中国学者海外归来遭受安全局骚扰的问题，该记者对我做了采访。我从此打破沉默，公开了我的经历。接着友人摩妮卡和她先生又从中鼓励，我才把我西安受拘审的经过写成长文在报上发表。该文随即由林教授译成英文，以 Arrested in China 为题，在《纽约书评》上刊出。一时间各报刊竞相转载，海内外公众才惊异地得知，至今在中国，安全局还在搞偷拆邮件，陷人于罪的阴险伎俩。

我是为表白自己和清除心头的阴影而说的，也是想让更多的读者看到真相，向他们提供参考和教训而说的。我还要让世人知道，中共及其权力机构一手遮天的时代已成为过去，他们对自由呼声的限制和压迫虽然依旧，但外界的对抗力量也在发挥日益增强的作用，对他们的为所欲为，已有了相当的遏制。因此，我要再次在这里提醒，一个人一旦落到安全局手中，绝不要为侥幸过关而企图与他们“私了”，应该尽快把事情披露出去，尽量争取外界的营救。最近笔名“不锈钢老鼠”的女孩终于获释的事件说明，在今日中国，任何一个异议人士受到迫害，都会立即牵动国内外争自由争民主的良心，都会迅速引起外界舆论的反应和营救。

回到纽黑文，我再没有给国内邮寄过任何印刷品。不是我不敢寄，而是没有必要再采用那样老旧的方式传播当局禁阅的文字。高科技的应用在魔术般迅速发展，才不过几年光景，互联网已整个改变了这个世界信息交流的方式。中国的网民已近一亿，现在大家都在用电子邮件及其附件和链接等方式有效而迅速地互相交流信息。正是通过了网络，蒋彦永大夫要求立即平反“六四”的上书一夜之间传遍了整个华人世界，焦国标讨伐中宣部的檄文引起了雪片般赞同叫好的跟贴。防火墙挡住了这边，却拦不了那边；网警可以抓住杜导斌，却对越来越多的刘晓波、余杰式人物无可奈何。封杀是徒劳的，堵截是愚蠢的，广阔的网际世界已扩展到防不胜防的地步，我们深信，魔高一丈的日子拖不了多久了。

五十五　秀芹

那年初到美国，我们一家人刚在纽黑文橘街上住下来的时候，秀芹和俩孩子人生地不熟，时差又没倒过来，终日闷在家里睡觉看电视。一两周之后，秀芹瞌睡睡完了，乏也歇够了，她开始独自外出，常步行去附近的中国店买东西，很快摸清了周围的路径。她动起脑子，有了盘算，说是不能再这样闲待下去，得马上找个活干干。但他们三人拿的是 H4 签证，暂时尚无工卡，又说不了几句英语，要走出去打工，一时半晌，还很难找到门路。

在家里闷得心慌了，秀芹就去橘街上走动，注视着来往的行人，她特别留心长得像中国人的面孔。有好几次，她用普通话向她看准的陌路人主动打起招呼，可对方都做出了没听懂的表示。回到家她向我提说街上的遭遇，我对她解释说，没准她遇上韩国人或日本人了。但她并不气馁，继续上街，不揣冒昧地碰她的运气。有天下午，居然蹴了个准，当街就交上了一对来自山东的夫妇。老两口在此地照看小孙子，七月底要回国，儿子和儿媳妇都在纽黑文干全职工作，正急着找个人看孩子。事情也凑巧，孩子他妈来自西安，跟秀芹谈起各自所住的街道，两个人越说越近。从八月一日起，那八个月的孩子就送到我家，白天全交给秀芹照看。男孩本有英语名字，我叫不惯，就用西安人叫小孩常用的名字叫他臭蛋。家里有了臭蛋，秀芹新奇地用起一次性方便尿布，从此围着婴儿车欢快地忙碌起来。

忙到月底，秀芹五百块现金挣到了手。与很多初至美国的中国人一样，对手中美元的价

值，她还习惯按一块换八块的公式折合成人民币估量其多少。在交大幼儿院干了好多年临时工，她月工资仅有五六十块，两相对比，她初次真切地感到了劳力在美国的价值。也正是基于她个人这一点有限的经验，谈起初至美国的肤浅感受，那时候秀芹总是说："美国啥都不好，就是美元好。"

每天早上，秀芹给臭蛋换好方便尿布，把孩子在婴儿车上络紧，便推上车子去橘街北口的东岩公园，在草地上会其他推婴儿车的中国妇女。她向她们打听情况，收集信息，目标明确地琢磨着适合自己做的事情，从此跟上几个婴儿车妇女，在纽黑文日渐扩大起活动的范围。

我忙于教书，俩孩子都上了学，秀芹每天带上臭蛋出外活动，慢慢熟悉了纽黑文的街道和华人圈子，还结交了几个开车的妇女。那时我们还没买车，只能去步行可及的地方购物，自从她有便车可搭，便常去远处的廉价商店采购食物和日用品。那便车不只带她去商店，蹭到礼拜天，偶尔也把她带到本地的中国教会。起初去那里，秀芹只图多了解些情况，多认识些人，看能蹭到什么更好的工作机会。后来她教会去的次数多了，赞美诗唱出感情，祈祷中渐受感召，熏习既久，遂发愿信主，正式受洗，成了本地中国教会中积极参与活动的一员。

也许是上帝赐了福，秀芹不久即蹭到大好机会。第二年春天，附近一家医疗器械厂（US Surgical Company）招收临时工，秀芹应招去那里干上了装配工的工作。辞别了东岩公园的婴儿车妇女聚会，她生平头一次在大公司当上了工人。她所在的车间专门装配外科手术所需的针和线，活路并不复杂，边学边干着，只要一双手能灵巧地穿针引线，就足以胜任那个工作。秀芹从小干惯了活，也很爱干活，进入那清洁的恒温车间，她很快就熟习了日常的工序。一天到晚，她干得勤快而又欢快，手中的定量总是完成得又快又好。就这样干了一年多临时工，秀芹顺利转为全职工人。这全职工作享有假日、医疗保险、劳保与退休保障等福利，除非出差错犯了厂规，一般都不会无故遭到解雇。这待遇放在中国的国营单位，就叫"转正"，像秀芹这样人到中年的临时工，一没文凭资历，二无任何背景，在中国就是干到底，也捞不到那个社会主义的铁饭碗。人常说，饥者易为食，寒者易为衣，这全职装配工的条件和待遇毕竟比在交大幼儿园当阿姨优惠多了，因此秀芹十分满意和珍惜自己的工作，蹭上了加班加点，一次都舍不得放过。起先她上下班搭同事的便车，后来千难万苦，总算考上了驾驶执照，从此自己开一辆二手车，高速公路上来回地跑了。从什么都不习惯到逐渐适应环境，秀芹对美国的感受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几年之后，她那种简单化的概括方式又有了新说法。我问她如今感觉如何，她对我说："美国啥都好，就是英语不好。"

秀芹来美后，个人的各方面都随环境变化而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改进，唯独英语，迄今进步不大。她所在的那个工厂是重手不重口，只要工作中常用的几句英语听说没问题，就能凑合过去。她常说她在"联合国"工作，那里集中了来自世界各国的移民，从中国人、越南人、老挝人，到波兰人、俄国人，直至说西班牙语的南美人。工作语言虽是英语，但若在休息时步入咖啡厅，不同语种的工人各自成堆，说的都是各自的母语。正惟其员工族群多样，厂方特别重视强调多元文化的价值（diversity），只怕在政治正确性上弄出什么岔子。

从前在中国，秀芹这个无技术、可替换的劳力一直都被排斥在体制之外，受尽了低贱的待遇，没想到迁居美国，有了工运和民权、女权运动成百年奋斗争得的权利做后盾，人家的大树下，她反得到乘凉的好处，比从前在自己国家的处境要洒脱得多了。都活到了四十好几，扎根在异国他乡，秀芹才有了活出身份和个人尊严的感觉。因此她总是深有感触地对人说："在美国，你只要吃苦耐劳，就有活干，就能把日子过好。只要你不犯法，谁也不会干涉你的自由。至少你绝对不需巴结上司，不必害怕领导，反倒是职位越高的人，越得对职位低的人表面上一团和气，一言一行都很谨慎，唯恐有什么把柄叫下边的人抓住。从没听说要给当官的送礼这回事，反倒是我们职位低的人，每年生日，都会收到由公司总经理签名的贺卡。尽管我们心里很清楚，那只是个形式，但不管怎么说，当穷人还是当在美国好啊。"

听秀芹常说，她周围的很多中国妇女都是实在混不下去才跑出来的，然后都在美国的土

地上住出了家园感，住得不怎么想回中国了。至于中国那边的情况，她认为，偶尔打开中央电视台四频道，看看上面报喜不报忧的节目，信一些疑一些，记一些忘一些，也就可以远望当归了。她告诉我，这些年来，只有一件事牵动她回国的念头，就是想回去还些拖欠已久的“人情债”。

2003 年 10 月，秀芹利用她三周的休假，回了一趟中国。三周后，她返回纽黑文照常上班。我断断续续问了些她归国的见闻，现据当时的笔录，撮叙如下。

母亲身体的老化日益加剧，身上的关节越来越僵硬，头脑也越来越糊涂，她再也指使不了保姆，只好住进了养老院。但母亲一贯好强，始终不服老，据说至今都不安于那里的生活，时常闹着要回她东关的住所。平日和弟弟妹妹通电话我能听出，对老太太的固执，他们都很苦恼。因此秀芹一返回，我先问了我母亲的情况。

秀芹对我说：“在临潼养老院，老太太现在住的是单间房，有专职护理日夜值班，你妹妹淑智和淑慈经常轮流去那里看望，方方面面，照顾都很周到，总的情况，可以说很不错了。这一次我把老太太从养老院接回她红楼单元住了几天，给她洗澡洗头修剪了脚指甲，还专程推上她去看了她妹子，特别替你向你五姨和姨夫问了好。总的来说，你妈的身体还不错，我认为长寿是没问题的。她最大的不满是嫌把她送进了养老院，所以对儿女一肚子怨气，不管你怎样伺候，从她嘴里都难说出一句满意的话来。”

听秀芹讲了母亲的现状，我感到难受，但也无能为力。也许人老了，就变得这样不讲理了。各人的不适，最终还得各人独自承受，母亲要是什么事都想不开，老是怨天尤人，恐怕谁也无法改变她别扭的心情。

秀芹向来不喜欢沾别人光，但也绝不要别人沾她光。对她来说，受人恩惠而未能及时报答，便负债一样于心不安。这就是她所谓的“人情债”。

秀芹常对我说，她在中国生活了四十二年，想起从前所过的日子，几乎每一天都活得十分辛苦。有很多困难关头，要不是个别亲友出来帮一把，都不知道当初挺不挺得过去。她说后来我们搬到美国，她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经济上可以独立自主了，才初步具备了送钱给人的条件。但我们初来定居，要供给孩子上学，要还购房贷款，手头仍比较紧张，好多年过去了， 她都顾不上回国探亲。现在两个孩子都参加工作，负担轻多了，她这才打算回国一趟，去看看帮助过我们的亲友。

我让她给我详细讲她的行程，她说：“这一次回去，我来去三周，没游山玩水，没逛商场，也没专门去美食城吃喝解馋，除陪老太太在家里住了几天，其它时间，全用在走亲访友上了。包括你五姨等亲戚在内，凡住在城里经济情况好的，我都是买上礼物，专程登门看望一次。住在乡下比城里人穷的，根据具体的情况，多少都给留些现款。有些亲戚已上了年纪，再不趁早去看望一次，说不定哪天病倒去了世，就会酿成终生遗憾，补救不上了。还有些人，对你有过好处，总是很在意你惦不惦记他们，你要是置之不理，他们就会满口怨言，好像他们吃了你的亏。对这类人，尤需重点看望，适当满足，从此堵住他们不满的嘴。我就是要还这样的‘人情债’，还完了，也就两清了。”

“那就从你们银杏沟谈起吧，家乡的变化怎么样了？”我问秀芹。

“变化可大啦。我妹子从西安火车站接了我，出去就上了直达丹凤的大巴。从前狭窄的环山道都加宽修直，改善成单行的高速公路。一路上，汽车钻了一连串山洞，过了一座又一座新桥，行车格外快捷，三个钟头就开到了铁峪铺。下车后，从沟口到我家，我们转乘三轮摩托客车，从前背背篓脚踏出来的山上小道已修成土公路，虽说路面不太平，但各种机动车辆开上去，凑合着都可以通行。如今这沟里，拉东西一律用拖拉机，个人外出多骑摩托车。到处都通了电，差不多家家有电视，个别人家还安了电话。最大的变化是落实了退耕还林的政策，‘农业学大寨’时期开出的山坡地，现在一律不准再种庄稼。只有河两边平旷处保存了少量农田，山上全种上树木，交私人经管，谁也不得乱砍滥伐。”

“那粮食够不够吃？” 我问秀芹。

“地亩是减少了，但产量比从前生产队的提高了很多，再加上政府供应商品粮，补偿退耕还林的损失，大多数年轻人又在外打工，留在家里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孩子，粮食大都吃不完呢。村里到处盖起新房，乡亲们都说日子比在生产队时代好过多了。不过新房子盖得可不容易呀，哪像城里人，住房靠单位分配，他们低价买回原来分到手的住房，都不知从国有资产中捞走了多少好处？打个不好听的比方，城里人就好比公有制豢养的家畜，衣食住行，均有政府可依靠，可怜农村人向来都放逐在公有制之外，野生动物一样地自生自灭，城里人享受的福利，一件都轮不到农民头上。政府只要不来骚扰，不过多征收，农民就谢天谢地了。按照乡亲们的说法，最好的政策就是，把旧政策统统撤销，再不要乱搞新政策了。”

“那新房上的一砖一瓦，都是出力流汗换来的，个别人甚至贴赔了性命。我们银杏沟大概有五六百人口，年轻人差不多都去煤矿或金矿上干活，为个体老板下井卖命，几年来，死于矿井事故的就有十五六个。算起来，一百个村民里有三个人便死于非命！农民的命不值钱呀，死了就白死了，没死的还在拼死去挣钱。”

“我今年五十一岁，乡亲们见了我都说我咋这么年轻。那些与我同龄的妇女，她们结婚早，生娃多，她们的儿女同样结婚早，生娃多，不过五十岁左右，大都是膝下孙子一大堆。再看看她们的外表，头发白了，牙掉了，一个个都劳累得一副老太婆模样。”

我接着问起秀芹她家的情况。

秀芹说：“与大多数乡亲的情况差不多，我弟弟家也盖了新房，他们粮食够吃，靠地里种的药材卖些钱。弟弟夫妇俩一对老实头，两个儿子也都生得憨厚嘴笨。没想到那两个闷头儿都挺会读书，我这次回到银杏沟，乡亲们都说这俩娃有出息，给我们方家争了气。那老大在县城的重点中学读高三，一心准备考大学。老二正读初中，成绩比老大还好。我们方家总算熬到了今天。我走得最远，远得出了国；我妹妹跟上她当司机的丈夫，早住进县城，也有了工作；我弟弟全家虽在银杏沟，幸好俩孩子勤奋努力，将来总算有了盼头。我弟弟对我说，俩孩子若能考上大学，不管多苦，他都要供给他们读下去。只盼他们将来在城里找到工作，把方家的根从这穷山沟整个拔出去。”

听秀芹讲着现在的情况，我同时也想起了过去的事情。秀芹已好多年没回家了，她父母咽气，她都没在跟前，连下葬的日子，也没赶回去奔丧。她说她恨那个地方，实在怕回到家跟村里那些“活鬼”生气。那一年她父亲尸首停在家里，生产队的干部不准他们公开办丧事，不准任何人帮他们挖墓下葬。当时大搞阶级斗争，搞得连死人都不放过。大队会计公然扬言说：“不许反革命埋在集体的土地里，就让他臭在他自己家中。” 后来，是秀芹她姨夫和姐夫大着胆子挖了墓，才偷偷埋了她父亲。我因此向秀芹问起她父母的葬地以及那些恶干部的现状。

秀芹说：“我给我爸我妈上了坟烧了纸，守在那坟头，想起从前的事情，我当下放声痛哭了一场。生产队是扯了，但原来的不少干部还在位子上留着。阶级斗争当然早过时了，可有权有势的还在害搔平头老百姓，他们都在变着法子谋各自的私利，地方上出了不少新型的恶霸。听我弟弟说，附近有个镇长，敲诈勒索，干尽了坏事，不知逼急了哪方的仇家，竟被乱刀砍死在树林里了。”

“你说山里人眼光短浅不短浅，如今我家事事比他们强了，村里的人又眼红起我们，把我们苦尽甘来的现状与我父亲的墓地胡拉扯到一起，纷纷传说那是块风水宝地。就是在我父亲下葬时闹得最凶的那个大队会计，他现在不但不嫌弃我父亲的反革命帽子，反而打算把他的墓修到我家墓地里，将来好埋在我父亲的上首，一心要占那宝地的一席风光。为此，我弟弟已和那家伙大闹了一场。我对弟弟说，他嘴上打算就由他空打算去呗，等他真的在我家墓地动了土，就花钱请个律师，把他彻底告倒。”

被砍死的镇长，风水宝地，大队会计对死后的打算……秀芹所讲的事情听得我匪夷所思，

既深感义愤，又觉得滑稽可笑。思来想去，无以名状，看来还是“活鬼闹世事”这句老话说得最恰当了。

我见过秀芹的姨夫，顺便问起了她姨夫。

秀芹说：“我姨夫是个老实人，因亲戚关系，受了我们这反革命家庭的不少连累，那次偷偷埋了我父亲，就害得他陪我妈挨了批斗。这次我回到银杏沟，特意看望了我姨家。姨夫得了癌症，已是晚期，我给他多留了些钱，姨夫拉住我的手流下了眼泪。我还去王家园打听到我表叔的地址。王家园就是你和竹引初次见面的那个村子，那表叔就是冒险帮我家种自留地的亲戚。表叔家里穷，娶不起媳妇，早去黄龙县上门落了户，好多年都没有音信。还有我堂兄，就是开拖拉机带我游西安的那个堂兄，听说已从合阳县拖拉机站退修多年，日子过得也不太宽裕。我抄到了表叔和堂兄的地址，和我妹子专程到县城邮局给他们各汇了两千块钱，还给我堂兄写了封信，感谢他那年把我带到西安开了眼界……给我表叔的那笔款子真是汇得及时，回到纽黑文才从电话中得知，那表叔得了绝症，收到汇款时，已是病床上活不了几个月的人了。”

既然提到王家园，我顺便问秀芹见没见竹引，我很想知道竹引的现状。

“当然见了。” 秀芹答道。早就听秀芹说过，我们结婚不久，竹引也结了婚。竹引谈了个本村的现役军人，本指望那人复转后到国营单位工作，没料到匆匆结了婚，那人复转回来，照旧当了农民。他身体不好，连年看病花了不少钱，拖垮了家里的经济。秀芹说，这一次她俩见了面，她觉得比她小一岁的竹引面老多了。她也给了竹引一笔钱，说竹引搂住她肩膀，失声哭了起来。

“她感激你，还是触动什么伤心之处了？”我问秀芹。

“你不知道，竹引是个很好强的人，看到现在，想起从前，一时的心情复杂，当然是可想而知了。”秀芹对我解释说。

是的，人有时候有些复杂的心情，的确是说不出来的，也许只有哭出来最得体，哭上几声，也就哭得顺理成章了。听了秀芹的解释，我心里就这样想着“哭出来”的问题，然后问她：“后来呢？”

“后来，竹引就向她丈夫介绍了我，还特别提起你那年跟尹师上来找对象的事情。”秀芹接着往下讲述。“她对她丈夫和女儿说，起初尹师要介绍她，她不愿意你，才让给我，叫我跟你去了。竹引的话说得她丈夫和女儿连声为她感叹。那女孩十七八，小孩子说话，直露得可爱，当下就说她妈：‘你不去，让给人家去，现在叫人家好了。’孩子她爸在一边接了孩子的话茬：‘人家会来事，你妈不会来事么。这也是命，各人都有各人的命，谁也替不了谁啊。’我接下来向他们解释，也给竹引圆场。我说，那时她就是去了，过不了几天还会走的。我说你那时情况糟糕透顶，像竹引那样好强的性子，跟上你这种危险人物，根本不可能过到一起。”

从丹凤返回西安，秀芹专程去新旺村一趟。去那里，她说所还的“人情债”大都是我的。我写这本回忆录时，时常想起国栋和选民对我的好处，秀芹临行前，我特别叮咛她，也要给他们送些钱去。因此，讲完了回丹凤的事情，她接着便给我详细报告去新旺村的情况。

“你托我报答新旺村乡亲的事，我全部照办无误。该给的都给了，还是农村人老实，不像城里人那么挑剔，他们多少得些钱，都显得挺高兴的。国栋等几家人，还给你送了自己织染的格子布单子，说是你喜欢那东西，让我带给你，你会当工艺品看的。至于我自己，说句实话，对那村子没有啥感情，今辈子也就是这最后一次了。”

最后，秀芹给我讲了她在西安拜访几个朋友的情况，说她特别去看了茆致谊和郗琳。茆致谊和郗琳都在安全局的施压下写了保证，保证和我断绝来往，永不向我索要违禁印刷品，也不接受我邮寄的此类读物。对我讲完了从那两位口中听到的情况，秀芹就用幸灾乐祸的口气嘲讽起我。她说：“人家安全局算是完全达到了目的，把你那些反动宣传堵死了。你说你

图个啥？自己花了那么多邮费，结果不但丢了西安一大堆朋友，还叫人家把你彻底在国外孤立起来了。怎么样？你不接受也得接受，反正你那些东西，现在就是想寄出去，也没人可寄了。郗琳还特别叮咛我，叫你不要随便给西安的朋友打电话，说安全局现在有了特殊的技术装置，凡是你打进来的电话，都能监听得到。你在外边你安全，你当然不怕，但人家圈在里面，你得替人家着想：人家接了你的电话，可要承担风险!”

茆致谊人显得老多了，对这位仁兄，秀芹说，她确实怪同情的。他退休太早，住的还是原来的小单元，看样子日子过得并不十分如意。本来和我通着信，他封闭的生活还有个微弱的出气口，可以发发牢骚，谁能料到，就这么一点小草发芽的自由，也叫安全局连根掐死了。听着秀芹的描述，我完全能想象出茆致谊那一副百无聊赖的神态，那一堆脏衣服一样的心情：自从他贸然跳上南下的火车准备偷渡香港那一刻起，他对自由的渴望就一直悬在半空，坐井观天，徒叹白云，在公安局眼皮下窝囊了大半辈子。茆致谊算是叫中国社会害到底了。

秀芹去了师大，她说郗琳家另换了房子，面积不小，装修得挺排场的，看样子日子已奔了小康。谈起中国社会的现状，那夫妇两个口气和调子都很正面，这些年来，改革开放的实惠，他们显然陆续沾了些小光。秀芹还说，提起我，郗琳依然耿耿于怀，说我太冒失，强人所难，对我的事情，一副不以为然，也不屑染指的神气。他还在生我的气，但我从没生他的气。甚至对他现在的态度，我也完全能够理解。人都想往高处走，处于他如今正教授兼博导的地位，疏远原先的边缘立场，与当局努力保持一致，当然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秀芹继续往下发她的感慨，并向我提出现实的建议。她劝我说：“西安这一团线，你干脆就此缠起来吧。你妈还健在，有你妹子两家人照顾，能和这几个亲人时常保持个电话联系，也就够了。其它的关系，我看你就任其越走越远，淡漠下去好了。还乡这事情，实际上并不是我们身处异乡的人向往的那么风光。你知不知道？连治病救人，到处受欢迎的耶稣，回到家乡，都难免遭人扔石头围攻。何况我辈尘世凡人，哪招惹得起家乡熟人之间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这一次，我回西安，走丹凤，既为了却心愿，也顺便想试探一下人情世故。试探的结果不太如意，所以就下了决心，打算与这块土地从此永诀。我没流泪，也不伤心，满怀平和的心情，在上海浦东机场上了前往纽约的飞机。”

秀芹的话说得我有些失落，也有些省悟，满腹的乡愁无形中随之蒸发，水落石出般矗立起就地安心的信念。我凑了一联律句，自吟自咏着，自励自勉。其词曰：“浪子出门莫反顾，英雄在外不还乡。”接着就对秀芹说：“我看将来老了，咱们在纽黑文周围找个好墓园，买块墓地，死了就埋在北美算了。”

尾声

小稼和小庄早长大成人了，没人再叫他们的小名，都叫他们康倩和康庄。康倩那一年好容易签上了证，硬是在入境大门往紧关时挤了进来，险得差点夹住了尾巴。果然如签证官所料，康倩读完高中就上大学，毕了业便找到工作，再也没回中国。第一步，她同她弟她妈一起跟上我拿了绿卡；第二步，我入了美国国籍，她和她弟随后也办了入籍手续。

俩孩子来美时年龄偏大，在中国又没学好英语，我当时最担心他们跟不上学校的功课。张教授对我说：“孩子在孩子群中学语言，其势如骑驴赶驴，你放一百个心好了，要不了几年，他们的英语都会说得跟美国人一样好的。到了那时候，你恐怕还要担心他们忘了中文呢。”

我们住在橘街，要上公立中学，俩孩子只能在东岩公园旁的学校就读。此地为纽黑文市区，校内的学生肤色多样，文化背景各异，自不能与郊区的情况相比。按耶鲁同事的标准来衡量，孩子在那里就读，自然不够理想。但我有我的看法，对这两个才开始适应环境的孩子，我以为，入普通学校比入顶尖学校更便于启蒙。正惟其学生成分混杂，老师在教学上总是注

重全面兼顾，课堂的气氛才特别宽容后进。与中国的学生背个大书包上学的情景完全相反，这里的学生竟然没有课本，课本都在老师手中，上课时发下来，上完课就收回去了。俩孩子放学回家做作业，还得向老师借课本，由此可见课内外宽松的游学气氛。

我是当教师的人，对分数这种权宜之计的东西，心知其中水分的多少。我更明白，考试能力的较量，较量到底，不过是能否升学，以及能考到什么样的学校就读的问题。因此，对自己的孩子，我在分数上一向要求不严。但在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教学从政治挂帅转为分数挂帅，分数在取代政治的同时，它本身也政治化了。康倩在交大附中上学时常向我抱怨，说老师都宠爱那些学习尖子，连指定班干部和入团，也都优先考虑尖子学生，她分数考不上去，总觉得自己处处都入不了那个围。我自初中起，即因表现不好而倍受排斥，女儿现在又因成绩平庸而受起轻视，难道她要在一定的程度上重复我的命运？

只因康倩和康庄在本班考试名次常偏后，好多次家长会散了会，我都跟几个差等生的父母留下来另开小会，忍受班主任絮叨的汇报。不知被留下的其他家长回家后是否打骂过他们倒数第几名的子女，反正对班主任那些讨厌的煽动，我的反应一般都比较冷漠。我偏不觉得孩子成绩差丢了我什么人，反倒是对学校那种排名次公布成绩的方式，一直心怀不满。终于在一次家长会上，我忍不住站起来唱了反调，说成绩不管好坏，都是学生自己的事情，老是这样排名次搞评比，公开褒贬，恐怕是在歧视成绩差的学生及其父母了。我的几句话说得石破天惊，班主任当下拉长了脸，也引起了所有家长的侧目，那惊异的神色，不悦的表情，似乎都觉得我这个人神经有啥毛病。

康倩和康庄都是中等人才，逼死逼活，顶多也只能逼到中上，而放任自流，便容易滑入下等。在我的周围，我看见很多望子成龙的父母都在业余时间全力监督儿女的学习，他们的忘我和耐心大有分身为儿女之势。我没有人家那么悠闲，我要读的书都读不完，实在没时间过分过问孩子的功课，因为我不想自任他们的校外班主任。我认为，孩子若在放学后还需父母督促做没完没了的功课，那只能怪学校布置的功课太重。就这样，康倩和康庄在交大附中一直成绩不太好，后来就带着那样的成绩单转学到纽黑文公立高中。

好在这里的学校既不公开学生的成绩，也不把成绩当作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康倩告诉我，他们的老师一点也不像交大附中那么严厉，个个都喜欢夸奖鼓励学生。有个老师上课常带糖，就像在训练小狗，学生问题回答得好了，他当下就发给巧克力吃。有一次化学考试，临下课康倩没答完卷子，但她必须离开那间化学课教室，化学老师暂时收下卷子，竟叫她午饭后再次去那教室完成了考卷。天下的事就是这样无奇不有，此类事若发生在中国，校方不斥之为儿戏才怪呢。但对于英文尚差的康倩，我还是觉得，尊重而信任的松弛总比不近人情的严格更为有益。

我最讨厌争分数的学生，对那些差了几分没成第一名就哭鼻子的学生，我尤其没有同情心。我反而喜欢默默承受低分的学生，同时也以这一态度纵容儿女。但我的出发点不是溺爱或护短，我就是要在我们的家庭实践中对抗过分的分数挂帅和尖子学生中心主义。也许正是较少被分数教育扭曲的缘故，康倩和康庄的性格既活泼，又皮实，遇到困难，很少表现出承受不起的样子。就像盆栽的植株种进了露水繁多的泥土，他们固有的潜能开始受到激发，两三年内，都渐进地踩上了各自的生命鼓点。

康庄的中文表达力本来很差，写起作文，总是闷头咬铅笔杆，瞪着白纸发呆。有一次，面对窗台上一棵秋海棠，他咬着笔发呆，我看见他作文本上歪歪扭扭写了几句话，其中一句是："秋海棠啊，我要学习你在寒风中不凋谢的精神。"

"太夸张了吧？植物有什么可学习的？" 我问儿子。

"是老师叫这样写的，要像《松树的风格》那样，每人写一种植物，歌颂它的品质。咱们家就只有这盆秋海棠呀。"

对儿子的搜索枯肠，我深感同情，孩子的缺乏文才，我看都是语文课害出来的。我叫他

写不出来不要硬写，说哪怕交白卷，也不要养成作假的习惯。但我有时也暗自悲哀：俩孩子都不太热衷读书，与我小时候钻书本爱写作正好相反，他们全都贪玩。不抓他们的学习，在很大的程度上，只是我对既成事实的达观承认罢了。像这样的成绩，他们是很难考上大学的。确实，考不上大学，那是我当时对儿女最大的担忧。

没想到来到美国，康庄突然在英文的听说读写上表现出特别敏捷的能力。他是那种你越夸他好就越学好的孩子，没有指责的环境首先给他的积极性松了绑，再加上常受激励，又面临挑战，于是他这个闷头儿突然开了窍。第二个学年的暑假，通过几轮考察，他入选纽黑文中学生赴非洲参观团，去津巴布韦旅行数周，返校后所写的报导登上该校校刊，还得了奖状。交大附中有那么多父母从小精心培养的尖子学生，若留在那里，这类好事岂能轮到他头上！美国的公立学校教育也许水平低了一些，也许纵容了大量的懒汉学生，甚至养育了一定程度的无知，但有一点值得肯定，那就是给大多数中等学生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空间。分数有什么！

国内有些朋友常感叹我非常幸运，我对他们说："我自己无所谓了，再好，也不过从中国的名牌大学换到了美国的名牌大学教书。其实最幸运的是两个孩子，这一转学，真是救了他们。"

有一天康倩高兴地回来告诉我，她参加了学校美式足球校队的拉拉队，此后她课余长留在校内训练，周末则乘校车出外比赛。她活跃起来了，英语有了明显的进步，很快交上了不少亚裔和白人的朋友。听她说，这儿的学校可不像交大附中，赞美的目光并非只投向功课好的学生。成绩绝不公开，你就是成绩差些，也没人知道。你尽可以在其它方面表现自己，运动好，歌舞好，校内的学生组织活动参与好，都能赢得老师和同学的欢迎，连朋友交得多也算优点。康倩在交大附中的种种不足，转入美国中学，不但不再成为问题，反而有了转劣为优之势。

我十分庆幸，我和儿女的关系没有重复我和我父母的关系模式。回想我和父母之间几十年的相处，除了不断听到他们那些类似班主任或书记的告诫、批评之外，实在想不起多少能让我感到欢欣鼓舞的声音和话语。因为在他们眼中，我总是表现不好，总是在搅扰家庭，让父母担惊受怕，所以我不管做什么，都很少得到他们放心的支持和痛快的称赞。那时候，即使是我们家庭的日常生活，也在一定的程度上重复了我在学校、单位或公安局所受的训诫和限制。所不同的只是，父母对我的监督是为我好，他们的啰嗦是不得已，是怕我给他们惹祸。中国社会的泛政治化就是如此地无孔不入，几十年来，连在自己的父母面前，我都充当了"反动"的角色，而且"反动"到了忤逆的地步。和父亲的最后一面，竟是在恼怒的政治冲突中分了手。最近的一次回西安探望母亲，我伺奉她不到四天，这难得的母子团聚就以八个安全局人员一大早闯进家门，在母亲的惊慌中把我强行带走收了场。在写这本回忆录的过程中，每一想起父母的苦苦劝告，以及他们对我的失望和抱怨，我心中的愧咎感便与残存的抵触情绪一哄而起，就像半夜啃在旧家具上的鼠齿一样啮噬着我的陈年的记忆。

康倩高中毕业后顺利进了康州州立大学，她忙碌地打着工，紧张的学习中不时插入放松的玩乐，没花我和她妈多少钱，就举重若轻地拿到了学士学位的文凭。现在她住在家中，早出晚归，开车去一家附近的大公司上班。康倩一向人缘好，在集体中总是活跃分子，幸赖她周围的白领白人多对东亚人持"能干、勤奋"的正面期待，她往往付出六七分的努力，便能得到八九分的肯定。假日她总是跟朋友们出去疯玩，滑雪、爬山、滑轂辘鞋，到酒吧聊天到深夜，尽情享受她放松自己的活动。有时候她还拉我进去，鼓励我跟他的朋友们混在一起，聊发一阵"少年狂"。像我这样英语交流能力很差，常年局限在中文教学圈子内的人，正是通过和女儿、儿子的交谈，参加他们的活动，才间接了解了美国的社会生活，从中学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康庄高中毕业后参了军，他是在没和我商量的情况下报名应征的。那时候我们初至美国，

还没有积蓄，他看出了我供给两个学生上大学的困难。那一天从波士顿接受检查回来，他告诉我他要入伍，说在服役期间，他可以免费修完大学本科的课程，让我就供给康倩一个人读大学好了。三年后，他退伍回家，继续在网上读了半年大学，然后拿到大学毕业文凭。因为有部队当过三年后勤管理员的经验，很快就在纽约上州的一家大公司得到了车队管理的工作。

儿子在交大附中成绩比女儿更低，后来低到了处于本班渣滓学生的地位。好像要洗刷掉他当初那无以辩解的闷气似的，现在他得机会总要向我表现他各个方面的能力。几年来，我和康庄三天两头电话上交谈，大都是听他讲他工作中蹓到的种种问题。他给我谈他的想法和做法，征求我的意见，我也积极响应，尽量给他些主意。我毕竟不懂他的管理专业，因而多是在听他讲解，他常常讲得十分得意，好像我在给他当着学生。小时候听了我太多教训的儿子现在终于有机会发表他个人的见解了，能听得出来，在那滔滔不绝的讲述中，他似乎要补偿往昔的什么欠缺，通过告知我很多我还不懂的事情，他竭力在向我证实，他已经成熟，做了不少成绩，早已走出了交大附中当差等生时的劣势。

这本自述已写到结尾，只是走笔至此，我才欣喜地发现，我一直想通过文字争取的救赎，实际上已以另外的形式得到了实现。文字毕竟是文字，文字并不能改变已经形成的经验。岁月往矣，沉积在记忆中的经验好比树木的年轮，那一圈圈记录了寒暑旱涝的刻痕已从我的生命中抹不掉了。只有我自己能觉出那刻痕的深度，就像隐隐作痛的骨节能敏感到阴天的湿度。

我盼望索求了那么久的一纸平反书给我的只是纸面上的平反，我的真正的平反现在在我的儿女身上实现了。

我的父母始终认为我不争气、不成材，说我是他们的“害祸”。我把我自己收养给他人的做法，现在看来，也许在一定的程度上履行的正是我父母无意识层面的愿望。

但我现在无需担忧康倩和康庄什么，更无需接班我父母那徒劳的监督职责。在他们和我的相处中，再也看不出我出现在父亲面前时的那种警惕、躲避和畏惧，以及伴随着的厌烦情绪。他们没有必要隐瞒我什么，因为他们无需再担心自己所读所写的东西。康庄最喜欢把它写的英文短文电邮给我阅读，更喜欢听到我赞赏的评论。他只读英文书，尤其爱读名人传记，从杰斐逊直到弗兰克林。康倩还保持着读中文书的习惯，时不时翻出《红楼梦》读上一回。但她的阅读是随意性、消遣性的，轻松得一如清风吹过来翻动了几张书页，她太好玩了，至今都在文字中沉不进去。她也读朋友送我的书，严歌苓的小说，就饶有兴味地翻过几本。但她不读我写的书，好像在有意逗我气我，对我的书她向来视若无睹。有一次，我把我新出的一本书放在她床头想让她读，后来有点失望地发现，她并没怎么翻阅。女儿似乎觉察出我的失望，她对我说：

“爸哟，干吗那么认真的？文字是作者的录音带和录像带，我不认识那些作者，所以才读他们的书呢。咱们天天一起吃晚饭，饭后散步，你的声音笑貌就在我面前，连你写书时喉咙眼不断冒出的吭哧声我都听见了，还看你那些带子干啥？”女儿的话说得幽默，说得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过后我自思自问：还要在纸上追问什么答案，什么结局呢？这不就是答案和结局吗？

与女儿喜欢待在父母身边，无忧无虑度韶华的生活态度不同，儿子在事业上雄心勃勃，一直都不满足现状，老想去找更好的机遇。2003 年 10 月，康庄修完了网上的 MBA 课程，拿到了学位，立即去中国看了几家新开业的美国公司。他看中了上海，并得到了一家公司在上海总部的工作。返美不久，康庄就收到了那个上海公司的聘书，职位是地区推销主管。12 月底，他辞去纽约上州的工作，回家中做赴上海上任的准备。

秀芹一直在阻止儿子回中国工作。她劝了康庄，康庄不听，现在又转过来要我去劝。我能理解她那儿行千里母担忧的心情，但我并不想迎合她那种庸人自扰的灾难心理。不久以前的中国之行给她留下了太多的负面印象，于是她就在自己的想象中尽量夸大起那里的腐败及其腐蚀力量。她说上海现在是花花世界，到处都有娱乐场所，她担心康庄在那里工作没干好，

结果染一身坏毛病。又说儿子到那里搞推销，整天和生意人打交道，出进酒楼、歌舞厅，那里面肯定有贪官有奸商，有行贿受贿的勾当，有犯罪的危机，说放着这儿安安稳稳挣工资的活不干，放他到那里冒什么险去？

“你是中央四台的反贪电视剧看得太多了吧？”我忍俊不禁地问起秀芹。“你以为腐败和堕落是埋在你儿子脚下的地雷，一不小心就踩上了？现实并不等同你那些电视剧。腐败和堕落是无处不在的诱惑，既在我们身外，也在我们心内。只不过现在中国那边的环境变得比较恶劣了一些，难道在美国就不会腐败堕落了？美国的吸毒和暴力难道不厉害吗？你儿子怎么没吸毒、没杀人呢？遗传就是命运，”我在替儿子向她辩护，“要相信生物化学的因素在我们身上造就的人格力量。你若没给他遗传坏毛病，他就不会那么容易受到腐蚀，而你若不幸给他遗传了劣质的东西，很可能你再担心也没用处。对自己的孩子，还是持信任的态度为好，这其实就是另一方面的自信。你是基督徒，你能做的就是为他祈祷，他的吉凶，就交给上帝好了。”

我嘴里对秀芹说上帝，其实我心里想的是观世音菩萨，是这位世俗世界的守护神所体现的，也是我坚信不疑的善缘。如果说染色体是我们作为一个个体的“命”，“缘”就是每一个个体进入群体的“运”。命有所定，运则随缘而转。善缘乃是我们在事物运转总秩序中向善的趋势，其中既有我们先祖的积累，也有我们自己的努力。那是一条世代修持，递相承传的因果之链，是万有引力一样维系着这个世界的稳定力量，而血缘、家庭和人伦则是养育、输送这一力量的载体，只要血缘传下去，善缘就不会断裂。五十多年来，善缘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现在我们已经越来明显地看出，那个企图凭借偶然性改造世界的政党及其群体才是真正的反动力量。我，还有成千上万人对此一反动力量所做的反动，都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回归着善缘。

我相信我的儿子，是因为他一直成长在善缘运转的轨道上，他的平安就维系于这一沛然莫之能御的洪流。

秀芹在儿子出发前的神经紧张渐趋平缓，康庄也做好了他回国的准备。他将从纽约肯尼迪机场起飞，其时我这本自述正写到结尾，而苦于不知该怎样收尾。他的起飞突然给了我休止的灵感，也逗起了我对未来的展望。

他带上了他的美国护照和网上大学的 MBA 学位证书，还有刚刚增补的英文履历表，整个的人，清爽得像一张白纸上刚画上美丽的图画。我颇为欣慰地想着，在他的基因里，应该是贮存着我身上值得遗传下去的密码，但他的经验中却不会有我那些经验的半点阴影了。他比我矫健多自信多了，而且也比我安全得多，不管怎么说，安全局的记录上没有关于他一个字的黑材料。不管他将会遇到什么困难和遭受什么挫折，有一点属于他的优势则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那就是他现在的起点，一个如此年轻和富有机遇的起点，一个像喷气式飞机起飞一样的起点，仅此一点，我已足以放心。

已经是春天了，我走出书房，站在露台上向后院望去，游目枝头的新绿，放松着我有点疲乏的眼睛。一架飞机从我头顶的高空飞过，在蓝天上拖下长长一道白色的喷气，如纱带摇曳飘浮，似飞白一挥而过，逗引得我心事浩茫，游思万里。毕竟有一个牵挂飞到了那里，那里就是再遥远再与我隔离，我现在也通过儿子代偿性地介入了。那里对于康庄，并非淘金的处所，而是发展的园地，因为那里还有千千万迷失在善缘之外的挣扎者奋进者，他们也像他一样年轻有为，一样雄心勃勃，甚至有不少人比他更聪明精干，更富有潜力，但他们未必拥有像他现在这样优势的起点。我深切祝愿康庄与他们齐心协力，同舟共济，开创未来。同时，我又像以往那样习惯地默诵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